大汉王朝(套装共4册) (文化百科丛书)

王新龙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汉王朝(套装共4册) (文化百科丛书)

王新龙

前言

在中国历代的大一统王朝中，汉朝历时最久。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到公元220年汉献帝被废，除去王莽的短暂篡权，大汉王朝统治中国达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统江山时间最久的王朝。本书总结了大汉王朝刘氏家族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治世的良策、祸乱的渊薮，再现大汉王朝家族的立体全景和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

大汉王朝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寂寥，童话般华丽的封建王朝，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这个伟大的帝国投下的背影与梦想仍值得我们去追忆与品位。“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是什么让血管里流淌着血性与勇武的刘氏家族构建起的汉帝国轰然崩塌？

在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有二十多位皇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外戚争权也始终伴随左右：诸吕之乱、霍光揽权、王莽代汉、窦氏欺主……在刘氏家族与外戚家族的争斗中，宦官逐渐登上了舞台，于是汉亡了。

第一章

大汉400年的兴衰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要是没有汉朝，“汉”就只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至多只会产生一些得名于这条河流的地名。

汉元年（公元前204年）夏四月，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率领三万军队和自愿随从的数万官吏百姓离开关中，翻越秦岭，前往他的王都——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去统治自己的封地——汉中、巴、蜀三郡（约相当于今秦岭以南的陕西省、长江沿岸以北的四川省和相邻的湖北、甘肃一小部分）。“汉”的国名显然来自汉中，而汉中又得名于长江的支流汉水（又名沔水）。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汉”即将成为一个延续400年的朝代。

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出身农家，成年后当了泗水亭长，负责乡一级治安、文件传送和刑徒的押送。一次，他押送县里的刑徒去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为秦始皇建陵墓，才到丰邑西面刑徒就逃跑了不少。刘邦自知到达后也无法交差，干脆把刑徒们都放了，然后挑选愿意跟随他的十余名壮士，隐蔽在芒县（今河南永城县北）和砀县（今河南夏邑县东南）之间的山野中。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起义，附近农民纷纷斩木揭竿响应，起义军声势日盛。六国贵族旧臣、“群盗”、儒生游士或投奔陈胜，或乘机自立。陈胜在陈（今河南淮阳县）自立为张楚王，出兵三路攻秦：以吴广为“假王”（代理王）西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周市夺取魏地，又进军齐地；南路以召平攻广陵，邓宗攻九江。吴广军不利，又加派周文西进。周文军进抵咸阳附近的戏（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像）时，已有车千乘、卒十万。秦二世派章邯率在骊山修陵墓的刑徒为兵应战，击败周文。武臣占领邯郸后，自立为赵王，又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也自立为燕王。齐国旧贵族田儋在齐地自立为齐王，击退周市。周市在魏地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任魏丞相。

九月，沛县令眼看周围一些县的百姓杀了县官响应义军，迫于形势，也想响应陈胜，召属吏萧何、曹参商议。萧、曹是刘邦密友，就对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现在率领百姓造反，恐怕没有人会听从你。不如召回逃亡在外的人，可以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了。"县令派樊哙去召刘邦。

当时刘邦已集合了数百人，但就在他们接近沛县时，萧何、曹参从城内逃出报告：县令恐刘邦到后无法控制，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关闭城门防守，并企图杀掉萧、曹。于是刘邦写了一篇给城内百姓的告示，用箭射进沛城。告示上写着："天下人受够了秦朝的苦，巴不得它快灭亡。你们替县令守城，起义军一来，必定把城里人杀个干净。你们如一起把县令杀了，再拥立合适的人率领你们响应起义军，生命财产就能保全。何必为县令送死呢!"城中父老带领子弟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请他担任县令。刘邦谦让一番后，同意担任首领，按楚国制度称"沛公"，以服从已称楚王的陈胜。他还宣布，他曾斩了一条白蛇，是赤帝子杀白帝子的象征，白帝子代表秦朝，所以旗帜都用赤（红）色。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协助下，刘邦在沛县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队伍。

同月，楚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子项羽（项籍）起兵于吴（今江苏苏州市），不久率8000江东子弟渡江北上。

称王后的陈胜却自我陶醉，疏远故旧，丧失了时机。秦二世二年十月（秦以十月为新年正月，仍为公元前209年），章邯率秦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秦军又逼近荥阳，吴广被部将所杀。十二月（前208年），章邯进抵陈。陈胜败退，被为他驾车的庄贾杀害。后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杀了庄贾。

六月，项梁与刘邦在薛（今山东滕州市南）会合，拥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怀王，都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项梁、刘邦两军联合击败章邯，又杀了秦三川郡守、李斯之子李由。但获胜后的项梁骄傲轻敌，被章邯夜袭所杀。项羽收拾余部，与刘邦暂时退却，将楚怀王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尽管章邯不断取胜，但反秦势力此伏彼起，日益高涨。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的王。"

李斯等大臣劝秦二世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二世不听，反将李斯下狱。赵高诬李斯谋反，将他处死灭族；又指鹿为马，完全控制了二世。项羽在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大破秦军，成为诸侯的统帅。章邯战败投降，被项羽立为雍王，率降兵西进。赵高迫使二世自杀，立其侄子婴为秦王，子婴设计杀赵高。刘邦在攻占宛（今河南南阳市）后，乘虚而入，越过武关，进驻咸阳附近的灞上。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汉元年十月）子婴出降，刘邦入咸阳，秦朝亡。项羽闻讯，率军连夜西进，刘邦自知不是项羽对手，听从谋士建议，在封存了秦朝的宫室府库后，退回灞上。又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赢得了人心。不久，项羽在新安（今河南新安县西）抗秦降卒20万，率军入关，驻于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至鸿门与项羽相会，虽脱险而归，但不得不承认项羽的盟主地位。项羽在咸阳烧杀掠夺后东归。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立刘邦为汉王，封秦朝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统治秦国故地，阻挡刘邦东进。又调整诸侯王的辖地，将自己的亲信封于各王国的中心地区或富庶地方，而将原来的王改封于各国的边远地区。这样，除了项羽自己的统治区外，还有18个王国并存。项羽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迁都于郴（今湖南郴州市），在途中即将他杀死。

刘邦及其部属对项羽违反对楚怀王的诺言，依仗武力称霸的行径十分不满，但他们深知自己的实力还远不能与项羽抗衡，所以听从萧何的劝告，接受封号，去汉中就位，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达汉中后，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将来时所经过的栈道放火烧断，表示不想再返回关中，进一步麻痹项羽。

实际上刘邦一直在进行夺取天下的准备，经萧何推荐，他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为刘邦谋划，部署回师关中，围章邯于废丘，司马欣、董翳降汉。刘邦还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巩固了关中，又多方出击，扩大势力范围。

六国旧贵族起兵的目的是复国和占据更多的土地，项羽的分封自然引起诸侯的不满，不久战火复燃，项羽废杀韩王信，田荣逐走齐王田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又攻杀济北王田安。燕王臧荼杀辽东王韩广，吞并了他的封地。项羽忙于镇压齐地的反抗，兵力受到牵制。

刘邦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项羽。汉军一度攻占彭城，但以后遭到楚军反击，大败而归，连刘邦的父亲、妻子都被楚军俘虏。由于刘邦注意巩固后方，任用贤能，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因此尽管有过多次失败，还是逐渐占据了优势。汉四年（前203年）九月，汉、楚间停战议和，划鸿沟为界。但在项羽撤兵后，刘邦立即发动进攻。汉五年十二月，楚军被围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突围南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被汉军围困，自刎身亡。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县境内）即皇帝位，定都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同年迁都关中。因秦都咸阳已完全毁坏，新建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为首都。

当初为了击败项羽，刘邦不得不利用实力强大的部将和项羽降将，满足他们拥兵封王的要求。消灭项羽后，刘邦集中了兵权，但还保留了七个异姓诸侯国。为了与这些异姓诸侯国抗衡，刘邦又分封子弟，建立了九个同姓诸侯国。这样，诸侯国的封地占了国土的大部分。经过镇压和调整，到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时，异姓诸侯中的韩信、彭越、黥布、卢绾等都已被杀或被废，只剩下一个安分守己、地僻国穷的吴氏长沙国，同姓诸侯与中央集权的较量成为主要矛盾。

刘邦临终前，对后事做了安排，规定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相继为丞相。刘邦死后，其子惠帝（刘盈，前195～前188年在位）软弱无能，太后吕雉专政，成为实际统治者。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直接执政。吕后对刘邦的其他姬妾和她们的儿子是相当残忍的，她毒死赵王如意，杀害了其母戚夫人，又害死赵王友。惠帝无子，吕后将宫中美人之子冒充惠帝皇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杀死。惠帝死后，太子名义上已经即位，实际被吕后幽禁后杀害。吕后又玩弄权术，大封吕氏王侯，并让吕禄、吕产、吕台等掌握兵权，控制了皇宫内外的警卫。但吕后“政不出户”，并没有改变刘邦的政策。加上萧何、曹参等连续担任丞相，国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刑罚有所减轻，农业生产受到重视，产量增加。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在此前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已做了应变准备。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起兵西进，与拥重兵屯驻荥阳（今河南

荥阳市东北）的颍阴侯灌婴相约，一旦吕氏有变就合兵讨伐，这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陈平、周勃与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襄之弟）等设计夺取吕禄的兵权，由周勃指挥北军，清除吕氏势力。大臣商议，拥立刘邦庶子、代王刘恒（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为帝。

文帝和其后的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在位的41年间，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注意“与民休息”，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相对较轻，刑罚也比较宽大。经济有了发展，国力逐渐加强，史称“文景之治”。

同姓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终于在景帝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濞、楚王戊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出兵镇压，在三个月内击败叛军。此后，朝廷不断采取削弱诸侯国的措施，彻底消除了分裂割据的威胁。

到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初，汉朝的统治已相当稳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物资储备充足。汉武帝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发动反击，不仅收复了秦末汉初的失地，还夺取了河西走廊、湟水流域等地，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在西南夷地区，汉朝扩大了行政区域，将众多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自秦末以来保持着割据的东瓯、闽越、南越政权先后被灭，置为郡县。灭朝鲜后，朝鲜半岛北部成为汉朝的政区。至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降汉，汉匈间恢复和平，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西汉的疆域达到极盛。

汉武帝像汉武帝时连年的战争、大规模的工程、巡游求仙和挥霍浪费，耗尽了历年的积蓄，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官僚豪强的兼并和剥削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沦为奴婢、佃客、佣工或流民，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武帝实行统一货币、盐铁专卖和平准、均输制度；还发动算缗和告缗，直接剥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富。并任用酷吏，实行严刑峻法。武帝晚年对政策有所调整，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尖锐的社会矛盾稍有缓和。

昭帝（刘弗陵，前87～前74年在位）即位时只有8岁，由霍光等接受武帝遗诏辅政。在这13年间，霍光对外不轻易发动军事行动，对内多次减免赋税，节约开支，取消武帝时的一些弊政和苛法，使社会趋于稳

定。

昭帝死时尚无子嗣，霍光与大臣商议，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但据说刘贺即位之初就昏乱无道，霍光与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决定废昌邑王，迎立武帝曾孙刘洵为帝（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宣帝初年，大权仍由霍光执掌，神爵三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亲政。

宣帝多次下诏征召贤能，安置流民，减免田赋，赈济灾民，还一再派人到各地考察吏治，查处不法官员，并亲自审核疑案大案。由于他来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了解“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所以注重对地方官的任命和考核，对成绩突出的官员及时进行奖励和提拔。魏相、丙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都是当时的名相良吏，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称职，“汉世良吏，以是（宣帝时）为盛”。宣帝对匈奴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没有乘人之危，而是以隆重的礼节和丰厚的资助接纳呼韩邪单于的归附，并帮助匈奴内部恢复秩序，保持匈奴基本独立的地位，使汉匈边界维持了60年的和平安宁。宣帝时期实现了西汉的中兴，成为与“文景之治”相似的又一个恢复和发展阶段。但宣帝对外戚的过度封赏，对宦官的任用，都为此后外戚和宦官势力的膨胀留下了伏笔。

即位的元帝（刘奭，前49～前33年在位）改变了宣帝“王霸道杂用”的策略，重用名儒学者，虽有宽政减刑、治国安邦的愿望，却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更没有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政治日益腐败。成帝（刘骜，前33～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氏开始控制朝政，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成帝软弱无能，只能听任外戚专政。哀帝（刘欣，前7～前1年）即位后，傅、丁二家外戚取代王氏，外戚专政的情况依然如故。哀帝重用嬖臣董贤，赏赐无度，诛杀规劝的大臣。哀帝死后，王氏外戚重新执政，9岁的平帝即位，政权实际已由王莽执掌。公元5年平帝死，据说是喝了王莽献上的椒酒。次年，王莽立二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自己摄政（称居摄）。至公元8年，王莽即皇帝位，国号新，西汉亡。

新朝的建立没有给社会带来生机，王莽的改制接连失败，对边疆少

数民族的军事行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速了新朝的覆灭。

最先对王莽政权发动反抗的，是受害深重的北方边民。不久，各地相继出现农民暴动。天凤四年（17年），荆州饥荒，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聚集数百人于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各地流民纷纷投奔，数月间达到七八千人，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率军镇压，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扩大到五万余人。次年绿林山瘟疫流行，绿林军分路出山，一支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江陵），称下江兵；一支北上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称新市兵。平林人陈牧等率众响应，称平林军，其中有西汉宗室刘玄。宗室刘绩、刘秀兄弟也组成舂陵军，与下江兵合作。绿林军为扩大影响，拥立刘玄为皇帝，恢复汉朝，称更始元年（23年）。王莽派数十万大军阻击，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说服众将坚守，自己突围求援，其后以三千援兵击毙敌军主帅。与城中合兵，取得大胜。昆阳大捷后，绿林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攻克洛阳，一路西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直取长安。王莽危急，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儒生、百姓因哭得悲哀而被封官。九月，更始军入长安，王莽逃至宫内的渐台，被暴动的民众杀死。公元24年初，更始帝由洛阳迁都长安。

另一支起义军赤眉军是由琅琊（今山东东南一带）人樊崇发动的，最初在莒县（今属山东莒）起义，在泰山、北海（今山东境内）一带活动。地皇三年（22年），王莽派廉丹等率十多万军队镇压，为在战斗中与敌军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涂红，因而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县境）击败王莽军，杀廉丹，势力大振。更始帝在洛阳时，樊崇等曾接受了他的封号，但因受到排斥，又脱离了更始。当时赤眉军部众想返回故乡，军心不稳，为防止瓦解，樊崇等决定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东）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而更始内部一片混乱，演变为兵变火拼。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等先后投降。

更始帝在洛阳时，派刘秀镇慰河北。刘秀收编地主武装，消灭农民起义军和敌对力量，在河北建立基地，脱离了更始帝。在赤眉与更始厮杀之际，刘秀乘机遣部将攻城略地。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部（今河北

柏乡县北）南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恢复汉朝，史称东汉或后汉，刘秀死后被称为世祖光武帝。同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建武三年（27年），赤眉军的主力在离长安东归途中向刘秀投降。同年，割据中原的梁王刘永从被刘秀包围的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县南）出逃，被部下所杀。建武四年，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至六年初攻克，李宪被俘。建武五年，刘秀的部将吴汉杀刘永之子刘纡于郯（今山东郯城县），张步杀苏茂后投降。建武六年，吴汉克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俘董宪、庞萌。至此，刘永势力全部肃清。同时，割据黎丘（今湖北枝城市北）的秦丰被俘。占有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的延岑和田戎等逃亡，投公孙述。割据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的彭宠被其苍头（家奴）所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东汉所有。

建武五年，据有河西的窦融归附东汉，使割据陇西的隗嚣处于孤立境地，致使其向据有巴蜀的公孙述称臣，合力抗汉。建武八年，刘秀与窦融两路夹击，消灭了隗嚣的主力。建武九年正月隗嚣死，十年十月，其子隗纯降，陇西平定。建武十一年，汉军两路大军攻蜀，十二年十一月公孙述战败受伤身亡，成都降，巴蜀平，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消灭。至此，除了一些边疆地区外，全国重新统一。

光武帝（25～57年在位）实行“务用安静”（务必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政策，“以柔道行之”（实行富有弹性而灵活的政策）。他注意减轻赋税徭役，提倡节俭，放宽刑法，释放奴婢，并省郡县，精简官吏，任用良吏，打击豪强，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恢复。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时，基本继承了光武帝的政策，同时对诸侯王加强控制，防范外戚专政，所以政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在此期间，南匈奴降汉南迁，东汉初的失地收复。北匈奴被击败，西域都护府重建。

但即使是在东汉的全盛时期，也没能再造西汉的辉煌。和帝以后，东汉初就预伏着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而且日益严重。

光武帝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支持才登上帝位的，特别是他故乡南阳一

带的宗室、豪族，是他主要的依靠力量。东汉初，官僚豪强拥有大量土地，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他们大多凭借权势隐匿不报。户口隐漏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其中一部分就隐匿在官僚豪强名下。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各州郡认真清查核实垦田数和户口登记，就是为了将被隐漏的土地和户口清查出来。但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和豪强地主勾结起来，以“度田”为名，对农民实行苛刻的清丈，连屋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也要计算，而对豪强却百般优待庇护，百姓怨声载道。光武帝得知后，将有舞弊行为的十余名高官处死，但各地都出现了“大姓”、兵痞和“群盗”（一部分为起义农民，一部分为盗匪）的武装反抗，袭击行政机构，杀死官吏。地方政府加以追剿，军队一到就不见踪影，军队撤退后又重新集结。光武帝只能采取变通办法，“度田”不了了之。

古代青铜器连开国皇帝也无法触动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以后的皇帝就更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东汉期间豪强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被他们隐匿的田地和户口也越来越多，转嫁到在籍的农民头上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而东汉的国力却越来越弱。

章帝死后，就接连出现少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秉政的局面。而少主一旦成年，就依靠宦官夺回权力，清除外戚。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一次次重演，成为东汉无法摆脱的轮回，直到覆灭。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制造出一次次权力斗争，使大批文武官员和无辜平民成为牺牲品，而且导致吏治腐败，国势衰落。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清议”之风，即评议鉴品人物。善于清议的名士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领袖，他们的贬褒左右着舆论，影响着士大夫的进退。清议起了扬清激浊、发扬正气、揭露黑暗的作用，但往往失之偏激、矫枉过正，甚至故作姿态、哗众取宠，名士中混杂了不少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士人的太学，很自然地成为清议的中心。而当权的宦官集团是清议的主要目标。这种斗争又与朝廷的权力斗争、外戚与宦官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为桓帝（刘志，146～167年在位）、灵帝（刘宏，167～189年在位）时发生的“党锢”事件。

使东汉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矛盾。地方官吏对羌人的残暴统

治，引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朝廷屡次出兵镇压，并将一部分羌人迁至陇西、陇东和关中。羌人的反抗波及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迫使朝廷将西北和关中的行政机构内迁，还强迫百姓随同迁移，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长期镇压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剧了民族矛盾。

灵帝时，钜鹿人张角传播太平道，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其徒众迅速增加到几十万，遍布八州。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起义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爆发，并迅速得到各地响应。尽管黄巾军的主力在9个月后就被镇压下去，但余部仍在各地坚持，张鲁以“五斗米道”为基础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在汉中存在了二十多年。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将领和地方官乘机掌握了军政权力，形成与朝廷抗衡和分裂割据的基础。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外戚何进联合官僚、名士，与宦官集团做了最后一场较量，结果两败俱伤。地方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协（献帝），控制朝政。关东州郡联兵讨伐，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但董卓实际控制的范围有限，统一的东汉政权已不复存在。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王允计杀，但其旧部又杀了王允，仍控制着朝廷。不久，董卓旧将自相冲突。献帝逃出关中，依附曹操，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曹操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刘备占有巴蜀、汉中和西南，孙权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和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击败曹操，从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20年，曹丕迫使献帝禅位，名义上的汉朝至此也结束了。

一般史书上将西汉的起迄时间定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东汉则自公元25年至220年。严格地说，公元前206年刘邦自己只称汉王，统治区范围也有限，至公元前202年才称帝，至此汉朝才开始。这样算来，西汉有210年，东汉有195年，合起来共405年。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

央集权政权至清朝被推翻，在这2132年间，比较长的宋朝（北宋、南宋合计，算至1276年宋廷降元）是316年，唐朝是289年，明朝是276年，清朝是267年，没有一个能超过汉朝。

如果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西汉所拥有的稳定疆域基本保持到了清朝前期，尽管在边疆的局部地区有所盈缩，但主体部分并没有变化。

“汉承秦制”，但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它的制度还来不及经受时间的考验，秦朝的短命更给它的制度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真正使秦朝的制度得到保持、发展和完善的还是汉朝，而只有经过了汉朝四百年的检验，这些制度的适用性才得到了确认，这就是当时很多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原因。

传世的文献资料使我们了解到，汉朝曾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强大而富足的国度，拥有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灿烂丰富的文化。考古的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书、地图、帛画和大量实物，长安和其它古城遗址，居延和河西其它地方的汉简、连云港尹湾出土的汉简、中山王墓中的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等等，更证实了文献记载。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汉”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绝不是偶然的。

汉朝为什么会建立?为什么会延续四百年?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又为什么会走向覆灭?读了本书后，你必定会找到一些答案。楚汉之争的胜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秦朝失掉了它的帝位，天下人一齐争夺，本领强的人先抢到。）

公元前202年初，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被汉王刘邦和各路诸侯的联军牢牢地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入夜，四周传来一片楚歌，使项羽大吃一惊：“莫非汉军已经占了楚国?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他知道大势已去，再也睡不着觉，在营帐中喝着闷酒。喝着喝着，项羽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唱起一曲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我有盖世的勇气，有撼山的伟力），时不利兮骓

不逝（可惜时机不利，连宝马也跑不快），骓不逝兮可奈何（宝马也跑不快，我奈何它不得），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啊虞姬，我怎样才对得起你）！

在左右的哭声中，项羽泣别爱姬，趁黑夜率领800骑兵突围南奔。黎明时分，汉军发觉，立即派灌婴率5000骑兵紧追不舍。渡过淮河后，项羽的随从已逃得只剩下百余人。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时，项羽迷了路，向一位农夫问路，他指点往左走，使项羽一行陷于一片沼泽，让汉军追上了。项羽且战且奔，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时只剩下28骑。在数千汉军骑兵的追击下，项羽自知不免，感到老天爷实在不保佑他，对部下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了，亲自打了七十多仗，所向无敌，从来没有败过，所以才称霸天下。可是今天却被困在这里，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作战的过失。现在我要决一死战，快速打三次胜仗给你们看看，每次都要杀掉对方的将领，砍断汉军的军旗。让你们明白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仗打得不好。"果然，项羽所向披靡，三次在汉军中夺旗斩将，但却无法摆脱汉军的追击。

项羽像项羽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亭长请他上船过江，劝道："江东（江南）还有地方千里，数十万民众，也足以称王。现在只有我有船，大王快上来过江，汉军无法渡江。"项羽笑道："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况且我当初与八千江东子弟一起渡江而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回去，就是江东父老可怜我，还尊我为王，我有什么脸再见他们?纵然他们不骂我，我心里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项羽将坐骑送给亭长，用短刀与汉军搏斗，又杀了数百汉军，自己也受伤数十处。这时，他见到了熟人吕马童，问："这不是老朋友吗?听说汉王用一千斤金子和一万户封邑买我的头，就成全了你吧!"说着举刀自刎。王翳抢上去砍了他的头，将士一哄而上争夺他的尸体，自相残杀，死了数十人。最后，吕马童等四人各抢到一块请功，于是封他们五人为侯。

项羽死后，楚地全部降汉，只有他的封地鲁城（今山东曲阜市）还在坚守。汉军扬言要屠城也不起作用，直到将项羽的头拿来，城内人确信项羽已死，才开门投降。至此，楚汉之争以汉王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自从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出咸阳城投降，交出皇帝玺绶，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秦朝失去的“鹿”终于被刘邦夺得。

实际上，在秦末参与逐鹿的群雄中，刘邦一开始并不具有“高材”的资格。

在刘邦成为汉朝的“太祖高皇帝”后，尽管史臣给他编造了一系列神话，却无法掩盖他出身“细微”的事实。刘邦出身在一个普通农家，父母连名字都没有，史书上只能称为“太公”和“刘媪”（刘大娘）；本人只担任过亭长，是最低级的吏。而项羽家世代楚将，是名将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参与角逐的其他诸侯中，章邯是秦朝大将，曾经统率数十万大军；司马欣是章邯的长史（相当秘书长兼参谋长）；董翳是都尉；魏咎、魏豹是原魏国王族；韩王成是原韩国公子；赵王歇是原赵国王族；田儋、田市、田都、田安、田假都是原齐国王族；张耳、陈余是原魏国的名士。论出身和家庭背景，都比刘邦有更大的号召力。

起兵前的刘邦没有什么能耐，好吃懒做，不治家业。有一次他拉了朋友来家吃饭，大嫂很讨厌，故意将锅底括得很响，使他们以为锅里已经没有什么羹了。他爱喝酒，却没有钱，经常向王媪、武负家赊账。据说王、武二人见他醉卧时上面有龙，常常将他的账一笔勾销。这是他当了皇帝后的记载，实际可能是他经常赖账。他好色，大儿子刘肥就是他和一位“外妇”（姘妇）曹氏生的。刘邦当亭长后，与同事吃吃喝喝，关系拉得不错，但押送刑徒去咸阳时，还没有出县境就让不少人逃跑了。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是沛县令的朋友，来到沛县后贺客盈门，负责收贺仪的萧何只能规定：“礼钱不满一千的人，请在堂下就坐。”刘邦登门后声称“贺钱万”，吕公闻讯大惊，连忙起身迎候，招呼他就座。其实刘邦身上一文不名，萧何知道他的底细，怕自己为难，就说：“刘邦一向好说大话，办不成正经事。”刘邦却仗着人头熟，大模大样坐了上座。这居然引起吕公的好感，将女儿（吕雉，以后的吕后）许配给了他。正因为如此，刘邦的父亲称他为“亡（无）赖”，其行为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项羽年轻时虽不愿读书学剑，却希望能学“万人敌”（能对付万人的本领），并粗通兵法。他身长8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武功不可谓不强；见到秦始皇巡游的排场后，竟说“他可以被取而代

之”，比刘邦在咸阳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更有气派，志向不可谓不高。从他的作战记录，特别是最后的垓下之战看，他称得上是当时最勇猛的将领，当然远在刘邦之上。他自杀时31岁，没有后人，仅与虞姬的泣别见于记载，大概不像刘邦那样寻花问柳。笃信儒家礼仪的鲁城父老居然愿意为他死守，作为一位失败者而没有留下个人丑闻，项羽的人品看来比刘邦要好得多。

刘邦起兵时，只在沛县征集到二三千人，而项梁、项羽渡江时已有子弟兵8000。刘邦连故乡丰邑也攻不下，得到项梁资助的5000士卒和10名“五大夫将”后才取胜。项梁在时，刘邦听从他的调遣。项梁死后，对付秦军主力章邯的是项羽。刘邦打的硬仗不多。入关后，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而项羽拥有40万大军。刘邦去汉中时，项羽只拨给他3万士卒，沿途还有不少人逃亡。就是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也屡次失败，父母妻子被俘，胸口中箭，几次死里逃生。

但是历史恰恰让刘邦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给项羽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我们当然可以说，推翻秦朝的统治，重新建立统一政权，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推翻秦朝的起义是由陈胜、吴广发动的，在刘邦之前已有很多人参加，项梁、项羽是与刘邦同时起兵的。实际上，消灭或牵制秦军主力的并不是刘邦，要是没有刘邦参与，秦朝也不可能再延续。刘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的暴政，但在其他诸侯控制的地区似乎也没有再继续实行秦朝的政策。如果由包括项羽在内的其他人来重新统一中国，并不一定比刘邦建立的汉朝差。所以，秦朝的覆灭和新朝代的建立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并没有注定非得由刘邦来完成。

还有人说，项羽的失败是因为他分封诸侯，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倒退了。可是刘邦在与项羽抗争时也是大封诸侯，汉朝建立之初又加封了不少同姓诸侯，如果说这是权宜之计，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也权宜一下呢？

以前还有人说，项羽出身楚国贵族，而刘邦出身劳动人民，所以刘邦能继承农民起义的事业。那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邦的最终目标也是

当皇帝，他所建立的汉朝与秦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使真是如此，陈胜、吴广，还有诸侯中的黥布、韩信、彭越、卢绾等的出身都属于劳动人民，也未必轮到刘邦。

所以说，历史提供了一种机遇，但并非只给刘邦一人，却让刘邦争取到了。从这一角度看，刘邦的成功自然不是偶然的。

刘邦初登帝位时，曾经让列侯诸将说出他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要求他们直言无隐。高起和王陵说："陛下为人傲慢，对人没有礼貌。项羽讲仁义，又爱护别人。但您派人去攻城略地后，战利品和俘虏都赏给了他们，有利益与大家共享。项羽妒贤嫉能，陷害有功劳的人，怀疑有本领的人，打了胜仗的人不给记功，得了土地的人不给予好处，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运筹决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良）；主持行政机构，管理百姓，保证供应，使粮食的运输线不断绝，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人物，我能使用他们，这才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会败在我手里。"

刘邦与韩信也有过两次对话，一次是他刚拜韩信为大将，韩信问他："大王自料勇悍仁强比项羽怎样?"刘邦沉默了好久，只得承认"弗如"。另一次，刘邦与已被剥夺了兵权和王位的韩信讨论诸将带兵的本领，问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刘邦问："那你呢?"答："像臣这样，多多益办（善），带得越多越好。"刘邦笑道："多多益办!那怎么会被我利用呢?"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而能带将，所以我会被你利用。况且您的本领是上天赋予的，非人力可比。"

看来，刘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本领有限，远不如项羽，所以如要战胜项羽，只能重用杰出人物，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克敌制胜。韩信的评价虽有溢美之处，但也说明刘邦的用将本领比他自己带兵要强，所以尽管他本人的武功和指挥能力远不如项羽，却能利用韩信等将领去战胜项羽。

或许正因为刘邦明白自己没有多大能耐，所以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开始的决定往往很成问题，但得到正确的意见后就不再坚持己见，楚汉之争中几次关键性的决策都是他采纳别人意见的结果。

郦食其去见刘邦时，他正让两个侍女替他洗脚，郦食其数落他道：“要是你真想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对长者如此无礼。”刘邦立即起身，整理好衣服致歉，请他上坐，并采纳他的建议袭击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获得了秦朝的储备粮。

出游图刘邦的军队攻至南阳郡时，秦朝的郡守死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他准备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劝道：“你虽然急于入关，但秦兵尚多，又占据了险要。现在如不攻下宛城，它在后面袭击，强大的秦军又在前面，是很危险的。”于是刘邦连夜引兵返回，到黎明就完成了对宛城的包围。当南阳郡守派舍人来讲了一番道理后，刘邦及时接受他的投降，赢得了首先进入关中的宝贵时机。

进入咸阳后，刘邦原来打算住在宫中，听了樊哙、张良的劝阻后，就将秦朝的重宝财物府库全部封存，回到城外灞上驻扎。他误听了别人意见，派军队封锁武关，以便阻挡诸侯入关，独霸关中。被激怒了的项羽不仅攻破武关，还准备发动攻击，消灭刘邦。刘邦闻讯后，完全听从张良的安排，结交项羽的叔父项伯，通过他向项羽疏通，又亲赴鸿门宴，在张良、项伯的协助下消解了这场灾难，死里逃生。

项羽背约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气得想与项羽拼命，周勃、灌婴、樊哙等也劝刘邦动手，萧何却加以劝阻：“现在兵力不如人家，百战百败，岂不是白白送死?”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封地，以汉中、巴蜀为基地，还定关中，进而统一天下。

萧何多次推荐韩信，没有受到刘邦重视。萧何亲自追回韩信后，再次向刘邦推荐：“您如果打算长期统治汉中，韩信没有什么用；如果一定要争天下，不用韩信就没有人可以商量，您自己打主意吧!”刘邦立即同意用韩信为大将。萧何说：“您一向傲慢无礼，现在拜大将就像找个小孩来玩玩，怪不得韩信要走。如果您真想拜他为大将，必须选个好日子，斋戒，专门建拜将坛，举行隆重的仪式。”刘邦一一照办，这才获得了韩

信这员大将，赢得了还定三秦的胜利。

以后，刘邦一度听信郦食其立六国的后人为诸侯的建议，连印都刻好了，听了张良的八点反对理由，刘邦又气又急，大骂："这臭小子，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立即将印销毁。在荥阳被围时，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失去了范增。刘邦准备再次东进时，听从袁生的计谋，改为出武关，进军南阳盆地，调动项军南下。韩信灭齐后不听调遣，刘邦想以武力镇压，经张良劝阻后改为封韩信为齐王，赢得韩信在关键时刻的支持。项羽同意以鸿沟划定双方界线，释放了刘邦的父母妻子，刘邦心满意足准备退兵回关中，又是张良、陈平进策，刘邦才转而追击项羽。在最后决战时，兵力最强的诸侯韩信、彭越按兵不动，汉军被楚军击败，只能深沟高垒固守，刘邦接受张良建议，调整扩大韩彭的封地，换来他们的出兵，形成对项羽的合围。要是刘邦像项羽那样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以上每一步都可能失误，都会导致无可挽救的失败。

不过，仅仅能用人，能从善如流是得不了天下的。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邦还有他独特的本领。或许他不愿当众表白，以往的史家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那就是他在"争天下"的坚定目标下，实行相当灵活的策略，甘冒风险，又能屈能伸，甚至不择手段，从来不讲究光明正大、说话算数，不愧为"亡（无）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刘邦这样一个出身"细微"的人来说，这是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别无选择。

就拿他见吕公的事来说，按他的家境是拿不出一千钱作贺仪的，要是按规矩办事，只能老老实实坐在堂下看热闹；就算咬咬牙，凑上一千钱，也不过在堂上当陪客。而一句"贺钱万"使他轻而易举坐了首席，成为吕公嘉宾，还娶到了有身份的妻子。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也无伤大雅。就算被揭穿了真相，问题也不大，萧何定的办法毕竟不是法律，算不上犯法。刘邦本来就是无赖，也不怕在同事面前丢脸。

楚怀王派军队入关伐秦时，秦军还很强大，诸将都不敢争这个先，刘邦却敢于接受"西略地入关"的命令，说明他有胆略，不怕死。但项羽想与刘邦一起入关，却始终没有被准许，原因是怀王身边的"诸老"反对。诸老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猾贼"，经过的地方都被他烧杀破坏，而刘邦一向是"宽大长者"。其实，诸老对刘邦的了解并不全面，也不深入，

只是刘邦的表面文章做得更好，又重视公关。

诸老对项羽的坏印象之一是他曾将襄城（今河南襄城县）的人全部杀光，但刘邦初起兵时就曾威胁沛县百姓，要不响应他，就会“父子俱屠”；西进时攻下颍阳（今河南许昌市西南）后也“屠之”，杀了个一干二净，也有过很残暴的表现。

就是刘邦最受人称道的入关后的表现，更多的也是宣传手段。他不是不想住豪华的宫殿，只是张良等加以劝阻。他封了秦朝的珍宝府库，但在进咸阳之初，“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已接管了秦朝丞相和御史收藏的“律令图书”（均见《汉书·萧何传》），鸿门宴时刘邦送给项羽的璧和送范增的玉斗，当然也是秦宫中的珍宝，只是刘邦没有像项羽那样明火执仗抢掠破坏，也没有将府库搬空，留下一部分应付项羽和其他诸侯。“约法三章”的主要意义是废除秦朝的苛法，但这一点谁入关后都会实行，而“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三条法令实际是无法执行的。因为一方面，要确定杀人、伤人、盗窃罪并非容易，伤人与盗窃程度相差很大，如何抵罪?不同的罪执行什么刑罚?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很多，远非上述三种，百姓犯其他罪怎么办?现在能看到的秦律还很多，难道当时都废了?况且从刘邦入关到项羽入关不足两个月，“约法三章”不会有实际效果。至于刘邦谢绝百姓的牛羊酒食慰劳，正如他自己所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仓库中粮食充足，不缺，不想麻烦别人。）算不上是什么德政，却换来了百姓的喜悦，唯恐他不能当关中的王。

刘邦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当然是要当关中王，所以才派兵守关，想阻挡项羽和诸侯入关，只是兵力不济，被项羽一冲就垮。到了项羽大兵压境，刘邦把守关的责任都推给了出主意的“鲰生”，又向项羽表白守关只是为了防止盗贼和治安需要，“我日夜在盼望将军来关中，怎么敢背叛呢?”以后又忍着一肚子怨气，听任项羽背约，接受边远地区的封地。

等到刘邦回师攻占关中时，深恐项羽趁他立脚未稳，发动反击，特意让张良带信：“汉王只是想取得关中作为自己的封地，只要恢复原来的协定就会停止军事行动，不敢向东扩展。”又将齐国、韩国的“反书”送给项羽，上面写着“齐国准备与赵国一起灭楚国”。项羽果然上当，没有入

关对付刘邦，却集中兵力进攻齐国，使刘邦占有整个关中，并巩固了后方。

刘邦不能再打关中牌，就利用项羽杀了义帝的借口，打出“伐无道”的旗号。刘邦为义帝发丧，连续三天去义帝灵前号啕大哭，派使者通告各路诸侯：“义帝是天下共同所立，大家一致臣服，现在被项羽放逐到江南杀害，真是大逆无道!寡人亲自为义帝发丧，全军戴孝，出古代瓷人动全部兵力，愿随着各位一起讨伐楚国杀害义帝的凶手。”就这样，为自己争夺天下变成了替义帝伸张正义。

在荥阳被围，无法逃脱时，他让纪信乘上汉王的车，装成汉王出东门投降，自己趁机从西门逃走了。要是项羽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宁死不走的。项羽作战不利，将刘邦的父亲放在一个高木墩子上，警告刘邦：“再不退兵，就将你老子下油锅。”刘邦答复：“我与你曾经在楚怀王前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一定要烹你父亲，希望能分碗肉羹尝尝。”这样的话，自然只有刘邦才说得出。项羽最终没有杀刘太公，固然是有项伯的劝阻，但正如项伯所说“为天下者不顾家”，刘邦做到了这一步，杀了他父亲又会有什么作用?

韩信攻灭齐国后，借口形势复杂，没有一个“假王”（代理国王）就难以统治，要求立他为“假王”。当时刘邦正被楚军围在荥阳，见到使者送来的信后气得破口大骂：“我被围在这里，日夜在盼你来帮我，你倒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赶快在背后暗示，在他耳边说：“现在我们处境不利，哪能阻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主动立了他，与他搞好关系。要不，会出乱子。”刘邦也醒悟了，索性骂下去：“大丈夫平定了一个诸侯国，就该当真王，还当什么假王!”派张良封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兵力进攻楚军。要是刘邦不耍点花招，直截了当地拒绝韩信的非分之想，韩信肯定不会出兵相助，至多只会自立为齐王后隔岸观火，听任项羽灭掉刘邦，甚至会投入项羽一边。

要是刘邦恪守儒家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他绝不会成为以上这些较量的胜利者，也就当不成汉朝的太祖高皇帝了。有人说，开国皇帝十之八九是流氓无赖，只有流氓无赖才能成功，并非没有道理。刘邦如此，其他出身低微的开国皇帝莫不如此。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专制社会中，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按照正常的途径是绝对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的；而在家天下的世袭制下，更不可能合法地当上皇帝。非正常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是武力，一是阴谋。武力是不可少的，但光有武力还不够，得武力和阴谋结合。问题是出身低微的人在开始时不可能有很大的武力，像刘邦起兵时只有二三千人，这还得益于他当过亭长，在草莽中啸聚了数百人，还有萧何、曹参等现职县吏的帮助。凭这二三千人几乎不能与其他任何一支反秦武装匹敌，更不用说最终将它们一一收编或消灭。

当然还可以用实行“仁义”的办法，至少可以达到争取人心的目的。但讲仁义得有条件，即大家都讲仁义，单方面讲仁义就只能当东郭先生，下场往往比东郭先生还惨。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是比较讲仁义的，但对手胡亥（秦二世）和赵高却不讲仁义。面对伪造的秦始皇的诏书，扶苏只能选择自杀。在与刘邦的争斗中，项羽不止一次有过消灭刘邦的机会。项羽入关之初，已经部署了对刘邦的攻击，以当时的力量对比，刘邦毫无活路。而且刘邦守关阻拦诸侯，已经给了项羽很合适的借口，可以取得其他诸侯的支持。但项羽听了刘邦的辩解后放弃了袭击。在鸿门宴上又迟迟不实行与范增商定的行动，刘邦秘密回营后也就不了了之，固然是由于他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但主要还是范增所批评的“不忍”，即没有完全不顾“仁义”，而刘邦对付他时就没有那么多“仁义”了。再说，即使是为了争取人心而实行的“仁义”。也得有实行的条件，施行者得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拥有一定的地位。像刘邦宣布约法三章，前提就是他进了咸阳，成了关中的实际统治者，否则不是被当做空头支票，就是会被人视为痴人说梦。比较而言，“仁义”只对已经拥有权势者、当道者有利。出身低微的人要靠行仁义得天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找到的理论根据是“天命”。有了天命就不怕出身低微，也不怕别人指责你手段不光明正大，因为天命在身的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可是天命并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不是一只真正的鹿，古往今来，声称自己得天命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最终被承认的只是少数成功者。所以那些人的得天命，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预言，而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是出于事后的追认和伪造。相反，失败者即使原来拥有过一些得天命的迹象，也会随着失败的来到而使之荡然无存，因为失败本身就证明是“天之所厌”，是天命的丧失。

就拿刘邦来说，汉朝的史官记载了他很多得天命的征兆和事迹，实际都经不起深究。《史记·高祖本纪》说，他母亲刘媪在湖边睡觉，梦中与神仙发生性关系，当时天色昏暗，电闪雷鸣，刘太公去找她时，见到有蛟龙在上面盘旋，刘媪就此怀孕，生下了刘邦。这样的故事本来是母系社会“知母不知父”的残余，后来成了真命天子出世的公式。但这种事要编造也再简单不过，因为除了刘太公夫妇外，没有谁能够证明。据说刘邦的相貌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也就是高鼻子，高额骨，长脖子，大胡子，相貌或许有点异常，但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情况下，真正见过刘邦的人毕竟有限，到了他死后，就随便史官自由描绘了。至于说他左大腿上有72颗黑痣，就更玄了，因为当时不兴在公共场所穿三角裤或裸体，除了他的父母妻妾，谁能看到这些痣并数一下究竟有几颗?

其它三个故事，一是老人看相。刘邦当亭长时，请假回家种田。一天，妻子吕雉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干农活，一位老人路过，向她要些吃的，吕雉给了他。他看了吕雉的相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雉让他看两个孩子，他看了儿子后说：“夫人之所以能当贵人，就在于这个孩子。”看了女儿后也说是贵人。老人走后，刘邦恰好从邻居家过来，吕雉详细告诉了他，刘邦听说老人走了不远，赶快追上去，让老人给自己看看。老人说：“刚才夫人与小孩都与你相似，你的相贵不可言。”刘邦连声道谢：“要真像你说的，我一定不忘你的恩德。”刘邦发迹，却再也没有找到这位老人。

二是斩白蛇。刘邦将刑徒放走后，喝足了酒，走在野地小路上，让一位随行在前面探路，那人来报告：“前面有一条大蛇挡着道，退回去吧!”酒醉了的刘邦说：“壮士行路，有什么好怕的?”于是走上前去，拔出佩剑向蛇砍去，蛇被斩为两段，路通了。又走了几里，刘邦醉得就地睡着了。后面有人走过那里，见一位老太在黑夜里哭，问她为了什么事，老太说：“有人杀了我儿子，所以哭。”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人杀了?”老太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化成蛇横在路上，现在被赤帝子斩了，所以哭。”那人以为这老太在胡说，想给她点厉害看看，老太忽然不见了。那人遇到刘邦，告诉了他这件事。刘邦心中暗暗高兴，以赤帝子自居，随从的人对他越来越畏惧服从。

另一个故事，是秦始皇曾说："东南有天子气。"所以亲自东游，想凭着自己皇帝的身份将这股天子气镇压下去。刘邦听说后，就怀疑"天子气"是指自己，于是就隐匿在芒、砀二县相交的山野间。但他的妻子吕雉经常能找到他，刘邦很奇怪，问吕雉是怎么回事。吕说："你所在的地方上面一直有云气，所以只要往有云气的地方就能找到你。"刘邦心中大喜。有的沛县子弟听说，都想投奔刘邦。

鼎这些故事显然是事后编造的。像看相的事，只有刘邦一家知道，反正随便他们怎么说都行。醉后砍死一条白蛇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能说必无其事，但将此事说成是赤帝子斩白帝子就只有一个人为证，偏偏此人像那位老人一样，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在刘邦当皇帝后再也没有露面。第三件事唯一的证人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荒野地方有云雾很普通，天晓得吕雉是不是碰巧找到了丈夫。但秦始皇东游并不是为了什么"天子气"，刘邦藏匿是因为放跑刑徒又弃职潜逃，是够得上死罪的逃犯，就是秦始皇不东游他也不敢露面。总之，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能自圆其说，但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不由臣民们不信。就是心里不信，又有谁敢冒着犯"大不敬"罪的风险说三道四呢？

不过，指出刘邦的无赖行径，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一个人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应该得到肯定还是被否定，主要不在于他的个人品德，而取决于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在于他用什么手段达到了目的，而取决于这一目的是否与历史进程一致；不在于他这样做的动机，而取决于他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最终能得到鹿的只有一人。但在鹿死谁手还没有决定之前，统一政权不复存在，战乱不断，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所以重要的是尽快结束争夺，至于谁是胜利者倒是其次的。而要真正结束战争，占有优势的一方就得不惜一切手段地将另一方彻底消灭。

青铜器如果项羽听从了范增的建议，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尽管他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却消灭了一个劲敌。如果他亲自统治关中，或者他在刘邦毛羽未丰时就回师关中，刘邦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基地。在他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张良、韩信以至萧何、曹参未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他取得最后胜利，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绝不会像《史记》一样。可

惜项羽一次次错过了机会，他的失败只能说是咎由自取。项羽的下场或许能博得人们道义上的同情，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刘邦只满足于统治关中，不主动出关进攻项羽，或许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但对他个人和历史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他将面临项羽或其他关东诸侯的进攻，不是出现旷日持久的战争，就是他被项羽等消灭。即使项羽等承认刘邦对关中的统治，也不过是回到了战国时代，当另一位“秦始皇”出现时，又得付出多少代价?

在楚河汉界划定后，项羽老老实实解甲东归，刘邦却出其不意发动追击。但正是刘邦的毁约，使战争在短短数月间结束，统一重新恢复。如果刘邦讲究信用，恪守协议，等到项羽喘过气来，少不了又是几年战争。无论谁获胜，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

在楚汉之间最艰难的相持阶段，项羽曾经对刘邦说过：“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全国已经有几年不得安宁了，都是为了我们两人，我愿意向汉王挑战，与你决一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为我们受苦了。）但他既没有置刘邦于死地，也不愿意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退出历史舞台，而志在得天下的刘邦却不计一时的荣辱，百折不挠地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当然，夺取了秦朝失去的“鹿”，如何保持也还是个问题。但在西汉王朝持续了200年以后，历史学家对刘邦的成功早已毫无疑问了。刘邦和儒生陆贾是位儒生，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学条件，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知识分子获得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比在太平盛世碌碌无为，终老于书斋中要强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并没有杀掉所有的儒生，也没有能烧掉所有

的书籍，但对儒生和儒家经典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来顺受，甘当顺民；或避居山野，远走他乡。有的人守护着藏匿的书籍，有的人背熟了经典从事口头传播，也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儒生们也纷纷响应，连孔子的后代孔鲋也背着祖传的礼器投奔陈胜，被封为博士，不久随陈胜而死。但当时各路反秦首领和诸侯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秦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纯粹的儒生并无多大兴趣。孔鲋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其他毫无知名度的儒生。

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将，骁勇善战、能指挥军队的将才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如韩信由小军官提拔为统帅，三年内就成为大国诸侯。英（黥）布出身群盗，以军功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降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刘邦部下中得到重用，以后被封为秦始皇像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盗、小贩、农夫出身，他们的发迹靠的就是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军功。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像后世那么的纯，依然有“六艺”本色，文武兼资，这类人完全可以优先发挥武的功能，或者以武为主，也不愁没有出路。

知识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谋士。他们了解形势，谙熟韬略，能为主子出谋划策，有的还能调度和指挥军队。像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陈平，原来是个“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投奔刘邦后主要是起参谋作用，曾经“六出奇计”。项羽的谋士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也是这类人物。

另一类是辩士。他们继承春秋战国以来辩士说客纵横睥睨、翻云覆雨的传统，或充当使者，或担任说客，在刘、项和各诸侯间大显身手。

再一类是行政管理人才。刘邦、项羽与各诸侯国都需要这类知识分子，在秦朝覆灭，各诸侯国处于草创，又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这类人物不可或缺。他们能维持日常行政机构，安定后方，征调戍卒，筹集、输送粮食和物资。刘邦手下要是没有萧何这样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这类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既不上前线，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史籍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纯粹的儒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保存文化尽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鲁（今山东曲阜市）的诸生，他们即使在刘邦军队的包围之下，照样“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所以鲁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丧失。又如济南人伏生，曾经担任秦朝的博士，《书经》被禁毁后，他将书藏在墙壁中，战乱中外逃，回家后发现藏着的书缺少了几十篇，但还剩下29篇，他就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征召懂《尚书》的人，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无法再进京，就让晁错去他家学习。儒家文化和《尚书》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鲁诸生和伏生的努力。尽管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没有为哪一方面建功立业，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永存的。像孔鲋那样，明知自己既无勇力，又无奇计，既当不了说客，又管不了行政，却要背上礼器投奔陈胜，实在是走错了门路。

汉高祖刘邦从小没有读过《诗经》、《书经》一类儒家经典，只是上过识字班。家庭出身和当小亭长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结识大知识分子，他的密友萧何是沛县“主吏”，大约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秘书长；曹参是县狱掾，相当于县警察局长；樊哙则是卖狗肉的小贩。萧何、曹参在县里虽然称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权势，但他们熟悉的是吏治法规，应对上司，而不是诗书礼仪。所以刘邦养成了轻视儒生的习惯，在他起兵以后更讨厌投奔他的儒生，认为他们只会添麻烦，一概不予理睬。对那些死皮赖脸求见的儒生，刘邦干脆当众摘下他的儒生帽子，当成尿壶解小便。谁向他介绍儒生，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正因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作一番包装，将自己的信仰、主张以至服装掩盖起来，以避免刘邦的恶感。

就是这样一位主子，还是有知识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下面就举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三人为例。

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郦食其是个“好读书”的儒生，虽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却志向远大，瞧不起路过高阳的数以十计的反秦将领，因为他们都缺乏“听大度之言”的气魄，相反他对那位傲慢无礼但“有大略”的刘邦却情有独钟，决心追随。起初他不知道刘邦的好恶，让一位在刘邦部下当骑兵的同乡通报：“我有位同乡郦生六十多岁了，身长八尺，别人都称他为狂生，自己却说不狂。”同乡告诉他刘邦不

喜欢儒生，他就让同乡将见刘邦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件详细告诉他。

郦食其求见时，刘邦正靠在床边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门房通报后，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看起来像个大儒，穿儒服，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马上说：“给我回绝他，就说我正忙着打天下，没有闲功夫见儒生。”郦食其一听，瞪圆了眼睛，手按着剑柄，怒喝道：“滚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门房被吓得没有报告就进了刘邦的房间，把郦食其的话重复了一遍，刘邦这才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见刘邦后没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礼，问道：“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灭秦朝呢?”刘邦骂道：“混账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害那么久了，所以诸侯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我帮助秦朝?”郦食其说：“你真要结聚民众组成义军，去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在见长者时如此无礼。”刘邦赶快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郦食其说了一番六国合纵连横的情况，刘邦大喜，请他吃饭，并虚心求教。郦食其说：“足下不过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满万人，用这些力量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军，真是所谓探老虎口。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城里又有许多储备粮，我与县令关系很好，请派我去与他联络，让他听命于你。如果他不听，你就发兵攻打，我做内应。”攻下陈留后，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经常派他出使诸侯，充当说客。要是郦食其不知深浅，开口就谈儒生的一套，早就给刘邦骂走了，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了。

另一位叔孙通也是饱学的儒生，秦二世时受到征召，充当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二世召见博士和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卒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县），诸位有何高见?”30位博士和儒生都说：“臣子违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怒形于色。叔孙通站出来说：“他们所说都不对。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墙已经拆除，武器已经销毁，明确告诉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况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尽自己的职责，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还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盗贼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这里讨论?让郡里的官吏抓起来法办就行了，何足忧虑!”二世大喜称是，又一一问了儒生，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一批盗贼。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将认为是

造反的儒生押入监狱审讯，因为他们发表了错误言论；将认为是盗贼的儒生都释放了。二世赐给叔孙通20匹帛、一套衣服，封为博士。出宫回到住处，儒生们指责他：“先生怎么这样当面拍马屁?”叔孙通说：“你们不懂，我差一点脱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今山东滕州市南），投奔了项梁，以后又在项羽部下。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不久刘邦兵败西撤，叔孙通认准刘邦必胜，率领弟子们继续追随。

古代瓷器叔孙通穿的是儒服，刘邦见了就生气。他知道刘邦是楚人，就换上了按照楚地式样裁缝的短衣，刘邦大喜。叔孙通了解刘邦的需要，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当过盗贼的壮士。刘邦非常满意，封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随他降汉的百余个弟子恨得在私下骂他：“跟了你几年，好不容易降了汉王，可是从来不举荐我们，倒专门介绍那些江洋大盗，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争夺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我要先推荐能斩将夺旗的勇士。你们好好等着，我忘不了你们。”

郦食其和叔孙通其实都没有抛弃儒生本色，只是为了适应刘邦的现实需要，暂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郦食其没有等到刘邦最终夺取天下，就给齐王田广扔进油锅“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说客辩士的形象；而叔孙通却在刘邦巩固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城。我可以召来鲁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制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

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一日（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十月一日，诸侯和文武百官齐集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趋”（快步轻声上前）一声令下，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由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朝见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就立即将他带出，整个朝堂中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刘邦好不得意，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他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赏给他500斤金子。叔孙通说：“我这些儒生弟子跟随我很久了，与我一起排练了朝仪，希望陛下封他们为官。”刘邦全部封为郎。叔孙通将刘邦赏他的金子都分给了弟子们，这批儒生又当了官又有了钱，皆大欢喜：“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

汉高祖死后，即位的惠帝调叔孙通担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员），让他制定宗庙的礼仪，并继续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如果说叔孙通所制定的还只是表面的礼仪，可以立竿见影地让刘邦

见到成效的话，那么陆贾所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通过他的努力，刘邦也接受了他的观点。

陆贾早就投奔刘邦，以宾客的身份随同出征，但他是以口才出众而闻名的辩士，不仅一直在刘邦身边，还经常出使诸侯。西汉初，陆贾奉命出使南越，成功地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南越王的封号，向汉朝称臣，回朝后被刘邦封为太中大夫。

陆贾认为，要使新建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况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夺取王位的，但也都是以君主的身份维持政权的，文武并用，才是他们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以往吴王夫差、智伯一味讲求武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秦王一贯使用严刑峻法，却灭了赵氏。要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实行仁义，效法前代圣人，陛下怎么可能夺取秦朝的政权呢?"刘邦哑口无言。心中虽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请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就概括地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12篇。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被称为《新语》。

在吕后当政时，吕氏家族大权在握，挟持了年幼的傀儡皇帝。右丞相陈平既为国事担忧，感到无能为力，又恐怕将来连累自己，经常深居简出、苦思索对策。当时陆贾已托病辞职，但还是主动求见陈平，为他出谋划策。陆贾直截了当指出："足下身为首相，享受着三万户的一个侯国，富贵已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再需要追求了。之所以整天忧虑，无非是为了吕氏诸人和幼小的皇帝罢了。"陈平见他说得是，便问他有什么办法，陆贾说："天下太平时，主要靠相；天下危难时，主要靠将。将和相能团结协调，就能得到士人的支持和拥护，就是出现什么变乱，政权也不会动摇。国家的安危，就在你们两位的掌握之中了。我与太尉绛侯（周勃）很熟悉，经常与他交谈，他也听我的话。你何不结交太尉，建立密切的关系呢?"陈平采纳了他的建议，赠送500斤金子给周勃，为他

举行丰盛的宴会；周勃也设宴赠礼答谢。陈平和周勃公开结盟的姿态使吕氏不能吕后不有所顾忌，他们的阴谋受到挫折。陈平又拨给陆贾奴婢百人、50辆车和马、500万钱，作为他的活动经费，陆贾广泛结交公卿大臣，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这些准备，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就清除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氏政权。

文帝元年（前179年），陆贾被封为太中大夫，奉命再次出使南越。由于在吕后当政时，有关部门作出了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的决定，导致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兵戎相见。南越王赵佗软硬兼施，使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在今广西的瓯骆服从他的统治，自称南武帝，采用与汉朝皇帝相似的仪仗和制度，表示自己已与汉朝平起平坐，不再承认臣服关系。汉文帝以登位为契机，在陆贾出使前就派人整修了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的祖坟，专门安排了守陵户，每年定期祭祀；还将赵佗的堂兄弟召来，给予高官厚禄。文帝让陆贾带给赵佗一封信，词意恳切，但很有分寸，表示了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也劝赵佗放弃称帝。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帝这些措施很可能是出于曾经出使过南越的陆贾的建议。

陆贾的使命圆满完成，赵佗宣布取消帝号，停止使用“黄屋左纛”的仪仗，恢复南越王的地位，臣服于汉朝。

这三人中，叔孙通最有代表性。他选择刘邦以前，已经当过秦朝的博士，为项梁、项羽效过力，但在投降刘邦以后，即使刘邦兵败逃跑，他也没有重新回到项羽一边。这说明他已经作过比较，下了决心，所以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追随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可以暂时不戴儒生帽子，不穿儒生服装，甚至穿上楚式短衣来迎合刘邦，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学识。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和学生暂时没有用处，就尽量向刘邦推荐合适的将材，但并没有遣散学生或让他们也改行。一旦发现刘邦对礼仪有了需要，他就及时提出建议，终于奠定了汉朝的礼仪制度。

或许有人认为叔孙通确定的无非是一些繁琐的跪拜仪式，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妨看看另一个例子：陈胜称王以后，原来和他一起当长工种田的伙伴来看他，见到宫里一进进的殿堂，一层层的帷帐，不禁高

叫：“好大的气派!陈胜这王做得真够味。”他们在宫中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距，还大谈陈胜以前的事。有人向陈胜建议：“这批客人愚昧无知，老是胡说八道，影响您的威望。”陈胜下令将这几个人全部斩了，吓得投奔他的故人都逃走了，更没有人再去投奔他。

刘邦做皇帝以后面临的局面比这更严重，文武大臣中既有亲戚朋友，也有患难与共的同事邻居，还有居功自傲的功臣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低微，或者本来就是盗匪，根本不知道朝廷礼仪为何物。刘邦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朝见时毫无规矩，在朝堂上酗酒斗殴，更担心皇帝的权威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必定削弱自己的统治力。但他又苦于没有办法，因为大臣中没有几个像样的，连他自己也不懂以往的朝仪。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杀掉几个人树威，刘邦多半是会采纳的。后果如何虽不能假设，但肯定不会是积极的。

叔孙通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刘邦的难题，而且为整个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礼仪制度，与秦朝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汉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孙通并没有照搬秦朝的一套，而是根据刘邦的需要与可能，“损益之”（作了删减或增加）。从西汉初的君臣关系看，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简易；而从汉初定的朝仪基本不变地延续了400年来看，这套朝仪足以满足维持皇帝权威的需要，是相当成功的。

捕鱼图更重要的是，叔孙通通过朝仪的制定，使刘邦认识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君权维护者。如果说此前的刘邦还只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己任的话，此后的刘邦就真正进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汉初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对于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割据，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无疑是有益的。

朝仪的制定和实行的成功，使刘邦对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而儒生们也更加主动地争取刘邦的支持。在刘邦声称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后，陆贾就敢于进行争辩，说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写的《新书》有了推销的机会，为刘邦所接受。

要是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因为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放弃自己的

知识和信仰；要是他们见到刘邦将儒生帽子当尿壶后立即欢呼为革命行动，并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以示拥护；要是他们在刘邦声称“马上得天下”后就唯唯诺诺，不敢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汉朝的文治就得推迟很多年。

但要是他们在见刘邦时坚持自称儒生，戴儒冠，穿儒服，那么不是被刘邦赶走，就是会被闲置一边。要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卜时向刘邦建议实行文治，要是在刘邦会集诸侯联合进攻项羽时就提出要制定礼仪，那肯定会碰上一鼻子的灰，或许从此不再会受到重用。

这些看来简单的道理，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叔孙通为了排练朝仪，到鲁征召三十多位儒生时，就有两位拒绝接受，他们说：“你效忠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说好话来获得亲近和地位。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的尸体尚未埋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恢复健康，又要搞什么礼乐。礼乐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需要积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备。我不忍心像你那样行事，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古法，我坚决不干。你走吧，别糟蹋我。”叔孙通一笑了之：“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两位儒生表面上看来很有骨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真是“鄙儒”之见。叔孙通的确先后有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和刘邦这些主子，或许还可以加上秦始皇，但他真正效忠的大概只有刘邦。因为秦二世显然是不值得效忠的，而项梁、楚怀王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在项羽那里又并不得已，等见到刘邦后叔孙通就再也没有背叛，说明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至于当面说秦二世的好话，显然是为了寻求脱身之计，他获得二世的奖赏，拜为博士后，并没有贪恋荣华富贵，而是立即逃归故乡，投奔反秦的项梁。难道非要像其他儒生那样，坚决要求秦二世出兵镇压陈胜，不惜被投入监狱，才符合儒家的信条吗?把“礼乐”看得那么神圣，非要积百年的功德才能讲礼乐，死守着“古法”一成不变，实际上是使儒家的理论变成僵化了的教条，对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是依了这两位儒生的意见，汉朝最早也得到武帝时代才能制定朝仪，说不定等不到那么大殿久，就会因为正常的君权无法确立而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两位儒生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大家都优游林下，不愿意出来说服统治者实行，对历史、对社会又有什么作用?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刘邦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好骂人的习惯至死也没有改变。但作为一位志在得天下的领袖人物，只要对自己的天下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重用并不喜欢的儒生，听从他们的意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建议，即使与他原来的想法不一致，只要言之有理，他就会改变初衷。一旦他认识自己没有道理，虽然不会认错，却能在实际上改正。刘邦对待郦食其、叔孙通和陆贾都是如此，随何和娄敬的例子也能说明问题。

随何本是刘邦的“谒者”（侍从），汉三年（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打了败仗，退驻虞县（今河南虞城县东北）。刘邦对左右说：“像你们这些人，没有人能够商量天下大事。”随何问：“不知大王是什么意思?”刘邦说：“能不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起兵背叛项羽，只要能将项羽拖在齐国几个月，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得天下。”随何请求出使，带了20名随员去淮南。项羽所封的九江王英布一直在隔岸观火，随何将他说服，答应背楚归汉，但还没有公开。这时楚王的使者又来催英布出兵，随何闯入营帐，当着英布的面对楚使说：“九江王已经归顺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出兵?”他又向英布建议：“事情已到这一地步，不能再让楚使回去，把他杀了，马上起兵与汉王会合。”英布起兵攻楚，使楚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折。

到战胜项羽，天下平定，刘邦大宴群臣。刘邦喝多了酒，就贬低随何的功劳，称他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你这种腐儒。随何从坐席上挺起身子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楚王（项羽）还没有离开齐地时，如果陛下出动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能不能夺取淮南?”刘邦说不可能。随何说：“陛下让我带二十人出使淮南，达到了你的目的，说明我的功劳比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还大。可是你称我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腐儒，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刘邦无言可答，就说：“我正要报答你的功劳呢!”于是封随何为护军中尉。

娄敬是齐人，从他的言行看，原来也是位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介平民，按法律规定得去边疆服役。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他前往陇西服役，路过洛阳，刚登帝位的刘邦就住在那里。娄敬通过同乡人虞将军求见刘邦，表示要提出重要建议。虞将军让他换上新衣，他说你平时穿

什么衣服，见皇帝时也该穿什么衣服，于是他就披一件毛皮袄进了宫。娄敬详细说明了刘邦得天下的过程与周朝完全不同，不能像周公那样，通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接着他建议：

秦地依托山脉，有黄河相通，地形四面封闭，相当稳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征召百万之众，利用秦地的现有条件，依靠那里肥沃的土地，真是所谓天府（天然的库房，比喻物资丰富）。陛下要能入关，在那里建立首都，即使山东出现叛乱，秦国的旧地可以得到保全。好比与别人格斗，要是不扼住他的喉咙，不按住他的背，就没有获胜的把握。现在陛下入关去建都，直接统治秦国旧地，好比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喉咙，按住了天下的背了。

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他们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定都洛阳的好处：“周朝定都洛阳，延续几百年；秦朝定都关中，二世而亡，不如学周朝。”刘邦犹豫不决，但张良肯定了入关的优越性，刘邦当天就起驾西迁。他不忘娄敬的功绩，封为郎中，赐姓刘。

山水画高祖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北征，派出侦察的人回来都说匈奴虚弱，可以进攻，娄敬却认为这是匈奴故意制造的假相，千万打不得。刘邦气得大骂：“齐虏（该死的齐国奴才）!靠花言巧语当了官，竟敢胡说八道动摇军心。”下令将娄敬戴上枷锁关起来。但刘邦大败而归，事实证明娄敬的意见完全正确，刘邦立即将他释放，并向他表示：“我不听你的话，以至被困在平城。当时在你前面说可以进攻的十几个人都让我给斩了。”娄敬被封为关内侯。

此后，娄敬又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将关东六国的世家大族十余万人迁到关中，都得到刘邦的同意。和亲政策延续到武帝初年，而“实关中”更成为西汉一代的根本国策。

娄敬虽然没有参加刘邦夺取天下的战斗，但为刘邦安天下所作的贡献，没有哪一位功臣可以与他相比。要是刘邦没有虚心听取这位“齐虏”的意见，没有及时向他认错的雅量，娄敬固然无法名垂青史，汉家的江山也未必能坐稳。

刘邦一开始并没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至仇视知识分子，但一

旦他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改变态度，至少会抑制个人情绪，先考虑“得天下”的目标，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得天下、保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恰当作出自我估价，适应现实形势，坚持正确立场，同时又采取灵活手段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汉朝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飞将军”李广年轻时，以勇猛善战受到汉文帝的赞扬，但文帝也感慨他生不逢时：“要是生在高帝时，封个万户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武将如此，文官也是如此，可惜汉高祖那样的皇帝太少了，可惜汉高祖的时代太短了。西汉初的诸侯王国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让他统治三个郡共五十三个县。封王仪式结束后，刘邦召见刘濞，端详了他的相貌后，不禁微微吃惊：“你的样子有反相。”刘邦心中后悔，但不便收回成命，于是摸着刘濞的背说：“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刘濞叩着头说：“我不敢。”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刚登上帝位的刘邦剖符分封七位异姓功臣为诸侯王。所谓剖符，就是将一片刻着红字的铁片（丹书铁券）“符”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功臣各执一半，作为凭据。皇帝收执的一半郑重地保管在宗庙中的金匮石室。铁券上的誓词是：“使黄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国家像黄河、泰山一样永存，你们的爵位传给子子孙孙。）

与其说是分封，倒不如说是承认现状，因为在没有分封时，这些诸侯早已拥兵割据，或者就是刘邦所封。

最先被封的是韩信（与另一韩信同名，故史书上称为韩王信）。他是战国韩襄王的孙子，韩信像跟着刘邦进关中，入汉中，又劝刘邦率兵东归。刘邦返回关中后，就许诺他当韩王。汉二年（前205年），韩信夺取了韩地，被刘邦封为韩王。韩王信一直率军随刘邦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位韩信是刘邦回师关中的主将，立下赫赫战功。汉四年他攻灭齐国，就以齐国反复无常，又紧靠着楚国，需要有一位王来统治为由，要求立他为“假王”（代理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在盼望韩信出兵解围，只得封他为真齐王。汉五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县南）会师，结果他们都没有到达，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退回固守。刘邦只得采用张良的计策，答应韩信，破楚后，从陈（今河南淮阳县）以东直到海滨的土地都归齐王所有，才换来韩信出兵。但刘邦在垓下之战后，出其不意夺了他的兵权，并以他是楚人，熟悉楚地风俗为由，改封为楚王。

淮南王英布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是项羽的主要依靠力量。刘邦派随何说服他叛楚归汉，汉四年封他为淮南王，让他收复原来的封地，率领当地军队参加对项羽的最后一仗。

张耳是项羽所封常山王，被陈余驱逐后投奔刘邦。他与韩信一起攻下赵地，于汉四年被立为赵王。张耳之子敖娶刘邦长女。第二年张耳死，刘邦的女婿张敖即位。

群盗出身的彭越是一员勇将，早在入关前就帮助过刘邦。汉三年，彭越率三万人归汉，率兵略定梁地。在刘邦与项羽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彭越两次攻占梁地，还将缴获的十余万斛谷供应汉军。为了换取他出兵会师，刘邦答应灭楚后将睢阳（今河南商丘县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县南）间的土地作为酬劳。五年正月，彭越被封为梁王。

燕王臧荼也是项羽所封，因原来占有燕的韩广不愿改当辽东王，臧荼杀了韩广，并了他的地方。他归汉后，刘邦鞭长莫及，继续封为燕王。

长沙王吴芮本是秦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令，后率越人起兵反秦，从项羽入关，被封为衡山王。刘邦灭项羽后，他与其他诸侯一起拥戴刘邦登基，被改封为长沙王。

这七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约相当今山东）的地方还属朝廷，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汉朝的直辖区只有15个郡。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

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分封异姓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燕王臧荼。当年七月，臧荼反，刘邦亲自出师征讨，九月就俘虏了臧荼。考虑到北方边疆面临匈奴的侵扰，需要有大将驻守，刘邦破例封卢绾为燕王。卢绾与刘邦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俩的父亲就是好朋友，两人同日出生，从小亲密无间，卢绾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刘邦的反秦活动，在刘项之争中已被封为太尉，与刘邦的亲密程度远在萧何、曹参之上。功臣受封时，刘邦就想封卢绾为王。只是怕引起群臣心态的不平衡才封他为长安侯。一般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至少不能在关中，卢绾的封地却在秦朝首都咸阳的郊外，不久建为新的首都。所以等臧荼被废，刘邦就迫不及待地将燕国封给卢绾。

史料中有关臧荼的记载非常简略，他的"反"是很令人怀疑的。在刘邦忙于与项羽争夺、胜负未卜时他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到了天下已定却匆匆造反，反了后又不堪一击，两三个月就让刘邦活捉。对比刘邦给其他异姓王一一套上的"谋反"证据，我们不难想象臧荼事件的真相。

文人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实际原因是韩信藏匿了遭到通缉的项羽旧将、自己的老朋友钟离昧。钟离昧是刘邦的仇人，听说他逃亡在楚国，刘邦下诏追捕，大概是为了保护钟离昧，韩信出行时都出动军队警卫，这成了"谋反"的口实。刘邦得报后，根据陈平的计策，通报各国诸侯，声称自己要南游云梦（在今湖北中部长江以北一带），命令他们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县）会合。眼看刘邦快入楚境，韩信还是拿不定主意，要发兵造反吧，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又没有犯什么罪；要去见刘邦吧，怕当场被扣押。有人向他建议："拿了钟离昧的头去见皇上，他一定欢喜，你也就没事了。"韩信便与钟离昧商量，钟知道韩信的打算，当他面自杀了。韩信到陈县向刘邦献上钟离昧的头，还是被当场逮捕。回到洛阳后，刘邦赦了韩信的罪，降为淮阴侯，楚国被取消。

韩王信的王都在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封地处于中原要地，刘邦很不放心，将他改封到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山西中部、北

部），让他防御匈奴。六年，韩信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被匈奴包围，投降匈奴，反而率军攻打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征，韩信逃亡匈奴，而令部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军队联合抵抗汉军。刘邦进至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好不容易才脱险，大败而归。

刘邦归途中过赵国，赵王张敖对皇帝丈人毕恭毕敬，亲自日夜侍候，刘邦却动不动骂人，一点不给他面子。赵国的相贯高、赵午是张耳的旧属，六十多岁了，气得忍耐不住，向张敖建议杀了刘邦。张敖又惊又急，咬破手指，表达对刘邦的忠诚，要他们千万不能再讲这样的话。贯高和赵午等决定背着张敖行动，以便在失败时不连累他。八年冬，刘邦路过赵国的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西北），贯高等事先在宾馆的夹墙中埋伏了刺客。刘邦警觉，没有留宿就离开了。第二年，贯高的仇家向朝廷揭发，赵王、贯高等全部被捕。贯高等人不顾将被族诛的警告，以家奴的身份跟随张敖至长安。贯高被严刑拷打，体无完肤，始终坚持张敖没有参与他们的阴谋，并在得知张敖被无罪释放后自杀身亡。张敖因是刘邦女婿，释放后被封为宣平侯。

山水风景图刘邦自平城归长安后，任命陈稀为代国的相，负责指挥代、赵二国的边防军。有人揭发，陈稀临行前曾与韩信密谋，陈稀在边境反，韩信为内应。赵国相周昌也求见刘邦，说陈稀拥兵在外，宾客众多，应谨防有变。十年秋，刘邦以“太上皇崩（刘邦父亲死）”为由召陈稀回京。陈稀知道回去决无善终，就称病不至，并与曼丘臣、王黄等公开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至邯郸部署讨伐，用“羽檄”（特急军令）征调彭越、英布等，彭越称病，只派部将；英布也没有应召。当时陈稀部将四出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邦只得用重金收买陈稀部将，引诱他们投降。汉军又分两路出击，太尉周勃从太原入代，叛乱才被平定，陈稀被周勃斩于灵丘（今河北蔚县）。

在刘邦出兵期间，韩信一位舍人的弟弟向吕后密告，韩信将假造诏书放出官奴刑徒，袭击吕后与太子。吕后与萧何策划，声称得到刘邦的消息，陈稀已死，于是列侯和群臣都进宫祝贺。萧何还带信给韩信：“你虽然有病，这样的大喜事也应该尽量到一下。”韩信进宫后，就被预伏的武士逮捕，在长乐宫的钟室被杀。韩信的尸体被剁成肉酱，遍赐群臣，三族全部被杀。

刘邦因彭越不应召去邯郸，派人去责问，彭越很恐慌，准备亲自去向刘邦谢罪。部将扈辄劝他："你开始时没有去，受到责问后再去，到那里后一定会被捕，不如先发兵反了。"彭越不愿意，继续称病。一位得罪了彭越的太仆逃出梁国，上告彭越与扈辄谋反，刘邦派人秘密到达梁国都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出其不意地逮捕了彭越，囚禁在洛阳。经过审讯，有关方面认定彭越已构成谋反罪，要求依法惩处。刘邦赦了彭越的罪，降为庶人，迁往蜀郡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县北）。途中到达郑县（今陕西华县），正遇上由长安去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自己无罪，希望能回故乡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吕后答应了，带他回到洛阳，却对刘邦说："彭越是壮士，现在将他迁到蜀地去，是给自己留了后患，不如把他杀了。"于是吕后指使彭越的舍人揭发他继续谋反，刘邦批准廷尉（主管刑事的长官）的意见，将彭越和他的宗族全部处死。

田园山水画淮南王英布见韩信被杀，害怕哪一天会轮到自己。彭越被杀后，刘邦也将他剁为肉酱，遍赐诸侯。那天英布正在打猎，见到送来的肉酱，更加惊恐，暗中调集军队，并加强了对邻郡的警戒。英布一位宠姬得病就医，医生家与中大夫贲赫家对门。贲赫以为是讨好英布的机会，向宠姬赠送厚礼，又参加了医生家的宴请。宠姬在英布前说起贲赫的好处，英布怀疑宠姬与贲赫有不正当关系，吓得贲赫称病不出。英布更生气，要逮捕贲赫，贲赫就向地方官表示要揭发谋反大罪，立即被用官方提供的交通工具送往长安，英布追赶不及。贲赫到长安后，说英布的叛乱已经开始实施，应该趁他尚未发动就镇压。萧何认为英布还不至于谋反，恐怕是仇人诬陷，建议将贲赫监禁，派人暗中去淮南调查。但英布得知贲赫揭发，已经怀疑他将自己私下的举措报告了刘邦，朝廷派来调查的人又抓到了一些把柄，就杀了贲赫全家，发兵反汉。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现在都已被杀，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有恃无恐。刘邦也知道诸将对付不了英布，只得抱病东征。

出发前，刘邦听说有位楚国前任令尹薛公很有主见，就去听取他的意见。薛公认为英布有三种选择：上计是东取吴国，西取楚国，北取齐、鲁，争取燕、赵的支持，然后固守，那么山东就不属于汉朝了。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韩、魏，占据敖仓的粮食储备，控制成皋的

通道，胜败难以预料。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以越地为基础，自己去据守长沙，那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汉朝不会有危险。刘邦问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薛公说可以按下计部署。刘邦问为什么，薛公说："英布是骊山的刑徒出身，凭自己的本领当了万乘之主，都是为了自己，不会考虑到百姓和长远利益的，所以必定会用下计。"

英布果然先攻破吴、楚，然后率军西进，在蕲（今安徽宿州市东南）以西与汉军遭遇，英布的军队虽然精锐，但还是被刘邦亲自指挥的汉军击溃。退至淮南后，英布又打了几次败仗，只带了百余人逃往江南。英布是长沙王吴芮的女婿，想投奔长沙国。吴芮的儿子派人将他诱至番阳，当地人将他杀死。

刘邦征讨陈稀时，卢绾曾攻击陈稀东北加以配合。陈稀派人向匈奴求援，卢绾也派张胜去匈奴，说明陈稀已经兵败，劝匈奴不要支持他。但张胜在匈奴见到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对他说："你在燕王身边受到重用，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情况；而燕王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诸侯相继反叛，战事不断。如今你要为燕国加紧消灭陈稀等人，到他们被灭了，就该轮到燕国，你们这些人就快当俘虏了。你何不让燕缓解对陈稀的进攻，而与匈奴讲和呢?形势缓和了，可以长期当燕王，要是汉朝采取军事行动，也可以使燕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张胜觉得很有道理，就私下请匈奴帮助陈稀进攻燕军。卢绾怀疑张胜勾结匈奴谋反。上书刘邦要求将他合族处死。张胜回来后，将这样做的理由详细报告，卢绾醒悟过来，就找了一个人冒充张胜杀了，又释放了他的家属，让他当与匈奴的联络人，又秘密派遣范齐驻在陈稀的总部，让陈稀一直逃亡在外，使战事延续。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陈稀的裨将降汉，交代了卢绾派范齐与陈稀秘密联络的事。刘邦派人召见卢绾，他称病不去。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去请他，并向他左右查问，他更加害怕，躲了起来。卢绾对左右说："现在不是刘氏当王的，只剩下我与长沙王了。去年春杀韩信一家，夏天杀彭越一家，都是吕后的主意。眼下皇上病了，把权交给吕后，她是妇道人家，一心要杀异姓王和大功臣。"卢绾始终称病不出，连左右也躲藏起来，这些话传出来，审食其回去做了详细报告，刘邦更加愤怒。匈奴的降人又说，张胜逃亡在匈奴，充当卢绾的代

表，于是刘邦断定卢绾果然造反了，派樊哙出兵燕国。卢绾将家属宫人和数千骑兵转移到长城边，一边打听情况，希望等刘邦病好后亲自去向他解释。四月，刘邦去世，卢绾就带着部众逃入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卢绾在匈奴处境困难，经常想回汉朝，一年多后死去。

到刘邦死时，异姓王中只剩下一个长沙国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沙国处在边远地区，人口稀少，全国只有两万多户，又与南越交界；另一方面长沙王吴芮及其后人小心谨慎，绝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英布谋反败走时，长沙王吴芮还大义灭亲，将他诱杀。所以长沙国延续到了文帝初年，才因吴氏无人继承而取消。但长沙国是刘邦留下的唯一例外，所以他宫殿内明确规定，今后不许再封异姓诸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是姓刘的人当了王，天下人应该共同消灭他。）

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七个异姓王（臧荼加六国）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尽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经过汉朝史臣裁剪过的史料，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卢绾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哉枉也。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这些异姓王都曾重兵在握，有过辉煌的战绩，在楚汉之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自身的目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兵力或战略地位与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或土地，或者在关键时刻不服从刘邦的调度，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国事之前，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刘邦，或者自己夺取天下。倒不是他们毫无野心，而是由于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明智举措，赢得了他们的效忠；刘项之争中刘邦的发展趋势，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他是天命所在，不敢再轻举妄动。

韩信是最典型的例子。还在韩信刚当齐王时，项羽就派武涉做说客，劝韩信在楚汉之争中保持中立，三分天下。武涉的话说得很明白：

虽然足下自以为与汉王的交情很深，为他尽力用兵，但最终还是会败在他手里。足下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由于项王还在。现在项王与汉王的命运就操在足下手中，你向右转就汉王胜。你向左转就项王胜。不

过项王今天亡，下一个就轮到足下了。足下与项王是老朋友，何不反汉而与楚结盟，三分天下，自己做王？错过了这样的时机，一定要为汉王灭楚，难道是聪明人的做法吗?

韩信的答复很实在：

我在项王手下时，官不过郎中，干的事不过是执戟（身边的警卫），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叛楚归汉。汉王授予我上将军印，给我带数万兵，将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将自己的饭给我吃，言听计从，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人家对我如此信用，我要背叛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死也不会改变。谢谢项王的好意。

齐人蒯通深知韩信的重要性，想方设法要说动他。蒯通先替韩信看相，说："相你的面，不过封侯，而且又有风险；相你的背，却贵不可言。"韩信问是怎么回事，蒯通把他的策划和盘托出：

现在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同时抛在荒野的不计其数。三年下来，楚汉双方都智勇俱困，无法取胜，战斗的锐气受挫，粮食消耗殆尽，百姓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是天下的圣贤肯定无法消除天下的大祸。当今二主的命运就取决于足下，你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我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只恐怕足下不能用。如真能听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并存，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样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以足下的圣贤，有这么多军队，占据着强大的齐国，联合燕、赵，控制后方，根据百姓的愿望，请汉王停止战争，为百姓请命，天下都会迅速响应，汉王怎么敢不听!到时再调整诸侯国的疆界，诸侯建立，天下就都会感谢齐国，服从齐国。齐国本来就有充足的土地，再善待诸侯，谦虚谨慎，天下的君王就都会来齐国朝拜。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会受到指责；时机成熟了不行动，必定会遭殃。愿足下深思熟虑。

韩信还是这几句话：

汉王待我那么好，让我乘他的车，与他穿一样的衣，与他吃同样的饭。我听说，乘了人家的车就该分担他的患难，穿了人家的衣就得与他共享忧乐，吃了人家的饭就得为他而死，我岂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就违背

道义!

蒯通不以为然，举了张耳、陈余从布衣时结下刎颈之交，最后相争相杀的例子，还以文种、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称霸而不得善终为例，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他说：

吕后像我听说一个人的勇略能使主子震惊，自己就危险了。功盖天下，君王就无法行赏了。足下渡黄河西进，俘虏魏王，活捉夏说；引兵下井陉口，杀成安君（陈余）；夺取赵国，威胁燕国，平定齐国，向南击败楚军二十万，东征杀了龙且。这就是所谓天下独一无二的功绩、世上不再有的伟略。现在足下拥有震主之威，立了无法行赏的大功，要归楚，楚人不会信任；要归汉，汉人感到震恐。足下该怎么办?处在臣子的位置上而拥有震主的威望，名高天下，我真为足下担心呀!

这一番话真使韩信受到了震动，他表示要考虑一下。几天后，蒯通又力劝韩信当机立断，但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认为自己功劳大，汉王肯定不会夺走他齐王的位置，最后回绝了蒯通。

此后，刘邦果然在消灭项羽后就剥夺了韩信的兵权，登上帝位后就改变了他的封地，但韩信都服从了。以韩信的智谋，不是不知道刘邦“南游云梦”的骗局，但他还是以老朋友钟离昧的人头为代价，委曲求全。被降为淮阴侯后，至多也只是称病不朝，发发牢骚而已。史书上说他与陈稀策划里应外合，显然是吕后一伙捏造的。陈稀其人来历不明，直到刘邦从平城归来才以郎中的身份被封为列侯，担任赵相国，与韩并无深交。韩信真要造反，以往不知有多少机会；要寻求同谋者，忠诚得力的部下肯定不少。何至于在落到闲居长安的地步时再与陈稀合作谋反呢?从刘邦得知韩信的死讯后“且喜且怜”的记载看，刘邦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

就是最终发动叛乱，并与刘邦对阵的英布，也是到最后一刻才下决心的。他被封为淮南王后，连续三年朝见，没有任何想谋反的迹象，就是在见到彭越的肉酱后，也只是采取防御措施。即使有了贲赫的揭发，连萧何也不相信英布会造反。要是刘邦稍作一些抚慰，或者不是故意激化矛盾，英布绝不会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刘邦、吕后早就下了彻底消灭异姓王的决心，所以要千方百计制造借口，激化矛盾，必欲除之而后快。明知彭越、韩信并非蓄意谋反，却要斩草除根，满门杀尽。根据当时的法律，对彭越、韩信这样犯“谋反大逆”罪的人要用“五刑”，即先在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掉两脚的脚趾，用板子活活打死，然后割下头颅，再将尸体剁成肉酱。而对他们还加上了一条：将肉酱遍赐诸侯群臣，作为警戒他们的反面教材。异姓王已如惊弓之鸟，就连刘邦最亲密的伙伴卢绾，也只能违心地投降匈奴，魂断异域。

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这就提醒我们，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首先，大部分异姓王的存在既无必要，也非刘邦所愿。韩信之封齐王，彭越之封梁王，都是拥兵要挟的结果。韩王信是刘邦有言在先，不得不履约，但将天下之中的冲要之地给他当封地实在不合适。英布封王也是刘邦不得不做的交换。臧荼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封，只是鞭长莫及，暂时维持原状。既然这些王位是靠武力、靠刘邦一时之需换来的，一旦武力被解除或刘邦不再有需要，它们就不会再有存在的理由。可惜韩信等一味贪恋王位，迷信“丹书铁券”，没有人谦让，更没有人主动辞位，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其次，作为君主的刘邦不得不考虑汉朝的长远利益。刘邦死时已有五六十岁，在当时已不算寿短。他深知太子刘盈懦弱无能，但与吕后是患难夫妻，太子又没有什么过错，加上吕后通过张良等的帮助，一次次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使刘邦一度想立戚夫人之子的打算无法实现。在继承人远不如自己的情况下，要保证他能够驾驭群臣，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其中的强者、不顺从者，首选的目标当然是那几位拥有大片封地和人口的异姓王了。彭越、英布不响应紧急征召既给了刘邦口实，也给刘邦敲起了警钟——若是现在不消灭他们，自己死后还有谁能对付他们?

再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欲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尽管异姓王当时不想谋反，但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谋反，更

不能杜绝有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蒯通、武涉、扈辄这样的说客、辩士，劝主子反叛的大有人在，荣华富贵和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随时都会驱使一些人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即使是异姓王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足以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如卢绾听了张胜的劝告后，实际上已与匈奴和叛臣陈稀结盟，尽管他本人并不想反叛，但发展下去，局势就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可以设想，如果韩信听从了蒯通的劝告，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鹿死谁手的确难以预料。但不管谁是胜利者，统一的进程必定会延长，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会更大。同样，如果彭越采纳了扈辄的意见，起兵反叛。虽然他不可能推翻汉朝，但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要是彭越迁至蜀地，或许会不安分地制造事端，或许会被其他反对派所利用，吕后的手段虽然毒辣，却消除了这些风险。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尽管刘邦、吕后对异姓王的手段是过度的、不道德的，但却没有更好的、更可靠的选择。一些异姓王的死是无辜的，尤其是他们数以百计的家属纯粹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牺牲和财产的损失，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经济文化的破坏。

汉朝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像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开杀戒的几乎绝无仅有，但前提是他的“杯酒释兵权”等政策没有受到抵制，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得以顺利执行。所以，杀功臣一类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品质，而应该看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却在“众建诸侯”，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同姓王国不断增加。

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就封了第一批同姓诸侯国。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齐国旧地未设诸侯国，当年正月刘邦立子肥为齐王，辖7郡73县，规定凡是百姓说齐方言的地区都划归齐国。韩信的楚国被废后，刘邦将其一分为二，以淮河东南的52县立同宗兄刘贾为荆王，以淮河西北的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仲）为代王，但这些地方大多为匈奴所占，只是名义上拥有。九年，刘邦废了赵王张敖，立子如意为赵王。十一年，立子恒（以后的文帝）

为代王。梁王彭越被杀后，立子恢为梁王，将东郡划给梁国。又立子友为淮阳王，辖陈郡和颍川郡。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反，立子建为燕王。当年十月，因荆王刘贾被英布军杀死，无人继承，改荆国为吴国，立兄刘仲之子濞为吴王。到刘邦死时，已有9个同姓诸侯国，加上吴氏长沙国，所占面积仍超过全国疆域的一半，直属朝廷的郡仍然只有15个，甚至比刘邦初年还小。

刘邦大封同姓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灭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已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邦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子弟竟也会像异姓王一样谋反叛乱。或许他已经想到了，但为时已晚，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刘邦的大哥已死，二哥刘喜（仲）封了代王，奉命为刘氏镇守北边。可是这位被

他父亲称赞为会治产业的老兄实在胆小，匈奴人进攻代国时非但不能坚守，而且吓得偷偷地逃到了洛阳。按法律应该杀，但看在兄弟份上，刘邦把他降为列侯。刘邦的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他喜欢读书，找了一帮著名学者研读《诗经》。刘邦做了一年多皇帝，大哥的儿子刘信还没有获得封赏，太上皇替孙子说话，刘邦说倒不是忘记了这位侄子，而是因为他妈的行为太不厚道了。刘邦始终没有忘记大嫂故意括锅底，不让他朋友吃羹的往事，所以封刘信为羹颉侯。刘贾是刘邦的同宗，因有战功也封了荆王，可惜无后，战死后王位就无人继承了。当时刘邦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子侄中找不出一位年轻力壮的人来统治吴、会稽（今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而刘喜之子濞，年方20岁，有勇力，参加过平定英布之战，所以才选择了他为吴王。封王仪式一结束，刘邦就预感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控制不了这位“壮王”，于是告诫他侄子：“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千万不要造反）!”

以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加上年龄、辈分、能力、经验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刘邦对付这些子弟王绰绰有余。但到了他的儿子文帝、孙子景帝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刘邦和楚元王死后，他就成了最年长的同姓王，是文帝的堂兄、景帝的堂叔。文帝时，吴国的太子进京，侍候皇太子下棋。吴太子平时骄横惯了，师傅们又没有教好他规矩。刘邦率师见项羽对皇太子就像小兄弟一样，下棋时居然与太子吵了起来。皇太子一生气，抓起棋盘就往他头上砸去，不料把他砸死了。吴太子的棺木运回吴国后，吴王极其怨恨，说：“既然天下是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何必还葬回来呢。”下令将棺木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不朝。拖了几年，文帝难以对付，只得赐吴王“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因年老而不必朝见。

诸侯国与代表中央集权的朝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西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有七个郡，小的也有三四郡。由于王国的赋税收入归国王所有，又不必负担中央政府的开支，与直属朝廷的郡相比，财政负担较轻。国民在本国就近服役，不像其他郡那样，得千里迢迢去长安或边疆服役，也得到百姓的拥护。王国还垄断了国内的资源，如果盐、铜、铁等资源丰富，还能减免百姓的赋税。所以王国对郡县的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诸侯也利用这一点与朝廷争夺民户，诸侯王公然接受其他郡的逃

亡者，甚至庇护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财富供养大批宾客，集中了一批文武人才，其中不乏失意文人、辩士说客、流氓恶棍。他们翻云覆雨，拨弄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主子出各种坏主意，唯恐天下不乱。

吕后执政时，为了用吕氏取代刘氏，曾对刘氏诸侯王予以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了吕氏8个王国。吕后死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诸吕，恢复刘氏政权，立了大功，似乎更证明了汉高祖“众建诸侯”的正确性。汉文帝是以外藩即位的，原来在朝廷毫无基础，被拥立的条件只是年长和母亲薄氏家是“君子长者”，登基后只能先恢复齐、楚、赵诸国故地，并分封有功宗室作为酬答，对同姓王也优礼有加。同姓王国的势力更为膨胀，居功自傲，目无朝廷，以致谋反作乱的事也随之发生。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今山东西北部）王兴居趁文帝去太原之机，准备发兵西袭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随即兵败自杀。他谋反的原因是自以为诛诸吕有功，文帝封他的济北国地方太小，心怀不满。

同年，淮南王长入朝，他自以为是皇帝的弟弟，关系最亲，平时不守法度，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在与文帝去打猎时，他公然坐上皇帝的车子，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能把鼎举起。他身带一把铜锥去见辟阳侯审食其，见面后就一锥砸去，令随从将他杀了。原来20年前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将她送到宫外。不久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亦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吕后因忌妒不愿告诉刘邦，审食其不敢坚持。美人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承认。忿恨自杀。刘长认为审食其没有尽职力争，对其母的死负有责任，就擅自杀了他。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被亲王所杀，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文帝只得免予处罚。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他归国后更加骄横不法，甚至不用汉朝法令，不顾规定的礼仪。文帝亲自下诏责备，仍然无效，就让自己的舅父、将军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刘长接信后

很不愉快，在文帝六年与人密谋策划，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阴谋败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遣送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刘长在车中绝食自杀，沿途接送的官员一直不敢打开车门，直到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才被发现。

汉景帝针对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对策。他指出：在对付异姓王时朝廷幸而获得胜利，但朝廷与诸侯王矛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同姓诸侯王与朝廷的对抗已见征兆，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同样结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大国的王大多还没有成年，朝廷为他们配备的傅（国王的老师）、相（王国的行政长官）能够掌权。几年以后，诸侯王都成年了，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都到了退休年龄，王国在丞、尉（县一级行政官员）以上都用上自己的人，那时与济北王、淮南王还会有什么不同?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难以控制，“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小腿粗得像腰，手指大得像大腿），平时就无法屈伸，再有这样一二个指头乱动就更受不了了。今天再不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到时纵然有扁鹊再世，也会无能为力。从异姓王的情况分析，“大抵强者先反”，而长沙王“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功劳最小而存在时间最长，关系最疏远却对朝廷最忠诚），这并不仅仅是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主要是形势所造成的。所以要使诸侯忠诚，必须造成像长沙王那样的形势。他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设置诸侯国来减弱他们的实力），实力弱了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法制，国小了就没有邪心。这样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动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们不敢有异心，争着朝见听命于天子。

贾谊的建议在生前尚未付诸实现。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死，无子，文帝追思贾谊的意见，乘机将齐国一分为六，分封为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六国，将剩下的琅琊郡收归朝廷；又将淮南王喜改封为城阳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立刘长三子为淮南、衡山、庐江王。原来两国分成了九国，辖境自然缩小，力量也必定分散。从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成为汉朝处置诸侯的一项基本政策。

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分诸侯国得有借口，如果诸侯王健在就难以实施，特别是对诸侯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吴王奈何不

得。所以，太子家令（太子的总管兼生活秘书）晁错几次上书，建议应对吴国削地，这无疑会激化朝廷与吴国的矛盾，所以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初，吴王更加飞扬跋扈，已担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议实行削藩，因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曾经误杀吴太子的景帝自然明白，在他当皇帝后，这位吴王伯父必定会越来越难对付。因而在三年（前154年）冬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则削了六个县。下面自然要轮到吴国了，吴王濞联合楚、胶西等国准备采取行动。正在此时，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到达，吴王就宣布起兵，杀掉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六国一齐响应，发兵西进。赵王还秘密派遣使者，联络匈奴出兵。齐王本来已参加谋反，因后悔而退出，在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固守。济北王也是同谋，但损坏的城墙来不及修好，被手下的一位郎中令挟持，不许他发兵。吴王下令全国总动员：“寡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亲自指挥。我小儿子十六岁，带头当兵。国内年龄在六十二岁与十六岁之间的全部征召入伍。”征集到二十余万人，东越和闽越也发兵随从。

正月甲子（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每年第四个月），吴军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吴王向诸侯发布文告，号召各国一起举兵诛“贼臣晁错”，并公然声称：“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还定下赏格，各国凡能斩捕汉朝大小武将文官，都可按规定级别领赏。“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不必都回吴国拿），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吴、楚合兵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景帝之弟），攻破棘壁（在今河南拓城县西北），杀数万人。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东进迎战吴军，郦寄击赵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策应前方。景帝一时乱了方寸，原吴王相袁盎献计，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吴楚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晁错，恢复削地。现在只要杀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恢复它们的旧地，就可兵不血刃，结束事变。景帝同意，封他为太常（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派他秘密出使吴

国。十几天后，丞相青翟等就照事先安排弹劾晁错，称他大逆不道，要求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晁错还蒙在鼓里，被召来后立即被押赴东市，穿着朝服就被斩了。其实晁错不是不知道上“削藩策”将付出的代价，听到他向景帝建议削藩的消息后，他父亲就从故乡颍川赶来，对他说明利害关系。晁错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亲说：“刘氏安了，而晁氏危了。我不忍心受到牵连，先走一步了。”就喝毒药自杀了。晁错没有动摇，不过他绝不会想到，景帝会如此轻易地将他抛弃。

袁盎到达吴国时，吴楚联军已进攻梁国的防御工事。听说袁盎要让他拜受诏书，刘濞笑道：“我已经当了东帝，还拜谁?”将他扣在军中，根本不见，继续进攻。

校尉邓公从前线回长安，向景帝汇报军事。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吴楚收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几十年了，因为削地而发怒，以杀晁错为名，目的并不在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紧嘴巴不再说话了。”景帝问是何原因，邓公说：“晁错怕诸侯强大不可制服，所以建议削地，以巩固朝廷，是万世之利。计划刚实行，自己就被杀了，对内使忠臣不敢再说话，对外正好为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如此。”景帝追悔莫及。

古代瓷器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东北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食供应线。梁国受到吴楚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梁王上书景帝，让景帝多次下诏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只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

徒（今江苏丹徒县），准备退保东越（今浙江南部）。汉军乘胜追上，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大量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景帝初，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要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士划出。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

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即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二章

武帝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西汉初，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王要削县，侯要免国。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

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古代山水画五百万以上）等。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关东出相”，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分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

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及王位绵绵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但除了某些短时期真正具有分封意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了，影响不出一省。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

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当然，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汉匈之间的争斗与融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的铁骑团团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505年以后，冒顿单于的后代、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左国城宣布自己是汉高祖的后代，建国号为汉。

唐朝的诗人曾经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无数“飞将军”曾经阻挡了胡马的南下，但一部分匈奴人却迁入了中原，并且最终融合在汉族之间。

秦始皇死后，原来驻守在北部边境的大将蒙恬被迫自杀，边防松懈。不久反秦起义爆发，秦军忙于镇压，不再顾及北方边疆。匈奴趁机南侵，移民大多逃亡。在没有军队守卫的情况下，秦始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筑起的万里长城根本无法阻挡匈奴的骑兵。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匈奴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冒顿单于。他即位后，率领匈奴各部东征西讨：攻灭了东胡，将其残余的乌桓和鲜卑赶到了大兴安岭；击败了月氏，迫使月氏人从河西走廊的西部迁往中亚；征服了北部的丁零、坚昆等部，扩展到贝加尔湖一带。匈奴不仅全部收复了被蒙恬夺取的土地，而且继续南下，进入战国时秦、燕、赵的旧地。匈奴号称拥有“控弦之士（能挽弓作战的士兵）三十万”，盛极一时。

秦汉之际，楚、汉和各诸侯忙于争夺天下，无暇北顾。等刘邦消灭项羽，匈奴的威胁已经相当严重。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州市），驻守那里的韩王信投降后，依仗匈奴的势力南下太原（今山西中部），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城下。七汉朝骑兵年冬，刘邦率大军亲征，击败韩王信和匈奴联军，乘胜追击。当时连降大雪，天寒地冻，有的士兵连手指都被冻掉。刘邦为了了解实际状况，不断派使者进入匈奴地区观察。冒顿将计就计，故意将精锐部队和

肥壮的牛羊隐藏起来，沿途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和瘦弱的牲口，十几位使者回来后都说匈奴不堪一击。刘邦又派刘敬（即娄敬）去复查，他的报告与众不同：“两国交战，一般都要壮大声势，但我只见到了老弱的士兵和牲畜，肯定是故意造成假相，将精兵埋伏了起来。我认为匈奴打不得。”但这时30万汉军已经越过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恒山山脉），争先恐后地北上了。刘邦认为刘敬是动摇军心，将他拘押在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自己率领骑兵到达平城（今大同市东北）。但汉军大部分是步兵，远远落在后面，只有一部分赶到平城。这时冒顿出其不意，以大量骑兵将刘邦团团包围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并且切断了刘邦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整整七天七夜，汉军无法突出重围，几乎弹尽粮绝。刘邦派人突围找到阏氏（单于的夫人），送给她丰厚的礼物，让她在单于面前说好话。正好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等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到达，单于怀疑他们与汉军合谋，于是在包围圈上网开一面，刘邦冲出包围，与大军会合，匈奴军队也撤退了。

但匈奴仍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刘邦苦于应付，听从刘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所谓和亲，就是将汉朝的公主（实际上大多是以宗室的女儿或宫女代替）嫁给单于，并馈赠大批物资礼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匈奴的入侵，但汉朝正忙于巩固内部，加上不断有汉将叛逃，成为匈奴的帮凶。如燕王卢绾带着万余部众投降匈奴后，上谷以东（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就经常成为匈奴侵扰的目标。

吕后时，冒顿自恃兵力强盛，有意挑衅，给吕后送去一封信，大意说：“我孤零零生活在荒野地方，很想到中国游玩。陛下是寡妇，想必也很寂寞。大家都不快乐，何不互通有无?”吕后大怒。召集群臣商议，准备杀匈奴使者，出兵问罪。她的妹夫樊哙请战：“给我十万军队，我可以横行匈奴之中。”季布却说：“樊哙应该杀头。当年三十二万汉军出征，樊哙是上将军，高祖被围在平城，樊哙不能解围。到今天伤病者刚刚复原，百姓还在唱着悼念平城士兵的哀歌，樊哙却要让天下震动，胡说用十万军队去横行，不是当面欺骗你吗?况且匈奴人本来就像禽兽一样，听了他们的好话不必高兴，对他们的坏话也犯不着生气。”吕后明白汉朝的实力，就派张泽送去一封复信：“我已年老气衰，头发牙齿都掉了，走路也不成样子，单于不知从哪里听了传闻，实际上完全不必降低身份来找我。敝国没有什么过错，应该能得到你的宽大。奉上御车二辆，骏马

二匹，供你日用。”冒顿也派使者致歉，表示自己不懂得中国礼仪，请求原谅，还回赠了马匹，双方恢复和亲。

文帝时（前180～前157年在位），冒顿单于击败月氏，控制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兵力更加强盛；而汉朝经济尚未恢复，又受到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牵制，军事上处于劣势，只能尽可能维持和亲。例如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侵，文帝亲赴太原，派丞相灌婴率八万车骑迎击右贤王。但济北王兴居发动叛乱，企图袭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文帝只得召回灌婴的军队，镇压内乱。第二年，冒顿单于致书文帝，表面重申和亲，实际却宣扬灭月氏的战绩，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所有使用弓箭的百姓已完全合并为一家），提出“皇帝如不想匈奴靠近边塞，就应该命令你的吏民迁得远远的”。

尽管如此，匈奴还是不时入侵。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冒顿单于之子）率14万骑兵进入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南），派出巡逻和侦察的骑兵到达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和甘泉（今旬邑县南），逼近首都长安。汉军紧急动员，单于在塞内留驻月余才撤退，汉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军队出塞，却无法消灭敌人。匈奴更加肆无忌惮，每年入侵边境杀人掠夺，受害最严重的云中（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和辽东（在今辽河下游和辽东半岛）二郡每年要损失万余人口。

汉朝一方面仍然只能争取与匈奴和亲，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边境的防卫和报警。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分两路侵入云中和上郡（今陕西北部），各有三万骑兵，文帝派三支军队分别把守北地（今甘肃东部）、句注山和飞狐口（今河北蔚县南），又调集军队驻守长安郊外。匈奴军一度直逼句注山，报警的烽火直达甘泉、长安。数月后，汉军推进到边境，匈奴军也退回塞外。

在景帝和武帝初年，汉朝始终执行和亲政策。在与匈奴的边境贸易中实行优惠，给了匈奴不少好处，长城沿线成为汉、匈奴间交易的场所。自单于以下的匈奴贵族、首领都喜欢与汉朝交往，长城下人员来往络绎不绝。但匈奴小规模的杀掠依然不断，汉朝内部的阴谋分子也想利用匈奴的武力。景帝即位后，赵王遂暗底下与匈奴勾结。吴楚七国之乱时，赵王企图引匈奴兵入境，但因汉军很快平息叛乱，赵王被围自杀，

匈奴才停止行动。

在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后，从汉初以来长期制约着中央政权的诸侯割据危机彻底消除，朝廷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外患了。加上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积累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人口也增加了一倍有余，对匈奴发动反击的条件趋于成熟。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豪富聂壹向武帝献计，引诱单于入塞，以重兵围歼。于是武帝派聂壹假装私自出塞贸易，引诱单于夺取马邑城（今山西朔州市），单于贪图马邑的财富，亲自率领10万骑兵进入武州塞（在今山西左云县），30万汉军已经埋伏在马邑四周，只等单于进入伏击圈。在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单于见牛羊遍布，却不见有人放牧，觉得可疑，就袭击了汉朝一个亭，抓住了正在巡视的雁门尉史（边境巡视员）。怕死的尉史将汉军的部署一五一十告诉了单于，单于大惊，立即退兵，汉军一无所获。从此匈奴断绝和亲，经常攻打边塞，入侵杀掠。但匈奴已对来自汉朝的物资产生了依赖性，还是要来边关购买，汉朝也利用贸易缓和局势，双方的边境贸易继续进行。

马邑之围虽然没有成功，但汉军并未受损，经过几年的训练准备，已经具备了打击匈奴的实力。元光六年秋，四位汉将各率一万骑兵向关市下的匈奴人发动袭击，并攻入匈奴境内。但第一仗打得并不顺手，除了上谷一路的卫青获得杀死、俘虏700人的战果外，公孙贺无功古代山水而返，公孙敖损失了7000人，李广还被匈奴俘获，好不容易才逃脱。元朔元年（前128年），匈奴二万骑兵分几路入侵，武帝派卫青率三万骑兵出雁门郡，李息出代郡，主动攻击匈奴。结果消灭数千人，取得初步胜利。第二年，卫青从云中出击，直至陇西（今甘肃东部），又杀、俘匈奴数千人。收复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汉朝整修了蒙恬所筑的长城的关隘，恢复了秦朝的边境线。当年还在内地招募了十万移民，迁入新设的朔方郡。

元朔三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军臣单于之子於单被打败，投降汉朝。匈奴又接连在边境入侵杀掠，河套一带本是右贤王的属地，所以他不断在朔方缘边杀掠。元朔五年，卫青率六将军共10万军队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阴山），深入

六七百里后，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虽然逃脱，但其部属1.5万人被俘，再也不能对朔方构成威胁。第二年，卫青又率六将军与10万骑兵从定襄出击，杀、俘匈奴1.9万多，但汉军也损失了3000多骑兵，前将军赵信被俘。赵信本来降汉的匈奴小王，熟悉双方情况，他建议单于将主力后撤，引诱汉军长途出击，以便待汉军疲劳后捕捉战机。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武帝封年轻骁勇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1万骑兵从陇西向河西走廊进军，一路杀、俘8000余人，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当年夏天，霍去病又从北地出击，过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北），南下至祁连山，前后杀、俘3万余人。单于因休屠王、昆邪王损失惨重，准备召来杀掉，休屠王与昆邪王闻讯后准备降汉，汉朝派霍去病率军迎接。昆邪王杀死临时变卦的休屠王，合并了他的部众，4万余人一起降汉，使汉朝获得了整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匈奴的重要畜牧基地，走廊中段的焉支山出产的颜料是匈奴妇女的化妆品，它们的丧失引起匈奴人极大的哀伤，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第二年，关东大水。汉武帝将72万多灾民迁至西北边疆和河西走廊，以后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朝稳固地占有河西走廊后，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向西域的大门。

元狩四年，汉朝出动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率领，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发远征，约定在沙漠以北会师。由于汉军接连获胜，百姓纷纷随军出征，以便建功立业，出塞的私马有14万匹，还不包括装运粮食的。单于撤退了辎重，率精兵在漠北迎战，被卫青一路汉军包抄，仅与数百骑突围而逃，部众1.9万人被杀、俘。霍去病一路也杀、俘了数万匈奴人，在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举行了祭祀仪式，直到接近瀚海（今贝加尔湖）才返回。这次战役迫使匈奴远离，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庭，汉朝的疆域扩展到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泽一带，在那里设置田官，组织五六万军人屯田。但汉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万余人和十余万匹马。汉朝一时无法增加战马，加上霍去病于元狩六年逝世，对匈奴的战事停顿了多年。

由于汉军无法在匈奴地区久驻，匈奴的流动性又大，所以汉匈间战事仍不时发生，但规模不太大，对汉朝没有什么威胁。太初三年（前

102年），汉朝派徐自为在五原塞外数百里至千余里间修筑了一系列防御设施，派路博德在居延泽边建筑障塞。当年秋，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将徐自为筑的城障全部破坏。此后，汉军仍不断出击，但多次失利，损失不小。征和三年（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汉军损失数万，元气大伤，不再出兵。但经过汉军二十多年的持续打击，匈奴人畜大减，加上天灾，濒于困境，自单于以下都希望与汉朝恢复和亲。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匈奴狐鹿姑单于死，其子壶衍鞮单于立，左贤王、右谷蠡王不服，不参加每年的祭天大会，匈奴势力更加衰落。由于汉朝边境已建起完备的防卫系统，烽火台报警及时，匈奴的入侵难以得逞。

昭帝末年，匈奴转而攻打西域的乌孙国，声称要得到汉朝嫁去的乌孙公主，公主向汉朝求援。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大规模征发士兵，派范明友、赵充国等五位将军率二十余万军队分路出击匈奴。救援乌孙。乌孙也派五万军队，由西向东接应。匈奴闻风而逃，汉军追至一二千里之外。派驻西域的常惠与乌孙军队攻至右谷蠡王庭，俘获单于亲属及将士近四万和大批牛羊，从此匈奴更加一蹶不振。当年冬天，单于为了复仇，率万骑进攻乌孙，俘获一些老弱人员，可是在归途遇到罕见的大雪。人畜冻死，返回的不足1／10。于是乌孙、丁零、乌桓从西、北、东三方合力进攻，匈奴无力招架。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匈奴的人口只剩下3／10，牲畜损失一半。汉朝出动三千骑兵就能俘获数千匈奴人返回，匈奴也不敢进行报复。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部众降汉。匈奴内乱不止，两年后分裂为五部，各自拥立单于，相互攻击。呼韩邪单于一再受到攻击，甚至被其弟郅支单于逐出了单于庭，所属左伊秩訾王劝他向汉朝称臣，寻求支持。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与大臣商议，大臣们一致反对："我们匈奴的风俗一向崇尚武力，鄙视降服，靠马上战斗立国，所以能威震各族。战死是壮士的光荣。现在兄弟争国，不是兄胜就是弟胜，就是战死了也有威名，子孙还能当各国的将帅。汉朝虽然强大，也无法吞并匈奴。何必违背古制，臣服于汉，使先单于受到侮辱，让各国耻笑!这样就算能得到安定，怎么还

能领导各族呢?”左伊秩訾力排众议：“不然!一个国家有时强有时弱是正常的，现在汉朝正强，乌孙等西域各国都当了它的属国，而且从鞮侯单于以来匈奴一天天削弱，无法恢复，就是这样也没有一天能安稳。现在臣服汉朝就能安全生存，否则就会灭亡，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争论了很久，呼韩邪决定听从他的意见，率领部众南下至汉朝边塞附近，派儿子右贤王到长安侍奉皇帝（充当人质，以示忠诚），并准备到长安朝见。郅支单于闻讯，也将儿子送到长安。

第二年，呼韩邪从五原塞入境，宣帝派车骑都尉韩昌专程迎接，沿途七个郡出动两千多骑兵在大道列队迎送。甘露三年正月一日，呼韩邪在甘泉宫朝见，宣帝做了特殊安排，让他享受诸侯王以上的隆重礼仪，并给予大量赏赐。呼韩邪在长安居留月余后回国，要求率部众驻守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附近，一旦有急可以利用汉朝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北）自保。宣帝派长乐卫尉董忠和韩昌率1.6万骑兵，又征发边郡的数千人马，送单于出塞，董忠等留在那里维护呼韩邪的统治地位，资助的粮食多达3.4万斛。

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韩昌与光禄大夫张猛将呼韩邪留在长安的侍子送回，并消除了单于的误会。他们见呼韩邪的部众日益强盛，足以自卫了，不必再畏惧郅支单于，而塞下的资源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大臣们也劝呼韩邪北归。他们恐怕呼韩邪北归后难以约束，就与单于、大臣们登上诺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东山，杀白马，饮血酒立下誓盟：“从今以后，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代代不得相互欺骗和攻击。有进入对方盗窃的，互相通报，将盗贼杀死后赃物归还对方。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发兵相助。谁先违背盟约，将受天的惩罚。让子子孙孙都遵守。”不久，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回到蒙古高原今乌兰巴托一带的单于庭，部众逐渐增加，国内安定。韩昌、张猛回长安后，公卿大臣认为他们与匈奴结盟超出了职权，并且降低了汉朝的地位，损害了国家利益，应该派使者去重新祭天，解除盟约，两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应处死刑。元帝减轻了韩昌、张猛的罪名，只处以罚款，命令维持与匈奴的盟约。

古代扇面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表示愿意当汉朝的女婿，元帝以后宫宫女嫱（昭君）相赐。呼韩邪十分感激，表示愿意

永远替汉朝守卫从上谷至敦煌的边疆，建议撤销边塞，以节省人力物力。元帝让大臣商议，大家都认为可行，只有熟悉边境情况的侯应反对。他向元帝详细说明了十点理由：塞外的阴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放弃防守就使汉朝失去了屏障；匈奴一旦强大了还会骄横，这是它的本性，要居安思危；中国有礼义刑法，愚民百姓还会犯法，单于难道就能完全约束他的部下?边防并非单为匈奴而设，也为了防止其他属国的降民逃亡；羌人移居塞下，与吏民已有冲突，也需要防止；以往军队中有不少因被俘或投降留在匈奴的人，他们的贫困子孙想去投奔；边疆地区的奴婢想逃亡匈奴；盗贼罪犯往远处躲藏，如能逃亡出境，就不易对付；边防线建设了百余年，所用人力物力不计其数，一旦废弃就再也无法恢复；真的让单于替汉朝守边，他一定会对汉朝居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要不满足他，后果就不堪设想。

元帝听后，下诏不再讨论此事，并派前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为特使向单于通报："单于的好意我毫不怀疑，但中国四方都设置关塞，并不单是防御匈奴，也是为了不使中国内部的罪犯歹徒出来害人，以便严格执行法律，统一民心。"单于表示自己考虑不周，接受了元帝的解释。直到王莽代汉，边境牛羊遍野，人口繁衍，城门经常到很晚才关闭，三代人听不到战争警报，百姓不必再服兵役，汉匈间保持了60年的和平局面。

郅支单于见呼韩邪归附汉朝，无法取胜，于黄龙元年（前49年）西迁坚昆（今俄罗斯叶塞河上游一带），以后又迁至康居，建昭三年（前36年）在康居东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被汉将陈汤、甘延寿所杀。

绥和元年（前8年），成帝的舅父王根执政，有人向他建议："匈奴有一块土地突出，插入张掖郡，出产上等木材，适合制箭杆，如能得到，可以增加边境的财富。国家扩大了领土，您也建了大功，名垂千古。"王根让夏侯藩出使匈奴索取。单于两次推辞，最后上书朝廷报告此事，朝廷只得表明是夏侯藩擅自盗用朝廷名义索要土地，已予处罚。平帝（公元前1～公元5年在位）初，因匈奴接受了西域车师后王等叛逃者，引起汉朝不满，特意颁布了四条规定：匈奴不得接受汉朝、乌孙、西域佩汉朝印绶诸国和乌桓的降人。原来匈奴向乌桓收皮布税，汉朝监

护乌桓的官员让乌桓人不要向匈奴纳税，匈奴兴师问罪，俘虏了不少乌桓人。这些都给汉匈关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公元8年王莽代汉后，派五威将王骏等出使匈奴，将汉朝颁发给单于的“匈奴单于玺”收回，另发“新匈奴单于章”。他们收回旧印后，因恐怕单于发现印文不同后会索回，当天就用斧头将旧印砸坏。单于认为将“玺”改为“章”是把他的地位降到了诸王一级，大为不满，上书要求恢复旧印。同时以送回乌桓人为名，调集一万骑兵，陈兵朔方塞下。第二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西域车师后王企图逃往匈奴，被汉西域都护但钦所杀，其兄率两千余人投奔匈奴。驻在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的戊己校尉刁护被部属陈良等人杀死，陈良等劫持吏士和家属两千余人，在匈奴骑兵的接应下到达单于庭。于是王莽下令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又宣布将匈奴分为15部，派人携带珍宝至塞下招引呼韩邪单于子孙当各部单于。从此，匈奴不断入塞杀掠，雁门和朔方郡的太守、都尉被杀，被掠的牲畜和财物不计其数。王莽派遣12名将军，征集30万军队，准备分10路对匈奴发动全面进攻，为部队筹集的粮食、物资由江淮、海滨运往北部边疆，弄得天下骚动。为了同时出兵，先到的部队驻在边境等待，但等了几年，部队还没有集合起来，搞得边境一片萧条。

东汉初，割据安定的卢芳在匈奴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使匈奴乘势南侵。光武帝无力对抗，不得不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当地行政机构和百姓内迁。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发生严重旱、蝗灾，赤地数千里，人畜大量死亡。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比为南单于，仍用呼韩邪称号。他们派人至五原塞向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得到接受。同年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五年，南匈奴袭击并俘虏了北单于之弟左贤王，又攻至北单于帐下，俘获万余人、五千匹马、上万头牛羊，北单于不得不退却了千余里地。南单于的地位初步稳定，汉朝也将内撤的8个郡迁回旧地，汉匈奴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态势。南单于派使者去洛阳，寻求汉朝的支持，请求恢复汉宣帝与匈奴的协议。建武二十六年，汉朝中郎将段郴等去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今包头市西）西部塞80里处，并允许其部众迁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朝廷调运去大批粮食和牛羊给

予救济，还派了常驻联络官员。由于南匈奴的实力还抵不住北匈奴的攻击，当年冬，又将单于庭南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准噶尔旗西北）一带，段郴和副校尉王郁留驻监护，设立了行政机构，每年由西河郡派2000骑兵和500名由缓刑犯充当的士兵担任卫护。南单于接受汉朝的监护，同时助汉守边，将部属分别派驻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约自今宁夏、甘肃至河北北部），为当地政府充当耳目，汉朝每年供应南匈奴大量财物、粮食、布帛、牛羊。

风景画鉴赏北匈奴控制着西域，不时侵扰河西和北方边境，掳掠南匈奴和汉人。南匈奴中也有些人与北匈奴勾结。为了断绝南、北匈奴间的交通，汉朝设置度辽将军，在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带屯兵。永平十六年（73年），汉军分4路出击，窦固、耿忠一路追至天山、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回伊吾（今哈密市西）。北匈奴四面受敌，南匈奴从南面做正面攻击，丁零在北边抄它的后路，鲜卑和西域各国从东、西两面左右夹击，加上接连发生饥荒和内乱，不断有人南下投汉。

永元元年（89年），汉将窦宪、耿秉率军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遁，降者二十余万，汉军一直推进到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第二年，汉军夺回了由北匈奴据守的伊吾卢，并派兵与南匈奴军一起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进攻匈奴，北单于受伤后只身逃遁。永元三年，耿夔率汉军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单于率一部分部众逃往乌孙，北匈奴彻底溃败，从此离开蒙古高原西迁。4世纪70年代，匈奴出现在欧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但东汉的北部边境并没有因为北匈奴的溃败和西迁而安宁，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很快填补了匈奴留下的空白，成为蒙古高原的新主人，他们与汉朝的冲突也随之开始。

从中国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与北方牧业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只是激烈程度和冲突范围而已。以往人们往往把冲突的出现归咎于牧业民族的野蛮落后、侵略好战，或者认为是农业民族软弱无能所致，这是相当片面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牧业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黄河流域一度是东亚大陆最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牧业民族曾经与农业民族一样生活在这一地区。但随着农业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牧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到战国后期已被挤出了黄河中下游，迁到了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之外。

在正常情况下，牧业民族的迁移范围并不大，所谓“逐水草而居”，主要是季节性的或周期性的。但在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他们的迁移范围必定会扩大。一般说来，要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条件或有了充分的安全后，他们的迁移才会告一段落。

秦长城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以后，匈奴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尽管北方还有大片处女地，但由于气候寒冷，匈奴人不可能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公元前3至前2世纪开始，气候逐渐变冷，严寒、干旱、大雪、蝗灾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要灾害。东西向的迁移往往同样难以躲避由北而来的灾害，还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抵制，向南方的迁移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殊死的搏斗就不可避免。由于牧业民族的生产技能——为放牧和狩猎需要锻炼出来的骑马和射箭——非常容易转化为军事需要，在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中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使他们稳操胜券。

在占有农业民族的土地的同时，牧业民族往往也夺得了粮食、纺织品、生产工具、其他物资、妇女和劳动力。这些战利品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度过了灾难，而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有了积蓄。这使他们意识到，用武力从南方农业区掠夺物资和人口是趋避灾害、获得财富的最容易的手段。而与其他游牧民族的争夺，付出的代价很大，收获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南方农业区缺乏有力的防卫，牧业民族就会经常性地进行袭击性的掠夺。每当秋高马肥，牧业民族的战斗力最强，又最需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和物资，这类掠夺也最频繁。

无论是正常的交换，还是掠夺所得，一旦牧业民族开始消费粮食、食品、纺织品，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更适宜的生活用具，就会产生更大的需求，逐渐形成依赖性。原始的牧业民族可以完全依靠畜产品为

生，但在食用粮食，穿上纺织品，使用了铁制工具或武器后，就再也无法断绝。当茶叶传入牧业民族以后，也很快变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但牧区不能生产这些物资，至少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将这些物资的供应视为生命线，中原王朝的供应、在边境开设的“关市”和“互市”对他们来说至关紧要，甚至不可或缺。中原的统治者不了解牧业民族的需要，或者故意将这些物资的供应作为对付他们的手段，这往往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尽管的确存在着先进和落后，但从本质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相适应的，没有优劣之分。然而，处于东亚大陆中心、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以后的汉族）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他们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春秋时就集中表现在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是夏；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族是夷。夏是中心，是文明，是先进；夷是附庸，是野蛮，是落后。夏和夷的界线绝不能混淆。正因为如此，汉朝从皇帝到臣民都很难理解和同情匈奴人，汉朝和匈奴也不容易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关系。

汉文帝时一位宦官中行说在出使匈奴时投降，他留在匈奴后，对双方的情况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来代表匈奴与汉使做了一场有意义的辩论：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驳斥道：“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戍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

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制度太烦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通过耕地栽桑获得粮食和衣服，修筑城墙作为防卫，所以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的话虽不无强词夺理之嫌，却比汉使更加理直气壮，他懂得了站在汉人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道理：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适应了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绝不能用农业民族的标准来衡量，而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汉朝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匈奴的条件。可惜当时懂得这样的道理的人太少了，特别是在汉朝方面。

古代山水画中行说也明白匈奴文化的弱点：他们也要追求物质享受，但本地的产品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汉地产的“缯絮食物”对匈奴贵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行说向单于建议，将来自汉地的丝织品放在棘草地上践踏，衣服都撕破，以表明它们不如匈奴的裘皮耐久实用；将汉地运来的食品统统扔掉，以证明它们不如匈奴的奶酪味美，从而防止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产生对汉人的依赖性。在这一点上，中行说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匈奴人，他的建议自然是徒劳的。

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匈奴入侵汉朝，在边境杀掠，当然是侵略，是非正义的，但并非不可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汉朝防卫自己的边界完全是正义的，适当予以回击，以保证边界不受侵犯，也有其必要。即使对匈奴的打击超出了防卫的限度，同样有其不得已的一面。

在汉匈之争中，汉朝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匈奴人的生存条件比汉民低，汉民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而匈奴人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一般都能变为牧地，匈奴人南下后可以将农牧界线南移，汉人北上后却不能将农业区向北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阴山山脉已是农业区的极限。

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匈奴人都曾占有过阴山以南的土地，他们照样可以在那里放牧和生活。而汉朝的军队尽管曾一次次深入蒙古高原，甚至将匈奴人驱逐到蒙古高原之外，却无法在那里久驻，更不能将那里变为自己的疆域，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域。因为军队或移民都无法就地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全部要从遥远的后方运来。在匈奴人与他们的牲畜全部转移后，他们既没有统治的对象，也没有作战或掠夺的目标。即使是给匈奴以重创的战争，实际损失往往是汉朝一方面更大。

所以，在汉匈冲突中，汉朝往往只能取守势，匈奴却一直采用攻势。匈奴的每次入侵，都会给汉朝造成很大的损失，汉朝的反击倒经常是得不偿失，因为在匈奴远遁时，汉军出兵再远，也不会有任何战果，却要赔上大量粮食、物资和人员的损失。在汉朝的军事实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采取“和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和现实的政策，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来和平，避免更大的损失。

我们应该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入侵的贡献，这一努力巩固了西汉的疆域，也为以后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注意到，真正给边境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宁的是汉宣帝的正确方针。当呼韩邪单于兵败投降时，他不仅没有趁机消灭匈奴政权，而且给予基本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充

分的物资供应，使匈奴能享受体面的和平。汉元帝继承了宣帝的政策，并且承认了使者未经授权与匈奴立下的平等盟约，支持呼韩邪返回匈奴故地复国。否则的话，60年的安定是不会出现的。在汉朝400年的历史中，与北方游牧民族保持长达60年的安定局面是空前绝后的，其意义于此可见。

山水画鉴赏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大批匈奴人因被俘或归降而被迁入汉境，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而设置的“属国”中，“因其故俗”，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置在内地，逐渐融合于汉族。有的还担任汉朝大臣或将领，如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金日磾，就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以后金氏繁衍为著名的士族。不过，多数迁入内地的匈奴人都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他们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

东汉时入居塞内的南匈奴，一度有3.4万户、23.73万人，还有很多散居各地的南匈奴人和北匈奴降俘人员未列入统计。长期定居后，匈奴人开始从事农业，以后又渡过黄河进入今山西省，在汾水流域定居。匈奴的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已与汉族士人无异；而底层贫民则被作为奴婢，大量掠卖到中原各地。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设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匈奴不少上层人士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以后又迁至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以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为由，自认为刘邦之后，取刘氏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刘曜建立赵（前赵）。

匈奴是“乱华”的“五胡”之首（匈奴、鲜卑、羯、氐、羌），而刘氏匈奴又是匈奴中首先建立政权的一支。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支“乱华”的匈奴人在文化上与被“乱”的华夏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据《晋书，载记》所载，刘渊（元海）七岁遭母丧后，“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哪里还有一点匈奴人的痕迹?就是他习武，也不是继承了匈奴尚武风尚的结果，而是研读《史记》、

《汉书》受到了启发。他对同门的朱纪、范隆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如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我每次阅读史书传记，常瞧不起随何、陆贾缺乏武艺，周勃、灌婴没有文化。道是由人来弘扬的，有一方面不如别人，当是君子的耻辱。随、陆二人遇到汉高祖而不能建功封侯，周、灌二位在汉文帝时代却没有崇教兴学，真是太可惜了!）从此他开始习武，并达到"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的水平。刘渊之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个儿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武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族祖刘宣是五部匈奴的"左贤王"，但也是"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

古代山水人物如果说，这些记载可能出于后人的溢美或蓄意"汉化"的话。我们不妨看一下刘渊即汉王位时发布的文告，这是不可能作假的：

昔我太祖高皇帝（汉高祖刘邦）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周朝）。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汉献帝）委弃万国，昭烈（刘备）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不悔祸，后帝（刘禅）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完全是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一副为祖宗报仇，兴复汉室的姿态。刘渊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当然，刘渊这样做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显然已为本族所普遍接受，至少已为上层人士所认同。

由于匈奴曾经活动于东北亚至中西亚的辽阔地带，征服过很多民族，其他一些民族的人口也随匈奴而内迁，如丁零、鲜卑、羯和西域诸

族。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建立魏国的丁零人翟氏，他们的先人都是这样迁入中国的。

迁入中原的匈奴人和其他各族，最终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华夏文明，与华夏（汉）族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这是当年汉匈双方都想不到的结果，却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上值得珍视的光荣一页。两汉的疆域如果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汉的最大疆域与18世纪中叶清朝的极盛疆域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西藏、内外蒙古、东北和台湾以外，汉朝的疆域与清朝的版图不相上下，且还拥有朝鲜半岛、今越南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再看得仔细一点，还可以发现，西汉有一千五百多个县级单位，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县级单位是两千余个。在中原地区，汉县的数量和幅员与今天已大致相同。

中国的疆域就是从汉朝疆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是历史上空前的。但不久天下大乱，接着又是连续多年的楚汉之争，所以到公元前202年汉朝初建时，它的版图比秦朝缩小了不少，主要是在边疆地区。

秦始皇在东南越人地区设立闽中郡时，保留了境内的越人君长。这些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汉朝立闽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在今福建境内以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市）。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勾践的后人摇被封为东海王，以东瓯（今浙江温州市）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但朝廷面临内外敌对势力，无暇旁顾，只能暂时容忍。吴王濞起兵时曾征召东瓯（东越）和闽越的军队，闽越没有出兵。东瓯虽然参与了叛乱，但在吴王濞兵败出逃后将他杀死，表示继续效忠于汉朝，朝廷没有追究。

兵马俑秦始皇征服南越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中原移民为基础，设立了一些县。陈胜起义爆发后，南海郡（治番

禺，今广州市）尉任嚣病重，临终前他召来龙川县（治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西南）人赵佗，命代理自己的职位，拥兵自保。任嚣死后，赵佗下令封锁与中原相通的关隘，清洗了秦朝的官员，安排自己的部属控制了南海郡。秦亡后，赵佗出兵并吞了桂林和象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灭项羽后，继续忙于对付异姓诸侯和匈奴的入侵，加上岭南与汉朝并无冲突，所以直到十一年（前196年）才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地位。大约在公元前181年前后，南越灭安阳王，扩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13度，今巴江一带。

吕后执政时，有关部门要求断绝关市，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这对南越的经济有很大损害，引起了赵佗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一定是与南越相邻的长沙王出的主意，以便吞并南越，因而自称南武帝，并发兵进攻长沙国，破坏了几个县。吕后派隆虑侯率军队还击，因天气炎热，环境潮湿，士兵得了传染病，连南岭也过不了。一年多后，吕后去世，军队撤回。赵佗软硬兼施，使闽越、西瓯骆服从他的控制，还设立了像汉朝皇帝一样的仪仗队。

赵佗通过隆虑侯提出了三项要求：寻找他的亲兄弟，撤退在长沙国的汉军，调整南越与长沙国的边界。文帝即位后立即作出反应，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设立守墓户，逢年过节祭祀，召来他的兄弟，封官赏赐，并派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在给赵佗的信中，文帝说明已经满足了他的前两项要求，对最后一项，即对南越与长沙国之间犬牙交错的边界进行调整，文帝强调这是高皇帝有意的安排，他不能擅自改变，但这并不是贪图岭南的经济利益，希望他能取消帝号，双方捐弃前嫌，恢复友好关系。赵佗向陆贾表示，接受文帝的诏书，下令取消“黄屋左纛”的仪仗。此后，南越对汉朝称臣，但在国内依然以国君自居。

两千多年后，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西汉初长沙国南部的地图，证明当时长沙国与南越间的边界的确是犬牙交错，而不是按照南岭的自然地形划分的。这样的划分使汉朝在南岭南侧占有若干突出的据点，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汉朝将东瓯、闽越、南越三国称之为“外诸侯”，以区别于异姓、同姓王这些“内诸侯”。外诸侯实际上是藩属国，接受汉朝宗主国、皇帝的地位，向汉朝称臣，但在国内则保持独立。这三国在秦朝时都已建立郡县，是秦朝的正式行政区，西汉初变为“外诸侯”，使西汉的疆域实际缩小了，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自从刘邦在平城败归后，西汉对匈奴一直取守势。尽管西汉实行“和亲”政策，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它的一些部族住地离首都长安只有700里，轻骑兵一昼夜就能到达。西北和北方的边界都没有能恢复到秦始皇时的位置。

在西南地区，秦朝曾经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笮（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駹（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的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随着秦朝的解体，设置在云贵高原的行政机构撤退到四川盆地，西汉前期一直没有能恢复。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积聚了大批粮食和物资，人口翻了一番。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内部分裂割据的威胁已经消除，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了。这些都为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准备了条件。

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严助率会稽郡（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救援，闽越军队闻风解围。武帝以东瓯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而要求内迁为由，将大部分东瓯的越人迁至江淮之间，东瓯国不复存在。

建元六年，闽越王郢进攻南越边境。当时的南越王赵胡是赵佗的孙子，他派人上书汉武帝，表示南越和闽越都是汉朝藩臣，他不敢擅自出兵对付闽越，请天子作出处理。武帝对南越的态度很赞赏，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讨伐闽越。汉军还没有到达，闽越王之弟馀善就将闽越王杀

死，向朝廷报功。武帝下令罢兵，另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粤）繇王。馀善因杀了郢，在国内很有威信，就自立为王。武帝不愿为这一点事再出兵，就以馀善杀郢有功为理由，立他为东越（粤）王，与繇王并存。但馀善对汉朝态度暧昧，并未真正服从。

山水画鉴赏武帝派严助去南越宣布对闽越的处置结果，示意南越王入朝。赵胡派太子婴齐随严助去长安“宿卫”（藩王表示忠诚的方式，名义上派太子至首都担任皇帝的警卫，实际是作人质），表示自己处理完国内事务后就入朝。严助回去后，大臣纷纷劝阻赵胡入朝，认为汉朝出兵闽越实际是向南越示威，入朝就不可能回来，必定导致亡国。于是赵胡就称病，十余年后去世，太子婴齐归国即位。婴齐在长安与汉女结婚生子，回国后立为太子。汉朝几次派使者劝婴齐入朝，婴齐怕入朝后南越会成为内诸侯，也一直称病，只派儿子次公入宿卫。元鼎四年（前113年）婴齐死，太子赵兴即位，汉朝再次派使者到达南越，并命令卫尉路博德屯兵桂阳（今湖南郴州市），策应使者。赵兴与太后商议，上书武帝，要求像内诸侯一样，3年朝见一次，撤销南越与汉朝间边关。得到批准后，赵兴与太后就着手筹备行装。

南越重臣吕嘉是赵佗以来三位国王的丞相。宗族担任官员的有七十多人，与赵氏王室普遍通婚。吕嘉在国内的威望比赵兴还高，他坚决反对归入汉朝，见国王不听他的意见，就称病不见汉使。太后主张杀吕嘉，但与赵兴、汉使意见不一，无法采取行动。吕嘉密谋策划反叛，但一直在等待时机。元鼎五年，韩千秋请求去南越杀吕嘉，武帝派他与南越太后之弟率2000人前往南越。得知他们入境，吕嘉就发动叛乱，杀掉了赵兴、太后和派驻南越的汉使，并袭击杀害了韩千秋一行，派兵驻守边界。武帝下讨伐令，征调越人和江淮以南十万大军。

当年秋，汉军分五路进攻，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今湖南郴州市）顺湟水（今连江、北江）而下，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今江西）出发，经横浦关（今江西大余县大庾岭南）入南越；二位归汉的越侯分别被任命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从零陵（今广西全州县西南）进军，一路沿离水（今漓江）而下，一路进入苍梧（今浔江流域）；还派人率领巴蜀士兵，南下征调夜郎（今贵州安顺市一带）军队，顺湟柯江（今北盘江、红水河）而下，最后会师番禺。元鼎六年冬，杨仆一路攻占寻狭

（今广东清远市西），突破了南越在石门（今广州市西北）的防线，缴获大批船只和粮食，收编了数万越军。稍后，路博德的军队也到达，两军合围，攻陷番禺城。吕嘉与他所拥立的南越王赵建德逃亡入海，被归降汉军的旧部俘获。南越的苍梧王赵光投降，桂林郡监居翁招降了瓯骆地区，其他三路军队尚未会合，南越全境已经平定。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两郡在今海南岛上。

由于地方官暴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对抗，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一直无法稳定。始元五年（前82年），儋耳郡并入珠崖。但当地民族的反抗依然很激烈，地方政府难以维持，因而在初元三年（前46年）又不得不撤销珠崖郡，行政机构和人员全部内迁。虽然大陆政权在岛上的行政机构长期没有恢复，但民间的往来并没有停止，大陆人民还不断迁往岛上，使人口逐渐增加，开发范围日益扩大。

随着境外林邑国的扩张，东汉疆域的南端从今越南富安省南界退至承天省南界。

东越王馀善还是反复无常，元鼎五年他上书武帝，要求率领8000士兵跟随杨仆讨伐吕嘉，但进至揭阳（今广东揭东县西北一带），又以遭遇风暴为由停留，实际上暗中与南越联络，想左右逢源，持观望态度。汉灭南越后，杨仆要求率部队灭闽越，武帝考虑到长途用兵后军队疲劳，没有批准。部队从南越撤回后，武帝令诸将驻扎在豫章梅岭（今江西广昌县西一带）待命。

元鼎六年秋，馀善得知杨仆曾有请出兵的要求，汉军又留驻边境附近，就任命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今江西波阳县西）、武林（今余干县北）、梅领（岭），杀了汉朝三位校尉。馀善自称“武帝”，不再归属汉朝。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今浙江余姚市东南）出海南下，楼船将军杨仆从武林出发，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发，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二位山水风景画越侯分别从如邪（今地不详）和白沙出发，在元封元年（前110年）进入闽越。闽越凭借山地抵抗，陆路进攻一度不利。由汉朝派回的原越衍侯吴阳奉命劝馀善投降，馀善拒不接受。这时

韩说的部队由海路到达，吴阳发动当地居民起兵，配合汉军。闽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杀了馀善，闽越平定。汉武帝认为闽越地区地形崎岖，土地狭小，闽越人强悍，又曾多次反叛，下令将闽越居民全部北迁，安置在江淮之间，使闽越旧地基本成为无人区，逃避了强迫外迁的越人退居深山。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逐渐出山定居，才重新在今福州设立了冶县，在今椒江市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但由于越人外迁，又没有新的移民迁入，这一带一直地广人稀，东汉末年才有新县的设置。

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所谓西南夷，是指今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民族。分布在今乌江、金沙江流域的有夜郎、滇、邛都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比较集中的居民点，“椎结”（发髻扎成椎形）。在今澜沧江上游一带有巂、昆明等族，以游牧为主，人民都“编发”（头发编结后披下）。在今大渡河流域有徙、筰都、冉駹等，有的定居，有的经常迁移。在今甘肃南部白龙江流域有氐族的白马，岷江上游的冉駹等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撤退到了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巴蜀的商人还因与这些民族的贸易而致富。

建元六年（前136年），王恢在制止了闽越对南越的入侵后，派番阳（今东西波阳县东北）令唐蒙去南越通报情况。唐蒙在南越吃到了蜀地产的枸酱，问是从哪里运来的。当地人回答：“从西北的牂柯江，江有几里宽，下游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长安后就问来自蜀地的商人，得知枸酱是蜀地的特产，有人偷运出境到夜郎，南越用钱财从夜郎购买。夜郎面临牂柯江，那里的江宽百步左右。唐蒙估计到武帝迟早要对南越用兵，就上书武帝：“如果从长沙、豫章进入南越，水路不通，交通困难。我听说夜郎有十万精兵，从那里坐船沿群柯江而下，可以出其不意，是制服南越的一个奇招。以汉朝的强大，巴蜀的富饶，开通往夜郎的道路，设置行政机构，再容易不过了。”武帝任命唐蒙为郎中将，率1000士兵和运载粮食辎重的万余人，从巴郡出苻关（在今四川合江县），到达夜郎。唐蒙向夜郎侯多同宣传汉朝的强大，又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在当地设置了汉朝的地方政府，任命多同的儿子为令（相当内地的县令）。夜郎周围的小城得到了唐蒙分发的缯帛，又认为从汉朝过来道路

艰险，汉朝未必真能来统治，所以都表示愿意接受设置行政机构。唐蒙回来后，大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就下令在这一带设置犍为郡，以焚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为郡治，发动巴、蜀的士兵修一条从僰道通向牂柯江的道路。蜀人司马相如又上书称“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筰（今四川盐源县一带）也可以设置郡县，被武帝任命为郎中将。司马相如向当地的君长做了一番宣传，结果汉朝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和一个都尉，划归蜀郡管辖，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巴、蜀等四郡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修了几年，道路还没有修通，士兵饥疲交迫，加上天气湿热，死亡的人很多。西南夷君长接连反抗，派兵镇压耗费巨大，却没有什么效果。武帝感到很麻烦，派公孙弘去考察，回去后做了汇报，结论是筑路工程“不便”。不久公孙弘当了御史大夫，当时汉朝正忙于筑朔方城，以河套为基地进攻匈奴，公孙弘等建议西南夷工程危害大，可暂时停止，集中力量对付匈奴，得到武帝的批准。西夷的县取消了，南夷保留了二县和一都尉，由犍为郡自行修建县城。

张骞出使归国后，向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到有蜀地产的布和邛杖，了解它们的来源，说是来自东南的身毒国（今印度），有数千里远，蜀地的商人到那里去做买卖。听说身毒国在邛以西约2000里。张骞说：大夏在汉朝西南，一向仰慕中国，就怕匈奴隔断来往的道路。要真开通了由蜀往身毒国的道路，就又近又方便。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寻找从西南夷通向身毒的道路。滇（在今云南滇池一带）王留住汉使，为他们探路，但由于昆明（在今云南大理市南一带）阻挡，花了四年多时间也没有结果。

南越吕嘉反叛时，武帝命驰义侯从犍为郡征发南夷的军队，且兰（今贵州黄平县西南）的君长怕自己的军队跟随汉军远征后，被周围的部族乘机攻击，就发起反抗，杀了使者与犍为太守。汉朝用原来准备进攻南越的巴蜀罪人和八校尉加以镇压，正好南越已平定，调回的汉军攻入且兰，杀了数万人，在南夷地区设置了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见南越被灭，请求入朝，被武帝封为夜郎王。汉军又杀了邛君、筰侯，冉駹等十分恐惧，请求臣服并设置行政机构，于是汉朝在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东南）设越巂郡，在筰都（今四川汉源县东北）设

沈黎郡，冉駹（今四川茂汶县北）设汶山郡，在白马设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县东北）。

张骞像汉武帝派王然于将灭南越和杀南夷反抗的部族首领的情况向滇王通报，劝他入朝，但滇王自恃有数万部众，又有它东北的劳深、莫靡等同姓部族的支持，拒不服从。两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调巴蜀军队攻灭劳深、莫靡，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请求朝廷设立行政区，于是在滇设益州郡（今云南宁晋县东）。考虑到滇王曾带头拥护朝廷，武帝赐给他“滇王之印”，仍让他统治本部族的百姓。以后降服昆明，将其属地并入了益州郡，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并与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的哀牢人有了交往。

由于设置时考虑欠周，有的郡辖境有限，人口稀少，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撤销了汶山郡。这两郡的辖境大多并入了相邻的蜀郡，疆域并没有什么减少，但对当地部族的统治相对放松了。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接受内属，汉朝设置了两个县，又从益州郡划出六县，合并建立了永昌郡。汉朝的疆域不仅已包括今天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东部。

还是在战国后期，燕国就统治过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真番，在那里设置了行政机构和防御工事。秦始皇灭燕后，将燕国留下的机构划归辽东郡，作为在境外的附属机构。西汉初国力有限，考虑到在朝鲜半岛的机构路途遥远，仅修复了秦朝辽东的长城，以浿水（今朝鲜清川江）为界，归燕国管辖。燕王卢绾投降匈奴后，燕人卫满就聚集了数千人出塞。他们渡过浿水，在秦朝防区的旧地定居，逐渐控制了朝鲜、真番和流亡在那里的燕、齐移民，并在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南）建都。当惠帝时，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让他当汉朝的藩属，但不得侵犯边境，也不得阻止朝鲜半岛上其他民族与汉朝的联系，朝廷批准了这项措施。卫满有了汉朝的支持，控制了真番、临屯（朝鲜半岛东海岸中部），其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端、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北部。

但朝鲜半岛上还有不少其他部族，元朔元年（前128年），半岛东

北沿海一带的东夷秽君南闾等归属汉朝，武帝在那里设立了苍海郡。但该地与汉朝之间并不相连，通过海路运输耗费巨大。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后并没有获得实际利益，所以两年后就撤销了苍海郡。

到卫满的孙子右渠在位时，朝鲜引诱并接受了很多汉朝的逃亡人口，又从未入朝，而真番、辰国（在半岛南部）请他转达汉朝的书信也不上报。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派涉何向右渠下达诏书，右渠不肯接受。涉何觉得难以向武帝复命，在回到浿水边时命部下刺杀了朝鲜护送他回国的裨王，回来后谎报“杀朝鲜将”。武帝心里明白，却没有追究，任命他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对他十分痛恨，发兵袭击，将他杀了。

武帝下令募集全国罪人从军讨伐朝鲜。当年秋，由楼船将军杨仆率5万军队由齐地（今山东半岛）渡海，左将军荀彘从辽东陆路进军，右渠得知后，发兵据守险要抵抗。荀彘先派一队辽东兵进攻，战败逃散。杨仆率7000齐兵先到达王险城，右渠在城上见杨仆军队人数少，山水画鉴赏就出城袭击。杨仆被击败，与士兵失去联系，在山中躲藏了十几天，才逐渐收罗游兵散勇，重新集结。荀彘进攻浿水西岸的朝鲜军队，也没有获胜。

武帝见两路军队都没有取胜，就派卫山向右渠劝降。右渠表示本来就想投降，只恐中计被杀，现在见到皇帝的使者，请求归降。右渠派太子入朝致歉，献马5000匹，及向汉军送上粮食。由一万多持武器的士兵护送。这支部队正在渡浿水时，使者和荀彘怀疑他们可能会搞阴谋，认为太子既已降服，就应让随行人员不带武器。太子也怀疑使者和荀彘欺骗他，就不渡浿水而退回。接到卫山回来的报告，武帝气得将他杀了。

荀彘军终于攻破朝鲜在浿水防守的军队，攻至王险城下，围住城西北，杨仆转驻城南。由于右渠坚守，几个月也没有攻下。荀彘的部队来自燕、代，又打了胜仗，作风骄悍。杨仆的士兵都是齐人，渡海时已有了损失，与右渠一仗被打得大败，造成士兵恐慌，将领心中惭愧，所以虽然包围着右渠，却希望与他议和。面对荀彘的不断攻打，朝鲜大臣与杨仆秘密协商投降事宜，联系了几次，尚未作出决断。荀彘几次与杨仆约期进攻，杨仆在等朝鲜投降，不采取行动。荀彘也秘密派人向朝鲜劝

降，但朝鲜方面希望向杨仆投降而予以回绝。两将之间矛盾很深，荀彘认为杨仆此前已犯过脱离部队的错误，现在与朝鲜相处得很好，朝鲜却不投降，怀疑杨仆有意谋反。武帝等得心焦，派前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督战，并授权他便宜行事。公孙遂到前线后，荀彘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朝鲜之所以不能攻下，都是由于杨仆一直不如期会师："现在如不除掉他，就会与朝鲜一起来消灭我的军队。"公孙遂赞同他的分析，以使节召杨仆来左将军荀彘营地商议军事，等杨仆到后就将他捆绑扣押，由荀彘接管了他的军队。

荀彘集中两军猛攻朝鲜，朝鲜大臣知道守不住，纷纷出城降汉，但右渠又不愿投降。元封三年夏，已经投降汉军的尼溪相参派人杀死右渠。但王险城尚未攻克，右渠的大臣成已继续抵抗，经右渠之子和其他降人向百姓劝告，将成已杀死，战事才最后平息。汉朝在朝鲜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辖境南至今汉江流域。

荀彘因争功嫉妒、使用诡计等罪被杀，杨仆则因擅自行动造成损失而定下死罪，赎为庶人。对朝鲜一仗打得如此艰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两位主将的不和是主要因素。

朝鲜半岛北部的人口毕竟有限。很多地方尚未开发，还有一些地方仍由当地民族控制着，所以到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撤销了朝鲜的临屯和真番二郡，它们的辖境放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并入了乐浪郡。元凤五年（前76年），又将玄菟郡的东部放弃，治所也从朝鲜半岛上迁到了今辽宁新宾县以西。

昭帝以后，汉朝也没有组织向朝鲜半岛和辽东以东的地区移民，所以在朝鲜半岛的东海岸一带，汉朝的行政区缺乏本民族人口的基础。由于受到当地秽貊人和马韩人的压力，光武帝时放弃了乐浪郡在单单大岭（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的7个县。原来分布在鸭绿江上游的高句丽逐渐摆脱了汉朝的统治，随着高句丽的兴起和扩张，玄菟郡的辖境也完全放弃，郡治迁到了今沈阳市西，辖有从原辽东郡辖境中划出的数县之地。

随着反击匈奴的胜利，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朝收复河套地

区，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汉朝整修了蒙恬所筑的长城的关隘，恢复了秦朝的边境线。元狩二年（前121年），由于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合并了他的部众一起降汉，使汉朝获得了整个河西走廊。以后，汉朝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在湟水流域设置了金城郡。

当西汉的疆域扩展到河西走廊时，人们就将走廊西端玉门关和阳关（均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以西称为西域。天山山脉横亘于西域，将它分为南北二部。高山、戈壁、沙漠又将一片片绿洲、河谷相互隔离，交通线漫长而艰险，因此形成了数十个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的小国。这些国最大的有数十万人口，小的才数百人。天山以南的诸国大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业、手工业、商业，被称为城郭诸国。少数国处于游牧状态，没有城郭。天山以北的国还是以游牧为主，但也有一些城郭。

西汉初，匈奴迫使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山和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西迁后，又征服了西域诸国，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僮仆都尉。汉朝夺取了河西走廊后，虽然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但匈奴仍控制着西域，所以汉使常受到阻拦和劫掠。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军破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姑师（今吐鲁番盆地内）。六年，汉朝又以宗室女嫁给乌孙王。太初元年（前102年）、三年，汉将李广利两次出征大宛。李广利的出征并不完全必要，又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客观上打破了匈奴对大宛的控制。此后，汉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渠犁（今库尔勒市西南一带）驻兵屯垦，开始设置行政机构。

河西走廊但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天山以北各国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才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初元元年（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设置了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都护府的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其辖区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它们

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可以调动它们的军队，决定它们对外的态度，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废立它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国。可见，西域都护府所辖区域同样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

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内地与西域交通断绝。东汉初，一些西域国家多次寻求汉朝的保护，请求重建都护府，但光武帝限于实力，一再拒绝，各国只得降服于匈奴。永平十六年（73年），汉将窦固等率军进攻匈奴，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仅率吏士36人，但靠着汉朝在西域留下的影响和自己的勇敢智慧，成功地控制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和田市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一带）等国。第二年，窦固进攻车师。车师前王（都交河城，今吐鲁番市西北）和后王（都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县南）投降，在断绝了65年以后汉朝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这一大片疆域。但北匈奴势力依然强大，汉军并没有稳定的优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一带）、龟兹（今库车县一带，匈奴所立）攻灭了西域都护陈睦，匈奴和车师包围了戊己校尉（驻高昌壁，今吐鲁番市东南）。章帝建初元年（76年），撤销了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当时，汉朝的军队已全部撤回，章帝怕班超孤立无援，下令将他召回。建初三年又撤回了在伊吾（今哈密市西北）的屯田。班超离开疏勒时，举国震恐，都尉黎弇说："汉朝人使者抛弃了我们，我们必定会重新被龟兹消灭。"接着就拔刀自杀了。班超到达于阗时，王侯以下的人都号啕大哭，抱住他的马腿不让走。班超本来就不愿无功而还，索性返回疏勒，利用汉朝的威望，运用灵活机智的策略，留在西域孤军奋斗，使依附匈奴的国越来越少，基本保持了天山南道的畅通。永元三年（91年），汉军进至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亡，北匈奴从此西迁。西域都护府再次恢复，驻于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大望库木旧城），辖境与西汉时大致相同，班超出任都护。10年后，年近70的班超自觉"老病衰困"，思乡心切，请求召回。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这位在西域奋战了31年、为维护汉朝疆域立下奇功的英雄回到洛阳，一个月后就因病逝世。

班超回内地时，继任者任尚向他请教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说："在塞外的官吏和士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为犯了罪才被押送来，

或有过失才被调来。而本地民族与我们的习性不同，难以管理，容易闹事。你的性情太严过急，水清无大鱼，治理太严格了不能得到下级的拥护，应该放松简易，宽恕小过失，管住大事就行了。”任尚心中不以为然，认为班超“所言平平”，没有接受他的忠告，措置不当，激化了与各国的矛盾，受到各国攻击，永初元年（107年），都护府又不得不撤销，班超之子、军司马班勇与他的哥哥班雄奉命接应都护和驻西域的士兵返回。

汉朝的撤退使残留在阿尔泰山的北匈奴卷土重来，占领伊吾，寇掠河西。一些西域国再次寻求汉朝的庇护，大臣们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执政的邓太后召见班勇，经过与大臣的激烈辩论，他恢复西域建置的建议被采纳。延光二年（123年），朝廷任班勇为西域长史，驻柳中（今鄯善县西南），长史府的职能与都护府相同。班勇击退匈奴的残余势力，使汉朝再次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但与西汉后期相比，汉朝对西域的控制有所削弱。由于乌孙已成为独立政权，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也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的西北界退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东汉末年，汉朝已无力控制西域，长史府不复存在。

山水画鉴赏经过长期开拓，西汉的疆域向西扩展到了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中部，西南据有今云贵高原全部和缅甸的一部分，南边达到今越南中部，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范围最大的王朝之一。尽管东汉的疆域比西汉时有所收缩，但经过秦和西汉的开发，边疆地区基本得到稳定。东汉以后，尽管中原王朝的疆域时有盈缩，内部时有分裂，但这一范围始终是中国的主体，说明它的形成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秦汉疆域的形成是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各族人民长期交往，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人们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的加强，交通条件得到不断改善的结果；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大力开拓的决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汉朝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这绝不是偶然的。

不可否认，汉朝的开疆拓土主要是以武力征服为手段，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其中有一部分战争并没有正当的理由，完全可以称为侵略。

例如，汉武帝对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毫无军事上的理由，更没有自卫的需要。关于第二次用兵西南夷、打通往身毒道路的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西南夷地区，扩大上千里的土地。将各种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只有其中的第二点是真正从军事角度考虑的，但却完全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因为此前张骞第一次到达大月氏时，月氏国王因已占有大夏，土地肥饶，生活安定，不愿再报匈奴之仇了。从地理形势看，这样的设想也是绝对行不通的。攻西南夷的直接用意是通过今云贵高原进入身毒（印度），再从身毒往今阿富汗和中亚。结果是连通身毒都没有成功，更不用说通过身毒到达大月氏和康居了。其实武帝的真意是在第一、三两方面，所以在征西南夷没有达到目的以后，又发动了征大宛之战。

如果说对西南夷的战争还有借口可寻，那么征大宛则是赤裸裸的掠夺。事件的导火线虽是大宛杀了汉使，却是汉使强求大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而挑起的。而且汉朝的“使者”有不少人是“妄言无行之徒”，是谎报情况企图制造事端以便捞一把的，在西域的名声很差。武帝出兵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把这个美差赏给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封侯。岂料这支数万人的不义之师受到西域各国的抵抗，两年后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的人回到敦煌。武帝大怒，调集六万兵力及不少自愿从军的亡命之徒，十几万头牛马牲畜，由十多万人运送粮食补给，令李广利再次出兵，还派使臣守在玉门关，不获胜不许进关。即使如此，这支大军也未能攻入大宛国都的中城，只剩下万余人获得了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进玉门关。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条性命和无数牲畜、粮食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但历史却对正义和道德做了最大的嘲弄，正是这两场不光彩的战争导致了以后的西域都护府和西南数郡的设置，西域和西南同中原地区属于同一个政权就是这样开始的。要是武帝只满足于抵抗异族入侵，只满足于打击入侵者的有生力量而不乘机扩张，要是武帝真正崇尚正义，爱好和平，尊重其他民族，特别是落后民族的自决权的话，就不会有周边地区的归属，更不会有大汉帝国的极盛疆域。不过，历史也告诉我们另

一种结果，要是中国没有汉武帝那样的皇帝的话，当汉武帝式的君主在境外出现时，中国就免不了当年西南夷诸族或大宛国的命运。

显然，我们只能把历史事件置于当时的条件下来认识，而不能用今天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和民族关系原则来评判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既然这是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普遍承认的法律和原则的时代，我们就只能根据哪一种制度、哪一种生产方式、哪一个政权、哪一个民族的胜利对当时和长远的发展更有利来作出评判了。所谓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征服具有进步意义，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而言的。汉武帝和其他君主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行动促成了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逐步形成，使包括华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在总体上都得到了进步，而不是他们的个人品质或道德观念。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尽管汉朝的大军不止一次越过大漠，登燕然山，封狼居胥，深人中亚，但汉朝从来没有打算在蒙古高原设立政区，就是对西域都护府也只停留在军事监护，而不是设置郡县。对东瓯和闽越还采取了移民弃地的做法，将今浙江南部和整个福建的人口迁走，土地放弃。但另一方面，同样是新获得的土地，河西走廊先后设置了郡县，并且从此再也没有与汉朝分离；而西域却只能建都护府，并且“三通三绝”，这中间汉朝的大臣曾多次提出应该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统治完全建立在异族或其他政权的基础之上。在占据了其他民族或政权的地域以后，如果不能够派驻军事和行政人员，不能够实施最低限度的移民，就不可能达到长期占领并进而变为自己领土的目的。但军事和行政人员都需要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如果不能就地生产，运输又非常困难，这样的地点至多只能临时占据，或者只能限于很少的军事据点。否则，政府会不堪负担，官员百姓都会反对。

垂钓《盐铁论》记录了西汉昭帝时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德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的批评就很说明问题：

边疆的郡县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得土地都会冻裂，大风刮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民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服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异族那里去了。道路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夷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疲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一带要承担对秽、貉的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别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他们的话自然不无夸大之处，但基本还是事实，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决定一块地方是否适宜作为自己领土的基本条件，就看是否适合农业生产。在菊花完全依靠人力耕种的条件下，一定数量的人口只能耕种一定数量的耕地，在内地或近地还存在宜农荒地时，当然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舍易就难。正因为如此，汉朝正式设置郡县并能稳定维持的疆域，大致就是当时适宜农业生产的范围。在这范围之外的疆域，如西域，更多的是考虑战略的需要。由于路途遥远，交通困难，本地又不能生产大量粮食，所以难以经常保持大批行政和军事人员，只能采用军事监护的特殊形式。一旦遇到外来的侵略和当地民族的反抗，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可以支援，就只能放弃。

西汉后期设置郡县的范围约有四百余万平方公里，西域都护府的辖

境约二百余万平方公里，奠定了历代中原王朝的基础。统一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增强了抵御外敌和维持社会安定的能力，也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决定性因素。走向世界的汉帝国当汉高祖刘邦的军队进入咸阳时，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进行。公元192年，罗马皇帝康茂德被杀，前期帝国告终。这一年是东汉初平三年，献帝被劫持，国内陷于分裂战乱，东汉帝国实际已经崩溃。

东西两大帝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如果出现某种同步，只能是历史的巧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找到的两大帝国交往的证据非常之少。

第三章

在西汉以前，秦国故地与西方的联系可能已经存在，但没有形成稳定的交通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夏诸族与外界隔着众多非华夏族，从中原通向西方必须经过戎人、羌人、匈奴、西域诸族的地区，向西南则要经过西南夷诸族的地区，在各民族间还处于隔绝或仇杀的状态下，利用和穿越对方地区自然是非常困难的。直到汉武帝初，这样的条件还没有改变。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大月氏原来生活在敦煌和祁连山间，后在匈奴的攻击下被迫西迁，匈奴将大月氏王的头割下，制成盛酒的容器。在乌孙的驱逐下，大月氏又迁至妫水（今阿姆河）。大月氏恨透了匈奴，但因无人援助，无法报仇。汉武帝得知后，就产生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想法，下令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率领甘父等一百多随行人员出使，从陇西郡出境。在经过匈奴地区时，张骞一行就被扣留了，送往单于驻地。单于说："月氏在我们北面，汉朝怎么可以派使者去呢?要是我派使者到南越去，汉朝能让我过吗?"风景画鉴赏他将张骞留下，还给他娶妻，以便他不再离开。张骞虽然有了妻儿，但始终保持着朝廷颁发给他的使节，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甘父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堂邑侯的一名家奴，他善于骑射，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十多年后，匈奴人已放松了监视，张骞和甘父等人终于得到了逃脱的机会，继续西行，经过几十天的艰难跋涉，终于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十分富强，却一直无法交往，对张骞的到来很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宛王将他们送往月氏，答应回汉朝后将给予厚礼报答。大宛王派向导和翻译，将他们送至康居，又由康居送至月氏（今阿富汗北部）。这时月氏人已打败了大夏，在此安居乐业，对向匈奴复仇毫无兴趣，张骞逗留一年多仍不得要领，只好返国。他们经河西走廊，想通过羌人地区回国，但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单于死，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匈奴妻子和甘父逃回汉朝，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

尽管张骞没有能完成联络大月氏的使命，但他为汉朝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闻的信息，也在西域传播了汉朝的情况。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就是根据张骞的见闻编写的。

张骞直接向武帝报告了他在西域的见闻，介绍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的情况，使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闻所未闻，大开眼界：

大宛产蒲陶（葡萄）酒，多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

于阗以西的河流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于阗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流，向南流出地面后就成为黄河源。这一带盛产玉石，黄河流入中国。

乌孙与匈奴风俗相同，能弯弓射箭的有几万人，勇敢善战。以前服从匈奴，现在强大了，对匈奴不即不离，不肯再去参加朝会。

安息在大月氏西数千里，百姓定居，从事农业，种稻麦，产蒲陶酒。像大宛一样有城市，大小有数百个，疆域有数千里，是那一带最大的国家。在妫水（阿姆河）流域，有市场，百姓用车、船做买卖，贸易的国家远达数千里。用银币，上面铸着国王的像，国王死了银币也要更换。文字写在皮革上，都用横写。安息西面是条枝，北面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面临西海（地中海），气候湿热，百姓种稻。有一种大鸟，产的蛋像瓮那么大。国人善于变幻术。安息的长老传说条枝有弱水和西王母，但没有见过。

但由于匈奴还挡在汉朝与西域之间，武帝一时难以有所作为。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向武帝提出招引乌孙人回河西故地的建议，他说：“现在匈奴刚被我们击败，河西的昆邪王旧地空着，‘蛮夷’都贪图汉朝的财物，如果此时能够花大钱笼络乌孙，招引它东归故地，与汉朝结为兄弟，它肯定乐意听从，这样就断了匈奴的右臂。一旦与乌孙结盟，它西面的大夏等国就都可以招来当属国。”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派他再

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人，每人备马两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织品，还有多名副使随行，准备在交通方便的情况下，分别派往周围各国。张骞到达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正值该国内乱，乌孙人也不愿与匈奴为敌，但愿意与汉朝联系，派使者随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回长安。张骞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今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新疆西部），一年多后也陆续带各国的使者返回。此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

张骞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但建立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他“凿空”（开通）西域的功绩受到朝野的高度赞扬，张骞在西域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各国都知道“博望侯”（张骞的封爵）的大名。“丝绸之路”从此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

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是指两汉时期与中亚河中地区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以后的研究成果又将这条道路的西部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

中国的特产丝绸传入中亚和印度，远在秦汉之前，但直接的贸易道路却开始于张骞第二次从西域返回以后，不过直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才保持畅通。

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西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达今罗布泊西北的楼兰。至此分南北二道：北道向西沿今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经乌垒、轮台、龟兹（今库车县）、姑墨（今阿克苏市）至疏勒（今喀什市）；南道经鄯善扜泥城（今若羌县），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和田市）、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莎车（今莎车县）至疏勒。东汉迫使北匈奴西迁后，开辟了“北新道”，即由敦煌北至伊吾，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龟兹，再循北道至疏勒。自疏勒西行越葱岭，经今费尔干纳盆地，渡阿姆河，直到地中海滨。由此沿地中海西南行，可达犁轩（黎轩，今埃及亚历山大）。自疏勒直接西穿阿莱高原，经今阿富汗，也可与上述一路会合。另一条沿南

道从皮山西南，经悬度（今达丽尔）、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至乌弋山离国（今锡斯坦），东汉时称为“罽宾乌弋山离道”。以下或沿陆路西行至波斯湾，或南下至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出海。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丝绸之路不仅用于丝绸贸易，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香料、珠玑、皮毛、良马、橐驼等源源东来，中原的工艺品、金属制品、铁器、纸由此西运；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佛教和佛教艺术以及中原的打井、铸铁、农技都由此而传播交流。

但汉朝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联系却失之交臂。东汉永元九年（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他的下属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从西域都护府驻地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条支国的海滨（今波斯湾）。就在他准备渡海时，安息国（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船员对他说：“海面非常辽阔，遇到顺风也要三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如果遇到逆风就得两年，所以入海的人都要备足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航行很容易患思乡病，经常有人死在海上。”听了这话，甘英不敢渡海，只得返回。就这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失之交臂，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交往至少推迟了70年。要是甘英能有张骞那样的冒险精神的话，中国的官方使者到达欧洲、非洲的历史就应该开始于公元1世纪末，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

安息人阻止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来往的目的，是为了垄断丝绸转口贸易的利益。但当时汉朝击败了北匈奴，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慑于汉朝的威力，安息人不敢直接阻拦，偏偏甘英被这一番话吓住了。

张骞在大夏时，曾见到过产于今四川盆地的邛杖和蜀布，并得知这些物品是通过身毒（印度）运到大夏的。这说明这一交通路线至迟在公元前126年就已存在了。汉武帝曾派使者从蜀地分四路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由于当地民族不合作，只到达了滇（今云南滇池一带）。以后，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开通后，汉武帝对西南的道路不再发生兴趣。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派頞整治了由四川盆地通往

今云南的道路——“五尺道”。“五尺道”所经是崎岖险峻的山区，能在短期间开通只能是利用原已存在的便道、小道，这说明这条交通线的存在已有很多年代。由“五尺道”而下，就可以连接“身毒道”，即民间一直在使用的由云南经今缅甸通向印度的交通线。邛杖和蜀布并不是十分贵重的物资，如果运输成本过高，商人就会无利可图，所以这条交通线应该是比较畅通和便利的。

东汉永元九年（97年），掸国国王雍由调与汉朝联系；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将海西（大秦，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献至洛阳。罗马人经今缅甸入境，证明的确存在着一条由今四川、云南经缅甸、印度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这条交通线也向西方输出丝绸等物资，尤其是在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和逐渐衰落的情况下，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有的学者称它为西南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由中国大陆通往朝鲜半岛的航路早已存在，战国后期至秦朝已成为相当便捷的交通线，所以在半岛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大批在当时迁入的移民。尽管徐福定居于日本的传说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早在秦朝以前，从中国大陆通往日本列岛就已存在多条航路，汉朝时从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福建都可驶往日本。东汉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的使者到达洛阳，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这枚金质的“汉委（倭）奴国王印”在日本福冈县出土，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汉书·地理志》还记载了西汉与南方海外的航路：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南）、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东北部）相类。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境）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山水画鉴赏对这些地名的今地有不同的理解，文中的一些内容也还

难以正确解释，但大致可以肯定，当时从今越南中南部、广西沿海、雷州半岛出海，可以通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地。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玳）瑁”。虽然这完全可能是罗马商人使用了使者的名义，但毕竟是罗马帝国与汉朝的首次正式交往。“使者”显然是从海路经日南进入汉朝的。

汉代与境外的交流，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物质产品，又引入了外来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比较可信的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的一种，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博士弟子也愿意接受异国使者传经，可见这种信仰在当时已引起社会中层以上人士的注意，可以看成佛教已经传入的证据。

东汉初年，来自天竺国（印度）的僧人已经到达洛阳传播佛教。据说，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梦见金人飞空而来，召群臣占梦。傅毅说：“臣听说西域有神，称为‘佛’，陛下所梦，想必就是佛。”明帝派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去天竺寻访佛法，在那里遇见摄摩腾、竺法兰，邀他们来汉朝。摄摩腾与蔡情等来到洛阳，明帝亲自接见，并在城西门外建造寺院，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马寺。竺法兰不久也到达洛阳，他很快就学会了汉语。他们都死于洛阳。当时，上层人士已有人信奉佛教，如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就奉佛。但当时还将佛教视为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

1世纪中叶，大月氏（贵霜王国）战乱不绝，大批难民东迁西域诸国，一部分迁至敦煌一带定居，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迁，如高僧支谦的祖父支法度在汉灵帝时率数百人到洛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所以以后支谦被称为“河南支恭明（字）”，支氏家属在东汉末战乱中迁至江南。

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间的粟特人（或称为康居、康国）善于经商，游踪甚广，一些粟特人在天竺成为高僧，又随经商的粟特人（当时称为商胡）来到汉地，传播佛法。如灵帝、献帝时有康巨、康孟祥来洛阳，从事佛经汉译。来自康国的释昙谛在灵帝时来中原，献帝时南迁吴

兴（今浙江湖州市一带）。这样，大乘佛教般若学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翻译为汉文。

初平四年（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粮，利用公款大起浮屠寺，造铜浮屠像，用减免徭役的手段招致信徒。这是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最早记载。

佛教传入和佛教徒来中国的主要路线是西北经河西走廊的陆路，但南方海路也是一个重要来源。如康居人康僧会，世代住在天竺，父亲因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康僧会十余岁就出家，成为高僧后，于吴赤乌十年（247年）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康僧会显然是从海路到达交趾后再北上的。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证实，佛教由南路传入中国的时间还应大大提前。

经过汉代二百多年的传播，佛教在中原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基础，终于在南北朝时成为最主要的宗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展，周边不少少数民族人口迁入内地，境外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地区的移民也迁入内地。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他们被称为“商胡”。由商胡输入的珍奇货物已成为达官贵人的爱好和收藏品。东汉后期，洛阳等大城市的商胡数量已相当可观。执政的外戚梁冀为了收集兔毛，曾规定百姓不许杀兔，违者处死。一位西域商胡不了解，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在追查时牵连被杀的有十多人。可见商胡在洛阳人数不少，已经与一般居民无异。东汉辛延年所作乐府词《羽林郎》中描述了一位15岁的“酒家胡”（卖酒的胡人女子）受贵戚家奴调笑的事，说明胡人已在洛阳开酒店，“胡姬”已开始受人青睐。

东汉末的灵帝对“胡”有特殊的爱好，凡是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无不喜欢。在他的影响下，京城的贵族竞相仿效，成为一时风尚。这些来自境外的服饰、家具、饮食、乐器、音乐、舞蹈要引起皇帝和贵族如此嗜好，如果没有大量的传播载体——移民和流动人口，是不可能形成的。但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巨大的冲击，所以《后汉书》等正史的作者称之为“服妖”，认为是导

致动乱和亡国的“不祥之兆”。

和唐朝一样，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吸引外来文化较多的时代。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开放还是相当有限的，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开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这种开放给汉朝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

梅花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对付匈奴；用兵西南夷是为了获得境外的“奇货”，在军事上牵制匈奴和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而发动对大宛的战争，除了要掠夺当地的宝马之外，还想给李广利提供封侯的机会。这些举措尽管在客观上起了开疆拓土的作用，打通了与西域、西南的交通，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但丝毫没有改变汉武帝和汉朝人的观念。更没有使汉朝得到经济上的利益，相反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百余人至数百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瑞来引起武帝新的兴趣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将大把大把的钱花掉，或者假公济私，自己捞好处。由他们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特别优待，为了显示汉朝的“富厚”，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给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甚至办起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让他们爱什么就拿什么，也好使这些外国人在汉朝庞大的物质财富面前吓得发抖。武帝后期人口下降、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与这种挥霍性的开放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武帝“外事四夷”、包括派张骞通西域在内，在当时都会受到臣民的批评和反对；为什么东汉初光武帝坚决不愿恢复西域都护府，以后的君臣经常要考虑放弃西域。

山水风景图在西域商胡大批来汉朝经商牟利的同时，却没有汉朝的商人外出经商或推销商品，靠丝绸之路赚钱的是西域人和其他外国人，而不是汉朝人。除了官方的使者外，汉朝人被严格禁止出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汉朝为了政治、军事以外目的而派人出国的记录，也没有发现汉朝人认为需要向外国学习的言论，佛教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甘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看似出于偶然，其实却是必然的。即使甘英真的到了大秦，历史就会重写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因为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还没有产生与境外的文明中心沟通的要求。何况甘英只是一位地方官派出的代表，并不负有正式使命，所以他半途而归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追究或舆论的不满。要是他真的到了罗马帝国，大概也不会比张骞有更大的作为。

我们不应该苛求汉武帝或其他汉朝人，因为在当时的东方，汉朝的确是国力最强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汉朝的资源足以供养全部人口，满足农业文明发展的全部需求，不必向外界寻求资源和市场。在张骞和其他使者行踪所及的范围内，事实上也不存在总体上比汉朝更优越、更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他们的报告使汉武帝和汉朝人更相信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是人世间最富裕、最文明、最先进的地方，也是完全正常的。

但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必须看到这些局限。如果以为汉朝的“开放，，值得我们继承，抱着汉武帝的心态看待今天的开放，那就适得其反了。汉武帝的晚年在清朝康熙皇帝之前，活到70虚岁的皇帝屈指可数，其中一位就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也数汉武帝最长——整整54年。与秦始皇、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相比，只有明太祖比他多活了一岁，但当皇帝的时间比他短得多。不过，这位皇帝的晚年并不如意。

在武帝时期，汉朝先后灭东瓯、南越、闽越、朝鲜，平西南夷，击败匈奴，设河西四郡，通西域，奠定了汉朝极盛疆域的基础。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完全消除了割据的威胁，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亲自指挥堵塞了长期泛滥的黄河决口，使黄河恢复故道；兴修水利，扩大农田；修建了通向西南、西北边疆的道路。汉朝出现了开国以来最强盛繁荣的局面，武帝的功业也达到了巅峰。但在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延续数十年的帝位使武帝本来就存在的好大喜功、挥霍浪费、迷信鬼神、刑法严酷等缺点在他晚年恶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国库中的钱财曾经非常充足。陈粮还未用完，

新粮又入库了，结果陈陈相因，粮食腐烂而不能食用。大量的铜钱放在仓库中长久不用，串钱的绳子烂了，铜钱散落无法统计。但这些由上千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一年年聚集起来的物资很快就被武帝消耗完了，因为无论是战争、筑路、建城、移民、治河，都需要大笔开支和大量人力，而且由于原来的粮食生产者成为消费者，新产的粮食必然会减少。随着战线的延长和疆域的扩展，粮食输送的距离越来越远，成本高得惊人。因为从东部产粮区至北方和西北边疆只能依靠人力或畜力在陆路运输，在遥远的路途中人和牲口本身就要吃掉大量粮食和饲料，能运到的是极少数。据主父偃统计，秦始皇时从今山东半岛渤海沿岸将粮食运往河套，结果是“三十锺而致一石”，到达目的地的粮食是输出量的1／192。汉朝的水平大致相同，而目的地更远达云货币贵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甚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武帝曾调集10万人到朔方筑城据守，将关东72万贫民迁至西北，征60万士兵去边郡屯田，数万人向西南夷筑路，安置数万匈奴降人，这些人员至少在最初阶段必须完全由政府供应粮食和必需的生活、生产物资。当时每人每年大约需要18斛食粮，72万人就要1296万斛，而从关东输入关中的粮食最多的一年也只有600万斛。这样大的消耗，国库如何能不空？

郑当时任大司农（农业主管官员）时，建议从渭河引水开一条漕渠，穿过长安城，沿秦岭入黄河，既可方便漕运，又能使上万顷农田得到灌溉。数万人干了三年，漕渠开通，效益不错。这引发了武帝和群臣大办水利的积极性，大项目纷纷上马。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太守的计划是引汾水连接黄河，既可取代底柱（原三门峡中险石）以东的漕运，又可增加5000顷田、每年增产200万石谷。武帝投入数万士兵开垦这些“渠田”，由于这一带的黄河经常改道，渠道根本不能使用，渠田连种子都收不回，只能任其荒废。又有人建议，从褒斜道运漕粮，御史大夫张汤认为可以斜水通渭水，褒水通汉水，都可以运粮，而两水间相隔的百余里可以用车转送，这样一来，汉中的谷能运到关中，关东的粮食可以从汉水运来，不必再通过黄河底柱天险。武帝很听得进去，就封张汤的儿子为汉中太守，负责开褒斜道。几万人筑成了五百余里道路，固然距离较近，交通方便，但褒水、斜水都十分湍急，水浅多石，从褒水向关中又是溯流而上，根本没有办法行船。关中花了十几年才开成的龙首渠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益，“未得其饶”。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亲

自主持堵塞了泛滥23年的黄河决口，取得了一项空前的成就。这再次引发了大办水利的高潮，一时间“用事者争言水利”，西北边疆的朔方、西河、酒泉都引黄河及川谷水灌田，关中上马的工程有灵轵、成国、伟渠，汝南、九江（今淮河南北）引淮水，东海郡（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引钜定泽，泰山下引汶水，规模都有万余顷，其他小规模的工程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工程中，像成国渠和以后建成的白渠是成功的。发挥了长期效益，但多数只是应付政治任务，劳民伤财。如在朔方开渠，花费上亿，却毫无成效。在这种气候下，齐人延年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将黄河引入匈奴地区，关东再也不会有水灾，匈奴不战自灭。总算武帝的头脑还清醒，虽然对延年的气魄颇为赞许，表扬他“计议甚深”，却没有采纳。

如果说水利工程多少还有为百姓着想的成分，那么另一些花费就纯粹出于武帝的个人需要了。如武帝给功臣、将士、宠幸的赏赐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卫青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赐卫青、霍去病黄金50万斤，骗子栾大一次就获赏黄金10万斤。当然这些“黄金”并不真是金子，可能只是纯度高的铜，但即使如此，价值也是巨大的。至于对“外国客”和“使者”的接待和赏赐，是作为意义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的，自然更是不算经济账了。武帝在关中大建宫殿楼台，在各地到处建离宫别馆。他先后建了甘泉宫、柏梁台、承露仙人掌等，所谓仙人掌是用铜制的巨盘，高20丈，大7围，耗费可想而知。以后又在长安建飞廉、桂馆，在甘泉宫建益寿、延寿馆，通天台，扩建甘泉宫。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为了在甘泉宫接受诸侯和各地的“上计”（报告当地户口、赋税、粮食产量等基本情况），专门建造接待诸侯的宾馆。又下令造建章宫，规模宏大，千门万户，前殿比未央殿还高，东面的凤阙高20余丈，西面有一个方圆数十里的虎圈。北面开一个大水池，称为太液池，中间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等岛，还有一个高20余丈的渐台。南面有玉堂、壁门，雕塑的大鸟等，还有高50丈的神明台和井干楼，用走廊互相连接。

有的浪费是制度造成的，但数额巨大。根据汉朝的惯例，皇帝登位后就开始卜地修陵，所以属皇帝私产的“少府”，以年收入的1／3修陵。由于陵墓工程浩大，在位时间短的皇帝往往等不到完全修好就死了。武帝在位时间长达54年，到后来陪葬品已塞满陵中，无法再容纳每年新增

加的部分，但这种制度又有谁敢改变呢？

武帝的挥霍浪费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迷信和虚荣有关。如元封元年（前110年）去泰山举行春游封禅大典，就被认为是“存亡继绝”的大事，是“受命于天”的象征。主管天文观测、国家历史和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没有能躬逢其盛，竟一病不起。但武帝更多进行的是求仙、求长生不老药、炼黄金术和满足个人的欲望。武帝即位之初就特别敬重鬼神，于是一伙骗子也应运而生。

首先出笼的是深泽（今河北深泽县）人李少君。他本是深泽侯家的医生，一直自称70岁，能以意志使物体改变和长生不老，并经常留下一些金钱和衣食。大家见他从来不治产业却如此富裕，又不知道他的来历，更相信他是异人，争着侍奉他。有一次在武安侯的宴会上遇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说曾经与老人的祖父在某处游玩，老人小时候的确随祖父到那里去过，还记得，在座的人大吃一惊。他见武帝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件旧铜器，就说：“这是齐桓公十年放在柏寝的。”武帝一看上面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的器皿，宫里人都以为他是几百岁的神仙。他向武帝建议“祀灶”（祭灶神），说这样就能“致物”（按意志使物体改变），丹砂就能变成黄金，使用黄金制成饮食器皿就能益寿，这样就能见到海上的神仙，再封禅就能不死，像黄帝一样。他说：“我曾在海上遇见安期生，他给我吃的枣子大如瓜。安期生是仙人，住在蓬莱，但高兴时就见人，不高兴时就隐而不见。”武帝对他十分尊敬，亲自按他的办法祀灶，派人入海见安期生，用丹砂炼黄金。后来这位仙人病死了，武帝以为他不会死，只是化去了。于是齐、燕一带的方士更加活跃了。

宠妃李夫人死后，武帝日夜思念，齐人少翁说有办法让武帝再见到李夫人。到了夜间，他让武帝躲在帐帷中，在远处也放了一顶帐子，果然在幽暗的灯光中，帐子中出现了一个很像李夫人的美女，少翁说这是他召来的李夫人的神灵。武帝封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予大量赏赐，以客礼相待。少翁说：“皇上真想与神仙来往，除非宫室和用具都像神仙一样，否则他们是不会来的。”武帝立即下令对所住的甘泉宫重新布置装修，画上各路神仙。连平时坐的车上也画上云气。少翁这样混了一年多，再也没有什么新招，神仙却一直没有来。他灵机一动，在一块帛上写上一些字，与饲料一起喂入牛肚子，然后假装不知，说这头牛肚子里

有奇物。武帝让人杀了牛，果然见有一块帛，上面写着一些看不懂的话。武帝一看，认出是少翁的笔迹，经审讯，少翁只得交代。武帝将他杀了，但没有公开。

第二年，武帝在鼎湖宫病得很厉害，医生、巫师都没有办法治。有人推荐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有位巫师能召神君驱鬼治病，就想让他将神君请到甘泉宫，问有什么办法。巫师传达神君的话说："天子不必为病担忧，稍好一些就到甘泉宫来与我相见。"武帝去甘泉宫后，病果然好了。以后就在甘泉宫专门建立了神君寿宫，据说神君（太一）来时有太禁、司命等随从，但都住在帷中，见不到相貌，只听见声音，与人差不多，具体都通过巫师联络。武帝要见神君时，先得沐浴斋戒，然后才能进去。武帝将神君说的话记下来，与一般人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武帝却深信不疑。

元鼎四年（前113年），胶东康王的内弟乐成侯向武帝推荐栾大。栾大与少翁同出一门，武帝杀了少翁后，一直后悔没有能将他的方术都弄到手，见了栾大，龙颜大悦。栾大长得高大俊俏，会说话，敢吹牛，说得武帝神魂颠倒。他说："我常往来海上，见安期生、羡门等，但因为我身份低贱，他们不相信我；又认为胶东康王只是诸侯，不值得将方子交给他，再说康王也不重视我。我老师说'黄金可炼成，黄河决口可堵塞，不死药可以得到，仙人可以请来'，但我恐怕像文成将军一样下场，现在方士都掩口不言，怎么还敢说方术呢!"武帝忙说："文成是吃了马肝死的。先生要是能修成方术，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给你!"栾大说："我老师不是要求人，是人家求他。陛下一定要请他来，就得提高使者的规格，让他当你亲属，以宾客的礼节对待，让他们佩带印信，才能使他们向神人传话。还不知神人肯不肯来，但尊重使者后才能请来。"武帝让栾大试试小方术，他将一副棋子放着，棋子居然互相斗起来了。武帝正担心黄河决口堵不了，黄金炼不成，就拜栾大为五利将军，给了他四颗印，封为乐通侯，为他备了一所豪华住宅，1000名仆人，一切用品都由公费置办，将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他，赐黄金10万斤，武帝亲自上门，自武帝姑母以下皇族、文武百官全部登门赴宴送礼。武帝又授予他"天道将军"的玉印，让使者和他都在夜里站在白茅草上交接，表示不将他当臣子。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栾大就在家中举行仪式，但神仙一直没有光临。他就准备行装，说要入海见老师了。

当年六月，汾阴的一位巫师在魏国留下的后土堆旁发现了一只鼎，比一般鼎大得多，没有文字款识。武帝派人核实无误，就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鼎迎到甘泉宫，又随武帝一起运至长安。过中山时，出现一片黄云，有一只鹿经过，被武帝射死，正好当了祭品。武帝召集公卿大夫，问道："因为黄河决口，连年歉收，所以我巡祭后土，为百姓祈谷。今年并没有丰收，鼎为什么会出现?"有关专家论证为吉兆，应将宝鼎祭告宗庙，然后收藏在皇宫。齐人公孙卿报告称，宝鼎出现的时刻与黄帝时相同，黄帝得鼎后380年就升天成仙了。武帝听到后大悦，立即召见，公孙卿说自己的老师是申公，已死，原与安期生来往，听到黄帝的话，但没有书面记录。安期生说："汉朝的圣人出现在高祖的孙子与曾孙间，宝鼎出现后就能与神来往，封禅。封过禅的有七十二王，但只有黄帝封了泰山。"申公说："汉帝也应该封禅，封了就能成仙升天。黄帝经常游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又借着申公说了一通黄帝升天的过程，武帝听了大为感叹："真能像黄帝那样，我把扔掉老婆孩子当做脱鞋那么方便。"（实际上武帝时后宫已增加到数千人。）他封公孙卿为郎，让他在太室山等候神仙。

五利将军栾大到泰山转了一圈回来，骗武帝说他在海上遇见了老师。不料武帝派人暗中监视，知道他根本没有出海，他的方术也不灵了，就将他杀了。可是到了那年冬天，公孙卿又报告，在缑氏（今河南巩义市西南）城上出现了仙人的足迹，见到像野鸡一样的东西在城上来往。武帝亲自上城察看，还警告他："是不是要学文成、五利将军?"公孙卿答道："仙人无求于皇帝，是皇帝求他，所以没有充分的时间是不会来的。神仙的事看似迂阔荒诞，时间长了，自然会请来。"于是武帝下令全国各地整修道路，修缮名山的神祠，迎接神仙的到来。这位公孙卿一再以神人的踪迹为诱饵，武帝至死不悟。齐地上报的神怪奇方更是数以万计，数千人如醉如痴地求仙。

风景画鉴赏从元狩元年（前122年）开始，武帝外出祀神、求仙、巡游、封禅共29次，行踪北至朔方北河（今内蒙古黄河），南至九嶷山附近（今湖南南部），西至安定、北地（今宁夏、甘肃东北一带），东至辽西（渤海北部沿岸）。元封元年（前110年）至泰山封禅，沿着渤海到达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境），花了四个多月。第二年的巡游长达五个月。可以想象，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千乘万骑"、"舳舻

千里”的长途、长时间巡游，会耗费多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又会给各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武帝实行严刑峻法，任用酷吏，不断增加镇压手段。如张汤、赵禹等秉承武帝的旨意，在原来比较宽松的法律上增加了很多新的罪名，如“见知故纵”（知道情况故意不举报、放纵）、“监临部主”（下属犯罪，负有监察责任的上级连坐），减轻犯“深故”（蓄意使用重刑、故意将无罪判成有罪）官吏的处分，加重对“急纵”（轻率释放）罪的惩办，使一般官员宁滥不漏，谁也不敢冒灭族的风险为“囚犯”伸冤。律令增加到359章，其中“大辟”（斩首或腰斩）有409条、1882项，可以比照死刑处理的事例有13472项。元狩六年（前117年），张汤甚至创造了“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并据此将位居九卿的大农令颜异判处死刑，使之成为案例。另一位酷吏杜周担任廷尉时，“诏狱”（国家监狱）中的在押犯大量增加，其中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经常不下百人，各郡上报廷尉的案子每年有一千多件。大案涉及数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远的数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审讯时，官吏就根据控告的罪名逼供，不服就用鞭打。所以一听说官府抓人，无论是否有罪，都尽量逃避。有的案子十几年后还在追查，罪名大多是“不道”，所以都要上报廷尉或中央机关，诏狱中关押的犯人多达六七万，其他监狱中增加的犯人也有十余万。有人指责杜周不照“三尺法”（写在三尺竹简上的成文法）办事，专门揣摩皇帝的意图定案，杜周直言不讳：“‘三尺法’从哪里来的?前朝皇帝定的就是律，后来的皇帝定的就是令，当时的就对，干吗要照古法办?”杜周曾被罢官，以后又被起用为执金吾，在搜捕桑弘羊、卫皇后兄弟家属时相当坚决彻底，武帝认为他尽力无私，升为御史大夫。义纵出任定襄太守，到任那天就将狱中的重罪犯二百余人与私自去探监的宾客、家属二百余人全部杀光。王温舒出任河内太守时，准备了50匹快马，分段等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至长安途中。他到任后将郡中“豪猾”千余家定为灭族或死罪，立即接力传送，两天内取回批文，把这些人杀得一干二净。十二月过去，按规定春天停刑，王温舒顿足感叹：“要是冬天再增加一个月，我就把事情办完了。”武帝听说后，肯定他有本领，提升为中尉。当然，被这些酷吏杀掉的有一部分是该打击的地方豪强，但一味好杀，并且随意更改法律，无辜遭殃者更多。

本来，在文帝时就取消了肉刑，以笞刑代替劓（割鼻子）和斩左脚

趾。以后因为笞刑还是不断将人打死，几次减少了笞数，景帝中六年（前144年）又做了更具体的规定：笞刑的刑具长五尺，宽一寸，厚半寸，用竹片。中间的节要刨平，只许打在屁股上，最多打200下，打的过程中不许换人，打完一名犯人后才能换。但实际上，酷吏根本不遵守这些制度，“榜掠千数”，法外施刑或采用各种酷刑逼供的比比皆是。

卫青像就是对大臣和亲戚也是如此。元狩二年（前121年）李蔡继公孙弘任丞相，五年有罪自杀；严青翟继任，元鼎二年（前115年）有罪自杀；赵周继任，五年死在狱中；石庆继任，太初元年（前103年）病死；公孙贺继任，征和二年（前91年）死在狱中；刘屈氂继任，一年后就被腰斩。31年间的6位丞相，只有石庆一人善终。石庆是汉初功臣、著名的“万石君”（本人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石奋之子，为人极其小心谨慎。他当太仆时为武帝赶车，武帝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他数了一遍后才报告说是6匹。但石庆在职时也多次受到武帝谴责，差一点自杀。所以，这个大臣中的最高官职被一些人视为畏途。

公孙贺是武帝当太子时的下属，又娶了卫皇后的姐姐，是武帝的连襟。但听说要拜他为相，吓得连连叩头，痛哭流涕，不肯接受相印，说：“臣本是边远鄙人，靠鞍马骑射当了官，不是做丞相的材料。”武帝与左右见他如此伤心，也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忙叫左右将他扶起。公孙贺不肯起来，武帝起身走了，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后来他儿子太仆公孙敬声擅自动用了1900万军费，关在监狱。正好武帝下诏追捕阳陵（今陕西成阳市东北）人“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主动请命，如能捕获，则请求释放儿子，武帝同意了。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抓获，朱安世知道是公孙贺想以他为儿子赎罪，就从狱中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人行使巫术，以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在去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象征武帝的偶人（小木人）。武帝令有关部门审讯，将公孙贺父子在狱中杀死，并灭族，武帝两位女儿阳石、诸邑公主，卫青（武帝的姐夫）的儿子、卫皇后的外甥卫伉等都被杀。公孙氏和卫氏因骄奢犯法完全可能，但要咒武帝早死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当然纯粹是一起冤案。这一点，连武帝心里也不是不明白，所以在诏书中公布他的罪行都是贪污受贿，不顾百姓死活，擅自改变政策，加重百姓负担等方面，而对要害的“巫蛊”罪只含糊不清地提了一句“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

继任的刘屈氂死得更惨。他是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公孙贺死时他还在涿郡（治今河北涿州市）太守任上。从陈平、周勃以后汉朝已不设左右丞相了，此时武帝却任命刘屈氂为左丞相，而将右丞相位置空着，“以待天下远方之选”（等待更合适的人）。这一措施既可以解释为武帝对宗室的谦抑，也可以理解为对刘屈氂的预防，但刘屈氂看来毫无察觉，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被“亲亲任贤”、封侯拜相的他，一年后就步了公孙贺的后尘。当年秋天就发生了太子杀江充后起兵的事件，尽管刘屈氂最终指挥军队镇压了变乱，却已经得罪了武帝。当太子发兵进入丞相府时，刘屈氂“挺身逃”，连印绶也丢了。长史在报告武帝时替他掩盖，说“丞相为了保密，没有敢发兵”，武帝大怒：“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还保什么密?”后来因为覆盎门的值班官员田仁没有截住太子，刘屈氂要杀他，御史大夫暴胜之说田仁是二千石级别，不能擅自处死，应该先请示。武帝又大怒，将暴胜之抓起来责问，他惶恐自杀。刘屈氂虽一时无事，但武帝在表彰“元功”时对他毫无表示。实际上，在武帝对儿子的死悔恨不已时，这位“平乱”的统帅迟早是要成为替罪羊的。

第二年初，李广利出师匈奴，刘屈氂到郊外饯行。李广利建议他应该争取早日立昌邑王为太子，等太子即位后就可高枕无忧了。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外甥，而李、刘二人又是儿女亲家，刘屈氂当然满口答应。但还没有等他有任何行动，内者令郭穰已经揭发丞相夫人让巫师到社祠用恶言咒诅武帝，丞相本人与李广利一起在祠庙祷告，想让昌邑王当皇帝。有关部门要求对刘屈氂夫妇审讯，很快定下了大逆不道罪。武帝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诏令：将刘屈氂装在“厨车”（装食品的小货车）上，押到东市当众腰斩，刘妻在华阳街斩首示众。武帝对这位侄儿和现职丞相如此狠毒，显然并不仅是为了子虚乌有的“巫蛊”。

太史令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获罪，据他给任安的信中所说，在押期间“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手脚被绳索捆绑，身上套着木枷，被剥光衣服，用木棍和竹板打），以后又受“腐刑”（割去生殖器）。这还是从轻处罚，比起那些被腰斩、灭族的人来说已经幸运多了。

武帝后期的社会矛盾已相当严重，各地不断出现暴动，南阳、楚、齐、燕等各地都有发生。大的暴动有数千人参加，首领往往称王称将，

攻城略地，取走仓库中的武器，释放监狱中的罪犯，抓住郡太守、都尉，或将其杀掉，还向周围的县筹集粮食。武帝派出酷吏，调动军队，连续几年加以镇压，但此伏彼起，杀不胜杀。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了而没有全部抓获，二千石以下到最低级的官吏一律处死。这样一来，地方官干脆不上报，上下互相隐瞒，实际上“盗贼”越来越多。武帝初全国已有约3600万人，到末年只剩下3200万，由于流亡严重，在籍户口减少了一半。

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个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第一位皇后陈氏，是汉初功臣陈婴的曾孙女，又是武帝的姑母、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武帝能被立为太子，刘嫖是出过力的，所以等武帝一即位，这位太子妃就被立为皇后。陈皇后仗着长公主的权势擅宠骄贵，自己十多年生不了孩子，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后，几次想陷她于死地。武帝大怒，元光五年（前130年），当有人揭发陈后在背后用巫术咒诅他时，他就下令彻底追查，将替陈后作巫术的妇女楚服等三百多人杀了，陈后被废入长门宫。

农家小院卫子夫本来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武帝在平阳公主家看中带回宫中的，但进宫后就被武帝忘了。一年多后，武帝选一些无用的宫女出宫，卫子夫哭哭啼啼请求放出，武帝见她可怜，就留在身边，结果给他生下了三个女儿。元朔元年又生了太子刘据，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子夫的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以后霍去病立功封侯，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娶了平阳公主，卫氏有五人封侯。

但生了太子几年后，卫皇后色衰失宠，武帝又爱上了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和来自中山的李夫人，可是两位夫人都年轻早卒。李夫人本是舞女，武帝一见情钟，死后怀念不已，让人画了她的像挂在甘泉宫。方士少翁用法术让武帝见到李夫人的形象，却可望不可及。武帝更感悲切，亲自作了一篇悼亡赋。但以后，李夫人的弟弟获罪、哥哥李广利投降匈奴，李氏被灭族。

晚年的武帝在巡游时过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东南），又得到一位“奇女”赵氏，封为婕妤，大受宠幸。武帝62岁时，她怀孕14个月后生

下一子。

对晚年武帝打击最大的，是由江充一手炮制的“巫蛊”冤案。

江充是赵王的上等门客，为了报赵太子丹杀其父兄之仇，到长安告了御状。武帝将赵太子定罪处死，江充得宠，被封为“直接绣衣使者”，负责督察首都特区的治安和查禁贵戚近臣的违法行为及超标准享受。当时权贵不守法纪的现象很严重，江充征得武帝同意，将一批违法的近臣贵戚的车马没收，让他们去北军报到，参加征伐匈奴，又禁止他们进宫求情。他们的子弟十分恐慌，向武帝请求交钱赎罪，一下子收到数千万罚款。武帝认为江充为人忠直，奉法不阿，对他言听计从。江充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中发现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立即查问，公主说是奉了太后的诏书，江充说：“只有公主可以通行，其他车马都不许过。”将其余车马都上报没收。江充随武帝在甘泉宫时，见到太子属员的马车在驰道上行走，扣留后送交主管部门处理。太子闻讯后，派人向江充说情：“不是舍不得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知道，怪我没有管教好下属，请江先生饶了他。”江充不听，照样报告武帝。武帝称赞他：“当人臣的就该如此。”更加信用。

武帝在甘泉宫得病，江充见他已年老，怕他死了后被太子报复，就上奏，称武帝的疾病是有人以巫咒作祟所致，武帝任命他为巫蛊专案负责人。在此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卫皇后的外甥，已因被诬陷以巫蛊咒诅武帝而被杀。江充找来一位有巫术的胡人，让他挖地三尺，寻找用作咒诅目标的偶人，捉拿搞巫蛊的人。抓到嫌疑犯后就用酷刑逼供，使百姓相互诬陷牵连，官府都以大逆不道定罪，先后杀了几万人。武帝年老多疑，怀疑身边的人用巫蛊咒诅他，所以对被牵连的人，没有人敢为他们鸣冤叫屈。江充摸清了武帝的意图，就说宫里有益气。武帝信以为真，特意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当江充的助手。他们先从后宫失宠的妃嫔人手追查，再查到皇后，从武帝的御座下挖起，最后在太子的宫中挖出了用于巫蛊的桐木偶。

当时，武帝因病正在甘泉宫避暑，只有卫皇后和太子在长安。少傅（太子老师）石德劝太子假传武帝命令逮捕江充，彻底查清他的奸诈罪行，否则自己说不清，何况武帝在甘泉宫生死不明。“太子就不想想秦始

皇长子扶苏的事吗?”情急的太子顾不得仔细考虑，与皇后商议后，于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初九派人收捕江充等人，韩说怀疑有诈，拒捕被杀；江充被抓来，太子亲自监斩；但章赣受伤后逃往甘泉宫。

太子杀江充后，宣布武帝在甘泉病危，奸臣企图作乱，下令征调军队，发兵占据各重要机构。太子赦免了在中都官服役的囚徒，将武库的武器发给他们，命石德等人率领。丞相府被占后，丞相刘屈氂逃跑，长史火速赶往甘泉宫报告，武帝下亲笔诏令：“斩捕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用牛车作掩护），毋短兵接（不要用短武器交战），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别让造反的人出去）。”武帝还从甘泉宫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督战，下诏征发三辅近县兵，由刘屈氂指挥镇压。

至此，形势急转直下。太子征调驻在长水和宣曲的胡骑未成，北军也闭门不出，只得从长安四个市上召来了数万人。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部队与刘屈氂的军队在长乐宫西阙下相遇，激战了五天，血流成河。刘屈氂的援军源源而来，太子见大势已去，出覆盎门逃亡。石德等人和太子宾客全部被杀，参与发兵的还被灭族，受牵连的官吏、士卒被流放敦煌郡。武帝派人废卫皇后，逼令自杀，卫氏被灭族。太子夫人史良娣、一子、一女和家属全部被杀，只有一位在襁褓中的孙子被狱官冒死保护下来，18年后即位（宣帝）。

太子不知所终，但武帝震怒，臣下没有人敢进言。壶关县（今山西长治市北）一位“三老”县乡负责教化的官员，一般由有德行的长者担任）毅然上书，指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他揭露江充的奸计，请求武帝宽恕太子，停止追捕，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以期武帝有所感悟。

太子和二位皇孙藏匿在湖县泉鸠里（今河南灵宝市西北）一户穷人家，主人靠卖草鞋得来的钱供养他们。太子想到自己有位朋友在湖县，听说他很有钱，就让人去找他，走漏了消息。地方官带兵围捕，太子自知无法逃脱，堵住房门上了吊。士兵张富昌一脚踢开房门，新安县（今河南渑池县东南）令史李寿奔来解开绳子，将太子抱下，可是早已气绝身亡。主人格斗而死，两位皇孙被杀。武帝闻报无比伤感，封李寿和张

富昌为侯。

日子一长，事实证明，所谓巫蛊纯属冤案，武帝也知道太子实在是因为害怕至极，并无其他意图，但又不便公开认错。正在此时，高寝郎（高祖庙值勤官员）田千秋紧急上书为太子申诉：“儿子玩了父亲的兵，应有的惩罚是打一顿板子；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算得了什么大罪!我梦见一位白头老翁教我说这话。”武帝立即召见田千秋，赞扬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别人是难说话的，你却能讲清楚，这是高祖庙的神灵让你来教我的。”立即封他为大鸿胪鸯胪，几个月后又任命为丞相。武帝将江充家灭族。将参与追查巫蛊的苏文在渭水桥边活活烧死，在泉鸠里对太子动武的军官已升为北地太守，也被灭族。武帝造了一座思子宫，还在湖县筑归来望思台，寄托自己的哀思，为太子招魂。

晚年的武帝极其孤独，毫无天伦之乐，所以对身边出现的孩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爱。侍中金日磾有两个小儿子。常常在武帝身边玩耍，成为武帝的“弄儿”，深得他欢心。有次孩子在背后搂着武帝的脖子玩，被金日磾看见，狠狠瞪了一眼，小孩吓得赶快放手，边走边哭说：“爸爸发脾气了。”武帝立即指责金日磾：“干吗对我的孩子发脾气?”后来大儿子长大了，不守规矩，有一次与宫女在殿下开玩笑，被金日磾见到，他怕以后闹出事来，把儿子杀了。武帝得知后大发雷霆，金日磾叩头谢罪，说明了杀儿子的本意。武帝非常伤心，流下了眼泪。他也是一位老人，像普通老人一样爱孩子；但他是一位皇帝，他不得不用沉重的代价来维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以致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孙，并且不能像普通老人那样喜欢身边的孩子。

除了太子外，王夫人为武帝生过刘闳，被封为齐王，但8年后就夭折了。李姬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分别被封为燕王和广陵王。燕王有野心，在太子死后，认为该轮到自己了，上书要求从封地回长安，以后又隐匿逃亡者，引起武帝的厌恶。广陵王力大无穷，却喜欢吃喝玩乐，很不成器。李夫人为他生一子，被封为昌邑王，但只比武帝晚一年去世。从他的儿子刘贺即位37天就被废掉看，这位昌邑王大概不会好到哪里去。武帝不得不考虑立最小的儿子为继承人。但想到吕后的教训，担心出现年轻的太后专政的局面，犹豫再三，终于在孩子五六岁时找个借口将赵婕妤杀了。这位无辜的妇女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从西汉末

年和东汉的外戚之祸看，武帝此举不能不说是一片苦心，是不得不采取的防范措施，尽管当时看不出任何迹象。从个人情感说，武帝是残酷的；从汉朝的千秋大业着眼，他是英明的。不知是汲取了汉族统治集团外戚介入权力斗争的教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以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甚至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一条更残酷的规定：凡儿子被立为太子，其母一律赐死。

太子之死终于使武帝的头脑变得清醒了些，在他的最后三年内采取了一些弥补的措施。

征和四年（前89年），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进攻匈奴，开陵侯率西域楼兰等六国攻打依附于匈奴的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车师王投降。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请增派军队去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并招募百姓去耕种，在沿途建造亭障。此前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使汉军损失很大。于是汉武帝下诏：

先前有关部门上奏，要将百姓的口赋钱每人增加三十，以筹集边防费用，这会使老弱孤独更加困苦。现在又要求派士兵去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西面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击车师时，先派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在首都的子弟回国，让他们征集牲口和粮食迎接汉军，又由各国国王亲自率领军队共数万人配合，一起包围车师，使它的国王投降。各国的军队已很疲劳，没有能力在沿途供应汉军的粮食。汉军攻破车师城后，缴获的粮食很多，但士兵自己负载不了足够路上吃的粮食，身体强壮的吃牲畜的肉，体弱的在路上死了几千。朕征发酒泉郡的驴子、骆驼背了粮食出玉门关去迎接。官兵是从张掖郡出发的，路不是很远，但还是有很多人掉了队。

以前朕不了解情况，因为一位叫弘的军侯上书，说什么“匈奴人将马的前后脚缚住，扔在长城下，骑着马高叫：‘秦人（匈奴对汉人的称呼）!这马就赏给你们了。’”又因为汉朝的使者被扣留在匈奴，很久没有能返回，所以就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想作为使者的后盾，加强他们的地位。

古时候的卿大夫参与策划，都根据龟版占卜，不吉利就不行动。那

次将匈奴人缚马脚的报告给丞相、御史、二千石级别的各位大夫、饱学的郎官，以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都传阅了，他们都认为“敌人自己缚住马脚，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也有人认为“这是故意要显示他们的强大，表示对付我们足足有余，将马脚缚住也比我们强”。根据《易经》占卜，得到的是《大过》中的卦，九五的爻，表明匈奴必败。民间征召来的方士、太史（国家天文台专职官员）观星望气，太卜（皇家占卜师）根据龟版占卜，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卜辞上又说“北伐行军，到釜山必胜”。让他们为诸将打卦，贰师将军最吉利。所以朕亲自命令贰师将军向釜山进军，还特意下诏，要他一定不要深入敌境。现在证明这些意见和卜卦都是错误的、相反的，重合侯抓回来的匈奴侦察兵说：“听说汉军将要进攻，匈奴派巫师在必经之路和水源埋下牛羊，咒诅汉军。单于送给天子的马匹和裘皮，也总是让巫师先咒诅一番。缚住马脚，也是咒诅汉军。”又让人占卜，结果说“汉军有一位将军不吉利”。匈奴人常说：“汉朝极大，但汉人耐不得饥渴。缺了一条狼，就会跑走一千只羊。”（丧失一名将军，就会损失一千名士兵。）

那次贰师将军战败，士兵或战死，或被俘，或流失，朕心中一直深感悲痛。现在又要求在遥远的轮台屯田，沿途还要建兵站和供应点，这是使全国百姓背上包袱，受到骚扰，不是爱民的措施，朕不忍心听到这样的建议。大鸿胪等又提议，想募集囚徒送匈奴使者回去，给他们定下封侯的赏格，让他们到匈奴后为汉朝出气。这是连春秋五霸都不会采用的卑鄙手段，堂堂大汉怎么可以干?何况匈奴获得汉朝的降人后，总要仔细搜查，反复盘问，了解情况。

现在边塞管理松弛，出入没有严格禁止，边防哨所的长官为了得到皮毛兽肉，让士兵外出捕猎，士兵非常辛苦，但烽火传送却经常缺少。下面报上来的文书中从来看不到这些现象，以后有匈奴降人来了，或者俘虏了敌方人员后，才知道存在这些弊病。

当今最重要的是禁止对百姓苛刻残暴，制止擅自增加赋税，努力开展农业生产，切实执行养马可以减免赋税的政策，以弥补军马的缺口，使国防力量不至于削弱。各郡、国的长官都应提出增加马匹和巩固边防的具体措施，由上计吏带到朝廷来。

尽管武帝将主要责任都推给了臣下，但作为一位长期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君主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规定了切实的纠正措施，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作为“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象征。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以提高粮食产量。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虽不大，但标志着国家政策的重要转折，至少是将“苛暴”、“擅增赋”的势头制止住了。

司马光武帝自知不久于人世，想到了已在身边二十多年的大臣霍光，让人绘了一幅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赐给他。后元二年（前87年）春，武帝在五柞宫病危。霍光哭着请示：“陛下如不幸，谁应该为继承人?”武帝说：“你没有懂我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小儿子，你像周公一样行事。”霍光叩头推让：“我不如金日磾。”金日磾说：“我是外国（匈奴）人，不如霍光，再说别让匈奴人看不起汉朝。”于是，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接受遗诏辅佐少主。第二天，武帝死，八岁的太子即位，就是昭帝。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的评论所指出的，汉武帝的晚年与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汉朝没有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时能够中兴，原因在于武帝“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前面这些优点其实并不明显，而且武帝的改过不过三年，国内的严重危机并没有消除。关键的一点还是他“顾托得人”，对身后事做了正确的安排。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秦始皇在将长子扶苏赶到边疆去后，对继承人没有作出明确安排，却让少子胡亥随自己巡游。由于他“恶言死”（忌讳别人说到他的死），连丞相李斯等大臣都不敢问他后事。当他病重时，只是下诏令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让他到咸阳参加葬礼，却没有明确让他即位。这份诏书固然被赵高串通李斯篡改了。但即使照样发到扶苏那里，扶苏遵诏到了咸阳，继承问题也没有最终解决。而他信用赵高，对李斯又诸多限制，更为胡亥的篡位和赵高的专权准备了条件。

而武帝从杀赵婕妤，选定霍光为首席顾命大臣。赐画，立太子，确定辅佐大臣，一步步都有计划。霍光敢请示他死后怎么办，说明他在霍光等的心目中并不是“恶言死”的秦始皇。武帝死后，燕王刘旦就声称他收到的玺书规格不对，“京师疑有变”，立即派心腹到长安活动，又串联其他宗室，谎称受了武帝遗诏。要是武帝临终前不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是武帝像秦始皇那样，那么一场内乱就不可避免。

霍光和金日磾并不是朝廷中级别和资历最高的官员，此前也没有太大的功绩，金日磾还是匈奴休屠王之子，是武帝从俘虏中提拔出来的，但两人都在武帝身边多年，武帝了解他们的人品和能力。事实证明，武帝“顾托得人”，使汉朝得以延续和中兴。即位的昭帝才八岁，执行什么政策主要靠霍光等大臣决定和维持。昭帝死后，霍光又毅然决定废掉刚立的昌邑王，另立宣帝，也体现了武帝的遗愿，使昭帝时的休养生息政策得以继续执行。

武帝宁可不立已成年的燕王、昌邑王，却立八岁幼儿，显然是深知两个大儿子的弱点，又是出于对霍光的绝对信任。因为一旦不成器的成年儿子登位，霍光的作用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毫无影响，武帝的意图自然无法保证。而不预先排除母后的影响，霍光也未必能得心应手。这样的安排，的确显示了武帝的雄才大略，使他已经暗淡的晚年重新发出光彩。王莽的结局公元9年1月15日，长安未央宫的前殿中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宣布一个新的朝代——它的名称就是“新”——已经取代汉朝。新皇帝王莽穿戴着古怪的服饰，正在亲自宣读策命，封西汉的最后一位名义上的君主刘婴为安定公。读完后，王莽走到这个5岁的幼儿面前，拉着他的手，嘘唏地哭了起来：“古代周公摄政，最后还是让成王恢复了王位。可是我被皇天的威命所迫，由不得我呀!”他絮絮叨叨，竟不肯放手，孩子被他这些莫名其妙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孩子的老师将他搀下殿来，教他跪下叩头谢恩。在场的文武百官深受感动，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抽泣声。

王莽，字巨君，初元四年（前45年）出身在一个煊赫的家庭。当时他的姑母王政君已被元帝立为皇后。13岁那年元帝死，成帝（王政君之子）即位，王莽的伯父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执掌朝廷大权。河平二年（前27年），王莽的五位叔伯在同一天被封为侯。王

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本人却十分不幸，他的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连他的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在向沛郡学者陈参学《礼经》时非常勤奋，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没有什么不同。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阳朔三年（前22年），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王莽悉心侍奉，王凤每次用药前他都亲自尝过，成月不脱衣睡觉，经常蓬头垢面。王凤深为感动，临终前托太后和成帝照顾他。王莽被封为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踏进仕途，几年后，王莽的名声越来越大，当代名士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汤等都在成帝面前赞扬他，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将自己的封邑分出来封给他。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常常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将他的侄儿王光送到博士门下读书。每次休假回家，王莽总要带上羊和酒，赶着车去慰劳他的老师，所有的同学都能获得他送的礼物，学生们纷纷围观，老人都感叹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事。王莽的儿子王宇年纪比王光大，但王莽一定要让他等王光一起结婚。办喜事那天贺客盈门，忽然仆人报告：太夫人不舒服，要饮某药。王莽立即起身入内，宴会中断好几次。有一次，兄弟辈听说王莽私下买了一个侍婢，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博没有儿子，听说这位姑娘能生儿子，我是替他买的。”当天就将侍婢送到朱博家。

当时，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已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但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任侍中卫尉，名列九卿之首，资历比王莽深，按惯例应由他继任大司马。王凤病重时，淳于长也曾日夜侍奉，王凤临终也向太后和成帝推荐过，被成荷花帝任用，升迁很快。成帝想立宠妃赵飞燕为皇后，但太后嫌她出身微贱，经过淳于长在太后面前多次疏通，一年多后成帝如愿以偿。成帝感激淳于长，以他曾劝阻修昌陵为由，封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

淳于长纳的妾中有一位是寡居的侯爵夫人许孊，她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后想让皇帝给她复位，通过许孊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孊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王莽打听清楚此事后，就利用探望王根的机会做了详细报告，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送回侯国。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在成帝面前替淳于长说话，引起了成帝的怀疑。原来王立没有当上大司马，曾以为是由于淳于长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淳于长十分痛恨，但淳于长下台后却通过王立的儿子王融给他送了大批珍宝。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准备逮捕王融，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有大的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朝廷设在地方的监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大逆不道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立被勒令"就国"（回封地），受牵连被撤职的朝廷和地方官有数十人。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38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子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即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元帝的庶孙定陶王刘欣。哀帝即位后，按惯例，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必定会受到封赏和重用，所以被尊为"太皇太后"的王太后命令王莽"就第"（回家，即辞职），给新的外戚让路，王莽立即上疏"乞骸骨"（年老或有病，请求辞职以保全性命）。刚登位的哀帝不允，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报告太后："大司马如果不到职，皇帝就不敢听政。"太后顺水推舟，令王莽复职。事后看来，这不过是哀帝作出的一个小小姿态。果然，高昌侯董宏上书，援用《春秋》"母以子贵"的理论，认为哀帝的生母丁姬应该上尊号。但他举了秦庄襄王生母和养母都称太后的例子，被王莽和师丹抓住把柄，联合控告他"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大不道"。哀帝羽毛未丰，为表示谦让，将董宏免为庶人。哀帝的祖母定陶共王傅太后大怒，逼着哀帝给她上尊号。正好未央宫有宴会，典礼官在太皇太后的位置旁为傅太后挂起了帷帐。

王莽检查时发现，指责典礼官："定陶太后是藩王的妾，怎么可以与至尊一样待遇?"下令撤掉，重新安排座位。傅太后一气之下，没有赴宴，恨透了王莽。王莽知道形势不利，再次"乞骸骨"，在祖母和母亲的压力下，哀帝恩准，赐他黄金500斤和安车（老人乘的卧车）驷马，让他罢官"就第"。但公卿大臣纷纷上书，盛赞王莽对国家的贡献，哀帝只得又扩大他的封邑，给予最高礼遇。

不出王莽所料，一年多后傅太后被尊为皇太太后，丁姬被尊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的地位相同，丁、傅两家能封侯的都封了，能当官的都当了，成了暴发户。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曲阳侯王根被遣就国；成都侯王况被免为庶人，遣送回乡；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有关部门又追究王莽阻止给傅、丁太后上尊号，"亏损孝道"的严重罪行，认为应该处死刑，幸而得到赦免，也不应再享受封地，要求将他免为庶人。总算哀帝看在太皇太后的份上，没有免他的侯，仅遣就国。

王莽完全明白自己面临的危险，所以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后一直闭门不出。他的一个儿子王获杀了奴婢，这在当时本来是很普通的事，他却将王获痛骂一顿，逼他自杀了。侯国所属的南阳太守派孔休担任新都相，孔休求见时，王莽对他毕恭毕敬。一次王莽生病，孔休去探望，王莽为了与他结交，送他一把玉柄宝剑。孔休不肯接受，王莽说："我是见您脸上有瘢，而美玉可以去瘢，所以想把这玉柄给您用。"孔休还是推辞，王莽说："您大概嫌它值钱吧!"当场将玉柄砸碎，包起来送上，孔休只得收下。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前2年）发生日蚀，这被看成上天对皇帝的警告，贤良周护和宋崇等人在答复哀帝的询问时极力颂扬王莽的功德，为他受到的错误处置伸冤，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京。

一年多后，25岁的哀帝病死，此时傅、丁太后已死，哀帝又没有儿子，太皇太后当天就到未央宫收了皇帝的玺绶，急召王莽进宫，诏令尚书，包括调兵遣将和拱卫京师等一切事务均由王莽掌管。王莽建议免去哀帝的男宠、大司马董贤的职务，董贤当天自杀。太皇太后让大臣推荐大司马人选，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荐王莽，前将军何武与后将军公孙禄相互推荐。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

（平帝）。平帝作为成帝之后即位后，太皇太后重新成为太后，临朝称制，让王莽执政。王莽向太后报告，成帝赵皇后曾杀害皇子，傅氏骄横不守制度。太后下令废赵后和哀帝傅皇后（傅太后堂侄女），勒令自杀。傅、丁太后被追贬尊号，称定陶共王母和丁姬。

大司徒孔光是孔子后裔，是三朝元老，得到太后敬重，很得人心。王莽对孔光极其尊敬，提拔他女婿甄邯当侍中奉车都尉。王莽想撤掉哀帝外戚和自己不喜欢的大臣，就拟成奏章后让甄邯交给孔光，孔光一向怕王莽，不敢不上报，王莽请太后一律照准。丁、傅、董贤的亲属全部免官，流放远方。曾经相互推荐的何武和公孙禄免职。红阳侯王立是太后亲弟，是王莽的叔父，王莽怕他在太后面前多说话，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又让孔光上书追究他接受淳于长贿赂等罪行，要求遣他就国。太后不听，王莽说："现在汉家衰落，连续几代没有儿子继承，太后独自代幼子执政。真值得畏惧，尽力公正办事作天下的榜样，还唯恐来不及。现在为了私恩而不接受大臣的建议，使臣子们离心，今后必定出乱子。不妨暂时将他遣就国，以后再召回来。"太后不得已，只得听从。

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从此，王莽实行他的计划时更加得心应手：他表现得非常正直。说得冠冕堂皇，而把自己的意思暗示给党羽，由他们提出要求或着手进行，然后王莽叩头流涕，坚决推让，对上可迷惑太后，对下可向百姓显示他的诚意。

当年底，在有关方面的启发下，益州塞外（今云南或缅甸）的少数民族献来一头白雉，此事引起了朝野轰动。原来根据经典的记载，在周公摄政，辅佐成王时，遥远的越裳氏为他的德行所感动，不远千里送来白雉，王莽刚开始执政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其意义不言自明。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根据王莽的建议，太后下诏，将白雉作为宗庙的供品。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72岁的太后倒不糊涂，她问公卿们："真是大司马有这么大的功劳?还是因为是我的亲戚才特别抬高他?"群臣纷纷赞颂王

莽的功德与周公没有什么不同，这才有了白雉这样的祥瑞。他有“定国安汉家”的大功，应该封为安汉公，扩大封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惯例），以顺人心”。

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不要放在一起。甄邯让太后下诏，王莽有“安宗庙”的大功，不能因为亲戚关系而回避起来，不加表扬，请他不必推辞。王莽再次上书辞让。太后让人带王莽到大殿东厢等待任命，他称病不去。太后派尚书令下诏，要王莽赶快去，他坚决推辞。太后又派长信太仆代表皇帝召王莽进宫，他还是说有病。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太后下诏，封孔光为太师，增加1万户封邑；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广阳侯，封邑5000户；甄邯为承阳侯，封邑2400户；前三人还各赐一所住宅。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不等王莽进宫，就下诏：王莽“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增加封邑2．8万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群臣却坚持“原则”，不同意王莽退还，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

王莽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36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25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也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1／3。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

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皆大欢喜，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他向太后进言："眼看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做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100万、田30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10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左右报告太后，太后派使者命令王莽要"爱身为国"，不必不吃肉。元始二年全国大旱、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动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房。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提出，皇帝即位已三年，应该吸取前几位皇帝没有儿子的教训，及时选立皇后。有关部门上报的一份候选名单中，王家女子有好几位，王莽怕她们与自己的女儿争夺，就报告太后说："我没有德行，女儿才能低，不适合与其他女子一样列为候选人。"太后以为王莽诚心诚意，就下诏："王氏女子是我外家，不要挑选。"消息传出，庶民、学生、基层官吏到宫门前上书的每天超过1000人，公卿大夫有的守在殿上，有的伏在门外，一致请求，让王莽的女儿当"天下母"。王莽派下属分别劝阻公卿和学生，但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太后不得已，只得同意公卿选王莽的女儿。王莽又要求广泛选取，公卿争辩说不应该选其他女子以影响正统。王莽表示，即使如此，也该先考察一下他的女儿。由长乐少府、宗正（皇室族长）等官员组成的考察组报告：完全合适。太后下诏进行最后一道手续，派大司徒、大司空去宗庙向祖宗报告，并占卜，结果也是"康强"、"逢吉"，正式确定王莽的女儿当皇后。有关部门提出，古代天子封王后之父百里封地，应该将新野25600顷地封给王莽，使他的封地达到百里，被王莽谢绝。按惯例，皇后的聘金是黄金2万斤、钱2万万。王莽只愿接受4000万钱，而将其中3300万分给同时挑选到的其他11位女子。群臣认为，这样一来，皇后的聘金与妃子差不了多少。太后下诏再加2300万，合起来共3000万，王莽又将其中1000万分给王氏九族中的穷人。全国官民深受感动，先后有

487572人上书；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了太后就叩头，一致要求增加对王莽的赏赐。名臣张敞的孙子、博学多才的张竦，为大司徒司直（大司徒的首席属官）陈崇起草了一份长篇奏章，极力歌颂王莽的功德，引经据典，要求皇帝效法周成王，给予王莽像周公一样的褒赏。太后交群臣讨论，却发生了吕宽事件。

王莽立平帝后，以防止再次出现外戚丁、傅那样危害国家的事情为由，封平帝的生母为中山孝王太后，两位舅父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国（都卢奴，今河北定州市），不许来长安。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平帝长大后会怨恨，私下派人与卫宝联系。让平帝的母亲上书要求来京，被王莽拒绝。王宇与老师吴章、内弟吕宽商议，吴章认为王莽是不会听从别人意见的，但迷信鬼神，可以制造怪现象吓他一下，然后再讲道理让他把权力交给卫氏。王宇觉得有理。让吕宽在半夜将血洒在王府门上，想不到被门卫发觉。王莽将王宇送进监狱，令他喝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已经怀孕，便关押起来，等产后处死。王莽奏明太后，将卫氏灭族，又通过吕宽穷追猛打，将各地非议自己的豪强杀了几百个，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莽叔父）、平阿侯王仁（莽堂兄）等都迫令自杀。王莽为了教育子孙吸取王宇的教训，亲自写了八篇文章。群臣要求正式发表，天下官吏能背诵的，可以登记取得提升候选资格，享受能背诵《孝经》同样的待遇。

吕宽事件化险为夷，元始四年四月，王莽的女儿被正式立为皇后。为了了解各地民情，王莽派陈直等八人分路采访。太保王舜等上书，鉴于王莽兼有伊尹和周公的作用，应该将两人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合起来的“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八千多百姓上书赞同。于是确定王莽称宰衡，封他母亲为功显君，两个儿子为列侯，皇后聘礼再增加3700万，满l万万。王莽少不了又是叩头流涕，推辞一番，称病不出。太后没有办法，最后由孔光等提议，将王莽的封邑、称号、母亲功显君的爵位都规定为不世袭，再专门派大司徒、大司空代表太后传达让王莽立即到职的诏书，规定尚书不接受王莽的辞让奏章。王莽这才接受，但还是从补发的钱中拿出1000万，分赠太后身边的侍从。据太保王舜等报告，蜀郡民路建等本来在打民事官司，听说王莽如此辞让爵位、金钱，自觉惭愧，主动撤销了诉讼。周文王的德化，曾令虞、芮两国自动放弃了土地争夺，路建等的事迹说明，王莽的德行已超过了周文王，朝廷下令将这一

典型在全国宣传。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典章，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10万人突击，20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明堂举行了祭祀大典。王莽执政不到5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即采用与天子相似的仪仗，享受仅次于皇帝而高于任何诸侯的待遇。当年秋，8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3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象刑（违犯了的人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似乎上古的太平盛世就在眼前了。

当年底，14岁的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为武王祈祷，写了一道策文，请求自己代他死，将策文藏在一个金縢中，放在前殿，要群臣为他保密。但平帝还是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还有5位诸侯王、48位列侯，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因为平帝是宣帝的曾孙，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令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代理皇帝的工作），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第二年改元居摄，刘婴立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与他的相张绍，但他们只拉起了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连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到达山阳（今山东西南一带）时已有十余万人。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聚集了十余万人。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

动大军镇压，在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攻灭翟义的部队，翟义逃亡中被捕杀。赵明等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称：齐郡一位亭长一个晚上做了几次梦，有人告诉他："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让我告诉你：'摄皇帝当为真。'如果不信，你可以看到亭里会新出现一口井。"亭长早上起来固然见有一口新井，深百尺。巴郡发现一头石牛，扶风郡雍县发现一块有字的石头，都送到未央宫前殿展览。王莽和王舜等一起去看，刹时间刮起大风，一片昏暗，等风定时在石头前出现了一个铜符和一幅帛图古代瓷器，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些字。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匮，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匮里放着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及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还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匮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匮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接着又根据金匮的指示封官，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成为级别最高的大臣"四辅"之一。王盛、王兴谁也不认识，公开招寻后各有十几人来报到。于是根据问卜的结果挑了两位相貌符合的，一位王兴是前城门管理员，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位是卖饼的王盛，封为前将军、崇新公，位居"四将"。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应该承认，王莽取得了成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包括《汉书·王莽传》在内，都是在王莽被作为乱臣贼子、被"篡夺"的汉朝恢复后的官方史料，在这些史料中，王莽完全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史料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都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至此也是刚开始出现不满。

且不说旧时代站在正统立场对王莽的批评，就是近年来的论著大多也将王莽作为以虚伪手段篡夺政权的典型，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认

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宣帝的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临终前，他封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了朝廷机要。果然，在史高感到自己不受重用时，就与弘、石勾结，唆使元帝逼萧望之自杀，周堪等也受排斥。从此，石显等宦官擅权，反对他们的官员如京房等被杀。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先后10人封侯，5人任大司马，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京兆尹（首都特区长官）王章建议成帝罢大司马王凤，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威胁。太后亲自干预，成帝只得将王章下狱处死。从此，公卿对王凤侧目而视，成帝也无可奈何。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太后为泄私愤诬陷中山王冯太后，害死冯氏数十人。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男宠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他。丞相王嘉加以规劝，引起了他的不悦。哀帝又假托傅太后遗诏，要增加董贤及其他外戚封邑，王嘉封回诏书，并再次进谏。哀帝大怒，借口其他过失，要大臣议罪，又下诏廷尉诏狱。按当时惯例，现职丞相接到这样的命令，必须立即服毒自杀。王嘉不愿死得不明不白，拒不自杀，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死。

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朝廷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王莽在一道诏书中曾描述了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矛盾：“兼吞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强烈的贫富反差，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

呢?

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下诏，为了顺应谶语的指示，这一年改称太初元将元年，自己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可是，到八月就下诏取消了这些改变，还杀了提建议的贺良。所谓谶语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实际表明连最高统治者也已失去信心，只能用改元和采用不伦不类的称谓来实现“再受命”。建平四年，关东民间盛传西王母“行筹”（拿了治理国家的筹策巡游天下），一路闹到关中长安。百姓聚集起来祭祠西王母，或者在半夜点着火把爬上屋顶，击鼓狂呼。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王莽前期的作为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不能说是伪装或欺骗手段，因为至少他做了不少好事，在当时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括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外戚、前大司马、侯爵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么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就是被他干掉了的叔伯、堂兄弟，本身也都不是好货。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难道让淳于长或其他外戚执政，会比王莽更好?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乱世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

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至少比一帮贪官污吏要好得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建议的各项措施，使诸侯王、宗室、功臣后代、候选官吏、退休官员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三辅的百姓被横征暴敛的赋税可以得到补偿，而且还派官员检查落实，皇陵中的多数民墓可以不迁，全国百姓和基层官吏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的物资，这些都是少有的实惠，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一万套住宅，从全国征召数千有本领的人，又将天下通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数千人征至京师，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即便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至于制造符谶、祥瑞，这并不是王莽的发明，此前的汉高祖、此后的汉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难道不是假造出来的吗?

一句话，如果王莽成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他就是新朝的太祖高皇帝，他的本纪里的内容肯定比刘秀、曹操、曹丕更丰富，也会比刘邦更动人。但事实他却失败了。

汉光武帝如果王莽仅仅是为了夺取权力，仅仅是为了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成功了，他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却不知道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本来只是儒家的理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当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做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成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的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无疑是画饼充饥，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诸侯王、列侯、官员、国家供养的学者和人才，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这是绝对难以两者兼顾的。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自己该依靠谁，打击或抑制谁。刘秀要依靠南阳的宗室豪强，

所以对他们一直优待宽容，当了皇帝也不得不与他们有所妥协。所以尽管东汉从一开始就存在田地和户口登记不实的严重问题，但至少得到了地主豪强的支持。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每个男口不满八个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奴婢中不少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或者让他付钱买下。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筦。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

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1／10。所谓六筦，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放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又是完全行不通的。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括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增加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殿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总想超过前人，显示自己的功德，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50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

满，“民始怨矣”。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恢复古代的面貌。最容易的复古是改名，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改，不需要什么物质条件，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汉书·王莽传》中保留着一段诏书的样本，今译如下：

此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太尉：将益岁以南划给新平，新平，原淮阳。将雍兵以东划给陈定，陈定，原梁郡。将封丘以东划给治亭，治亭，原东郡。将陈留以西划给祈隧，祈隧，原荥阳。陈留已不再成为郡了，大尹和太尉都去朝廷临时驻地报到。

其实，诏书中还没有注全。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太守，而益岁就是原郡治圉县。可以想象，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他可以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

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如此。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情严重，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严重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战火逼近长安，王莽自知大势已去，但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他率群臣到南郊告天，仰天长叹：“皇天既然已将天命授予我王莽，为什么不消灭众贼?即使我有不是，用雷霆杀死我就是了。”他捶胸大哭，几乎断气，又伏地叩头，宣读自己作的《告天策》，向上天陈述自己的功劳，希望得到庇佑。成千上万的诸生和百姓昼夜不断地聚集在那里，边哭边朗诵《告天策》，为此设立了临时食堂，为他们供粥。有五千多人因哭得极其悲哀并能背诵策文，被提拔为郎官。

十月初一，更始军入城，攻至宫门。初二，大火延烧到宫中，王莽穿着紫色礼服，佩皇帝玺绶，手里还拿着一把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投其所好伪造了献给他的）。他让天文郎在他面前测量时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换坐的方向，嘴里不停地说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老天爷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么样!）

山水画鉴赏初三天明，群臣扶着王莽走出白虎门，王揖已备好车等在门外。王莽上车来到渐台，他抱着符命、威斗，希望利用台周围的池水阻挡汉军。此时，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就奔入宫中守卫王莽，找到了渐台。这时王邑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汉兵追到，将台团团围住。台上射箭抵抗，汉军一时攻不上。但不久箭就用尽，只能短兵相接。王邑父子等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

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他的尸体被争夺的士兵肢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见了大喜，说："王莽要是不这样做，那就应当有霍光一样的地位了。"毫无疑问，汉朝宗室对王莽最大的仇恨就是夺了他们的政权。王莽的头颅被挂在宛县市上，这里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这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汉代的商人司马迁热情地讴歌货殖，赞扬杰出的商人，但贾谊、晁错等却严厉地抨击"末业"和从事"末业"的商人。货殖，究竟是功，还是罪？

第四章

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视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唯恐不及。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里，“本”和“末”是完全对立的。“崇本”只能以“抑末”为前提，“末”兴必定是以“本”衰为代价，似乎是无法两全的。例如西汉初的贾谊就提出：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与“游食之民”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助长“淫侈之俗”，是“大残”、“大贼”，只有将他们都赶回田里去才是办法。“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任何物资的生产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使用是没有限度，那么物力必定会负担不了），这道理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商业是不是只是使用或浪费物力。

晁错的看法与贾谊相同，但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他把当时不能出现商汤、夏禹那样的太平盛世，归咎于“游食之民未归农”，而“游食之民”显然主要是指商人。晁错要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还在于他认为一旦百姓离乡，就会像“鸟兽”一样难以禁止，对统治者构成威胁。

贾谊、晁错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却是错误的，把农村的兼并和农民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商人，而将商业的发达当成粮食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更不符合实际；企图用全民皆农的办法达到增加粮食储备、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目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他们的这些看法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古训。在生产力极其落后，每个人所生产的物资充其量只能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人人必须直接从事耕织，既不可能、也没有剩余物资可供流通或交换，当然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职业商人的存在。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尽管西汉初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商人和商业的存在完全有其必要，人们还习惯认为，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不劳而获。

实际上，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不仅仅是商人，皇室、贵族、官吏、儒生、军人、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奴婢也都是靠农民供养的。但皇室

和贵族是天生的统治者，官吏和儒生是“食于人”的劳心者，当然没有当劳力者的必要；军人和奴婢虽然不干农活，却是统治者和劳心者必不可少的汉朝货币；所以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列为末业。但手工业毕竟有具体的产品，或者为国计民生所必需，或者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所以手工业者的地位总比商人要高一些，倒霉的商人就只能当末业的代表，做“抑末”的牺牲品了。

商人另一个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方面是他们的生活：你不耕不织，如果粗茶淡饭，布衣草鞋也就算了，偏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衣服必定要穿花色鲜、料子好的，吃的必定是精米和鱼肉），大商人还要“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不远千里地出访或游玩，出动不少车辆，车盖排列成行，坐着宽大的马车，赶着高头大马，脚上穿丝织的鞋子，身上披着精织的缯衣），岂能令人容忍?而且，穿什么式样和料子的衣服，吃什么标准的伙食，坐什么规格的车子，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级别和身份的标志。皇室、贵族的享受来自他们高贵的血统，靠的是上天的眷顾和祖宗的恩泽；官员们的享受是级别的规定和工作需要；商人们什么也不是，不少人出身低微，不少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就是有钱，却能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不仅儒生们望尘莫及，连中低级官员也自叹弗如，但心里总是酸溜溜的不是味儿，对限制“末业”的法律手段自然会衷心拥护，严格执行了。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在列举了各地的特产后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就是说，吃饭要靠农民，物资的开采要靠掌管山泽的部门，器具的制作要靠手工业，商品的流通要靠商人，这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而是要人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各人的努力，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自然规律。司马迁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原料的来源（山泽的开发）视为人民生活的基础（原），认为只有这个基础壮大了，才能富国富家。在司马迁的眼中，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引的《周书》中的话，已不见于今天流传的《尚书》，可能是已经散失了，但我很怀疑是被别有用心的儒生删去的。

司马迁以大量的事例，雄辩地证明了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绩。如果我们不断章取义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被司马迁所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不妨看几个例子：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因从事冶铁而致富。秦始皇灭赵国后，卓氏被强制迁移，身无余财，夫妻俩推着车，步行往安置地。当时其他被迁的人都用身边留下的一点钱财贿赂押送他们的官吏，以便找个近一些的地方，结果被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没有平原，又没有什么出产。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头，不会饿死人，百姓善于贩卖，容易做生意。"要求远迁该处。卓氏到达临邛后，很快发现了铁矿，大喜过望，立即就地冶炼铸造，产品遍销滇、蜀百姓。卓氏成为拥有上千家僮的巨富，生活的奢华足以与君主相比。

卓氏不仅掌握了一整套冶铁技术，而且具有开拓精神，在被强制迁移、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依然不求苟安，不畏艰险，宁愿到边远地区从事开发。他生产的铁器产品遍及滇蜀，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是当时赵国的"迁虏"中多一些卓氏那样的人物，西南地区的开发一定会加快很多。可惜见于记载的仅有另一位程郑，他的经历与卓氏相似，他生产的铁器远销南越，因而积聚的财富与卓氏不相上下。

或许有人会指责卓氏剥削了滇蜀百姓，要不他的巨大财富从何而来?但从滇蜀百姓乐意购买来看，他生产的铁器实在要比官方生产的那种“割草不痛”的农具更受欢迎，由此而增加的社会财富远比卓氏所得为大，卓氏就此致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也有人把卓氏拥有“僮千人”作为“工商奴隶主”或“剥削劳动人民”的典型。实际上，当时的官奴婢数量甚多，拥有“僮千人”或更多的贵族官僚也并非个别。例如，武帝给骗子栾大的赏赐中就有“僮千人”，要说存在奴隶的话也不是卓氏的创造。何况卓氏的“家僮”中肯定大部分是从事冶铁的，就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言，总比仅仅为统治者的生活服务要积极些。即使就这些“家僮”个人而言，他们所受的剥削未必比官奴婢或刑徒更大，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未必比其他雇工差。至于卓氏“田池射猎之乐”的生活，尽管“拟于人君”，却完全是自己掏钱，与公款消费不同，不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总不能要求卓氏赚了钱自己不花，全部上缴国库或用于慈善捐款吧!

另一些商人和投资者的致富，是以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为基础的，是以敢为天下先、甘冒风险为前提的。如宣曲（关中某地）任氏是仓库主管，秦朝灭亡时，豪杰们纷纷收罗金玉，只有任氏大量储藏粮食。以后楚汉在荥阳一带大战，农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万钱，任氏大发其财，豪杰们到手的金玉都流到了他手中。其他富人相互摆阔，任氏生活节俭，将资产投入农牧业；别人买土地和牲畜时只拣便宜货，任氏只求质优，不怕多花钱；结果他家几代都保持着富足。汉武帝刚开拓疆土时，边疆地广人稀，桥姚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久就获得马千匹、牛两千多头、羊万余只和数万石粮食。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在长安的列侯、封君被征召从军，为了筹办行装，向人借贷。由于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而吴楚等国在关东叛乱，成败未定，投资者怕收不回本息，不愿放款。只有无盐氏信心十足，拿出千金供借贷，年利定为10倍。果然，吴楚之乱仅三个月就平息，无盐氏一年之内获利十倍，一下子成为关中首富。

一些历史书上将无盐氏作为高利贷的典型，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欠公允。当时已经专门有一批人从事借贷业务，被称为“子钱家”，大概是将本求利（以母钱赚子钱）的意思。但正常的借贷绝不会有如此高的利息，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子。无盐氏进行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借贷，而是风险投资，风险越大，利率自然越高。要是吴楚七国叛乱得

逞，或者平叛战争持续多年，或者列侯的封邑遭受破坏，他很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要是一点风险都没有，或风险很小，其他子钱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不会有人接受这样高的利率。如果没有准确的判断，没有冒险精神和必胜的信心，无盐氏也不敢投入如此大的资金。无盐氏固然赚了大钱，但国家获益更多。正是他的资金保证了列侯们及时从军，使部队能迅速集结行动。要是都像其他子钱家那样，“成败未决”的局面肯定会延长。就是对列侯们来说，尽管他们付出了高额利息，但由于封邑得到保全，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所以无盐氏的致富完全是公私两利，称之为爱国行为也不过分。

齐地的刀间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商业奇才，他专门从奴隶中挑选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主人视为桀骜不驯却精明强干的奴隶，都加以收买，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有的奴隶善于公关，用赚来的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就更能得到刀间的信用。刀间因而致富，拥有数千万资产。奴隶们在为刀间尽力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人，所以都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刀间的见识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够通过扩大和延伸经营管理的方式，不是把奴隶当做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才能获得高额收益。尽管他没有改变奴隶们的身份，也剥削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但奴隶们得到了原来根本不敢企望的钱财和地位。

司马迁还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例子：

古代画扇农业并不是收益高的行业，但秦扬经营得当，富甲一州；盗墓是不光彩的勾当，曲叔却由此起家;赌博是恶业，桓发因而致富；行商不是大丈夫所为，但雍县人乐成却因此发了财；贩油脂的人地位低下，而雍伯赚了千金；卖浆是小生意，张氏却获利千万；郅氏靠磨刀这样的薄技而享受豪华的筵席，浊氏干制作胃脯这类小事而拥有高车驷马，张里凭医马的本领而过上王侯般的生活。

和卓氏等人一样，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

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所以太史公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当然，这些“贤人”只是将本求利，充其量只是奉公守法或遵守商业道德，还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爱国事迹。而武帝时一位奇人卜式，以畜牧致富，却一次次作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贡献。

卜式是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人，主要经营畜牧。他本来有土地住宅，弟弟长大后就将田宅都留给弟弟，自己只分了百余头羊到山里放牧。十几年后，卜式的羊已增加到千余头，还买了田宅，而弟弟却破产了，卜式就不止一次将自己的田宅分给弟弟。

武帝用兵匈奴，卜式上书，愿意将一半家产献出资助军费，武帝派使者问他：“想当官吗?”卜式答：“从小放羊，不了解官场的事，不愿当官。”“家里是不是有冤要伸，或者想上书报告什么问题?”“我生来不与人争吵，乡里的穷人我借钱给他们。不会经营的我教他们，我住在哪里，哪里的人都听从我，我会受什么冤?”使者简直不能理解：“既然如此，那你要干吗呢?”卜式说：“皇上征匈奴，我以为有本领的人应该上前线不怕死，有钱的应该出钱，这样才能消灭匈奴。”听了使者的报告，武帝告诉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认为卜式不符合人之常情，像这样不规矩的人不能树为典型，要不就乱了法制，请武帝不要理睬他。拖了几年，武帝也没有接受卜式的捐献，卜式也不在乎，还是回家放牧。

一年多后，匈奴昆邪王率众归降，关东移民迁往西北，都得靠朝廷供养，仓库里都空了，还是不够开支。卜式得知后又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要求用于资助移民。在河南郡上报的捐款富人名单中，武帝发现了卜式：“肯定就是上次那个要捐一半家产助边用的人。”武帝赏给他400个免除服役的指标，他又全部上缴。当时富豪们都争着隐匿自己的财产，只有卜式特别主动捐献，武帝断定他是忠厚长者，召他来封为中郎，授予左庶长的爵位，奖励田10顷，将他的事迹布告天下，作为百姓学习的榜样。

卜式还是不愿当官，武帝说：“我在上林苑中有一群羊，你就替我牧羊吧。”卜式就以郎官的身份，穿着布衣，脚蹬草鞋当了羊倌。一年多

后，武帝经过牧地，见羊长得很肥，数量也增加了，十分赞赏。卜式说："不但牧羊，治理百姓也应该如此，让他们起居适时，坏的及时除去，别让他们害了大家。"武帝觉得他的话不同一般，想试着让他治理百姓，就任为缑氏县（今河南巩义市西南）令，缑氏人反映他管理有方；调到成皋县（今河南荥阳市西北），该县的漕运完成得最好。武帝认为他朴实忠诚，任命为儿子齐王的太傅，又调任齐国的相。

南越吕嘉反叛的消息传来，卜式上书，请求与儿子一起，率领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弓箭手和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东南）的船工上前线参战。武帝下诏表彰，赐他关内侯爵位，黄金40斤、田10顷，并布告天下。可是全国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响，上百名列侯没有一人要求从军。到了列侯们献金助祭宗庙时，武帝令少府检测他们上缴的"酎金"，发现不是分量不足，就是成色过低，气得他一下子免去了百余人的爵位。武帝更感到卜式的可贵，提升他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是文职官员中仅次于丞相的高官，牧羊出身的一介平民在和平时期能获得如此宠幸，实在是罕见的际遇，这是卜式人生的巅峰。到了这一地步，他不得不介入朝廷政务，与武帝的主张相左就在所难免了。卜式发现各地对实行盐铁专卖都不满意，官造的铁器质次价高，却硬性配给，强令百姓购买。对商船征税后，商人减少，商品涨价。完全不懂官场规矩的卜式，不像其他大臣那样总是为现行政策歌功颂德，向武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引起武帝不悦。加上武帝正忙于筹备封禅大典，应该负有重要责任的这位御史大夫却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懂礼仪，所以不到一年，卜式就被降职为太子太傅，理论上是太子的老师，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但卜式有机会还是要说话。自从桑弘羊主管财政和商业后，大力推行均输平准等政策，成绩显著，博得武帝的嘉奖。那年出现小旱，武帝命令百官求雨，卜式上书："朝廷的开支应该依靠百姓的租税，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坐在市场上，贩卖货物求利，实在太不像话。将桑弘羊下油锅烹了，天就会下雨。"这当然动摇不了桑弘羊的地位，他最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但武帝对卜式还是优容的，使他得以善终。

对卜式致富的原因，史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不是靠种田，而是靠牧羊。但一般的牧羊也不可能使他积累如此多的财产，

看来他必定是一位养羊专家，或者是兼营商业，最大的可能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卜式的可贵之处，一是忠君爱国。他一次次捐献财物，甚至准备上前线作战，却毫无个人动机，即使一时不为朝廷所理解也一如既往。在担任高官后，他丝毫没有考虑到如何保住爵禄，也不管向武帝进逆耳的忠言会带来什么后果，直截了当地反映百姓的意见。要是当时的大臣都如此，武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或许不会持续那么多年。他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对国家机构职能的正确理解，不但通过牧羊悟到治民之道，而且反对官商合一。显然他主张朝廷只管征收赋税，让百姓合法地经商发财，但发了财的人也应该像他一样，主动为国家着想。

如果商人或发了财的人都像卜式那样，或许根本不需要武帝时出笼的一系列对付商人的政策，可惜卜式是绝无仅有的典型。而汉朝的商人中，像司马迁所称道的那些富有“诚壹”精神和开拓意识的商人只是极少数。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为了大多数普通商人，其中自然不乏大大小小的奸商、官商和半官商。

司马迁对货殖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就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所谓“算缗”，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凡是商人和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出租房屋供商业活动、储存货物以及其他商业行为的人，无论是否有市籍，先自己估计营业收入，按2000钱一算（120钱，税率为3%）的比例纳税；从事金属冶炼等手工业、囤积和贩卖有关货物的人，其营业额按每4000钱一算的比例征收。除了官吏、三老、北方边疆地区的甲士以外，其他人所有的自用轺车（小车），每辆征收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辆征收二算；船身长五丈以上的每条征收一算。不主动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又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为了鼓励检举揭发，规定将被检举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对检举者的奖励，这就是“告缗”。六年，武帝任命杨可主管全国的“告缗”，并将反对此举的右内史（首都特区长官）义纵以“废格沮事”（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从此，“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到元鼎二年（前115年）就取得辉煌战果：由于发动充分，检举揭发者积极性高，使朝廷没收了成亿财物、上万的奴婢；各县没收的田地多者数百顷，少者百余顷，住宅也数以百计；中产以上大多破产，而国库却一下子充实了。

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即将各地的煮盐、冶铁均收归政府管理，全部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官府招募盐户，提供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费用，其他费用自理，产品由政府包销。私自铸铁、煮盐者处以斩左脚趾的刑罚，并没收产品。不出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管理铁器的专卖。

这一建议是由大司农颜异提出的，而具体操作的是他的下属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侍中桑弘羊。东郭和孔都是大盐铁商出身，而桑则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心算能力极强，不用算筹就能算出结果。让他们来对付商人，可谓“以毒攻毒”，商人们只能乖乖服从。不过那位东郭先生和孔先生大概不会有如此高的觉悟，想来也是迫于形势的选择。

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落实措施，设置了数十个专卖机构——盐官和铁官，选用饶有资产又内行的人为主管官员。国家垄断盐铁的结果，是夺取了商人的丰厚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进一步控制流通领域，即在各地设置专职官员，负责收购物资，根据路途远近和运输状况进行调剂，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以各地输入的物品及官方制造的产品为本钱，进行交换和买卖，以平抑物价。由于官方行政机构拥有的渠道远比民间商人畅通，资产远比一般商人丰厚，商人自然无法与之竞争，朝廷大获其利，据说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不过朝廷的主要财源，显然还是直接从商人和手工业主那里没收来的。

古代文人各地的盐铁、均输、平准官十之八九是原来的商人，按理说是驾轻就熟，但一旦成了官员或官商，就出现了新弊病。例如，铁官们为了完成生产指标，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偷工减料使产品质量低劣，以致农具“割草不痛”，连草也割不断。本来应该在物价低时收购，贵时抛出，可是官商们常常反其道而行之。目的何在?因史料中未见记载，只能靠猜测了。至于这样的统购统销，官商垄断，私商普遍破产会造成什么社会效果，我们倒是不难想象的。

有的史学家赞扬汉武帝的政策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不法商

人，抑制了土地兼并。实际上，真正能“专山泽之饶”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宠臣邓通（汉文帝赐以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占有封国中的铜铁矿、盐场）这样的贵族官僚。商人占有的矿山、盐场不是出钱购买的，就是完全靠自己开发的，从来不可能无偿使用。从西汉初就存在的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商人或手工业者，因为即使只考虑自己的产业，商人们也不会赞成分裂割据。商人中当然会有不法之徒，但全国中等以上的商人个个“不法”，这“不法”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土地兼并也不是商人的专利，贵族、官僚、宦官、豪强地主无不兼并，并且多数是依仗权势掠夺，不像商人那样出钱购买。再说，商人购买了土地后不会自己耕种，而他们对雇工收的租税也不可能比官僚、豪强和其他地主更高。

使商人热衷于购买土地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的法律和社会习俗对商人的歧视、限制。商人要改变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由“末业”转入“本业”，如司马迁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其实，商人以资本购买土地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加剧土地兼并，而是减少了商业资本，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代，成功的商人也还要把大量资产用于捐官、买地、建住宅、造花园、为子弟求学、养清客、藏书画，或者挥霍浪费，却很少用于扩大投资。

总之，依靠压制商业、打击商人搜括财富，实际上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商业流通，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并不比农业歉收或自然灾害的影响小。可是在传统的本末观看来，只要商人和商业活动减少了，种田的人肯定就会多，粮食就能增产。但经济规律并不以汉武帝或其他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武帝死后，抑商政策就开始松动，原来的规定大多已成具文。西汉后期，外戚、官僚纷纷涉足商业，官商越来越多，越来越富。初元五年（前44年），元帝取消了盐铁专卖，以后虽一度恢复，但最终完全取消，东汉时再未恢复。平准、均输法也逐渐废弛。东汉期间，由于地主、官僚、豪强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他们与商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至此，商人的卑贱地位已成过去，但商业作为“末业”的帽子却一直没有摘掉。以至当代，这还是一个在史学界有争议的话题。汉代的知识分子公元167年，宦官曹节授意上报，将“钩党者”一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汉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

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集团的第一次政治迫害——党锢案的结果。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5年），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张成的弟子牢惰向皇帝上书，控告司隶校尉（首都特区长官）李膺等人资助太学（国家最高学府）中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结交各地士人，相互串连，结成“部党”，诽谤朝廷，破坏社会风尚。桓帝震怒，下令各地逮捕这批“党人”，并且将他们的罪行布告天下，全民共讨之。案子送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审理时，太尉陈蕃拒绝署名受理，还上书极力为他们申辩。桓帝更加生气，就将李膺、范滂等人关押到由宦官主管的黄门北寺狱刑讯逼供：又以推荐任用人员不当为由免了陈蕃的职。党人的供词牵连到陈寔等二百余人，也一律逮捕。其中有的人已经逃亡，都悬赏捉拿，全国通缉，朝廷派往各地办案的官员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集团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此事的起因与汉桓帝不无关系。原来桓帝当蠡吾侯（封邑在今河北博野县西南）时，当过甘陵国（国都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北，辖今山东、河北交界处数县）人周福（字仲进）的学生，等到即位后就提拔他当了尚书（内阁常务官员）。而同郡人房植（字伯武）担任河南尹（首都所在郡的长官），在朝廷颇有声望。于是本地人编了两句民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不愧是天下的榜样，周仲进当官不过是沾了当老师的光。）房、周二人的幕僚、门客、学生相互讥讽，制造舆论，又各自拉帮结派，逐渐势不两立，形成甘陵南部和北部，开始被称为“党人”。以后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北）太守宗资信用功曹（秘书长）范滂（字孟博），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太守成瑨也委任功曹岑晊（字公孝），这两郡中也流传出这样的民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真正的汝南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签字划圈。南阳太守也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要坐着嚷嚷。）当时太学有学生和访问学者三万余人，郭太（字林宗）和贾彪（字伟节）名声最大，他们与李膺

（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互相赞誉提携，太学中又传出了几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此外还有渤海（治所在今山东南皮县东北）'人公族（姓）进阶、扶风（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南）人魏齐卿，都爱发表直率的意见和深刻的议论，揭露豪强时不留情面。连朝廷的高官也怕他们的批评，吓得到他们家去时连车也不敢坐。

事件的导火线是几年前李膺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有打卦算命的本领，平时以此广交宦官，连桓帝都信他几分。据说张成推算出皇帝将要大赦，就让他儿子杀人。当时李膺正任河南尹，将他儿子收捕。不久果然颁布了赦令，张成的儿子在释放的范围，李膺更加气忿，竟将他定罪杀了，所以张成的弟子就作了诬告。

由于连太尉陈蕃都碰了钉子，朝廷百官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新息县（今河南新息县西南）长贾彪到洛阳活动，说服了尚书霍谓、城门校尉（首都卫戍司令）窦武于次年六月上书为党人鸣冤。窦武以皇帝丈人的身份指责"陛下所行，不合天意"，并同时称病辞职。当时，连年水旱灾害严重，中原地区百姓饿死的近一半，绝户的也不少，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盗贼"蜂起；36岁的桓帝虽然在上一年立窦武之女为他的第三位皇后，却一直没有儿子，因而对"天意"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李膺等的供词中也涉及不少宦官子弟，宦官怕受到牵连，劝桓帝顺从"天意"加以赦免。于是桓帝大赦天下，将党人们释放回乡，终身管制，他们的名字都由朝廷记录在案。

但党人们从此声名大噪，范滂等人获释后刚离开洛阳，汝南、南阳二郡的士大夫迎接他们的车已有数千辆。此后各地的士人更是推波助澜，互相标榜，把天下名士都收罗起来，定出各种称号：最高的是窦武、刘淑（宗室，任侍中，相当皇帝顾问）、陈蕃三人，称为"三君"，即当代领袖；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即士人中的精英；郭太等八人称为"八顾"，即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张俭等八人称为"八及"，即能够指导别人向领袖们学习；度尚等八人称为"八厨"，意思是能以钱财救济他人。

当年冬桓帝死后，因无子，窦武主持迎立解渎亭侯刘宏（灵帝）即

位，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陈蕃出任太傅、录尚书事（首相）。窦武与陈蕃策划清除曹节、王甫等长期弄权、祸国殃民的宦官，任“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禁卫军司令），又下令征召被禁锢的李膺等党人进京，并请“八俊”之一的荀翌、陈寔担任幕僚，共同商定计划。天下士人都知道了他们的意图，纷纷准备效力。第二年（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敦促窦武采取行动，但窦武一味依靠其女窦太后，而太后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包围之中，不愿下手。直到八月，窦武才从其党羽开刀，准备收捕曹节等人，但计划泄漏，曹节、王甫等抢先行动，占据皇宫，劫持了13岁的灵帝和窦太后，以他们的名义下诏逮捕窦武。窦武召集军队对抗，失败后自杀，陈蕃、刘瑜、冯述等均被杀，刘淑、尹勋等在狱中自杀，他们没有被杀的家属都发配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其他边疆。这是对党人的沉重打击，不仅“三君”身亡，政治势力被扫荡殆尽，而且招来了宦官们的疯狂报复。

建宁二年（169年），在中常侍（皇帝身边的机要官员，多由宦官担任）侯览的指使下，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朱并首先发难，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死党，“图危社稷”（阴谋颠覆国家），灵帝立即下令缉拿归案。大长秋（皇后宫内的主管官员，多由宦官担任）曹节也授意有关部门上报，将“钩党者”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其余的党人有的已在此前死亡，有的闻风逃亡。一些人趁机泄私愤，将仇家列为党人。地方官迎合朝廷的意图搞扩大化，以至根本与党人无关的人也遭祸害。因此而被杀、被关、被逼逃亡的有六七百人，受到牵连的更不计其数。

青山秀水熹平五年（176年），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市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言词相当激烈。灵帝大怒，立即命令将曹鸾用囚车押解进京，送监狱活活打死。又下令各地清查党人的学生、下属和父子兄弟。凡是当官的一律免职管制，处罚范围扩大到他们的五

服之内。光和二年（179年），上禄县（今甘肃西和县东南）长和海提出：按照礼法，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如果已经分居，就属于疏族，党人株连五服以内不妥当。灵帝才将追究范围限于三代之内。

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灵帝进言："党锢时间长了，人们的怨气很大。如果一直不予宽大赦免，这些人与张角合谋，叛乱会越闹越大，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灵帝才感到害怕，就对党人实行大赦，将被流放的家属放回故乡。历时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运动至此结束，但东汉王朝的最终崩溃也为时不远了。

这场党锢案当然完全是冤假错案。实际上党人们根本没有结成什么党，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甚至并没有结成什么团体，最多只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士人组成的非常松散的同盟。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周密的行动计划，面对政治迫害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的。说他们要"图危社稷"更是冤哉枉也，且不说他们都巴不得为皇帝效劳尽忠，窦武、陈蕃和党人们要杀的只是一批宦官，就是对出自皇帝的迫害也无不逆来顺受，至多只是逃避，却从来没有任何反抗。

不过，平心而论，党人们并不是没有责任，要是他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偏激，行为不是那么极端，策略不是那么幼稚的话，损失绝不会如此惨重，结果可能更接近他们的目标。

党人们的确都是学者士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的主要事业是读经游学，设帐授徒。党人们的集体活动也只是互相标榜，评品人物，发表一些"危言深论"。但他们既不是闭门读书、埋头著述的纯粹学人，也不是优游林下、清心寡欲的出世高士；其中大多数是在任或离任的官员——从最高一级的文武官员大将军、太尉、太傅，中央各部门和一级政区的行政长官，到幕僚和县长；其余的也都是"家世衣冠"的乡绅和待价而沽的士人。党祸的起因表面上是宦官对反对他们的士人的报复，实际还是东汉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党人们的领袖之一窦武，就是一度权倾朝野、掌握拥立新君大权的外戚，而窦武与宦官较量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就是这批党人。

东汉从和帝开始几乎都是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当权：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执政。元兴元年（105年），27岁的和帝死，其子刘隆（殇帝）还不满1岁，即位后由邓太后临朝，其兄邓骘执政。次年八月殇帝死，邓太后与邓骘立和帝之侄、13岁的刘祐为帝（安帝），继续由邓太后临朝。延光四年（125年），32岁的安帝死，废太子刘保已11岁，但系宫人所生，没有即位的资格；而皇后阎氏为了能长期掌权，贪立幼主，与其兄阎显等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少帝）。刘懿即位时年不详，但肯定是幼儿，阎后当仁不让，以太后身份临朝，阎显执政。数月后少帝死，宦官孙程等18人密谋，拥立废太子刘保（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幽禁。建康元年（144年）顺帝死，两岁的太子刘炳（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任大将军。第二年正月冲帝死，梁冀不顾大臣立长君的建议，立8岁的刘缵（质帝）为帝，梁太后继续临朝，梁冀执政。一年多后，质帝中毒死。梁冀立15岁的刘志（桓帝）为帝，梁太后仍临朝，梁冀也继续执政。灵帝12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父窦武执政。唯一的例外是，顺帝虽也是1l岁即位，却是由宦官拥立，阎太后失势，阎显被杀，顺帝母亲已死，因而没有太后临朝。但7年后立梁皇后，外戚梁氏的势力迅速膨胀。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3帝、19年。

东汉时之所以会接连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死时还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太后和外戚都想继续掌权，故意选幼主即位。等皇帝长大后，不愿当傀儡，就要设法摆脱太后或外戚的控制。但由于外戚大权在握，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如和帝14岁时与宦官策划，清除外戚窦氏。安帝28岁时邓太后死，方能亲政，同年即利用宦官废外戚邓氏。桓帝亲政后，梁冀继续独揽大权，桓帝与宦官合谋灭梁氏。宦官为了达到控制皇帝、巩固权力的目的，也主动掌握时机打击外戚，拥立顺帝，杀阎显就是一例。

在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士人们往往站在外戚一边。这固然是由于士人们不屑与宦官为伍，更主要是因为士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干一番事业，就得做官，而外戚掌握朝政，正是士人们投靠的对象。相反，宦官的正式职务大多属于内廷，按正常途径与士人们不应发生直接联系。加上外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一般都竭力拉拢士人，所以除了梁冀过于飞扬跋扈，诛杀李固、杜乔等大臣和士人外，其余的外戚与士

人的关系远比宦官与士人的关系密切。

但问题是，外戚与宦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宦官未必人人都坏，外戚也不见得个个比宦官强。像和帝时主谋杀窦宪的郑众，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参与灭邓氏的19名宦官中的良贺，灵帝时的吕强和丁肃等5人，都有值得称道的事迹，不愧为宦官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吕强，还直接推动了党锢案的解除。而外戚中尽管也不乏正人君子，或者颇有文治武功，但大多过不了迷恋权势和以权谋私这两关。就拿党人们推为领袖的窦武来说，实际执政仅9个月，史料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劣迹，但仔细分析就未必如此。桓帝死后，选择新君的决定权就操在他手中。《后汉书·窦武传》说他只是召见河间国（国都在今河北献县东南）的刘儵，询问该国的王子侯中有谁贤能，仅根据刘儵称道刘宏就决定立他为帝（灵帝）。以后的事实证明，灵帝根本无贤可言，而且他母亲与他的爱钱贪财，在帝后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河间王一支中缺乏贤能，也不至于到了以灵帝为最佳的程度，窦武轻率地选择灵帝，看来还是想找一个便于控制的12岁孩子。凭着这“定策”的功劳，窦武心安理得地增加封邑，子侄升官封侯，此后王甫在反驳陈蕃称赞窦武“忠以卫国”时指责“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看来不是无中生有。要是窦武执政的时间不是9个月而是9年，结果又会如何呢?这样的人做党人的领袖，领导党人与宦官斗，即使获胜，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好作用。

在与宦官的较量中，窦武与党人们占有压倒性优势：党人居朝廷的文武要职，控制着首都地区的军队和禁卫军；宦官弄权多年，作恶多端，积怨甚深，而党人们得到舆论的支持；皇帝为窦氏所立，对窦武有好感，又来自外藩，与宦官没有联系。但结果却是党人们的惨败，这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

从当年年初，窦武与陈蕃就开始做人事部署，要诛杀曹节、王甫等宦官的舆论已经造得“天下雄俊”都知道了，可是直到五月才找了两名中常侍开刀，又拖到八月才准备逮捕曹节、王甫。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即使不出现窦章奏章泄漏的偶然事件，宦官们也会有充分的对抗时机，无怪乎能在一夜之间反败为胜。窦武迟迟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是他过于重视女儿窦太后的作用，必定要等待太后的同意，偏偏这位女主在曹节、王

甫的奉承下，对他们十分信任，一直不批准将他们法办。可以想象，即使窦武的奏章送到了太后手中，她也未必会立即采取行动。窦武既没有将太后与宦官隔离，也没有对太后与小皇帝实行保护，结果让宦官轻易地劫持，成了他们假传圣旨的工具。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上了逮捕曹节等的奏章后，窦武安心地回家休假了，而由党人指挥的禁卫军事先居然毫无准备，临时召集的数千军人不堪一击。

这一系列错误的步骤当然不是窦武一个人的责任，但恰恰暴露了党人们的致命弱点：志大才疏，言行脱节。他们是言论的巨人，却是行动的矮子；他们追求的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就拿党人的另一位领袖、这次行动的具体策划者陈蕃来说。他的嫉恶如仇、直言极谏、临危不惧、不计私利（如多次冒死营救受迫害者，拒不接受封邑）不愧是道德的典范，而政治技巧和斗争策略却乏善可陈。陈蕃少年时的一件事曾传为佳话，正好说明了他从小就存在的片面性。他15岁时独居一室，父亲的朋友来看他时，见屋子里又脏又乱，就问："客人来了，小朋友为什么不打扫一下?"他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其实，扫除天下与打扫屋子是并行不悖的，能打扫屋子的人未必就不能扫除天下。相反，连屋子都不愿扫或扫不干净的人，又怎能扫除天下?不幸的是，陈蕃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并非少数。

党人们的嫉恶如仇，如果只是见于言论，即使过分一些也不至于有严重后果，但不少人是实权在握的官员，当然要付诸行动。而这些措施往往失去理智，以毒攻毒，或者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不仅无谓地激化了矛盾，而且授人以柄。像李膺不顾赦令已经颁布，杀了张成之子；岑晊为了让太守成瑨立威，拿不法富商张汎开刀。在赦令下达后不仅仍然杀了张汎，还杀了他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贾彪当县长时，为了制止穷人杀婴，规定对杀婴者与杀人犯一样定罪；窦武的奏章中不仅建议杀曹节、王甫，还计划将其他宦官一网打尽；如此之类，都已超过了理性的限度，将中间势力推向敌方，当然会把自己置于绝境。联系到一些党人的矫揉造作，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极端做法有哗众取宠的动机。

党人们的名士架子在相互标榜中越摆越大，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公然用之于官场政坛。范滂出任陈蕃的下属，按照公务礼节晋见，

陈蕃没有加以制止，范滂竟表示愤慨，马上扔掉官笏辞职。陈蕃向他道歉，也没有使他回心转意。范滂连与陈蕃都无法共事，并且只是为了君主出游毫无道理又微不足道的原因，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澄清天下之志”呢?其他党人也往往在官方征召时多次推辞，摆足架子（最后大多还是当了官），或者当了官后动不动就挂冠而去。显然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声望，而不是社会的需要和其他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张俭依靠自己的“名行”，在逃亡中“望门投止”，让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提供救援，却不顾许多人因他而被杀，“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的严重后果，心安理得地在塞外避过风险，晚年还“不得已”接受曹操的征召，以84岁高龄寿终正寝。

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党人的另一位领袖、与李膺齐名并备受赞誉的郭太（林宗）却能安然无恙，继续闭门教授上千弟子，看来似乎是奇迹，其实倒很说明问题。郭太虽然“名震京师”，但他认为汉朝已到了“天之所废，不可支也”的程度，拒绝出仕。他有自己的见解，但不发表“危言核论”，不对宦官作无谓的刺激。窦武等被杀后，他“哭于野，恸”，表达了自己极度的悲哀，却没有与朝廷作公开的对抗。《后汉书》列传中还记录了不少生动的事例，突出地说明了他待人接物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奖掖引导士人时，也不排斥有缺点错误的人。可见，清浊善恶并不像多数党人说的那样绝对，对宦官和邪恶势力也不必事事对着干，更没有必要作无谓的挑战。李膺等的供词曾牵涉到不少宦官子弟，并引起宦官的恐慌，说明宦官们也不是不想巴结党人。如果像郭太一样处理得当，至少可以起到分化作用。可惜的是，像郭太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实在太少了。

党锢案前后的事实，说明早在1800年前就存在着权力与舆论、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郭太这样的一介布衣，回乡时到黄河边送行的士大夫有车数千辆，而只有李膺有资格与他坐同一条渡船，其他人只能像对神仙一样仰望。被朝廷罢官、逮捕或杀害的官员和士人会赢得舆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受迫害越重声望越高。被释放的党人尽管尚在管制之中，还是受到家乡士大夫数千辆车的欢迎。对被朝廷通缉的党人，不惜弃官，不顾被满门抄斩并株连宗族而加以保护的也大有人在。这就是说，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士人的官职、财产、自由以至生命，可以对他们肆意侮辱或施加刑罚，但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能改变士人们的信仰。

士人乃至社会对是非好恶的评判，已经不是简单地屈从于政治权力，而是根据自己或本阶层独立的标准。这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尊严、道德的感召力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那种政治权力完全控制舆论，政治标准就等于道德评判的社会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无法解决两个矛盾：保持独立人格与服从皇权，实现自身价值与参与政治。

自从秦始皇建立君主集权的专制体制，并为汉朝所进一步巩固，又有了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合一”理论，皇帝和皇权已成为天意的体现，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诽谤皇帝就等于谋反大逆，是够得上杀头、腰斩、族诛的罪行。汉武帝时还增加了一条“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因为再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无法证明自己心里没有说过皇帝的坏话。批评皇帝的唯一根据是“天意”，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判断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意，往往在于皇帝是否愿意接受批评。所以党人们也罢，其他士人也罢，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声望、多广的影响、多大的胆量，批评或评价的对象是不能包括皇帝在内的。所以，对善恶是非、合法非法、忠奸贤愚的评判，一旦由皇帝表态，知识分子就不能也不敢再有议论了，因为不仅法律不允许，就是连发展了的儒家理论中也找不到这样做的根据。面对邪恶势力的各种倒行逆施，正直的士人会义无反顾地斗争，甚至可以将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奸臣所为，皇帝最多是受了蒙骗。但一旦证明这真是皇帝的旨意，或者皇帝亲自做了裁决，即便这是皇帝被欺骗或被劫持下作出的决定，士人们就失去了一切抵抗的余地。或许有人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但不可能再有言论或行动，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可言?

在党人中，范滂的死是最光明磊落的。在第一次被捕时，他与同案被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让犯人祭皋陶。范滂带头拒绝：“皋陶是贤人，也是古代的直臣。他要是知道我无罪，必定会代我向天申诉。如果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益?”狱吏要进行拷打，他见同案大多体弱有病，就要求从他开始，与同郡袁忠争着挨打。第二次逮捕党人的诏书下达时，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抱着诏书，在宾馆闭门痛哭。范滂闻讯后，知道一定是为了他，就主动到县监狱投案。县令郭揖大惊，他立即扔下印绶，准备与范滂一起逃跑，说：“天下如此大，先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范滂说：“我死了祸害才能停止，怎么敢以我的罪连累您，又让老母流离失所

呢?”他既没有像张俭那样不顾别人的死活，千方百计地逃亡；也不像有些人那样自杀；而是从容诀别亲人，拒绝别人的营救，主动投案，接受一切刑罚。表面看来，在独立人格与皇权发生冲突时，范滂已经无条件地服从了皇权，心平如镜，视死如归。但他给儿子的遗言，却透露了内心激烈的冲突和深切的悲哀：“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坏事干不得，好事又不能做；自己做了还可以心安理得，总不能让儿子也这样做，这岂止是范滂个人的悲剧?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永远无法两全的痛苦抉择!

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但汉代的知识分子能学的、能干的事实在少得可怜。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知识分子能做的只有读书和做官。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除了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嫉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会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且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

不过，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更大的不幸是他们连做这两种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东汉后期在全国五六千万人口中，县以上官员和贵族的定额是10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世袭或变相世袭的，留给士人竞争的职位更少。而光太学生就有3万，全国的知识分子估计有数十万。隋唐以后，读书人还能应科举考试，多少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东汉时实行的却是荐举制，士人得由地方官逐级推荐，或由官员聘任，或由朝廷征召，都得在学问和品行上有知名度。对大多数出身平民、家境贫寒的士人来说，要靠学问出众而成名难乎其难，品行上达到“孝廉”或名士的水平倒相对容易一些，而投靠名士，推波助澜，扬清激恶，党同伐异，臧否人物，更不失为一条捷径。如会稽阳羡（今江苏宜兴市）人许武已经被举为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许晏、许普没有什么特长，想让他们成名。于是向他们提出三兄弟分家。将家产分为三份后，许武自己取了最肥的田、最大的住宅、最得力的奴婢，而两个弟弟分到的都比他差得

多。于是舆论哗然，一致称赞弟弟克己谦让，批评许武贪婪，许晏、许普因此都获得地方上的举荐，成为孝廉。这时，许武将宗族亲戚请来，哭着告诉大家：“我当哥哥的不成器，先窃据了声誉和地位。两位弟弟年长了，却还轮不到荣华富贵，所以我提出分家，自己揽一个恶名。现在我替他们管理的财产已经增值三倍，全部分给弟弟，我一点也不留。”他因此受到全郡的一致赞扬，名声大振，以后官至长乐少府。这样的曲线求名，似乎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按照正常的途径，这两位弟弟大概绝对不可能当上孝廉，而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再卑鄙无耻、愚昧无知，也照样能得到举荐，甚至位至公卿，那最应该受到指责的就不是许武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似鸡。”这类名实之间完全矛盾的现象发生在东汉末年，和党人们风流显赫于一时一样，都不是偶然的。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有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少有选择主子的自由，成功了就是王侯将相，失败了也咎由自取，至少过了一下实现自身价值的瘾。秦汉之际的郦食其，虽然最后被扔进了油锅，但他毕竟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事迹，因此至死不悔。生在治世的知识分子可以安享圣君贤臣的恩泽，循着科举的阶梯往上爬，碰到“稽古右文”的皇帝，还有机会参加国家大型文化项目，不但无衣食之忧，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可惜中国历史上大多是不治不乱之世，就像党人们所处的时代那样，知识分子就只能挤在成名和做官的独木桥上了。从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会忍受腐刑的奇耻大辱，而不是一死了之，要不他怎能写成《史记》?东汉末年的蔡邕是在董卓威逼下才出仕的，但在董卓被杀后居然会表现出对他的同情，原因就在于董卓对他的尊重和为他编撰汉史提供了条件。所以他临死还要哀求王允，愿意接受黥面（在面上刺字）、刖足（砍去脚）的刑罚，留他一命，以便编完汉史。另一方面，一些人不惜以生命（甚至全家和亲友们的生命）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代价。党锢案中不乏自投罗网的人，还有的人根本没有列入党人名单，竟主动要求补入。他们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精神上却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明朝皇帝以廷杖对付敢提意见的官员，常常有人被当场打死，被视为对士大夫莫大的侮辱。对这样的待遇，天下士人竟会“羡之若登仙”，甚至会有人主动争取。

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许无法理解，但这是千百年来的事实。而《后汉书·党锢列传》就是其中的第一篇实录。汉魏与禅让光和六年（183年），张角与他的弟子策划起兵推翻汉朝，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第二年，张角率领头戴黄巾的部众举起了反汉大旗，天下响应，举国震动。

司马迁但黄巾起义被汉朝镇压了，汉朝在名义上又延长了36年，到公元220年才被曹丕建立的魏所取代。据说魏属土德，所以尚黄色，连曹丕用的第一个年号也称为"黄初"，黄天真的取代了苍天。而曹丕实行的却是模仿尧、舜、禹的禅让，以后成为"汉魏故事"。

相传上古时的唐尧将天下传给了虞舜，这就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唐虞故事"。据说以后舜又传天下于夏禹，又有了一个"虞夏故事"。但禹死了以后，他原定的继承人益却没有即位，让禹的儿子启得了天下。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益主动让给了启，一是启杀了益。无论如何，禅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因为从启开始就都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实行"家族天下"了。

今天的历史学家完全能够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禅让现象存在和消失的原因，并指出这并非中国的特产，但当年的儒家却以禅让为千古盛事，是天下为公的典范，颂扬唯恐不及，只恨未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可惜当皇帝的都讲究现实，尽管爱听臣下将自己比之于尧舜，却从来没有人愿意像尧舜那样传位于外人，连在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当太上皇的也屈指可数，其中出于自愿的或许只有乾隆皇帝，至于他在当太上皇的三年间是不是真将大权交给了儿子嘉庆皇帝，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可是另一方面，想接受"禅让"的人历来并不少。对于那些实际大权在握的权臣、军阀来说，要废掉傀儡皇帝自然已不费吹灰之力，但要自己当皇帝、建新朝却还有一道障碍。因为废了皇帝，甚至把他杀了，也还得在皇族中另立新君，否则就逃不了篡夺或弑君的恶名，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可能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但如果让皇帝自己让位，自己再假惺惺推却一番，篡夺就成了"禅让"，傀儡和操纵者都成了尧舜般的圣君，所以"唐虞故事"实在是不可少的。

最早演出“禅让”的是魏文帝曹丕代汉，以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梁取代前朝时都如法炮制。五代时郭威（周）代汉时汉隐帝已被杀，只能由太后扮演禅让的主角。宋太祖赵匡胤代周是在一个早上完成的，但也少不了以周恭帝的名义下了一道禅位诏书。大概因为“唐虞故事”年代久远，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而曹丕代汉的过程却由《三国志》记载得十分详细，操作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汉魏故事”成了后世禅让的代名词和样板。

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迎至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后，汉朝就已名存实亡。但曹操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始终没有取而代之。不过到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已被“封”为魏王，第二年汉献帝又“命”他使用皇帝的仪仗，离真当皇帝仅一步之遥。可惜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死，接受“禅让”的手续就只能由他的儿子、继承魏王的曹丕来完成了。

首先是一系列“祥瑞”的出现，而且是从曹操的故乡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开始的。据说早在熹平五年（176年），黄龙曾出现在谯，太史令单飏预言这里“后当有王者兴”，50年内黄龙会再现。当时一位名叫殷登的人记下了他的话。221年三月，也就是隔了45年以后，谯果然又出现了黄龙，殷登作为见证人宣布单飏的话应验了。四月，饶安县（今河北盐山县西南）上报见到了白雉。以后这类报告不断，如八月石邑县（今河北获鹿县东南）报称有凤凰光临。

六月二十六日，曹丕率大军南征。其实当时并无军事上的需要，曹丕也并不真想进攻孙权，所谓南征只是为禅让作铺垫而已。七月二十日，军队到达谯县，曹丕在城东宴请当地父老和全军，并下令免除谯县两年的赋税。经过数月的巡游，曹丕于十月初四回到离首都许不远的颍阴县曲蠡（今河南许昌市一带），却没有进入首都。

这时，左中郎将李伏上书，公布了他多年保守的秘密，证明近来出现的祥瑞正是应在曹丕身上。这位李伏原是张鲁的部下。他说，当年在汉中听说汉献帝将魏国封给曹操，大家都以为必定封为魏王。可是姜合却说：“肯定封魏公，现在还不便称王。定天下的是魏公子桓（曹丕的字），这是神的旨意，符谶上说得很明白。”张鲁问姜合根据何在，姜

说："这是孔子《玉版》上的话，皇帝的历数，就是一百代以后的事也能预知。"一个多月以后，果然有人送来了写着这些话的册子。姜合以后归顺曹氏，病死在邺城。李伏说："我已将此事告诉了很多熟悉的人，但考虑到时机没有成熟，不敢公开。您即位后一次次出现祥符，每次庆贺时我都想说明真相，但怕别人说我是讨好您。况且我原是张鲁部下，归顺的时间不长，说错了罪更大，所以一直忍着。现在祥瑞并呈，天意已经很明白，我心情无比激动，谨上表报告。"曹丕下令公布于众，又说自己德薄，实在不敢当，这是"先王至德通于神明"的结果。

于是刘廙、辛毗、刘晔等一批大臣上书，引经据典地证实李伏所称预言的正确性。他们说："尧宣称他得了天命时，北斗星座前四星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周武王还没有与商纣王作战，一头赤鸟就衔来了捷报；汉高祖尚未出世，他母亲就获得了神的预示；汉宣帝地位低微时，树叶上就显示了吉兆；汉光武帝的名字出现在图谶上时，他还是平民。可见天命授予圣哲，不必用华丽的辞藻，不必有芬芳的气味，只要有具体的迹象出现就能得到证明。汉朝的衰落已经有好几代了，从桓帝、灵帝末年的大乱到现在也二十余年了。总算老天爷有灵，使圣人诞生来解救苦难，所以用符谶预告，以显示天命所在。您即位不到一年，天上、地下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祥瑞，四方的百姓争先恐后地来归顺，自古以来的典籍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的盛况，我们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呢?"曹丕说："健壮的小牛像老虎，恶草的幼苗似庄稼，有些事会似是而非，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概是为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明我德行的不足"。曹丕命有关官员向百官宣告，使大家都了解。

眼看舆论造得差不多了，太史丞许芝在十月初九正式向曹丕报告了魏代汉的谶纬。

他首先根据最权威的《易传》所说"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巳日见"，而最近一次发现黄龙正是七月四日戊寅，应该是帝王受天命的最明确的预兆了。此外，蝗虫、麒麟在这时节的出现都是符合《易传》记载的典型的祥瑞。

接着他又引证了大量谶纬书籍中的记载和曹操名人的言论，说明汉朝气数已尽，魏代汉是早已安排好的天命。如《春秋汉含孳》说"汉以

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说“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说“汉以许昌失天下”“汉以蒙孙亡”；故白马令李云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等等。这些话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有的却要作一番解释。如所谓“当涂高”，是指当着大道的高大建筑物——象魏（或魏阙），暗含一个魏字。“蒙孙”据说是指汉朝第二十四代皇帝，或者说是指以非嫡嗣身份即位的皇室后代。而汉献帝非皇后所生，又是汉朝的二十四代，汉朝注定是要亡在他手里的。而《孝经中黄谶》和《易运期谶》的记载就更绝了：“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按汉隶的写法，曹字的上半部正是东字缺下半部（火字），下半部是个日字，符合“日载东，绝火光”；不字加一横正是丕，说明继承汉朝400年天下的只能是曹丕了。“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鬼在山，女禾连，王天下。”许昌要发生君臣易位，取代者为魏（汉隶的魏字右边鬼字下有一山字），是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四百之外”和“五八四十”，根据许芝的解释，上天安排帝王易姓的周期本来是720年，但有德的朝代可以延长到800年，无德的只能有400年。汉朝已经有426年了，如果从春秋时麒麟出现作为新周期的开始就有700多年了，已经到了“四百之外”。而天上太微垣黄帝星（代表魏国）变得明亮，赤帝星（代表汉朝）却经常见不到，已经有40年了。星象变化的种种迹象表明，改朝换代的时间已到。

这位太史认为，历史上圣人出现时的祥瑞不过一两样，而曹丕即魏王位后的祥瑞简直不胜枚举：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无所不有，是自古以来最美好的。而岁星已出现在大梁的范围，正是魏的分野，与当年周武王伐纣、汉高祖入咸阳时出现的星象相似。作为史官，将如此重要的图谶和天象上报，是应尽的职责。

谁知曹丕的答复竟是断然拒绝，他下令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还向殷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行使了君主的职权，完成使命后还是归还给成王，备受称颂。我的德行虽远不如这两位圣人，但怎么能忘记‘高山仰止’的道理呢？”“我的德行薄极了，地位鄙极了，只是生逢其时，有幸继承先王留下的事业，但还没有使天下都受到恩泽。虽然已经尽力来救济魏国的百姓，但还有受冻的人，还有人吃不饱肚子。我睡梦中都感到担忧恐惧，不敢稍有懈怠，只求能够像现在

这样太太平平地终老，使魏国得到保全，使我死后见到先王时感到没有辜负他的托付。我的愿望和志气都有限，只要能守成就行了。所以尽管祥瑞屡次出现，我只能增加不安，已经六神无主了。像许芝这些话，我岂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也表达不清。我曾作过一首诗：‘战乱纷纷已过十年，白骨累累纵横万里，可怜的百姓还能靠谁?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回乡。’我一定要遵守这一誓愿，绝不是说假话。因此昭告天下，使大家知道我的心意。”

可是大臣们似乎根本不理会曹丕的态度，侍中辛毗、刘晔，散骑常侍傅巽、卫臻、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及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联合上书：“您的令书辞意恳切，坚持谦让，比起舜、禹、商汤、周文王来也毫不逊色。但是古代的圣哲之所以接受天命而不推辞，也是为了遵奉上天旨意，满足百姓的期望，身不由己呀。”他们引用《易经》等经典，列举形势，证明天意不可抗拒，请求曹丕“急天下之公义”，“宣令内外，布告州郡”，使全国都知道上天的旨意和自己的谦让态度。

曹丕下令道：“让天下人了解我的心意是对的，至于其他的话难道是指我吗?我怎么敢当?”“最近东征时经过的郡县和屯田，百姓面有饥色，有的人连短衣都没有一件好的，这都是我的责任，所以上有愧于这么多的祥瑞，下对不起百姓。这说明我的德行连当一个统治一方的王都不够，还想当皇帝吗?你们应该立即停止这类建议，不要加重我的过失，使我死后不至于给世上的君子笑话。”

十月十一日，曹丕向百官公布此令，却并没有使大臣们的热情降温。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人上书，认为“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汉室的失德由来已久。而曹丕即位以来的“至德”已经广被上下、天人感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作为的大人，事前做的事不违天意，事后做的事遵从天时。舜、禹见天时已到就不作谦让，因而百姓受到及时的救济，万物普遍获得恩惠。现在四面八方、全国上下都在殷切期待着，上天在保佑您，神都在为您尽力，天下的十分之九已归顺于您，远远超过了当年周文王的三分之二。您要再不接受，实在是过于谦让了，我们大家真于心不安。”

曹丕的答复更加明确，他说："世上最缺少的是德义，最富余的是随大流说的假话，常人的性情就是不重视所缺少的，喜欢本来就富余的。""我虽然德行不足，总还希望不像常人那样爱听假话。岩石可以被击碎但不失坚硬，丹（朱砂）直到被磨尽也保持红色。丹、石这样的小东西尚且能坚持自己的品质，何况我多少算一个士人，又受过君子的教育呢?"在引述了古代圣贤事迹后，他表示尽管自己德行不如周武王，道义上有愧于伯夷、叔齐，但必定要立下丹石之志，绝不会信从假话，要学习圣贤的品德。"常言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这样的志向，难道是可以夺走的吗?"

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好像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戏还得演下去，这就需要傀儡皇帝上场了。两天后，汉献帝正式向魏王曹丕下了禅位诏书，并派兼御史大夫太常张音为专使奉上皇帝的玺绶。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书："天命弗可得而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而违"：请求召集文武大臣，公布诏书，顺应天命，并着手制定禅让的礼仪。曹丕下令："只能商议不该接受的理由。现在正在军旅之间，等回去后再正式答复。"尚书令等再次上书："汉高祖接受天命时正在军旅之中，为了畏惧天命，不敢拖延，就在驻地举行即位仪式。现在您接受禅位的诏书，应该召集百官，集合全军上下，使大家都知道天命。军营中地方狭小，可以在附近平地建坛，布置举行仪式的场地。我们与侍中、常侍等已经擅自讨论确定了礼仪，太史官已选定了吉日。"曹丕说："我实在不敢当，其他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

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又奏："汉家遵照唐尧公天下的道理，陛下（注意，已不称殿下了）以圣德接受历数的安排。上天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应该顺应灵符，及时即位。根据太史丞许芝的意见，本月十七日己未是吉日，可接受禅位，已经安排布置了坛场，具体情况另行奏请。"曹丕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设坛场呢?这些东西搞它干什么?我是要辞让不接受诏书的。那么就在帐前开读玺书，仪式与平时受诏时一样。再说现在天气寒冷，应该停止筑坛工程，让工匠回家。"在开读汉献帝的诏书后，曹丕下令道："我岂能接受诏书，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必须起草辞让的表章，奉还皇帝玺绶。古代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让天下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他们不是回到颍水之阳去耕地，就是以疾病作推托；或是远入山林，让别人不知所在；或带了妻子

出海，终身不再返回；或者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投水自杀。况且颜烛为了返璞归真而辞去官职，王子搜在丹穴中即使被烟熏死也不愿出来，柳下惠不因为三公之贵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曾参不以晋、楚二国的财富而放弃仁义。这九位先哲都有很高的节义，不为富贵所动，因而被史书记载，流芳百世。求仁得仁，仁其实并不远，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难道就不如他们吗?我坚决不接受汉朝的诏书，宁可跳东海自杀。赶快上奏章归还玺绶，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决心。”曹丕的决定于十月十五日公布。

大臣们自然知道这是献忠心的好机会，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120人联名上书，居然大胆地反驳曹丕的理论根据：“石户、北人，只是匹夫的狂狷，行为不符道理，在历史上也少见，所以司马迁就不以为然，实在不是圣贤所应该仰慕的。况且虞舜不拒绝尧的禅让，夏禹也没有发表过辞位的言论，说明圣人都知道天命不能违背，历数不可推辞。”他们表示将不顾曹丕的反对，“昧死以请”，并照样“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大有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意思。带头的刘若还是汉朝宗室，由他出面劝进更显得大公无私，也证明天命的确不可违背。曹丕的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以往柏成子高为了不接受大禹的任命而避往荒野，颜阖为了退回鲁侯的馈赠而隐居不出，为什么他们俩会将王侯的器重不当一回事呢?是因为有高尚的气节。所以烈士追求荣誉，义夫重视气节，即使只能过贫穷的生活，也会乐在其中。孔子向王骀学习，子产尊重申徒，就是这一缘故。诸位都是我的肱股心腹，照理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如今却做出这样的事来，看来你们追求的是物质，而我向往的是精神，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赶快起草奏章退还玺绶，别再搞新花样了。”

这120位大臣却理直气壮地再次上书，指责曹丕的做法是“违天命而饰小行，逆人心而守私志”，上对不起上天的关怀和信任，中忘了圣人应该通达的教导，下影响了臣民翘首企盼的热情。他们认为侍奉君主首先得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就可以与皇帝对着干，决心不理会曹丕的命令而“以死请”。曹丕却要把文章做足，推辞的话说得更加恳切：“现在百姓中还有人没有吃饱在挨饿，还有人穿不暖在受冻，鳏夫讨不到老婆，寡妇嫁不了好男人；孙权、刘备尚未消灭，不是唱凯歌的时候，而应该秣马厉兵；对外的战争没有平息，国内的士民不得安宁”；“诸位为什么不能让我殚精竭虑，顺天时，合人和，把这些事情都办好，让应有的祥瑞

都能出现，那时再议论此事不是更好吗?何必如此相逼，出我的丑呢?”

大臣们知道这场戏还得演下去，于是侍中刘虞等上奏，表示由于“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立即准备奏章，派遣使者回复汉献帝。曹丕唯恐大家不理解他的苦心，又下令道：“泰伯曾三次以天下让给他人，没有人不称赞他的，孔子叹为最高的德行。我这样做又算得了什么呢?”

古代征战十月十八日，曹丕上书献帝，表示奉玺书后“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说自己“无德以称”，并派毛宗送还玺绶。第二天，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从天文分野和岁星的位置论证，魏国得岁与周文王受命完全相同，今年正是时候。而曹氏的始祖是颛顼，与舜是同一祖先，十月份受禅与颛顼受命相符，取代汉朝是以土德代火德，又与舜代尧一致。他们警告“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劝曹丕不要“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而要“以时即位”。其实曹丕正在筹划下一轮的表演，只是答道：“我已经上书辞让，希望得到皇帝批准，也要让全国都知道。”

二十日，献帝下了第二道禅位诏书。尚书令桓阶等又“敢以死请”（上一次遭到曹丕拒绝后居然并没有死），请求立即“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曹丕的答复是：“那么急干什么?我希望辞让三次，如果还得不到批准就再说。”所以在二十二日第二次上书献帝，奉还玺绶。刘廙等上奏相劝，说这几天“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证明“天道悦怿，民心欣戴”。况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斯须无统”，“臣等敢不重以死请”（注意，加了一个重字）!曹丕在拒绝的同时表示：“此岂是小事一桩?公卿们还没有都表态呢!应该在坚决辞让之后再商议实行的办法，”

二十四日，献帝下第三道诏书，并命令使者张音不许再将玺绶取回。在曹丕的导演下，满朝公卿都表态了，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等46人联名上书劝进。曹丕答复道：“就德行而言我是不够的，就形势而言敌人也没有消灭。要是能在你们的辅佐下平平安安地当魏王，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要说天降祥瑞和百姓拥戴，那都是先王的圣德留下的成果，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敢从命。”二十六日，曹丕上书献帝，作第三次辞让，请求献帝召回张音。

大臣们都知道曹丕的“三让”已结束，劝进的热情自然更高，华歆等公卿立即上表，起草者更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易经》称圣人奉天时，《论语》说君子畏天命，正因为天命不常有。皇帝才要禅让。尧知道自己天命已尽，不得不禅位于舜；舜了解自己应了历数，不敢不接受。不得不禅位，是奉天时；不敢不接受，是畏天命。汉朝虽然已经没落，还能奉天命，效法尧禅让帝位；陛下处在大魏受命之初，却不像虞舜、夏禹那样通达，反而学延陵这般退让，真是顾了小节，损了大德，注意了小事，忽略了大事呀!连国内一般人都不以为然，要是死者有灵，舜必定会在苍梧的墓中忿忿不平，禹必定会在会稽山阴的葬地郁郁不快，武王（曹操）必定会在高陵的地宫中生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死相请。”在歌颂了曹氏的功德，列举了数不清的祥瑞后，又道：“古人说：‘要没有大禹，我们早就给洪水淹死了。’要是没有大魏，我们这些人早已变成白骨横在荒野了。”魏国的功德和瑞应真是“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百姓的命运托付给魏国，民心向着魏王，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是千世难得、万年难逢的机会，需要的是通达远见，完全用不到顾忌小节。以前没有及时顺应天命，这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已经在布置坛场，筹备礼仪，选择吉日，将要昭告上帝，祭祀众神，然后在朝堂召集百官，讨论改年号、正朔、服色等事项后上奏。”至此，曹丕答复：“我原来只想像舜那样终身吃粗粮，过苦日子；但舜接受了尧的禅位，穿上他赐的衣服，娶了他两个女儿，也是顺天命的表现。公卿臣民一定要说‘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我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

二十八日，献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了禅位册文。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奏：明天就是太史令选定的吉日，可登坛受命。曹丕批了一个“可”。二十九日，曹丕登上筑在繁阳亭的受禅坛，参加仪式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的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了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的事，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从黄龙出现在谯县算起，已有七个月时间。但从李伏上书算起，这场密锣急鼓的戏只演了二十余天，“汉魏故事”就圆满闭幕了。曹丕踌躇满志之余，肯定不会想到，仅在45年以后，他的侄孙曹奂就充当了汉献帝的角色，如“汉魏故事”，将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

明明是一场假戏，却非要演得如此逼真，在今人看来未免滑稽可

笑，但在当年是非如此不可的，否则曹丕与群臣就大可不必煞费苦心，“汉魏故事”也不会在七百多年间反复上演了。再说，曹氏代汉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最终能顺利完成，还得归功于这场戏的导演和演员。

曹操早已大权在握，汉献帝只是他任意摆布的工具。建安十八年，曹操将三个女儿给献帝当贵人，第二年就找借口杀了皇后伏氏。曹操派华歆带兵入宫，伏氏关了门躲在壁橱中，还是给抓了出来。披发赤脚的伏氏拉着献帝的手说：“难道你不能救我吗?”献帝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死呢。”两个月后，三位曹贵人之一被立为皇后，献帝成了曹操的女婿。要废掉或杀掉献帝是再容易不过的，使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无非是刘备、孙权的存在和舆论的压力。曹操死前两个月，孙权向曹操称臣，并劝他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当陈群等也劝他及时“正大位”时，他明确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以曹操的军事、政治观察力，他自然知道儿子曹丕不可能很快消灭刘、孙，只是希望到曹丕一代时舆论上会对曹氏更加有利，以便水到渠成地取代汉朝。司马光在评论曹操时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资治通鉴》卷68）虽不尽然，但不无道理。

正因为如此，曹丕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造祥瑞和符谶，以证明曹氏、魏国和他自己已经拥有天命。用中国曾经风行过的话说，就是“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秦始皇、汉高祖、王莽、汉光武帝，以及陈胜、吴广、张角（黄巾）等，无论是登基、禅位、篡夺，还是造反、起兵，都离不开这一套。对统治者来说，制造祥瑞和符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一旦造出来，绝大多数愚昧的人果然会坚信不疑，就是极少数智者又有谁敢、谁愿意揭露真相呢?所谓祥瑞，一部分是世上根本没有的动物，如龙、凤凰、麒麟，只要有人说见过，当然没有人能否定；一部分只是珍稀动植物或普通动植物，如白雉、灵芝、蝗虫等，存心要采集本来也不是难事。而且献祥瑞的官员会得到提升或赏赐，当地百姓也能沾光，如向曹丕呈报出现白雉的饶安县被免除全年田租，所在的勃海郡又获得牛酒的赏赐，特许合郡官民大喝三天。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符谶的制造当然要依靠知识分子，必要时还得争取著名学者或大臣的配合，但对统治者来说也不是难事。虽然我们不能妄断曹丕时的符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却可以举出宋真宗亲自炮制“天书”的事实：当王钦若劝宋真宗举行封禅仪式以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时，这位皇帝最担心的是不出现“天瑞”，找不到封禅的理由。王钦若与一位老儒杜镐却告诉他，所谓“河图洛书”本来就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耳”，都是人为的，只要君主相信，公布天下，就成了“天瑞”。真宗还怕得不到宰相王旦的配合，但一方面有王钦若事先疏通，王旦已心领神会；另一方面真宗亲自赐宴，又赏王旦一壶酒带回去与太太一起喝，回家后王旦发现壶中竟塞满了名贵的珍珠。于是真宗就向满朝文武宣布，他梦见神人告诉他将降《大中祥符》天书三篇，十二月初一果然发现天书已挂在左承天门楼上。王旦带头拜贺，全国庆祝，各地争相上报祥瑞。如此天人感应，真宗自然只能顺天命去泰山封禅了。

曹丕的“南征”与祥瑞的出现看似巧合，其实是他代汉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南征是他集中精锐兵力的最好理由，既能巡视各方，显示实力，又可随时镇压反抗势力。曹丕回师后既不回魏都邺城，也不进汉献帝所居的许都，而是留驻许都附近。连受禅仪式也在军营旁进行，显然是出于军事控制上的考虑。这是“汉魏故事”的重要一部分，一般人可能会忽略，仿效者却不乏其人。五代时周太祖郭威代汉，就是以“契丹入寇”而率军北征为序幕的。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也是在“契丹入寇”时率大军离开首都后，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

曹丕的“三让”也不是他的发明。当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后，实际已是天下之主，但在诸侯将相共同请他称帝时，他还要表示“吾不敢当”。然后群臣坚持，“以死守之”，刘邦三次辞让，“不得已”才说：“诸君一定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就当罢。”前后也花了近一个月时间。 刘秀的“三让”过程更长：更始元年（公元25年）正月他驻军平谷时，诸将上尊号，派马武劝他到蓟城（今北京）即位，他大惊，说：“你怎么敢说这话，该杀头。”四月，刘秀至中山，诸将又劝，他还是不听。到达南平棘，诸将又“固请”，他才表示“吾将思之”。果然，在抵达鄗（今河北柏乡县北）时，各种祥瑞和符谶纷纷出笼，刘秀登坛即皇帝位，此时已是六月。

但曹丕的“三让”表演得有声有色，不用说远比刘邦和刘秀精彩，以后的禅让者也都望尘莫及。这自然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为曹丕本人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文学家、学者，他的臣下也不乏文人学者，这一劝一让，正是他们施展文才的好机会，所以都千方百计将假话写得动听得体。曹丕的令和表虽然不无出于秘书之手的可能，但多数大概是自己写的。凭曹丕的学识和教养，他完全能将假戏演得十分逼真，绝不会像无赖出身的刘邦那样动不动骂人或自称“乃公”（你老子），或者在关键时刻离不开导演的操纵。另一方面是由于曹丕胜券在握，不怕夜长梦多，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操作起来也相当从容。而有的禅让却非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才能完成，就不能那样讲究了。

像周太祖郭威本是一介武夫，向他“劝进”的是一批军人，当时又正在行军途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场闹剧。十二月十六日，军队抵达澶州。据说当天早晨太阳边冒出一股紫气，正对着郭威座骑的头。十九日，郭威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第二天，将士大叫大嚷，涌向他所住的驿馆。郭威闭门不出，将士从墙上爬入屋内，请他当皇帝。军人挤满一屋，“扶抱拥迫”，有人撕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呼声震天动地。郭威被众人包围，说话都没有人听见，昏过去了几次，左右亲信侍卫都找不到了。直到被大家拥上城楼，才安定下来，由军队拥护着回首都去。这是《旧五代史》的记载，固然是为了掩盖郭威的策划，但导演的拙劣和当时的混乱已可见一斑。赵匡胤在陈桥驿“接受”军队的拥戴后，第二天清晨就回师开封。当时百官正在上早朝，将士将宰相王溥、范质等大臣押到赵匡胤的公馆，赵匡胤流着泪说：“我受世宗皇帝的厚恩，现在被军人逼到这样的地步，实在对不起天地，你们看怎么办?”还不等范质说话，有人拔出宝剑厉声说道：“我们没有主人，今天非立了皇帝不可。”范质等不知所措，王溥赶快到台阶下跪下叩头称臣，范质也只得随着下拜，于是请赵匡胤到崇元殿举行禅让仪式。黄昏前百官齐集，典礼即将开始，却发现最重要的禅位诏书都没有准备，幸亏翰林承旨陶谷事先私下拟了一份，当场从袖筒里摸出用上。这场快餐式的禅让只用了一天时间，不愧为速战速决的范例，赵匡胤所处地位非曹丕可比，哪有三劝三让的时间?即使陶谷没有备好诏书，也会照禅不误。只要真当了皇帝，还怕臣下不会补这个漏洞？不过，曹丕辞让的话表面虽然谦虚之极，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过分，其实却是用心良苦。他列举自己很多德薄的事实，实际

正是为了封天下人的口。因为孙、刘未灭，天下未定，百姓饥寒等等完全是事实，而祥瑞、符谶之类是如何出笼的，曹丕心中也是一清二楚，他自己都说了，并且直指群臣的称颂为假话，反对者反而无话可说了，似乎他真的是身不由己。这种以假为真的手段不愧是乃父曹操的真传，后人如果只以虚伪视之，倒是辜负了曹丕的一片苦心。

赵匡胤曹丕的禅让戏演得成功，也离不开汉献帝的配合。虽然献帝除了俯首帖耳外已别无选择，但真要干出些不合作的事来，也会大煞风景。如曹丕的孙子曹髦，因为不甘心当司马昭的傀儡皇帝，竟不顾一切，率领数百侍卫讨伐。结果曹髦被当场杀死，但司马昭不得不装模作样惩办凶手，代魏的日程也因此而推迟。作为酬谢，献帝也获得了曹魏的优待，让位后被封为山阳公，封邑有一万户，14年后寿终，获得“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75年，西晋时依然沿袭，直到永嘉之乱。或许是对曹魏的报答，禅位于司马炎的曹奂也当了37年的陈留王，得以善终。相比之下，其他禅位的君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们同样采取合作态度，有的还十分主动。如东晋的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接到臣下起草的禅位诏书后毫不犹豫地签字，还说：“晋朝早给桓玄灭了，多亏刘公（宋武帝刘裕）才延长了二十年，今天让位我心甘情愿。”而且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不再承认自己是皇帝了。刘裕封他为零陵王，规定可以享受皇帝的礼仪和亲王的待遇，实际却是一句空话。司马德文深知刘裕不怀好意，整天与妻子褚后生活在一起，饮食都由褚后料理，刘裕一直无法下手。到了第二年九月的一天，就派褚后的哥哥褚叔度找她说话，士兵趁机翻墙闯进内室，将司马德文杀死。此后禅位的尧、舜们几乎没有一位不死于非命，甚至禅位的第二天就被杀。可见他们再能识天命也无济于事，只要新皇帝感到前朝的威胁就会毫不迟疑地斩尽杀绝。从这一点说，“汉魏故事”也是禅让史中少有的。

第五章

刘邦得天下一个当初混迹街头的混混，如何能够成为九五之尊呢？

刘邦登基以项羽在乌江畔悲惨自刎为标志，在秦朝灭亡后的四年里进行的楚汉战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结果是以刘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其实，刘邦原刘邦像本只是地方上的一个小混混，他又为什么能够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呢?

尤其是数千年来，人们似乎更加看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刘邦以一个既无才又无德的人，究竟为什么能够战胜如此英雄的楚霸王呢?这个问题，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争论着。

公元前202年正月，由楚王韩信领衔，群臣共同上书，推尊刘邦为皇帝。二月，刘邦正式即位，定国号为汉，定都长安，正式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汉高祖登基之后，命令分封的八个王回到自己的领土之上，并实行裁军，安抚百姓，优待官员。这样，文武百官和黎民百姓皆大欢喜。汉高祖执政后，继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还根据多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等实际状况，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对汉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皇帝的问题初谋国事时，汉高祖刘邦确实很忙，忙了好几个月，等待稍有头绪时，他在洛阳的南宫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招待群臣。刘邦在宴会上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请各位畅所欲言，不必有什么顾忌。刘邦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得天下，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

大臣们听高祖说畅所欲言，于是也就随便说起来。王陵先站起来说，陛下待人一向傲慢，不如项羽待人宽厚。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每次胜利后，都有封功行赏，和天下人共同得利。可项羽嫉妒贤能，打了胜仗也不赏功，得了土地更不封赏。所以他不得民心，故而您得了天

下，项羽失了天下。

汉高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得失的根本原因，应该从用人上说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率兵攻打，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能够为我所重用，所以我能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而且还不能被项羽重用，很是凄苦，所以项羽最终被我打败了。"

参加宴会的群臣听了高祖的话，无不表示赞同，连连称是。看来，刘邦还真的十分明白自己的优点与劣势，对自己有一番正确的评估呢!

历史的必然的确，汉高祖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从善如流，扬长避短。他不但在楚汉之争中有贤相辅佐，有良臣猛将为他卖命，从而使自己的力量日益增强，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而且在汉朝建立后，他能够从秦亡的教训中总结经验，知道暴政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和国家基业的损害，从而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重新恢复巩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汉高祖刘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人善用，颇有建树的杰出政治家。

而反观项羽，其实在楚汉之争初期，他占有绝对优势，且自身具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素养。可惜项羽肚量太小，不能善于重用人才，导致原本依附他的精兵强将到后期都纷纷投靠刘邦，而且项羽善于妒嫉，实非帝王之才。所以，到头来，落得个拜别虞姬，在乌江畔挥剑自刎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本拥有非常听从他命令的楚军，可是屡战屡败后，楚军思念家乡，又被刘邦的"四面楚歌"之计策搞得人心惶惶，无心恋战。项羽到最后终于是功亏一溃了，历史不容假设，刘邦得天下，项羽失天下，归根到底，是历史的必然。田横和五百义士五百义士慷慨赴死，留下了千古悲歌。

郦食其被烹田横，是战国时齐国的贵族，他和自己的兄长田儋、田荣一起，起兵抗秦，其中，田儋自称为齐王，领导着这支起义队伍。

公元前208年，田儋被章邯所杀。田荣和田横决定立田儋之子为齐王。这时，项羽已经得了关中，大封功臣，他自称为西楚霸王。但是，

由于项羽怨恨田荣和田横，就没有封他们的王，而是将原来齐国的领地封给了另一个人做齐王。田横兄弟二人很不服气，就杀了项羽分封的齐王，田荣自立为王。

公元前206年八月，项羽讨伐齐国，田荣兵败身亡。田横又立了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

在楚汉之战中，双方多次争夺的战略要地有两个：一是荥阳，二是成皋。成皋的粮食是天下粮仓中存粮最多的，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公元前204年，刘邦再次被项羽赶出了荥阳城，失去了这座具有重要意义的城池，可赵和梁两地被韩信和彭越攻取了，于是项羽出兵去救援这两地，因而只留了很少的兵力镇守在成皋。郦食其建议刘邦说，这是天下给汉的大好时机，力劝刘邦尽快收复荥阳，占据成皋粮仓。而自己稍后则会游说齐王，让他发兵助汉攻楚。刘邦思前想后，同意了郦食其的建议，收复了成皋粮仓。

与此同时，郦食其来到齐国。对齐王田广细说利害关系，对比刘邦和项羽的为人处事和功过是非，论证了天下所在，归汉不归楚的道理，齐王田广接受了郦食其的意见，撤除了战备，每天和郦食其一起饮酒高歌，纵情欢唱。

五百义士郦食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不费一兵一卒，说服了齐国，这消息传来，激怒了韩信。他率兵攻打了齐国，趁齐王和郦食其饮酒作乐时长驱直入。到达了齐国都城临淄城下，齐王田广以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对他怒道：“你若能制止汉军，就能活命，否则我就把你煮了。”韩信的攻打是出乎郦食其意料的，他哪里能阻止韩信呢？于是只好自认倒霉，被田广烹杀，壮烈地死去了。

郦食其的悲剧，其实本不该发生。假如刘邦能及时下令，让韩信不要攻打齐国，假如韩信以国事为重，停止攻打齐国，就不会让郦食其面临这样的结局。造化弄人，一介书生的郦食其和野心勃勃的韩信，在名利场上，可谓是水火不容的。韩信要逞武功之强，就容不得辩士郦食其的口舌之术，可如果从郦食其身上检讨，如果他完成使命后，马上回去复命，不饮酒作乐，也就可以避免这悲剧了。郦食其错过了生存的机

会，高阳酒徒最终栽在了酒上。

辩士郦食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为刘邦建汉立下了大功，最终也败在了自己这张嘴上，可悲可叹！

逃避到孤岛上公元前204年11月，韩信攻破了齐楚联军，杀了齐王，田横败走。这一次，终于自立为齐王。后来，田横又败给了汉军的将领灌婴，只好投归了彭越。

公元前203年，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封彭越为梁王，促使彭越进攻项羽。项羽在垓下之战输了之后，田横害怕刘邦报复自己，就带着仅剩的五百名将士，一起逃到了东海的一个孤岛之上，这就是后来的田横岛。

田横躲在孤岛上，过着艰苦的生活。可他带领的这五百人，却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在刘邦看来，田横平时很得人心，如果他以后再趁机叛乱，就会给刘邦带来很大的麻烦。于是，刘邦派使者去田横所在的孤岛传达命令，让他们归降汉朝，并说前尘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归顺，就可赦免。田横和五百将士一起商议投降的事宜。大家都认为刘邦心胸狭窄，不能投降。田横于是拒绝了刘邦的使者提出的投降的要求，他说："我的族人杀了郦食其，现在他的弟弟郦商当了汉朝的将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请告诉汉王，我愿意长期在这海岛上做个普通百姓。"

使者回到京城，将田横的话汇报给刘邦。刘邦召来郦商，对他说："如果齐王田横归顺我大汉，有人敢动他或者他的手下，我一定诛灭他全族。"于是，刘邦再次派人来到田横的海岛上，对田横说："只要你们立即前去见皇上，就可以封王封侯，如果不来，就会发兵来讨伐你们，这可是皇上的特诏。"田横仔细思量，觉得一个小岛上居住五百人，实在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不如趁此机会前往京城去探探虚实。众人听说田横要去京城，都说要和他一起去。田横很是感动，对大家说："并不是我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去，而是如果大家同去，人数太多，反而会引起误会。我一个人去，如果确实能够受封，就回来接你们。"说完，他就带了两个门客，跟着刘邦的使者一起前往洛阳。

田横自刎到了尸乡(今河南偃师县以西)驿站，田横停下来对使者

说，做臣下的要见皇上之前，都应当沐浴更衣，以示敬意。于是，汉使暂时离开，让他沐浴。等汉使走后，田横对两个门客说，我和汉王都曾经是王，如今他做了皇帝，我却成了俘虏，要我去朝拜他，这样的耻辱我实在无法忍受。再者，我的族人以前杀了郦商的哥哥，现在让我跟他一同侍奉刘邦，就算是他不敢加害于我，我也感到惭愧。我现在已经家破人亡了，死也就死了。汉王叫我来，无非是要见见我的容貌。这里离洛阳很近，你们割了我的头，快马送去，他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说罢，他不顾手下人的阻拦，就拔剑自刎了。

两个门客悲痛异常，他们含泪遵命，包了田横的头去见汉高祖。刘邦感慨道："唉，真了不起。他们弟兄三人先后为齐王，很不简单啊。"随后又拜田横的两个门客为都尉，像对待国王的礼节一样，把田横厚葬。葬礼完毕，两个门客在祭拜过田横后，就在坟边自行挖了两个坑，双双自刎而死。刘邦听说后，大为吃惊，感到很费解，不明白他们和田横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厚的情谊。汉高祖又想起海岛上还有五百个这样的义士，就再一次派使者到海岛上，想赶快召他们回来。

五百人的集体自杀使者到了海岛，传达了刘邦的命令，让他们快去洛阳，与田横同享荣华富贵。这五百人听了将信将疑，来到洛阳后，他们见田横已死，就一同来到田横的墓前，边祭拜边痛哭，还一起唱了一首曲调十分悲哀的歌。唱完，他们伤心欲绝，又没有能力反抗，又不想投降，终于也全部自刎去追随田横了。

刘邦闻听了使者的报告，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不理解，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忠义的人呢?这五百人怎么可能竟然全都一条心，竟全都自杀了呢?像他们这样的忠义之士，如果能够归顺汉朝，将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如果他们坚持不肯投降的话，还真是汉朝的一大心腹之患。现在，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刘邦总算是消除了这块心腹之患。最后，他在感慨之余，命令手下士兵把这五百人全部厚葬。

于是，后人为了纪念田横和这五百个义士，就把他们居住过的海岛，称为田横岛。博士叔孙通当君臣之间太过随便的时候，就需要一定的礼仪了。

礼乐制度的必要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天下初定，各路诸侯共同推举刘邦为皇帝。这原本就是刘邦梦寐以求的事，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可刘邦只是一个市井出身的粗人，他没有想到，原来即位当皇帝还挺不容易的，需要有一套君君臣臣的严格的等级礼仪。一向懒散放纵惯了的刘邦对此感到很不适应，他不愿意受秦始皇所执行的那种严格的繁文缛节的约束，于是就要求简便行事。但是他手下那些草莽出身的英雄们本来就不太守法纪，现在更是忘乎所以，公然在宴会上饮酒争吵，相互邀功，吵得不可开交。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喝醉了酒后还大发酒疯，狂呼乱骂，拔剑相击，几乎要动起手来，闹得一塌糊涂，天翻地覆。一旦这些人喝醉了，就连一国之君的刘邦也觉得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这才深刻地意识到，战争时期处理问题的办法在建国后已经不再适用了，现在需要的是大力整顿政府，赶快制定出一套新的更适用的朝法礼仪和礼乐制度。

被刘邦选中制定这个礼仪和制度的人，不是人们所熟知的丞相萧何，也不是神机妙算的留侯张良，而是一个阅历丰富，人情练达的儒生，这个人就是叔孙通。

善于察言观色的书生叔孙通是鲁国地区人，鲁国是先圣孔子的故乡。儒家学说的发祥地。那里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造就了一代代数不清的儒家英才，使儒学在那里得到了一脉相传的发展。尽管秦始皇曾经杀害了一大批“以文乱法”、“是古非今”才女的迂腐儒生，并且实行了禁书的政策，不准民间私自藏有诗书，但他仍然在朝中设立了博士官，博士官所用的书也就不在禁毁之列了。

叔孙通知道国家马上就要有大乱，彻底对秦二世放弃了幻想，找了个机会逃回故乡，先是投奔了项羽，后来又在楚汉之争时归顺了刘邦。

叔孙通和其他只会背诵经书、不达时务的儒生不同，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人的心思，也懂得投其所好，见机行事。在跟随刘邦后，他探知刘邦讨厌戴高冠的博士装束，就立即将自己的服饰改成短衣，以此博得刘邦的欢心。在楚汉争霸的关键之际，刘邦最需要能征善战的人，他又向刘邦推荐了很多勇士。因此，刘邦封他为博士，号稷嗣君。所以，史书上记载，叔孙通既是秦末的最后一个文学博士，也是汉代的

第一个儒学博士。正是因此，刘邦即位后，领悟到只有儒生才能为自己制礼作乐、整顿纲纪。于是就自然地重用了通达世情、懂得自己心思的叔孙通。

于是，叔孙通揣摩着皇帝的心意，率领一班弟子和鲁国的儒生，杂糅古礼和秦朝的礼仪，因地制宜，删繁就简，创制了汉代开国之后的第一部礼乐大典。公元前200年，长安城中的长乐宫落成，群臣齐来朝见，第一次施行了叔孙通等人制定的汉代礼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详细史料记载的朝拜仪式。

皇帝的威严据载，这天天刚擦亮，宫廷中的礼官就带领着群臣次第步入殿门。廷中陈列着车骑步兵卫队，设置了各种武器和各色旗帜。在一声传呼令中，殿下数百官员站立在台阶两旁，武将立于西边，文官立于东边。刘邦则乘舆出现，百官都举着旗帜，左右侍卫高呼“皇帝驾到”，于是诸侯王以下依次奉贺，场面十分壮观，气氛肃穆，诸侯王、文武百官，无不震恐。大礼古代画扇完毕，又大摆宴席，殿上的臣子们都俯身俯首，按照尊卑的次序先后上朝。如果有不懂礼仪的，当即押下去法办。整个宴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尊卑有序，没有人再敢任意地在此时高声喧哗。

刘邦看到这种情景，不禁感慨道，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于是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专职制定礼仪。这时，叔孙通趁机进谏，为参与制礼作乐的弟子们和儒生们求官。素来鄙视儒生的刘邦在高兴之余，接受了叔孙通的请求，拜封儒生为郎。先前不理解叔孙通、甚至埋怨他的儒生们也终于心悦诚服，称赞他是圣人。

叔孙通后来官至太子太傅，在刘邦犹豫太子的改废之事时誓死捍卫太子，为汉惠帝立下了大功。惠帝即位后，叔孙通继任太常之职，所以汉初的各种礼仪制度，皆出自叔孙通之手。司马迁曾评价叔孙通为“汉家儒宗”。纵观叔孙通一生的为人处世和他的功业，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叔孙通和他的弟子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汉代儒学的先声了。儒生不可轻视天生讨厌儒生的刘邦，偏偏又离不开他们。

面对书生的鼾声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

好吃懒做，游荡成性，从不读诗书文章。在楚汉战争中，虽经文武大臣们给他推荐了几个读书人，也是必须经过实践，亲眼看到确有才学方受重用的。就刘邦本人而言，他是不喜欢读书人的。他常常用“我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得天下”为口头禅，轻视儒生。为此，当秦朝博士叔孙通投靠刘邦时，因他素知高祖不喜儒生，便改着短衣，装扮成武士；进见高祖，取得高祖欢心才被受封为博士的。

楚人陆贾，对刘邦轻视儒生很不以为然，便常常乘进见刘邦时，谈诗论书，引经据典，津津有味。每到此时，刘邦听后，心中十分讨厌，但又不便发作，便佯装熟睡，呼声充耳。有一次，正值高祖心中烦躁，陆贾来到面前，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高祖一听便恼，高声向陆贾怒骂：“我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你整天谈诗论书有什么屁用?”

陆贾的三寸不烂舌陆贾并不惧怕，反而正色答道：“马上夺得天下，难道马上还能治天下么?据臣所了解，商汤、周武都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后来治理国家，却是以加强文化思想教育，才达到长治久安的。相反，秦朝统一六国取得天下之后，仍然任性好杀，便有焚书坑儒，草菅人命，才引起民愤，群起而攻之，最后导致灭亡。陛下不妨想想看，假如秦朝以武力夺取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周、汤，您又怎么能达到灭秦亡楚而取得皇帝的位子呢?”一席话，说得刘邦默言无语，慢慢低下头来，暗自生愧。他又想到，南粤赵佗，自中原大乱以来，多年称王，至今未能平服。前一段又听说赵佗想称皇帝，与刘邦抗衡。刘邦心感不安，便派陆贾前去安抚。陆贾去南粤，一刀一枪未动，只凭三寸不烂之舌，陈述利害，晓之以理，使得一个蛮横猖獗的赵佗，五体投地，备受感动，自愿称臣，遵奉汉约，并取出越中珍宝，价值千金，作为赆仪。这是何等的能耐?看来，武略文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刘邦想到这里，慢慢抬起头来，很是抱歉地说：“爱卿说得极是，请你为朕办一件事好吗?”

陆贾道：“陛下请讲。”

刘邦道：“你可将秦是如何失天下，我是如何得天下，分条解释，并用周汤以来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加以证明，找出真切的原因，著成一书，使子孙们代代相传，引为借鉴。”陆贾奉命出朝，认真写作，辑

成12篇，尔后呈高祖过目。高祖看后，篇篇叫妙，并把该书命名为《新语》。从此，高祖刘邦对文治的作用加深了认识，也不像以前那样轻视儒生了。韩信之死一代名将韩信，最终却死得不明不白。

改封淮阴侯项羽兵败后，他的逃亡将领钟离昧因素来与韩信关系很好，就投奔了韩信。刘邦记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就下令楚王逮捕他。那时韩信初到楚国，到各县乡邑巡察进出都派军队戒严。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的计策，说天子要出外巡视会见诸侯，通知诸侯到陈地相会，说："我要游览云梦泽。"其实是想要袭击韩信，韩信却不知道。刘邦将到楚国时，韩信打算起兵谋反，但又认为自己无罪，想去谒见刘邦，又怕被擒。这时有人向韩信建议："杀了钟离昧去谒见汉高祖，高祖必定高兴，也就不用担心祸患了。"于是韩信把此事与钟离昧商议，钟离昧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看来你也不是位德行高尚的人。"结果钟离昧自杀而亡，韩信持钟离昧首级去谒见刘邦。刘邦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韩信说："果然就像人家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所以我也应该死了!"高祖刘邦却说："我抓你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反。"说完就给韩信戴上械具。回到洛阳，刘邦没有马上杀掉韩信，而是赦免了他的罪过，改封他为淮阴侯。

妇人的计策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深知高祖刘邦畏惧他的才能，所以从此常常装病不参加朝见或跟随出行。韩信由此日益怨恨，在家中闷闷不乐。韩信部将陈稀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辞去左右，拉着陈稀的手仰天长叹道："你可以同我说知心话吗?我有话想同你讲。"陈稀表示一切听从将军的命令。韩信说："你所管辖的地方，是聚集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稀平素就了解韩信的才能，相信他的计谋，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

韩信后来陈稀果然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前去征讨，韩信称病不随高

祖出征，暗地里派人到陈稀处联络，要陈稀只管起兵，自己定从京城策应。韩信与家臣谋划：可以在夜里假传诏旨，释放那些在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然后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部署已定，只等陈稀方面的消息。这时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囚禁了他并准备杀他。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事。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恐怕韩信的党羽不肯就范，于是与相国萧何商议，假装有人从皇上那里来，说陈稀已被杀死，诸侯群臣都前来进宫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道："虽然您有病，还是要勉强朝贺一下。"韩信入朝进贺，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缚起来，在长乐宫中的钟室里斩杀了他，并诛灭其三族。韩信临斩时说："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韩信是继战国时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作为统帅，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但人无完人，韩信在政治上犯有严重的失误，几次关键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妇人之手，后人评价韩信"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这话说得实在太对了。彭越被冤杀被剁成肉泥，做了人肉丸子，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彭越与刘邦的战争情谊彭越，昌邑人，别号彭仲。他常在钜野湖泽中打鱼，纠集了一帮人做强盗。陈胜、项梁揭竿而起时，有的年轻人就对彭越说："很多豪杰都争相树起旗号，背叛秦朝，你也站出来吧，咱们也效仿他们那样干。"彭越说："现在两条龙刚刚开始搏斗，还是等一等吧。"

过了一年多，泽中一百多年轻人，前去追随彭越，大家说："请你做我们的首领。"彭越拒绝说："我不愿和你们一块干。"这些人执意请求，他才答应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太阳出来集合，迟到的人杀头。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迟到的有十多人，最后一个人直到中午才来。当时，彭越很抱歉地说："我老了，你们执意要我当首领。现在，约定好的时间而有很多人迟到，不能都杀头，只杀最后来的一个人。"于是命令校长杀掉他。大家都笑着说："何必这样呢，今后不敢再迟到就是了。"但彭越还是把最后到的那个人杀了。设置土坛，用人头祭奠，号令所属众人。众

人都大为震惊，害怕彭越，没有谁敢抬头看他。后来他带领众人夺取土地，收集诸侯逃散的士兵，有一千多人。

沛公刘邦从砀北上攻击昌邑，彭越援助他。昌邑没有攻下来，刘邦带领军队向西进发。彭越也领着他的人马驻扎在钜野泽中，收编魏国逃散的士兵。项籍(项羽名籍)进入关中，分封诸侯后，就回去了。彭越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多人，却没有归属。汉王元年秋天，齐王田菜背叛项王，派人赐给彭越将军印信，让他进军济阴攻打楚军。楚军命令萧公角率兵古代名画迎击彭越，却被彭越打得大败。汉王二年春天，汉王刘邦和魏王豹以及各路诸侯向东攻打楚国，彭越率领他的部队三万多人在外黄归附汉王。汉王说：“彭将军收复魏地十几座城池，急于拥立魏王的后代。如今，魏王豹是魏王咎的堂弟，是真正魏王的后代。”就任命彭越做魏国国相，独揽兵权，平定梁地。

刘邦在彭城战败，向西溃退，彭越把他攻占的城池又都丢掉，独自带领他的军队向北驻守在黄河沿岸。汉王三年，彭越经常往来出没替汉王游动出兵，攻击楚军，在梁地断绝他们的后援粮草。汉王四年冬，项王和汉王在荥阳相持，彭越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邑。项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派曹咎驻守城皋，亲自向东收复了彭越攻克的城邑，又都归复楚国所有。彭越带着他的队伍北上谷城。汉王五年秋，项王的军队向南撤退到夏阳，彭越又攻克昌邑旁二十多个城邑，缴获谷物十多万斛，用作汉王的军粮。

汉王刘邦打了败仗，派使者叫彭越合力攻打楚军。彭越说：“魏地刚刚平定，还畏惧楚军，不能前往。”汉王刘邦举兵追击楚军，却被项籍在固陵战败。便对张良说：“诸侯的军队不跟着来参战，可怎么办呢?”张良说：“齐王韩信自立，不是您的本意，韩信自己也不放心。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战功累累，当初您因为魏王豹的缘由，只任命彭越做魏国的国相。如今，魏王豹死后又没有留下后代，何况彭越也打算称王，而您却没有提早作出决断，您和两国约定：假如战胜楚国，睢阳以北到各城的土地，都分封给彭相国为王；从陈以东的沿海地区，分封给齐王韩信。齐王韩信的家乡在楚国，他的本意是想再得到自己的故乡。您能拿出这些土地答应分给二人，这两个人很快就可以招来，即使不能来，事情发展也不致完全绝望。”于是刘邦派出使者到彭越那里，按照张良的策划行

事。使者一到，彭越就率领着全部人马在垓下和刘邦的军队会师，于是大败楚军。那年春天，封彭越为梁王，建都定陶。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彭越到陈地，朝见汉高祖。九年，十年，都来长安朝见。

残忍的惩罚汉十年秋天，陈稀在代地造反，汉高祖亲自率领部队前去讨伐，到达邯郸，向梁王征兵。梁王说有病，派出将领带着军队到邯郸。高祖很生气，派人去责备梁王。梁王很害怕，打算亲自前往谢罪。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当初不去，被他责备了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如就此出兵造反。"梁王不听从他的意见，仍然说有病。梁王对他的太仆很生气，打算杀掉他。太仆慌忙逃到汉高祖那儿，控告梁王和扈辄阴谋反叛。于是汉高祖派使臣出其不意地袭击梁王，梁王不曾察觉，被逮捕，囚禁在了洛阳。

经主管官吏审理，认为他谋反的罪证具备，请求皇上依法判处。皇上赦免了他，废为平民百姓，流放到蜀地青衣县。向西走到郑县，正赶上吕后从长安来，打算前往洛阳，彭越见到吕后就对着她哭泣，分辩自己没有罪行，希望回到故乡昌邑。吕后答应下来，还和他一块向东去洛阳。

可是到了洛阳，吕后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反而向皇上陈述说："彭越是豪壮而勇敢的人，如今把他流放蜀地，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杀掉他。所以，我带着他一起回来了。"于是，吕后就让彭越的门客告他再次阴谋造反。廷尉王恬开呈报请诛灭彭越家族，皇上就批准，于是诛杀了彭越，灭其家族，封国被废除。后来，刘邦为了杀鸡儆猴，还残忍的把彭越的尸体轧成肉泥，做成人肉丸子，送给那些开国功臣们吃，借此警告他们不要谋反。但是，刘邦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反而激起了更多功臣宿将们的恐惧和反感，以后起兵叛乱的人更多了。英布谋反一代英豪，却因为家庭琐事断送了性命。

不堪忍受，立誓报仇英布，是西汉刘邦时的一员大将，官封"淮南王"。替汉高祖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刘邦坐上皇帝宝座，吕后专权，大杀功臣，先杀了韩信，继而又杀死彭越，于是众叛山水田园亲离，仅有的几员战将都不免兔死狐悲，心中开始对刘邦不满，从此对朝廷怀有戒心。刘邦要保持皇帝的尊严，为使手下的臣子不生异心，他

就把彭越的尸身，用刀剁碎后，做成大小不同的人肉丸子蒸熟，用锦匣收藏，外面用黄绫子包着。他又下了一道圣旨，叫太监抱这些人肉九子分送部下众将，叫他们吃，吃了就是忠于他的；不吃，就说明心中有鬼，想用这个手段来威胁试探人心。

淮南王英布接到圣旨，当即撕毁圣旨，义愤填膺，要杀太监，太监再三哀求，才得以幸免。英布怒发冲冠，大骂刘邦黄面小儿，屠夫得志，立誓要为韩信、彭越等人报仇。当即设了几个被害者的灵位，发誓要讨伐刘邦。于是，英布扯起反汉的义旗，率20万人马，天天操练，只等时机成熟，一朝举事。

怀疑引发的悲剧正巧这时英布的一个爱妾生了病，经常到一个医生家里去看病。这个医生家对门住着一个叫贲赫的人，他想讨好英布，所以就在那个宠妾去医生家时，送一些贵重的礼物给她，还和她一起在家中喝酒。那个小妾回去以后，果然对英布称赞贲赫是一个诚实的长者。英布听了却大怒说："你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小妾很害怕，就向英布讲述了前后经过。英布还是不信，反而怀疑小妾与贲赫私通，于是就召见贲赫来问话。贲赫提前听说了这个消息，心里觉得很害怕，所以就假称有病不肯前去。这下子，英布更加愤怒了，下令要逮捕贲赫。可是这时贲赫已经连夜逃走了。后来，逃到了长安，向刘邦上书说："英布已经有了谋反的迹象，皇上应该先发制人，派兵去诛灭他。"刘邦问萧何的意见，萧何说："英布应该不会这么做的，这件事里面恐怕有个人的仇怨而诬陷的成分。还是先把那个告密的人抓起来，派人去暗中检查准南王的举动。"

而对于贲赫的逃走，英布早就怀疑他是去京城告发自己了。这时皇帝一派人来，英布验证了他的判断，马上诛杀了贲赫家族，并且起兵反汉。这反而证明了贲赫并非诬陷。

消息传到了刘邦的耳里，满城朝野震惊。原先的几个大将，均已死去，英布又是一员虎将，有勇有谋，不能轻视。刘邦遂命樊哙、曹参带兵60万，陈平为参谋，他御驾亲征，去攻打英布据守的九江；另一方面，暗地派一支人马到六安去捉拿英布的家小。

第六章

朋友的出卖王师很快到达九江境内，英布调集人马，与刘邦大小数十战，相持两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九江失守。英布兵败之后，只带着百骑，逃到夏江好友吴芮的总兵衙门。这时吴芮正好出外未归，衙门只有侄儿吴成。这吴成以前曾被英布奚落过，心中有气未平。今见英布兵败来投，心下暗喜：你这个红面贼也有今日？于是假装殷勤接待，伯父长、伯父短地叫个不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叔父虽然未回，对刘邦早已不满，伯父此来正好共同举起义旗。我这里人马虽不足五万，但个个骁勇善战，你老人家放心，刘邦绝不会追查到此。今夜侄儿摆下素酒，替伯父压惊，好好休息。”英布不知是计，且连日奔走，也确实疲劳，相信不疑，只顾喝酒。谁知这吴成早在酒里做了手脚，下了蒙汗药，英布带来的百骑士兵同时醉倒，人事不省。吴成一声令下，命军士将英布部下全部杀死。同时割下了英布的首级，用黄绫裹扎，再用木匣装好，连夜动身，去献给刘邦。

刘邦坐军中大帐，左有樊哙，右有陈平。士卒报夏江吴总兵的侄儿吴成带英布首级来献，刘邦将信将疑，他要亲自验看是真是假。樊哙当即奏上：“皇上不可，英布虎将也，苍促遇害，恐英魂不散，有伤龙体。”刘邦大笑道：“孤家自起兵以来，身经数百战，人头何只见过万千，我不信这红脸贼有如此厉害。”于是，吴成呈上木匣，取出英布人头，解开黄绫，刘邦果见是真，咬紧牙关，指头大骂：“红脸贼，你有王不做，要替什么韩彭报仇，他们早到阎王面前报到去了，你不是也去与他们作伴了吗?”骂罢命手下人将头剁碎喂狗。

不料这时，英布二目突张，黄须根根倒竖，口一张，一口血浆直往刘邦脸上喷来，刘邦吓得大叫，“啊呀”一声，往后便倒。众将将他扶起，抬入后营，速命随营太医救治。樊哙令手下将英布首级挂于鄱口示众。刘邦自此以后，得了个神昏颠倒不治之症，不几年就晏驾了。

且说吴芮回衙，得知侄儿将英布谋害，把吴成大骂一顿。见英布尸身尚未入殓，于是他辞官不做，好在他没有妻儿，瞒着侄儿吴成，带足

银两，将英布身边携带的一把剑收好，用布卷起英布尸体并头盔，放在马背上。来到湖北黄梅，再到英山，历时二十余天，来到英山尖，将英布的尸体葬在王家界“金盆架”。吴芮就在英布墓的近处盖了一座小庙，削发为僧，念经拜佛，为英布守墓超度，吴芮直到年迈体衰时，才收下一个徒弟，在临终前他告诉徒弟“金盆架”的墓中埋的是什么人，叫他莫忘师言，年年拜祭。

刘邦死后，儿子登基，是为“惠帝”。新皇即位追赠一批开国功臣时，其中就有英布的名字。不过，也有人说，英布是被自己的老丈人长沙王番君所骗，所以才被杀死的。而且，刘邦虽然剿灭了英布的反叛，但是自己却在战斗中中了一箭，受了重伤，回到京城后不久就不治而亡了。白登之围如何利用女人的弱点解救皇帝？

形势极其危险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力还很衰弱。经过了几百年连续不断的战争，人民一直颠沛流离，全国的经济状况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一直忙于安抚国内，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塞外的少数民族。这时，一直居住在长城北面的匈奴人就乘机南下，侵略中原，劫掠财物，还抓走了大量的百判案姓去做奴隶。公元前200年的冬天，警报又像雪片一样飞入关中，刘邦接到了边境又有匈奴人入侵的消息。这一次，他亲自统率着二十余万大军亲征。但是，刘邦在向北行进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的时候，却被匈奴冒顿单于率40万精锐骑兵包围在白登山(今大同市东面)，冒顿单于还派出大兵，分扎在各个重要路口，截住汉兵的后援，存心要把汉军一网打尽。高祖登上白登山的山头，向四面眺望，只见四面八方都有匈奴的骑兵屯驻把守着，实在没有办法突围。

走夫人路线当时正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不断。高祖刘邦和将士们都冻得手脚发僵。在被围了3天后，粮食也快吃完了，汉军饥寒交迫，危在旦夕。被围到第7天，一直跟随在刘邦身边的智多星陈平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知道冒顿单子对新得的阏氏(单于的王后)十分宠爱，朝夕不离。这次匈奴大军在山下扎营，冒顿单于还把阏氏带在身边，经常和她一起骑马出出进进，浅笑低语，情深意笃。于是陈平想到，冒顿单于虽然能出奇制胜，可也不免被妇人所惑，于是就想从阏氏身上打主意。他派遣使臣，乘着大雾的时候下山去拜见阏氏。这位阏氏听说有汉

军的使者，就悄悄地走到帐篷外面，屏退了左右，召见汉使。汉使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并且说是汉皇帝送给阏氏的，另取出一幅图画，说是汉帝请阏氏转给冒顿单于的。

阏氏毕竟是女流之辈，一见到黄金和珠宝，就目眩心迷，爱不释手，便收下了。再打开图画，只见画上绘着一个绝色的美女，心中不禁起了妒意，便问："这幅美人图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送给单于?"

汉使装出一副很虔诚的样子，回答说："汉帝被单于包围，非常愿意罢兵言和。所以把金银珠宝送给您，再请您代他向单于求情。可又怕单于不答应，就准备把国中的第一美人献给单于。因为美人现在不在军中，所以先把她的画像呈上。"

阏氏微怒地说："这个用不着，赶快拿回去吧!"汉使说："汉帝也觉得把美人献给单于，怕会夺了单于对您的宠爱。可是事出无奈，只好如此。如果您能解得了我们的围，那我们当然不会把美人献给单于了，情愿给您多送点金银珠宝。"阏氏说："请你回去告诉汉帝，尽管放心好了。"说完，将图画交还给使者，让使者回去了。

阏氏心想，如果汉帝不能突围，就会把美女献给单于，那时我就要受冷落了。于是，她回到后营，就对单于说："军中得到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单于问："有这样的事?"

阏氏回答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也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

说到这里，阏氏泪如雨下，呜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单于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于是问："那怎么办呢?"

阏氏说："汉帝被围了7天，军中始终没有什么慌乱的迹象，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虽有危险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单于将信将疑，可是又怕惹阏氏不高兴，便在第二天，传令把

围兵撤走了。陈平用这条妙计，终于骗得匈奴退兵，刘邦总算逃出重围，一场大难消于无形之中。萧何的结局韩信等人纷纷被杀，而另一位功臣萧何又如何了呢?

第一次危机众所周知，萧何是汉朝的第一任宰相，是辅佐刘邦创立汉室天下的第一大功臣。刘邦即帝位以后，论功行赏，就把萧何排为第一。但是最后还是被刘邦怀疑，险些丢掉了性命。试问，刘邦当上了皇帝之后，大杀功臣，他又怎么能独独落下萧何一个人呢?

在萧何帮助吕后诛杀了韩信以后，终于消除了刘邦的心腹大患。刘邦因此对萧何更加恩宠，除了给萧何加封外，还派了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相国的护卫。很多人都来祝贺，萧何自己也非常高兴。当天，萧何在府中摆酒庆贺，喜气洋洋。突然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穿着白衣白鞋，进来吊丧。萧何见状大怒，召平对萧何说："相国，您的大祸就要临头了。皇上在外风餐露宿，而您长年留守在京城，您既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勋绩，皇上却给您加封，又给您设置卫队，这是由于最近淮阴侯在京谋反，因而也怀疑您了。安排卫队保卫您，这可不是对您的宠爱，而是为了防范您。希望您辞掉封赏，再把全部私家财产都捐给军用，这样才能消除皇上对您的疑心。"

萧何听从了他的劝告，刘邦果然很高兴。

第二次危机同年秋天，英布谋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他身在前方，每次萧何派人输送军粮到前方时，刘邦都要问："萧相国在长安做什么?"使者回答，萧相国爱民如子，除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刘邦听后总默不作声。使者回来后告诉萧何，萧何也没有识破刘邦的用心。

有一次，偶然和一个门客谈到这件事，这个门客忙说："这样看来您不久就要被满门抄斩了。"萧何大惊，忙问为什么。

门客说："您身为相国，功列第一，还能有比这更高的封赏吗?况且您一入关就深得百姓的爱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百姓都拥护您，您还在想尽办法为民办事，以此安抚百姓。现在皇上萧何所以几次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借关中的民望而有什么不轨行动啊!如今您何不贱

价强买民间田宅，故意让百姓骂您、怨恨您，制造些坏名声，这样皇上一看您也不得民心了，才会对您放心。”

萧何长叹一声，说：“我怎么能去剥削百姓，做贪官污吏呢?”门客说：“您真是对别人明白，对自己糊涂啊!”萧何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为了消除刘邦对他的疑忌，只得故意做些侵夺民间财物的坏事来自污名节。不多久，就有人将萧何的所作所为密报给刘邦。刘邦听了，像没有这回事一样，并不查问。当刘邦从前线撤军回来，百姓拦路上书，说相国强夺、贱买民间田宅，价值数千万。刘邦回长安以后，萧何去见他时，刘邦笑着把百姓的上书交给萧何，意味深长地说：“你身为相国，竟然也和百姓争利!你就是这样‘利民’啊?你自己向百姓谢罪去吧!”

刘邦表面让萧何自己向百姓认错，补偿田价，可内心里却窃喜。对萧何的怀疑也逐渐消失。镇国家、抚百姓的萧何，违心地干了侵害百姓的事情，心中很不安，总想找机会补偿百姓。

第三次危机不久，萧何看到长安一带耕地狭小，百姓缺衣少食，可是天子的上林苑中却有许多闲着的荒地用来放养禽兽。萧何觉得太浪费了，便上奏请刘邦把这些荒地分给百姓去耕种，收了庄稼留下禾杆照样可以供养禽兽。

刘邦当时正在病中，见了这道奏章，觉得萧何是想借此事来讨好百姓，一怒之下，命令将萧何抓起来。满朝文武都怕连累自己，不敢替他申辩。幸亏有一个王卫尉，平日敬佩萧何的为人，在侍卫刘邦时顺便向刘邦探问：“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刘邦说：“不要提他!提起他我就生气。当年李斯当秦朝丞相时，做了好事都归君主，出了差错就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萧何受了商人的许多贿赂，竟要求我开放上林苑给百姓耕种，这分明是想讨好百姓，自己得个好名声，不知道把我看成什么样的君主了。所以我才要把他关起来。”

王卫尉说：“办事忠于职守，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为民请命，这是相国应该做的事啊!陛下怎么能疑心相国是收了商人的贿赂呢?当初您与项羽相争数年，后来陈稀、英布谋反，陛下亲自上前方征讨。由萧相国镇守关中，他若想取得关中，不过举手投足之劳。萧相国对古代名画这样

的大利尚且不图，难道今天会贪图商人的一点贿赂吗?何况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皇听不见臣下对自己过失的批评，才一意孤行。李斯即使能承担过错，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您这样怀疑相国，一定是没有仔细考虑吧!”

刘邦听了，心里虽不高兴，但想想王卫尉的话毕竟有些道理，所以当天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赦免了萧何。

萧何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对刘邦素来谨慎恭敬。虽然因为全身带上刑具，害得他手足麻木，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而且蓬头赤足，秽污不堪，但又不敢回府沐浴再朝拜天子，只得这样来上殿谢恩。刘邦见萧何这个样子，也觉得过意不去，便安抚萧何道：“相国不必多礼。这次的事，原是相国为民请愿，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无道天子罢了；而你却是个贤德的丞相，我之所以关押相国，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你的贤能和我的过失啊!”刘邦的这段话虽然言不由衷，但对萧何的廉正为民，终于还是默认了。从此以后，萧何对刘邦更是诚惶诚恐，恭谨有加了。刘邦也照旧以礼相待。但萧何从此对国事总是保持着沉默寡言、小心翼翼，总算是得了一个善终。汉高祖不敢改立太子刘邦威武一世，在立嗣的问题上，却不得不忍气吞声。

有了改立太子的想法汉高祖刘邦从一介小吏奋死拼杀，终于开创了大汉帝国，当上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在他进入暮年之时，手握大权，身边伴着娇妻美儿，朝中又有许多贤臣辅佐，国泰民安，尽享富贵，正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是就在刘邦觉得万事顺心的时候，仍然有一件事情总是横亘在刘邦的心头，让他想咽也咽不下去。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如此烦心而又无法解决呢?

风景画鉴赏原来，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立了他和皇后吕雉所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这就是以后的汉惠帝。然而刘盈从小就和父亲分离，父子俩的感情十分生疏。刘邦虽然因为他是正妻所生而立了他为太子，可却始终感觉刘盈为人过于“仁弱”，恐怕不能成大事，当一个合格的一国之君。于是，他几次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可最后终究没敢改立，这就是刘邦终其一生最为遗憾可又无力改变的事。

刘盈出生之时，刘邦还是秦朝的泗水亭长，因为私自放刑徒逃亡而犯了杀头大罪，从此抛家弃儿，亡命天涯。父子俩这一别，就是两年。公元前209年，刘邦在沛县起兵时，他们父子有过一次短暂的相逢。此后刘邦转战南北，又是三年未曾与儿子相见。楚汉战争爆发时，刘盈得以与父亲同行，当时楚军在后面追得很紧，于是刘邦几次把同坐一辆车子的刘盈推下车，以加快逃亡的速度。由此看来，刘邦对待刘盈可以说很冷淡，根本看不出什么父子之情。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分离造成的，也是刘邦想改立太子的原因之一。刘邦当了皇帝以后，非常宠爱戚夫人。据说这戚夫人貌美如花，深得刘邦喜爱，传说刘邦时常当着大臣的面，也还把她抱在怀里不愿放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就是赵王刘如意。刘如意聪明伶俐，坚决果敢，常在刘邦身边撒娇，使他深深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刘邦总觉得如意才像是自己真正的继承人。戚夫人也自然明白母以子贵的道理，如果如意能被立为太子，日后自己就是皇太后。这样，善于妒嫉的吕后也就无法再加害自己了。于是，戚夫人日夜恳求刘邦改立如意为太子，废掉刘盈，有时甚至哭泣相求，刘邦禁不住她这样哭泣，于是打起了改立太子的主意。但是，他的开国重臣们却极力反对刘邦改立太子的打算，有的人甚至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地说：“臣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绝不奉诏。”于是，在群臣的反对声中，刘邦只得暂罢此项动议。

“四皓”出山保太子这时，吕后知道刘邦宠爱戚夫人到了极点，说不定真的会改立太子，她非常害怕刘盈的太子之位不保，自己也会遭人暗算。于是，她恳求刘邦最器重的谋士张良出面相助。张良知道刘邦很尊重“四皓”，曾经多次请四皓出山，但都被拒绝了。张良建议吕后说，如果能请四皓来辅佐太子，一定能保住太子之位。吕后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恳请四皓出山辅佐。四皓深受感动，终于答应出山辅佐刘盈，使他在处理问题时与太子的地位非常相称。这样，刘盈的太子之位才渐渐稳固了。

风景画鉴赏公元前194年，异姓王韩信、彭越均被诛杀，淮南王英布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了。他暗中聚集军队，以防不测。可是，英布的中大夫及时地向刘邦密告了英布想谋反的消息，刘邦立即派人调查，结果反而逼得英布提前造反。刘邦亲自率兵平定这些功臣们的叛乱。两军大战之时，英布大败而逃，刘邦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一年后，刘邦伤

势加重，一病不起，就更想赶紧废掉刘盈，在他死前，把如意立为太子。大臣们全都据理力争，甚至以死相谏，刘邦就是听不进去。后来还是因为四皓出面，才使刘盈再一次转危为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一次家宴中，刘邦命令刘盈出席陪同。入席时，他发现刘盈身后有四位八十多岁的白发苍苍的老翁，正是自己平素最敬重的四皓，于是大吃一惊。刘邦询问他们为何不接受自己的邀请，反而甘愿辅佐刘盈?四皓回答说：“陛下从来没瞧得起儒生，经常侮辱取笑读书人，不尊重知识礼仪。而太子敦厚仁慈，聪慧贤明，虚心求教，所以我们愿意辅佐他治理国家。”刘邦看到刘盈既有大臣拥护，又受高人指点，羽翼已经丰满。如果自己再强要改立太子，势必引起流血斗争，于是从此不再谈改立太子之事。

此外，刘盈的舅舅吕泽、姨夫樊哙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他们在朝中都拥有很大的势力。刘邦要更换刘盈改立如意，刘盈母家这一关就很难通过。刘盈的母亲吕后，跟随刘邦平定天下，也掌握着很大的政治权力，是汉朝宫廷的第二号人物。如果刘邦不听劝谏，执意改换太子，恐怕会引起夫妻反目，发生宫廷政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到头来，赵王如意的太子地位仍不稳固，而且必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刘盈身后的强大势力，也是让刘邦止步、不敢更换太子的另一重要原因。

尽管刘盈有大臣支持，四皓辅佐，外戚拥护，保住了太子之位，并即位登基，成为历史上的汉惠帝。但是，刘邦的确没有看错，惠帝实在太过懦弱，不敢过问朝政，听凭母亲执掌大权，使汉朝在刘邦开国后就笼罩在后宫乱政的阴影之下，而他自己却因为贪于淫乐而早早去逝了。由此可见，他当太子的确是不合适的。同样，赵王如意和其母戚夫人，由于这次争立为储的事件，不但未能如愿，反而落得个凄惨而死的下场，这恐怕是刘邦死后最不能瞑目的事了。白马之盟为了遏制吕后，才立此盟约，但是真的管用吗？

无法挽回的局势汉高祖刘邦晚年的时候，宠爱戚夫人。戚夫人生了孩子，叫做刘如意，被封为赵王。汉高祖总是觉得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生性软弱，怕他将来干不了大事，倒是如意说话做事都很像自己，有帝

王风范，很有魄力。因此就想改立如意为太子，而戚夫人也是经常向汉高祖吹枕边风，要求立如意为太子。

汉高祖刘邦曾经为这件事跟大臣们商量过，但是大臣们都反对，就连他一向敬重的张良也帮着吕后和刘盈。吕后还请了当时很有名望的四个隐士叫“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刘盈。这让汉高祖很是惊讶，平素里自己多次相邀，四皓都不出山，此时却义无反顾地支持太子刘盈。于是汉高祖知道没法废掉太子，就对戚夫人说：“太子有了帮手，翅膀已经长硬了，没有法子改变了。”戚夫人也伤心得没法说，只得哭泣。

汉高祖在讨伐英布的时候，胸部中了流箭。后来，伤势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有人偷偷地对他说：“樊哙(吕后的妹夫)和吕后串通一气，只等皇上一死，就打算杀掉戚夫人和赵王如意。”

汉高祖大怒，立即把陈平和将军周勃召进宫来，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到军营，立刻把樊哙的头砍下来见我。”

那时候，樊哙正带兵在燕国。陈平、周勃接受了命令，两人私下商量说：“樊哙功劳大，又是皇后的妹夫，咱们可不能随便杀他。这会儿皇上发火要杀他，以后万一后悔起来，怎么办?”两人商量了一阵，把樊哙关在囚车里，送到长安，后来果然被吕后释放。陈平和周勃也因此而逃过了一劫。

高山流水以白马为盟约汉高祖病情日益严重了，他把大臣召集在他跟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要大臣们歃血为盟。大伙儿当着高祖的面，歃了血，起誓说：“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违背这个盟约的，大家共同讨伐他。”这就是“白马之盟”的由来。其实，刘邦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防备吕后在自己死后大权独揽，坏了刘家的天下。他和吕雉作了几十年的夫妻，深知自己的妻子胸怀大志，野心勃勃，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还不至于出什么大乱子。但是自己死了以后，吕后的儿子登基作了皇帝，她成了太后，恐怕就无人能冶了。也正是因此，刘邦才打算废掉太子刘盈，其中也有防止日后吕后专权的意思。既然废太子的事不能成功，他也就只好另想办法遏制吕后了，于是就有了这个历史上闻名的“白马之盟”。

大臣们宣了誓，汉高祖才放下心。他的病越来越重了，不得不把吕后找来，嘱咐自己的后事。吕后问他：“陛下百年之后，要是萧相国死了，谁可以接替他?”汉高祖说：“可以让曹参接替。”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汉高祖说：“王陵可以接替。不过王陵有点直，可以叫陈平帮助他。陈平有足够的智谋，但是不能独当一面。周勃为人厚道，办事慎重，只是不大懂得文墨。但是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还是靠周勃。”吕后再问下去，汉高祖摇摇头说：“以后的事，就不是你能够知道的了。”

密不发丧背后的阴谋公元前195年，汉高祖死去。吕后把消息封锁起来，秘密把她的一个心腹大臣审食其找去，对他说：“大将们和先帝都是一起起兵的，他们在先帝手下已经不大甘心。如今先帝去世，更靠不住，不如把他们都杀了。”审食其觉得这事不好办，就约吕后的哥哥吕释之做帮手。吕释之的儿子吕禄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他的好朋友郦寄，郦寄又偷偷地告诉他父亲郦商。郦商得知这消息，赶忙去找审食其，对他说：“听说皇上去世已经四天。皇后不发丧，反倒打算杀害大臣。这样做，一定激起大臣和将军们的反抗，天下大乱不用说，只怕您的性命也保不住。”

审食其吓住了，忙去找吕后。吕后也觉得杀大臣这件事没有把握，就下了发丧的命令。大臣们安葬了汉高祖，太子刘盈即位，就是汉惠帝。吕后就成了太后。

汉惠帝的确是个老实无能的人，一切听他母亲吕太后作主。吕太后大权在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刘邦生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臣子们立下了“白马之盟”。可是死人还是斗不过活人的，苦心经营的刘氏天下，就这样一时间被吕后给篡夺了权力。自己的儿子遭到杀戮，太子即位后成为傀儡政权。这不得不说是汉高祖刘邦的悲哀。“白马之盟”的实际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吕后残杀戚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女人的手段竟然会这么残忍。

被变态管制的日子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五月十七日，刘邦的葬礼刚刚完毕，吕后就迫不及待地利用皇太后的权力，对戚夫人及其儿子刘如意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她先是命人将戚夫人投入永巷，“髡钳，

衣赭衣，令舂”。永巷本谓宫中三长巷。此处永巷指宫中监狱，专门用来幽闭宫女之有罪者。当时，凡是得罪了皇上、皇后或后宫总管的嫔妃、宫女都囚禁在这里。她们按原来的身份、地位和过失的轻重，分为三等：第一等是过失轻微的嫔妃和贴身宫女，主要做些轻巧的活计，如编织、缝纫、绣花及其他一些细活。第二等是过失中等的嫔妃和地位较高的宫女，主要承担稍重一些的活计，如洒扫、打水、洗衣、挑菜等。第三等是过失较重的嫔妃和地位低下的宫女，主要承担劈柴、和泥、舂米一类的重活。

在永巷负责监督的人，都是秦宫留下来的老宫女，她们原来也是从民间选来的美女，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机会亲近帝、后和太子，年龄大了以后，有的被赐给诸侯王，有的被放回原籍，有的就被分配到永巷。她们十几岁入宫，一直忍受着孤独和生理上的煎熬，心理上大都有些变态，非常妒忌那些受过皇上和太子宠爱的嫔妃，怀着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残忍地折磨这些犯了过失的嫔妃和宫女们。在她们的百般折磨和沉重的劳役之下，囚禁在永巷的嫔妃和宫女们一个个形容枯槁，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经受着炼狱般的身心摧残。

戚夫人被投入永巷后，按照吕后的吩咐，被拔掉头发，穿上褐色囚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铁链，栓在一棵树桩上，从事繁重的舂米苦役。

风景画鉴赏终于有了下手的机会有一天，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哀伤地唱道：“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至暮，常与死为伍!相隔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歌声传到了吕后的耳朵里，吕后大怒，骂道：“你还仗恃你的儿子不成?看我怎么整治你的儿子。”吕后说得出，做得到，先后三次派遣使者前往赵国，诏令赵王如意入长安。

惠帝刘盈仁慈厚道，听说赵王如意正赶往长安，心头一惊，料想赵王一到，太后一定不会放过。于是亲自带人到灞上迎接赵王，领着他一起入宫晋见太后，然后就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寝宫。自此以后，刘盈和如意同吃同住，一起饮食起居，吕后虽然想加害如意，可一时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十二月的一天，惠帝本想带如意一起出城打猎。但早晨起来以后，见弟弟睡得正香，就没忍心把他叫醒。想不到吕后早在盈身边安排了暗眼，很快就把赵王一人独居的消息通报上去。等惠帝打猎回来，如意已经七窍出血，死在床上。惠帝追悔莫及，抱着如意的尸体痛哭一场，命令按王礼厚葬如意，谥号为“赵隐王”，寓含如意的强勇和才华被隐没了，没有发挥出来就过早地遭人暗算。

刘盈对此事非常气恼，他刚刚即位不久，皇宫里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不祥的事，使他一连几天情绪低落，茶饭不香。他尽管知道谋害如意的元凶就是自己的母亲，但还是坚持暗中派人查明杀人凶手。

惨绝人寰的手段吕后毒死了刘如意，又想方设法残害戚夫人，她让人把戚夫人的手脚剁掉，挖去眼珠，熏聋双耳，药哑喉咙，然后扔进厕所里，名曰：“人彘”。过了数日，吕后派人召谕刘盈到永巷去观看“人彘”，以壮其胆气。惠帝刘盈不知“人彘”为何物，怀着满心的疑惑与好奇，跟着宦官来到永巷。

宦官指着厕所中的一个怪物说：“陛下，这就是‘人彘’。”惠帝朝里边望去，但见一个全无手足的、血肉模糊的肉团佝偻在那里，光秃秃的躯体上，有两处早已结了疤的血窟窿，下面张着一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几条白花花的肉蛆在那里爬来爬去。惠帝心里害怕，但又想知道这个从外形上看是个人的“人彘”是男是女，于是换个角度仔细望去，这才从裸露在外的乳房上分辨出是一个被伤残的女子，忙问身边的宦官此人是谁，宦官不敢说明，刘盈赦他无罪，宦官才小心翼翼地说出三个字：“戚夫人!”惠帝一听，当场惊昏过去。被抬回寝宫之后，变得神智恍惚，一会儿心中绞痛，只觉满腔悲愤，无处可申；一会儿又觉五脏六腑上下翻滚，作呕欲吐，连续几天不饮不食，又哭又笑，如痴如呆。

吕后听说后，悔恨不该让刘盈去看“人彘”，这不是害人反害己吗？但事已至此，只能命太医想尽一切办法诊治。刘盈吃了些安神解忧的汤药之后，这才感到有些清爽。

想到母后竟残忍地把先父爱妃害得如此凄惨，又哽咽不止，真是悲愤交加，因此派人去对吕后说：“这种事实在不是人干的，我作为太后的

儿子，没有脸再去理天下。今后朝廷庶政，就请太后自行做主吧。”

从此以后，刘盈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不再过问任何政务，自己戕害自己。由此可以说，吕后不仅害死了戚夫人和刘如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加害惠帝的凶手。

自此以后，西汉大权就理所当然地落到吕后手中。汉惠帝迎娶外甥女一个堂堂的皇帝如何做出有违伦理的事情？

太后的婚外情汉惠帝刘盈是西汉的第二个皇帝，他是刘邦的正妻吕雉所生的儿子。他生于公元前211年，当时还是秦始皇三十六年。汉惠帝是个年轻的皇帝，在十六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但他也是个短命的皇帝，仅仅在位七年就去世了。这和他的母亲吕后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他的登基做皇帝是母亲吕后的功劳，但最后英年早逝也和母亲的所作所为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刘盈作皇帝的第四年，他已经年满20岁了，到了应该大婚的年龄了。当整个宫廷为了皇帝的婚事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的时候，新房中的新郎和新娘却相对而坐，默默无言，全无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惠帝刘盈的这位小新娘名叫张嫣，是惠帝同父同母的姐姐鲁元公主的亲生女儿，也就是刘盈的亲外甥女!这种舅舅娶外甥女的乱伦婚姻，又怎么能让新郎新娘不为之感到羞愧呢?更别说小张嫣今年才刚刚10岁，根本还是一个小孩子呢!

惠帝究竟为什么要娶自己的外甥女为妻呢?难道他不怕因为乱伦而受到天下人的耻笑吗?其实，这桩婚姻实在也不能怨刘盈，因为这正是他的母亲——皇太后吕雉一手操办，强加汉惠帝于惠帝和张嫣身上的。而这件事的起因却是因为惠帝要逮捕吕后的情夫审食其引起的。

吕后生来就行事大胆，敢做敢为。当她嫁给刘邦以后，刘邦陷入了楚汉争霸的不停争斗之中，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屈居下风。甚至自己的父亲和妻子都落入了敌人项羽的手中。在楚军大营中，吕雉孤立无援，觉得很孤单，就和与自己一起被抓来的审食其勾搭在了一起，做了

一对地下夫妻。

汉朝建立以后，刘邦把妻子接到了自己身边，吕雉这才有所收敛。但是因为刘邦总是忙于政事，又很好色，在后宫中收罗了许多美女，所以吕雉仍然难免寂寞。于是，她和审食其仍然藕断丝连，依依不舍。结果闹的朝廷上下沸沸扬扬，人们都在窃窃私语，只是谁也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刘邦罢了。

刘邦死后，因为惠帝实在懦弱，使吕后得以执掌了朝廷的大权。这一下，她更是谁也不怕了，明日张胆地封审食其为侯，让他当了自己的丞相，两人来往更加频繁，再也不怕被人看见了。

有人好办事吕后和审食其私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惠帝的耳朵里，他不禁觉得又羞又恨，总想找个机会处置了审食其这个淫乱宫廷的奸夫。终于有一天，他抓到了审食其的一个错处，判了他一个欺君枉法的罪名，想要借这个机会杀了他。

吕后在宫中听到儿子要杀自己的情夫，马上慌了神，抬起脚来就想去找儿子求情。但是一只脚刚迈出殿门，又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一想到自己和审食其做的那些丑事，又怎么好向皇帝开口求情呢?她思虑再三，终于决定去找一些大臣向皇帝求情。有一个审食其的朋友，平原君朱建说他有办法去救审食其。

原来，这时还没有结婚的惠帝喜欢上了一个宫内的宫女，名叫闳孺。这个闳孺长的妩媚俊俏，十分得惠帝的宠爱，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刘盈很听他的话。

朱建就去找这个闳孺，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皇帝要杀审食其，你如果不想办法救他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了!"

闳孺听了这话又惊奇又害怕，连忙说："我和审食其又不熟，他死了为什么会连累到我呢?"

朱建看到他害怕的样子，知道事情要成功了，就详细的解释给他听："现在，你受到皇上的宠爱，这是宫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同样

的，太后喜爱审食其，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要知道，朝廷的大权是掌握在太后的手里，不过是因为这件事太后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才不能向皇帝开口要求。一旦审食其被杀了，太后能不怨恨吗?为了报复，只要皇帝杀了审食其，太后就会想方设法地杀了你，到时候你能躲得过吗?恐怕就是皇上也不能保护你了。”

闳孺听了，这才明白过来，不由得汗如雨下。他连忙答应一定尽力救出审食其，以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朱建还安慰他说：“不要紧，你也不用害怕。只要你在皇上面前哀求他，放了审食其，那样不但审食其会感激你，就是太后也会感谢你，这样你就能得到太后的欢心，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于是，闳孺果真多次向惠帝求情，说了许多审食其的功劳。最后，惠帝虽然十分不情愿，但是实在禁不住闳孺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把审食其放了。

审食其一出监狱，马上就去找太后温存了一番。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商量今后该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两个人的结论就是要尽快让惠帝成亲，这样惠帝就会搬出现在和吕后一起居住的宫殿。以后两个人再要寻欢，也不怕被惠帝撞见了。

寻找“合适”的妻子于是，吕后马上行动起来，想尽快给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妻子。但是，这个皇后让谁来当好呢?这可不能找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就行，一定是要自己能够控制的人。想来想去，吕后终于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自己的外孙女，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把自己的外孙女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样他们都是自己家里的人，就不怕日后有人向自己夺权了。

但是，当她和惠帝说这件事的时候，惠帝说什么也不同意。吕后可不管儿子怎么说，硬是定下了这门亲事。她对惠帝说：“张嫣是你的外甥女，血统高贵无人能与之相比，而且容貌品德超绝古今，我这么多年选美女还没看到比她强的。”惠帝担心地说：“这样是否违背伦理，况且她的年纪太小。”太后说：“年纪小不碍事，渐渐不就长大了吗?而舅舅娶外甥女不在五伦之列，你没听说晋文公娶文赢的事情吗?”软弱的惠帝实在

拗不过母亲的意思，只好答应了这门乱伦的婚事。因为那年张嫣刚刚十岁，太后害怕人们议论她太小，便让她自称是十二岁，无论“问名”、“祭告”祖庙诸礼都这样说。

处女皇后就这样，在吕后的一手操办之下，惠帝刘盈就娶了自己的年幼的外甥女做皇后。可是，在新婚夜里，身为舅舅的刘盈又怎么能和自己的小外甥女同睡呢?于是，两个人都闷闷不乐地枯坐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惠帝就离开了皇后的宫殿，以后再也极少进来。三年以后，惠帝抑郁而终，小张嫣在年仅12岁的时候，就成了寡妇，从此开始了她孤独寂寞的一生，直到36岁的时候，才默默的死去了。据说，这位张皇后一直到死，仍然是一个处女。萧规曹随我们的能力不如前人的时候，不妨就按照前人的方式去做。

慧眼识英才惠帝即位第二年，年老的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还问他将来谁来接替他合适。

古代风景画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只说：“谁还能像陛下那样了解臣下呢?”

汉惠帝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跟随汉高祖一起起兵。两个人本来关系很好，后来曹参立了不少战功，可是他的地位比不上萧何。两个人就不那么和好了。但是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也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不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曹参本来是个将军，汉高祖封庶长子刘肥做齐王的时候，叫曹参做齐相。那时候，天下刚安定下来，曹参到了齐国，召集当地的父老和儒生一百多人，问他们应该怎样治理百姓。这些人说了一些意见，但是各有各的说法，不知听哪个才好。

后来，曹参打听到当地有一个很有名望的隐士，叫盖公。曹参把他请了来，向他请教。这个盖公是相信黄老学说的，主张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清静无为，让老百姓过安逸的生活。

曹参依了盖公的话，尽可能不多去打扰百姓。他做了九年齐相，齐国所属的七十多座城都比较安定。

醉生梦死的表现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做相国。曹参还是用盖公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

有些大臣看曹参这种无所作为的样子，有点着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帮他出点主意。但是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没法开口。最后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认为他是倚老卖老，瞧不起他，心里挺不踏实。

曹参的儿子曹窋，在皇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嘱咐他说："你回家的时候，找个机会问问你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么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怎么说。"

曹窋趁假期回家去的时候，就照惠帝的话一五一十跟曹参说了。

曹参一听，就上火了，他骂着说："你这种毛孩子懂得个什么，国家大事也轮到你来啰嗦？"说着，竟叫仆人拿板子来，把曹窋打了一顿。

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到宫中向汉惠帝诉说了经过。

汉惠帝也感到很不高兴。

按照前人的方法做事情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就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

曹参向惠帝请了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

汉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皇帝。"

曹参说："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

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好像不如萧相国。"

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照着办，不要失职就是了。"

汉惠帝这才有点明白过来。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三年相国。由于那时候正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他那套办法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当时有人编了歌谣称赞萧何和曹参。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萧规曹随"。周勃灭诸吕江山是如何从吕氏手中还回刘家的呢？

婴儿当皇帝周勃是汉初的功臣，他的祖先原是卷城(今河南省原阳)人，是后来迁徙到沛县的。刘邦在沛县起义时，周勃投身义军，做了刘邦的侍卫官。从此，他跟随着刘邦东征西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立了不少战功。

汉朝建立以后，周勃又接受刘邦的命令，到处征讨叛乱的诸侯王，先后取得了许多胜利，因为功劳很大，被刘邦赐爵列侯，食绛县八千多户，所以又被称为绛侯。刘邦去世后，周勃就以列侯辅佐惠帝。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设置了太尉的官职，这是掌管军事的重要官职，周勃因为深受朝廷信任，就被任命为太尉。

不过，当时朝廷的大权都掌握在太后吕雉的手中，因为惠帝没有儿子，吕后就从外面找了一个婴儿冒充是惠帝生的，立为太子。公元前188年，惠帝一死，由这个婴儿接替皇位，吕太后就名正言顺地临朝执政。她陆续的把自己的内侄、侄孙像吕台、吕产、吕禄、吕嘉、吕通等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整个朝廷大权几乎全落在吕家的手里了。所以，周勃虽然名为太尉，实际上却手无寸兵，没有实权。

吕氏死后的局势吕太后临朝的第八年，得了重病。临死前封赵王吕产为相国，统领南军；吕禄为上将军，率领北军，并且叮嘱他们说：“现在吕氏掌权，大臣们都不服。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古代风景画要带领军队保卫宫廷，不要出去送殡，免得被人暗算。”

吕太后死后，兵权都在吕产、吕禄手里。他们想发动叛乱，但是一时不敢动手。

刘章从妻子(吕禄的女儿)那里知道了吕家的阴谋，就派人去告诉他哥哥齐王刘襄，约他从外面发兵打进长安来。

齐王刘襄向西进兵，吕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将军灌婴带领兵马去对付。灌婴一到荥阳，就跟部将们商量说：“吕氏统率大军，想夺取刘家天下。如果我们向齐王进攻，岂不是帮助吕氏叛乱吗?”

大家商量下来，决定按兵不动，还暗地里通知齐王要他联络诸侯，等待时机成熟，一起起兵讨伐吕氏。齐王接到通知，也就暂时按兵不动。

周勃、陈平知道吕氏要发动叛乱，他们想先发制人，但是兵权在吕氏手里，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大臣郦商的儿子郦寄和吕禄是好朋友，就派人要郦寄去劝说吕禄：“太后死了，皇帝年纪又小，您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您，对您不利。如果您能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封地，齐国的兵就会撤退，大臣们也心安了。”

吕禄相信了郦寄的话，把北军交给太尉周勃掌管。

第七章

周勃测试军心周勃拿了将军的大印，迅速跑到北军军营中去。向将士下了一道命令："现在吕氏想夺刘氏的权，你们看怎么办?谁帮助吕家的袒露右臂，帮助刘家的袒露左臂。"

北军中的将士本来都是向着刘家的。命令一传下去，一下子全脱下左衣袖，露出左臂来(文言叫"左袒")。周勃顺利地接管了北军，把吕禄的兵权夺了过来。

吕产还不知道吕禄的北军已落在周勃手里，他跑到未央宫想要发动叛乱。周勃派朱虚侯刘章带了一千多个兵士赶来，把吕产杀了。接着，周勃带领北军，把吕氏的势力消灭了。

到这时候，大臣们胆子就大了。他们说："从前吕太后所立皇上不是惠帝的孩子。现在我们灭了吕氏，让这种冒充的太子当皇帝，长大了不是吕氏一党吗?我们不如再在刘氏诸王中推一个最贤明的立为皇帝。"

大臣们商议的结果，认为代王刘恒在高祖的几个儿子中，年龄最大，品格又好，就派人到代郡(今河北蔚县)把刘恒迎到长安，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

文帝即位以后，右丞相陈平却声称有病不肯上朝。文帝觉得很奇怪，就亲自到陈平家中去探望他，询问他不愿上朝的原因。结果，陈平对文帝说："当初跟随高皇帝打天下时，太尉周勃的功劳不如我；但是现在平定诸吕之乱，我的功劳就不如周勃了。因此，我想把自己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所以才没有去上朝。"文帝见他说得很诚恳，这才放下心来。第二天上朝，他果然拜周勃为右丞相，改任陈平为左丞相。当时汉朝是以右为尊，这样一来，周勃的官位就在陈平之上了。

能武不能文不过，周勃虽能征善战，但是对治理国古代瓷瓶家、处理政事却是一窍不通，很快就在朝廷上闹出了笑话。有一天上朝，文帝问周勃："现在全国一年判处的囚犯有多少?"周勃摇了摇头说："不知

道。”文帝又问：“那现在全国一年的赋税，收入有多少?”周勃仍然答不上来，急的出了一身汗。文帝见了，就转过身来问陈平：“左丞相知道吗?”陈平不慌不忙的答道：“这些事都有主管的人。陛下如果想了解监狱的情况，可以问负责刑狱的廷尉；要了解钱粮的收支情况，可以问负责税收的治粟内使。”汉文帝又说：“既然这些事情都有主管的人，那么你是管什么的呢?”陈平严肃的回答说：“我的职责就是管理群臣。对外，镇抚四方；对内，爱护百姓，让文武百官都能恪尽职守。”汉文帝听了，不禁笑着称赞陈平答得好。

散朝以后，周勃感到很羞愧，不由得埋怨陈平说：“你怎么不早教给我这些呢?”陈平听了也不禁笑了出来，说：“你做了丞相，却怎么不知道丞相的职责呢?如果陛下问你这长安城中到底有多少盗贼，你也能强答吗?”周勃听了，心里更加清楚，陈平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第二天，他就上书给汉文帝，交回了自己丞相的相印，仍然让陈平来做这个丞相。

后来，周勃就终老在家。他的儿子周亚夫在日后也出将入相，成了一代名臣。汉文帝刘恒刘恒的身世如此曲折，不得不让人慨叹造化弄人。

被刘邦遗忘的女人汉文帝刘恒，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开创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因此被历代士人誉为一代圣明的君主。汉文帝刘恒深明治国之道，也颇具治国之才，他奉行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安抚百姓的措施，使全国上下呈现出国富民强的景象。他还大力推行了安抚边疆、减少征战的条例，节俭费用、废除苛政、教化百姓、杜绝诽谤，他还虚心纳谏，重用廉吏，使汉朝出现了国泰民安的盛世中兴。汉文帝的政治清明为后人所敬仰，他的身世之谜也同样让人好奇。

公元前204年，当时的汉王刘邦打垮了魏王豹，掠夺了魏王豹的宫人侍女，让她们负责织布服役。有一次，刘邦偶然来到织布之处巡视，在人群中看见一个女子长得清秀沉稳，柔弱可爱，好色的刘邦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后宫。这个女子姓薄，是她父亲和魏王宗室的魏氏女子私通生下的孩子。她以为被汉王看中，自己就有了出头之日，所以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汉王后宫。可是没想到，刘邦转身就把她忘掉了，从此再也没

有被召幸过。

有一次，刘邦的心情很好，就找来几个嫔妃，和她们一起饮酒作乐。其中的两个美人和薄氏女子本来是很好的姐妹，她们一起从魏刘恒墓王的后宫来到了刘邦的宫中。在还没有发达之前，三个女孩子曾经相互约定过“富贵莫忘故人”。

可是，这两个女子一心只想追求荣华富贵，哪里还记得当初一起共同患难的姐妹呢?她们俩就把这个约定当作笑话讲给了刘邦听。而刘邦听了之后，动了恻隐之心，觉得那个薄氏女子很可怜，于是就决定当天晚上召幸她，让她沐浴一下自己的龙恩。

薄氏女子昔日里和那两个美人十分要好，又同是从魏王豹的宫中被掳来的，三个人感情好得像亲姐妹一样。哪曾想今日却是天壤之别呢?人家夜夜欢声笑语，倍受恩宠，可自己这儿却是冷冷清清，一个人苦熬着漫漫长夜。想到这些，薄氏女子不禁常常泪流满面。

美梦成真这日，薄氏又在暗自垂泪，怨恨命运的不公平，忽然听说刘邦驾临。薄氏战战兢兢地起身欢迎。刘邦看到这个女子干枯瘦弱的身材，哭肿的双眼，又没有施些粉黛，顿时兴趣索然，转身就想走。达时，薄氏女子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拉住了刘邦的衣袖，禀告说昨夜梦见苍龙缠绕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竟与龙交合起来，她问刘邦此征兆是何意义?刘邦这时正处在与楚霸王争夺天下的最关键时刻，听了薄氏的话，顿时大喜过望，说这是地位尊贵的吉祥之兆，于是当天就宠幸了薄氏。就是这短暂的一夜欢娱，薄氏竟然产下一子，刘邦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就叫刘恒。虽然如愿的生下了皇子，但是薄氏却并没有如自己当初想像的一般，从此可以攀龙附凤，彻底改变自己低贱的身份地位，而仍旧是个姬妾，没有当上妃子。而刘恒也因为母亲不受宠的原因，极少见到父亲，自然也不被刘邦喜爱。母子二人一直在宫中小心谨慎地生活。

刘邦一共有八个儿子，诸子结局都很不幸，唯独刘恒因为薄姬不受宠，没被吕后嫉恨，母子两个反而因此得以保全性命。

公元前180年，执掌汉室大权多年的吕后死了。忠于刘氏的朝臣们密谋抄斩吕氏满门，还政于刘氏子孙。众大臣们推选皇位继承人时，综

合考虑后，否定了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最后一致推举了代王刘恒。原因除了刘恒为人宽厚仁孝外，他的母家(即薄姬母家)没任何势力，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于是，代王刘恒因为母亲家庭的惨淡，反而幸运地当上了皇帝。

一生节俭汉文帝在位23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宫室、苑囿、车骑、服御等衣食住行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增加。发现有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力求有利于民众。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什么还要修建露台呢?”按当时的条件，修建这样一个露台是不成问题的，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结果，而文帝却认为过于破费，竟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他用自己的纯朴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装饰；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他临死前还留下遗嘱说：“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盛世景象古代文人刘恒即位之初，就赏赐功臣，安置亲信，把刘氏宗室的利益予以恢复。还命令诸侯们都离开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居住，维护和巩固了自己的皇权。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其间推行“与民休息，安定百姓”的国策。他和平地解决了边疆问题，如南粤；又采取和亲与防御相结合的政策对付匈奴。他在位期间，尽量减少战争开支，重视农业，降低田税，鼓励生产。汉文帝在国事开支和个人花费上，也是精打细算。他为人简朴，只穿粗绸的衣服，就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能穿曳地的长衣，不能用绣花的贵重丝织物，从而杜绝了后宫效仿奢侈的风气。他还废除了从秦汉以来一直被沿用的许多酷刑，如连坐、肉刑等，对民施教，以教化育人。于是，全国上下的犯罪率不断下降。他不把自己的过错归结给臣

民，鼓励百姓大胆地讲真话讲实话，废除了诽谤和妖言罪。此外，汉文帝重用了一些敢于执法的官吏，如冯唐、魏尚、张释之等。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他也被后人赞扬为仁君和明主。

与其他古代帝王相比，汉文帝刘恒是否是真龙下凡，还是君权神授，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他仁政待民，体恤百姓，并且保持政治清明，使汉朝呈现出繁荣兴盛的盛世景象，他就是好皇帝。真将军——周亚夫不给皇帝面子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皇帝慰问前线汉朝在高祖刘邦以来，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但是到了匈奴单于继位时，他听信属下的谗言，与汉朝绝交了。

公元前158年的一天晚上，汉朝都城长安，皇宫里灯火通明，文武大臣全都聚集在大殿，汉文帝坐在中间，其余人排列两旁，气氛很是紧张。许久，汉文帝说：“匈奴单于受奸人挑唆，废毁了和我们大汉之间原有的和亲旧约，与我们断交，来势很是凶猛。现在请大家商议一下对策。”群臣听罢，个个义愤填膺。武将们都争着请命出征。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事急从权，汉文帝调兵遣将，派三位将军率领三路汉朝大军前往边疆抵抗匈奴军队的侵略。为了保卫都城长安，还特别加强了京都地区的防卫。汉文帝命令将军刘礼驻军在灞上地区，命令将军徐厉驻兵在棘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地区，命令将军周亚夫驻兵在细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地区。三位将军各自走马上任。

几天后，汉文帝在未事先通知的前提下，亲自到三处营帐去视察，并慰劳将士，以鼓舞士气。

他先来到了棘门地区，守卫营门的卫兵一看到皇上亲自驾临，赶忙大开营门，迎接天子。汉文帝和随行的侍从们从周亚夫营门飞驰而入，直抵营中，一路顺畅地来到了将军的营帐前，未见有任何人来阻拦他们。汉文帝视察了棘门大营后，发现有一些军纪不严的情况，觉得是小毛病，未加责怪，仅仅是指出了而已。慰劳完棘门的将士们，汉文帝赶往灞上大营。临行前，棘门的将士们全体列队恭送汉文帝，并且遥望着

汉文帝远去后，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在灞上地区，汉文帝受到了同样的礼遇，飞马直抵营中将军大帐，仍未见有人阻拦，同样有一些治军不严的现象，汉文帝也是未加批评，主要是想慰劳将士，鼓舞士气。从灞上大营离开时，汉文帝也受到了全营将士们的列队恭送，将士们也是一直遥望着汉文帝远去的方向。

不让皇帝进军营最后，汉文帝一行来到了周亚夫将军驻兵的细柳军营。还未行至营前时，守营的卫士发现远处有一队人马过来，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汉文帝看见这里的将士们都身披铠甲，手持刀枪，张弓搭箭，如临大敌一般，心中不觉暗暗称奇。汉文帝派先行官来到营门前，只见大门禁闭，刀枪如林，根本就进不去。先行官对守营的将士说："皇上即刻就要抵达这里，你们还不赶快开门迎接？"可没想到，守营的将士们回答说："我们只听周亚夫将军的命令，不服从皇上的诏令。"先行官返回禀报汉文帝，文帝心想，准是周亚夫的守营将士怕是敌人有诈，所以需要验明身份，须得朕亲自去一趟儿，他们才会打开营门。于是，汉文帝亲自上营前来，可没想到的是，仍被阻挡在营门外。随同汉文帝一起来的臣子们都很气愤，怪周亚夫把皇上堵在营门外。

最后，汉文帝只好派使者拿着符节去见周亚夫，通知他皇上前来慰问将士们。使者卸去佩剑，来到细柳营中，见到了周亚夫，说明了一切。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营门，让车马队进来。守卫营门的士兵接到命令，郑重地向汉文帝宣布说："将军有令，军营内不许车马快跑。"汉文帝的随行大臣们听到这样的话更生气了，可汉文帝却让大家服从命令，放松缰绳，缓缓前行。等到了将军的营帐前面，才见周亚夫率将士们出迎。周亚夫全副武装，可谓是威风凛凛。他对汉文帝拱手作揖道："穿盔甲的军人不能跪拜，请准许我行军礼吧。"汉文帝见此情景，听此言语，大为震动，也扶着车前的横木欠了欠身，向周亚夫表示答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他的慰问。

随后，汉文帝一行视察了细柳军营，慰劳了将士们，鼓舞了他们的士气。细柳营中的将士们见到皇上亲自来慰劳自己都很激动。

之后，汉文帝离开了细柳军营。临行前，周亚夫也没有像棘门和灞

上的将士们一样，出营门相送。汉文帝刚刚出了营门，他就命守卫营门的将士们把门关住了。

皇帝的感慨在回宫的路上，跟随着汉文帝的侍从们，都认为周亚夫对皇上很是失礼，应该治他的罪。然而汉文帝还不时的回头，望着细柳军营，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棘门和灞上的将士们，和细柳的将士相比，简直就如同儿戏。敌人如果突然来袭击，只有细柳的将士们能够从容迎战，其他的不做了俘虏才怪呢。如果我大汉的将军都像周亚夫这样严谨地治军，敌人怎么还敢侵犯我们啊?

在这次危机过去后不久，汉文帝就将周亚夫由将军提升为中尉，负责京城和皇宫内外的保卫和治安工作。

一年后，汉文帝病重，医治无效。在临终前，汉文帝把太子刘启叫到床前，嘱咐他说："周亚夫是真正的将军，将来一旦发生叛乱，你可以让他统帅军队，不必担心。"随后，汉文帝就病逝了。太子刘启继位，就是汉景帝。有了文帝的嘱托，汉景帝对周亚夫也是十分的礼遇。从而文景两朝中，周亚夫都得到了重用。贾谊一生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法施展，最后郁郁而终。

少年得志贾谊是西汉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后遭猜忌排斥，抑郁而死。

贾谊从小精通诗书，18岁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洛阳一带很有名，被以爱才著称的河南郡守吴公赏识，招为弟子。后来吴公上调，贾谊也被吴公推荐做了博士。

贾谊年纪轻轻，21岁就当上了博士，深得汉文帝赏识。但是，和许多悲剧性人物一样，他太过于锋芒毕露了，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嫉妒，给自己埋下了隐患。这时朝廷官员多为年长者，因自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来一些功臣宿将多居要职，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官员中最为年少。他年轻敢为，思想敏锐，每当朝廷商议国家大事，许多老臣往往无言对答，贾谊却能对答如流。汉文帝赏识器重他，一年之中，三次擢升，从博士提为大中大夫(较高级的顾问官)。

但是，当汉文帝还准备提升他为公卿时，丞相周勃和太尉灌婴等人，十分妒忌他的才能，交相诋毁，说什么贾谊夸夸其谈，意在擅权，不宜重用。汉文帝见这么多大臣反对，就动摇起来，逐渐疏远了贾谊。另外，贾谊虽才高，但不懂人情世故，不知权衡轻重，从统治者及权贵的利益出发。他迫不及待的提出许多改革措施，文帝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觉得他书生气，华而不实。

不懂人情世故后来贾谊建议为了强化皇上的权力，让列侯离开京城，回到他们的封地去，结果得罪了列侯，招致后祸。

贾谊年纪轻轻就得皇帝赏识，招致小人的嫉妒，又大力提倡改革，得罪权贵，结果上下左右均在文帝面前诽谤他，久而久之，文帝也觉得他人缘不佳，就把他调出京，下诏将他贬往长沙，作了长沙国的太傅。

长沙国在遥远的南方，距离京师数千里。贾谊辞别京师前往长沙，因是被排挤出京，又听说长沙炎热潮湿，担心身体不能适应，心情非常不好，深感委屈，慨叹人心险恶，哀伤自悼，一蹶不振。后来，他在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把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同是遭庸人的排挤与迫害，只好远走高飞；并要发扬屈原精神，坚决与庸人对立与斗争。

这篇《吊屈原赋》传入京都后，文帝虽然赞赏其文采，但又觉得贾谊气量小，言过其实，更觉得此人不堪重用。

贾谊流放到长沙之后，每日就这样抑郁寡欢，终日不乐，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不问苍生问鬼神四年后，文帝忽然想到贾谊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又将他召回京城。贾谊接到圣旨，喜出望外，立即收拾行李，离开长沙。回京以后，贾谊进宫去拜谢文帝。当时文帝刚刚祭完鬼神，正静坐宣室(即未央宫前殿的正房)休息，贾谊来时，他脑子还不断萦绕着鬼神的事，见到贾谊，便向他询问各种鬼神的由来。贾谊想不到文帝竟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出意外，但皇上垂询，不能不答，只好将鬼神的起因，鬼神的形象，鬼神的危害等等，一一尽述。文帝听得津津有味，竟忘记了疲倦。贾谊见文帝听得这样入神，也就越讲越长，从下午一直

讲到夜色朦胧。内侍几次来请文帝用晚膳，他竟全然不知，却接连三次将身体移近前席(古人席地而坐)，尽量与贾谊靠得近些，唯恐贾谊说的某一句话未听清楚。待贾谊出宫，三更已过，文帝方才进入内寝，长叹一声道：“我长期信奉鬼神，以为贾谊这方面的知识定不如我，今天一席交谈，才知我远不如他。”

田园山庄贾谊回家之后，觉得这次谈话，虽使文帝高兴，自己却感凄然。原来他以为文帝召他入京，是要与他商议国家大事，谁知却与他大谈鬼神，使他十分失望，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不禁喟然长叹一声，真有不胜唏嘘之感。

这次论鬼之后，贾谊本来以为从此会留在京城了，谁知汉文帝又把他派去作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刘胜(又名揖)，是文帝的小儿子，非常受宠爱，而且还喜好读书，所以文帝才把学问渊博的贾谊派去辅导他。

梁怀王与贾谊相处很好。过了几年，梁王刘胜从马上坠下而死，贾谊本来没有什么责任，但他害怕文帝追究，又追悔自己疏忽，没尽太傅的责任。从此更加郁郁寡欢，哭泣不已，经常为此而感到伤感。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终年仅33岁。

贾谊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察觉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矛盾，政策有着不少过失，反复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著书立说，或上书建议，发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论，最著名的是《过秦论》和《治安策》。《过秦论》的主要论旨，就是如何安民的问题，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根据。而《治安策》则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他的这些论点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封建君王的足够重视，但是却成了我们今天学习古文的经典篇章。汉文帝听冯唐的话当着众人不给皇帝面子，只因为有理有据。

第八章

亲征的想法汉文帝可谓是守成君主，尽管他在为人处事上难免错漏，但重要的是他能够虚心纳谏，过而能改。在汉文帝时期，有一个名叫冯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能令汉文帝改过的人。

汉文帝刘恒自外藩入主朝政，他对封地故国的眷恋和关注就十分强烈。再加上匈奴趁当时汉室政权更迭之际，大肆掠夺，杀人越货，边疆地区秩序混乱，百姓生活不得安宁。所以，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就亲临太原，他有两种考虑，一是自己以九五之尊，亲临边疆地区，可以威震匈奴，安定民心；另一方面，他想借机安抚自己藩国的旧臣，论功行赏。

在当时代王府的旧臣之中，有一个名叫冯唐的人，他的祖父原是赵国人，后来迁居到代地。冯唐以孝而闻名，曾是代王府中的中郎署长，在汉文帝归故国封赏时，冯唐已是一位暮年老者。汉文帝和旧臣们闲聊叙旧，听说了冯唐的身世，就问他当年赵国的大将军李齐的情况，汉文帝一直很欣赏李齐的才能。当他得知廉颇、李牧比李齐还要贤能时，不禁脱口而出，感慨现在没有这样的英雄了。汉文帝认为，如果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攻打匈奴就并非难事，何足挂齿呢。可冯唐却给在兴头上的汉文帝泼了盆冷水，他说，陛下虽然有廉颇、李牧之才，却不得用也。汉文帝被冯唐激得大怒，过后责怪冯唐，不该当着众臣的面，让自己下不来台。

可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困扰汉文帝的心腹大患，即匈奴不断入侵边境，依然存在。而边关又缺少良将镇守，这使得汉文帝坐卧不安。过了不久，汉文帝依然惦记着冯唐的话，就召见他，问道，怎么知道自己不能任用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呢?这一次，冯唐细细地将一番道理讲给汉文帝听，从而成为载于史册的一段佳话。

古代风景画鉴赏冯唐的道理冯唐首先提到的是古时君王命将领出征，君王跪着推车为之送行，反复说明宫廷之外的军国大事，就拜托将帅负责了。军功奖赏都在外决定，只要回宫后上报就可以了，照章批

准。李牧当赵国将军戍守边疆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军营中设立市集，把市场的租税都用来犒赏士卒，赏赐由他自己决定，无需请示朝廷。赵王非常信任李牧，让他专权行事所以可以尽其智力，施展才华。李牧率军队北逐单于，东破匈奴，西御强秦，南使韩魏。当时，几乎使赵国称霸。可惜后来赵王听信了谗言，杀害了李牧，从此赵国再无良将。这也就是六国破灭的原因中，赵国败亡的重要原因。

说到这里，冯唐话锋一转，指出现在的云中郡守魏尚，很有古人之风，率兵打仗都很过硬，他也在军中开设市场，把租税用来犒劳将士，还拿出自己的俸禄，五日一杀牛，慰劳军中。于是，魏尚的将士们，个个奋勇杀敌，主动请战，所以匈奴在他的守卫区远远地散去，不敢接近云中边疆。可惜这样的人，只因为在一次战斗后，所上报的杀敌数量和实际的略有差池，就被朝廷罢免了官职，还判了刑。魏尚功大于过，赏不行而罚必用，有李牧那样的贤能却不被重用。由此可以得知，汉文帝即使拥有像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也不能用。汉文帝被冯唐的话说得心悦诚服，即刻派冯唐持节，赦免了魏尚，并让其复任云中郡守。

冯唐这样有违恭敬地和汉文帝说话，其意在激励汉文帝，放权用人，用而不疑。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能因为小的过错而掩盖一个人大的功德，如果赏罚失衡，将士们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就不会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在人才的使用这个问题上，君王应该唯才是用，唯善是从，充分地支持、理解和信任臣子，这样才能使臣子各尽其能，各展其才。臣下就会竭智进谏，举贤不避仇，举过不讳君。这样一来，君臣相得，如鱼得水，齐心协力，国家的政治才会有清明的局面。冯唐这样举贤，直言面对，汉文帝从善如流，知错即改，不愧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汉文帝以藩王入主朝政，很快就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这和他的虚心纳谏、及时调整用人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而冯唐的一番论述，能让汉文帝改过，这段佳话，一直被后世传诵。古今有很多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忠良志士，他们不禁扼腕叹息，自己何日能遇到汉文帝这样的明君?的确，自古以来，像汉文帝这样虚心纳谏，诚恳改过的君王并不多，而遭受冤屈的忠臣良将则是不少，他们之间缺少的是像冯唐这样敢于为忠臣良将鸣不平，向君王推

心置腹进谏的人。不过，这也正是汉文帝得以合乎民心，顺平民意，赢得天下人的支持，大力发展经济，开创治世的原因所在。只可惜，像冯唐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这也是其他朝代的悲哀吧。饿死的富翁邓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富甲天下，但是最后却冻饿而死。

因为一个梦而受宠邓通原本只是一介船夫，每当他出外行船时，常将黄旗插在船头，所以就被人称为黄头郎。因为他善于划船，就被选到宫里当了御船的水手。

有一晚，汉文帝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登天。但是文帝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已经十分接近南天门，但总是登不上去。就在这时候，有个头戴黄帽的人在背后推他，终于使他登上了天界。他回过头来看推他的人，发现那人的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文帝正想叫住他，怎知却被鸡鸣声吵醒了。

第二天，文帝来到建在宫西苍池中的渐台，见到有个御船水手头戴黄帽，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正是他梦中遇见的人。召来一问，那人名叫邓通。文帝想，他既然能把自己推上天，必定是个奇才，而且邓与登谐音，邓通即登通，有登天必通之意，认定了梦中助他登天的人便是邓通，因此特意提拔邓通，非常宠爱他。邓通也老实谨慎，不随便和外人交往。文帝多次赏赐他的钱财，总数上亿之多，还授予他上大夫的官职。

其实，邓通除了会划船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自己处事谨慎，虽然不能推荐贤士，但却很擅长谄媚文帝，因而得文帝的宠信，官封至上大夫。

相面人的预言有一次，文帝命一个在当时非常有名，善于算命的人许负去给邓通相面，许负相面后对文帝说：“邓通这个人将来要贫饿而死。”汉文帝听了很生气地说：“能让邓通富裕或贫穷的只有我，可我又怎么会叫他受穷呢?”于是，文帝下令把蜀郡严道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造铜钱。从此邓通发了大财，他铸造的铜钱布满天下，人人都知道有“邓氏钱”。

汉文帝比太子更爱皇帝邓通对于皇帝对自己的喜爱也非常感激，总

想着要报答文帝。后来有一次，文帝背上生了一个疮，脓血流个不停。邓通觉得孝顺皇帝的机会到了，便天天进宫去，亲自守候在皇帝身边，侍疾问药，殷勤备至。为了要减轻文帝的痛苦，邓通不顾腥臭难闻，甚至用嘴将脓血吸出。文帝因此心中非常感动。有一天邓通给他吸完了脓血，他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邓通恭顺地回答："应该说没有谁比太子更爱陛下的了。"文帝听了以后没有回答。

正巧有一次太子刘启来看望文帝病情，文帝成心想试探太子的孝心，就要他也吸吮脓血。太子见疮口脓血模糊，腥臭难闻，禁不住一阵恶心，但又不敢违抗，只得硬着头皮吮吸，可是脸色很难看。文帝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得感叹道；"邓通比太子更爱我啊!"太子这才知道了邓通经常为文帝吮吸脓血的事，心中感到很惭愧，也因此而嫉恨邓通。

饥寒交迫而死的富翁文帝死后，刘启即位，史称汉景帝。景帝免去邓通的官职，让他回家闲居。不久，有人告发邓通偷盗境外的铸钱。景帝派人调查，结果发现确有此事，便把邓通家的钱财全部没收，邓通顿时变成了穷光蛋，还欠下好几亿钱的债。还是景帝的姐姐长公主记住文帝不让他饿死的遗言，赐给他一些钱财。但是，官吏马上把这些钱财用来抵债，连一吊钱都不让他留下。长公主知道后，就又让手下人借给他一些衣食，但是也被看守的官吏没收了。就这样，曾经富甲天下的邓通，最终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腰斩晁错为皇帝出谋划策，最终却成了他人的替罪羔羊。

晁错的计划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后，为了使自己的王朝统治更加巩固，他开始大肆封赏同族刘姓为王，给每个有功爵的刘氏子弟一块封地，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居住生活。到了汉景帝刘启的时代，同姓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当中，有的作威作福，有的仗势欺人，实际上已经不受朝廷的约束了。还有的同姓王封地太多，比如齐国，有七十多座城池，又如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池，还有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池。同姓王的泛滥和他们的不服从中央政府管辖，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了汉朝的社会政治秩序。汉高祖刘邦当初分封刘姓子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却给后代帝王带来了麻烦。

这时，汉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错站了出来，他担心这样的局面若持续

下去，会引起叛乱，甚至把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汉朝的天下瓜分得四分五裂。晁错对汉景帝说：“吴王刘濞不来上朝，按理应当将他处斩。先帝(指汉文帝刘恒)仁慈宽厚，对他宽大，可他反而更自大狂妄，不思悔改，越来越傲慢。吴王在其封地内开山铸钱，煮海为盐，并且招兵买马，准备叛乱。如果陛下不及时地削减他的土地，一定会养虎为患的。这样的话，将来就不好收拾局面了。”

汉景帝刘启平素就很欣赏晁错的才华横溢，晁错提出了“削藩”的建议，就是削减诸侯王的封地，得到了汉景帝的同意，然而同时，汉景帝又有一些顾虑。汉景帝对晁错说，削地固然好，可怕他们造反啊。晁错宽慰汉景帝说：“如果削地要反，不削地也要反，那么他们现在造反，对陛下和社稷的危害还小些，但如果等他们势力强大了再造反，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汉景帝前思后想，认为晁错的话很有道理，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削藩！

父亲服毒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劝谏皇上削藩，特地从老家赶到京师劝阻儿子。晁父说：“你身为御史大夫，位高俸厚，你怎么不安分守己，好好度日，反倒多管闲事，自寻烦恼呢？各诸侯王都是皇室的亲戚，你能管得了他们吗?你削了他们的封地，他们必定会怨恨你，你图什么呢?”

晁错回答父亲说：“怨恨是必然的，但如果现在不削地，国家就会不稳定，这样下去，天下总有一天会大乱起来的。”晁父听了，叹气道：“这样下去，刘家是安全了，可我们晁家就大难临头了。我已经老了，实在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啊!”晁错再三劝导父亲，可老人依旧只是叹气。后来，晁父回到老家，就服毒自杀了。父亲自杀的消息传到晁错耳中，他非常伤心，可削地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千秋社稷，他必须去做。可是他的命运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掉父亲的预言。

七国之乱汉景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先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一部分土地。随后商议着要削减吴王刘濞的封地。吴王刘濞得到这个消息，心想，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先发制人。山水画鉴赏于是，他联络了楚、赵、胶西、胶东等七个地区的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七国之乱”。

汉景帝没想到吴王刘濞能联合七个诸侯王一起来反叛自己，而且叛军声势浩大，心中不免惊惶。他想起先帝汉文帝临终遗言，就派了善于治军的将军周亚夫去讨伐叛军。当时，朝廷上有人嫉妒晁错，想把七国起兵叛乱的责任推给晁错。这些人对汉景帝进谗言说，七国造反，是为了诛杀晁错。如果陛下能够答应他们的要求，杀了晁错，赦免七国无罪，并将原属他们的封地归还给他们，他们的要求被满足了，自然就会撤兵的。汉景帝早已没了主意，便听信了这番话，说如果真的这样，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人呢?于是，汉景帝批准了腰斩晁错的奏折，并下诏让七国速速退兵。

吴王刘濞听说汉景帝腰斩了晁错，哈哈大笑说，晁错该杀，但杀得晚了，我现在已经是东方的皇帝，还接刘启的诏书何用呢?说完他继续长笑，并下令继续向长安进军。

不久后，校尉邓公回到朝廷来汇报军情。汉景帝见了邓公就问他，吴楚七国是不是知道晁错已经死了，他们愿不愿意退兵?邓公回答说，吴王早就有意谋反，他处心积虑，准备了几十年。这次，因削地而叛乱，打着诛晁错的招牌，只是借口而已。想不到皇上真的把晁错给杀了，今后恐怕再也难有人敢替朝廷替皇上出主意了。景帝听了，心中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但是，幸亏景帝仍记得父亲留给自己的遗言，起用了周亚夫作大将去平定叛乱。周亚夫将军治军严谨，用兵巧妙，他避免跟吴、楚两国的叛军正面作战，只是派一队精兵断绝了叛军的粮草运输。吴、楚两国军队没有了粮食的供应，自己就先乱了起来。相持几日后，吴楚军队就绝了粮草。周亚夫看此情景，认为时机已到，就立即调兵遣将，他又亲自率领将士出击，把吴楚军队打得人仰马翻，一败涂地。

吴楚是带头叛乱的两国，他们一败，其他的国家也就不战而败了。几个月内，七国之乱就被平定了。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再亲自治理其封国，封国中所有的官吏，都由朝廷任免，诸侯王逐渐只剩下了一个虚名。以后又实行了推恩法，让同属同一封国的弟子，都在其封国内受封土地，从而使一

个封国的能够继承的人越多，每个人的封地就越小。由于对诸侯王斗争的胜利，汉室朝廷的威仪也大大的加强了。

七国之乱，实际上随着汉景帝诛杀晁错这个替罪羊而告终。“诛晁错，清君侧”只不过是吴王刘濞叛乱的一个借口罢了。就算没有晁错在汉景帝身旁，他也会找其他的借口和机会的。这就是汉初高祖刘邦分封同姓王时所没有料想到的一大弊端。季布一诺千金至今仍为人们传颂的人物，就连刘邦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战国时期就已经扬名战国末年，楚国人季布一向轻财仗义，侠肝义胆，以任侠闻名于当时。楚汉相争之际，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后来又归顺了刘邦，被刘邦拜为中郎将。但是，季布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他的语言信实、说话算话，当时人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的军功政绩都为人们所忘记，而季布“一诺千斤”的佳话却至今为人们所称颂。

当初，季布在项羽手下做大将，曾经好几次带着军队把当时力量还不强大的刘邦逼得走投无路，所以刘邦一直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自杀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上了皇帝。他发下命令，悬赏千金捉拿季布，想报以前被季布追逼的仇。他还宣布，谁都不能收留季布，否则就要被诛杀九族。季布从此不得不东躲西藏。最后，他藏在了濮阳的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那个姓周的人在乡里一向以侠义敢为出名，他听说过季布的侠义名声，所以一心想要帮助他。季布一到他家，他就对季布说：“现在皇帝正在下令捉拿将军，追捕的很急，马上就会搜捕到我家，到时被朝廷的人发现了，就没有办法逃脱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就斗胆献上一计；如果您不信任我，不能从我的计策，我情愿先行自杀。”季布相信周氏，答应全听他的安排。于是，周氏就让季布剃掉头发，穿上粗布衣服，然后藏在丧车里，与几十个家童一起，把他送到鲁国去，卖给了朱家。朱家人也心知肚明，知道自己买回来的这个高大魁梧的佣工就是非常有名的大将季布，所以对他都很敬重，田地里的劳动全部由他支配安排；吃饭的时候，也让他和主人一家坐在一起。

周氏把季布安顿好以后，就起了一匹快马赶到洛阳，求见汝阴侯腾公。腾公和周氏早就认识，留他在自己家中吃饭。席间，周氏就问腾公

说：“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陛下这么急着要抓到他?”腾公回答说：“季布曾经帮助项羽多次围困陛下，陛下一直恼恨他，因此才非要急着抓到他。”周氏又问：“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呢?”腾公直率的回答说：“他是一个人才。”周氏于是借这个机会劝说道：“人臣各为其主，季布为项羽效力，不过是尽他身为人臣的职责罢了。只因为这样，就要抓他，难道那些曾经当过项羽的属下的，可以因此而被斩尽杀绝吗?如今陛下刚刚得到天下，还没有安定下来。现在却要因为个人的恩怨追捕一个人，这在天下人面前显得何等的小肚鸡肠啊!况且，季布这样的人才，如此苦苦追逼下去，到最后，他不是北投胡人，就是南奔越地。记恨壮士而逼他资助敌国，这不是明摆着给敌人输送人才吗?您何不把这些道理找个机会奏明陛下呢?”腾公听了心里就明白了，他知道这个周氏一向很有侠义心肠，估计季布就藏在他的家里，便答应为季布说情。后来，腾公果然把周氏说的这些话在汉高祖刘邦面前说了，又说了季布许多好话。高祖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下令赦免了季布，还把他招到朝中，任命他为郎中。

汉朝为官，不改本性季布在汉朝做了官以后，仍然本性不改，为人耿直，不善于阿谀奉承。惠帝时，他任官中郎将。那时候，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很紧张。有一次，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吕后觉得其中有侮慢之意，便召集诸将商议付伐匈奴之事。上将军樊哙说，他愿意率领10万兵众横扫匈奴。樊哙一向很受吕后的器重，手中掌握了很大兵权。朝中的大臣们见樊哙说出了这样的话，吕后又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就也都顺着吕后的意思，表示赞同樊哙的意见。这时只有季布站出来对吕后说：“樊哙这是当面欺瞒，按律当斩。当年高皇帝率了40万兵马去攻打匈奴，仍然被围困在乎城，当时樊哙也在军中，对这件事很清楚。可现在樊哙却说以10万兵就能横行匈奴，这不是在当面欺瞒吗?秦朝就是因为向匈奴起衅，而不得不修长城进行抵御，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使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创伤至今还没有被平复。现在，樊哙又当面奉谀，想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这是要动摇国家的根基!难道不应该斩吗?”大臣们听季布说得如此直接，都很恐慌，生怕吕后会动怒。但是吕后听了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再不议论讨伐匈奴的事了。

汉文帝时，季布做了河东的郡守。当时有人向文帝推荐季布，说他是一位贤者。文帝便诏季布到京城，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但是，季布

来到京城后，却又有人向文帝说季布好喝酒，难以接近。文帝于是又放弃了原意。就这样，季布留在京城整整一个月无所事事。后来，他面见文帝时说：“臣因为陛下的恩宠任河东守，现在陛下无故召臣到京城来，大概是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好话。但是我到了以后，却又无所事事，这大概是因为又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个臣子的称赞召臣来，又因为一个大臣的贬低而疏远我，陛下这样做，我只恐怕有人会利用您这一点的。”文帝听了觉得很惭愧。不久，季布就辞官而去，离开了朝廷。周亚夫受冤而死一代名将，虽立功无数，但最终却因失宠受冤而死。

算命人的预言周亚夫起初当河南太守，未曾封侯。传说当时著名的观相者许负给他相面，说：“你三年以后能够封侯。封侯之后八年会成为将相，秉持国政，贵极人臣，当世不二。在以后九年，你就会饿死。”周亚夫根本不相信这些话，笑着说：“我的哥哥已经承袭了我父亲的爵位，如果他不幸早逝，也是由他的儿子来承袭，我又怎么会封侯呢?更何况既然你预言我会位极人臣，贵不可言，又为什么会说我饿死呢?请你给我解释解释。”许负看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过了三年，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因为犯罪而被处死，文帝下令要选择周勃之子中最贤能的人，结果大臣们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周亚夫真的被封为绛侯，应验了许负当年的预言。

周亚夫的鼎盛时期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塞。周亚夫受命带兵在前线。他治军严谨，一丝不苟，就是皇帝亲自来了，他也古代人物画像要求军中的士兵必须严守自己的命令，毫不松懈。文帝视察回来后，还因此称赞他是“真将军”。以致于文帝临死时，还告诫太子刘启说：“如果国家有紧急的大事，周亚夫可以相信，尽管派他去带兵。”这些话，太子刘启一直深深记在心里，始终没有忘掉，并且最终依靠周亚夫平定了诸侯王的叛乱。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动武装叛乱。吴王刘濞亲自领兵二十万来犯，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先向梁国进击，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间埋伏起来，伺机行动。周亚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职务，奉命率领大军东进，反击吴楚叛军。他拟了个先予后取、

避实击虚的策略，前后三个月，就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汉军凯旋回朝后，朝廷就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二月，周亚夫被升任为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完全应验了当初许负的预言。只是这时，周亚夫正处于志得意满之中，根本没有时间去细细思量许负接下去的预言。

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来了。景帝想要废掉太子，但是遭到了周亚夫的强烈反对，君臣为此而发生争执，景帝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目的。从此以后，景帝就开始疏远了周亚夫。

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和梁王刘武之间发生了嫌隙，梁王从此怀恨在心。以后，刘武每次进京朝见，都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与皇帝的隔阂这时景帝的生母窦太后提议要封景帝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她对景帝说：“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很为难的说：“当初先帝并没有封太后的亲属为侯，是我即位以后才封他们为侯，现在我即位不久，实在不能封王信为侯。”窦太后说：“君主应按当时的情况办事。我的哥哥窦长君活着的时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后，其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为此事深感遗憾。”她说到这里，用命令的口吻说：“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答道：“这件事我得与丞相商量商量。”后来，景帝与周亚夫商议这件事。果然不出所料，周亚夫坚决表示反对，认为不能违反高祖刘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禁令。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景帝听了默然不语，也因此一直没有封王信为侯。因为这件事，窦太后也记恨在心。后来，匈奴有一些人来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周亚夫却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君主来投降陛下，陛下现在却要封他们为侯，以后又怎么能责备那些不守节的臣子呢?”景帝这次很坚决，直接否定了周亚夫的意见，封那些来降的人为侯。周亚夫因为皇帝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感到很不高兴，因而称病在家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失去了皇帝欢心的周亚夫终于被罢免了丞相的职务。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饮食。席上放了一大块没

有切开的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里不满，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着发笑，说：“这不是没有给你的筷子吗?”周亚夫向景帝免冠称谢。景帝说：“起来吧。”周亚夫快步出宫，不告而别。景帝两眼直盯着他出去，说：“他如此含恨在心，终究不是我这年轻君主的臣子。”

被人诬告时过不久，周亚夫的儿子从工官那里购买了五百具甲盾，准备将来父亲死后作殉葬品之用。因为他苛待雇工，不给工钱，了解实情的雇工知道，这是私买皇帝的器具，就上书告发了周亚夫的儿子。这件事也牵连到了周亚夫。

景帝看了告发之书，就交给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发书中所列罪状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也无从回答。景帝却因此大为恼怒，把周亚夫交给执法宫廷尉处治。廷尉责问周亚夫说：“侯爷为什么想造反呢?”周亚夫说：“我所买的器具，只是葬器而已，又怎么说的上是谋反呢?”廷尉官说：“你即使在活着的时候不谋反，恐怕也准备死后在地下谋反吧?”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这些严酷的官吏更加紧了对周亚夫的威逼。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本来就打算自杀，但是被他的夫人制止了，所以没有死成，就被廷尉捉了去。现在他知道自己在这些酷吏手中是活不了的，于是自己绝食五天，最后吐血而死。他的封国也被废除了。一代名将周亚夫就这样含冤而死了。狂人东方朔在皇帝面前仍然耍贫嘴，成为千古传奇人物。

不幸的童年东方朔原本姓张，小名曼倩，但后来却又为什么又姓起“东方”来呢?原来他是一个“弃儿”。生父姓张，名夷，字少平，母亲田氏。当他来到人间刚三天，母亲就去世了。父亲觉得实在无法养活他，只好把他扔出了家门。当邻家听到婴儿啼哭声将他抱回来的时候，此时正值东方发白，于是便取姓“东方”，名“朔”。据说，东方朔生性滑稽，出语诙谐，举止荒诞，常给他的升迁带来麻烦，甚至引起人们的攻击，用“狂人”的称呼来侮辱他。但是看起来东方朔对这个外号却并不怎么在意，反而还有一些得意呢。

他虽然在无知时就失去了亲生父母的爱抚，但却在义母的精心抚养下茁壮成长起来了。刚满三岁，就显露出独特的性格。他记忆力特别强，而又富有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兴趣。尤爱“天下秘识”，“一

览”就能“喑诵于口”，且又喜欢指天画地，像着了迷一样地自言自语。为了探索书中的奥妙和寻求未知的世界，小小年纪就敢离家出走，经月不回。义母虽曾严加管教，但这个放纵不羁的孩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多次逃离家园，在外流浪，即使是被蚊叮蛇咬，狼追狗扑，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东方朔渐渐地从苦难中挣扎出来，得到了足够的知识、胆识和体魄，就等着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了。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临了。

东方朔特殊的简历武帝即位初年，为了招揽天下贤才为自己的帝业效忠出力，便下了一道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的诏书。于是，四海有识之士，纷纷聚集长安。他们殚精竭虑、洋洋洒洒向皇上进言，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够被皇帝所赏识，进而分得个一官半职。机灵洒脱的东方朔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也向汉武帝上了一封书信。据说，这封上书足足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人才能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在自我推荐书中，他毫不自逊地夸赞自己身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后生，具有勇、捷、廉、信的性格特征。即自诩有齐国勇士孟贲般的臂力，春秋时庆忌般的敏捷，齐国鲍叔般的廉洁，战国尾生般的信守，具备了成为“天子大臣”的条件。他还声称，自己大气早成，才学过人，说：“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看起来他非常有自信的认为皇帝一定会对自己感兴趣的。果然，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许自夸的推荐书，被他这种不亢不卑、大言不惭的自白，引起了好奇心，又很赞赏他的气概，所以就召他在公属中作了一个小官。

关于侏儒的玩笑过了一段时间，东方朔不满意目前的处境。因为他始终没有机会接近皇上，发表自己对治国的建议，施展自己远大的报复，而且，生活待遇低下，每天都食不果腹。一天他出游都中，见到一个侏儒，就恐吓他道：“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像你这样矮小的人，留下来根本毫无用处，要你们去种田吗?你们不能耕地扛锄，算不了一个好农民叫你们去当官吗?你们没有理政、治民的本领；要你们去当兵吗?你们又不能横枪跃马、杀敌夺虏，留着

你们对国家对社会都是一个累赘，不如统统杀了的好，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只知伸手要吃、要穿的人。所以如今皇上一律要杀掉你们。”

侏儒听后大哭起来。东方朔对他说：“你暂时不要哭，皇上就要来了，他来了你就去叩头谢罪，也许还能得到宽恕。”一会儿，武帝真的乘辇经过这里，侏儒立即上前去哭着跪下，连连磕头。武帝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哭啊?”侏儒回答说：“东方朔说皇上要把我们这些矮小的人全都杀掉!”

汉武帝这才知道原来是东方朔出的歪点子，就找他来责问。东方朔却振振有辞，他说：“侏儒身长不过三尺许，他们一月能得到一袋口粮，还有二百四十钱俸金。他们撑饱了还有余有剩。我身高九尺三，每月也是一袋口粮、二百四十钱俸金，食不饱肚，衣不蔽体，这实在是不公平了。如果陛下认为我是一个可用的人才，就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才对。如果认为我是无用之辈，就应该早早遣散我回家。您怎么能忍心让我沦为长安城中的一名乞丐呢?”汉武帝听罢，哈哈大笑。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升了他的官，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以备咨询。从此，东方朔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

博古通今据说，因为东方朔读的书很多，总是知道一些别人闻所未闻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武帝也经常找他来询疑解惑。有一次，皇宫的花园中忽然钻出一头奇怪的动物，有人向汉武帝报告，并引来一群人围观，但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于是只好诏见东方朔。狡黠的东方朔一看就知道答案了，但他却故弄玄妙地先提出个要求：“我知道这是什么动物，但陛下先赐给我美酒佳肴，我才愿说出来。”汉武帝满口答应了。等到他酒足饭饱之后，又提出一个要求道：“某地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要是慷慨赐给我，我立即就说出来。”汉武帝急于要了解这头不知名的怪物究竟是什么，也就爽快地答应了。东方朔这才胸有成竹的说出：“这是一种名叫驺牙的动物。这种罕见的动物出现，说明远方必有来归附的人，所以驺牙先来预报。”武帝听了，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一年以后，果然有匈奴混邪王率领着将士十万前来降汉。真不知这是一种奇妙的巧合，还是真如东方朔所说这是一种预告迹象的动物。反正不管如何，这都博得了汉武帝的欢心，又赐给他很多钱财。

又有一天，武帝在宫里玩耍嬉戏，把一只壁虎放在盂盆下要大臣们猜是何物，大臣们都猜不出。东方朔上前猜道："这是龙吧，没有角；是蛇，却有脚，它肢跤脉脉地会在墙壁上爬行，这不是壁虎，就是四脚蛇!"汉武帝便赐给他十疋缎子。接连又叫他猜，他都能猜中，得到很多的赏赐。真不知他到底是如何猜中的。

正是因为东方朔来自下层社会，接触面较广，加之又读过很多书，有着超人的见识，常能为汉武帝解疑答难，且性格活泼，出语诙谐，深得武帝的欢心。所以虽然他经常有一些行为不检的地方，但是武帝都会原谅他的过错。例如有一天，天气特别热，汉武帝下诏要官员们到宫里来领肉。官员都到了，可是等了好久，分肉的官员还未来，东方朔就自己拔出剑割了一大块肉，并对同僚们说："大伏天，肉容易腐烂，大家快快拿回去吧!"第二天，武帝很生气的对东方朔说："昨天赐肉，你为何不等诏书下来，擅自割肉归家，这是为什么?"东方朔却诙谐的说了一首顺口溜："朔来!朔来!受赐不等诏书下来，为何这样的无礼!拔剑割肉，为何这样勇敢!割得不多，为何如此廉俭!带回家给细君(即妻妾)，又为何表现得如此的仁爱!"汉武帝听了，不但没有再生气，反而被他逗笑了，说："我要你作自我批评，你倒是表扬起自己了!"于是又赏赐给东方朔酒一石，肉一百斤，让他都拿回家去。

正是由于东方朔在许多时候能为皇上解难答疑，又很机敏灵活，汉武帝一直把他留在身一边，他的官职也逐步由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直至太中大夫的很高职位。丝绸之路张骞这个名字和丝绸之路一起留在了史册当中。

切断匈奴的胳臂汉武帝初年的时候，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汉武帝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一点西域(今新疆和新疆以西一带)的情况。他们说原来草原上有一个叫月氏的国家，他们被匈奴人打败了，被迫向西逃去，现在就定居在西域一带。他们跟匈奴有深仇大恨，一直想要报复，可就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又没有人能帮助他们。

汉武帝心想，这个月氏国既然是在匈奴的西边，汉朝如果能跟月氏联合起来，从东西两边夹击匈奴，就能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这不是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胳膊吗?那样就能削弱匈奴人的力量了。

于是，他下了一道诏书，征求能干的人到月氏国去联络。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月氏国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离中原有多远，更别说中间还要路过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要担负起这个任务，可得有很大的勇气才行。

正巧当时朝中有个年轻的郎中，名叫张骞，很有胆识。他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首先应征。

有他一带头，别的人胆子也大了，很快就有一百名勇士应了征。有个在长安住了很久的匈奴族人，叫堂邑父，他也愿意跟张骞一块儿去找月氏国。

做了多年的俘虏于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派张骞带着这一百多人出发去找月氏。要到月氏，就一定要经过匈奴占领的地界。张骞他们小心地走了几天，还是被匈奴兵发现围住了，全都做了俘虏。

出行图匈奴人没有杀他们，只是派人把他们分散开软禁起来，只有堂邑父跟张骞被关在一起。一住就是十多年。

日子久了，匈奴对他们管得不那么严了。张骞跟堂邑父商量了一下，抓住匈奴人不防备的时间，骑上两匹快马逃了。

他们一直向西跑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终于逃出了匈奴的地界。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月氏国，却意外地闯进了另一个国家叫大宛(今中亚细亚)。

大宛和匈奴是近邻，当地人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堂邑父都能说匈奴话，交谈起来很方便。他们见了大宛王，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个富饶强盛的大国，这回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很欢迎他们，并且派人护送他们到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再由康居到了月氏。

月氏被匈奴打败了以后，就迁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附近建立了大月氏国。因为那里水草丰美，物产丰富，人民过的都很好，所以他们也不想再跟匈奴作战了。大月氏国王听了张骞的话，虽然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张骞是汉朝的使者，也就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

张骞和堂邑父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还到大夏去了一次，看到了许多从未见到过的东西。但是他们一直没能说服大月氏国共同对付匈奴，只好回来。在经过匈奴的地界时，他们又不幸的被抓住了，扣押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巧匈奴发生了内乱，这才逃出来回到了长安。

十三年的出访张骞这次出访，在外面足足过了十三年才回来。汉武帝认为他立了大功，封他做太中大夫。

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他说："我在大夏看见邛山(今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当地的人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天竺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就一定离蜀地不远。

于是，汉武帝再次派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想去结交天竺。张骞把人马分为四队，分头去找天竺。四路人马各走了上千里路，都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天竺国。有的还被当地的部族打了回来。

往南走的一队人马到了昆明，也给挡住了。汉朝的使者绕过昆明，到了滇越(今云南东部)。滇越国王的上代原来是楚国人，已经有好几代跟中原隔绝了。他表示愿意帮助张骞找去天竺的路，可是昆明在中间挡住，还是没能过去。

等张骞回到长安，汉武帝认为他虽然没有找到天竺国，但是结交了一个一直没有联系过的滇越，也很满意。

到了卫青、霍去病消灭了匈奴兵主力，匈奴逃往大沙漠北面以后，西域一带许多国家看到匈奴失了势，都不愿意再向匈奴臣服、进贡纳税了。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和他的几个副手，拿着汉朝的旌节，带着三百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带着一万多头牛羊和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礼物去结交西域各国。

张骞首先到了乌孙国(在新疆境内)，乌孙王亲自出来迎接这些汉朝的使者。张骞送了他一份厚礼，建议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乌孙王只知道汉朝离乌孙很远，可不知道汉朝的兵力有多强。他想得到汉朝的帮助，又不敢得罪匈奴，因此乌孙君臣对共同对付匈奴这件事商议

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张骞恐怕耽误了行程，就打发他的副手们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大月氏、于阗等国家。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

这许多副手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来。乌孙王先派人送张骞回到长安，派了几十个人跟张骞一起到长安参观，还带了几十匹高头大马送给汉朝。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了乌孙王送的大马，所以格外优待乌孙使者。这些乌孙使者瞧见了大汉的富强，都感到很震惊。

过了一年，张骞得病死去了。这时他派到西域各国去的副手们才陆续回到长安。副手们把到过的地方合起一算，总共到过三十六个国家。

从此，汉武帝每年都派使节去访问西域各国，并且和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交往。西域派来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过西域运到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后来人们就把这条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同时，人们也记住了张骞这个名字。李广难封侯一生驰骋疆场，最终却死于自己的剑下。

飞将军唐朝诗人王昌龄有一首诗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里面所说的“龙城飞将”就是指在汉朝有。“飞将军”之称的李广。李广是西汉镇守边关的一员猛将，他英勇善战，威震边塞，令匈奴人闻风丧胆，因此被匈奴人敬畏的称为“飞将军”。

李广一生征战沙场，与匈奴军队交战达七十余起。在这些战役中，他一直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杀敌的，因此非常受将士们的爱戴。他在十七岁的少年时期，就投身于军队，在汉文帝时候就做了将军；汉景帝的时候，他跟周亚夫一起平定七国之乱，立过大功；后来，汉景帝又派他去做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太守；汉武帝时，又常常派他和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等人一起带兵去攻打匈奴，可谓劳苦功高。

据说有一次，景帝派了一名亲随到李广军中，这名亲随带了几十骑卫士出游，不巧正遇上匈奴进攻上郡，结果他们在回营的路上遭遇三名匈奴骑士，卫士们全被射杀，亲随本人也中箭逃回。李广听说了，马上带着一百个骑兵去追赶那三个匈奴射手，追了几十里地才追上。他射死

了其中的两个，把第三个活捉了，正准备回营，却远远望见有几千名匈奴骑兵赶了上来。他们见到李广等人，还以为是汉军的诱敌之兵，连忙抢占了一座高地。李广所带的百骑兵士一看自己已经让匈奴的军队包围了，古代风景图都慌忙的上马想调头逃跑。李广大喝一声制止了他们，镇静的对他们说："我们离开大营还有几十里地。如果现在往回跑，匈奴兵追上来，我们就完了。不如干脆停下来，匈奴兵以为咱们是来引诱他们的，一定不敢来攻击我们。"于是，他不退反进，在离开匈奴阵地仅仅两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命令兵士一齐下马，把马鞍全卸下来，就地休息。匈奴的将领看到李广这样布置，心里更加害怕了。他们远远地观察汉军动静，不敢上来。只派了一名将官出阵试探，李广却飞马奔出，很快地抢到阵前，一箭就将他射落马下，然后从容归队。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一直到了半夜，匈奴人认定这一定是汉军的诱敌之计，怕汉军半夜袭击他们，就连夜全部逃回去。到了天亮，李广一瞧，山上已没匈奴兵，才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安然回到大营。

第九章

战败的耻辱公元前129年，匈奴人大举入侵中原，攻到了上谷郡。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和李广等人兵分四路，各率骑兵万余名，赶赴边塞。匈奴的军臣单于探明了汉兵的情况，知道四名将军中最难对付的是李广，就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雁门，沿路布置好埋伏，命令部下活捉李广。匈奴兵多势盛，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李广的人马被打散，李广自己也受了伤，被匈奴兵俘虏了。匈奴兵见到李广深受重伤，昏迷不醒，就把他放在一张网上，把网挂在两匹马之间，就这样把李广拉回了匈奴大帐。

途中李广清醒过来，拼命跃起，骑上了一匹匈奴的战马，把原本在马背上的匈奴兵踢了下去，又抢走了他的弓箭，一蹦向南急驰，匈奴派了几百名骑兵追赶。李广一面使劲夹住马肚子，催马快跑，一面回转身来，拈弓搭箭，一连射死了几个追在前面的匈奴兵。匈奴兵眼看赶不上李广，只好眼睁睁让他跑了。李广会合了部下的残兵败将，返回了雁门关。但是，李广惨败，兵将损失严重的消息传到了京师，汉武帝顿时大怒，本来想将他问斩，可是又想到他德高望重，屡立战功，就让他交纳了赎罪金，贬为庶民。几年之后，因为匈奴又在边境骚扰，汉武帝才又重新起用李广。

射中石虎多少年来，李广一直在北方边境防守。因为李广行动快，箭法精，忽来忽去，叫人摸不准他的路子。所以匈奴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叫“飞将军”。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匈奴人害怕古代风景画飞将军，所以一直不敢进犯。据说，有一次李广回来晚了，天色朦胧，他和随从一面走，一面提防着老虎的袭击，忽然瞧见前面山脚下草丛里蹲着一只斑斓猛虎。他连忙拿起弓箭，使尽全力射了过去。凭他百发百中的箭法自然射中了。手下的兵士见他射中老虎，拿着刀枪跑上去捉虎。他们走近一瞧，全愣了，原来中箭的不是老虎，竟是石虎，而且这支箭陷得很深，几个人想拔都拔不出来。大伙儿真是又惊奇，又佩服。李广走过去一看，自己也纳闷起来，石头怎么能射得进去呢?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对准那块石虎又射了几箭，箭碰到石头，只进出火星儿，却再也射不进

去了。但就是凭这一箭，人们都传说飞将军李广的箭能射穿石头。

拔剑自刎后来，汉武帝又派李广跟随大将军卫青去进攻匈奴。李广向卫青请求担任大军的先锋队，卫青不许，反倒命令他从荒凉的东道行军，限期会合。卫青率领汉军追杀匈奴大军，在赵信城时，捕获并斩杀了一万九千余名匈奴兵。而此时李广的军队却因为道路险恶而迷失了方向，从而延误了军机。卫青指责李广故意拖延军务，按律当斩。李广十分悲愤，他流着热泪对将士们说："我自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从没贪生怕死过。想不到今日却因为迷途而误了军期，现在却被大将军如此催逼，我已年过花甲，哪能再受这样的屈辱!"说罢拔出配剑引颈自刎。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悲惨地死去了。将士们看到平素里爱兵如子的李将军竟死得如此悲壮，不禁都失声痛哭起来。附近的百姓们知道了这个噩耗，也都是泪水涟涟。

李广的一生，大都投入了抗击匈奴的事业。他身经大小七十几次战斗，由于他英勇善战，成为匈奴贵族心目中可怕的劲敌。虽然李广没有被封侯，可他在将士、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却是难以磨灭的。大将军卫青一个彪炳青史的人物，原来是私生子，真是英雄莫问出处。

一个私生子卫青是汉武帝时出击匈奴的著名将领。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够当上位高权重的大将军，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赢得了武帝的宠爱，当上了皇后。于是，在当时的京城长安中有歌谣说：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意思是说卫氏一门的显贵全靠了卫皇后。当然卫青也不例外。但是事实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在两汉时期，许多左右朝政的外戚的确都是靠裙带关系窃居高位的，但是卫皇后的家人称霸朝廷却是另有原因。这其中包括卫青、霍去病，他们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卫皇后失宠，二人在朝廷的地位也丝毫未受影响。

卫青的母亲是平阳侯家中的帮佣，她和同在平阳侯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了卫青。后来，因为他的母亲感觉供养他非常艰苦，就把他送到了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但郑季的夫人根本看不起卫青这个私生子，让他到山上放羊，郑家的几个儿子也不把卫青看成手足兄弟，随

意苛责。卫青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受尽了苦难，在他的性格形成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一次，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你现在穷困，将来定为贵人，官至封侯。"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卫青长大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就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又因为他怨恨郑家对他没有一点亲情，所以就自己决定改姓为卫，从此与郑家完全的断绝了关系。

平步青云的机会公元前139年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这确实是卫青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却不是他发达的惟一原因。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那么，卫青就有可能在皇宫中当一辈子的侍卫了。

卫青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从此，卫青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这次用兵，汉武帝派卫青、公孙敖、公孙贺和李广分为四路出击。卫青首次出征，但他英勇善战，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首700人，取得胜利。另外三路则有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高兴，加封他为关内侯。从此，卫青开始在北击匈奴的大业中崭露头角。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决定避实击虚，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在这次战斗中，卫青率领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立下了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在紧接着的战斗中，卫青又抓获了匈奴的右贤王，俘虏了一万五千多人和几百万头牲畜。汉军大获全胜，高奏凯歌，收兵回朝。汉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拼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这样是不能鼓励将士奋

力作战的。他们三人怎敢接受封赏？”汉武帝随后又封赏了随从卫青作战的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李沮、李息、窦如意等。

后来，卫青又率领着汉朝的大军，多次进击匈奴人，最终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的大将军，朝中官员无不巴结奉承。这时，平阳公主寡居在家，要在列候中选择丈夫，许多人都说大将军卫青合适，平阳公主笑着说：“他是我从前的下人，过去是我的随从，怎么能做我的丈夫呢?”左右说：“大将军已今非昔比了，他现在是大将军，姐姐是皇后，三个儿子也都封了候，富贵震天下，哪还有比他更配得上您的呢？”汉武帝知道后，失笑道：“当初我娶了他的姐姐，现在他又娶我的姐姐，这倒是很有意思。”于是当即允婚。时迁事移，当年的仆人就这样做了主人的丈夫。这样一来，卫青与汉武帝亲上加亲，更受宠信。但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

黯淡的晚年后来，汉武帝对霍去病恩宠日盛，霍去病的声望超过了他的舅舅卫青，过去奔走于大将军门下的许多故旧，都转到了霍去病门下。卫青门前顿显冷落，可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心甘情愿地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

公元前106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汉武帝命人在自己的茂陵东边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像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以象征卫青一生的赫赫战功。霍去病少年得志同样也是一个私生子，却创造了更大的功绩。

又是一个私生子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他的母亲卫少儿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里的奴婢，在与平阳县衙役霍仲孺私通后，生下了霍去病。

霍去病从小生活在奴婢群中，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精通了骑马、射箭、击刺等各种武艺。

后来，霍去病的姨母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中，并被立为皇后。卫氏家族从此平步青云。到十六七岁时，霍去病已经长成了一个相貌奇伟、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青年。汉武帝很赏识他，派他做了保卫皇帝安全的

侍中官。

这时，西汉王朝与匈奴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匈奴屡次入侵，汉武帝一改以前的和亲政策，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战争。霍去病的舅舅卫青几次领兵攻打匈奴，立下赫赫战功。

少年请缨公元前123年春，汉武帝再次组织对匈奴的反击战争。这一年，霍去病刚刚18岁。他听说舅舅又要出征，便跃跃欲试急不可耐地向汉武帝请战。汉武帝见他少年英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骠姚校尉，由卫青挑选了800名骁勇矫捷的骑兵归他指挥。霍去病率领着这800骁骑一往无前地向北奔去。莽莽草原，人迹全无。他们不知不觉地走了好几百里，将近黄昏，忽然发现前方远处有一片黑点。霍去病判断应是匈奴的营帐，当即命部下衔枚而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过去。匈奴兵根本没古代风景画想到汉军会这么远地杀来，顿时一片混乱。霍去病身先士卒，首先闯入匈奴营帐，800骁骑也个个勇猛无比，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

这次战役，霍去病功居第一，其他各路有胜有负。卫青将战争的经过报告了汉武帝。汉武帝对霍去病大加赞赏，大大夸奖他以800骁骑斩杀了2000多名敌人，又封他为冠军侯，并给了他许多赏赐。

战绩卓著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率一万骑兵，从陇西地区出发，孤军深入沙漠，去寻找匈奴的主力，伺机作战。霍去病的军队一路顺风，势如破竹。他们先穿越了今甘肃省山丹地区东南的焉支山，深入达千余里，遇见了匈奴大军，短兵相接后，他们杀死了匈奴的两个王，活捉了浑邪王的太子和相国，就连休屠王平时祭祀用的金佛像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紧接着，霍去病又带兵第二次出击，孤军深入到祁连山腹地，与匈奴军队会战。这一仗，又擒获了匈奴王、单于、王子、相国共百余人，取得了很辉煌的胜利。汉武帝加封霍去病食邑5400户。从此，霍去病的声望日益显赫，地位日益尊贵，几乎与舅舅卫青相当了。两次河西战役之后，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这对匈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匈奴人非常惋惜，他们悲伤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

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为了铲除匈奴对大汉侵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决定再一次派卫青、霍去病各自率领五万精兵，分两路夹击匈奴军队。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军。卫青从定襄出塞，北进1000多里，与匈奴伊稚斜单于所率主力相遇，经过激战，大败匈奴单于，斩获19000多人，一直追到真颜山赵信城才胜利班师。

汉武帝原来的计划是由霍去病专力对付匈奴单于，所以给他配备的全是经过挑选的精兵强将。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出发，大胆地重用匈奴降将赵破奴、复陆支、伊即轩等，在大沙漠地带纵横驰骋，行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间河，与匈奴左贤王相遇。汉军发动猛攻，左贤王大败而逃。这次战役，活捉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匈奴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歼敌7万名。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全军覆灭。霍去病率军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德尔山)。为庆祝这次战役的胜利，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积土增山，举行祭天封礼，又在姑衍山(狼居背山附近)举行祭地禅礼，并登临瀚海(今贝加尔湖)，刻石记功，然后凯旋还朝。

古代风景画霍去病因功加封食邑5800户，并与舅舅大将军卫青一起被拜为大司马。从此以后，匈奴向北向西迁到更偏远的地方去了，长城内外一片和平气象，人民安居乐业。

传说在河西战役期间，汉武帝特地从京城送来一坛美酒，霍去病没有独自享用，而是将酒倒入泉水中，让全军将士饮用，后来，此泉就称为酒泉，当地也就以酒泉命名。

霍去病一生曾四次领兵出塞攻打匈奴，共歼敌11万多人。他平时少言寡语，战场上却勇猛无比。他是一位军事天才，汉武帝常常劝他学习孙吴兵法，他却说：“为将须随时运谋，何必定拘古法呢?”他是凭借战场上的直觉指挥战斗的，随机应变，闪电式行动，使他百战百胜，成为名扬后世的一代名将。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屡立战功，获得了高官厚禄，但他把个

人的享受搁在一边，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河西战役胜利后，汉武帝为了奖励他的卓越战功，特意命人在长安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住宅，叫他去看看是否满意。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气概豪壮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传语千古的名言就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

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4岁。对于这位青年名将的过早离去，人们都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惋惜。汉武帝特地命人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形状像祁连山的坟墓，并发动陇西、北地等五郡的匈奴人民，身穿黑甲，把霍去病的灵柩从长安护送到墓地安葬。霍去病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苏武牧羊苏武的身上真正地体现出了汉民族的高尚气节。

匈奴人的口是心非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实力最为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多次派出大军进击匈奴。尤其是他先后两次派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去攻打匈奴，使匈奴人元气大伤，从此退回大漠以北，不敢再骚扰汉朝的边境。自此以后，汉匈双方几年都没打仗。然而，匈奴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要跟汉朝和好，实际上他们变换了许多狡诈的手段欺骗汉朝朝廷，心里还是想着等自己恢复好了再随时进犯中原。

于是，为了争取军队修整的时间，匈奴的单于一次次派使者来求和，可是当汉朝的使者到匈奴去回访时，有的却被他们扣留了。没有办法，汉朝便也只得扣留了一些匈奴使者。

苏武被擒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攻打匈奴时，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都放了回来。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就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苏武到了匈奴。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礼物。苏武正等单于写个回信让他回去，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祸从天降，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导致了苏武后来九死一生的生活。被匈奴扣留了十九年，差点客死异乡。原来，在苏武没到匈奴之前，有个汉人叫卫律，在出使匈奴后投降了匈奴。单于特别重用他，封他为王。卫律有一个部下叫做虞常，对卫律很不满意。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原来是朋友，就暗地跟张胜商量，想杀了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原去。

苏武牧羊张胜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但是他却没有向苏武报告这件事。没想到虞常的计划没成功，反而被匈奴人逮住了。单干大怒，下令就地幽禁全部汉使，还让卫律审理此案，并让他劝降苏武。苏武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到了这时候，张胜怕受到牵连，才告诉苏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苏武很是冷静，他对卫律说，我是汉使，要是辱没了国家的使命，活着也没有颜面回祖国了。说完，苏武拔出佩刀就要自杀。张胜和随员常惠眼快，夺去了他手里的刀，把他劝住了。那个虞常到也是一条有骨气的好汉子，尽管他受尽了种种刑罚，却只承认跟张胜是朋友，曾经说过几句话，拼死也不承认汉使跟他同谋。卫律向单于报告。单于大怒，想杀死苏武，被大臣劝阻了，单于又叫卫律去逼迫苏武投降。

苏武一听卫律叫他投降，就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违背了使命，丧失了气节，活下去还有什么脸见人?"又拔出刀来向脖子抹去。卫律慌忙把他抱住，苏武的脖子已受了重伤，昏了过去。卫律赶快叫人抢救，苏武才慢慢苏醒过来。单于觉得苏武是个有气节的好汉，十分钦佩他，就让苏武好好养伤。等到苏武伤痊愈了，单于又想逼苏武投降。单于派卫律审问虞常，让苏武在旁边听着。卫律先把虞常定了死罪，杀了。接着，又举剑威胁张胜，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于是卫律对苏武说："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苏武说："我既没有跟他同谋，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

卫律又举起剑威胁苏武，苏武不动声色。卫律没法，只好把举起的剑放下来，劝苏武说："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好，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的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富贵荣华。先生如果能够投降匈奴，明天也跟我一样，何必白白送掉性命呢?"苏武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背叛了朝廷，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决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窖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屈服。

毫不屈服这时候正是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了一把雪止渴；饿了，扯了一些皮带、羊皮片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单于见折磨苏武没有用，就把他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上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

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不过是说要长期监禁他罢了。

苏武到了北海，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惟一和他作伴的，就是那根代表汉室朝廷的旌节。匈奴不给苏武口粮，他就掘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旌节上的穗子全掉了。这期间，苏武的好友，李陵投降了匈奴，他曾经是苏武的知音和至交。李陵也受单于的委派，前来劝降苏武，可苏武坚决拒绝了李陵的游说和劝诱，告诉他，不要再说了，没有意义和结果的。

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派使者来向汉朝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经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称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后来，汉朝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惠此时还在匈奴。他买通匈奴人，私下和汉使者见面，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

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送消息呢，就连忙向汉朝使者道歉："苏武确实是活着，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40岁。他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百姓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自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都说他是个有骨节的大丈夫，真英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是家喻户晓的汉代一对令人羡慕的鸳鸯。

凤求凰卓文君，是今天四川一带的人，她出生于当地一名叫卓王孙的富户家中，是卓王孙宠爱的女儿。据说卓文君相貌俊美，而且精通音律，是不可多得的才女。她十几岁就嫁了人，不幸的是，结婚不几年，

丈夫就死了。当时才十七岁的卓文君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心情自然非常郁闷。她被父母接回家，从此长住在娘家。

一天，卓王孙宴请当地县令王吉，王吉带来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介绍说是他的朋友，此人就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他住在当时的蜀郡成都。司马相如自幼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总是结结巴巴的，但他爱好读书写字，还喜欢击剑，最擅长的是文章辞赋。因为仰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所以改名为司马相如。这天，他原本不想来赴宴的，而且是沾别人的光，可又听说请客的卓王孙家有个绝色的美女，这才强打精神，来到了卓家。

或许，这就是命运，命中注定，卓文君要和司马相如相识。宴请中，酒过三巡，司马相如已略有醉意，此时王吉请他抚琴，正是对了他的心思，身为大才子，又精通音律，此时不展现更待何时?于是，司马相如轻轻拨弄丝弦，优美的《凤求凰》在他指下奏出，也敲开了卓文君的心。卓文君从内室轻轻挑帘一望，演奏乐曲的是位俊美的翩翩公子，于是心中不免思量，不知不觉中竟喜欢上了这位飘逸儒雅的客人。而与此同时，司马相如也发现了竹帘那头的天仙美女，果然绝色。于是，便曲调一转，在琴声中暗送秋波，聪颖的卓文君顿时领会，二人相约，夜晚幽会。这次幽会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定下了百年之好，又怕卓王孙不同意，年轻人在冲动之下，决定私奔。卓文君的出走，果真令卓王孙十分愤怒，本想立即派人去追，可又想想，人走也走了，与事无补，只好随她去了，不再追究。

私奔二人私奔之后事情为大家所熟知，身无分文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穷困潦倒，不得不又回到了故乡。二人一合计，便在集市上卖酒。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的确可以维持生计，而且确实有很多人慕名前来买酒；二是可以羞一羞卓王孙的脸皮，没准他还会拉这小夫妻俩一把。在王吉的帮助之下，他们买好了一处酒舍，由卓文君亲自做酒，司马相如充当伙计，而且穿上破衣烂裤满街招摇。更有市井之民说，卓文君的衣裙都遮不全身体，颇有出卖色相的嫌疑。果然，卓王孙听说私奔的女儿回来了，还衣不覆体地在集市卖酒，十分生气，并且深深引以为耻。这时，由卓文君的家人出面劝说，分给司马相如夫妻二人家童和钱财，缓和了两方的关系。于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购买了车马，置办了田

宅，一时又恢复了往日富庶的生活。酷吏—张汤一生使用严刑峻法的张汤终于也被皇帝逼着饮下了一杯毒酒，毫不被人怜悯地死去了。

小时候显现的才能张汤的父亲曾任长安丞。7岁那年，父母外出，他因为贪玩不顾家，结果厨房的肉被老鼠叼光了。父亲回来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张汤决定惩办“盗肉贼”，他先是进行“侦察”，接着“捕拿”：在一个洞口张好网，另一个洞口采取烧柴灌油的方法，老鼠果然一一落网。张汤又挖出洞内的残肉做“罪证”，然后，一拍惊堂木，历数“罪犯”的“罪状”，最后，对老鼠处以极刑——就地打死。他的父亲看到后暗暗高兴，知道他有审理案件的才能，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

张汤政坛得意周阳侯田胜是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的弟弟。他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张汤一心帮助他，对他关怀备至。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田胜经常引见张汤遍雪后景像见各位贵族，使他的名气大增。后来，张汤担任给事内史，因为办事无误，由内史宁成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武安侯田纷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

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关系密切，张汤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赵禹。但是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倨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过食客。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张汤却为人狡诈，玩弄智谋驾御他人。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皇上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一定预先为皇

上区别断案的原委，凡是皇上肯定的，就确定为成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主上的英明。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皇上拜谢，他还揣摸皇上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臣下愚昧，只及于此。”因而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皇上奏事，受到称赞，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他断决的罪犯，若是皇上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皇上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官去办。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低”，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织其罪；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失，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严酷的官吏像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丞相公孙弘多次称道他的优点。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武帝欲释放严助和伍被。张汤与武帝争论说：“伍被本来就曾谋划反叛之事，而严助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私自交结诸侯亦如此类，不加惩处，以后将无法处治。”武帝因此同意将伍被、严助治罪。他以审理案件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的表现，多像这样。从此，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杀身之祸田甲本是张汤当小吏时的朋友。他见张汤的权势太盛，就指出其过失，告诫他不要结怨太多。但是张汤却不以为然。后来，他当了七年的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杀身之祸。

河东郡人李文曾与张汤有隔阂，不久担任御史中丞。为了泄愤，多次在上奏的文书中寻找对张汤不利的证据，都没有得逞。张汤有个心爱

的属吏名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便指使他人上奏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奸邪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以死罪。实际上他心里明白此事是鲁谒居所为。武帝问起这件事说：“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张汤假装吃惊的地说：“这大概是因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引起的。”

古代风景画这时有人盗走了孝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到了武帝面前，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皇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审查这件事。张汤还想奏报说丞相知道盗钱之事，丞相庄青翟深感恐惧。于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因此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囤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一一予以否认，不服。于是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赵禹见到张汤后，责劝张汤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呢?你审讯处死了那么多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想让你自己赶快妥善处置自己，好平息这些案子。你又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张汤这才明白了皇帝的心意，于是上书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糠有外椁。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晋升了张汤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大侠郭解大侠郭解，纵情任性，最终难逃一死。

少年侠客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是汉代著名的

相士许负的外孙。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爱好行侠仗义，在汉文帝时被诛杀。到了郭解这一代，他并没有吸取父亲身亡的教训，或者说郭家的血液里就流动着激情澎湃、酷爱冒险的因子，郭解仍然随心所欲地纵情任性，为所欲为，很像是后代武侠小说中亦正亦邪的人物，如此特立独行，在民间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但是，在一个控制严密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需要的是任由摆布的听话顺民，而不是这样极有个性和主张的知名侠士。因此，最后名声太大的郭解就因此被皇帝下令处死，就连他的家人也没能逃过这个劫难。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但是他的性格沉静，为人勇悍，从不喝酒。郭解年轻时也曾经像他的父亲一样，心狠手辣，恣意杀人。他有时候肯舍命帮助素不相识的人去报仇，但有时又干些藏匿好人、打家劫舍、铸钱掘墓的事情。谁也搞不清他为人究竟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只知道他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所作所为全是凭着自己一时的心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郭解忽然出入意外地一改前行，从此开始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而不自恃功劳。本来他已经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声，因为这种人人乐见的改变，他在当地的声望更高了。

公平处事据说，郭解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向对方灌酒，却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了。郭解的姐姐来求郭解给自己儿子报仇，但是郭解因为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所以没有答应。他的姐姐因此大为愤怒，把儿子的尸体陈尸街头，想借此来羞辱郭解。后来，那个杀害郭解外甥的凶手自己归来，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反而还说，这是我的外甥做得不对，就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默不作声地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当地百姓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郭解的门客看见了很生气，就想上前杀了那个人。郭解说：我在家乡得不到尊重，这说明我的修行还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当地的尉吏说：“这个人我很敬重，到“践更”时不要为难他。”(“践更”是当时的一种徭役。)结果在这以后，每月一次的践更，拖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人去找那个人。那个人觉得很奇怪，找人一问，才知是郭解求人替他解脱的。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向郭解谢罪。郭解此举，更是得到乡里少年们的

倾慕。

那时候。郭解所居住的邻县雒阳有一对互相结仇的人，县里的豪杰多次从中调解，他们始终不听，不肯放弃冤仇。郭解听说后，就连夜赶过去见那对仇家。那两个人最终听从了他的劝解，放弃了恩仇。郭解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但是，在雒阳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反而由我劝解开了，恐怕有点不合适。我还是尽快离开这里的好。”于是，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去为人办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当地的许多富家大族都很依赖他，争相请他做事，那些四处亡命者也多从远方来投奔郭解。而县中那些崇拜郭解的少年和旁近各县的豪杰，也经常把自己的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那些投奔郭解的人使用。

武帝的命令武帝的时候，朝廷下令要迁徙豪富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于朝廷的控制。郭解的家里其实很穷，甚至连买柴的钱都没有，但也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听说过郭解的名声，就主动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听了卫青的话，却说：“郭解身为一介布衣百姓，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啊!”于是，郭解仍旧被迁徙到茂陵。在他临行之日，县里前来送行的人非常多，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的豪杰无论听没听说过他的名字，都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一家被迁徙到茂陵，本来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的侄儿却非常鲁莽地把当地县吏的头扭断了。后来，县吏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杀了。杨家有人为了这件事向武帝上书，可是又被那些仰慕郭解的人杀了。接连出了几件这样的事情，武帝听说了，就下令逮捕郭解，并且命令一定要抓住那些杀人犯法的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来办案的人到了郭解住的地方，郭解的门客一致声称郭解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还齐口称赞郭解的贤德。但是，这时却有一儒生说：“郭解专门做这些奸邪的事，以至于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又哪里称的上是贤人呢?”这话一下子就触动了众怒，书生不久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却不知去向。办案

人查明以后，于是回报武帝说郭解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无罪的。但是，当时朝中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虽然不知是谁杀了人，但他身为布衣百姓，任侠行权，收罗众多门客，让这些人因为一些小冤小仇就动辄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郭解全家都被诛杀了。巫蛊之祸有人利用汉武帝迷信鬼神的心理，操纵了一幕巫蛊的闹剧。

第十章

后宫的争风吃醋第一次巫蛊之祸发生在公元前130年。当时的陈皇后是汉武帝的姑表妹，名阿娇。汉武帝在由胶东王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中，他的姑母长公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武帝对她很感激，于是按照姑母的意思，娶了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为妻。武帝即位以后，阿娇被立为皇后。这样的政治联姻使得陈阿娇飞扬跋扈，不可一人物画像世。她的嫉妒心异常的强烈，为了独占丈夫，对汉武帝的管束也很严格，以至于婚后十余年，非但自己不能生育，还使出各种手段迫害其他的嫔妃，使其他嫔妃也未能产下一子半女。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汉武帝少年登基，年近三十却仍然膝下空虚，自然十分郁闷，满朝文武，也都为此而忧心忡忡，纷纷想方设法，推荐了十几位美貌女子给汉武帝。可是，汉武帝没看上这些出身高贵、修饰得体的女人，反而爱上了一个歌女，名叫卫子夫。

卫子夫出身卑微，却深得汉武帝宠爱，这使得陈皇后十分嫉恨。她几次三番地寻死觅活，想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汉武帝，这让汉武帝焦急万分，心中更是恼怒。而且，陈皇后每闹一次，汉武帝的恼怒怨恨也就更加深一层，更是从此对皇后不闻不问。最后，陈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后宝座，竟然铤而走险，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这可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东窗事发后，陈皇后被汉武帝废除了皇后之位，从此居住在冷宫之中，再也得不到宠幸，孤老终死了。

宫廷争斗第二次巫蛊之祸发生在公元前92年。当时朝廷正在搜捕一个罪犯朱安世，可逮捕的命令下达了很久，都没有能将其抓获，汉武帝催得更紧。这时，丞相公孙贺的儿子，身为太仆的公孙敬声，自以为是皇后的外甥，就目无纲纪，擅用军饷，导致被捕入狱。公孙贺为了救儿子，主动请缨追捕朱安世，以弥补儿子的罪孽，汉武帝恩准了。后来，朱安世果然被他抓获。在狱中，他得知丞相捉拿自己是为了替儿子赎罪时，他就立即上书，向皇帝告发了公孙敬声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的事情，并且检举说他们还用巫术诅咒汉武帝。汉武帝派人查办，发现朱安世所举报的情况属实，就下令杀死公孙父子，株连九族。而汉武

帝的女儿阳石公主，和卫皇后的侄子等人，也都被牵连诛杀。这一次的巫蛊之祸，牺牲要比第一次大得多。

太子的厄运如果巫蛊之祸终止于此，也就罢了。然而，汉武帝晚年益发崇信鬼神，体弱多病，更加好猜疑，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总是担心左右人会用巫蛊害自己。他的猜疑心理，被江充利用，制造了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巫蛊之祸。

江充本是赵国邯郸人，他曾出使匈奴，回到京师后拜为绣衣使者。据说，有一次江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路上遇到太子的家奴乘马车在道路中央驰骋，这是逾矩的行为，江充将太子的家奴送去法办。尽管太子再三求情，他仍不许，由此和太子结下了仇怨。而汉武帝认为他刚正不阿，很是赞赏，遂大加任用。

公孙贺的巫蛊之祸后，汉武帝住在甘泉宫，此时已经病重。江充见汉武帝年老，担心以后皇帝死了，太子登基，自己会被诛杀，就上书说汉武帝的病情加重是巫蛊在作祟。于是汉武帝听信了江充的话，责成他处理巫蛊案。江充借机大肆严刑逼供，使人诬告太子，因这次巫蛊案而获罪的，有数万人之多。随后，江充揣度汉武帝的心思，投其所好，说宫中有巫蛊之气，汉武帝于是命令宫人掘地，江充伺机在太子宫地下埋了木偶。当时汉武帝住在甘泉宫，消息不怎么灵通，太子害怕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就和卫皇后商量，准备杀死江充。

结果，一时间长安城内大乱，都谣传说太子要谋反，结果众将士都不听太子的指挥。太子兵败，只得外逃，卫皇后被赐死。不久后，太子被围困致死，皇孙也一并被害。这一次巫蛊案，皇后被赐死，三十七岁的太子遇害，而其他被牵连诛杀的人，数以万计。最重要的是影响是帝嗣空缺，后宫无主，朝纲失控，这给汉朝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汉武帝来不及重新立嗣，驾崩之前，在仓促之间，不得不采用周公辅政的办法，托孤给朝中的大臣。

纵览汉武帝时期的三次巫蛊之祸，其结果是两位皇后被废杀，两位丞相死于非命，太子、两位公主和皇孙也被牵连诛杀。再加上其他遭难的人，前后不下十数万之众。制造巫蛊，一害他人，二害自己，牺牲太

大了。虽然后来汉武帝知道了太子惶恐的真相，其实并不是想谋反，汉武帝很是后悔，可惜已经太晚了，他只有建造追思台来凭吊自己的皇后和太子了。司马迁与《史记》

遭受宫刑的司马迁，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李陵说话司马迁是西汉时候夏阳人，因为得罪了汉武帝而遭受宫刑，后来忍辱负重，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史家巨著——《史记》。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武艺高强，爱兵如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封他为都尉。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陵率领5千精兵良将策应主帅抗击匈奴。李陵挥师南还时，遭遇到3万多匈奴骑兵的围堵。李陵率部浴血奋战，杀死千万敌兵，这令匈奴单于胆战心惊，准备退兵。然而不幸的是，李陵部下一个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招供出此时的李陵孤军无援，而且粮草尽绝。知道了内情的匈奴大军疯狂发起反扑，李陵和诸将拼死厮杀，5千精兵只剩下十几人。看着越来越多的匈奴军队包围着自己，看着伤痕累累、赤手空拳的部下，李陵这堂堂汉子不由得流下热泪，说：“全军覆没，还有何面目去见皇上呢?只能日后见机立功吧!”说罢，他下马投降了匈奴。

匈奴单于很佩服李陵的英雄气概，把女儿嫁给他，让他在匈奴享有尊贵的地位，期望他能效忠自己。

汉朝上下得知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后，朝野震惊。汉武帝盛怒之下，下令杀死了李陵的母亲和妻儿，以报复和惩罚李陵。汉武帝召集群臣廷议李陵罪行，大臣们纷纷顺着汉武帝的看法，痛斥李陵贪生怕死，投降变节，都指责他不忠于国家。只有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勇于替李陵辩护：“李将军以5千步兵，剿灭万余匈奴骑兵，已经对得起天下人了。如果不是孤军奋战，且没了粮草供给，他绝不会投降的。再有，李将军未必会是真降，或许日后会寻找机会，报答皇恩。”司马迁的看法可以说是客观的，可这却激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我派李陵出兵就错了，对李陵亲属的处理不对啦?”于是，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听不进去司马迁的辩解，直接把他打入了监牢。

司马迁严惩司马迁作为史官，必须要有坚持真理，客观记述史实的

精神。司马迁没有虚伪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而是如实地记录并且评价着统治者的功过是非。对汉武帝的缺点，他也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这样，就招致了汉武帝对他的嫉恨，并且早就准备伺机收拾他了。这次正好借李陵事件对他加以迫害。

司马迁被判了宫刑(所谓宫刑，就是像对待太监一样，阉割男子的生殖器。)这样的酷刑，对于司马迁来说，不仅剥夺了他作为男子的权利，更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司马迁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留下的只有难以洗刷的耻辱。在耻辱和负罪的双重压力下，结束痛苦，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一死了之。事实上，司马迁不是没有想到过死，可当他重新审视了古往今来的圣人贤人的处事之道后，他对忍辱负重的那些人的生命价值作了理性的思考。终于，司马迁毅然决然的放下了儒家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志士仁人的观念，虽然自己遭受的耻辱比历史上其他先贤们所受的耻辱都要惨烈，但是，父命尚未完成，自己的文采还没有得到发挥。既然残酷的现实已经无法改变，他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了。

于是，他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中汲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终于完成了为后世流传千古的史学巨著——《史记》。君臣不相疑君臣之间的情谊，成为千古传颂的经典。

汉武帝托孤汉武帝七十多岁的时候，身体日渐衰弱，病痛缠身，而且每天都愁眉不展。因为他知道，自己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可是自己又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杀了培养多年的太子。所以他现在对自己的身后事非常忧虑，其中头等大事就是要早立太子，免得死后国家大乱。

当时汉武帝还有三个儿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是亲兄弟，但是他们平日骄横不法，不能立为太子。可是小儿子弗陵这时还只有七岁，汉武帝想立他为太子。因此就想先为年幼的太子物色一个忠实可靠的大臣来加以辅佐。

汉武帝认为，朝中大臣只有霍光可担此重任，所以就想把国事托付给霍光。他想起了古代周公辅佐年幼成王时的故事。周公曾背着小成王临朝，会见诸侯继承大统。汉武帝就让人根据这个故事，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这是用图来暗示霍光将来要像周公辅成王一

样来辅佐幼主弗陵。

过了一年，汉武帝病危，霍光流着眼泪问汉武帝：“如果陛下有个三长两短，由谁来继承皇位呢?”汉武帝这时明确地说：“立我的小儿子弗陵为太子，由你来履行周公辅成王似的职责。去年我送给你的那幅画，你到现在还没有领会其中的意思吗?”霍光见皇帝对自己如此信任，就只好含泪答应了。第二天，汉武帝就死了。太子刘弗陵继承皇位，他就是汉昭帝。

他人的怨恨霍光自从接受了汉武帝的遗诏，担负起辅佐幼主、治理国家的重任，他工作得更加勤恳谨慎了，兢兢业业地治理着国家。但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威望也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嫉恨他，总是在小皇帝身边说他的坏话，这让霍光一直提心吊胆。

汉昭帝的同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因为没有当上皇帝，心里老是怨恨不已，一直想自己来当这个皇帝，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先除掉保护昭帝的辅命大臣霍光。反对霍光的势力也趁机和燕王刘旦相勾结，密谋策划先挤垮霍光，再废昭帝拥立燕王为帝。燕王刘旦恨不得马上当皇帝，就催上官桀等人早点想办法动手。以燕王刘旦为首的政变集团，在暗中布下了罗网，就等着霍光往里钻了。

皇帝的绝对信任有一天，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皇帝的近卫队)操练，并且调了一个校尉(仅次于将军的军职)到大将军府里来工作。上官桀等人认为这是整垮霍光的好机会，于是乘机假冒燕王刘旦的名义给昭帝上书，状告霍光。他们一告霍光出城集合御林军操练，一路上耀武扬威，坐着像皇帝出巡时一样的车马，违反礼仪规定，不像个大臣的样子。二告霍光擅自作主，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最后还表示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来警卫皇上，查处奸臣作乱的阴谋等等。昭帝看了告状信后，当时没有表示可否，就把此事先放下了。

第二天早朝时，霍光已知道被他们告了，就不敢上朝，留在偏殿里等待昭帝的处置。昭帝一上朝，没有看见霍光，马上问：“大将军怎么没来上朝?”上官桀立即回答说：“大将军因被燕王告发，心虚不敢进来了。”汉昭帝派人去叫霍光进来。霍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入朝，脱下帽

子叩头请罪说：“臣该万死!请皇上发落。”

汉昭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霍光说：“大将军戴上帽子，请起来。我知道这封告状信是假的，是有人想陷害你，你并没有过错。”

霍光听了小皇帝的话后，又惊又喜，连忙问昭帝：“陛下怎么知道信是假的呢?”昭帝说：“你出京城去阅兵，只是最近几天的事，选调校尉也不过十天，可是燕王远在北方，怎么就知道了呢?就算知道了，马上就写信派人送来，现在也到不了。如果大将军真的要作乱，也用不着调一个校尉。这件事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你。我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也不会上这种当的。”聪明机智的汉昭帝还下令要追查冒名伪造信件的人。上官桀等人焦急不安，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的阴谋，就劝昭帝说：“这点小事算了，不必再追查了吧。”昭帝不仅没有松口，反而更加怀疑上官桀等人了。

后来，上官桀等人还是经常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不仅不听他们的，反而大发脾气，警告他们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临终前托他辅佐我治理国家。他帮我办了很多好事，这是臣民有目共睹的，以后再有人毁谤他，我一定要从严惩处了。”这样上官桀等人想借皇帝的手来除掉霍光的阴谋也破产了。可是他们还不甘心，又心生歹计，想策划暗中杀了霍光，然后夺取帝位。但是，他们的阴谋很快就被霍光发现了，他将他们政变的阴谋，奏告昭帝，然后把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都杀了。燕王刘旦和长公主也畏罪自杀。从此以后，朝中再也没有人敢离间昭帝和霍光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君臣相得，互相信任，共同治理着国家，为西汉政权的稳定繁荣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年轻聪明的汉昭帝21岁就死了。他们这份难得的君臣之情不得不提早结束了。汉元帝宠奸任佞汉元帝在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奸任佞，一批奸佞小人麇集于朝廷要枢。

一个太监的权柄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与中书令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他嘴唇灵巧，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

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他们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等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奸佞势力。元帝性格柔弱，采取折衷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元帝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氏又稳操实权，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大臣无用的劝谏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定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在一次朝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古代风景图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们不贤明?”元帝说：“后人看到乱世亡君的恶果，所以知道不贤明。”京房说：“这么说来，是任贤必治，任佞必乱。那么幽、厉为何不觉悟，为何一直任用佞臣，以致搞得国破身亡?”帝回答：“面临乱亡的君主都自以为任用的臣是贤臣，若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昏君呢!”京房把话锋一转，问：“那么陛下观当今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毫不隐讳地说：“也算是极其混乱了，还有什么说的。”京房又问：“那么当今陛下任用的是何人?”元帝支吾其词：“………话不能这么讲，今天虽然混乱，比幽、厉时还算好些，况且这与用人没有关系。”京房感慨地指出：“陛下，前代君主就是这样看待他那个时代的，臣恐怕后人评论今天，也像我们今天评论前代一样啊。”元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他问：“那么，你说今天为奸行佞的乱臣是谁?”京房回答：“明主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朕不知道。如果知道，朕为何还要用他?”京房说：“臣所说的，就是陛下所最信任、共同在帷幄中密图大事、掌握天下用人权的那个人。”元帝明白京房指的是石显，于是说：“朕已知晓。”

京房这番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但京房退后，元帝信任

石显一如既往。因为石显已经用各种狡诈手段骗得了元帝对他牢不可破的宠信，石显对元帝骗得越深，元帝对石显越宠信，后来干脆把朝政一股脑儿推予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继肖望之、周堪、张猛死后，石显为排除异己，又陆续害死京房、郑弘、张博、贾捐之、苏建等人，并迫害陈成、朱云、王章等多人。由于元帝过于宠信石显，石显总以中书(尚书)权力侵夺朝权，渐使汉代尚书机构权重起来。石显凭借尚书权，先后清除政敌，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野，有的合家流放，不少人被推上断头台。上至公卿下至郎吏的满朝官员，无不畏惧以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走路时抬腿落足也不敢疏忽大意。王昭君出塞因为画师从中作梗，成就千古佳话。

求亲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汉朝又强盛了一个时期。那时候，匈奴由于贵族争夺权力，势力越来越衰落，后来，匈奴发生分裂，五个单于分立，互相攻打不休。

其中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死伤了不少人马。呼韩邪和大臣商量结果，决心跟汉朝和好，亲自带着部下来朝见汉宣帝。

呼韩邪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汉宣帝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他，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他要求汉宣帝帮助他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了两个将军带领1万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还送去3、4万斛粮食。

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一心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和汉朝和好了，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汉宣帝死了后，他的儿子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没几年，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汉朝派兵打到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把郅支单于杀了。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就稳定了。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汉元帝同意了。

以前，汉朝和匈奴和亲，都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这回，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

画师的诡计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一样，都巴望有一天能把她们放出宫去。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

有个宫女叫王嫱，也叫王昭君，长得十分美丽，又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她毅然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

管事的大臣正在为没人应征焦急，听到王昭君肯去，就把她的名字上报汉元帝。汉元帝吩咐办事的大臣择个日子，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

呼韩邪单于得到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高兴和感激的心情是不用说的了。

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看到昭君又美丽又大方，多少有点舍不得。他想把王昭君留下，可是已经晚了。

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他再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模样虽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可爱。

原来宫女进宫后，一般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到皇帝那里去听候挑选。有个画工名叫毛延寿，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宫女们送点礼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王昭君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

汉元帝一气之下，把毛延寿杀了。

和平象征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她骑着马，迎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

日子一久，她慢慢地也就生活惯了，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匈奴人都喜欢她，尊敬她。

王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从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王昭君离开长安没有多久，汉元帝死去。他的儿子刘骜即位，就是汉成帝。汉成帝的结局汉成帝在朝中的昏庸、宫中的无能，导致了西汉社会的严重混乱。

身边都是小人汉成帝听不进逆耳忠言，忠直有节之士遭贬斥远离朝廷，围在成帝周围的阿谀奸佞小人往往得到重用。

都尉侍中淳于长无德无能，只是在立赵飞燕为后时有功，为成帝宠幸，“遂封为宝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遣赏赐亦累巨万，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

张放因陪同成帝逸游，深得成帝信任，“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张放有恃无恐，纵奴为奸盗，还公开藏人于张放府上。张放下令家奴设弓弩射杀来捕盗的官吏。甚至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带人闯进官府，砸坏器物，捆绑官吏。官府内无人敢管，纷纷逃散。张放和他的爪牙为夺人妻而杀人夫，为报一人仇而尽杀人亲属。后来告发张放的人日益增多，在皇后的干涉下，成帝才不得已把张放遣出京师暂避，不久成帝又偷偷把张放召回。

官吏枉法成帝时官吏枉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成帝母舅、红阳侯王立藏匿潜逃的罪犯，王立门下宾客结伙为盗，公开作恶。司隶京兆尹对他们也不敢过问。王立和淳于长暗中勾结，徇私枉法。案发后，朝臣奏请将王立下狱。成帝却说：“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成帝的庇护、官吏们的横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当时京都长安恶棍横行，竟有恶人专用红弹丸射杀武官，用墨弹丸射杀文官，用白弹丸专杀仇人。造成长安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炮鼓不绝。”

对此，成帝不闻不问，整日沉醉“温柔乡”中。执掌大权的公侯大臣

们乘机竟相争利肥私，祸国殃民。

古代瓷器有一个成都富豪商贾叫罗裒，带着千万资财来到京师。他用半数钱财去贿赂曲阳侯王根和淳于长。他们得了好处后就给罗裒大开方便大门，把国家财利让给他。得到保护的罗裒肆无忌惮，“依其权力，赊货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他们一方一本万利，另一方塞满私囊，受损失的是国家，最终受苦的还是劳动人民。

贪得无厌的官吏们还直接从农民手里夺取田土，增加财富。红阳侯王立，通过南郡太守李尚，把农民已开垦的田地数百顷作为荒地划归自己所有，然后把这些土地卖给国家，得钱一万万以上。丞相张禹当官时就买了渭水、泾水边的沃田百余顷。到了老年，他又看上了平陵肥牛亭的田地，向成帝奏请。成帝对张禹是有求必应，不顾别的大臣的反对，赐给了他。日薄西山的西汉王朝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腐朽的生活，成帝又“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广大农民在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层层盘剥下，失地破产，流离失所，人民穷困，国家疲弱，“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统治阶级的黑暗残酷，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成帝时期民众起义不断暴发，直接威胁了汉朝的统治，西汉王朝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西汉统治阶级病入膏肓，西汉社会哀歌四起，而成帝却还沉浸在“温柔乡”中。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在赵昭仪(赵飞燕的妹妹)处，早晨起床袜子还没有穿好，就一命呜呼了。赵飞燕姐妹畏惧朝野舆论，相继自杀，但汉家政权由此一蹶不振，西汉王朝已日薄西山了。汉哀帝割袍断袖汉哀帝确实可以算勤俭节约的人，为人就不那么有效了。

崇尚俭朴的生活汉哀帝，名刘欣，是汉元帝的孙子，汉成帝的侄子。他三岁时世袭中山王爵位，十九岁时在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的帮助下，继承大统，可谓是尊贵无比。

然而，汉哀帝身上却少有一般贵族的奢华气息，他崇尚简朴的生活。继位后不久，他就废掉了汉成帝时兴盛起来的乐府官，反对皇族贵戚们过奢靡的生活。接着，他又罢止了齐国的三服官(是汉朝管理织造丝

服的官员)，提倡臣民们过节俭的日子。汉哀帝自己仅仅册立了一后一妃，以缩减后宫的用度。皇帝带头过朴素平淡的生活，古今少有，汉哀帝这样的做法是为什么呢？

早在汉成帝时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贫苦的农民无立足之地，统治阶级又拼命地征收重税以敛财，从而供自己大肆挥霍。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汉成帝还营造了昌陵，花费钱财一百亿元，同时征地平掉了百姓的坟墓几万座，颠沛流离甚至死亡的百姓有几十万人，导致民怨载道。当时又有连年水灾，大批饥民难民流落异乡，只得卖身为奴。这样一来，贫苦的农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他们只能揭竿而起，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高潮。

汉成帝初年，关中地区有数百人起义河古代兵器平三年、阳朔三年、鸿嘉三年、永始三年……都有人起义。虽然农民起义最终被汉朝统治者镇压了下去，但却暴露出汉王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了。

汉哀帝即位之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阶级矛盾严重，农民反抗剧烈；王莽把持朝政、觊觎汉室天下；官僚生活腐败、敷衍国事政务。这也是汉哀帝初年的三大统治危机。他必须要缓和阶级矛盾，笼络人心，才能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于是，汉哀帝下诏，罢掉乐府官，禁止靡靡之音在汉朝的继续泛滥。他一向反对贵族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提倡过平淡的生活，勤俭节约。同时，免去齐国三服官，不再设立专门管理织造丝织服装的部门，提倡君臣都衣饰朴素，减少用度。汉哀帝的本意是通过减少高档消费，从表面上看，缩小了贫富差距，使对比不再那么悬殊，让穷人感到心理平衡，化解了农民反抗的怨气。

不好女色好男宠汉哀帝的个人生活，也可称得上是简朴了。据说，他“雅性不好声色”。他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娶了王妃；他被立为太子后，王妃跟着被改立为太子妃；他登基为帝后，太子妃即成为皇后。汉哀帝从没有喜新厌旧，对原配不离不弃。他虽贵为天子，却从不纵情声色，仅册立了一位昭仪，姓董。董昭仪的住处名为椒风，和皇后的住处椒房相呼应。董昭仪是汉哀帝最欣赏的女子，可她的住处也是很简朴，

生活上也很简单，不讲究铺张浪费。汉哀帝的私人生活如此朴素，除了上述政治意义，可以号召臣民效仿学习，减少用度之外，会不会有什么隐衷呢？

事实上，汉哀帝身子孱弱，不能多近女色，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减少对女人的兴趣。他选择了补偿的目标——男宠。他的男宠名叫董贤，原本是他做王爷时的舍人。有一次董贤在殿下报时，汉哀帝见到了，顿时一见钟情。董贤蒙汉哀帝恩宠，先后拜为黄门郎、驸门都尉侍中。董贤以身侍帝，同卧同起。据说一次午睡，汉哀帝的衣袖被董贤的身体压住了，他想起床，可又怕吵醒董贤，于是就用刀割断了衣袖，可见恩宠无可比拟。董氏一门由于董贤的缘故，得以升官加爵，荣耀无比。他的亲妹妹即是上面所提到的汉哀帝最欣赏的女子——董昭仪。此外，董贤的父亲、岳父、内弟，都先后被封了高官。董贤自己也成为大司马，权倾天下，傲视权贵。

王莽的谋略董贤其实是个绣花枕头，胸无点墨。汉哀帝是个饱读诗书、熟悉治国之道的人，怎么会把大司马这样的重要权位放心地交给董贤呢？

这要从王莽说起。汉哀帝即位之初，正是王氏外戚专权、独揽朝纲的时候。汉哀帝要夺回军政大权，就必须要削弱王氏的权力。汉哀帝用自己的外戚丁氏代替王氏外戚，夺回了朝权。但他只给了丁氏尊贵的地位，并不交给他们实权。后来，他罢免了大司马丁明，由董贤代之。傀儡董贤当大司马，实际上等于全部权力都掌握在汉哀帝自己的手中。汉哀帝得以暂时实现了他的君主高度集权。他尊崇董贤，就可以压制和控制朝野的各派势力，震慑皇族贵戚，使他们不敢与王权抗衡，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汉哀帝提倡节俭，很大程度上掩盖和缓和了社会贫富分化的矛盾，但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实际上，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他重用董贤，看似夺回了大权，实则，王莽的势力不久就东山再起。汉哀帝下诏时还限定了田宅和奴婢的数量，触动了大地主的利益，势必会遭到反对，他的设想流于破产。汉哀帝的措施，实际上已经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刘氏天下已摇摇欲坠。王莽的毒酒身为国丈的王莽，残忍

地杀死了亲女婿——汉平帝。

位极人臣王莽，字巨君。他原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儿，在汉成帝、汉平帝时都任大司马，总揽大权，风光无限。他把女儿嫁给汉平帝为后，更是以国丈这无以伦比的尊贵身份掌控朝纲，权可倾国。王莽的权势和地位已经是位极人臣，且皇帝又是自己的亲女婿，可他却残忍地杀死了汉平帝。

王莽的姑母名叫王政君，登上汉元帝皇后的宝座后，娘家一族封爵授官，显贵无比。王莽的父亲早逝，没有能受到皇恩，分得个一官半职，因此他们家仍旧生活贫困。但是王莽却胸怀大志，并不跟那些受到皇后封授的亲友攀比，而是洁身自好，苦读诗书，结交名士，很有远见，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赞誉。王莽还小心地伺侯自己的贵族亲属，颇受他们的青睐。当时朝中的大司马大将军就是他的伯父，名叫王凤。王凤病重时，王莽比亲生儿子还要细致周到地服侍他，这让王凤很感动，临终前托付汉成帝和王皇后，授王莽一官半职。

于是，王莽从黄门郎做起，开始步入仕途。不久他就因为表现突出而升为射声校尉。他经常做一些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事，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爵位越尊贵、节操越谦逊的圣人的形象。在众人的盛赞下，他被荣封为新都侯，晋官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在年仅30岁的时候，就成为朝廷重臣。公元前8年，王莽更是击败了姑表兄淳于长，成为大将军。

被迫辞职汉成帝死后无子，就立了侄儿刘欣即位，即是汉哀帝。汉哀帝即位后一个月，就尊奉自己的亲祖母傅昭仪为太皇太后，母亲丁氏为皇太后，追封傅、丁两族的已故亲属。一时间傅、丁两族显赫无比，荣耀至极。傅、丁两姓新的外戚与把持朝政已26年的外戚王氏一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汉哀帝为维持政局的稳定，命令王莽让出大司马之位给丁氏，王莽无奈只好辞职。

后来，汉哀帝着手开始削夺王氏的爵位，把王氏权贵纷纷赶下台。傅、丁两家封侯受赏，跋扈不已。王莽此刻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滋味，他认识到了权力的宝贵，积极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公元前1年，汉哀帝逝世，王莽重新执掌大司马的职位。这时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因年幼无法亲政，就由王太后临朝，大权实际上落在了王莽的手里。王莽害怕汉平帝日后重演哀帝更换外戚的历史覆辙，就封汉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封平帝的舅父卫宝、卫玄为关内侯，命令他们留居中山，不得入京。

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申屠刚，他上书建议应该迎卫姬入京，这一下可触怒了王莽，结果被罢官。王莽的长子王宇害怕汉平帝亲政后，因王莽苛毒而迁怒于自己王氏一族，就想用计使王莽还政给平帝，以求日后能得到皇帝的宽恕，他派妻兄吕宽去王莽府门前喷洒污血，利古代灯台用王莽怕鬼神的弱点来吓唬王莽。不料王莽的门吏发现了吕宽鬼鬼祟祟的行动，报告了王莽，得以追查出真相。王莽真不愧是心狠手辣，他逼死了自己的儿子王宇，将吕宽下了狱，把自己的叔父王立，堂弟王仁、王安都害死，肃清了反对自己的势力。王莽还趁机把卫氏一族牵扯进来，除卫姬外，他屠杀了所有的卫氏族人。一时间，朝中再也没有人能跟他一争长短，他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王莽设计铲除了平帝母亲一族，又计划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为后，安享国丈的无上荣耀。汉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就上书为帝选后，他先虚伪地把自己女儿的名字划掉，再暗示朝臣们请愿。这样一来，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书，请汉平帝立王莽的女儿为后。最后，他的阴谋终于实现。从此，他的女儿成为帝后。他成为当朝天子的岳丈，又是惟一的外戚。作为国丈执掌朝中大权，甚至还凌驾于汉平帝之上。

汉平帝内有王莽的女儿的监视，外有王莽的控制，又远离自己的亲生母亲，心中对王莽自是十分仇恨。到底还是年少不经事，汉平帝无意中流露出了对王莽的怨恨，被监督他的人知道了，报告给了王莽。这使得王莽警觉起来，他明白小皇帝一旦长大后亲政，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自己这个国丈。于是，他决心不留汉平帝，必须除掉他。

给皇帝一杯毒酒公元5年，大臣们欢聚一堂，为汉平帝贺寿。王莽献上一杯酒给皇帝祝寿，平帝喝了这杯酒后，毒性在夜间发作起来，腹痛难忍。王莽得讯，知道毒酒发作，心中大喜。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虚情假意地仿照周公替武王祈祷的故事，将自己甘愿代死的祷文封在

匣内，以示忠心。汉平帝几天后终于不治身亡，王莽又假惺惺地令天下官吏穿孝衣三年，以示郑重怀念。汉平帝死后，王莽又选择了更年幼的仅仅两岁的小王孙刘婴立为皇太子，自己摄行皇帝之事，称“摄皇帝”。公元9年，他再也装不下去了，终于自立为帝，定国号为“新”，史称新朝。

为了争权夺势，历朝的宫廷内都充满了腥风血雨。王莽的女婿汉平帝因为怨恨王莽而招致杀身之祸，可刘婴仅仅五岁就被废掉，说明了什么呢?由此可见，任何人阻挡了王莽窃取天下的脚步，都成为他的绊脚石，不管是女婿还是儿子，他都毫不手软，坚决除掉。权贵的心中只有权力，根本就没有骨肉亲情。这样看来，王莽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势，而杀害自己的女婿，宁可让女儿当寡妇的行为，就不奇怪了。杀死亲生儿子王莽为了他朝思暮想的皇位，可以说是“大义灭亲”地逼迫自己的亲儿子自杀。

大义灭亲公元前8年，王莽刚刚38岁，就被升为大司马。他平素一向尽力表现出仁义礼孝、忠君爱国的样子，希望博取皇帝和朝臣们的尊敬与信任。旁人也确实都被他表面上做出来的样子骗了，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君子。

然而，信任他的汉成帝去世后，哀帝即位，任用了新外戚傅、丁两族，王莽的大司马之职刚当了一年，就不得不被追让位给丁氏。王莽于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阳，积极结交地方上的士大夫，准备东山再起。

但就在他家居之时，他的家人却又出了问题。他的二儿子王获，意外之下杀死了一个奴隶，这种事在当时本来不是什么大事。要知道那个时候，官宦世家都养着很多奴隶和婢女，尽管皇帝有严令，不允许任意杀害奴隶，但是在大家族里死一两个奴隶实在不是什么大事。可是王莽为了博取自己的好名声，却对自己的儿子痛加斥责，而且还命令儿子王获自杀给那个奴隶偿命。

王莽这样“大义灭亲”的举动，虽是小题大做，却果然如愿地为自己赢得了极好的声誉，朝野上下对他是一片赞美之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汉哀帝只好恢复了王莽的官职。于是，他踏着亲生儿子的鲜血，重

新登上了大司马的高位。

第二个儿子的鲜血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汉平帝即位，平帝的皇后就是王莽的亲生女儿。平帝年幼，王莽从此得以掌握了朝政大权。他还怕有其他人来争夺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卑鄙地用计排挤了平帝的母亲卫氏一族，不许平帝的亲生母亲和小皇帝见面，也不让卫氏族人到京城来。他的大儿子王宇很担心汉平帝长大后怨恨王莽造成自己骨肉分离，从而迁怒于王氏一族，甚至要王氏后代遭受灭门之祸，一直为此而忧心忡忡。可他知道，父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从自己的劝说。为了避免日后的灾祸，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但他却绝对没有想到，这条“妙计”一出，就搞掉了自己的性命。

为了这件事，王宇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吴章和妻子的哥哥吕宽商议计策。吴章知道王莽迷信鬼神，就出主意说，把狗血洒在王家的大门上，让他感到害怕，吴章再去借机说天神之意是让王莽迎接汉平帝的母亲卫姬入京，还政于卫氏一族。王宇也认为这个办法行得通，就让吕宽赶快去办理。于是这三个人分头行动，吕宽趁着夜黑人静的时候，把狗血淋在王莽府门上，随后慌慌张张地就跑开了。不料王莽的门吏竟然看见了他，还认出这黑影是吕宽，就禀告了王莽。王莽听说此事，连夜审问吕宽，吕宽又供出了王宇。

王莽面对自己的亲儿子王宇，气得眉毛倒竖。他呵斥王宇，问是谁指使的，谁是主谋。王宇战战兢兢地供出了老师吴章。他以为父亲这一次大发雷霆，一定会重重处罚自己的。可他万万也没想到，王莽问完话后，什么也没再说，只是冷冷地跟他说：“你自杀谢罪吧!”说完就走开了。王宇实在想不到父亲竟然如此绝情。逼着儿子自杀后，王莽又杀掉了吴章。然后，他决定一不作、二不休，又将屠刀伸向了卫氏一族，杀尽了除平帝的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卫氏亲族，还把王氏一族内与自己不和的亲属，全都扣上通谋卫氏作乱的罪名，杀了个干干净净。朝中大臣也被他借此机会铲除异己，死掉了许多人。这一次，王莽的“大义灭亲”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王宇的鲜血让他荣膺了“宰衡”的称号，得到了“九锡”的待遇，荣耀显贵，无可比拟。王莽踏着两个儿子的鲜血，一步步登上日益升高的台阶，平步青云。公元8年，他成功地篡夺了刘氏的汉室江山，坐上了自己所建立的新朝的龙椅。

第三个儿子的死然而，因为是靠阴谋夺位，他也时时刻刻提防着别人篡夺他的宝座。王莽共有四个儿子，王宇、王获被他逼死后，另外一个儿子被吓疯了，他只好封仅剩的一个儿子王临为皇太子。王莽连续诛杀了两个儿子，妻子为此而哭瞎了双眼，王莽就让王临来侍奉母亲。王莽的妻子有个侍女叫原碧，曾经与王莽私通，这时王临来到后宫时，也和原碧勾搭在一起。日子久了，王临害怕自己的丑事被父亲知道，就和妻子密谋杀掉王莽篡位。可是在他还没来得及行动前，王莽就发觉了这件事，废掉了王临的皇太子之位，并把他撵出京师。第二年，皇后病危，王临写信给母亲，说皇上对子孙太苛刻，大哥、二哥都是三十岁时被父亲逼着自杀了，就不知道自己今年也已经三十岁了，能否保得住这条性命。正巧这时王莽来探视病危的皇后，见到了这封信，顿时震怒异常。皇后一死，他就拷问原碧，问出了她和王临私通的事。王莽怕家丑外扬，竟把参与审问的官吏一同处决，并勒令王临自杀，王妻也被逼自尽。

为了皇位，王莽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中恶毒残忍的本性。连亲生儿子都可以杀了，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呢?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但像王莽这样杀子杀婿的，倒真是不多见。王莽的结局西汉的外戚王莽对夺权蓄谋已久，终于如愿以偿地篡夺了汉朝的天下。

第十一章

王莽复古王莽即位做了皇帝以后，面临着西汉来年一片衰败混乱的政治局面。为了挽回败局，王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王莽首先改革了官制，将传说的上古官制拿来和汉朝官制结合，就成了新朝的官制。关于土地改革，王莽参照了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王田令”，即将天下土地改称为“王田”，同时禁止土地的买卖。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满8人，但土地超过了900亩，就要将多余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没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100亩的标准分配。违背法令的人将被流放。流放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流放后还要服劳役，以后也不准再返回家乡。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响国家劳动力的减少，还颁布了“私属令”，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违令者也是流放。另外，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国家垄断铸钱，国家管理山林水泽，并收山泽税等等。他还先后改革币制，有四次之多，可是每改一次，都使人民更加贫困不堪。

走上末路王莽的新政并没有使他的政权稳固。他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北方匈奴的不满，致使边陲重起战火。当对外的战争正节节败退的时候，朝中的大臣又发生了叛乱。因为这次事件的刺激，对很多的亲信也不再相信了。每当外出的时候，他都要事先派兵在京城搜查，还取名叫做“横搜”。有一次外出，王莽惶恐，竟命令在京师搜查了五天之久。为了防范其他的人谋反，王莽对大臣入宫的随从人数做了限制，这又导致了新的矛盾。太傅平晏有一次进宫时带的随从超过了规定的人数，结果被把守宫门的仆射拦住，双方发生了纠纷，平晏的随从盛怒之下将仆射捆了起来。王莽听说后，气得七窍生烟，马上命人围攻太傅府，把闹事的卫士处死，这才算完。王莽还总是觉得自己的儿子想夺权，因此把儿子也杀死了。

就这样，他虽然用杀戮的手段将内部的祸患消除了，但外面的威胁即起义军却已经壮大起来无法消灭。王莽的统治已经走上了末路。

王莽的一些笑谈在这动荡的乱世之中，王莽再有办法，也不知道该

如何挽救自己的命运。最后，他的所谓救亡措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笑柄。

有人见他很害怕，便对他说，远古的黄帝曾经建了一个华盖，后来黄帝就成了仙。王莽听了，赶忙命人建了一个九重的华盖，高达八丈一尺，将这当成了成仙的车。每次外出，都要在前边拉着。还让几个人在车上击鼓，同时，拉车的三百名勇士边拉边喊："登仙!登仙!"

还有人献计说，按照古时礼制，国家有大古代铜器难时，就以哭来向上天求救。于是，王莽就率领大臣们到了郊外，王莽抬头喊道："苍天!你已将天命授与我，但为什么不替我消灭反贼!如果是我有大错，就请用雷电击死我吧!"然后，王莽就痛哭不止，也许是王莽真的着急了，结果哭得昏了过去。为了向上天表示自己的真心，王莽还命令太学生和百姓们每天都到郊外去哭，早晚各哭一次。他为了让大家尽心地替他哭，还下令说，哭得悲痛的就给郎官做。重赏之下必有"哭夫"，结果短短几天工夫，就有五千人得到了郎官的职位。

在公元23年，即地皇四年，绿林起义军拥立刘玄称帝，年号定为"更始"，刘玄就是更始帝。这使王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为了冲走这个不好消息带来的晦气，王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为了显示自己没有老，他还特意将自己的胡子染成了黑色。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王莽的败亡命运。

公元23年的6月，王莽派出的军队和起义军在昆阳交战，结果王莽军几乎全军覆没。起义军乘胜直捣长安。10月1日，义军攻进了长安的宣平门，进入城内。最后，王莽被起来响应义军的一名商人杜吴杀死。

王莽死后，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初刘邦起义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条巨大的白蛇挡住去路，刘邦抽剑要斩杀这条蛇时，那条蛇忽然说出刘邦有帝王相，但它还是要和他做对，它说，如果刘邦斩他的头他就在他朝代的头捣乱，如果斩他尾，它就在朝代的尾捣乱。结果刘邦将蛇拦腰斩断。最后，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就在中间被王莽的"新"朝捣了十七年的乱。而王莽就是这条蛇后来变成的，而"莽"正好和蟒蛇的"蟒"同音。如此看来，王莽的灭亡真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娶妻当娶阴丽华

刘秀对皇后阴丽华的一往情深更是被后世人传诵的典范。

一见钟情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就是光武帝，他是汉刘秀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王莽的新王末期，天下大乱，起义纷纷，刘秀从南阳起兵，于公元25年重新建立了汉王朝。经过十三年的征发和平定战争，他终于统一了天下。

光武帝刘秀雄才大略，恢弘大度，开明谦和，以文治武功赢得了天下。他勤于国事，治政严明，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大好局面。据说刘秀生活很俭朴，后宫中只有皇后一名，贵人几名，美人、宫女、彩女更是有限。他对皇后阴丽华的一往情深更是被后世人传诵的典范，传说他们恩爱无比，是皇帝和后妃中少有的典范。刘秀更有“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名句流传后世。

刘秀虽然贵为皇族，可在祖辈日渐衰落的时候，家境日益贫困。到了他的父亲刘钦这一辈，仅仅是个县令。刘秀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度过了一个窘困的青少年时代。刘秀家住南阳的蔡阳，与新野县相邻，他常听人赞美新野县首富阴家的小姐阴丽华，聪明贤惠，艳丽娇羞，多才多艺，非常出众。刘秀闻听这样的消息，怦然心动，虽然自幼家贫无助，可也是皇室后裔，更何况他生得身躯英武，眉清目秀，嘴方鼻高，自是有一种英雄气概，绝非燕雀而是鸿鹄啊。于是，刘秀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大丈夫立业扬名天下，娶妻当娶阴丽华，方不负此生！

终成眷属公元22年，天下动荡，南阳又闹起饥荒。刘秀起兵(等到他当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公元57年得到豪强地主的支持，很快他们的起义军发展成为七八千人，阴丽华的哥哥阴识也率领自己的部众投奔了刘秀。不久，他们的起义军加入了绿林军，刘秀任太常偏将军。王莽派了四十二万军队来围剿绿林军，此时刘秀据守的昆阳只有八九千人，他率轻骑十几人昼夜突围，调来援军。后又率三千精兵，突袭了敌军的中坚力量，杀死了敌将王寻。随后，昆阳城内的起义军乘胜追击，内外夹攻，王莽的军队大败。起义军以少胜多取得了昆阳大捷，刘秀在此战役中智勇双全，建立了奇功，一下子威名远扬。

此时，他认为自己建立了一定的功名，不会辱没了阴丽华小姐，就

派人去阴家提亲，阴家早就对这位英雄豪杰敬佩无比，更欲攀附，哪有不同意结亲之理?于是，当年6月，正是意气风发的刘秀娶了年方十九岁的阴丽华为妻。当走进洞房，看到倾心已久的阴丽华那么端庄秀丽，高贵典雅时，刘秀惊呆了。梦寐以求的美人真的走到了自己的身边，好似梦境重现。阴丽华望见自己的丈夫如此英姿勃发，气概不凡，也是十分欢喜。夫妻俩从此恩爱情长，形影不离。然而，三个月后，刘秀要去洛阳任司隶校尉，不得不暂别娇妻。阴丽华遂回到了新野县的娘家居住。

无奈的政治婚姻刘秀在赴洛阳途中，听说哥哥被更始帝刘玄杀害，十分悲愤。他强忍着心中的痛苦，骗过了刘玄，被刘玄封为大司马，前往黄河以北的地区，招抚地方部队。刘秀一路废除了苛政，释放了犯人，他的队伍不断地壮大。可是，北方的宗室此时却突然间拥立了新帝，在邯郸建立了政权，还要追杀刘秀。刘秀得知拥护新政权的武装力量是西汉的真定恭王刘扬，就派人前去游说刘扬归顺自己。刘扬同意归顺，但条件是要刘秀娶自己的外孙女郭圣通为妻。这样，一旦刘秀成了大事，自己也好沾光。

郭圣通是真定人，其父郭昌出身望族，其母是真定恭王之女，更是豪门富族。郭圣通知书达理，容貌姣好，人品更是出众。刘秀知道郭氏有权有势，若能联姻，对自己自是有很大的帮助。可同时，他又觉得愧对阴丽华，她聪慧贤德，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动力，与自己更是情投意合，怎么能让这么优秀的女人寒心呢?刘秀在矛盾中挣扎。

经过了反复的前思后想，踌躇不决，刘秀终于意识到：举起义旗只有前进，没有退路可以选择。如果错失了眼前的机会，失去郭氏对自己的支持，恐怕就要亡命天涯。真到那时，连结发的妻子阴丽华也要跟着自己受罪，就更别提让她享受什么荣华富贵了。这样仔细思量后，刘秀最终决定；答应与郭氏联姻，迎娶郭圣通。

刘秀和郭圣通的政治婚姻很快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使得刘秀如虎添翼，为他最终夺取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宠幸阴丽华公元25年，刘秀在洛阳称帝，改元为建武。第二年，他命人修缮洛阳的宫殿，准备迎接结发妻子阴丽华。此时，距他们新婚一

别已有三年，重逢之时，两人都感慨万分。刘秀认为，阴丽华是那么的高贵典雅，又是自己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具备母仪天下的品质，自己应该立阴丽华为后。可郭圣通和她的族人却也为自己夺取天下开创帝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郭圣通还为自己生下了皇子，按照母以子贵的传统，也该立郭氏为后，更何况，如果不封郭氏为后，势必会失去郭氏族人对自己的支持，对于自己巩固刚刚建立的基业是非常有害的，将造成重大的损失。考虑到这些，刘秀感到非常为难。这时，阴丽华替他解了围。她坚决请求刘秀，立郭圣通为后，这令刘秀十分欣慰，也因此对阴丽华更加宠爱有加。从此，刘秀出征时，都会带着阴丽华，日夜不分离，他们的儿子刘庄也就出生在行军途中。

刘庄聪明伶俐，深得刘秀的喜爱。据说他十岁时就能通读《春秋》，十二岁时，就替刘秀为国事排忧解难，十五岁时，恰逢原武爆发农民起义，官军久平不下，刘秀十分着急。刘庄对父亲建议，采取围城留之阙的计策，导致小股起义军出逃，涣散了农民起义军的军心，成功地瓦解了原武城的武装。刘庄如此足智多谋，让刘秀更加欣赏。他越来越想废掉郭圣通的儿子，太子刘强，改立阴丽华的儿子刘庄为太子了。

公元41年，天下安定，四海升平。此时的郭氏一族，原来的豪强地主，已经不能对刘秀的东汉天下构成威胁了。于是刘秀下诏，废掉了郭圣通的后位，改立阴丽华为后，同时，刘庄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

阴丽华成为皇后，圆了刘秀多年的心愿。在他的心里，阴丽华一直是他的指路明灯，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和最知心的爱人。而郭圣通，不过是他攀登路上的一个台阶，是政治工具，是被利用的角色。所以，郭圣通在刘秀平定天下之后被废去后位的悲哀，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秀为一代帝王，能从感情的需要出发，留给后人“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名言也算是少有的帝王情种了。汉光帝宽以待人刘秀能够完成宏伟事业，除了他的才干之外，还与他宽厚待人的精神密切相关。

不随便杀人刘秀对自己的臣属要求既严格，又宽厚，从不以刑杀立威。如刘秀在河北与占据邯郸的王郎争斗时，因王郎势力较大，刘秀内部一些人与王郎有些来往，以寻求后路。当刘秀消灭王郎之后，缴获了

不少刘秀部下与王郎私下交往、并辱骂刘秀的书信。刘秀故意不去翻阅，还让人把那些书信全部烧掉。于是，那些与王郎有过秘密交往的人员不仅打消了顾虑，而且对刘秀的宽宏大量感激涕零，从此便一心一意追随刘秀打天下。刘秀统一全国之后，也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诛杀功臣，而是教育功臣遵纪守法，善始善终。对其中确有治国才干的，如邓禹、贾复、李通等人参议朝政。其余从南阳起兵以来屡立战功、但缺乏治国之才的功臣宿将，则给以优厚封赏，让他们安享天年。

刘秀对敌军营垒中的人前来投降，也能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当时隗嚣占据甘肃，公孙述占据西南益州，刘秀占据中原，隗嚣对臣服于公孙述还是臣服于刘秀，一时举棋不定，就派部将马援分别去两处实地了解情况，马援与公孙述是同乡，从小相好，就先入蜀见公孙述。公孙述在阶下、殿上列满持戟的武士，才宣布让马援来见。后来马援去洛阳，刘秀却在一间普通殿房中接见他，穿着也很简朴，更没有戒备森严的卫兵在场。马援一到，刘秀立即笑着古代瓷器迎上前去，十分友好地说："您徘徊在两个皇帝之间，今天能见到您，使我很高兴。"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与公孙述那种大摆皇帝架子的傲慢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马援很受感动，后来就归附了刘秀，成为一员战功卓著的名将。再如坚守洛阳的朱鲔，曾参与谋害刘秀哥哥刘绩的行动，又曾阻止刘秀往河北发展势力，很担心投降刘秀后会遭报复，而刘秀派人向他表示："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忌恨个人的小私怨。朱鲔若现在投降，官位都可保留，又怎能加以诛杀呢?河水在此，指河为誓，我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即任命他为平狄大将军，封扶汉侯，历代为官。刘秀对这些仇人都宽宏大量，不加报复，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由于刘秀的宽厚待人，其他营垒中的不少文臣武将都纷纷投靠于他，既减少了对立面，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用人不疑刘秀宽厚待人的再一个表现就是用人不疑，不对部将进行监视和掣肘，即使对长期专兵的大将也是如此。如大将冯异长期统兵在关中，有人向刘秀告状说："他威权达于极点，百姓倾心拥戴，都称他为咸阳王。"冯异听说后异常紧张，立即上书说明情况，刘秀却这样答复他："将军与我，义为君臣，恩同父子，有何嫌疑，而生惧意?"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使冯异安下心来。刘秀对外出统兵作战的将领一般没有任何牵制，使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去指挥打仗，所以刘秀的军队常常获胜。将

领们对刘秀无不舍死效忠，恪尽职守。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秉公执法刘秀虽然对臣属很宽厚，但对贪赃枉法、祸害国政的官员却从严惩处，决不姑息迁就。如大司徒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以讲授《尚书》而知名，声望很高。后来他在任汝南太守时度田不实、贪赃千万的罪行被人告发，刘秀即将他逮捕下狱。当时有近1000名儒生守候在宫门口替他求情，还有人甘愿替他受死，但是刘秀仍坚持依法办事，下令处死。对于他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行凶杀人之事，刘秀也能支持洛阳令董宣秉公执法，将杀人犯当场处死。并称赞董宣是“强项令”，赐钱30万。邓禹辅佐刘秀邓禹是东汉最重要的开国功臣之一，他在东汉王朝建立的功臣榜中功劳名列第一。

文武双全，投靠明主邓禹(公元2年—58年)，字仲华，新野三泉阪(今城郊乡板桥铺村)人。他少年学习诗书，勤练武艺，得到乡里人们的交口称赞。后来，他去了长安求学，进了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与同在太学学习的刘秀成为了好朋友。

新莽末年，全国各地义兵蜂起。等到更始皇帝时，许多豪杰都推荐邓禹去为刘玄服务，但是邓禹看得很清楚，刘玄不是能为人君的适当人选，所以全都拒绝了。

后来，他听说刘秀在河北起义，就连夜北渡黄河，追到了邺县才赶上刘秀的队伍。刘秀一见他很高兴，对他说：“我现在是更始皇帝的属下，有委官封赏之权。你千里跋涉而来，是想当官么?”他回答说：“我不是要在现在的朝廷里当官才来的。只是因为您的威德加于四海，如果我能为您效劳，就可以开创一代新王朝了!”刘秀一听更是大喜过望，本来他也是西汉的宗室出身，一直不甘心屈居于更始帝之下，总想取而代之。现在听到邓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当然很高兴遇到了知己，于是就把邓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随时同他长谈。

邓禹针对时势，对刘秀说：“现在更始帝虽然在关西建立了统治，但是山东还没有安定，赤眉、青犊等义军，数以万计，三辅自立名号的人，往往在那里群聚。刘玄既未挫伤他们，而又不善听取忠言做出正确的决断，他的诸多将领皆都是一些目光短浅的庸才，他们都只知道掠夺

钱财，争用武力，图一时之快而已。他们之中没有忠贞明智、深谋远虑、能辅佐皇帝兴邦安民的人。现在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您虽对刘玄有辅卫之功，但恐怕还难以自立。今日之计，不如广揽英雄，取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这样做，天下还不能够平定吗?”刘秀大喜，令左右称邓禹为邓将军。

自此，邓禹就常居中军，跟在刘秀身边，帮助刘秀共议军政大事。刘秀感到自己的地盘太小，势力不大，拿着地图对邓禹说：“天下郡国这么多，现在我却只得到了其中的一个，怎么能说天下很容易平定呢?”邓禹回答说：“现在海内淆乱，人们都渴望有一个英明的君主，这就象赤子思慕慈母一样，再说，从来兴旺称雄的人都是因为威德的传播，而不是以现在国家的大小而定的。”刘秀认为邓禹言之有理。

屡立战功邓禹不但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且能文能武，既对当时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还是一个能上马带兵打仗的勇将。

王郎起兵反汉，刘秀自蓟至信都，命令邓禹征集将士，得数千人，在邓禹的率领之下攻占了乐阳，首立战功。邓禹又很擅长推荐贤能，所举之人都才干出众，才尽其职。刘秀非常赏识邓禹识才、举才和用才的贤德，所以每次任命和调整将领时，多听取他的意见。乐阳之战后，他又奉命与盖延到清阳镇压铜马义军，大获全胜，平定北川。当赤眉大军入关，刘秀料定赤眉义军必破长安，自己则想乘机收取关中。由于他深知邓禹善于谋略，器量恢宏，遂委以西征之重任，任命他为前将军，使其持节率精兵两万西入函谷关。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由箕关进入河东，大战十天，攻占箕关，时而围困安邑。更始大将军樊参数万人攻打邓禹，邓禹在解南大败樊军，斩杀樊参。接着，王匡、成丹、刘均等将领汇合十余万大军，共同攻打邓禹。他大败王匡，生擒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平定河东。

激流勇退，明哲保身刘秀即位，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酂侯，食邑万户，并下诏表扬他极有忠孝之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勋显著。邓禹一上任，就率兵渡汾阴河、入夏阳，击败更始十万兵将。他军纪严明，军队所到处，均受到百姓的欢迎，降者日以

千数，众号百万，倍受百姓拥戴。男女老少齐集其车下，莫不感悦，名震关西。他又北击栒邑，所到之处，郡邑皆开城门归顺。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他被更封为梁侯，率军抵达长安，犒劳三军，斋戒将士，选择良辰吉日，备厚礼到高庙拜祭，并收集十一个帝王牌位，派使者敬奉到洛阳；又巡查帝王陵墓，设官吏守护。后来邓禹因为一次战败，就辞去大司徒之职和梁侯的封号，上交了印绶。但是几个月后，他又被拜为右将军。

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他奉命率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王匡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迫使延岑逃奔汉中，余部皆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邓禹被定封为高密侯，放弃了原来的将军之职。这正是他激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他淡泊名利，待人敦厚，孝敬父母。天下已定，常思远离名誉和权势。邓禹还教子有方，他有十三个儿子，他不引导他们追求高官厚禄、追名逐利，而是让他们各掌握一种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技艺。他修整家庭伦理，教养子孙，食封邑，不置产业。后来，他的子孙皆称名天下。

中元元年(公元56年)，邓禹复任大司徒。显宗即位，因为感到他的功劳太高，就拜他为太傅。永平元年，邓禹逝世，谥元侯。永平中，显宗追念邓禹开国功勋，诏画像绘其像于南宫云台，为二十八宿之首。马援被诬陷马革裹尸，气概实在令人敬佩。

老而弥坚马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因为他功勋卓著，所以，光武帝刘秀在统一了全国，恢复了汉家天下后，封他为伏波将军、新息侯。

马援家境贫寒，十二岁时，父母双亡，因为无钱上学，只能由哥哥马况在劳动之余，教他读书识字。由于学习条件的限制，几年过去了，马援的学习成绩非常一般，他有些泄气了。哥哥马况鼓励他说：“你不必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而苦恼，你的才能很大，只是成功的晚些罢了。”这也就是成语大器晚成的来历。马况的话后来果真应验，天资并不聪明的马援，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早在王莽统治时期，马援曾在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当差。有一

次，他在押解一名因反抗朝廷统治而被捕的罪犯时，怜惜起对方是条好汉就私下里把犯人放跑了。放跑了犯人，自然他自己也不能再继续当差了，于是，马援就逃到了北方边界一带躲藏了起来。没几年的功夫，他就已经成了一个大财主，有佃农数百，有牛马羊数千，可谓是富户了。

然而，马援想要的生活，并不是一辈子过这样衣食富足的日子，当他看到全国各地的英雄豪杰都在逐鹿中原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分送给朋友和手下的佃农，准备投奔到逐鹿中原的滚滚大潮中去。临行前，马援满怀豪情的说："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远大志向。越穷越坚强，越老越雄壮。"

常胜将军此后，他来到了中原，先是在刘秀的政敌隗嚣手下，做了一名将军。后来，他认识了刘秀，发现刘秀是一位礼贤下士、有雄才大略而且很有君主气度的英雄，就投奔了刘秀。马援遇到刘秀，可谓是良臣遇到了明主。在跟随刘秀的日子里，马援多次带兵东征西讨，为刘秀统一全国，建立东汉，立下了赫赫战功。马援率军作战，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自己勇冠三军。比如在平定陇西时，马援被敌人的箭射穿了小腿肚子，可他仍然咬着牙，坚持端坐在马上，指挥作战，这使得全军将士士气大增，一鼓作气，最终大获全胜。刘秀对马援的指挥才能十分折服，经常称他为"常胜将军"。

古代瓷器当东汉政权稳定以后，很多大将军都功成身退，也有人劝马援说：大将军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现在也该尽情地享享清福了。马援豪迈地回答道："男子汉大丈夫就该在战场上显示自己的威风，死就要死在疆场，让别人用马革裹着尸首送回老家，怎么能天天醉卧在床上，缠绵于儿女的私情呢。"

公元48年，南方的五溪一带，有个少数民族部落叛乱，光武帝刘秀一连两次派兵征讨，都大败而归。这时的马援已经是62岁了，他主动向光武帝请求出征。刘秀看着已是银髯满鬓的马援，很是于心不忍。马援声如洪钟，对光武帝说："陛下，臣还能披甲上马!"刘秀被老将军的精神深深感动，命令武士们为马援牵马进宫，让他一试身手。只见马援轻松地翻身上马，雄赳赳、气昂昂地跑了一大圈。光武帝刘秀动情地说："老将军真是威风不减当年啊!"于是，派马援出征讨伐少数民族部落的事就

这样定了下来。

马援临行前，与朋友们话别，说："我深受皇恩，现在年事已高，我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唯恐不能为国而死。今天，总算有了一个机会，我即使战死在沙场，也死而瞑目了。"送行的人，听了马援这样的话，无不落泪。

小人的谗言马援率军队来到了五溪后，打了几个胜仗。但由于五溪在南方，他所带部众多是北方人，水土不服，身体很不适应，于是整个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差。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马援自己也体力不支，得了重病，导致了战事进展缓慢。有小人趁机向光武帝进谗言，说马援指挥失误，贻误了战机。

刘秀连忙派驸马梁松前往前线，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梁松平日里飞扬跋扈，正直的老将军马援一向看不惯他，因而没有给过梁松什么好脸色。梁松想趁机公报私仇，可当他赶到五溪时，马援已经病死在军中了，梁松感到非常地失望。可他这个小人，连死人也不放过，回来后向刘秀告状，说马援不但指挥失误，还趁机从南方搜刮民脂民膏，带回了一车珍珠。

这一次，光武帝刘秀相信了自己的驸马，下令革去马援所有的职务，并派人到他的家里去查抄从南方运回的珍珠。

去马援家抄家的人很快就回来了，他们给光武帝带来了一把所谓的"珍珠"。刘秀一看，不认识这些东西是什么，有认识的文武大臣一看，赶忙告诉光武帝说，这是用来治疗风湿病的中药，学名叫薏苡。原来，马援由于长期征战在外，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从南方运回的所谓珍珠，是他治疗风湿的药材。许多文武百官当场落泪，一心为国、马革裹尸的大将军战死疆场，死后却仍要遭人迫害。

光武帝刘秀狠狠地教训了驸马梁松，也不再让人去追查马援的罪过了。可是，马援兵败五溪是事实，所以，刘秀还是让人把马援的爵位革去了。三十年后，汉章帝才把自己祖辈误判的这桩不近人情的冤案予以平反，马援被谥为忠成侯。

可叹一代名将马援，大器晚成，马革裹尸，一心为主，老当益壮，到头来却落得个被小人诬陷的下场。马援的赤胆忠心，是为后世人所敬仰。大树将军文武全才，堪称刘秀的左膀右臂。

投靠刘秀冯异起初是王莽手下的一员将领，之后投奔了后来成为光武帝的刘秀，做了刘秀一朝的大将军。冯异是今河南宝丰地区的人，他从小熟读兵书，据说能把《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等兵家典籍倒背如流，因此很多人都夸他将来必是个大将军的材料。

在王莽新朝乱政的时期，绿林军爆发了起义，冯异曾被王莽任命为保卫父城的将领。而当时指挥进攻父城的正是日后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冯异和刘秀可谓是不打不相识，刘秀见冯异有大将风范，指挥若定，进退有方，心中对他很是欣赏。而冯异也觉得刘秀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帝王模样，很有大家的风度，是个能成大气候的君王。这样一来二去，冯异的仗并没有多打，反倒是最终弃城追随了刘秀。从此以后，刘秀的军帐中，就多了一位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冯异。

大树下的谋略虽然冯异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辉煌无比，骁勇善战，能攻能守，可他在平时的生活中却很小心谨慎，不苟言笑，可谓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据说冯异在路上走，无论碰到比自己官大还是官小的人，他都主动让路，所以他的人缘极好。那些只会打仗的鲁莽将士们打了胜仗时就会粗鲁地吵吵闹闹着去邀功请赏，而当冯异打了胜仗凯旋时，他总是一声不吭地悄悄离开，一人坐在大树下，思考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正因为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又善于用兵，功名显赫，却不居功自傲，将士们都称他为“大树将军”。这个称呼，体现了冯异博学多才，沉稳有加的性格品质，也反映了将士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之情。

光武帝刘秀深知冯异的脾气秉性，尽管冯异不会和其他大臣一样，有了一点功劳就在他面前邀功请赏，可刘秀从来都不忘记这位为自己建立东汉政权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将军。刘秀先后封冯异为阳夏侯和征西大将军。冯异的确为刘秀打了很多的胜仗，在他奉命进军关中地区时，从河南到陕西，一路过关斩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冯异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短短十年间，冯异把原本已满目疮痍的关中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冯异功劳如此之大，又不居功，反而自谦得很，

这深得光武帝刘秀的宠爱和信任，也自然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妒嫉，有一些人给光武帝刘秀上书，说冯异在关中权势过重，拥兵自重，有谋反的野心。刘秀很是信任冯异，便把这些奏折拿给冯异看，天性老实的冯异一看这样的奏折，吓了一大跳，跪在地上半天不敢动弹。倒是光武帝刘秀连忙离座，把冯异搀起来，安抚他说："将军莫慌，您对汉朝江山的一片赤胆忠心，朕岂能不知晓不了解。咱们名义上是君臣，论恩德则如父子，你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为我开辟了大好的河山，老将军千万别把这些无稽的谗言放在心上。"于是，刘秀不但不问冯异的罪，反而对他大加赏赐，这样的举措让冯异大为感动，他发誓要一辈子效忠光武帝。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光武帝刘秀对冯异的确是非常地敬重和信任。

居功不傲中原和关中地区被冯异平定了之后，刘秀又命冯异带兵攻打一直在陇西(今甘肃兰州一带)割据搞分裂的隗嚣。冯异大军一路上势如破竹，进展十分顺利。然而，在他每次从前线传回的功劳簿上，有许多将士的姓名，却总是没有他自己的名字。光武帝刘秀无不感慨地说："征西的功劳昭若山丘，冯老将军却从不提起自己的功劳，他的品德太高尚了!"后来，光武帝刘秀专门下诏，晓谕全军将士，对冯异大加表彰。刘秀也从此更信任冯异了，冯异自然也对光武帝更加感恩。

然而，就在冯异的军队即将消灭完隗嚣的余部残敌时，冯异却突然得了急病，不幸死于征途之中。全军将士闻听此消息皆扼腕痛惜，无不伤心落泪。冯异去世的消息传到洛阳，光武帝刘秀十分伤心，竟在金殿上痛哭了起来，他失声哭道："失去了冯老将军这样的忠臣，是我大汉之大不幸啊!"硬脖子县令敢拿皇亲国戚开刀，勇气的确让人钦佩。

无人敢动的皇亲国戚建武年间，陈留(今开封市东南)人董宣在洛阳当县令。县令的官职虽小，但却是洛阳的父母官。由于京城是天子脚下，汇集了大量的达官显贵，所以，县令这个小官的确不好做。谁也得罪不起，事又不能不管。

董宣生性耿直，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他认为自己既然是京城的父母官，就有把京城治理好的责任，就算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也应与庶民同罪，要按法律制度办事，决不能徇私枉法。

有一天，湖阳公主府上的一个家奴，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别人的珠宝，还行凶杀人。状子告到了县衙，董宣看完状纸，很是气愤。他说：“这还了得，在天子脚下，一个家奴竟然敢明目张胆地行凶杀人!”当即传令，把凶犯捉拿归案。

可他堂下的捕头们好像都没听到董宣的话一样，都站在原地不动。董宣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都站着不动?还不快去把杀人犯给我带上堂来!”可堂下还是没有动静，许久，领头的衙役小声对董宣说：“老爷，这个杀人犯是湖阳公主的家奴，我们进不了公主府啊!再说，就算是进得了公主府，又有谁敢下手拿人呢?这件事，您还是不要追究的好。”

董宣听了这样的话非常愤怒。他说：“什么?有人在京城杀了人，我作为洛阳县县令却不去追究，那我还当这个父母官做什么?古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倒要看看湖阳公主能把我吃了不成?”他命令众衙役第二天一大早随他一起去亲自捉拿凶犯。如果不能把杀人犯正法，董宣说他就不做这个洛阳县令了。

风景画鉴赏捉拿凶手落网第二天一早，董宣亲自带人来到湖阳公主的府前，捕头们说的没错，公主府的家奴们趾高气扬地堵在门口，不让进去。董宣也不着急，就让衙役们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公主府大门对面等着杀人凶手出来。一连几天，天天在此。

湖阳公主在府内，开始还可以踏实作息，后来也沉不住气了。一个小小的洛阳县令，竟然天天堵在自己的府门口，口口声声地要捉拿凶犯，自己的面子都快丢尽了。湖阳公主自幼娇生惯养，脾气也倔得很，她说：“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一天，湖阳公主带着大批家奴，浩浩荡荡地从府中出来，杀人凶手负责为公主赶车，她要向董宣示威。董宣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带着众衙役从县衙赶来，拦住了湖阳公主的车。坐在车内的湖阳公主认为董宣触犯了她的尊严，沉下脸来说：“董宣，你一个小小的洛阳县令，也敢拦本公主的车，你还想不想活？”

董宣并没有被湖阳公主的阵势所吓倒，他拔出佩剑说：“您身为公主，不为当今万岁分忧，却背后指使自己的家奴在京城胡作非为。你应

该明白，这是在天子脚下，容不得扰乱国家治安的破坏分子。请公主主动交出杀人夺宝的凶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否则，公主就别怪在下无礼了!”

湖阳公主气不打一处来，认为董宣太不给自己面子了，说：“我看你今天敢把本公主怎么样?”

董宣明白，和公主斗嘴是没有用的。他一摆手，叫衙役们把杀人犯逮捕归案。衙役们一哄而上，把杀人犯从公主的车上揪了下来。董宣怕夜长梦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剑就把杀人凶手当场处决了。

湖阳公主没想到董宣真的敢在自己面前执法，差点儿气昏过去。她立即赶往皇宫，当着自己兄弟、光武帝刘秀的面大哭大闹，说董宣欺负她，让光武帝为她出气。

董宣对光武帝的劝谏光武帝刘秀听了湖阳公主的话，也十分生气。立即召董宣进宫，要狠狠地打他，为姐姐出气。董宣进宫后，连忙跪下说：“陛下，臣有话要说，等臣奏完，您再下令打死我也不迟。”

光武帝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你连朕的姐姐都敢欺负，还有什么话可说?”

董宣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我汉朝的社稷，差点儿毁在王莽和绿林、赤眉之手，将士们拼死拼活才换来了今天的中兴局面。我朝当务之急，是重整风纪。然而，湖阳公主却放纵家奴在京城行凶，这样下去，社稷如何能得到长久的安稳呢?臣得罪公主，为的是社稷江山，如果做的不对，不用陛下动手，臣死在陛下面前就是了!”说罢，董宣就一头撞在身边的柱子上。光武帝刘秀连忙令侍卫拉住董宣，可再看他时，已经是血流满面了。光武帝心里十分清楚，董宣说的在理，是湖阳公主的错。而且董宣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可光武帝又不好意思当着姐姐的面把这些话说出来。于是，他建议说，让董宣给湖阳公主磕个头，赔个礼，以了结此事。

董宣跪在地上，仿佛没有听见光武帝的话，表现得毫无反应。两名侍卫知道这是光武帝想找个台阶下，就使劲摁着董宣的头，要他磕头。

可董宣却用两手撑着地，使劲挺直脖子，就是不磕头。

刘秀见此情景，知道了董宣的为人，也不再难为他，就下令："把这个硬脖子给朕轰出去。"

湖阳公主见刘秀放了董宣，很是气愤，说："兄弟，从前你当老百姓时，还敢收留罪犯，和地方官吏抗衡。可现在做了皇帝，为什么却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对付不了?"

光武帝刘秀一本正经地说："正因为我做了皇帝，才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姐姐，请你一定要为我大汉的社稷着想，不要再放纵家奴做违法的事了。"

后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没有处分董宣，还赏给他三十万钱作为奖励。董宣回到县衙后，把这笔钱分给了跟随自己去捉拿杀人凶手的衙役们。从此，洛阳城里原有的飞扬跋扈的权贵们都不敢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他们背地里都称董宣是"硬脖子县令"。*丑女孟光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举案齐眉"的美好故事。*

*丑女多次拒婚*东汉初年，陕西扶风县有一户姓孟的人家，虽不是高门贵族家庭，但却靠经商聚积了不少钱财，算得上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家。孟家有一个女儿，粗眉大眼，身材矮小壮实，肤色黧黑，可谓姿色俱无。这副容颜本来就使她的婚姻成为困难，但她偏又自视甚高，别人不挑她，她倒挑起别人来了。

有一次，一个落魄书生，饿昏在荒野，被孟女发现，背回家救醒，疗养月余，渐渐康复，书生渐生好感，对孟女的外貌也就并不在意，有求婚之意，孟家父母都感到非常满意，但却碰了孟女的"冷钉子"，并被数落了一顿："你们读书人，不缺胳膊不少腿，到处请托权门。得意时，正眼都不瞧我们；失意时却饥饿不能自存，还痴心妄想娶媳妇呢?我如果在这时候答应你的求婚，人家会说我趁人之难。你还是不要这样打算吧!"书生只好答谢她的救命之恩，怏怏而去。这件事一传开，乡里大为震惊，都佩服孟女的侠义，不少人前往求婚。当地一家财主的儿子求婚，遭到孟女的拒绝之后，顿生羞恼，指斥道："我上门求婚是抬举你，凭我的财富，找一个漂亮媳妇难道还成问题吗?瞧瞧你那模样。"孟女毫

不示弱，针锋相对："有钱就财大气粗吗?模样丑是天生的，你有钱就买'俊'的，就是买不去我这'丑'的。"县令的小舅子一听，也决定来碰碰运气。他尽量打扮得儒雅一些，装出斯文相，登门求亲，与孟女相见，开口夸赞道："久闻姑娘高义，实在佩服!"孟女莞尔一笑："高义怎比高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哪里值得您如此称道?"县令的小舅子一听，也就悻悻地走了。

孟女几次拒婚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登门求亲了，到三十岁时，仍是待字闺中。父母终于失去了耐心，问她："女儿，你到底要嫁个什么样的夫婿?"女儿不假思索地应声而答，"我要嫁个像梁伯鸾一样的贤士!"父母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又说了一遍，以为是女儿灰心至极说的气话，但女儿神色安详，哪像是在生气呢!父母都认为女儿的这个念头荒唐之极，绝无实现的可能。

梁鸿主动提亲扶风有一位著名的隐士，名叫梁鸿，就是孟女口中的梁伯鸾。这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且为人品行端正，诚信忠厚，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他甘于贫困，立志不仕。附近的人仰慕他的名声，许多人都主动上门提亲，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孟家的人认为想让梁鸿许婚事是不可能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梁鸿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竟然真的请人来下聘礼。孟家人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又唯恐梁鸿反悔，很快议定了嫁娶之期。待到成婚之日，孟女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头上珠宝金银，身上丝织衣服闪闪发光，脚穿青丝鞋。一路吹奏弹唱，好不热闹。然而，婚后一连七日，梁鸿一言不发。第八天早上，孟家女来到梁鸿面前，恭恭敬敬地行过札，然后对他说："妾早闻夫君贤名，立誓非您莫嫁；夫君也拒绝了许多家的提亲，最后选定了妾为发妻。妾深感荣幸!婚后，夫君默默无语，使妾诚惶诚恐。想必是妾犯了重大过失，如此，请夫君治罪。"

梁鸿听罢，带着一种不满的神情说："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麻、葛制作衣服的人，并且能与我同甘苦，能够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大泽之中。而现在你却穿着绮缟等名贵的丝织品缝制的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一副贵夫人模样，这哪里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呢?"

孟女听了，不但不恼，反而欣然作喜，对梁鸿说：“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并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验证一下，夫君是否真是我理想中的贤士。其实妾早就备妥了劳作的服装与用品。”说完之后，便将头发卷起来，穿上麻布衣服，架起织机，动手织布。梁鸿见此，又惊又喜，连忙走过去，笑容满面地对妻子说：“你是我梁鸿真正的妻子!”他怀着尊敬的心情，为妻子取名为孟光，字德曜，意思是她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

隐居山野自从梁鸿妻子换上麻布衣服，亲自纺纱织布以后，夫妇互敬互爱，男耕女织，在家乡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一天晚饭后，当梁鸿像平时一样拿起书本时，孟光拉住了他的手，用深情的目光注视了他好久好久，弄得梁鸿疑惑不解。这时，孟光用低沉的声音对梁鸿说：“妾早就知道夫君要遁世归隐，避开尘世的烦恼。但为何我们至今还不走?难道夫君还要向世俗低头，委屈自己去入仕吗?”梁鸿猛然惊悟，忙说：“贤妻说得好，此处无甚可留恋的，我们即刻归隐吧。”于是就在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忙碌了一个通宵，收拾行装，将必需的生活用品打包装点，第二天天刚亮，夫妻二人背着包袱，踏着未尽的月色，悄悄地进到了霸陵(今西安市东北)山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霸陵山深处，他们就着岩石，用枯树枝和茅草搭起了能遮风避雨的草棚，在山谷中开垦出了一片土地，种上了小麦等作物。白天，他们共同劳动；夜晚，梁鸿就着火边或诵读经书，或赋诗作文，或弹琴自娱。孟光则缝衣衲鞋，或夫弹妻唱，抒发他们对前代高士的仰慕之情和不为利禄所染的高洁品格。

梁鸿孟光但是霸陵山山势并不幽深、险峻，更不是无人涉足之地。梁鸿夫妻隐居于此山的生活终于被外人知道了，昔日平静、恬然的日子再也无法保持，经常有人慕名前往寻找他们。为了保有自由安宁的生活，梁鸿夫妻以后又多次搬家，躲避这些世俗的烦扰。再加上梁鸿做的一首讽刺东汉统治者的《五噫之歌》触怒了皇帝，派人在全国各地捉拿他们，所以他们隐姓埋名，躲避得更隐秘了。后来，他们来到了吴地(今江苏境内)，寄居在当地大族皋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为人舂米过活。皋伯通开始倒未留意这个舂米人是何等人物。一天，他偶然看见梁鸿妻子孟光给梁鸿送饭，只见妻子恭恭敬敬地走到丈夫面前，低头不敢仰视，把装饭的盘子高举齐眉，请丈夫进食。皋伯通大吃一惊，心想：

一个雇工能让他的妻子如此守礼，那此人一定是个隐逸的高人。他立即把梁鸿全家迁进他的家宅中居住，并供给他们衣食。

梁鸿已上了年纪，干体力活渐渐力不从心了，皋伯通热情款待他一家，又非常知趣，没盘根问底，梁鸿也就安心在皋家住下了。他晚年利用这段衣食不愁的宝贵时光，潜心著述，成书十余篇。

也就在他致力于写作的过程中，由于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使他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临终前，梁鸿对皋伯通说："我听说前代的高士都是不择生死之地，是随遇而安葬。我死之后，请您千万不要让我的孩子把我弄回故乡去安葬。我既然死在吴地，就把我埋在吴地吧!"

梁鸿死后，孟光按照他的遗愿，在当地安葬了他，然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吴地，不知所终了。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到底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我国的史书上有多种记载。

梦中的奇景汉明帝，名刘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汉光武帝到了63岁，害病死去。太子刘庄即位，就是汉明帝。

据说，一天夜里，刘庄做了一个令人非常费解的梦。他梦见一个金人，浑身上下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和日光一样的光环，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非常耀眼。这个金人忽然从天而降，飞到了金殿之前，绕着殿飞行，忽然又升到天空，往西去了。梦中的汉明帝见到这样的金人，心中十分高兴，居然都笑出了声来，这一笑，他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上朝时，汉明帝迫不及待地把夜里梦见的景象说给众大臣听，让他们给自己解梦，说说这个全身闪金光的金人到底是谁，代表着什么意义。可是，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说不出那个头顶发光的金人到底是谁。

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傅毅，最为博学多才。听到了皇帝的这个怪梦，他出列参奏道："陛下，臣曾听说天竺(今印度境内)有一个神仙，被称为佛，身体轻盈，能在天空中飞翔，陛下梦中所见，可能就是佛吧。"汉明帝听说竟真有和自己梦中所见一样的人，就连忙追问道，天竺在什么地方，离汉朝有多远。傅毅回答说，天竺在汉朝以西，传说中有

几千里的路程。

第十二章

出使天竺这样的回答，引起了汉明帝的好奇心，他想派人到傅毅所描述的天竺国去看一看。不久，汉明帝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他派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使天竺。

风景画鉴赏实际上，傅毅所说的天竺，就是佛教的发源地，本来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别称，释迦牟尼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65年，原是个王子。传说他在二十九岁那年，抛弃了王族的舒适生活，出家修道。他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他所指的佛，就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距离汉明帝在位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释迦牟尼到处宣传佛教的道理。他传教四十多年，收了不少信徒，大家尊称他“佛陀”。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把他生前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经。

据史书记载，汉明帝为了一睹神秘金人的真实面貌，派出了到天竺去的使团。秦景、王遵等十二人领命以后，经过长途跋涉，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天竺国。

他们在当地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天竺国上上下下都对这些来自遥远的中原地区汉朝的客人们非常友好，天竺有两个沙门(就是高级僧人)一个名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还帮助王遵和秦景懂得了一些佛教的道理，王遵和秦景就趁机邀请他们到中原来。

所以，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不仅带来很多佛经，一同归来的还有这两位天竺的得道高僧。

白马驮经公元前67年，王遵、秦景带着两个沙门，用白马驮着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经，经过西域，回到了洛阳。

汉明帝并不懂佛经，对佛教的道理也不清楚，但是对送经前来的两

位沙门倒很尊敬。第二年，他命令在洛阳城的西边按照天竺的式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寺院，并且建立了一座佛塔以示纪念。因为把送经的白马也供养在那里所以这座寺就叫白马寺(今洛阳市东)。

从此，佛教就传入了中原大地，并生根发芽，日益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并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随秦景、王遵一起来到汉朝的两位高僧，在白马寺落成后，就一直居住在那里，并且再未返回过天竺，直到圆寂，他们也葬在了白马寺内，为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班超投笔从戎班超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

家中的变故班超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即“曹大家”)，一家子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就立下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

他勤奋好学，思路敏捷，颇有口才，且胆识过人，在班超三十岁时，他的家庭遭到意外事变。正当哥哥发愤编著《汉书》的时候，有人向皇帝告发其“私修国史”，因而被捕入狱。班超为了替哥哥辩明冤屈，向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明帝将班超召进京城做了兰台今史，并对班超的口才和学识有了深刻印象。

投笔从戎班超的字非常漂亮，年轻时就经常被朝廷雇佣，抄写文书。当时，北方的匈奴时常侵犯汉朝的边疆地区，还控制了西域，割断了西域各国同汉朝的联系。此时的他已经是博览群书、胸怀韬略、小有名气的史学家了。一天，班超正在抄写文书，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将来，难道就这样在抄写文书中度过吗?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把笔扔到地上，感慨道，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就应当有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至少也应该像张骞那样到边关为国出力，怎么能像现在这样，整日和笔墨纸砚打交道呢?

班超的一席话，遭到了同事的讽刺和嘲笑，然而他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班超心想，一般的人是不会理解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的思想的，既然自己认准了目标，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

出使鄯善国公元前73年，班超的机会来了。东汉政府决定出击匈奴，恢复和西域地区的友好关系。班超跟随大将军窦固出征匈奴，在军中任假司马。这路大军出酒泉塞(今甘肃酒泉)，西北至天山，大败匈奴呼衍王，并攻占了伊吾庐(今新疆哈密)。班超在战斗中初露锋芒，他的军事才能深得窦固赏识，立下了大功。为了联络西域各国孤立匈奴，恢复汉朝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在窦固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出使西域的使者。班超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六人组成的使团，先到达了鄯善国(今新疆境内)。鄯善国王友好地接待了班超及其随员，表示鄯善愿意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可是，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国王开始有意疏远自己了，他警觉起来。通过观察，班超推测匈奴也向鄯善派来了使团，而且鄯善国王已经倾向于匈奴了。于是，他十分机智地请来了接待汉朝使团的鄯善官员，两人一见面，班超就突然很严厉地问道，匈奴使团来到鄯善几天了，你们偷偷地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这位鄯善官员一听，以为机密已经泄露，只好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果然被班超料到了，匈奴派来了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住在离汉朝使团驻地三十里处。鄯善国王看到匈奴使团人多势众，无奈地准备和匈奴结成友好关系，从而疏离汉朝。

班超闻听此言，立即召集自己的随员们商议对策。班超说：“现在匈奴来了一百多人的使团，鄯善国王正准备和匈奴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他们达成共识，我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大家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随员们都说：“班大人，我们要生就生在一起，要死就死在一起，你说应该怎么办，我们万死不辞。”

班超想了想，鼓动大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也只有一个办法了，先下手为强。我们今天夜里就突袭匈奴使团的驻地，把他们全部杀掉。只有这样，鄯善国王才会和我们汉朝建立友好关系。”

众人一致同意了班超的决议，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夜，班超率领这三十多位勇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匈奴使团的驻地。班超一马当先，一路砍杀，冲进了匈奴使者的大帐。一时间，匈奴人的大营里，火光冲天，鼓角齐鸣。等

匈奴使者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大多数匈奴人的脑袋都搬了家。转瞬间，匈奴使团被班超和他的随员们消灭得一干二净，而班超一行则无一伤亡。

第二天，班超不露声色地去见鄯善国王。鄯善国王此时已经知道匈奴使团被汉朝使团消灭的事了。这样，导致鄯善和匈奴结下了仇怨，鄯善只有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汉朝了。从此，鄯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班超前前后后在西域共活动了三十多个年头，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汉朝终于和西域五十余个国家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他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朽的业绩。班超被封为定远侯，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立下的宏伟愿望。

班超弃文从武，使班氏一族在班彪、班固、班昭这些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之外，又出了一位大将军，是著名的武将。而他当初放下书本，投身疆场的故事，也就是“投笔从戎”这个成语的来历。马皇后母仪天下汉明帝的妻子马皇后，是一位赢得了全天下人称赞的好皇后，她一直支持并劝谏着明帝。

立马氏为皇后马皇后是光武帝的大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她小时候非常聪明，才思敏捷。据说她十岁的时候就能帮助母亲很周全地料理全家的事务了。后来，她被选入宫中作了太子的妃子，那时她刚刚十三岁。她虽然年纪小，但是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头头是道，很会伺候人，所以当时的光武帝的阴皇后非常喜欢她。太子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敏得体的妃子。

汉明帝即位的那年，马氏已经二十二岁了，但是一直没有生下儿子。她有一个表妹，是和她同时入宫的，这时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刘炟。明帝因为喜欢马氏，就把这个孩子要过来交给马氏，做了马氏的儿子。马氏小心翼翼地带着这个孩子，母子俩人感情非常好。

明帝一直想立马氏做自己的正宫皇后，但是又不愿意由自己提起。后来有很多大臣们都上书请求立马氏为皇后，明帝还是回答说要和太后商量。阴太后听说了这件事，马上说：“在这个后宫之中，马氏的品行数

得上是第一了，不立她做皇后还要立谁呢?”于是，明帝这才名正言顺地昭告天下，正式地立马氏为皇后，立刘坦为太子。

贤内助马皇后虽然做了正宫，但她还是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一点也没有皇后的架子。她总是穿着粗布做的衣服，也不加什么装饰。那些每天忙着争奇斗艳的后宫嫔妃们都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总是喜欢穿这样的衣服。马皇后笑着回答说：“这种布料并不坏，染上颜色也不爱褪色。”那些妃子一听都傻了，她们有谁在意过衣服褪不褪色的问题呀?

汉明帝汉明帝即位的时候还很年轻，很喜欢四处游玩，马皇后则总是好言好语地劝告他，希望他能够专心政事。有一次，明帝去一个有名的花园赏花，把自己所有的妃子都带去了，唯独马皇后没有来。那些妃子平时都很敬重马皇后，这时见她没来，就纷纷请求派人去叫她。明帝却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叫她了，她不喜欢游玩。即使来了，她也不会高兴的。”就因为马皇后一直在明帝身边督促他，所以明帝游玩的时候就少多了。

明帝见马皇后一天到晚一有时间总是在读书，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本事和才能，成心想考一考她。他把大臣们的奏章拿来给马皇后看，询问她处理的意见。马皇后仔仔细细地看过奏章以后，果然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地列出了各种事情的处理办法。明帝见了非常佩服她，从此以后，凡是在朝廷上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事情时，明帝就会回来和马皇后商量，听取她的意见。

不让亲戚沾光明帝当了十八年皇帝，一直是兢兢业业地管理着国家大事。后来，他病死了，太子刘炟即位做了皇帝，就是汉章帝。马皇后也升格做了皇太后。她亲自动笔给章帝写了一篇《起居注》，章帝看过以后，请求马太后加上他的舅舅马防服侍明帝的事情。他对太后说：“先帝生病的时候，我舅舅不分昼夜地在身边伺候了一年多，太后既不奖赏，也不记功，现在《起居注》上也没有记载这件事。这样未免太不公平了吧?”马太后回答说：“我是不想让后人知道先帝和外戚亲近的事。”章帝听了，很赞成母亲的这种做法。

第二年，有些大臣为了讨好皇帝和太后，找了个理由，上书请求加

封马皇后的亲戚，像光武帝加封阴皇后的族人一样，也封马防等人为侯。汉章帝马上回去和马太后商量这件事情。马太后知道后很生气，马上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封不封侯，和天旱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拿这件事做借口，无非是想向皇帝讨好，为自己谋求富贵罢了。汉成帝在位的时候，把外戚王家五人同时封了侯，也没见天下雨。汉武帝在位的时候，那些受到封赏的外戚横行非法，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所以先帝才没有让马家的人担任中枢要职，也没有封他们为侯。光武帝在位的时候，阴家确实有几个人封了侯，但是那是因为他们跟随着光武帝打天下，立下了大功的原因。现在，马家的人毫无功劳，怎么能跟阴家相比呢?”

皇帝读了诏书以后，深受感动。以后，他又几次想为舅舅加封，但是都被马太后严辞拒绝了。章帝没有办法，既佩服又遗憾，最后只好听从了马太后的要求。

建初四年(公元79年)，马太后去世了。在中国历史上，像她这样严于律己，约束外戚，劝谏皇帝的皇后真是很少见。寒朗自动坐监牢为了正义，慷慨直言，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一起造反案东汉明帝刘庄(公元58年—75年在位)和楚王刘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刘庄做太子时和刘英关系最好。刘庄做了皇帝后，对楚王刘英又是封地，又是赏赐。

刘英年轻的时候喜欢击剑、打猎、游玩、广交朋友，收罗了一批江湖上的亡命之徒。年纪大了后又喜欢道教，交结了一大批江湖术士，在楚王宫中画符念咒，建塔祭祀。他的这些活动早就引起朝中一些大臣的注意。

不久，有人向汉明帝揭发楚王宫中私制皇帝的印玺、用品，私造图谶，勾结大臣，搞谋反活动。汉明帝派人调查，楚王宫中果然造有砖塔，养有不少游侠、术士。

汉明帝没想到自己最恩宠的弟弟竟然谋反，十分气恼。大臣们也纷纷主张把楚王下狱定死罪，汉明帝不忍心杀掉自己的弟弟，只把刘英的王位革掉，赶到一个小县城去生活。然后就把一肚子的怒气全发泄在和

楚王鬼混的颜忠、王平身上，严令司法机构对颜忠、王平重刑拷问，追逼楚王勾通大臣谋反的事情。颜忠、王平经不起刑讯拷打，为了开脱自己，拼命地攀扯朝中有名的公卿大臣。

汉明帝是有供就信，供出谁来就抓谁。一时间，被捕入狱的有几千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耿建、臧信、邓鲤、刘建4位侯爵。

寒朗秉公办理寒朗作为侍御史也参加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当时，承办案件的大臣们看到汉明帝对大臣参予谋反极度恼怒，都非常小心，不敢多说一句。凡是有一点牵连的都要逮捕入狱。惟独寒朗不同，他不相信会牵连这么多人，几次单独提审颜忠、王平，发现这两个人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见过耿建等4位侯爵，便知道他们是胡说一气。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问调查，寒朗就上书给汉明帝，提出耿建、邓鲤等人并没有参予阴谋，纯属受颜忠、王平等人的诬陷，并表示怀疑全国上下类似耿建、邓鲤等人的冤情还很多。汉明帝看了以后，专门把寒朗叫去问道：“你说耿建他们没有谋反，为什么颜忠、王平要揭发他们?”寒朗说：“这两个人明知道自己的罪行重大，故意拉扯朝中大臣来开脱自己。”

汉明帝很不高兴地问：“既然是四位侯爵都没有事，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把他们关在狱中已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就没有责任吗?”寒朗回答：“我虽然早已怀疑四位侯爵冤枉，但害怕万一其他地方还有揭发的。因此，没有及时向皇上报告。”这一下汉明帝可火了，破口大骂：“混账、狡辩!做官吏的竟敢这样地看风使舵，该死!”一边骂，一边让人把寒朗拉出去杀掉。卫士们上来把寒朗扭住向外推，寒朗就冲着汉明帝大声喊叫：“我早就准备一死了!可我说的是实话，为的是国家!”汉明帝又叫人把他推回来，问他：“谁和你一起写的这份东西?”寒朗说：“我明知说了这些话是灭九族的大祸，根本不敢再拉扯别人，实在是希望陛下能够明白过来，再没别的目的。”明帝说：“让我明白什么呢?”寒朗说：“第一，办案的大臣、官吏都是看陛下的脸色行事，都知道多抓一个比多放一个保险。抓住就搞逼供，一供陛下就信，所以抓一个，牵连十个，抓十个连一百个。第二，朝廷的大臣们，当着陛下的面都说陛下很宽大，牵连的人只抓本人不罪及九族，真是天下的大幸。可是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扪心自问，都知道冤枉的不少。大臣们没有一个

敢向陛下说真话的，我今天说了实话，只要陛下能明白过来，我就死而无怨了。”寒朗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直言，使汉明帝的怒气减了一半。他思考了一下，就把寒朗放了。

送自己进监狱过了两天，汉明帝亲自到洛阳监狱中审理被抓的人，先后放出来的有一千多人。随后，全国各地因此案被捕的又放出几千人。一个特大的冤狱，因寒朗一个人舍命直言得到了平反。可是，寒郎本人却没有一点居功之意。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敢早一点讲实话是一种失职犯罪的行为。在被冤屈的人得到释放后，他自己把自己定了个渎职罪，主动住进了监狱。汉明帝倒是从心里感激他，不久，找了个借口赦免了他。蔡伦发明造纸术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和造纸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化发展的瓶颈在我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书写材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瓶颈。以我国为例，我们的老祖宗们，先后试用过龟甲，兽骨、青铜、竹简、木简和绢帛等材料，比如我们最早发现的文字，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又称甲骨文。后来经济发展了，就在青铜器上刻字，以流传后世，尤其商朝居多，因为商朝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炉火纯青，各个君主都喜欢在青铜器上铸铭文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秦始皇每次批阅奏折时，都要让两个甚至更多的宫人担担子，里面是竹木简的奏折，奏折越多，担子越沉重；又如宫廷内用绢帛写字，很是轻便，但却不易保存，尤其是绢帛造价昂贵，寻常百姓家用不起，只能供少数达官贵人使用。由于竹木简、绢帛等这些材质脆弱、造价昂贵等原因，一直难以真正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发明一种新的书写材料，既经济又适用，不仅能为统治阶级所用，普通百姓也用得起，就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样日益高涨的呼声中，先人们为此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努力，终于，这一难题被东汉时的蔡伦和他所率领的能工巧匠们攻克了!

第一张纸蔡伦是东汉桂阳人，桂阳，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蔡伦自幼家境贫寒，为了糊口，他只得进宫当了太监。在宫内的日子里，蔡伦曾负责皇家手工作坊的工作，这为他日后发明新的书写材料——造纸术提供了方便的试验场所。

古代铜器为了能造出物美价廉，适合百姓们用的书写材料，蔡伦和他所率领的工匠们进行了长久的尝试，反复比较多种原材料，以及他们相互搭配的比例。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蔡伦的勤劳感动了上苍，他研制出了纸——一种经济适用的书写材料，而且是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书写材料。

这是公元105年，蔡伦和许多能工巧匠一起，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先进的造纸方法。这种方法的原材料，是树皮、麻绳、破布头、旧渔网等，和以前的龟甲、兽骨和后来的竹木简、绢帛相比，可谓是造价低廉，而且不必受资源和环境的限制。

蔡伦造纸的工序是，把原材料洗涤，切碎，浸泡沤制，再在经过处理的原材料中加入石灰浆，放在大锅中蒸煮，反复地用力捣，以分离其中的纤维组织，制成纸浆，再捞出纸浆，均匀地平摊在很细密的帘子上，滤去水分，晾干，再揭下来，这就是成品纸张了。

当蔡伦把历尽艰难研制出的第一张纸献给汉和帝时，汉和帝喜出望外，立即下诏让全国各地都按照蔡伦的方法推行造纸。自此，造纸术在神州大地得到了广泛地推广，龟甲、兽骨早已不再使用，竹木简和绢帛也退出了书写材料的历史舞台。

传播在世界的福音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不仅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发展和重要文件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6世纪时，造纸术传入日本、朝鲜、越南。公元751年又向西传入阿拉伯地区，后来，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了欧洲。

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勤劳的劳动人民献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现代的造纸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精美的纸张，如新闻纸、相纸等越来越多的分门别类的专用纸张，但是在根本上，纸的生产原理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延续蔡伦造纸的方法，改变的仅仅是技术和工艺。这也充分地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而智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造纸术的诞生，改变了人类书写材料的历史，直到今天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意义重大。造纸术的诞生，不仅是蔡伦个人勤奋努力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蔡伦作为造纸术发明者的领军人物，将被永远铭记在史册中。班昭续写《汉书》

班昭去世时，当朝的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行国葬之礼。

年轻的寡妇班昭(公元49年—约公元120年)，名姬，字惠班，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她出生在一个“家有藏书，内足于财”的显贵人家。她十四岁的时候，嫁给了同乡曹世叔为妻，所以也被后人称为“曹大家”。她的父亲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很有学问；长兄班固，也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次兄班超，则是东汉的一代名将，在西域立下大功。班昭出生在这样的仕宦之家，深深受到了家庭的熏陶，父兄的影响，再加上自身的聪颖努力，使她成为一个博学广识的学者，对儒家经典和各种史籍都耳熟能详，也在年纪轻轻之时就积累了大量的历史、天文和地理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

据说，班昭的丈夫曹世叔年纪轻轻就死去了，班昭十几岁就做了寡妇。但是，她幼受庭训，敬养舅姑，抚育儿女，为人处世很有法度。这种美德最后还传到了皇宫里，再加上当时在位的皇帝汉和帝早就听说了她才学过人，就把她招入宫中，专门教授皇后和后宫的嫔妃们各种礼仪。到了邓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班昭更是深受太后的喜爱，以师傅之尊参议朝政，随时出入宫廷。当时，人们把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妇女称为“大家(家音同姑)”，班昭的丈夫姓曹，因而被尊称为“曹大家”。因为她的功劳很大，朝廷还特封她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官职一直做到了齐国的丞相。

古代妇女的骄傲班昭一生，在很多领域都有所贡献。但是，她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最突出贡献，却是整理并续写完成了重要的史学巨著——《汉书》。

自从司马迁完成《史记》以来，因为这部书的记事截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班彪一直想续写西汉的遗事，还为此收集了大量的前朝遗事和档案资料。后来，他曾经作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续补汉武帝以后所缺的部分，这就是《汉书》前身，为《汉书》的写作完成奠定了

基础。班彪去世后，班昭的哥哥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着手编写“包举一代”、囊括西汉历史的史书《汉书》。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努力，班固终于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使《汉书》初具规模。不料，公元92年，班固因为受统治阶级内部政争的牵连，入狱而死。这样，班氏父子花费几十年心血编纂的《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能写完，同时整个书稿面临着散佚的危险。眼看《汉书》的著述就要功亏一篑。这时，汉和帝想到了只有班固的妹妹班昭能担当此任，于是就下诏宣班昭到东汉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观藏书阁，继续完成《汉书》的写作。班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使命，毅然担起整理、续写《汉书》的重任。她补撰了八表，又在马续的协助下，写出《天文志》，终于最后全部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的编撰工作。

《汉书》成书后，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多好评，但是因为书中多用古字，比较难读，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所以，班昭在书成之后，又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亲自向学者们传授，使《汉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她曾在皇家图书馆的东观藏书阁讲解过《汉书》，当时奉诏跟随她学习的人有很多，包括后来成为东汉经学大师的马融。班昭为《汉书》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作用。这部书凝结了班家父子四人的心血，终于完成了这部流芳百世的史学巨著。

除了在史学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外，班昭在文学方面也有所建树。她写过赋、颂等文章十六篇，后由其儿媳丁氏辑成《大家集》三卷，可惜此书已经散佚，只有《东征赋》等八篇流传下来。

尽管后代的有些人一直在怀疑着班昭续写《汉书》的真伪，但是不论学者们的意见如何，大家都公认的一点就是班昭在《汉书》的成书过程中下了大力，费了苦功。即使她没有续写，但是编辑、润色之功也是大家都承认的。而且，在《汉书》成书之后，班昭还成了惟一通晓《汉书》的权威，这就无怪当时的达官贵人们都心甘情愿地拜她为师，听她讲解《汉书》，从而被这些一向心高气傲的学者们尊敬地称为“曹大家”了。

班昭是我国第一位有著述的女学者。在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封建

社会里，才学出众的班昭，真好似一株冲寒怒放的奇葩，她是古代妇女智慧的代表，也是古代妇女的骄傲!关西孔子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堪称典范。

刻苦读书杨震，字伯起，是东汉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地区人。据说，杨震在少年时就失去了父亲，自幼家境贫寒。但他靠着自己那顽强的意志品质，刻苦读书，成年后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和杨震在同一个时代的很多学者，都亲切地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

清廉一生杨震年轻时，以教书为生，到了五十多岁时，他被推荐到朝廷做官，从荆州刺史做起。在任职期间，杨震品德高尚，廉洁公正，从不参与腐败贪污，敲诈勒索和收受贿赂的活动，由此，他到荆州后，就获得了清官的美誉。

从官职上说，杨震的权力并不小，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他任教书匠时差不多，依旧寒酸清贫，未曾添置过像样的家产，每日吃的依旧是粗茶淡饭。很多朋友见此情景都劝杨震，应该趁做官掌权时，给后辈们置办些家产，也好对后人有个交代。杨震听到这样的话时总是笑笑，但会很认真地回绝他们说，我把“清官”这个产业留给子孙后代们，让众人都知道他们是清官的子孙，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多么丰厚的一份产业啊?

孔子暮夜却金由于在职期间政绩突出，杨震后来被调到东莱任太守。在他去东莱上任的途中，经过昌邑县(今山东省巨野县)时，碰到了一个熟人，叫王密。王密是昌邑县的县令，原来也是一名穷书生，还是杨震举荐他做了县令。王密在自己的辖区见到杨震，十分高兴，执意要留杨震在昌邑县多住几日，好让自己尽尽地主之谊，借此机会来款待一下恩人。杨震见王密如此真心真意地挽留自己，也就没再推辞，就在昌邑县停了下来。杨震来到王密府上，简单地吃了顿便饭，喝了几杯王密为自己准备的接风酒，就回到了驿站，打算早些休息，以便次日继续赶路。

在杨震准备就寝时，王密一人独自到访。杨震正纳闷着对方怎么这么晚还来造访，而且自己刚从他府上回来，就见王密环顾了周围确定没

有旁人后，从怀中拿出一包金子，放在杨震屋里的桌子上。

杨震脸色一变，立即质问王密：“你这是什么意思?”王密低声回答说：“当年如果不是恩师的保荐，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这些黄金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望恩公一定不要拒绝，请笑纳。”

杨震看到王密这样的举动，听到这样的话语，严肃地对他说：“向朝廷举荐人才，是任何一个享受朝廷俸禄的人的分内之事，我当初推荐你，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既正派又有才能的人，我并没有让你来报答我，你今天这样，是不对的。”

王密执意要让杨震留下金子，又说：“恩师请息怒，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思，现在社会时兴这个，也谈不上是什么贿赂啊。再说，这间屋子里，只有您和我两个人，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的。”

杨震很是生气地说：“怎么能说是没人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是不会收下你的黄金的，你赶快带着金子离开我这里。”

杨震愤怒之中，下了逐客令，王密只得惭愧地收起了自己的金子，悄声退出了杨震的房间。次日，杨震很早就起身，离开了昌邑县，马不停蹄地奔向东莱上任去了。

后来，杨震深夜拒绝王密献金的事被百姓们知道了，都纷纷称赞他这个清官真是表里如一，这段故事也被后人称为“杨震暮夜却金”，并且成为千古美谈。跋扈将军飞扬跋扈，骄横自大，也终有受报应的一天。

外戚与宦官东汉王朝从汉和帝起，即位的皇帝大多是小孩子，最小的是只生下一百多天的婴儿。皇帝年幼，按照祖例，由太后临朝执政，太后又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娘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局面。有的皇帝死后没有儿子，太后、外戚就从皇族里找一个孩子接替皇帝即位，以便他们控制政权。

但是，小皇帝渐渐长大，日益懂事，就不再甘心长期当个傀儡皇

帝，于是想要摆脱外戚的控制。可是皇宫里里外外都是外戚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只有一些宦官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扑灭外戚的势力。这样一来，外戚的权力就转到宦官手里。

无论是外戚也好，宦官也罢，都是豪强地主阶级中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轮流把持着朝政大权，东汉的政治局面就越来越腐败了。

对一个孩子的报复公元125年，东汉第七个皇帝即汉顺帝即位，外戚梁家掌权。梁皇后的父亲梁商、兄弟梁冀先后被封为大将军。

梁冀是一个十分骄横的人，胡作非为，公开勒索，全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汉顺帝死去的时候，接替他的汉冲帝是个两岁的娃娃，可没料到，过了半年也死了。梁冀就在皇族中找了一个八岁的孩子接替，这就是汉质帝。

汉质帝虽然年纪小，却也伶俐。他对梁冀的蛮横劲儿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将军!”(跋扈即强横的意思。)梁冀听了，气得要命，可当面却不好发作。背后一想，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长大了还了得。于是就暗地里派人把毒药放在煎饼里，送给质帝吃。

汉质帝毕竟是个孩子，哪里会知道饼里有毒，吃了饼，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赶紧叫内侍把太尉李固叫进来。李固见汉质帝十分难受的样子，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汉质帝回答说：“刚刚吃了饼，只觉得肚子难过，嘴里发干，想喝点水。”

梁冀在旁边连忙阻拦说：“不能喝，喝了水就要呕吐。”他的话音还没落，可怜的汉质帝，这个八岁的孩子已经倒在地上，滚了几滚，断气了。

梁冀害死了汉质帝后，就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十五岁的刘志接替皇位，这就是汉桓帝。

无法无天汉桓帝即位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于是朝政全落在梁冀手里，梁冀更加飞扬跋扈起来，越发目空一切了。他为了自己享受，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梁家的私人花园。花园里面亭台楼阁，应有尽有。梁冀喜欢养兔子，就在河南城西造了一个兔苑，命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身上烙上记号，谁要是伤害梁家兔苑里的兔子，就治谁的死罪。据说，有个从西域到洛阳来的商人不知道这个禁令，无意间打死了一只兔子。结果为了这件案子，竟株连了十多个人，商人自己也丢了性命。

梁冀还把几千个良家子女抓来作为奴婢，把这种奴婢称做“自卖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卖给梁家的。他还派人去调查有钱的人家，把富人抓来，随便给他安一个罪名，叫他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就得办死罪。有个叫孙奋的人很有钱财。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却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被梁冀逼得没办法，给了他三千万。梁冀火了，吩咐官府把孙奋抓去，诬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奴婢，偷去大量珍珠、金子，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就被官府活活打死，财产也全被没收了。倒台梁冀就这样无法无天地掌权将近二十年，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梁冀派人暗杀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实在忍受不了，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五个跟梁冀素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没有防备，发动羽林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慌里慌张直发抖，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知道自己再也活不了了，只好吃毒药自杀。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亲戚也全都被治罪，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朝廷上下，梁冀的爪牙心腹三百多人全撤了职。结果一时间朝廷上的官职差不多一下子全空了。

梁家倒台，老百姓别提有多高兴了。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家产，一共价值三十多亿，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半数。那些被梁家占用作花园、兔苑的民田，仍旧给农民耕种。

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个宦官都封为侯，称做“五侯”。从那时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宦官手里了。梁冀势力的覆灭，说明外戚势力在东汉朝堂上暂时的结束和被削弱，宦官势力这时有了较大的起色，单超等五人开始深得皇帝的信任。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成了东汉政治的一大特色。而梁冀的跋扈和其族人的猖獗，也不过是外戚一时

势力盛行的写照，是东汉其他皇帝遭遇到外戚专权时都会遇到的局面。天下楷模李膺非常有声望，当时的人以能和他见上一面为荣。

秉公执法李膺是颍川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人，出身在一个官僚之家，可是他却没有官宦人家常见的长袖善舞的本事，为人非常不善于应酬，也不轻易和别人来往，性格正直，很讲原则。

东汉后期，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权，他们专断独行，扰乱朝纲，胡作非为，结果导致黎民饱受痛苦，百姓民不聊生。李膺是一个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人，从自己步入官场之日起，他就把同宦官作斗争、保卫汉家皇室的威严，作为自己一生的神圣使命。

在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朝中有个权势很大的宦官，名叫张让。他的弟弟名叫张朔，借着哥哥的光当上了县令。这个张朔在地方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做尽了坏事。但是因为他哥哥在朝中的权势太大，从来没有人敢去管他。就是级别比他高的官员见到了他，都是恭恭敬敬的，生怕说错了话。李膺却不管这一套，从他上任伊始，就准备要惩治张朔。张朔听说后，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弃官而逃了。他逃回京城，躲到哥哥张让的宅子里。李膺得知后，立即亲自来到张让府上，不顾张让的请求，毫不留情地逮捕了张朔。经过严格审理，确认罪名属实，立即就宣布将张朔处以死刑。

作威作福惯了的张让怎么也想不到有人敢李膺拿自己的弟弟开刀。他连忙赶到宫中，向汉桓帝告状，说了李膺很多坏话。汉桓帝听了，信以为真，十分生气，立即宣李膺进宫觐见。汉桓帝指责李膺，怪他没有在请示自己前就随便处斩了张朔。可是李膺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陛下，以前晋文公在周天子身边捉住了陈公就立即处决，当时也没有事先请示周天子，而周天子也没有说他有什么不对。如今张朔犯了重罪逃回京城，微臣只是依法办事将他处死，本来就用不着请示陛下啊。”

汉桓帝听了李膺所说，想想也觉得有道理，何况自己也挑不出他什么毛病。汉桓帝心想：是啊，本来处死这样一个罪犯就是无需请示皇帝的，只不过这个罪犯是张让的弟弟，才显得与众不同罢了。想到这里，汉桓帝心里都明自了，但他还是坚持对李膺说：“你刚上任没几天，还没

了解全部情况，不该那么快就处死犯人的。”

李膺发现汉桓帝在故意找自己的毛病，就说：“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做司寇，上任七天，即斩了少正卯。微臣到今日，已经上任十天了，一直担心因为自己办事不力而有负皇恩，想不到陛下却嫌微臣办事太快而不高兴。臣自知难逃一死，但希望陛下能让臣再担任五天这司隶校尉，让臣杀了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之后，臣死而无憾。”

汉桓帝见李膺这么说，知道自己再也挑不出他的什么错了。于是挥挥手让李膺出宫去了。等李膺走远后，汉桓帝才扭过头来，对张让说：“这件事看来也只能怪你弟弟，他为什么要去找李膺的不自在呢?”

李膺处斩张朔之后，宦官们的气焰不再那么嚣张了。有些自己知道已经犯下滔天大罪的宦官，更是连宫门都不敢出，生怕被李膺揪住把柄。

难逃一死汉桓帝见身边这些平日里天天到外面去惹是生非的宦官突然间都变得老实起来，不禁觉得很纳闷，大惑不解。于是就问身旁的宦官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安静?宦官们回答说，外面大街上有老虎啊，还是躲着点儿好啊!

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发生了宦官反对清议的“党锢之祸”，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置李膺于死地，他们恨死李膺了，忌惮了好久后，终于可以报复他了。李膺被捕后，深知自己得罪了宦官，难逃一死，于是坚决不肯向那些破坏国家、作恶多端的宦官们屈服，最终还是被害死了。

李膺不畏权势，敢于向专权跋扈的宦官们挑战，再加上他优秀的个人品德，所以被天下的读书人称为“天下楷模”。在当时东汉末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的所作所为，是无愧于“天下楷模”的称号的，他也一直受到后世人的敬仰和爱戴。范滂自投罗网在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总是把一个“义”字摆在前头。

宦官的危害汉灵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因为皇帝年龄太小，所以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掌握朝廷的大权。封自己的父亲窦武为大将军，陈蕃

为太尉，共同治理国家。

窦武和陈蕃都是支持名士、反对宦官一派的，他们把原来受到宦官的迫害，终身禁锢的李膺、杜密又召回来做官。陈蕃曾经对窦武说过：“只要一天不消灭宦官，就没法使天下太平。我已经是快八十的老人了，还贪图什么?我留在朝中，只是想为朝廷除害，帮助将军立功而已。”窦武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发现陈蕃竟然和自己想到一起去了，心中非常高兴。两人一商量，就由窦武向窦太后提出，要求痛下决心，消灭朝中的宦官势力。可是窦太后跟汉桓帝一样，都很相信自己身边的宦官，而且也深知宦官势力的强大，没有一举成功的把握，是不敢下手的。所以她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陈蕃看到太后一直在犹豫，就又向窦太后上了一道奏章，其中列举了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几个人的种种罪恶。窦太后看了以后还是没有答复，仍旧把奏章搁在一边不理。

党锢之祸这一来，他们的举动反倒打草惊蛇了。曹节、王甫联络了一些宦官，来了先下手为强。他们先从窦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窦太后软禁起来。又用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杀了。宦官又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凡是窦武、陈蕃提拔的人统统被撤职。李膺、杜密也被撤职回到家乡。因为他们一直反抗宦官的行为，在民间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一些名士、太学生更加推崇他们，也受到了他们古代征战的影响，更加痛恨宦官。那些掌权的宦官们把他们看作死对头，总想找机会置他们于死地。

当时有一个名士张俭，因为他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的罪行，所以侯览一心想报复他。正巧，张俭家偶然赶走了一个犯了错的仆人。侯览就利用那个心怀怨恨的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结成一党，诽滂朝廷，企图造反。宦官曹节也抓住这个机会，吩咐他的心腹上奏章，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汉灵帝，这时候才十四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他就问曹节说：“为什么要杀这些人?他们有什么罪?”于是，曹节就指手划脚把党人怎样可怕，怎样想推翻朝廷，图谋造反的事，乱编了一通。小皇帝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真假，听他们这么一说，当然就相信了他们，连忙下令逮捕党人。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都骚动了起来。这时，有人提前得到了消息，连忙跑去报告李膺。李膺听了反而坦然地说道：“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了!如果我现在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年纪已经六十了，死活由他去，还逃什么?”他就这样自己进了监狱，被拷打死了。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但是宦官的党羽们仍旧不放过那些士人，继续在全国各地抓捕当地有名的反对宦官的读书人。

自己投案汝南郡的督邮就是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范滂的人。他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什么也没做，反倒关上门，把自己锁在屋里，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痛哭起来。驿舍里的人听到哭声，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这个消息传到当地的名士范滂那里，他笑了笑说：“我知道督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

于是，他就亲自跑到县衙里去投案。县令郭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见到范滂自己来了，吓了一大跳，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说完，他还打算交出自己的官印，跟范滂一起逃走。

范滂十分感激郭揖，还是拒绝了郭揖的提议，他说：“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捕党人的事停下来。我又怎么能连累您呢?再说，我的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

郭揖没有法子，只好把范滂收进了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滂来见面。范母带着孙儿随着公差到监狱来探望范滂。范滂安慰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弟弟会抚养您。您不要过分伤心。”范母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反倒十分镇定地说：“你能和李、杜(指李膺、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够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

范滂跪着听他母亲说完，又回过头来对他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

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范滂就这样被宦官冤

杀在了监狱之中。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还有六七百个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只有那个宦官侯览的死对头张俭，却反而逃过了官府搜捕。他一听到官府要来抓他的消息，就开始到处躲藏，许多人听说了他的名声，都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等到官府得到消息来抓他的时候，他又躲到别处去。于是，凡是收留过他的人家都遭了祸，轻的下监狱，重的被杀，甚至整个郡县都因为他而遭了殃。他的这种贪生怕死的行为，比起范滂的勇敢面对灾祸，也不愿意连累他人的行为，可就差的太远了。汉桓帝卖官鬻爵皇帝将自己的臣子官职当作商品，国家怎么可能不亡呢？

第十三章

黑暗的时代汉桓帝，名刘志，是汉章帝的曾孙。因为汉质帝被梁冀毒害，他得以幸运地登基为帝。汉桓帝在位时间21年，而前13年间，他只是个傀儡皇帝，真正的朝政大权由外戚梁冀总揽。在28岁亲政后，汉桓帝在宦官势力的协助下诛灭了梁氏一族，结果却引来了宦官专权，使朝政更加混乱。

汉桓帝还到处搜集美女，在后宫藏了佳丽千万，以满足其奢侈荒淫的放纵生活。他还异想天开地要“卖官鬻爵”，公开破坏了东汉的政治法规，败坏了社会风气，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实际上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当时，梁冀是大将军，是当朝梁太后的哥哥。梁冀专横跋扈，无所不为，朝廷内部呈现出贿赂公行，政出私门的局面，造成了政治上的极端黑暗。梁冀册立了汉桓帝后，权力达到了顶点。汉桓帝对他极端尊崇，委以重任，甚至准许他可以“入朝不趋，剑履上朝，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又加了四县给梁冀作为其食邑，赏赐金钱、奴婢、车马、甲第等。梁氏一族中，还有梁不疑被封为颖阳侯，梁蒙被封为西平侯，梁胤被封为襄邑侯，梁冀由此更加专横暴虐。百官升迁，居然要先到他的家里谢恩，然后才能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地方贡品，上等的献给梁冀，次等的才给汉桓帝。梁冀的跋扈张狂，其实让汉桓帝无比痛恨。延熹二年，梁太后病逝，汉桓帝依靠宦官单超等五人的势力，一举诛灭了梁氏的势力。

这次政变，消灭了梁氏外戚的势力，却又导致了宦官专权时代的到来，朝政非但没有平定下来反而更加混乱了。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位同三公，朝政大权由宦官们牢牢把持。这些宦官一朝得势，横行霸道，穷极奢侈，倒行逆施，把东汉政府弄得乌烟瘴气。他们还在地方上安排爪牙，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务。甚至还强抢民女，强迫逼为妻妾；霸占民田民宅，大兴土木；收养义子，世袭爵位；滥施淫威，追求铺张排场。各级官吏上行下效，都

是贪婪暴虐之徒，鱼肉乡里，导致民不聊生。东汉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和激化起来，人民群众开始觉醒，奋起反抗了。

公元159年，羌族人民再也忍受不了贪官污吏的疯狂野蛮压榨，掀起了少数民族大起义，声势浩大。他们的起义军很快扩展到了三辅及并州和凉州，东汉政府派护羌校尉段颍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起义的大旗却更加高高飘扬，熊熊的起义大火越烧越旺。随后，东汉政府改派中郎将皇甫规，他采取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严惩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这才逐渐平息了羌族人民倡导的大起义。

无药可救的边缘公元162年，荆州南部地区的人民也举行了英勇的起义，起义军攻打长沙、桂阳等地，在苍梧、南海、交趾等地厮杀，联合当地人民，杀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人民群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给东汉王朝以很有力的打击。东汉政府不得不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然而，被压迫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从当时流传着一首民歌我们就可以看出：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汉桓帝无视内外交困的局面和国库空虚的现状，恣意圈养着上万宫女，供其淫乐，以维持、满足他腐朽糜烂的生活。以汉桓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穷极奢侈，致使国库枯竭。他还借口羌族人民大起义，从公元161年开始，施行“卖官鬻爵”，以此来聚敛财富，供其挥霍。他下令以不同的价格售卖关内侯、羽林郎和五大夫等重要官职。不问来人的才学和品德，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来作。这样的官吏一上任，就开始疯狂野蛮地搜刮老百姓，他们残暴凶恶，盘剥压榨老百姓，以此来把他们买官的钱加倍地夺回来。东汉各级官吏一时间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奢侈糜烂，穷凶极恶。汉桓帝靠这“卖官鬻爵”的办法确实大捞了一把，他还为自己的“灵活机智”而洋洋得意，却不知自己的无知、昏庸、荒唐、愚昧，早已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更加腐败，吏治更加黑暗，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尖锐。这下子，东汉政权真是摇摇欲坠，真的走向灭亡和崩溃的边缘，无药可救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是东汉政局的一大特征。帝多年少，太后势力强大，母家党羽众多；宦官身居朝中日久，自然也不甘落后。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以皇帝为筹码，在宫廷中明争暗斗，把持朝政大权，是实质上的皇帝。小皇帝多年少不经事，以为后

党干涉朝政，便依靠宦官以图夺权亲政，殊不知自己赶走的是一匹狼，引来的却是一群狼，终落得个被人利用的下场，或死于非命，或亡于声色犬马之中。可叹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开创和后续的汉室基业，就这样毁在了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手中。兴建裸泳馆他以贪婪荒唐在东汉的皇帝中闻名。

只爱金钱的皇帝汉灵帝，名叫刘宏，是汉章帝的玄孙，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刘宏十二岁登上皇位，目睹了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知道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于是很有自知之明地任凭宦官集团独霸专权，自己甘愿当一个傀儡皇帝。他曾经无耻地说，宦官张常侍就是他的父亲，赵常侍就是他的母亲，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治国大权完全交给身边的宦官，对国家大事再也不闻不问。那么，他整天无所事事，究竟对什么感兴趣呢?

要说刘宏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那就是钱，这是受了他母亲的极大影响。他的父亲位列侯位，比大富大贵的当朝权贵，自是家境一般。可他的母亲董氏，一向嗜财如命，看到人家暴富，就心里冒火，恨不能把别人的家产全都抢过来据为己有。刘宏在母亲的熏陶下，对金钱、财产有着极大的占有欲，甚至连做梦都想着捡到钱。

公元168年，汉桓帝去世，刘宏继位，为汉灵帝。他不虚心学习治国之道，十七岁亲政时，对政事一窍不通。他把大权委任给亲信宦官和母亲董太后，自己专心变着花样玩乐，贪图享受，生活很是荒淫奢侈。

汉灵帝刘宏在玩腻了皇家园林后，对遍地的奇花异草、珍奇走兽、四季飘香的果蔬都没了兴致，上林苑、西苑、显阳苑、平乐苑、鸿德苑都不能满足他，他要建造规模更大，气势更恢弘，设计更古代人物画豪华的新苑。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国库早已经被他折腾得空空如也了。

短见的董太后看小皇帝不高兴，就建议他卖官来敛钱，糊涂荒唐的汉灵帝居然也拍手称快，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在公元178年，董太后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明码标价，按官位等级定位。两千石的官，要价两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要价四百万钱，云云。他们还规定，确有品德高尚的人，可以酌情减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价钱。可以现

金交易，也可以赊欠，到任后需加倍偿还。这样的官员，到任后自然疯狂野蛮搜刮百姓钱财，逼得百姓家破人亡。卖官所得的钱，收藏在西苑仓库内，取个名字叫作“礼钱”。望着满屋子的钱，董太后心里十分踏实。她计划把这些钱全部留作自己的私房钱用，儿子造御苑可以再去卖官鬻爵。汉灵帝在母亲的授意下，卖官得到了许多的钱，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的刘宏激动得甚至头晕目眩，手脚都抖了起来。

皇帝购置地产汉灵帝把一部分钱用于造了新苑，就是毕圭苑和灵琨苑，那么剩下的钱他打算怎么花呢?他终于决定拿回老家河间置办产业，购买田宅，让周围的人看看，我家也有钱了。看来他真不是真龙天子的料，当不长皇帝，他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道理都不明白，作了皇帝都不踏实，都想着留后手。有个宦官叫吕强，觉得这样太可笑了，就劝汉灵帝道：“天下万物都是陛下一个人的，何必花钱购买呢，陛下此举实在不妥当啊。”汉灵帝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还是我行我素，不加理睬。

卖官鬻爵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建了新苑，买了田宅之后，还剩下许多，这该怎么花呢?汉灵帝在西苑修了个万金堂，以储藏金钱用。他又用搜刮来的钱在殿内铸了四个铜人，四个黄金钟，四个铜蛤蟆，用来看守自己聚敛来的财富。他还时常像个农村地主一样，时不时来看看，摸摸看看自己的钱还在不在。汉灵帝刘宏，就像一个暴发户，有了钱先置办产业，再捂紧了钱袋，剩下的就是尽情享乐了。

微服私访的胡乱行为他讨厌朝臣们前呼后拥地跟着他去游览御苑，就换上常人的衣服，“微服”出巡了几次，他觉得很有意思，就又让人在御苑内设立市场，让宫人扮成商贩，卖酒卖肉，卖衣卖布，他自己游逛于其间，不时侃价，顺手牵羊，喝酒吃肉，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故十分尽兴。

宦官们为了讨好汉灵帝也为了麻痹他，就变着花样逗他玩儿。有一次，宦官给一条狗戴上顶戴花翎，身披朝服，刘宏瞧见了，大笑不止，说：“好一个狗官啊!狗官不错!”朝臣们跟随着见到此景，只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拍手称好的自然是宦官。宦官们还找来了四条很老实的驴，栓成四辆小驴车，拉着刘宏满皇宫乱跑，刘宏亲自驾车，左突右

撞，宫中到处晌起“驴车老板”的吆喝声。皇帝尚且如此，大臣们为拍马屁，自然争相效仿，一时间“洛阳驴贵”。

裸泳馆的兴建不久，汉灵帝刘宏对狗对驴又没了兴趣，宦官们也想不出什么更刺激的点子了。一日，刘宏猛然说：“我想看女人光着身子玩儿!”于是，在西苑就建起了“裸泳馆”。汉灵帝看着众多妙龄少女们裸奔于其间，也加入裸奔的行列，嬉笑淫荡，深感无比欢畅。汉灵帝如此荒淫无耻，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昏君。正所谓主暗臣昏，他手下的大臣们也只顾助其为非作歹，讨得皇帝的欢心，宦官们则一心只顾聚敛钱财，奢侈挥霍。最后，这样的朝廷君臣终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爆发了黄巾大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给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公元189年，年方三十四岁的汉灵帝刘宏一命呜呼，结束了他贪婪奢侈荒淫无度的一生。

作为一个帝王，不关心自己的国事，放任宦官乱政，实在可气。兴建“裸泳馆”让少女裸奔，实在可悲。东汉王朝，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灭亡。傀儡皇帝当皇帝变成傀儡的时候，还不如一个百姓舒服。

年幼称帝汉献帝，名刘协，他的父亲就是东汉有名的昏君汉灵帝。他就是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汉室皇位落入曹氏父子手中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刘协年幼的时候，经历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的这样一个在东汉一朝特有的政治局面，其间围绕着权力，产生了很多的血雨腥风。九岁时，刘协被当时的大奸臣丞相董卓立为皇帝，随后就开始了他一生饱受欺辱的傀儡皇帝生涯。他就像一个玩偶，被各种势力争来抢去，受尽挟制，也任人摆布，可谓是失去了尊严还要遭到凌辱。直到最后，刘协落入了曹氏父子手中，在曹操和曹丕的淫威之下，继续苟且偷生。公元220年，曹氏的羽翼已经丰满，不再需要他这个傀儡皇帝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的幌子了，于是，汉献帝被迫将自己的汉室皇位让位给曹丕，结束了自己屈辱悲惨的一生，也同时结束了汉朝的历史。

纵观东汉一朝，皇帝年幼，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是一个很明显的政

治特征，汉室政治格局也因此而与众不同。很多小皇帝都悲惨地沦为外戚和宦官们争权夺势的工具。那么，汉献帝又是怎么沦为一个傀儡的呢?这要从他的父亲、昏君汉灵帝说起。汉灵帝荒淫无度，贪婪无耻，不分是非，混淆黑白。这导致了宦官在宫内玩弄权术，官僚也无心治理，只贪图敛财，终致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汉灵帝末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这沉重地打击了早已摇摇欲坠的东汉政权，整个王朝在衰落，不可逆转地在瓦解中走向灭亡。汉献帝刘协就是在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中，登上了皇位，纵然他再有千万般本事，也无力回天了。

汉献帝坎坷命运汉献帝刘协生来命运坎坷。他的母亲是汉灵帝时的王美人。王美人怀孕时，害怕当时的皇后何氏——一个屠夫的女儿嫉妒自己，就不敢产子，遂服用了打胎药，可是，没有奏效，刘协还是历尽艰难地来到了人世。善妒的何皇后闻听此事，果然醋劲大发，以至于真的毒死了王美人。此时刘协尚未过满月，就由祖母董太后抚养。刘协从小举止高贵端庄，颇有皇家风范，因此很得汉灵帝的喜爱。而何皇后的儿子刘辨举止轻浮粗俗。由于刘辨是皇长子，因此汉灵帝犹豫着一直没有确立太子的人选。结果不久后汉灵帝就病死了，刘辨被他的舅舅，大将军何进立为少帝，刘协被封为陈留王。

少帝新继位，东汉的宦官势力和外戚势力又一如既往地为权力争夺了起来。最后，是并州牧董卓取得了胜利，控制了京师的政治形势，他以司空的身份废掉了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从此，年仅九岁的刘协开始了他痛苦悲惨的一生。

董卓与王允董卓自封为相国，又加封了太师，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为所欲为。汉献帝在董卓的淫威逼迫之下，噤若寒蝉，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各地地主豪强，纷纷以讨伐董卓这个大奸相的名义起兵，共同推举了袁绍为盟主，围攻洛阳。董卓挟持着汉献帝，迁都于长安。其实汉献帝无时不想摆脱董卓对自己的控制，他希望借助军阀势力来消灭董卓，可惜无人把他当回事，自然没有人理睬他。公元192年，司徒王允和中郎将吕布密谋，利用貂婵这一美人计策划刺杀了董卓，朝政大权遂由此二人把持。

王允是个狭隘多疑的人，也树敌无数，后来也被诛杀。汉献帝又落入了旁人的手中，依然不得自由，又从长安颠沛流离地回到了洛阳。刘协本以为能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了，却又遭遇了愈演愈烈的军阀争霸之战，最后，曹操抢先占领了洛阳，牢牢控制住了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后又要挟汉献帝迁都许昌，就连皇宫侍卫也都换成了曹氏党羽，汉献帝与自己的臣子们被隔绝起来，忠于汉室江山的朝臣被杀，再也没有人真心为汉家江山着想了，刘协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被曹操软禁在被曹氏软禁的日子里，刘协也想过抗争，可他的力量太薄弱了，根本就不堪一击，终究还是抵不过曹氏的强权，改变不了自己受挟制被凌辱的命运。汉献帝有个贵人姓董，是董承之女，本已怀孕，她的父亲被曹操视为眼中钉，所以就连汉献帝含泪恳求曹操放过董贵人一马时都被曹操粗暴地拒绝了，董贵人最终被曹操所害。可怜一个堂堂天子，竟连一个怀有自己骨血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刘协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

古代画扇公元213年，曹操自立为魏公，汉献帝明白，曹氏自立代汉的日子不远了，自己傀儡的命运也快到头了。汉献帝的皇后姓伏，是伏完之女。伏皇后目睹了曹操对汉献帝的残暴和凌辱，感到汉室江山已经危在旦夕，再不救就来不及了，于是偷偷地写信给自己的父亲，求父亲伏完采取行动来推翻曹操。可伏完知道自己的势力根本不足以与曹操抗争，不敢以卵击石。可这封密信的内容不知被谁泄露，让曹操知道了，曹操大怒，代替汉献帝写好了废后的诏书，命令汉献帝废后，又派御史大夫去捉拿伏皇后。当伏皇后从官内拖出时，她披头散发，赤裸双脚，凄惨无比。她跪着向汉献帝哭诉道：“你是一国之君啊，就不能给我求情，留下一条生路吗?”可曹操根本就不理睬汉献帝的苦苦哀求。最后，伏皇后被幽禁而死，她的两个皇子也被毒死。汉献帝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妻离子散，自己却无力保护他们，大受刺激，痛苦时时折磨着他的心。然而，他也明白，更大的变故，还在后面等着自己。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给他。曹丕还居然封汉献帝为山阳公，还要汉献帝向自己磕头谢恩。刘协就这样孤寂地又活了十四年，最后抑郁而终。

第十四章

汉匈战争西汉时期，汉政权的最大外来威胁是来自北方的匈奴。汉高帝时，采用刘敬献计，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丝絮酒米等财物，约为兄弟，冒顿单于的进犯稍有收敛。刘邦死后，冒顿公然致书吕后狂妄地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并以极其侮慢的词语戏弄吕后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与娱同），愿以所有，易其所无。"①对于这样露骨的挑衅和侮辱，西汉政府由于国力不足，无法抗击，吕后只得命人答书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误也）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②卑躬屈膝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还是献马、和亲，以求一时的安宁。

古代演奏文、景之世，冒顿死，其子老上、孙军臣相继立为匈奴单于。西汉政府虽然继续奉行和亲政策，通关市，厚馈赠，但仍无法遏止匈奴铁骑的侵犯和掳掠。文帝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今宁夏同原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纵骑兵入烧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前锋直抵雍县（今陕西风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二百里。文帝命张相如为大将军。大发车骑前往抵御，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匈奴骑兵逐出塞外。景帝时，著名政论家晁错曾提出"徙民实边"，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以备匈奴的策略，为景帝采纳。吴楚反，匈奴欲与赵王合谋入边。后汉军破赵，匈奴亦罢兵。景帝仍然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但直至景帝末年，匈奴始终未能停止对汉朝边境进行小规模的骚扰。

匈奴婢女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后，在西汉前期积累雄厚财富和平定七国之乱后形成的统一力量的基础上，决定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为了作好充分准备，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即下令全国各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③，并亲自向他们策问古今的治国之道。《汉书·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

位，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武帝从中拔擢董仲舒、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予以破格任用。这样，汉王朝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都增添了新的血液，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在外交上，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得悉月氏王为匈奴所杀，月氏余众遁往西域、意图报复的情况后，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此行虽然未能成功，但西汉政府因此对西域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为孤立匈奴和尔后沟通西域起了一定作用。在军事上，汉武帝认识到，要想战胜匈奴，非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不可。因为骑射是匈奴的长技，以前晁错在向汉文帝上《言兵事疏》中曾经谈到匈奴骑兵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与犹如）也；险道倾仄（斜坡），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④武帝即位后，针对这一情况，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除令各郡县大量扩建骑兵外，中央也直接训练骑兵。当时设置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虎贲、射声、中垒、步兵等八校尉，其中有四个是与建设骑兵有关的。在骑射训练方面，也以匈奴的技术为标准，一方面选召许多精于的“六郡良家子”⑤为郎，担任皇帝的侍卫；另一方面，又雇用长于骑射的匈奴人，来担任教官。经过不断的努力，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终于建立起来，为对匈奴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开始于元光二年（前133）。是年夏六月，武帝命雁门马邑人聂宜出塞，引诱匈奴军臣单于进占马邑（今山西朔县），派遣李广、韩安国等五将军率汉军三十余万埋伏在马邑附近山谷中，待匈奴军队入伏后予以歼灭。军臣单于率匈奴骑兵十万人如期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行至距马邑百余里处，见畜群布野，无人管理，心生疑虑。继进至汉“亭”（边防设施）时，‘俘汉巡边尉史，得知汉方诱兵之计，军臣单于大惊，慌忙退归。自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西汉边郡，汉军也多次发动反击和进攻。在长期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一、河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7）春，匈奴侵扰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杀掠吏民数千人。武帝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避实就虚作战方针，命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出云中，沿河西进，对盘踞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楼烦王、自羊王的军队，风景画鉴赏进行突然袭击，歼灭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

头，乘胜进至高阙（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沿黄河折而南下，直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夺回河套南部地区，于其地设置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二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旧长城。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以充实边防力量。

匈奴贵族不甘心于河南的失败，于元朔三年和四年，又先后数次侵入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西南）、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延安），杀掠吏民数千人。元朔五年（前124）春，匈奴右贤王又数次侵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武帝为了确保朔方，派将军卫青督苏建等六将军领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深入塞外六七百里，乘夜包围右贤王的王庭。右贤王酒醉，突遭袭击，在惊惶中，仅率壮骑数百人突围北逃。汉军虏获匈奴裨王（小王）以下一万五千人，获牲畜数十万头，大胜而归。武帝派使者迎接凯旋的汉军，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统领诸将。这次战役，巩固了汉王朝在战略要地河套南部的统治，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首都长安的严重威胁，而且构成了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开始转入有利地位。

同年秋，匈奴又出动骑兵万人侵入代郡，大肆杀掠。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主力，巩固边防，武帝于元朔六年（前123）二月，命大将军卫青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将军，率领十万余骑，由定襄北进数百里，在漠南歼灭匈奴军数千人。卫青之甥、年仅十八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也率领八百精骑，参与战役，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获得歼敌二千余人的辉煌战果。战后，全军返回定襄、云中、雁门，经过短期休整后，于夏四月再出定襄，击歼匈奴军万余人。但苏建和赵信率领的三千名骑兵，与匈奴单于军队遭遇，损失惨重，苏建突围逃回；赵信原是匈奴小王，在失败后又率残部八百余人投降匈奴。赵信向匈奴单于伊稚斜建议，将匈奴军队转移到大漠以北，以诱汉军，待其疲困，然后出而击之。伊稚斜单于纳其献计，决定暂作战略上的撤退，将主力远徙漠北。

二、河西之战西汉河南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在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东面左贤王和河西匈奴的军队。河西即今甘肃的武威、张

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义称河西走廊，向为中国通西域的道路。从这两方面匈奴军队力量来看，无疑是左贤王较强。但河西匈奴控扼通西域的要道，对汉朝的威胁，又较左贤王为重。在匈奴主力转移漠北，北部边防趋于缓和的情况下，武帝为了打开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北边防，于元狩二年（前121）春，命骠骑将军（“骠骑”是骁勇的意思）霍去病率领精骑一万人，由陇西出塞。汉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勇猛向西挺进，经历五个匈奴王国（部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余里，在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下，与匈奴短兵相接，击杀折兰王、卢胡王（一作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以下古代风景画鉴赏八千九百余人，并且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佛像）。浑邪王、休屠王等率败军逃遁。

为了彻底歼灭河西匈奴有生力量，同年夏，霍去病与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省环县东南）出发，向河西进军。同时，张骞、李广领万余骑兵，从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县）出发，以左贤王为进攻目标，以策应霍去病的行动。

李广率四千名骑兵先行，北进数百里，为匈奴左贤王的四万名骑兵包围，力战二日，死者过半，杀敌亦过当（超过相抵之数）。张骞率主力赶至，左贤王见不能取胜，乃引兵退去。汉军因疲劳过甚，亦未追击而还。

霍去病和公孙敖由北地出发后，以迅速行动向河西实施大迂回，越过居延泽（在今内蒙古西北部）、小月氏（未西迁而仍留居的月氏人），深入二千余里，在祁连山麓（今甘肃张掖西南）与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展开激战，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计接受匈奴单桓王、酋涂王等两千五百人的投降，俘王子、根鼠潞军、当户、都尉等百余人，歼灭匈奴军队三万二千人。汉军亦损伤约十分之三。匈奴单于恼恨浑邪王、休屠王两次战败，损伤惨重，欲加诛罚。两王连遭汉军重创，士气受到严重挫折，又怕单于降罪，乃于是年秋共谋降汉，派使者向正在黄河沿岸督修城堡的大行（执掌异族归化投顺事务的官）李息接洽。武帝闻奏，恐匈奴诈降袭边，即令霍去病率军前往受降。休屠王临时反悔，为浑邪肇王所杀，部众也被兼并。霍去病率军渡河后，与浑邪王的部队对面相望。浑邪王属下裨将望见汉军，心存疑惧，不欲投降，准备逃走。当此

紧要关头，霍去病当机立断，亲率精骑驰入匈奴营中，与浑邪王会晤，斩杀企图逃亡的八千人，并先遣浑邪王乘驲传先至行在所（长安），去见汉武帝。然后亲率匈奴投降官兵四万多人回到长安。其后，汉武帝将匈奴降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因其故俗为“五属国”。西汉王朝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不但阻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的作用。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去河西，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马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⑥三、漠北之战汉军在河西大捷以后，匈奴在军事形势上的右翼力量已经显著削弱；但单于兵力的中坚部分，对汉朝的威胁依然很大。河西之战的第二年，即元狩三年（前120）秋，匈奴又派骑兵数万人侵入右北平、定襄，杀古代山水画掠吏民千余人，并企图引诱汉军深入，乘远道疲困予以歼灭。

汉武帝决心彻底解除来自匈奴的侵扰，为此目的，他一方面采取整理币制、专卖盐铁、加重商税等措施，以解决战时经济的困难；一方面乘匈奴势衰之际，集中兵力，深入打击其主力。元狩四年（前119）春，他召集众将商议进军漠北说：“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沙漠）轻留（轻人久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⑦他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因势利导，确定集中兵力、深人漠北、歼灭匈奴主力的作战方案。随即集中兵力十万人，组成两大骑兵集团，令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分东西两路，远征漠北。同时令李广为前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食其为右将军，曹襄为后将军，皆归卫青指挥。由于此次用兵，是准备在沙漠地区与匈奴主力决战，大量人马的物资供应和军需品的运输补给，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武帝在连年战争军马不足的情况下，决定组织“私负从马十四万匹”⑧，随军行动；并以步兵数十万人，紧随大军之后转运辎重，以保证这次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

汉军大出击的消息传至匈奴，赵信向单于献策说：“汉军即度幕，人马疲，匈奴可坐收虏耳。”⑨伊稚邪单于纳其议，将全部辎重转移至远北。以精兵待于漠北。汉军原拟由定襄北进，并由霍去病专力对付单于。但在进军途中，捕得匈奴俘虏，得知单于驻地所在，于是又改令霍去病从代郡出击，卫青仍按原定计划出定襄。卫青率领精兵直趋单于驻

地，命令李广与赵食其合兵一处，从东道进发，约定在战场会齐。卫青率军出塞后，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望见伊稚邪单于的军队正严阵以待。卫青临危不惧，他下令用武刚车（四周及车顶用皮革做防护的兵车）自环为营，然后派出五千名精骑去向敌阵冲锋。伊稚邪也以万骑应战。这时，天近黄昏，狂风陡起，沙砾击面，两军对面不相见。卫青乘势派出部队从左右翼迂回，包围单于的营阵。单于见汉军人数众多，士气旺盛，自度不能取胜，慌忙骑上善走骡，率领数百名精骑，向西北方古代风景画鉴赏向突围逃去。两军激战至深夜，杀伤相当。卫青发现单于逃走，立刻派出轻骑连夜追击，匈奴人马纷纷溃散。及至天明，汉军深入二百余里，未获单于踪迹，计俘斩匈奴官兵一万九千人。汉军一直挺进到寅颜山（宾音田，寅颜山在今外蒙古纳拉特山）赵信城（赵信降匈奴后所建）。汉军在赵信城缴获匈奴大批积粟，补充了军用。大军驻留一日后，尽焚其城余粟奏凯而还。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统率的东路是主力军，因而配备兵力最强，所领骑兵皆“敢力战深入之士”⑩，所属将领，如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都尉卫山，校尉李敢和徐自为等人，都是有名的猛将。他古代风景画鉴赏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先前匈奴的降将，他们熟知地理，惯于在沙漠中行军。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上行军二千余里，越过大沙漠，与匈奴左贤王军遭遇，大败左贤王，击溃其主力部队，俘获左贤王属下三个小王，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捕斩七万四百余人。左贤王及其将领弃军逃走，汉军追至狼居胥山（今外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在其主峰上建立高坛，祭告天地，然后班师凯旋。

这次漠北决战，卫青所到宾颜山和霍去病所到狼居胥山，都在瀚海大沙漠以北，已深人匈奴腹地。汉朝两路大军追击匈奴，出塞二千余里，共歼敌九万余人，夺回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所有草地，“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军亦有不小损失，士兵死亡数万人，军马十一万余匹。

注释①②《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③《汉书》卷六《武帝纪》。

④《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

⑤六郡：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上郡、北地郡、西河郡。良家子：地主官宦人家子弟。

⑥《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旧事》。

⑦《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

⑧《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⑨⑩《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张骞通西域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旧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总称）以东，被称为西域，是为狭义之西域。广义的两域，则把葱岭以两，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地方，也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张骞出使西域之内。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葛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分为三十六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①，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南北边缘。南缘自楼兰（在罗布泊附近，昭帝元凤四年更名鄯善）沿昆仑山路而西，至于莎车（今新疆莎车），凡十国，是谓“南道诸国”②。北缘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沿天山南麓而东，至于狐胡（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凡十二国，是谓“北道诸国”③。南、北道诸国，人口多者才八万人（龟兹），少者仅数百人（狐胡），多以种植和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之日“城郭诸国”。自莎车以西南，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者凡十国，是谓“葱岭诸国”④。这些国家由于耕地面积限制，大多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此外，天山北麓还有蒲类、蒲类后国、单桓、乌孙等国，其中乌孙最大，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军队十八万八千人，过着随畜逐水草的生活。

公元前二世纪，匈奴征服了西域，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槊之问，向西域各国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并以此为

据点，向西汉进攻。先是，原居敦煌、祁连之间的“行国”大月氏，有户十万，口四十万，控弦十余万人，故对匈奴未加重视。后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冒顿死后，其子稽粥立，是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⑤，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成为“世仇”。大月氏人远遁，过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建都妫水（今阿姆河），以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⑥。汉武帝闻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乃募人出使大月氏，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皇帝的侍从）应募，使月氏”⑦。

建元三年（前138），张骞与堂邑氏、胡奴甘父等百余人，从陇西出发，西行途中，为匈奴俘获，匈奴单于谓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因拘留张骞十余年，“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⑧。张骞羁留匈奴日久，监守稍宽，一日，张骞乘间与其属取道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经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一路上跋山涉水，艰苦备尝，有时一连几日无食可进，赖堂邑父“射禽兽给食”。因此，从匈奴西部至大宛，共走了数十日。大宛早闻汉古代风景画鉴赏朝强大富饶，“欲通不得”，见到张骞，喜出望外，问其意欲何往?张骞说：“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返汉，汉之赂遗（馈赠之意）王财物不可胜言。”⑨大宛王乃派遣向导引张骞等人至康居（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又由康居到了大夏，找到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占有大夏的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⑩。张骞在大月氏居留一年多，不得要领，乃取道羌中归国，不料中途又被匈奴俘获，拘禁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张骞乘匈奴军臣单于死，国内发生内乱，乃与胡妻及堂邑父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奉使出行时，率领百余人，此时仅二人得还。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情况，武帝很是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张骞此次西行虽未完成原定任务，但却在中西交通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第二次出使奠定了基础。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内地和西域即有所往来，清代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七《西域土地内属略》载，唐虞三代西域和内地

即有交往。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西域的记载和传说，《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及风土物产均有较多记载。但作为官方正式使节，张骞及其随从却是第一次开通西域，开辟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获得了大量关于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的资料，因此班固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古代人物画像张骞回到汉朝的前一年（前127），匈奴再度进攻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和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遣将军卫青、李息率汉军由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然后向西迂回，直插陇西，于黄河南岸打败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主父偃的献计，于此设置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杭锦旗北），并招募十余万人修筑城池，屯田积谷，以加强河南地的防御。但匈奴仍然不断向汉朝发动进攻。元朔六年（前123），张骞以校尉军职，随卫青再次出击匈奴，由于他对匈奴情况比较熟悉，“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汉武帝因张骞屡建军功，又曾出使西域，乃封张骞为“博望侯”。

汉武帝听张骞报告说“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又闻骞言“身毒国（今印度）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古代文人四道并出，求身毒国，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至大夏的交通线，但未能成功。元狩二年（前121），为了打通通往西域道路，汉武帝组织了对匈奴的第二次大战役，张骞以卫尉（掌管宫门警卫的高级军官）军职与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郡治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以策应骠骑将军霍去病主攻的部队。张骞、李广一路虽然战斗失利，然而霍去病却大胆深入，向西挺进二千里，歼灭匈奴兵数万人，直逼祁连山下。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汉，西汉政府取得河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保护西域交通。元狩四年（前119），汉政府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击匈奴的战役。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人，步兵数十万人，分出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长驱直人，挺进至今蒙古大沙漠以北，、大败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匈奴远遁，势力日渐衰落，汉朝与西域间的交通基本上得到畅通。

为了“断匈奴右臂”，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张骞建议汉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乌孙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行国”。原居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后被大月氏人打败，被迫归服匈奴，大月氏遂占有其地。后来，大月氏为匈奴所破，两迁至伊犁河流域；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又将大月氏人逐出伊黎河流域，于其地重建家园。武帝时乌孙强盛，“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因此，汉武帝对于张骞的建议很是赞同，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负责统领皇帝侍卫的高级官吏），再次派他出使西域。张骞率领随从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帛钜万。此外，还有一些“持节”副使，偕张骞同行，以便沿途派往各地。

张骞等人至乌孙，正值乌孙发生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争，几乎使乌孙一分为三。张骞见乌孙昆莫（王号）猎骄靡，转达汉武帝旨意说：“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离汉朝，又不知汉国力强弱，加以长期依附匈奴，大臣皆不欲东徙。此时，猎骄靡已经年迈，对于国事不能专断，因此，对于联汉灭胡之事，未能做出决定。张骞无奈，即分遣副使至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身毒等地，自己决定回朝复命。乌孙特遣使者数十人，携带良马数十匹及译员、向导等，随张骞一道赴汉朝报谢，并借以了解汉朝情况。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到汉朝，汉武帝嘉奖他的出使功绩，拜为大行（即大行令，是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列于九卿。乌孙使者，来到长安，见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家富强，回国后向乌孙王做了报告，“其国后乃益重汉”⑥。明年，张骞去世。其后年余，张骞派往大夏等地的副使，分别偕同对方报聘使者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频繁，贸易大盛，汉朝派往西域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所谓“驰命走马日，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即是此种情况的写照。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中西交通史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注释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南道十国：楼兰、且末、女若蜡羌、小宛、精绝、才于弥、戎卢、渠勒、于阗、莎车。

③北道十二国：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焉耆、尉黎、危须、渠黎、山国、狐胡。

④葱岭十国：皮山、西夜子合、鸟托、蒲黎、依耐、无雷、难兜、桃槐、捐毒、休循。

⑤⑥《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⑦⑧《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⑨⑩《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论》。

第十五章

广开三边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古代风景画鉴赏盛时期，不但政令统一，经济繁荣，而且在奠定我国疆域的事业中，也创造了空前辉煌的纪录。

东南沿海一带，是东汉时期百越之族的聚居地。其中居住在现在浙江省南部的越人，汉代称作“东瓯”；居住在现在福建省境内的称作“闽越”；居住在两广地区的称作“南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百越之地设置会稽、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南海（治今广东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进行统治。当时百越之族，在秦朝地方政府统治之下，输纳租税；或退入山岳地带，继续与秦朝政府对抗。秦末，中原大乱，百越之族群起叛乱。当陈涉起事时，今浙江、福建一带的越族，在其君长无诸和摇的领导下，参加了刘邦反秦的战争。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市）。其后惠帝三三年，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曾参加吴王濞之叛，后其王为汉政府所收买，诱杀吴王濞于丹徒。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怂恿闽越攻打东瓯。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兵浮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瓯为避免再受攻击，请求内迁，汉朝将其一部分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南越，秦时已置郡，秦末变乱时，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奉命代理南海尉事，他乘机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派陆贾通使南越，赵佗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汉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因汉对南越实行铁器封锁，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脱离汉朝，并发兵进攻长沙王国边邑，大败汉兵。文帝即位后，派人整修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和汉恢复原来的关系。景帝时，赵佗遣使朝请，表示臣服，但在国中仍用帝号。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出兵攻打南越，武帝派王恢、韩安国发兵往援。汉兵未至，闽越王弟余善杀闽越王郢归汉。武帝立前闽

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立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余善又反汉自立为武帝，进攻豫章郡，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繇王等共杀余善请降。武帝认为闽，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当地越人迁徙到江淮地区。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与汉人相融合。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鼎四年（前113），南越王赵兴和榜（音流）太后愿意内属，请求汉朝撤除边境关塞，要求同内地诸侯同样对待。武帝允准，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吏印绶，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署置，取消南越沿用的古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七十多人都身居要职，实权超过王室，因此，不甘心放弃半独立地位，他代表越人贵族势力阻止赵兴内属无效，于是在元鼎五年夏起兵反叛，杀死南越王赵兴、樛太后以及汉朝使者，另立建德为王。汉武帝闻讯，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领十万大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今广州市）。吕嘉等兵败逃走，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追兵俘斩，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封许多南越贵族为列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由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汉朝时候，对居住在我国西南山麓地带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巂（音西）、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音斯）、筰都，成都以北有冉（音忙）。甘肃南部的自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西南夷各族的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习惯于梳椎发，从事农耕，有邑聚和“君长”；巂、昆明等族习俗编发，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无“君长”。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

西汉初年，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经常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僰僮（僰族奴隶，僰音博）及金、银、铜、象牙等。巴蜀的铁器、枸（音举）酱和其他商品也运人西南夷地区。建元六年（前135），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

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而上书向武帝建言：“南越王黄屋左纛（皇帝车辇及装饰），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群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①武帝允其所请，派唐蒙率兵千人，辎重队伍万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前去招降夜郎。夜郎侯多同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汉在其地置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焚道直通夜郎群柯江（今北盘江）的山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抚邛都、（榨都、冉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的厚赐，愿意归附。汉在其地置一都尉，设十余县，隶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省）。后来因接受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建议，欲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汉廷一度放弃经营西南夷。

古代山水画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元狩元年（前122），张骞自大夏归国，向武帝报告上述情况，建议重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遣使者自巴蜀四出寻找通身毒的道路。汉使到达滇国，由于昆明、嶲等族贪图财利，杀害汉使，抢掠财物，阻闭通路，汉使寻求身毒道路之目的未能达到。滇王曾同汉使谈话，问汉使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侯也曾有过同样故事，“夜郎自大”的典故，即本于此。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在其地置群柯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初倚南越，及汉灭南越，遂归降汉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乃以邛都为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以榨都为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以冉胧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以白马为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攻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同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均归人西汉版图，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古代风景画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族，汉代称之为“东，胡”。乌桓活动于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

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②。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黑色糜子）。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中“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③，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每年被迫缴纳牛马羊皮。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左部后，乌桓被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统辖。

鲜卑最初与乌桓同为东胡部落，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亦向西南推进，居住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与乌桓为邻，也受匈奴族的奴役。

西汉时期，东夷之族也分化为许多部族或种族。其分布于今日沈阳以北者曰夫余，分布于鸭绿江北岸者曰高句骊，分布于朝鲜半岛之东者曰貉（音汇莫），之西者曰朝鲜。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乱而徙往辽东者数万口。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发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坝水（今朝鲜清川江），居秦故空地上下鄣（云鄣、属乐浪郡），稍役属真番（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工之，都王险（今朝鲜平壤）”④。卫满在朝鲜建立了政权，当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汉辽东太守和卫满相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⑤。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元朔元年（前128），貉君主南问率其部属二十八万人归服汉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后来卫满传位于其孙右渠，右渠大量招诱逃亡汉人，又不入觐汉朝皇帝，并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元封三年（前109），汉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晓谕右渠遵守前约，右渠终不肯奉诏。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两路讨伐右渠。次年，朝鲜贵族大臣参等使人杀右渠来降。武帝封参等为列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菟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高句骊，今辽宁新宾西）、临屯郡（治东曰随，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此，其后在局部地区曾有所收缩。如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并入了相邻的蜀郡。但总的来说，从武帝以后，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汉武帝时期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开发，为以后中国的广袤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注释①《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②③《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

③⑤《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苏武出使不辱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在北之战中，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古代风景图鉴赏去病击败匈奴以后，匈奴的势力逐渐衰落，但还具有一定战斗力量。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一面持续战争，一面相互遣使往来，表面上为寻求友好，实则窥探对方虚实，因此，扣留对方和杀戮来使之事，时有发生。匈奴曾拘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十余名。太初四年（前101），匈奴呴犁湖单于死，其弟且鞮（júdī驹低）侯立为单于，汉武帝欲借征大宛之威胁迫匈奴，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时，齐襄公之九世祖为纪侯所谮而烹杀于周，鲁庄公四年，齐襄公灭纪），《春秋》大（敬）之。”①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怨望之意）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辈也）也。”②因而派使臣去长安修好，并将以前扣留在匈奴的路充国等十几名西汉使者释放回国。为回报匈奴，答其善意，天汉元年（前100），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作为使臣，携带厚礼，送还匈奴被拘留在汉使者。

苏武（前-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市南）人。为人廉洁正直，而且有胆量，有骨气。苏武奉命后，乃偕同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带领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一路晓行夜宿，历尽艰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匈奴单于王廷。苏武献上汉天子所赐厚礼，匈奴单于非但未表谢意，反而露出骄矜之色，使苏武等汉使大失所望。

苏武办完使事，准备启程回国，正在此时，不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

事情：在苏武出使匈奴期间，匈奴贵族缑王与降将卫律部下虞常等七十余人，阴谋劫掠单于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素与张胜相知，暗中将此事告知了张胜，并准备杀死卫律，为汉朝立功，张胜亦表赞同。其后月余，一日，单于外出射猎，虞常与七十余人欲发，在举事前夕，其中一人出首告密，单于子弟发兵进攻虞常等人，缑王等人皆战死，虞常被执获。单于射猎归来，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乃使卫律查办此事。张胜恐虞常供出自己，只得将前情告知苏武。苏武闻之，惊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被侵犯而死），重负国。"③欲引刀自裁，张胜和常惠连忙上前制止。虞常在卫律的严刑拷问下，果然供出了与张胜密谋情况。单于在盛怒之下，召集匈奴贵族商议，欲尽诛杀汉朝使者。单于身边一名大臣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因谋杀卫律而杀汉使，未免处罚太重，如果谋杀单于，又当治以何罪?不如趁此机会胁迫汉使归降匈奴。单于命卫律召苏武前来听审。苏武对张胜、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④当即拔出佩刀自刺，卫律见状大惊，急上前抱持，并立即命人召医急救。苏武气绝，半日复苏。常惠等痛哭不已，将苏武抬回营帐。汉武帝张胜被匈奴拘禁。且鞮侯单于得知审讯情况，对于苏武忠于汉朝的气节，十分敬重，朝夕遣人问候苏武病状，并暗中晓谕卫律设法使苏武归降。

当苏武伤势渐愈时，单于使人通知苏武、张胜同去观审虞常，欲因此迫使苏武归降。卫律当场将虞常斩首，然后威胁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卫律自称），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⑤举剑向张胜砍来，张胜慌忙跪地请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有罪，当相坐（连带治罪）。"苏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卫律又举剑向苏武作砍杀状，苏武神色自若，安然不动。卫律急忙收剑入鞘，无耻地向苏武夸耀其投降匈奴后所获荣华富贵，妄图以此来动摇苏武的忠节，苏武置之不理。卫律又改颜施加压力说："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苏武听后，大怒骂道；"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对匈奴的贬称），何以汝为见（清人王念孙以为此句当作"何以见汝为"，意为见你干什么）!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使汉天子与匈奴单于互相争斗），观祸败!……若知我不降明（言汝明白地知道我不会投降），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⑥苏武义正词严地一番答话，使卫律明白苏武

终不可屈致，乃如实地向匈奴单于作了报告。单于听说苏武如此忠义，心中十分敬重，益欲使其归降。乃命人将苏武囚禁于大窖中，不予饮食，以为如此可以使苏武归降。适值天降大雪，苏武在冻饿之下，只好以雪团和着毡毛一起吞食，竟数日不死。匈奴单于惊奇，以为有神明暗助苏武。于是乃将苏武迁至白雪皑皑、杳无人烟的北海（匈奴北界，即今贝加尔湖）上，使牧羝羊（公羊）。临行时，单于对苏武说，待公羊产生子羊，苏武才能回国。同时将苏武的属员常惠等人，分别置其他处所，不得与苏武相见。

苏武来到荒凉的沙漠苦海，得不到匈奴供给的粮食，只好掘取野鼠，储藏的草籽用以充饥。他每日拄着“汉节”（汉武帝差他出使匈奴的符节）牧羊，不论朝夕从不离手，因此时间一长，节旄（节上的牦牛尾毛）脱落净尽。时光荏苒，春去秋来，苏武已度过五六个寒暑，苏武怀念祖国的心情并未削减。一日，苏武正在牧羊，忽听远处传来马蹄声，苏武正在惊疑间，一个匈奴贵族打扮的官员来到面前，苏武定睛一看，原来是汉朝的骑都尉（骑兵统带官）李陵。李陵，字少卿，汉名将李广之孙。在汉朝时，与苏武俱为侍中，且系好友。苏武出使匈奴之明年，汉武帝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兵五千，与匈奴交战，战败投降匈奴。李陵虽知苏武被困在匈奴，却无面目去见故友。过了很久，单于知李陵与苏武相善，乃命令李陵去北海劝苏武归降。

李陵来到北海上，为苏武置酒设乐。叙说朋友交谊后，向苏武说明单于使其前来劝说归顺之事。李陵首先告知苏武家庭的不幸遭遇：老母已死，兄弟皆坐事自杀，苏武妻子年少，闻已改嫁，女弟、儿女，十余年来，存亡不可知；接着自叙始降匈奴时忽忽如狂的内疚心情，表示对古代风景画苏武此时的心境很是理解，然后又联系到汉武帝对大臣的残酷寡恩说：“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⑦为如此皇帝自苦如此，实不值得，不如归顺匈奴。苏武爽直地向李陵剖明心迹说：“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提拔之意）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近臣之意），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⑧李陵与苏武盘桓数日，终不能动其心，李陵见其至诚，惭愧地与苏武挥泪告别。李陵使其妻子赠给苏武牛羊数十头，以改善其日常生活。

后元二年（前87），李陵又至北海上，将汉武帝去世的消息告知了苏武。苏武听后，南向号哭，悲痛异常。明年，昭帝（武帝之子）即位，是时，匈奴且鞮侯单于早已死去。昭帝始元二年（前85），匈奴壶衍鞮单于即位。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渴望和平。同时，匈奴新单于初立，国内乖离，贵族争夺，常恐汉军来袭，乃采纳卫律之谋，与汉朝恢复和亲和正常往来。昭帝始元六年（前81），汉与匈奴议和，要求匈奴把苏武、马宏（前使西域为匈奴所获，亦不肯降）等人放还，竟遭到匈奴的拒绝。匈奴诡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汉朝被囚禁在匈奴的使者常惠买通守者，得夜见汉使，将苏武的真实情况告诉汉使，并教给汉使营救苏武的计策。

翌日，汉使面见壶衍鞮单于，对单于说：一日，汉朝皇帝在上林苑（汉朝宫苑，在今陕西西安市西）中射猎，射中一只大雁。大雁足上系有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正在北海牧羊。汉使以此责问单于，为何向汉朝隐瞒苏武的真相?单于听后，异常惊慌，环视左右大臣，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单于无奈，只得如实地对汉使说："武等实在。"为了避免再引起汉匈战争，答应释放苏武回国。汉使向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表示祝贺。李陵闻知，亦为苏武置酒祝贺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⑨然后又向苏武倾诉了自己兵败降胡后，仍时刻不忘报效汉朝的心情，由于汉武帝族诛其家，为世大辱，他才断绝回汉念头，成为异域之人。因起舞与苏武作别，歌曰："径（穿过之意）万里兮度沙幕，为君（指汉武帝）将兮奋匈奴（与匈奴作战）。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同颓，丧失）。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⑩李陵歌罢，流着眼泪，与苏武诀别。始元六年（前81）春，苏武率领以前留居匈奴的汉朝官员九人，一同回到汉朝首都长安。苏武出使时，正当壮年，回国时，已经须发尽白。汉昭帝为了表彰苏武出使的功绩，拜他为典属国（负责少数民族及属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三人皆拜为中郎（官员，掌宿卫侍值，属郎中令）。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各赐钱十万，免除终身徭役，使归家养老。宣帝（前73—前49）时，封苏武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以苏武为节操素著老臣，令苏武只在朔望朝见天子，号称"祭酒"，优崇甚厚。苏武每次获得皇帝的赏赐，皆分赐与昆弟、故人，家无余财。当时的王公大

臣如许广汉（宣帝皇后之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等，皆十分敬重苏武。苏武在匈奴生的儿子苏通国被接回汉朝，任为郎官。

宣帝神爵二年（前60），苏武病故，享年八十多岁。甘露三年（前51），匈奴单于来汉朝见，汉宣帝思念功臣，命画工绘十一大臣之像于麒麟阁（在未央宫中），以表彰其功德，苏武即为其中之一。苏武的崇高民族气节，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和敬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他那首气贯长虹的《正气歌》中提出历史上许多气节高尚的英雄人物，其中“在汉苏武节”之句，即为赞扬苏武坚贞不屈的名句。

注释①《资治通鉴》卷二一，汉武帝太初四年。

②《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

司马迁撰《史记》

西汉时期，我国史学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学术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借鉴前代统治经验，迫切要求编写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变”①。于是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前145—前86）②，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人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编写国史、研究天文历

法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决心编写一部通史，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写出部分篇章。但愿望未及实现即故去。临终前嘱咐儿子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③。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为继承父亲遗志而作。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家庭，得到父亲培养，十岁已读大量的今文书籍，并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篆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后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二十岁时，他怀着远大抱负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游历东南名山大川。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十征，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闽、广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实地调查，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38岁（前108）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官职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④。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同时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功绩显著，投降实属无奈，从他平素为人及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时机报答皇恩。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触怒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有意诋毁与他同时出征的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便将司马迁下狱，又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腐刑（即宫刑）。他认为受此刑是奇耻大辱，他在给友人任安信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后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⑤他虽万分痛苦，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党非常之人”在逆境中发愤的先例，决心活下来，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中书令，更加奋发地写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岁时，终于完成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社会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不久这位史坛上的启明星便溘然长逝。这部遗著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把几千年间零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⑥，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史记》叙述上下三千年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本书的总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及其子孙世袭（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列传”主要记载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之为“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之为“合传”（如《廉颇与蔺相如列传》）；把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之为“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

“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是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则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如《平准书》系统地叙述了汉代社会经济情况；《河渠书》叙述了历代水利情况；《历书》、《天官书》叙述了当时的历法和天文学的概况。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

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⑦。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⑧，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雪后景像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⑨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

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记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古代风景画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画才能。他的刻画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说。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如认为秦古代人物图鉴赏的统一是“天所助焉”⑩，刘邦是“受命而帝”，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马固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

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

注释①《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

②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代说法不一。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郭沫若认为生于公元前135年，卒于公元前93年（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今从王说。

③④《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⑤《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⑥《史记》第一三○《太史公自序》。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⑧《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⑩《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第十六章

巫蛊之祸巫蛊①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一起宫廷内部斗争。

征和元年（前92）夏，汉武帝居建章宫休养，恍惚间见一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宫门名），疑其图谋不轨，命人收捕。男子在惊恐中弃剑逃去，追之不及，武帝怒斩门守。冬十一月，紧闭长安城门，发动三辅骑士大肆搜索上林苑周围数百里凡十一日。巫蛊事件于此爆发。

丞相公孙贺之夫人君孺为卫皇后（武帝皇后）子夫之姊，因此有宠于武帝。公孙贺子敬声依仗权势，骄奢淫逸，不顾朝廷法纪，竟擅自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发后，被拘捕入狱。恰在此时，武帝下诏急捕阳陵（今陕西咸阳县）大侠朱安世归案，公孙贺乃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武帝许之。后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捕获，投之狱中。朱安世从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并在武帝赴甘泉宫途中，使巫者于当道埋偶人，以恶言诅咒武帝。武帝下令将公孙贺父子逮捕下狱，考验属实；公孙贺父子被处死，族诛全家。武帝乃以中山靖王子刘屈氂（máo）为丞相。征和二年（前91）闰四月，诸邑公主（卫皇后之女）、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因巫蛊事件被牵连处死。

先是，武帝年二十九，卫皇后生戾太子，甚是钟爱。及长，武帝以太子“性仁恕温谨，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②；同时，所宠幸王夫人、古代风景画李夫人和李姬又各生一子，因此卫皇后及戾太子恩宠渐衰，常有不自安之意。武帝对卫后弟大将军卫青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③卫青顿首叩谢。武帝每次出外巡幸，常以国家大事付托太子。武帝任用酷吏，用法严刻，太子宽厚，多所平反，“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④。元封五年（前106），卫青去世，朝中邪臣以太子无复外家以为凭依，竟欲构陷太子。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长安，率皆以邪道欺骗群众，使用变幻多

端的手法，以达到一己私欲。有些女巫往来宫中，教唆后宫美人于房中埋木偶人祭祀，可以免除灾祸。美人由于妒忌怨恨，彼此间互相告讦对方用木偶诅咒皇帝无道。武帝大怒，下令诛杀后宫美人并连及大臣凡数百人。武帝心怀疑忌，尝昼寝，梦见数千木偶人持杖向其打来，惊醒后，身体感到不爽，精神恍惚，神疲健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皇后有隙，见武帝年老多病，恐一旦死去，太子即位，将不利于己，因而萌发奸谋，言武帝病源在于巫蛊。于是武帝即以江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先是，江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逃至京师，告发太子丹阴事，太子丹因被废黜。武帝召见江充，见其容貌魁梧，衣著洁丽，与其议论政事，又多称意，因此大悦，拜为直指绣衣使者⑤，使其督察贵戚及近臣违反法纪者。江充受任后，检举揭发，无所回避，武帝以其任事忠直，大加信用。江充曾随从武帝巡幸甘泉宫，遇太子家使者乘车马行于驰道（天《子驰走车马之御路）中，江充将人及车马扣留交吏议处。太子闻知后，古代风景画鉴赏使人向江充请求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指武帝）闻之，以教敕无素者（言平素对左右人不加管束）。"⑥江充置之不理，仍将此事上奏武帝。武帝称赞说："人臣当如是矣。"自此更加信用江充，擢为水衡都尉（官名，掌上林苑兼保管皇室财物及铸钱），威震京师。

江充率领胡巫掘地求偶人，拘捕夜祠及视鬼之人，同时派遣巫者污染地上，以为祭祠之处，用来诬陷无辜吏民，然后收捕审讯，使用烧铁钳灼等酷刑，强令服罪。于是庶民被迫互相以巫蛊攀扯，官吏则劾以大逆无道之罪。当时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因巫蛊罪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莫敢讼其冤者。江充察知武帝怀疑左右皆有巫蛊祝诅嫌疑，乃假借胡巫檀何之言谓武帝说："官有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愈也）。"⑦于是武帝乃使江充入宫禁中，毁坏御座，掘地求蛊；并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办理此事。江充先后命人至后宫希幸夫人、皇后、太子宫中。掘地纵横，以致太子、皇后无复施床之地。江充为诬陷太子，先使胡巫作桐木人埋太子宫中，及掘出后说："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⑧太子闻知大惧，问计于少傅石德，石德亦惧受牵连而被诛杀，因对太子说："前丞相父子（指公孙贺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假托天子诏命）收捕充等系狱，穷

治其奸诈。”⑨太子犹豫不决，将往甘泉谢罪。江充紧逼不舍，必欲置太子于死地而后已。太子无奈，只得按照石德策划实行。秋七月，太子令其宾客诈称皇帝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使者”击杀韩说。太子亲临监斩江充，骂曰：“赵虏（江充，赵人）!前乱乃国王父子（充前告赵太子丹阴事，因使太子见废）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⑩并命人将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

太子命舍人无且持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通过长御（皇后近侍）倚华将捕斩江充事报告给卫皇后，并请调拨宫中厩车以载射士，动用武帝兵器，发给长乐宫卫兵。于是长安城中秩序混乱，或言太子谋反。黄门苏文从宫中逃出，直奔甘泉，向武帝报告太子谋反。武帝认为太子所以有此行动，乃是由于巫蛊之事心怀恐惧，又愤恨江充等人。乃派遣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见太子，回来向武帝谎称“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武帝听后大怒，丞相刘屈氂闻变，弃其印绶，拔身而逃，派丞相长史乘急传驿马报告武帝。武帝怒，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古代风景画赏罚。以牛马为橹（盾牌），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太子宣言告令百官说：“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武帝车驾从甘泉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下诏调发三辅兵马，中央二千石以下官员，皆由丞相统一指挥。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免长安京师诸官府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别统领，同时派长安囚徒如侯持节调发长水、宣曲胡骑，皆整装来会，侍郎马通追捕如侯，告胡人说：“节有诈，勿听也!”因斩杀如侯。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授与节符，令其发兵，任安拜受后，闭门不出。太子只得引兵而去，纠集长安市民数万人，至长乐宫西阙下，正与刘屈氂统率的军队相遇，双方交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城沟中。当时，民间皆传说“太子反”，因此士兵不附太子，转向丞相一方。太子兵败，从南城门逃出。刘屈氂欲斩城门守卫司直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谏阻说：“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刘屈麓遂释放田仁。武帝闻知大怒，下令责问暴胜之，胜之恐惧自杀。武帝又诏令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以天子策书收皇后玺绶，皇后自杀。武帝因任安为官多年，老于事故，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下令与田仁并处腰斩。平日出入太子宫门之宾客，皆被株连处死；追随太子发兵者，则以谋反罪灭族。吏士被胁迫者，一律

徙敦煌郡。在武帝盛怒下，群臣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通鉴考异》引《汉武帝故事》作郑茂）上书武帝为太子辩冤说：“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江充），恐惧捕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请求武帝“极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武帝览书后，有所感悟，然而并未立即下诏赦太子之罪。太子出亡，东至湖县（今河南阕乡东），隐藏在泉鸠里一民户家中，主人家贫，常靠卖屦所得以供太子。太子在湖城有一富友，命人前往传呼，因被发觉。是年八月，地方官吏围捕太子。太子自料不能脱逃，遂入室自缢而死。

征和三年（前90）九月，吏民以巫蛊互相告发者，经过查验多与事实不符，武帝亦颇知太子为江充所迫，恐惧无以自明，并无谋反之意。此时，适值高寝郎（高庙卫寝之郎）田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武帝大为感悟，于是召见田千秋，立拜千秋为大鸿胪（九卿之一），同时下令族灭江充家，焚烧黄门苏文于渭桥上。武帝哀怜太子无辜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城。

注释①巫蛊——即以巫术害人之意。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⑤官名，亦称绣衣直指。汉武帝末年为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而设。使者为皇帝特派，着绣衣，可持节发兵，并有权诛杀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三年。

⑦⑧⑨⑩《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三年。

霍光废立后元二年（前87）二月，汉武帝于五柞宫病笃，大臣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封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石单（匈奴休屠王子，人汉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为车骑将

军、太仆，古代风景画鉴赏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武帝死，皇太子弗陵嗣位，年八岁，是为孝昭皇帝。霍光、金日石单、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辅政。

先是，武帝欲立少子弗陵为太子，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独居骄蹇，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使黄万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奉车都尉霍光。后数日，武帝令人引持弗陵母钩弋夫人送掖庭狱，赐死。

霍光受诏后，朝中政令，悉由所出，天下人莫不想望其风采，一时间权倾朝野。然光为人沉静详审，资性端正，为朝廷内外所敬重。昭帝始元二年（前85）春，霍光被封为博陆（今河北蠡县南）侯。有人建言霍光："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一反诸吕排斥刘氏宗室专权而亡的做法），如是则可以免患。"①霍光采纳建言者之议，乃于宗室中留意选择可委以重任者，遂拜楚元王孙辟疆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疆并为长乐官卫尉（汉九卿之一）。元风元年（前80）冬十月，霍光以前朝旧臣尚书令张安世（故御史大夫张汤之子）志行纯笃，乃启奏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作为自己的副贰。又以杜延年揭发燕王（昭帝兄）、盖长公主、上官桀父子、桑弘羊谋反，有忠节，擢为太仆（九卿之一），右曹给事中（加官，掌顾问应对，得出入宫中）。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得收宽严相济之效。自平燕王叛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②。

元平元年（前74）夏四月，昭帝死，无嗣。当时武帝之子只有广陵王刘胥尚存，霍光与大臣商议立嗣问题，群臣均主张立广陵王。但广陵王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霍光内不自安。适有郎官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太伯之弟），文王舍伯邑考（文王长子）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③郎言正合霍光之意，于是霍光以郎所上书交丞相杨敞等传阅，当日奏请皇太后，诏遣行（代行）在鸿胪（汉九卿之一）事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迎接昌邑王刘贺武帝子昌邑哀王髆（bó博）之子，乘七乘传，来到长安官邸。

原来昌邑王刘贺，也是一个狂纵无节的王子，武帝丧时，刘贺仍游

猎不止。王国属官王吉、龚遂等均曾切谏，刘贺或置若罔闻，或当时接受，其后复放纵自若。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但刘贺于翌日中午始启程，于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急行至定陶，行程一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中尉王吉奏书戒之曰："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谓兴举众事）!大将军（指霍光）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无以加也。……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南面而已。"④昌邑王一路不忘游乐，车驾行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派人求长鸣鸡（自南诏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以为玩好。过弘农时，遣大奴名善者用衣车（有遮蔽的车）载女子。至湖（即湖县，在今河南灵宝西北），长安使者见此情景，召昌邑王国相安乐进行责备，安乐将此事告知龚遂，龚遂入见昌邑王，问有无其事，昌邑王谎称"无有"。龚遂说："即无有，何爱一善（即大奴名善者）以毁行义，请收属吏（将大奴拘捕付吏审问），以湔洒大王!"⑤于是揪住大奴善交给卫士长依法惩办。

刘贺来到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大鸿胪郊迎，侍从奉上乘舆（皇帝坐的车驾）。昌邑王命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为参乘（亦作骖乘，即陪乘）。车驾将至长安未央宫东阙（宫门），龚遂对刘贺说："昌邑吊哭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向阙西面伏哭，尽哀止。"⑥刘贺按照龚遂的嘱咐尽哭如仪。六月，昌邑王接受皇帝玺绶，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昌邑王立为天子后，淫戏无度。原昌邑官属皆被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昌邑国相安乐迁升长安宫卫尉（汉九卿之一）。龚遂见此情景，甚为忧虑，乃流涕对安乐说："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⑦龚遂和太仆丞张敞均以"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为非，劝其"诡（反也）祸为福，皆放逐之"⑧!刘贺不听。霍光闻知昌邑王"所为孛（违背也）道"，心中忧懑，私下向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问计。田延年提出要霍光建自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援引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故事作为根据。霍光乃古代人物像荐举延年为给事中（将军、列侯、九卿以至黄门郎、谒者等的加官。均给事殿中，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对策。计议已定，霍光使延年先报知丞相杨敞，杨敞惊惧，不知所应，在夫人启示

下，乃许诺延年："请奉大将军教令!"霍光遂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于未央宫举行会议。霍光首先对诸大臣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田延年乃离席按剑，对群臣说："先帝属将军（指霍光）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宜速决）。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群臣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⑨霍光率群臣朝见太后，详奏昌邑王不可继承皇位情景。皇太后乃驱车来到未央宫承明殿，诏令宫廷卫士不许昌邑王的臣下入内。昌邑王朝见太后回至所属之温室殿后，殿门即闭。霍光命令侍卫将昌邑王群臣全部驱赶至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骑收捕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奉诏拘禁犯人的监狱）议处。有顷，太后有诏召昌邑王，此时昌邑王始感事态严重，心怀恐惧。太后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武士数百人皆手持兵器陈列殿下，群臣按官品大小依次上殿，然后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尚书令宣读霍光与诸大臣连名给皇太后的上奏，具言昌邑王于汉昭帝死后，典丧不按礼仪，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掠抢民女，与昭帝宫人淫乱。滥赐昌邑王旧属官爵印绶，受玺二十七日，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宗庙重于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⑩!皇太后诏曰："可。"霍光令昌邑王起，拜受诏，然后解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霍光与群臣将昌邑王送至官邸。不久，太后又采纳群臣奏言，诏命刘贺回到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赐汤沐邑二千户，国除。昌邑群臣"坐无辅导之谊，陷王于恶"被诛杀者二百余人。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及昌邑王师王式以忠直多次进谏，得减死，髡为城旦。

皇帝是封建国家的象征，昌邑既废，立谁为君?此为当时汉朝廷之大事。霍光与张安世等诸大臣议论此事，未能作出决定。大将军长史、光禄大夫给事中丙吉上书霍光曰："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宫中旁舍，妃嫔所住之处）、外家（病已先在外家史氏）者，吉前使居郡邸（即郡邸狱，巫蛊事起，病已始生数月，亦被收系于此，武帝征召丙吉治巫蛊郡邸狱）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义……决定大策!"秋七月，霍光召集丞相以下百官议

定所立，决定上奏皇太后请立病已为帝，皇太后诏曰：“可。”霍光遣宗正、太仆以轻车奉迎病已入未央宫，见太后，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是为中宗孝宣皇帝。十一月，立许婕好为皇后。

宣帝本始元年（前73）春，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益封大将军霍光万七千户，与前所食凡二万户。车骑将军张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赐爵关内侯者八人。霍光曾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诸事皆先报告霍光，然后上奏。自昭帝时，霍光家族即权倾中外，声势煊赫，霍光兄弟、子婿、外孙皆身居要职，党亲连体。及昌邑王废，光权益重。

本始三年（前71）春正月，许皇后死。先是霍光夫人霍显欲使其小女成君立为皇后，无由得进。会许后将娩，病，霍显因串通宫中女医淳于衍，令其于许皇后分娩后，投毒药中，许后饮药而死。事后吏捕诸医，劾淳于衍侍疾无状，收系诏狱。霍显惟恐阴谋败露，即将事件原委悉告霍光，霍光大惊。会奏疏上，霍光阅后在奏疏上题写“勿论”二字，遂寝其事。本始四年春三月，霍光女成君入宫，立为皇后。

地节二年（前68）春，霍光病重，皇帝亲自临问，霍光上书谢恩，请求将其博陆侯国封邑三千户，封给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列侯。当日，宣帝拜霍光之子霍禹为右将军。三月，霍光死。四月，宣帝又封霍山为东平侯，使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明年，夏四月，立刘奭为皇太子，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霍显闻立许后子为太子，怒不可遏，以至呕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言即使霍女生子），反为王邪?”乃又唆使其女成君令毒杀太子，由于太子保姆监护严密，未能得逞。霍显认为霍光生前功勋卓著，子侄、兄弟、诸婿占据权要，更加骄奢放纵，无所顾忌。

古代人物图宣帝在民间时，即闻知霍氏家族权势尊盛，不知加以节制。后拜魏相为丞相，多次赐宴言事；平恩侯许广汉（宣帝岳丈）、侍中金安上等均得径入宫中奏事；又宣帝为防壅蔽，下令准许吏民得奏封

事（即臣民上书，为防泄密，得以黑囊缄封）。通过以上各种渠道，颇闻霍显毒杀许后之事，但尚未完全证实。为防霍氏放纵不制，危乱国家，乃将霍氏家族及其亲属在兵官者，一一调离原职，以损夺其权。霍禹虽保留大司马官号，但不予印绶，并罢去其右将军领兵实权。霍显及霍禹等见霍氏权势日见削夺，常相对啼泣，互相埋怨。霍山谓霍显曰："我家兄弟诸婿多不谨，又闻民间谨言（众口一声）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霍显惶恐，即具以事实真相告知霍山、霍云、霍禹等。于是以霍禹为首的霍氏家族及其亲党准备先发制人，诛杀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事发，霍云、霍山、范明友（霍光婿）自杀，霍禹腰斩，霍显及诸姊妹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太仆杜延年以霍氏旧人，亦坐免官。八月，皇后霍氏废。霍光宗族，至是诛夷殆尽。

注释①②③《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④⑤⑥⑦⑧《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

⑨⑩《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

《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地节三年。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昭宣中兴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罢轮台屯田"的罪己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①，以示与民更始。武帝死后，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昭帝年幼，一切政事听任霍光处理。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武帝后元二年）前皆勿听治"③。昭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减免百姓田租，免收赈贷种食，诏止民出马，勿斂马口钱

（牲畜税）。元凤四年（前76），昭帝行加冠礼，下令“毋收（元凤）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④。以上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复苏有了可能。昭帝还于始元六年召集郡国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的攻扰。

元平元年（前74），昭帝死，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皇太后迎立在民间的刘询（原名病已）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幼遭巫蛊之变，被关押于郡邸狱中，后养于祖母史氏家，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多有了解，这对其即位后的施政具有直接的影响。

宣帝初即位，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后，宣帝始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亲政伊始，即令群臣得奏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以通下情。

并规定“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敷陈）奏其言，考试功能”⑤。地节四年（前66），因大司马霍禹（霍光之子）与其母霍显等谋反，诛灭霍氏家族，并废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消除了霍氏的势力。

古代人物画宣帝为政，十分重视吏治，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选用，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⑥!凡拜刺史、守、相，宣帝都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辄以玺书勉励，给以褒扬。渤海（郡治浮阳，故城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岁饥，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问“何以治渤海?”遂对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⑦。宣帝许之。龚遂到任，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请持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兵器）者乃为盗贼”⑧。持兵者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农具，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开仓济民，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蓄积，诏狱止息。龚遂人为水衡都尉（总管治水及上林苑）。对于公卿大臣，则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⑨。召信臣由郡太守迁升为少府。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⑩。宣帝不仅重视官吏的选拔，也

很注意以刑名（亦作形名，即循名责实之意）考核臣下。当时，一班地位很高的大臣，如平通侯杨恽、光禄大夫王迁、京兆尹赵广汉、司隶校尉盖饶宽等皆因罪被处死。太子刘爽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宣帝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另一方面，宣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元康二年（前64），下令赦免那些触犯他本人名讳的人。地节三年（前67），因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设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四人，以慎刑狱。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姓名、属县、官爵、邑里，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一些苛法。

宣帝图治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地节元年（前69），诏令假（权借）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又诏“池（陂池）絮（禁苑）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不出算赋及给徭役）”。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本始四年（前70）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赈贷困乏。其令太官（东汉时掌皇帝饮食宴会之官，属少府）捐膳省宰（屠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京师各官署之令丞）上书人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地节四年（前66），郡国多被水灾，皇帝遣使循行郡国，发放赈贷。同时命令各地降低盐价，以减轻百姓负担。诏曰：“盐，民之食，而价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价”。为节省转漕，而利农民，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这些措施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元康年间，由于“比年丰稔，谷石五钱”，创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宣帝在位期间，对于文化学术事业也很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捕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

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神爵元年（前61），汉将赵充国击败先零羌，羌人降者逾万。次年，羌人若零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率四千余人降汉，汉政府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从而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以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图谋。三年，匈奴日逐王率其众降汉，骑都尉郑吉发西域诸国五万人迎之。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不得不废除。甘露二年（前52），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叩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以是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西汉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昭帝、宣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特别是宣帝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史称中兴。

注释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③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⑤《汉书》卷入《宣帝纪》。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汉书》卷九《元帝纪》。

《汉书》卷八《宣帝纪》。

《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五凤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元康四年。

第十七章

盐铁会议盐铁会议是西汉昭帝时中央政府组织的一次有名的讨论国家内外政古代军营策的会议。

汉武帝元封至太初年间，桑弘羊先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农令、大司农，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及酒类专卖等重要财政政策，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盐铁官营等政策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给农民造成烦苦，迫使农民反抗斗争日益频繁。加以连年对外战争，国帑匮乏，边用不足。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面对现实，不得不考虑改变其内外政策。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其所下著名的轮台诏令中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

轮台诏是汉武帝晚年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他的内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并不一致。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死，少子弗陵即位，是为昭帝。遗诏以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与桑弘羊、金日石单、上官桀、田千秋等共同辅政。由于武帝以后，中朝权力多在尚书，加以武帝病危时，嘱托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②。所以武帝死后，“政事一决大将军光”③。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④。为了统一大臣们的思想，保证武帝轮台诏令的贯彻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有功名的儒生）文学（地方上有名气的儒生），询问民间疾苦所在，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双方代表人物，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当局，一方是霍光支持下的民间代表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六十余人⑤。这次会议前后进行了两

次，前一阶段可以说是正式的会议，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主题。后一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时所进行的又一场辩论，可以说是前次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是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两次会议的内容，汉古代风景画鉴赏武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经过“推衍”，“增广”，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全书共分六十篇，各立标题，内容前后连贯，再现了盐铁会议的辩论情况。从《盐铁论》全书看来，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间疾苦的原因问题。文学首先提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⑥又说：“山海者，财用之宝路（重要来源）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生命线）也。……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⑦因此，文学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⑧，将从事盐铁等事业的劳动力都调回到农业上去，认为这是“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之道，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文学所说的“进本”，就是重农，“退末”就是抑商（按此指官营商业），这是他们反对盐铁等官营政策的理论根据。贤良也对盐铁官营进行了非议，一则曰：“县官（朝廷）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务必符合指标），不给（给，通洽；不给，不合之意）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痛快）。是以农夫作剧（劳作繁重），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⑨再则曰：“卒徒工匠，故（从前）民得占租（依法向政府缴纳租税）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利（锋利）而中用（合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用费不省，卒徒烦（烦苦）而力作不尽（不尽力工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⑩除盐铁官营政策外，文学还对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平准政策进行抨击说：“间者（近来）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与百姓讨价还价，从中取利）。……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奸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官府乱发号令），阖门擅市（垄断市场），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各官署自采所需物资），则吏容奸豪（官吏和奸商互相勾结）。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囤积居奇），轻贾（不法商人）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对于国家铸钱，算缗告缗等政策，贤良文学也持指责态度，认为这

些政策的实行将“与人以患”。最后在辩论言行问题时，贤良认为“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放弃盐铁官营政策），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

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定地站在捍卫官营、反对私营的立场，对贤良文学的主张进行了答辩。他对贤良文学所提到官营事业中的一些流弊，并不完全否认，他说：“故扇水（地名，今址不详）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质量优良）’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疆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他认为盐官营政策在执行中的一些流弊，是由于某些不良官吏造的，不能因此即加以否定。他提出盐铁官营政策应当继实行的理由如下：

第一，桑弘羊从封建国家的法权观念出发，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料，为最高封建统澜者所占有，乃为理所当然之事：“家人（即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古代风景画第二，有利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桑弘羊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侵掠）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指中原地区）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俘虏）也，故修障塞（防御据点），饬（整修）烽燧（烽火燧烟），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增加货财收入），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守备）之用，使备塞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第三，有利于国计民生，征外安内。桑弘羊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政府大举反击匈奴入侵的时代。汉武帝用兵数十年之久，每次出兵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军费开支相当巨大，仅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为奖赏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击匈奴大军的有功人员即用去五十万金。而这些费用都需出自官营事业之利人。故桑弘羊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元狩三年（前120）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kuai快，堆积秣草的房舍）以赈贫民”。桑弘羊据以回答文学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

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当作贾万物，意为买卖各种货物）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古代风景画鉴赏第四，有利于摧抑豪强兼并之路，维护国家统一。桑弘羊以为“权利之处，必在深山大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为摧毁地方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桑弘羊主张由国家统一盐铁，禁止人民私铸钱币。他说：“只有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实行官营。乃所以“抑制兼并”，“排富商大贾”，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二、关于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在此问题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持完全相反意见。贤良文学以“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攻击反匈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造成“田地口荒，城廓空墟”。他们指出”苦师劳众”的原因，“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指天于）计过也”。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的抗匈主张说：“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越王勾践破擒吴王夫差），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议，听君之计，吴越王之任种（文种）、蠡（范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疲备）之效，匈奴不为加俛（俛，同俯，加傀，、更加屈服），而百姓黎民以弊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因此，贤良文学认为，“方今为县官计者，莫名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修文德而已”。只有如此，才能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恃（疲劳人民）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

桑弘羊坚决反对贤良文学对匈奴和亲的主张。他总结了西汉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并未能制止匈奴侵扰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馈赠）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改变入侵行为），而暴害滋甚。先帝（指武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坏，故广将帅，招奋击（招募奋勇杀敌的武士），以诛阙罪。功勋粲

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收藏档案之所），何命（何谓）亡十获一乎。”指匈奴“贪侵盗驱（贪得无厌，掠夺人畜），长诈谋（崇尚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对如此一贯背信弃义的敌人，只有通过战争加以制服，“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桑弘羊还指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的民族自卫战争，是“所以匡难避害，以为黎民远虑”的正义战争，并非为了愤斥地开辟疆土。虽然进行反击战，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终于制止了边患，保证了汉朝的安全，“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桑弘羊对抗击匈奴战争的一些论点及埘贤良文学的争辩，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在昭帝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哉后，已然远遁大漠以北，对汉朝的威胁已大大减弱，加以汉朝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倘再坚持出兵彻底降服匈奴，就显得与轮台诏令精神有些不合。

古代风景画三、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理论思想问题。贤良文学信奉儒家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用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他们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说：“二世信赵高之计，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欺压）民重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期（约定）俱起方面而攻秦，闻不一期（不到一年）而社稷为墟。乌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⑦因此得出结论说：“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贤良文学还认为，严刑峻法，酷吏政治，只能增加犯法人数，造成社会动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深或浅，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加以“当今所谓良吏者……文诛假法（深文罗致，假借法令），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更加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最后他们向桑弘羊提出警告说：“严刑峻法，不可久也。”

宫殿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相反，他祖述法家，崇尚法治。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因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也应有所不同。他主张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所谓“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刓弊（刓音完，刓弊，谓百姓贫弊，为巧诈以避法也。）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是不会收到实效的。他认为法乃至高无上之原理，有法则治，无法则乱。“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他的助手御史们也补充说：“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并举“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作为论证。

桑弘羊不但主张以法治民，而又特别强调严刑峻法。他举商鞅为例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饰政教，奸伪无所容，”“商君刑（罚）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

桑弘羊坚持的法治主张，是与前面所说的经济政策相联系的。他主古代风景画张法治。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他所提倡的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实施。如他的助手御史在发言中说：“张廷尉（武帝时酷吏张汤）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暴虐）寡。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征而用足。”

此外，这次会议上的争论还涉及到农业的基本政策，对儒家学派的评价，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对接待外宾的礼节等问题。

盐铁会议反映了西汉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特别是轮台诏令发布后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会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却受到二次沉重的打击。最后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对“昭宣中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⑧《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

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⑤桓宽《盐换论·杂论》。

⑥《盐铁论·本议》。

⑦⑧《盐铁论·禁耕》。

⑨⑩《盐铁论·水旱》。

《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能言》。

《盐铁论·复古》。

《盐铁论·禁耕》。

《盐铁论·本议》。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盐铁论·非鞅》。

《资治通鉴》卷一九。汉武帝元狩三年。

《盐铁论·力耕》。

《盐铁论·禁耕》。

《盐铁论·错币》。

《盐铁论·轻重》。

《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未通》。

《盐铁论·地广》。

《盐铁论·伐功》。

《盐铁论·击之》。

《盐铁论·结和》。

《盐铁论·击之》。

《盐铁论·结和》。

《盐铁论·和亲》。

《盐铁论·结和》。

《盐铁论·诛秦》。

《盐铁论·诏圣》。

《盐铁论·刑德》。

《盐铁论·申韩》。

《盐铁论·诏圣》。

《盐铁论·大论》。

《盐铁论·刑法》。

《盐铁论·申韩》。

《盐铁论·非鞅》。

《盐铁论·刑法》。

《盐铁论·轻重》。

《盐铁论·取下》。

第十八章

赵充国招抚西羌羌族是我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散居在今甘肃、新疆南部，青海、西藏东北部和四川西部。远在先秦时，羌人已见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两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出游谷，以产牧为业。”①羌人有火葬习俗，“羌人死，燔而扬其灰”②。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称雄于河、湟问，爰剑及其子孙，从此即成为羌人世袭酋长。以后羌人人口逐渐增殖，分为很多部落，“或为氂牛种，越离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电；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③。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羌人臣服于匈奴，一部分请求内迁。汉景帝允许研种（爰剑五世孙研时武力最强，固以为种号）留何率族人迁于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西和西北）、羌道（今甘肃岷县南）。为了反击匈奴侵扰，汉武帝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并派军队进入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袍罕（今甘肃临夏西南），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昭帝时，又置金城郡，辖地西及湟源，等恐怒，遂联络小种背叛犯塞，围攻城邑，杀汉长吏。安国为羌人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重，退至令居，将上述情况上报朝廷。时赵充国年已七十余，自荐将兵到金城，解决西羌问题。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原为陇西郡上邦（今甘肃天水）人，后徙金城郡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早年为骑士，以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熟读兵法，明晓周边少数民族事务。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从式师将军李广利进击匈奴，为匈奴骑兵包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甚多。赵充国率百余名壮士陷阵突围，身被二十余创，式师大军因此解围。以战功拜为中郎，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武都氐人，迁中郎将，还为水衡都尉。又领兵出击匈奴、俘西祁王、擢升为后将军兼水衡都尉。后与大将军霍光定策尊立宣

帝，封营平侯。本始年间（前73—前70），又以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获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

是年六月，赵充国至金城，其时虽有骑兵一万余人，可以渡河进击，但为慎重计，他当夜派遣三名校尉衔枚先渡，渡河后，即建立营阵，大军相继于天明前依次渡河完毕。羌骑约百人来至汉军营旁，赵充国疑为羌人诱兵，不许军士出击。至夜，充国率军登上落都山（今青海乐都县附近），召集诸军校司马说："假如羌人派出几千人马拒守四望陿（今青海乐都县东南）中，我兵岂得进入，以是知羌人不晓用兵之道。"赵充国率军出征，无论行止都能随时保持戒备状态，并且常以远斥侯（侦察兵）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先计而后战。由于他能够持重，爱惜士卒，因此士兵都乐为其效力。羌人虽然几次派兵挑战，但充国坚守不动。先是罕（同罕）、开（jiān坚）首领靡当儿使其弟雕库至金城向汉西部都尉告密说"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有不少种人在先零军中，都尉乃扣留雕库以为人质。赵充国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被劫掠者，以瓦解羌豪阴谋，俟其疲剧，然后出兵进击。乃遣归雕库使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仍以功大小赐钱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⑤是时，汉宣帝已经征集内部兵屯边者六万人，准备进攻西羌。酒泉太守辛武贤为希功邀赏，奏请朝廷于七月上旬进兵，攻打罕、开，"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⑥。他认为汉兵频繁出击，羌人必然因震惊而破败。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奏疏交与赵充国，令其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共同研究，是否可行。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汉军迂回千里，深人击羌，大军粮草转输困难，羌人如据险守隘，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辛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⑦。赵充国提出宜"捐罕、开闇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劝之"，罕、开当能悔过反善，因而赦免其罪，再选择良吏进行抚集，这样可全师保边，实为上策。宣帝乃下其书与公卿大臣讨论，议下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又凭借罕、开之助，如不先破罕、开，则先零亦未可图。于是宣帝乃拜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古代人物图羌将军，并赐玺书表扬其进攻之策。同时以诏书责备赵充国"欲以岁数而胜微（久历年岁，乃胜小敌）"，令其引兵与辛武贤并进击羌。充国以为将任兵在外，宣便宜从事，以安国家。乃上书谢

罪，并向宣帝陈述攻守利害，以为先零首帅杨玉欲为背叛。故与罕、开解仇结约。如果先击罕羌，先零必然来援。击之并无必胜把握，反使先零得以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羌兵联合，兵马增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⑧。为今之计，宜“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开不服，涉（到）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⑨。宣帝览毕奏书，批准赵充国的计划。

赵充国率汉军来到先零屯兵处所。羌人由于屯驻日久，不见汉军动静，不免懈弛，望见汉军，皆惊慌放弃车重，欲渡湟水逃走。由于道路险狭，赵充国命令军士徐徐追赶。有的部属认为宜急行追赶，赵充国喻诸军校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回顾），急之则还致死（返还尽力死战）。”⑩在汉军追击下，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斩杀者五百余人，汉军虏获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大军到达罕地，赵充国下令军士不许焚烧居所及于田中樵采放牧。罕人闻知，喜相谓曰：“汉果不击我矣!”羌帅靡忘前来归服，充国赐给饮食，欲遣其归谕种人，充国部属皆认为“反虏不可擅遣”。正在争论间，汉宣帝玺书到来，准靡忘将功赎罪。由于汉政府及赵充国对羌人的政策得当，罕羌竟不烦兵而下。

古代风景画其年秋，充国病，宣帝赐书慰问，并命破羌将军辛武贤至屯所，作为赵充国副手，诏令十二月进攻先零羌。当时羌人降汉者已达万余人，充国料其最后必然败坏，欲撤还骑兵进行屯田，以待羌人之敝。奏未及上，会得进兵玺书。充国子中郎将赵印忧惧，恐拂宣帝意旨，使客谏充国因疾昭屯。不必上书争论。充国叹息说：“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大意说：“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人二十亩，益积蓄，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宣帝览奏，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书陈述说：“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因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九部），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

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从水上运粮）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击退敌人）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古代递送文书歇宿的馆舍），充人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言不可必胜）；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遭遇也）霜露、疾疫、瘃堕（因寒冷而堕指，瘃音竹）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经历险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种名）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桥成军行安易，若于枕席上过也），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宣帝对充国所奏仍有疑虑，再次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熟计复奏!”充国奉命复奏曰：“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他最后恳切地向宣帝表明心迹说：“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无尺寸之功，蝓（苟且也）得远嫌之便（即无违旨之嫌），而无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赵充国的奏疏每次送达朝廷，宣帝辄令群臣讨论。初时同意充国奏田园风景议者不过什三，后什五，最后则至什八。宣帝诘问前时反对赵充国的大臣，皆顿首服。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保也）其计必可用也。”宣帝于是赐书充国，嘉纳其议，并令其上报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字。同时，考虑罢骑兵后，恐羌人乘机进犯，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于是两从其计，诏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与中郎将赵印出击。结果许延寿降羌四千余人；辛武贤斩首二千级；赵印斩降二千余级；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宣帝下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夏五月，赵充国奏言：“羌本可（大约）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以定数计算）遗脱与煎巩、黄羝（皆羌小种）俱亡者不过四

千人。羌靡忘（羌首领）等自诡必得（言自己可以承担追回逃亡之责），请罢屯兵!”宣帝同意他的奏请。赵充国整军而还。

同年秋，羌首领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级及诸羌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率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汉朝廷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其余皆为侯、为君。始设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汉政府的以上措施，促进了羌族地区的发展和羌、汉两族的融合。终西汉之世，我国西部边境地区比较安定，与赵充国的绎略有一定关系。

注释①《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庄子》。

③《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④《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六，汉宣帝神爵元年。

⑥⑦⑧⑨《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经今古文之争儒学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著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训释和阐发，形成了经学。

汉朝自武帝以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往往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到了宣帝来年，五经共有十二家博士①。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阐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

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为汉朝的统治进行了辩护，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实行了广开“禄利之路”②。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同时设写书之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③，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已初具规模。以后，汉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从此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日益丰富。成帝以图书既多，杂乱无章，乃派员分别整理而以刘向总其事。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后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这一工作，并且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写出了《七略》一书：《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④。

孔子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因而导致了经学内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和两派的争论。原来西汉博士所传述的儒家经典，是根据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相传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如武帝末，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和《论语》、《孝经》等，都是用古文字书写的，因被称为“古文经”。而原来用隶书字体写的便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不同，篇章多少不同，而且对经学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其特色是结合当时政治需要为现实服务。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诂，把儒学经典视为古代历史资料，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借题发挥。它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明，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今文经出现较早，董仲舒以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得

到汉武帝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今文经陆续被立为学官。如《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易》有施、盂、梁丘、京；《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均为公羊家）等，都先后被立为博士⑤。古文经晚出，遭到今文经派的排斥，长期不得立于学官。

西汉末年，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⑥，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十讨论，但博十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因而写了一篇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是“因陋就寡”，“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残缺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⑦的缘故。另一方面则竭力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认为它可以补现有经传的残缺，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多十六篇等；它又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误，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③。由于刘歆言词激切，遭到今文学家古代铜器和当权官员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当时任大司空的儒者师丹，对于刘歆的主张极力反对，向哀帝表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⑨。刘歆虽未遭到哀帝斥责，但由是忤执政大臣，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从此离开长安，到外地任职，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争论异常激烈。

原来，汉朝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通晓儒家的“五经”，就成为人们仕进的重要途径。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魄师，以养天下之士”⑩。当时所建立的学官，大抵是今文经学家。由于今文家的学说受到了国家法令的提倡，士子们当然趋之若鹜，国家选拔官吏，也大都以这些学说为准则。久而久之，朝廷中的大臣，自然也以今文经学的信徒为主。这些人一旦进人仕途，自然要把自己信奉的说法视为唯一合于孔子之道的“真理”。学派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交织在一起，相持不下。

古代帝王平帝时，王莽当权，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

《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即位，聚集四方学者于京师洛阳，废除王莽时所立的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建武年间，大司徒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因“群议讙”，不久又废。章帝时，曾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群儒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主持，并作结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由著名史学家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它集中了今文经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了解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资料。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再加上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马融是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贵族地位足以保卫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名学生，因此，古文派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汉末，经董卓之乱，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今文经学遂日益衰微。

注释①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

②（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

③《汉书》卷三○《艺文·志》如淳注引刘歆《七略》。

④《隋书·经籍志》作三万三千九十卷。

⑤参见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⑥⑦⑧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

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年代遥远，今日欲考出其确切年月，已不可能。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能大体上确定其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古代铜器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汉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①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的国家之一，直接派僧侣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说明佛教已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这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之官员）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信士）、桑门（沙门）之盛馔。"并把这个诏书下达给各封国的国傅。

以上记载，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之见于史籍者，楚王刘英是第一人。楚王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当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国已有佛教传入，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成为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民之信仰，在社会上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可是，从明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甚至给予以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开始。这种说法几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例如：①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给石虎奏议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②唐太宗《三藏圣教序》有：“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③唐代著名古文家韩愈在其上给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表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右《出三藏记集》、梁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情，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

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④。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古代田园风景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⑤，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⑥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⑦，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元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

注释①从魏略对《浮屠经》的解释来看，最早的《浮屠经》大概叫做《复豆经》，引文中的"复立"当按照《世说新语》注的引文改作"复豆"（宋徐铉《说文解字》注，"豆"，"徒侯切"），与"浮屠"（佛陀）同音，而在佛教流行以后才按当时的译法改为《浮屠经》。由于它是早期

的翻译佛经，在使用词语方面很不规范。

②梁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

③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二。

④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饮冰室文集》卷五九。

⑤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安世高传》。

⑥般若学：魏晋时期与禅学并行的佛学两大派别之一。禅学偏重宗教修持，主要流行于北方；般若学偏重教义的研究，主要流行于南方。

⑦梁慧皎：《高僧传·支娄迦谶传》。

第十九章

王莽托古改制在西汉和东汉历史之间，有一个历时十五年的新朝，这个代汉建立新朝的篡窃者，就是汉朝的外戚王莽。王莽夺取政权后，打出复古的旗号，进行“改制”，历史上称作“王莽改制”。

古代铜器西汉后期，当权的一些贵族官僚，不是骄奢淫逸，便是贪婪成性，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沦为官私奴婢，社会险象丛生。成帝时，西汉王朝已经走向崩溃的道路。当时，在一般人民乃至中下层官吏中间，都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正派的人物出来执掌朝政，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这个志大才疏的野心家，认为天与人归，时机成熟，便破门而出，献冕登场，用阴谋手段做起皇帝来。系外威王氏家族在元帝、成帝时期长期地把持朝廷大权，这就为王莽后来篡夺政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年，汉成帝刘骜即位，皇太后王氏专权，以其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河平二年（27），王凤的五个弟弟谭、商、立、根、逢时同日封侯。时人谓之“五侯”。王莽之父王曼早死，未得封侯，故王莽早年生活不如诸叔父兄弟。他自知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①。其伯父王凤病危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②。以此获得姑母和诸伯叔的欢心。王凤临死前，把他托付给王太后和成帝，使他做了黄门郎，不久，又升迁为射声校尉。永始元年（前16），元后要成帝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嗣爵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他倾家财赈施宾客，招纳名士，结交公卿大夫；又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的罪过，获得了忠直的名声。成帝绥和元年（前8），在他姑母的安排下，王莽代王根为大司马。他爵位愈尊，矫情伪饰愈甚。妻子见客，衣不曳地，布蔽膝，人以为使婢。第二年，成帝死去，刘欣以元帝庶孙继承皇位，是为哀帝。哀帝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两家外戚集团因近亲关系把持朝政。王莽暂时告退回到自己的封国，伺机再起。哀帝是一个短命天子，只做了五年皇帝就死去，元后即日收取了皇帝玺印，召王莽进宫，于是王莽在元后的诏令下重新做了大司马辅政。公元1年，王莽奉元后命立中山王刘衎（kǎn侃）为帝，是为平帝，年仅九岁。元后以七十二岁高龄临朝称制，一切政事悉由王莽处理。

王莽在受命辅政以后，便积极扩大和巩固王氏集团势力，排除和消灭异己。凡是与王莽不合的人，都"傅致其罪"，罢去官职，甚至连他的叔父王立也遭到他的排斥，被遣就国。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③。西汉政权已为王莽集团所控制。王莽常以周公自命，他对圣经贤传中所记周公辅成王而后来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甚感兴趣。传说中周公摄政时，交趾南面曾有越裳国前来中国献白雉，王古代铜器莽也于平帝元始元年（1）遣人示意益州（今云南晋宁县）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来汉廷，献白雉一，黑雉二，以符合于周公的故事。王莽奏请元后下诏，用白雉祭祀宗庙。于是群臣盛陈王莽功德，实无异于周公辅佐成王；周公托号于周，王莽有定国安汉之功，宜赐号为"安汉公"。元后乃下诏封王莽为太傅，号曰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

王莽被晋封为安汉公后，便利用太后的宠信，笼络大小官僚，大封其集团党羽，以扩大并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奏请增加大臣们的俸禄、爵秩，续封宗室后裔因罪失爵者，使之重新得到封邑。朝臣皆承王莽旨意行事，使莽声望日隆。不久，又示意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元后乃下诏曰："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王莽为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称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④是时王莽的权势已与皇帝不相上下。

为了控制宫闱，以固其权，王莽又发动爪牙，假借民意，请立其女为平帝后。元始三年（3）春，有司奏请："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合）钱二万万。"⑤王莽表示辞让，只受四千万，而以其余部分分给十一媵家（陪嫁人家）及九族贫者。按照古礼，皇后之父应有百里之封。王莽之女既被立为皇后，于是又有人请以新野之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给王莽，以满百里之数。王莽之志原不在百里，因而故辞不受，欲以辞封邀取名誉而实现其代汉自立的目的。据说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被接见的）皆叩头言，宜极加赏于安汉公"⑥。王莽的党羽大司徒司直陈崇为迎合王莽，使张敞（汉宣帝时名臣）之孙张竦草奏，盛称王莽功德，几乎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词引用殆尽，然后建议："宜恢公（指王莽）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长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

之。”⑦元始四年（4）春，太保王舜等及吏民八千余人向元后上书说：“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莽兼二人之德，宜封为宰衡。朝廷照准。王莽又佯做辞让，最后元后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王莽才视事就职。自是王莽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真可谓爵贵号尊官重矣。

王莽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在就宰衡之年，“为学者筑舍万区（小室）……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即《史籀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⑧。这些异能之士后来都成为王莽的号筒。

这年秋季，王莽派遣分行天下的八名观风使者回到洛阳，称说“天下风俗齐同”，并假借郡国百姓名义，制造歌谣三万言，称颂王莽的功德。王莽在朝廷的声威愈隆。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零二人，奏请赐王莽九锡。元后照准。王莽从皇家领受了衣服、车马、弓矢、斧钺、柜（音巨畅，美酒）、乐器、朱户、纳陛、虎贲等九种显示尊荣的赏赐和权益，开了后来大臣受尊宠的先例。

王莽受封为安汉公，官居宰衡，与周公在西周时的地位很相像，他本人也很希望成为周公。于是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⑨刘庆的奏书一上，群臣争相附合。当王莽日益走近皇帝宝座时，这个“富于春秋”但不是孺子的平帝，只得夭折而亡。王莽从刘氏皇族中找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广戚侯刘显的子婴，立为皇帝。紧接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⑩的符命天书，就应时出现。于是王莽公然由安汉公成为摄皇帝、假皇帝。

居摄元年（6）四月，安众侯刘崇起兵反抗。次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聚众讨伐王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众至十万人。这时长安附近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亦集合十万以上的农民，起兵反莽，以响应翟义的号召。但是这些反莽势力，都为王莽所消灭。自是王莽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因而不久便有铜符帛书出现，其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显然是天命攸归了。不

久，又有一个“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人哀章，做了一只铜柜，制作两道封书题签，其一书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二书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遵照天命行事。哀章持铜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上报，王莽不敢违抗天命，只好到高帝祠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改年号为始建国元年（9），西汉王朝便寿终正寝。

古代铜器西汉王朝虽然结束，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隐患和危机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和矛盾，王莽附会《周礼》，实行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疲）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乃）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控制）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掠）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取田地产物，勒索佃农租税），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针对以上情况，王莽提出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规定：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之家，占田一井（九百亩）；原有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者，把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诋毁井田制度、惑乱人心者，流放边远地区，以儆效尤。

王莽颁布这一诏令的目的，并非想要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借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官僚富商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者不可胜数，于是他们的代言人区（音欧）博公开出来反对。区博上书给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渐进过程），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由于官僚富贾的反对，王莽被迫于始建国四年，下令取消。其诏令曰：“诸名（私人占有）食

（朝廷赏赐）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各治。”王莽试图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到此已完全失败。

王莽另一项经济改革政策，是实行五均、赊贷与六筦（管）。始建国二年（10）：二月，王莽下令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市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定出法定的标准价格，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自相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须品滞销时，则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不令折钱。

五均官除平准物价以外，还有一个向农民办理借贷的任务。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祭祀贷款归还日期不得超过十日；丧事贷款归还日期限定为三个月。如果因欲经营生产而缺少本钱，也可低利借贷，年收利息不得过十分之一。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种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实行六筦的理由，照王莽自己的说法是：“夫盐，食肴之将（主也）；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要挟）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管理）之。”由此看来，王莽实行的六筦政策，即统制重要经济事业的政策。六筦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人，多是一些巨商富贾，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和临淄伟姓，都是家资千万的富商，这与武帝时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管理盐铁的官吏；而王莽则缺乏这样的力量，对他们则是无能为力。这些富商巨贾乘传求利，与郡县官吏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即所谓“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纳言冯常谏王莽废除六筦，荆州牧费兴提出，对荆州“盗贼”要“阔其租赋”、“解释安集”，都被免官。直至地皇三年（22），王莽见四方盗起，攻城杀吏，知天下溃叛，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

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使者未及出发，刘秀兄弟及李通等已起兵反莽，事实上六筦政策，已自动取消。

古代铜器在王莽的改制中，给社会经济造成最大混乱的是货币的屡次改革。王莽从当“摄皇帝”开始，前后进行过四次货币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原来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再以更劣的货币兑换原来铸造的劣币，而且品类繁多，换算困难，甚至连古代的原始货币龟、贝也拿来应用。王莽不知道钱币的价值要由它所包含的内在价值、金属价值来决定，而只是一味用法令来强行变更，这就注定其必然失败。

第一次改革是在居摄二年（7）王莽居摄时，下令于当时通用的五铢钱外，另铸大钱（重12铢，值五铢钱50）。又造契刀（值五铢钱500）、错刀（值五铢钱5000），与五铢钱并行。这种做法的掠夺性异常明显，大钱与五铢钱的重量是12：5，而价值却规定为50：1，重量和价值相差极其悬殊。

第二次改革是在始建国元年（9）王莽称帝后。这次又废除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造小钱（重一铢），与大钱同时并行。并下令以一个五铢钱兑换一个重一铢的小钱，以50个五铢钱（共重250铢）兑换一个重12铢的大钱。社会上久已惯于使用五铢钱，且大钱与小钱的比值极不合理，因此民间仍然私用五铢钱进行交易。

第三次改革是在始建国二年（10）。王莽以钱币讫不行，“于是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些复杂的货币，只有更使“百姓愦乱”，而且连古代的原始货币龟、贝也拿来应用，尤为荒谬。由于“其货不行”，“乃但行小钱值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停止使用。

最后一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14）。由于大钱、小钱不能通行，遂予废止，改行“货布”与“货泉”两种。一个货布重25铢，一个货泉重5铢，但却规定一个货布的价值等于25个货泉。又下令一个12铢重的大钱兑换

一个5铢重的货泉，比例还是不对。

王莽屡易货币，“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而且种类复杂，单位太多，换算亦不容易，所以人民仍私用五铢钱，盗铸钱者不可胜禁。王莽对于私铸钱币者，原定处以死刑，后来因为犯者愈来愈多，古代风景画鉴赏杀不胜杀，于是改为犯者及妻子没为官奴婢，由郡国用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主管铸钱的官），因此“愁苦死者什六七”。虽然如此，新币仍不能通行。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一味的“矫讬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改革。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和行政区划，大加改变，屡易共名；甚至连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有“新家”、“新室”、“新成”、“黄室”等，名目虽多，但毫无意义。

王莽实行的这些改制，有些措施触及到当时社会的突出矛盾。但是王莽是封建权贵的代表，他的改制实质上是从维护贵族的利益出发的。他之所以打击一部分豪强和工商业主，不过是为了强制大地主、大商人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封建经济得到适当的调整，借以缓和当时已经激化了的社会矛盾。更明白地说，就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封建权贵的统治。这如果能够实现，在客观上对农民还是有利的。正因如此，所以遭到豪强富贾的顽强反抗；加上王莽胡乱推行一些反经济规律的措施，给本来即已混乱的社会经济生古代风景画活更增加了混乱。许多官僚也趁火打劫，渔肉百姓，无限制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致“农商失业”，“百姓困乏”，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统治，又肆意挑起了和周边各族的战争，以转移人民的视线。王莽执政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朝的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侯，引起周边各族的反抗。在东方，高句丽人反对王莽，王莽派严尤征服了高句丽，并把高句丽改称“下句丽”，但高句丽并没有停止战斗。在西方，西域各国纷纷反抗，断绝同王莽的往来。在西南，句町（今云南蒙自地区）王起兵反抗，王莽于天凤元年（14）派冯茂等发巴蜀兵击句町，前后三年，“士卒

疾疫，死者什六七”，始终未能征服句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是对匈奴的战争。匈奴从宣帝时起和汉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王莽称帝后，派专使收回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接着，王莽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并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子，封为单于。始建国三年（11），王莽一面下令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对匈奴表示侮慢；一面又发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十二部兵，分十路向匈奴进攻，引起匈奴人的强烈反抗。结果“损失惨重”，“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王莽发动的这些战争，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王莽改制没有挽救社会危机，相反，使广大人民在政策的摇摆中遭受祸殃。残酷的刑法，沉重的赋役征发，加之匈奴入寇，旱灾虫蝗频仍，使得百姓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天下萧萧然，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注释①②③④⑤《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⑥《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五年。

⑦⑧《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⑨《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五年。

⑩《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资治通鉴》王莽始建国二年。

改行货布、货泉年代。《王莽传》置于地皇元年（20），此据《汉书·食货志》。

《资治通鉴》王莽天凤元年。

《汉书·食货志）下。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第二十章

绿林赤眉起义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成帝时，因饥馑而死于道路者数以百万计。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等为此拟汀了方案，都因遭到权贵的反对而作罢。农民的处境日益古代风景画鉴赏恶化，谏大夫鲍宣上书说，由于租赋苛重，官吏贪残，豪强蚕食，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加上水旱自然灾害，民“有七亡（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①。因此，“部落鼓鸣”，“盗贼横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莽应运而出，实行托古改制，但是事与愿违，他的改制不但未能挽救社会危机，结果却转化为引发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的导火索。

始建国三年（11），边塞上首先爆发了反对王莽的农民“叛乱”。这一年是连年自然灾害后的一年，王莽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在连岁自然灾害之后又发动不义战争。不少农民被征为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当时属五原郡），“以助军粮”；海岱江淮之民，则转输兵谷于边塞；而并州一带农民，既承担更多兵谷，又受到莽军吏士的骚扰，受害更深。因之，并州农民最先举起了反莽的旗帜好天凤二年（15），随着王莽征戍压迫的加剧，反莽斗争愈加发展。按汉制戍卒服役为期一年，而王莽调发三年仍不更换，“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人旁郡”②。接着，在长江下游也爆发了“叛乱”。天凤四年（17）“……临淮（郡名，治今江苏泗洪东南）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郡名，治今苏州）长州（苑名，在今苏州西南）”③。同年，在今山东也爆发了“叛乱”，琅邪女子吕母起于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吕母富有家产，有子为县游徼，因小罪为县宰判处死刑。吕母怨宰，散尽家财，招聚饥民数千人，为子报仇。吕母自称将军，亲率农民攻陷海曲城，杀死县宰，以宰之头祭其子墓。然后回到海上，继续反莽斗争④。

以上所述均为大规模农民起事的前驱，从天凤四年起，大规模的农民叛乱随之爆发。就地域分布来看，当时的农民“叛乱”，可以分为三大

区域。在东方是青、徐（今山东）一带；在南方是荆州、南阳（湖北‘西部和河南南部）一带；在北方是河北地区。其中主要的后来成为大的军事集团的是东方和南方的两大支，起事后都曾先后攻到长安，这就是“绿林”和“赤眉”两支农民军。

天凤四年（17），荆州一带连年大旱，发生饥荒，农民相率在野泽中采掘凫茈（音符子，野荸荠）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兄弟为人排难解忧，受到饥民拥护，被推举为首领。他们聚集饥民，不时攻击附近乡聚。一时诸亡命如马武、王常、成丹之徒，都率古画众参加。他们以今湖北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揭起反叛的旗帜，数月问众达七八千人，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绿林军”。绿林山的“叛逆’，一天天成为荆州的威胁。地皇二年（21），新莽荆州牧发兵两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击败莽军，攻拔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东南）等地，部众增至五万人。次年，大疫降临鄂西，绿林山的叛民，死亡一半。为了求生，他们相率离开了绿林山，分道转移：一路击壬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江陵），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风、马武、朱鲔、张印（昂）率领，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当新市兵进攻随县时，平林（今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也聚合了数千农民响应，称“平林兵”。由于新市兵与平林兵的结合，鄂北、豫南一带已完全为叛乱的农民所控制。

绿林军起事爆发后，一些与新莽政权有矛盾的西汉宗室和地方豪强也纷纷起兵。宗室刘玄投奔平林军，为安集掾。南阳的刘宝寅、刘秀兄弟也是西汉宗室子弟。他们兄弟既富资财，又广结豪侠，王莽即位后，遭到迫害，遂在农民军兴起后，抱着“复高祖之业”⑤的目的在春陵（今湖北枣阳南）起事。刘氏兄弟纠集族人、宾客七八千人，称舂陵军，与新市军、平林军联合反莽。

绿林军起义的第二年（天凤五年），在今山东、苏北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当时青、徐大饥，民变蜂起。在吕母起事地区莒县的饥民，共推琅邪人樊崇为首领，尊之曰“三老”。樊崇的同乡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率众会合，部众发展到几万人。吕母死后，她的一部分部众也并人樊崇集团，于是樊崇遂成为山东农民“叛乱”的总领袖，而泰山也就成为当时农民“叛乱”的中心。“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

徇地之计。众既寖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沉相称曰巨人”⑥。不仅樊崇的集团如此，其他“叛乱”集团，无不如此。

关于上述农民叛乱情况，曾有许多“盗匪地区”逃出来的官吏，上书向王莽报告。王莽将这些官员“下狱以为诬罔”，他认为，“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所以他下令要各地守令，务予殄灭，以后“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⑦。自是以后，臣下多不敢向王莽报告“盗贼”真实情况。当时有一个名叫田况的高级军官，曾因与“盗贼”交手，一度取得小胜，被王莽任命为兼领青、徐二州州牧。他大胆地向王莽建议，不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王莽不听，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十万大军进击青、徐“盗贼”。当莽军前来进攻时，樊崇“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日赤眉”⑧。王莽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⑨地皇三年（22）冬，莽军攻下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屠杀起事人民一万多人。赤眉军以逸待劳，勇敢杀敌，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会战中，大破莽军，击杀万余人，并乘胜追至无盐。在成昌会战中，廉丹丧命，太师王匡落荒逃走。赤眉军占领了东自莒城，西到陈留，南达汝南东海，北到濮阳青州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结束了王莽在东方的统治。战后，赤眉军在黄河南北纵横驰骋，队伍扩充到数十万人。

古代风景画鉴赏继樊崇之后，大河以北地区的居民也四方蜂起，各推首领，攻掠郡县。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称：“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当时，“诸贼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⑩，各部叛民，均有渠帅，如铜马贼帅东山荒秃，上淮况，大彤渠帅樊重……，富平贼帅徐少，获索贼帅古师郎等。其余“贼”，亦各有其渠帅。可见当时“叛乱”者声势之浩大与分支之繁多。

在赤眉军成昌大捷之后，绿林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地皇四年（23）正月，绿林军在沘（音比）水（今河南泌阳）大败莽军，歼灭二

万余人，杀死主将甄阜和梁丘赐。接着，又转兵向西，在淯阳（今河南南阳西南）击溃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获得大批装备，部众扩展到十多万人，随即进围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由于战局的胜利发展，需要建立政权来统一指挥。绿林军将领认为人民支持反对王莽就是“人心归汉”，因此，在这年二月，他们在淯阳拥戴刘玄做了皇帝，建元“更始”，正式建立了汉政府。从此，绿林军被统一称为“汉军”。汉政府建立后，一面发布复兴刘氏的政治号召，一面派刘演、刘秀等出师北伐。

王莽听到刘玄建立汉政权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但他为了对外伪装镇静，故意染黑了须发，宣召从全国各地征选的一百二十名淑女进宫，王莽日与方士涿郡人昭君等在后宫考究房中术。四月，绿林军将领王常、刘秀等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北）、郾（河南今县）和定陵（今河南舞阳）；同时，刘绩以别军占领了宛。这时刘玄的政府已奄有今日豫西大部分地方。王莽闻之更加恐慌，因大发兵讨伐中原“群盗”，“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洛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按照规定期限会合）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此外，王莽还征集到各地明兵法者六十三家，随军担任后备军官，并且选用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巨毋霸作为垒尉，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军威。

这年五月，王邑、王寻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出颍川，会同严尤、陈茂，直逼昆阳。新军将领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为歼灭汉军于昆阳城下，不过弹指间之事耳。当时，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汉军诸将见新、汉两军众寡悬殊，皆惶怖，欲放弃昆阳，散归荆州各地。刘秀反对上述主张，他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汉军正在议论间，莽军的前锋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开来。这时，军情十分紧急。诸将彼此观望，但又苦无良策。刘秀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又是一员偏将，在以前的战斗中，也未立过赫期战功，因此平时并不为诸将所重。

当此紧急关头，他表现得如此坚定沉着，又能提出一整套御敌方案，诸将始另眼相看，请他参与谋画。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按照刘秀的主张，由王凤与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与五威将军李轶（音义）等十三骑，从城南门突围，到定陵、郾城去调集援兵，夹击新军。

王邑、王寻率领新军围攻昆阳，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顽强抵抗。屡经败阵的严尤，吸取以往教训，向王邑献计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指更始）在宛，急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王邑骄傲地回答说："吾昔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围城的莽军，在昆阳城外列营百数，围之数十重，金鼓喧天，远闻数十里。围兵"或为地道、冲輣（輣音崩，冲轫，楼车也）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背着门板）而汲"。汉军守将王凤在莽军的重压下，曾一度请降，莽军不许。王邑、王寻意气洋洋，以为攻占昆阳，建立大功，就在漏刻之间!昆阳汉军，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坚守危城，顽强抵抗，昆阳城为之屹立不动。严尤见屡攻昆阳不下，再次向王邑、王寻建议说："《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王邑仍不纳。六月初，刘秀从郾城、定陵调来了全部汉军，救援昆阳。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千余人，开到距。新军主力四五里处，布下阵势。王邑、王寻狂妄自大，根本未把刘秀放在眼里，轻率地决定只派数千人前去迎战。经过几次小的接触，汉军均获胜利。其时，宛城已为汉军主力攻克三日，战报尚未传来。刘秀乃使人向昆阳城中伪传捷报："宛下兵到。"又故意将捷报失落。王邑、王寻得到战报，暗自吃惊。汉军闻讯，"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

刘秀见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便亲率敢死者三千人，迂回到昆阳城西，从水上向新军大本营发动猛烈袭击。王邑、王寻见汉军兵力不多，仍然认为不堪一击，亲自带领一万余人巡行军阵，下令诸营"皆按部毋得动"。汉军由于接连胜利，胆气更壮；而新军士兵大都是临时胁迫来的农民，他们痛恨王莽，都不愿意作战；诸将又借口"皆按部毋得动"的命令，乐得按兵不动。因此，汉军冲人新军阵中，如入无人之境。王邑、古代人物像王寻部队经不住汉军猛冲，阵势紊乱。汉军乘锐破阵，杀死王寻。守城汉军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呼声震天。失去指挥的莽军为之大乱，继之以溃散逃亡，奔逃者互相冲撞践踏，死伤不计其数。会大

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城北滍（音志）川暴涨，虎豹吓得战傈不止，莽军士卒淹死于水中者以万数。王邑、严尤、陈茂率轻骑踏着溺者尸体逃命而去。被迫征发来的农民，在汉军的攻击下，以溃散方式反对王莽，各还本郡，王邑只得率领数千残兵败将逃回洛阳。

昆阳大捷之后，刘玄遣王匡率兵直攻洛阳；申屠建、李松叩武关。汉军的强大攻势，不仅三辅为之震动，海内豪杰亦“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偏于天下”。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于南乡（属析县）聚兵百余人，响应汉军，降析县宰和武关都尉，攻杀莽军右队（弘农郡的改称）大夫宋纲。王莽更加忧惧，技穷不知所出。当时有一臣下崔发告诉王莽说，《周礼》及《春秋左氏》皆谓国有大灾，则哭以厌（压胜）之。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叩头号哭，乞求皇天保佑，又作告天策千余言，自陈功劳。太学生和居民哭得最悲哀者和能诵策文者，均“除以为郎”，计有五千多人。古代风景画这幕丑剧刚刚收场，邓哗即战败王莽的援军，迎接申屠建等率领的汉军进入武关。汉军势如破竹，郡县望风而降，九月间攻人长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集众响应，火烧作室门（未央宫的便门），延及宫室，大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王莽避火宣室（未央宫殿名）前殿，宫人妇女啼哭曰：“当奈何!”王莽青服端坐，自我安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天明，群臣扶王莽至渐台（在未央宫中），欲阻池以拒“贼”。汉军攻上渐台，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取其玺绶，校尉公宾就斩王莽头。莽首传送至宛，悬于市上，“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经过六年血战，王莽政权终于被绿林军所推翻。

当西人武关之军，攻陷长安时，刘玄的北伐军也攻陷了洛阳。公元23年十月，刘玄政府由宛县北迁洛阳。当时赤眉军散布于汝南、颍川一带，饥饿无以为食。樊崇亲率渠帅二十余人赴洛阳，诣谒刘玄，接受封古代风景画鉴赏号，表示归附，但并不为刘玄所重视。樊崇等人乃亡归其营，率兵人颍川，击杀河南太守。但当时的河南，“赤地千里，城无所夺，野无可掠，赤眉部众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樊崇等知东归则群众必散，乃决计西攻长安。

更始二年（24），刘玄移都长安。当时长安“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锺鼓、帷帐、舆辇、器服、

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居长乐宫，完全恢复了封建帝王一套腐化堕落的生活。刘玄委政事于宠臣赵萌等，“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又大封宗室、功臣，“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绔、襜褕（音参于，围裙）、诸于（妇女的外衣），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炊烹之意），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像这样的政权，当然要使天下大失所望。

是年冬，赤眉军分两路向长安进发：一路由樊崇率领进武关；一路由徐宣率领进陆浑关（今河南嵩县东北）。更始三年（25）正月，两军俱至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与刘玄诸将连战皆捷，众遂大集。进至华阴，有士人方阳者，劝说樊崇立刘氏宗室，以为号令。樊崇以为然，乃于军中求得西汉宗室后裔、一个年仅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立为皇帝。樊崇本来应做丞相，然不知数术，便推举做过县狱吏能通《易经》的徐宣为丞相，自己做了御史大夫。

赤眉军继续西进，到达高陵（今属陕西省），刘玄将张印叛降赤眉，遂联兵共攻长安城东都门。城破，刘玄来降，上玺绶于刘盆子，先被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缢杀。

赤眉军进人长安后，由于关中地区豪强地主坚壁清野，聚众反抗，长安城中粮尽，于是西走陇阪，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于是又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建武三年（27）春，在宜阳（今河南洛宁东北），遭到刘秀大军截击。赤眉军突围未成，十余万众被迫降附了刘秀。同年夏，樊崇准备再次起兵，但事泄为刘秀所杀，赤眉起义遂告彻底失败。

注释①《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②《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④吕母“叛乱”事，《后汉书·刘盆子传》置于天凤元年。此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⑤《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刘宝寅绩传》。

⑥《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⑦《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⑧《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⑨《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⑩《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李贤注。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资治通鉴》卷三九淮阳王更始元年。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

《资治通鉴》卷三九堆阳王更始元年。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据《汉书·王莽传》。《汉书补注》引《三辅故事》谓杀死王莽者系“屠儿杜虞”。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刘秀统一全国昆阳大捷后，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绩、刘秀兄弟威名益盛，阴劝刘玄杀掉刘縯。刘绩寅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对刘玄立为皇帝，心中不服。刘秀刘玄封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接受，刘玄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收捕刘稷，将要斩首，刘绩寅固争，因与刘稷一并被诛杀。刘秀闻讯，心自不安，立即含悲忍泪，从城父（今河南宝应县东）赶到宛城，向新市、平材诸将谢罪。刘秀迫于形势，不敢为刘多寅服

丧，饮食言笑如平时，以此取得刘玄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虽然如此，从刘绩被杀之日起，刘秀无日不在策划脱离农民军的队伍，独树一帜。更始元年（23）十月，刘玄北都洛阳后，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抚诸郡。

当刘秀北徇河北时，河北地区形势异常复杂。这里既有以铜马为首的几百万农民军，也有同起义军为敌和观望自守的地主武装，另外还有拥有实力、据守城邑、无所归依的王莽所置官吏。刘秀知道，要平定河北，必须剿灭农民军；要剿灭农民军，必须要获得城市以为军事据点。因此，他一渡黄河，便打起大司马的旗号，所到之处，“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从而取得吏民的支持，“争持牛酒迎劳”①。正当刘秀兴高采烈之时，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卜者王郎在当地土豪的支持下，称帝于邯郸。这个割据势力由于谎称为赤眉拥立和诈称成帝子子舆，发展极为迅速，以至“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②。王郎移檄通缉刘秀，刘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今北京市）。更始二年（24）初，刘秀为了逃避王郎的拘捕，狼狈地逃出蓟县，在风雪交加中，驰驱于饶阳、下曲阳和下博途中。在饶阳传舍，为取得一餐，还冒充过王郎的使臣，险些被捕。

当时河北郡国皆已降王郎，惟独信都（今河北衡水东）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信阳为和戎，居下曲阳）太守邳肜（音容）不肯从。刘秀走信都，任光、邳肜来会。刘秀拜任光、邳肜为大将军。刘秀以信都为根据地，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豪族刘植、巨鹿大姓耿纯各率宗族宾客数千人归附刘秀，合兵攻陷下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于是有兵数万人，连陷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等地，进而与王郎的大将李育在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发生了遭遇战。正当此时，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率领大队骑兵来会。上谷、渔阳是西汉边郡要塞，天下精兵荟萃之地，特别是骑兵中的乌桓骑士，最能冲锋陷阵，素有“突骑”之称。两郡的归附，大大增强了刘秀的军事力量。接着，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带兵来讨伐王郎。于是刘秀乃大飨士卒，连兵进攻王郎，五月，攻破邯郸，王郎乘夜逃走，刘秀使王霸追斩之。

古代瓷器刘秀击斩王郎，声势大震于河北。刘秀势力的不断发展，

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安抚刘秀，刘玄特派人封他为萧王，令其罢兵回长安。刘秀辞以河北未平，不肯就征。从此刘秀与更始分道扬镳，在河北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进行一系列建立地主政权的活动。更始二年（24）秋，刘秀亲统大军击铜马于（音鄡，今河北東鹿东）。又命吴汉率"突骑"来会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企图一举歼灭河北的农民军。铜马军顽强地抗击了刘秀的进攻，迫使刘秀大军只能"坚营自守"，采取封锁政策。后来铜马军由于粮道断绝，饥不得食，不得不撤退，在逃遁途中，被刘秀军追至馆陶（今属河北）击破。铜马军余部和高湖、重连两部会合，与刘秀大战于蒲阳（即蒲阳山，在今河北完县西北）。结果因为高湖、重连等农民军领袖背叛了群众，大部分饥民被改编为刘秀的创业之军。刘秀将这支大军分隶诸将统领，形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大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③。所谓"铜马帝"，即"贼帅"的别称，而刘秀正是凭借这支农民军争衡天下的。明年，刘秀又于元氏、右北平、安次、渔阳诸地，连续击破了尤来、大枪、五幡等支农民军。这些军事活动，使刘秀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占据河北广大地区。

正当此时，更始政权已呈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强大的赤眉军已开始向长安进军。刘秀估计到赤眉军必然能够攻克关中，占领长安，因而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策略。他派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西向，以乘更始、赤眉之乱；同时遣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以拒洛阳。为了巩固河北北部的占领，刘秀又自徇燕赵。此外，为了保守根据地及粮饷的来源，又命寇恂留守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可谓攻守成宜，进退自如，刘秀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河北诸将议为刘秀上尊号，刘秀谦辞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④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绝望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⑤刘秀谦让后说："吾将思之。"行至部（hao浩，今河北高邑东南），刘秀以前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带来《赤伏符》（捏造的谶记）。符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古代建筑为主。"⑥到了这时，刘秀只得"恭承天命"，命有司设坛场于部

鄗南千秋亭，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产，部为高邑，是为汉光武帝，时在25年六月。同年十月，刘秀派岑彭劝说坚守洛阳的绿林军将领朱鲔（wěi委）投降。岑彭向朱鲔陈说利害，朱鲔说：“大司徒（指刘绩）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岑彭回报刘秀，刘秀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⑦朱鲔乃降。刘秀随即占领洛阳，并在其地建都。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汉政权，又称为后汉。

当赤眉军与更始激战之际，邓禹自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渡过黄河，占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从此，赤眉军和刘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建武二年（26）春，长安粮尽，赤眉军引兵而西，至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北地（今甘肃中宁），邓禹乘机进入长安。九月，赤眉军在陇地转攻城邑，受到陇西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大雪的袭击，士兵冻死不少，只好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当时邓禹派兵在郁夷（今陕西宝鸡东）袭击义军，结果被义军击败，赤眉军再度占领长安。

冬十一月，光武帝遣冯异入关代邓禹，临行，敕冯异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为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饬，无为郡县所苦!”⑧冯异受命西行，因征召邓禹还京师。十二月，关中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军引兵东归，尚有众二十余万人。在义军回归途中，刘秀已经作好截击部署。他派侯进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弁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分为二道，以截其归路。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今属陕西），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卒五千余人。明年正月，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着赤眉服，伏于道旁。两军交战，伏兵突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在今河南渑池、洛宁两县之间），降男女八万人。赤眉余众东奔宜阳，刘秀亲统六军，严阵以待，赤眉惊震，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皆降，献上所得传国玺绶。刘秀赐樊崇等洛阳田宅，以盆子为赵王（光武叔父）郎中。同年四月，冯异击败延岑等，平定关中，刘秀大军遂占领长安。

刘秀虽然扫平了铜马、绿林、赤眉等农民军，但群雄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为了统一天下，刘秀又展开了削平群雄的战争。当时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梁王刘永称帝于睢阳；隗嚣占据天

水，自称西州上将军；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掠郡县。另外，北部还有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勾结匈奴，立为汉帝。

自建武二年（26）开始，光武帝采取攻伐与招降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对盘踞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发起攻势。刘永为西汉梁孝王八世孙，从宗族谱系上说，比刘秀更为正统。因此，刘秀视刘永为最大威胁。当时刘永雄据今日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庐江的李宪、苏北的董宪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四月，光武帝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讨伐刘永，围攻睢阳。八月，盖延攻陷睢阳，刘永与部将苏茂等逃至湖陵（今山东金乡南）。睢阳人反城迎刘永，盖延率诸将围之，吴汉亦率兵前来助战。城中食尽，刘永出走，为其部下庆吾所杀。刘永部将苏茂、周建等共立永子刘纡为梁王。建武五年（29）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郯城北），刘纡不知所归，为其军士高扈斩杀以降。其后不到半年，张步、李宪、董宪等亦先后为刘秀所击灭，刘永的势力，至此完全被肃清，“山东悉平”。

在讨伐刘永集团的同时，光武帝又遣建义大将军朱祐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襄樊南），围城半载，秦丰穷困出降，用轞车押送至洛阳诛死。遣右将军邓禹西击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田戎于津乡（今湖北江陵东）。“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人蜀”⑨。盘踞河北、自立为燕王的叛将彭宠亦于建武五年初为苍头所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已平定。

宫庭演奏关东虽平，但陇蜀尚为野心家隗嚣、公孙述所割据。光武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消灭隗嚣和公孙述。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金城、武都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郡，几乎占有今日甘肃省之全境。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窥伺关陕，退可据隘自守。且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是“名震西州，闻于山东”⑩。光武帝闻其风声，报以殊礼，欲同他结好，要求他出兵攻打巴蜀的公孙述。可是隗嚣持观望态度，上书推说“三辅单弱，刘文伯（卢芳）在边，未宜谋蜀”。隗嚣部下王元、王捷也劝他保守边陲，以观天下之变。光武见诱降不成，决定用武力解决，

于是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进攻隗嚣。隗嚣使王元据陇坻（一名陇阪，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伐木塞道。诸将与战，败退。王元进攻三辅，为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破。隗嚣因遣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八年（32）春，光武帝率诸将西征，分数道上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汉。隗嚣携妻子奔西城（即西县城，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光武遣吴汉、岑彭围西城月余，王元率蜀兵五千人来救，迎嚣归冀（今甘肃甘谷东）。明年春，隗嚣病死，王元等立嚣子隗纯为王。建武十年（34），光武帝命来歙等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收买窦融，命其以河西五郡之兵，与汉兵夹击隗纯，攻破落门（聚名，在今甘肃武山县西），隗纯降，王元奔蜀，陇右平。

建武八年（32）秋，颍川农民群起，河东守兵亦叛，京师为之骚动。光武认为形势紧急，亲自辰夜东驰，临行前，赐书岑彭等将领说："两城（西城、上邦）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指公孙述）。人苦不知古代演出图足，既平陇（隗嚣所都），复望蜀（公孙述所都），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公孙述当时据有益州之地，包括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大部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势险阻，兵力精强。他北联隗嚣，并趁光武有事于山东之际，联结关中割据势力，吕鲔、延岑、田戎、王歆等多往归依，公孙述皆拜为将军，因聚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于刘秀称帝的同年，即建武元年（25）四月，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即位于成都，号成家，建元龙兴。

他也和刘秀一样，好为符命鬼神异应之事，借图谶以欺弄民众。他妄引谶记，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征汉之十二帝（包括吕后），说明汉数已尽。又引《录运法》和《括地象》（皆谶纬之书）中"公孙当立"的预言，说明他是天帝派来接替汉朝的真命天子。公孙述还常将上述宣传品送到中原，借以迷惑百姓。刘秀为此颇为担忧，他致书公孙述，说公孙述歪曲谶语，谶记所言"公孙"，乃指宣帝；并且劝他不要仿效王莽那样以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等作为符瑞，自欺欺人；天下神器，不可力争，不如早日归降，还可保全宗族。然而公孙述并无降意，因此没有复书光武帝。

建武十一年（35）七月，光武帝亲自将兵征讨公孙述，驻军长安。八月，汉将岑彭大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今四川涪陵东）。于是汉军不分昼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一一直攻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出动精骑驰击距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势若风雨，汉军所至之处，蜀军无不奔散。公孙述昕说岑彭绕过延岑军后，攻下武阳。惊惶地以杖击地说："是何神也!"他在气恨之余，心生毒计，暗派刺客诈为亡奴，投降汉军，乘夜刺死岑彭。十二月，汉大司马吴汉率领舟师三万人自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溯江而上，征讨公孙述。明年春正月，吴汉攻克广都，遣轻骑烧成都市桥，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当胜利在望之时，光武嘱咐吴汉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其后吴汉与公孙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十一月，吴汉、臧宫又与公孙述古代瓷器战于成都郊外，大破之，公孙述被创而死。延岑以成都降。吴汉杀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巴蜀之地予以平定。

最后还剩下一个盘踞北部的卢芳。当时卢芳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包括今日之陕北、山西和内蒙古一带地方。卢芳勾引匈奴和乌桓作为外援，经常侵扰北部边境。光武帝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未成功。建武十二年（36），刘秀已剿灭公孙述，卢芳与其部将贾览共攻云中，久攻不下，其留守九原的部将随昱欲胁迫其归降光武。卢芳自知不能相敌，遂弃辎重，率十余骑逃人匈奴。建武十六年（40），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遣卢芳还降。卢芳至汉，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汉立卢芳为代王。不久又逃人匈奴，后死于匈奴。

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刘秀次第翦灭四方割据势力，结束了纷乱局面，全国重归统一。

注释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卷一二《王昌传》

③④⑤《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

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

⑦《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⑧《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

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

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

《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光武中兴刘秀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汉政权，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夺功臣之兵权。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古代雕像“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①耿弇、邓禹、贾复等皆相继交出兵权，以特进奉朝请。不仅如此，刘秀还不使功臣参与朝政，而以优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②。当时，只有极少数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特许“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③。

与此同时，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的官职创于秦代，原是少府属吏，其任务仅仅是在殿中传达诏令。西汉武帝时，成为侍从近臣，职权渐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为中书。成帝时，又复尚书旧名。尚书职名虽然由来已久，但直至西汉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东汉建立后，刘秀为了便于自己独揽国家大权，那些侍从其左右的尚书，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尚书的职权，日益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④。尚书

台已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

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变化，其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据《后汉书·百官志》等书记载，东汉尚书台的组织为：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据应劭《汉官仪》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若公为之，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诏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于朝会时均专席独坐，京师谓之"三独坐"。这表明尚书台已成为国家的法定机关，其最高长官尚书令的地位也随之而升格。尚书令下设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设六曹：一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二日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三日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等；日封客曹，主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五日二千石曹，主司法词讼事务；六日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治安事。每曹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后来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窥见尚书台组织之庞大和职掌之广泛，实为中央政府之缩影。

古代人物图光武帝除以尚书台为政治司令塔发号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严格。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国）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他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原无固定治所。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亦设司隶校尉，督察中央直辖区。东汉州刺史的权力，远比西汉时为大，除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叛乱，光武帝在完成解除开国功臣的兵权后，又进一步削夺地方的军权。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⑤，同时废除每年八月各郡国集兵演武的都试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为西汉旧制。东汉裁撤各郡国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汉的太守，亦称"郡将"。翌年三月，又下诏解散地方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军中临时服役官员），令还复民伍"⑥。在削弱地方武装的同时，又扩大禁卫军的编制，原来的正卒和戍卒，都改为由中央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担

任。东汉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职业军队的地位，也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减轻刑罚和整顿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诏书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悯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⑦五年又下诏说：“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⑧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曾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

光武即帝位后，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选贤任能和奖廉斥暴。如擢王莽时密（今河南密县东南）令卓茂为太傅，名儒伏湛为大司徒。任用杜诗为南阳太守，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视事七年，政化大行”⑨。卫飒为桂阳太守，“役省劳息，古代风景画奸吏杜绝”⑩。任延为武威太守，到官之后，查明将兵长史田绀纵容子弟，横暴乡里，任延拘捕田绀，诛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内，吏民累息（因恐惧而呼吸急促）”。光武帝还重用不畏强权的董宣为洛阳令。时刘秀姊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时，于路上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落公主过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车，处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状，董宣据理力辩，刘秀不但未加罪责，反而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美名，并赐钱三十万。因而史称光武时期“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坷谓清矣”。

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对于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武帝时制定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仅保留食邑特权而已。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因此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或对抗中央之事。

王莽时期，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刘秀登基后，面对的是经济残破、户口大减的情况，并且震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罪”。四年之后，又针对王莽时期不合西汉旧法而将吏人没人为奴婢的情况，下诏一律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平定东部地区，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此后在平定陇蜀过程中，又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诏令释放益、凉二州奴婢，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冉讼”在官者，一切免为庶人。此外，光武帝还在建武十一年（35）一连三次下令，规定“其杀害奴婢，不得减罪”，“敢炙灼奴婢，论如律”，“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以上一系列诏令的实行，使大量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风景图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国家用度不足，曾实行什一之税。后因实行军士屯田，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为迅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特颁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即和西汉文景时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还下令各州县吏员减损到十置其一。光武帝统治后期，史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东汉初期的封建赋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

古代人物画像刘秀生长于民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于各地，颇知稼穑艰难，百姓疾苦，因而在即帝位后，能够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史书上说他召而不谒。光武不但不怪，反赐他帛四十匹。东海王良，在王莽篡汉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三年（27），征拜谏议大夫，后迁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还有一个与光武少年同游学的会稽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备车遣使聘请，一连去了三次，严光才来到洛阳。光武帝亲自到他的住处相见，请他出山相助，严光谦辞。光武帝再次请他人

宫，与他同床共卧，论道旧故，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征召，严光又不至，年八十，终老于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诏郡县赐给严光家属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对待士人的礼敬政策，受到当时人的欢迎，许多原来宣布不与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后来奔，为东汉王朝效力。

光武在即帝位后的三十四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以重建汉朝对全国的统治。赤眉、绿林起义的严重教训，豪强地主势力的严重威胁，使他在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改变中央古代风景画鉴赏权力结构，以加强皇权；注意整顿吏治，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减轻赋税，礼贤下士，崇尚节俭。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自光武中期以后于明帝之末，其间四十余年，既未发生过内战，亦无封建割据，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致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这与光武皇帝开创之功是不可分的。因此，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南宋诗人陈亮说：“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可谓允论。一常生活：身不穿重綵之衣，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37），他将异国贡献的千里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士。他不建造专为皇家游乐的苑林，不从事浪费人力物力的狩猎。他一向提倡薄葬，将作大匠窦融向他请示园陵广袤，光武帝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茅草）马……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临死前，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上行下效，在光武帝的带动和影响下，后宫妃嫔和东汉初期的一些臣僚，也多能做到生活俭朴，清廉自守。如在东汉建国初期，做过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宣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家中的粮食储存不超过一担。比宣秉稍后，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古代风景画鉴赏布被瓦器”，他的妻子还亲自到田间去曳柴，其清贫自守，可以概见。光武时期，著名的地方官会稽太守第五伦，虽身为二千石，然“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才留一

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东汉初期的政治，由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因而是比较清明的。

另外，光武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团结士人方面，也很有策略。建武二年（26），寇恂拜颍川太守，当时大将贾复任执金吾，驻在古代风景画汝南。贾复的部将因杀人被寇恂逮捕，戮之于市。贾复引以为耻，心怀不忿，对左右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自是寇恂常避让贾复。光武闻知，乃召见寇恂，时贾复亦在座。光武对二人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解也）之。”在光武帝的调解下，两人又“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王莽代汉之时，不少士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其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他礼贤下士，对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史称其“侧席幽人（即侧席而坐以待隐居之人），求之若不及”。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北海逢萌、太原周党，皆曾多次聘请来朝。逢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不肯就征。

注释①《后汉书》卷一上。

②《后汉书》卷四。

③《后汉书·贾夏列传》卷三。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

⑤《后汉书）卷第二八《百官》五。

⑥⑦⑧《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⑨《后汉书》卷三一《杜诗传》。

⑩《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后汉书》卷二八《冯衍列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后汉书）卷二七《宣秉、王良传》。

《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

《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宋陈亮《龙川文集》卷五《酌古论一》。

定谶纬为国宪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及其后继者为了巩固新政权，大力提倡谶（音衬）纬之学，并定为官方统治思想。

古代扇面所谓谶纬，即指谶记和纬书。“谶”是方士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所以也称“图谶”、“图书”。“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四库全书》说：“纬者，经之支流”，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学经典的书，也称纬书。实际上，谶纬都是汉代人假托天帝或孔子的名义，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编造的著作，其总的思想属于阴阳五行体系。它的内容很庞杂，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天文、历数、地理、文字，也有讲典章制度的，更多的则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颇便于人们穿凿附会地作出任意的解释。

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始于秦穆公一梦。据史书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曾于梦中会见天帝，天帝告以“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秦大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①。秦始皇时，燕人卢生人海求神仙，奏上“图书”，上写“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匈奴（胡人）将威胁秦王朝，因此派蒙恬发兵北伐匈奴，夺取河套之地。类似这样的谶语还有不少，如“今年祖龙死”，“始皇

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假天神之名发出的预言。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深重，图谶随之更加流行。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利用谶书，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②。刘向奏忠可假借鬼神罔上惑众，汉成帝把忠可下狱治罪，最后死于狱中。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年达到全盛时代。王莽辅政之后，各地纷纷呈报祥瑞，仅平帝在位的五年间就出现了七百多件，接着，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县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石上丹书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竟因此做了假皇帝。但王莽并不以此为满足，后来又利用梓潼（今四川广汉）人哀章所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指刘邦）传予黄帝（指王莽）金策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③的符命，终于登上真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新”，改正朔，服色配德尚黄。王莽建立新朝后，将上述这些谶文编录为“符命”四十二篇，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宣传解说，证明王莽代汉完全是上天的意旨。

到了新朝末年，刘秀又利用图谶起兵造反。当时，南阳一带饥荒严重，民不聊生，宛人李通乃以“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劝说刘秀起兵。当刘秀在河北立稳脚跟，并向中原推进时，他早年在长安的同学强华送来“河图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④刘秀的部属大造舆论，说这是“受命之符”，应了火德之运，劝刘秀称帝。其后于建武元年（25），刘秀终于利用谶记在古代人物画像部做了皇帝。此外，还有和刘秀同时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也找寻许多天帝允许他应当做皇帝的谶语，准备在成都称帝。

当时，谶语虽然极其盛行，但直至古文经出现之前，还未形成有系统的文献。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把这些天帝的言语编辑起来，而命之曰纬书。

谶语只是构成纬书资料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浩如烟海的传说与神话。编辑纬书的目的，主要地是要从侧面宣扬孔子的儒家学说，以达到吹捧利用儒家学说的汉朝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光武帝在即位后，酷好纬书，虽头昏目眩，仍不忍释手。当时他的臣下，有人竟因谶纬的偶合，被提升官职。

例如有一个做野王（今河南沁阳）令的王梁，因为《赤伏符》上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刘秀认为玄武是北方水神，司空是水土之官，于是擢升王梁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⑤。也有人妄改纬书，希图幸进，例如建武二年（26），光武帝命尹敏校对纬书，并指示他把那些吹捧王莽的图谶全都删除。尹敏对刘秀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词，恐疑误后生。”光武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尹敏见有机可乘，便利用谶书阙文添上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即是说尹敏（“君”字去掉口为“尹”字）应为汉王朝的辅弼之臣。光武帝觉得奇异，便召尹敏查问，尹敏回答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⑥光武帝虽不悦，但并未治尹敏之罪，只是终身未加升迁而已。

古代扇画光武帝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决断政事，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一次，光武下诏群臣会商修建灵台（天象台）处所，欲用图谶决断，他问桓谭有何意见?桓谭沉默良久，回答说：“臣不读谶”，并极言图谶不合经义。光武帝大怒，斥责桓谭“非圣无法”，即要将他问斩。桓谭在光武帝的淫威下，被迫叩头流血，直至刘秀气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然而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竟因此被贬外任，死在途中。桓谭“博学多通，偏习五经”⑦，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建武初年，经大司空宋弘推荐，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是时，光武帝正在迷信图谶，每以谶记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批评谶记之虚妄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建议光武帝：“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⑧光武帝对于桓谭的议论，本已感到不快，这次桓谭在建灵台的廷议中又直言不讳地“极言谶之非经”，更加激怒光武帝，以致必要加之以死罪。桓谭的遭遇表明，在光武看来，非谶即非法，谶纬神学已成为东汉初年官方的统治思想。

还有一次，光武帝问太中大夫郑兴郊祀之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回答说：“臣不为谶。”光武大怒，反问之曰：“卿不为谶，非之邪?”⑨显然把不学谶与反谶联系在一起，给郑兴加上一个非圣非法的罪名。郑兴惶恐万状，当即谦辞解释说：“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⑩表示自己对于谶书有所未学，而不敢反对，这才幸免于难。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当政时，曾携门人从刘歆讲

正左氏大义，与当时另一名儒贾逵并称“郑贾之学”。郑兴每言政事，则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而因为他“不善谶”，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当时，图谶已成为仕途显达的决定因素。

古代人物画像光武帝不仅用谶纬决定政事，当时的一些礼仪制度和礼仪盛典，也无不以谶记纬书为根据。光武帝晚年，大司空张纯、博士桓荣等人，曾根据《七经谶》、《明堂图》等纬书，请立辟雍（古太学及祭祀之所）及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光武帝准奏施行。张纯又请封禅泰山，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中元元年（56），光武帝东巡岱宗，登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后又禅于梁父，祭祀地神于梁阴，命张纯以视（比也）御史大夫随从。是年十一月，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谶纬神学的统治地位，从此谶纬迷信风行全国。章帝时，举行汉宫白虎观会议，使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在皇帝的亲临主持下，最后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亦称《白虎议奏》）——一部集儒学与谶纬于一体的神学化国典。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一层神学的云雾。

注释①《史记》卷一三《赵世家》。

②《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④《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⑤《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

⑥《后汉书》卷七九《尹敏传》上。

⑦⑧《后汉书》卷二八《桓谭传》上。

⑨⑩《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第二十一章

班超经略西域继匝西汉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东汉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大探险家班超。

古代山水画鉴赏班超（32—102），字仲升，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其父班彪、兄班固，都是东汉著名史学家，其妹班昭，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班超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颇受其父兄影响，史称其“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①，而且博览群书，很有口辫。班彪死后，班氏家境中衰，生活十分清昔。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班超与老母随至洛阳。因为家境贫困，班超不得不受雇官府，抄书取酬，供养老母。这与班超志在四方的报国大志很不协调。一日，班超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问乎?”②同事们都笑他说大话。班超感慨地说：“平庸的人怎能了解壮士的抱负呢?”

古代风景画永平十六年（73），东汉政府为了恢复丝路交通，命窦固领兵出击匈奴，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代理司马，较低级武官）。在攻打伊吾庐（今新疆哈密西），大战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的战斗中，班超机智勇敢，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深为窦固所器重。为了联络西域各国，孤立匈奴，重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政治关系，窦固决定派班超出使西域。这对班超来说，正是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

班超率领从事（辅佐文官）郭恂等三十六人首先来到鄯善。鄯善原名楼兰，在塔里木盆地的东端，西域南北两道的必经之路。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曾出使楼兰，用计智杀倒向匈奴的楼兰王安归，改名鄯善，恢复了一度中断了的丝路交通。此次班超肩负着与当年傅介子同样的使命，来到鄯善。当时鄯善王广由于汉朝大军新破匈奴，失去依靠，所以对待汉使“礼敬甚备”。但数日后，匈奴的使节来到，鄯善有了匈奴做靠山，所以对班超的礼敬忽然疏懈。班超察知其情，乃悉召其吏士三十六人，饮酒高会，从而激励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

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指匈奴）使才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吏士异口同声答道：“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当机立断，朗声地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古代人物画像胆，功成事立矣。”③入夜，班超带领吏士奔向匈奴使者驻地，适值大风骤起。班超命十名吏士携鼓隐藏在匈奴营舍之后，并约定，以火为号，看见火光，立即鸣鼓大呼。其余吏士皆持兵器，埋伏在匈奴营门两侧。部署完毕，班超乃顺风纵火，喊杀之声大起。匈奴人惊慌不知所措，到处乱窜，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吏士斩杀匈奴使者及随从三十多人，其余的一百余人全部被烧死。明日，班超约见鄯善王广，向他出示匈奴使者首级，鄯善举国震怖。班超好言抚慰，宣传汉德，鄯善王表示愿意与匈奴断绝关系，归附汉朝，并遣其子入汉为质。

窦固将班超的功绩上报朝廷，并请求朝廷复选干员出使西域。明帝对班超的才能十分赞赏，立即诏令窦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④班超遂复任使臣。行前，窦固打算给他多派些人马，班超辞谢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意外），多益为累。”⑤窦固同意了他的请求。

班超此次出使，首先来到于阗（今新疆和阗县）。其时，于阗王广德新破莎车（今新疆莎车），雄据南道，势力方盛，而北匈奴又派有使臣监护其国。因此，广德对于班超等人的态度很是简慢。于阗人还有迷信巫人的习俗。巫师闻汉使至，竟对于阗王说：“神已发怒，责问何散欲向汉?汉使有匹马（guǎ瓜，黑咀的黄马），赶快取来祭祀我。”广德不敢有违，乃派使者至班超处求取马。班超对此情况早已侦知，当即佯允，但要求巫师亲自前来取马。巫人不知是计，有顷，欣然而至，班超当即斩杀巫首送给广德，从而质责广德对汉使不敬、对汉廷不诚之罪。广德早已闻知班超在鄯善诛灭匈奴使团的壮举，今见班超发怒，大为惶恐，立即派人攻杀匈奴监护使者，诚心附汉。班超重赏广德及其所属官员，并加安抚，由此班超威镇于阗。

永平十七年（74）春，班超来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先时龟兹（qiūcí丘慈，今新疆库车）王建为匈奴所立，他依仗匈奴势力，控制北

道，攻破疏勒，杀死其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故当时的疏勒，直接为龟兹王的属国，而间接受制于匈奴。班超在到达疏勒前，在距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处暂驻，派从官田虑先去招降。行前，班超指示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⑥田虑到后，兜题见其人少力弱，毫无归降之意。田虑乘其无备，突然劫持兜题，左右惊慌奔走。田虑将情况派人飞报班超，班超立即赶到架橐城，悉召疏勒将吏，当众揭露龟兹王倒行逆施的种种暴行，并求得疏勒故王古代山水画兄子榆勒，更名为忠，立为疏勒新王。疏勒举国欢腾。榆勒及其官属皆请处死兜题，班超为树立汉朝声威，释兜题遣归龟兹。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西域自与汉断绝六十五载之后，至是复通，于是汉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田车师后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县西北）；关宠为己校尉，屯田车师前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屯田士兵各数百人。

永平十八年（75）春，北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两万名骑兵，反攻车师后部。七月，又围耿恭于疏勒城⑦。八月，明帝死，皇太子嗣位，是谓肃宗章皇帝。冬，焉耆、龟兹乘机围关宠于柳中城。车师复叛汉廷，伙同匈奴共攻耿恭于疏勒城。耿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最后仅剩数十人，仍厉众坚守。汉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调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七千余人，星夜驰援。终因道路遥远，未能遽至。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也趁机屡发兵攻疏勒。当时班超拒守架橐城，势孤力单，只能与疏勒王忠相呼应，拒守一年有余。章帝以陈睦新没，班超力单不能自立，乃悉罢西域都护校尉官，同时下诏征召班超回国。

古代风景画东汉的势力从塔里木盆地撤退，给西域南道诸国，造成很大的恐怖和压力。因为东汉军队一旦撤退，匈奴必然卷土重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报复。班超将要启程，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弁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⑧说罢，竟引刀自刭。班超自疏勒还至于闻，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抱住班超马脚，曰："依汉使为父母，诚不可去!"班超见此情景，知道于阗将不肯放其东归，自己也因壮志未酬，决定暂不回国，与所率三十六人又折返疏勒。在此期间，疏勒有两城复

降龟兹，并与尉头（约在今新疆阿合奇县一带）连兵，企图颠覆班超所建立的疏古代人物画像勒政府。班超回到疏勒后，采取果断措施，勒兵击杀疏勒的反叛者，又击破尉头，诛杀六百余人，使疏勒的局势重新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78），班超率疏勒、康居（在今巴尔克什湖和成海之间）、于阗、拘弥（在今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东）等国士兵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斩首七万级。班超欲乘胜平定西域诸国，遂上疏章帝，大意说：西域诸国大多数倾向汉朝，只有焉耆、龟兹未服，若能集中各国兵力攻破龟兹，派数百名骑兵护送龟兹侍子向霸回国为王，便可稳定西域，断匈奴右臂，“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⑨。章帝览奏，知其功可成，遂于建初五年（80）以徐干为假司马，率领驰刑（缓刑）及义从（志愿兵）一千人往助班超。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再复出，遂降附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叛汉。恰巧徐干率兵及时赶到，班超遂与徐干共破番辰，斩首千余级，俘虏甚众。班超既破番辰，又欲连络天山以北之乌孙，进攻龟兹，以牵制匈奴。他上书章帝曰：“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⑩章帝采纳其建议，遣使与乌孙通好。建初八年（83），章帝派班超为将兵长史（大将军置长史、司马；其不置将军而长史特将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臣归国。李邑到达于阗，正值龟兹进攻疏勒，惧不敢前，反而上书陈奏西域难平，并极力诋毁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章帝深知班超忠心，乃切责李邑：“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因令其到班超处接受节度，同时诏令班超说，如果李邑到达班超处报到，便留与从事。班超不但没有留难他，反而派李邑监护乌孙侍子回到京师。徐干很不理解，问班超为何这样处理?班超回答说：“内省不疚，何恤人言。”为了国家，班超心底竟是如此之宽广!

元和元年（84），东汉政府再派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统兵八百增援班超。至此，班超所属汉军前后共有一千八百人，于是他以这些人马为基本力量，同时凭借西域诸国之兵，信心百倍地展开经略西域的英雄事业。班超首先发疏勒、于阗两国的军队，从东西两面夹攻莎车。莎车自

知不敌，乃一面以珍宝贿赂王忠，要其从内部反叛，西保乌即城；一面求援于龟兹。当班超出兵以后，疏勒果然叛汉而从莎车。班超于是改立疏勒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数征发疏勒的亲汉吏民，全力攻忠。由于康居出兵援忠，半年未能攻下。班超又施展外交攻势，联合与康居结姻的月氏，厚赠锦帛，令其晓示康居王罢兵，并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班超。

章和元年（87），班超征发于阗等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共五万人前往救援。班超召集将校及于阗王商议决定："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时班超为将兵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等待）夜鼓声而发。"然后故意放松对所获俘虏的监视，令其得便逃走，还报军情。龟兹工闻讯大喜，亲率一万名骑兵驰至西界，阻遏班超。温宿王率八千骑兵于东界，邀截于阗兵。班超得悉二虏已出，遂密召诸部部置兵马，于鸡鸣时赶至莎车营。胡虏毫无准备，惊乱奔走，班超乘势追杀，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温宿等亦各退散。班超由此威震西域，远近慑服。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古代人物画像正当东汉政府在西域进行活动时，月氏族亦欲染指塔里木盆地。永元二年（90）五月，大月氏遣其副王谢统兵七万，向班超进攻。当时班超兵力甚少，部属都感到惶恐不安，班超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他晓喻军士们说："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言运输粮草困难），何足忧邪!但当收兵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事态的发展果如班超所料。月氏副王谢驱兵进攻班超，不胜，纵兵抄掠，又一无所得。班超估计敌军军粮将尽，必定派人向龟兹求援，于是派兵数百于东界邀截。谢果然派出骑兵携带金银珠玉往赂龟兹。班超伏兵截击，将其尽行消灭。班超派人持月氏使者首级以示谢，谢大惊恐，因即遣使向班超请罪，乞求生还。班超释其西归。月氏由是大震，向东汉岁奉贡献，以示臣服。

古代山水画永元三年（91），在班超的威名震慑下，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是年底，东汉政府复暨两域都护、骑都尉、戊已校尉官。以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护送其回国。班超与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同时派姚光

将尤利多送至洛阳。班超驻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其时西域只有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尉犁（今新疆库尔勒）尚怀二心，其余悉定。

永元六年（94）秋七月，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共七万余人，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大军到达尉犁界，班超派使者晓喻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谓其首领）来迎，当赏赐王侯以下，事毕即还。今赐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携带牛酒来迎班超。班超质问鞬支说"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班超部下有人建议班超杀掉北鞬支。班超以为不可，说："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依例赏赐鞬支，遣其归去。焉耆王广遂与其酋豪带上珍宝至尉犁来迎接班超。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因戒惧，不欲令汉军进入其国，乃拆除苇桥，断绝交通。班超指挥部队从别路涉深水而渡。七月末，班超进人焉耆，古代风景画鉴赏在距城二十里的大泽之中扎下营寨。广得到报告，大为惊恐，准备将其部众尽数驱入山中以自保。焉耆左侯元孟以前曾入质洛阳，与汉有旧，因派人将此事密告班超。班超当即斩杀来人，示不信用。然后与诸国王约定会期，扬言要对与会者重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凡及北鞬支等三十人如期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逃至海上，危须王也未到会。广等坐定，班超怒斥广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为什么）逃亡?"说罢，即下令吏士捉拿广、凡等斩首于陈睦故城。然后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俘虏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古代风景画鉴赏宣布改立元孟为焉耆王。班超本人留驻焉耆城内半岁，对焉耆百姓善加抚慰。于是西域大小五十余国全部摆脱匈奴控制，纳质归附，再度隶属于东汉统治之下。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帝下诏表彰其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

班超征服了西域，使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今罗马）。甘英一行曾经到达条支（今伊拉克）的西海（波斯湾）岸。本想渡海赴罗马，据说为安息（今伊朗）西界船人所阻，由波斯湾头折回。甘英是我国有史

以来出现于波斯湾的第一人。

班超“壮年竭忠孝于沙漠”，到了晚年，思念故土的感情与日俱增。永元十二年，他上奏和帝，请求准许他还归故土。疏中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情词恳切，感人肺腑。朝廷接到班超奏疏，不知何故，很长时间未能回报。班超胞妹班昭（即曹大家，因嫁扶风曹寿，博学高才，和帝数召人宫，令皇后诸贵人以师事之，号曰大家）亦上书和帝，代兄复请，大意谓：班超在沙漠至今三十年，骨肉分离，不复相识。班超年近七十，衰老多病，旦暮人地；发有猝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捐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已超余年。情真意切，委婉动人。和帝览奏，很受感动，下诏征班超回汉。班超奉诏于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班超素有胸胥疾，回洛阳后病情加重，医治无效，同年九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

班超为了开通西域南北道，远在绝域艰苦奋斗了三十年，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奴役，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此，著名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班超为我国历史的发展和统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追思。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⑦按此疏勒城在今喀什噶尔，不是塔斯马干沙漠西端的疏勒。

⑧《资治通鉴》卷四六，东汉章帝建初元年。

⑨⑩《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两匈奴叛服王莽天凤五年（18），匈奴乌累单于咸死后，其弟左贤王舆继位，是谓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由于王莽的倒行逆施，破坏了汉匈的友好关系，也促成了其自身的灭亡。更始政权建立，刘玄遣中郎将归德侯刘飒、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要求恢复传统的友好往来。单于舆骄傲语使者：“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

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①态度极其强硬。

从此匈奴内部反汉的敌对势力抬头，汉匈关系再趋紧张。

东汉建立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之机，扶植割据势力，分裂汉朝。建武元年（25），据有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县东）的卢芳，自立为上将军、西平王，派使者与西羌、匈奴相勾结，匈奴单于舆乃使句林王率数千骑兵迎接卢芳兄弟入匈奴，并且立卢芳为“汉帝”，以芳弟卢程为中郎将，率领匈奴骑兵回到安定，以为声援。

不仅如此，匈奴单于还派使者与起兵边郡的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等和亲，笼络他们支持卢芳回内地称帝，企图通过这位“汉帝”，变中原为匈奴的属地。建武五年（29）十二月，李兴等人引兵至单于庭迎接卢芳人塞，并在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建立傀儡政权，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五郡，分置守、令。卢芳与匈奴连兵攻掠东汉北部边郡，人民不堪其苦。

当时东汉政府初建，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刘秀正忙于进行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北部边事，对匈奴的侵扰，只能加强边塞，采取防御政策。

古代风景画鉴赏建武六年（30），刘秀始先后派刘飒、韩统出使匈奴，并馈赠大量金币，企图重修旧好。然而单于态度倨傲，对汉使词语狂悖，对汉边境侵掠如故。建武九年（33），刘秀遣大司马吴汉指挥王常等四将军共五万余人出击卢芳。匈奴出兵救援，连战经年，汉军无功而还，匈奴气焰更加嚣张，侵掠有加无已。

东汉政府只得采取守势，以朱祜屯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王常屯涿郡（今河北涿县），侯进屯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王霸为上谷太守，以防匈奴的进扰。建武十五年（39），匈奴攻掠日甚，州郡无法抵御。刘秀遣吴汉率马成、马武等北击匈奴，徙雁门（今山西朔县东南）、代郡（今山西阳高西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匈奴的杀掠。同时，在边地大筑亭候，修烽火，增沿边兵每郡数千人，以加强防守。

匈奴单于闻汉朝悬赏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意遣卢芳还降。卢芳派使请降，刘秀为使卢芳和辑匈奴，立其为代王。卢芳亦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怕暴露阴谋，也未敢明言真相，因而东汉政府未予赏赐。

匈奴单于恼羞成怒，更加怨恨，侵掠更加深入。建武二十年（44），匈奴两次攻掠上党（今山西长子）、扶风（今陕西兴平）、天水（今甘肃通渭西）一带。明年春，又与乌桓、鲜卑连兵攻掠北边，代郡以东受害尤深，“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②。是年冬，匈奴又侵扰上谷、中山（今河北定县）等地，“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③。

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单于舆死，其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内部因继位问题发生矛盾；加以匈奴国内连年蝗旱，赤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过半，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暂停军事攻掠，并遣使至渔阳请求和亲，以缓和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呼韩邪单于之孙、匈奴南边诸部首领日逐王比以不得立，心怀愤恨，乃密遣汉人郭衡携带匈奴地图，于建武二十三年面见东汉西河郡（治离石，今属山西）太守，请求归附。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单于，仍袭用呼韩邪名号，表示继承西汉末年汉匈的传统关系。

明年，日逐王比率领南边所属八部兵四五万人降汉。光武帝采纳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比的归降，令其“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④，并承认他为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汉匈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政府派中郎将段郴等出使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西部，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保护并指导督察，南单于遣子入侍。汉王朝赏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官员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及粮食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缯缲万匹，絮万斤。其年冬，南单于因与北匈奴交战失利，东汉政府决定将单于庭南迁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命“使匈奴中郎将”及西河长史派兵保护单于，并恢复沿边郡县，南单于亦列置诸部王，率领部众协助戍守，侦察北匈奴动静。

古代风景画南单于归附汉朝，北匈奴单于蒲奴甚为惶恐。先是归还以前所掠汉民以示善意；建武二十七年（51）又假意遣使至武威请求与汉和亲。东汉政府召集公卿廷议，众臣议论纷纭，未能作出决断。刘秀认为北匈奴的军事力量尚强，彻底消灭，还非其时，不如息民待时，以观其变。明年，北匈奴再次遣使进贡马匹及裘皮，乞求和亲，并请赐与音乐。光武帝交三公府商议酬答良策，司徒掾班彪建议用西汉宣帝时呼韩邪、郅支两单于的历史教育北单于蒲奴，指明“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叛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⑤。意思是，蒲奴单于必须真心归降，表里如一，如有二意，必将落得和郅支单于同样的下场。同时赐给布帛、弓矢、利剑等物作为酬答，但不派使者回访。所请乐器，因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功为务，暂不赐予。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意见。其后，北匈奴侵掠行径稍有收敛。

到了明帝时期，北匈奴的力量逐渐强盛，他们控制西域，经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匈奴的侵扰，答允与北匈奴“合市”。南匈奴一些叛者因汉与北匈奴交使，内怀嫌怨，秘密同北匈奴贵族勾结，准备共同反对东汉王朝。东汉政府于永平八年设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以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北匈奴虽遣使入贡，而仍多次在河西边郡大肆攻掠，“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⑥，边郡再度受到威胁。东汉王朝为确保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决定改变以防御为主的策略，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一永平十六年（73），明帝派窦固等率领汉军和南匈奴、羌胡等族士兵共四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匈奴。窦固、耿忠一路，出酒泉塞至天山（今新疆吐鲁番北），击败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守。其余三路，因匈奴闻风北逃，皆无功而还。次年，耿秉、窦固等率军一万四千骑，征服车师（今新疆奇台、吐鲁番等地），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

章帝继位后，北匈奴因饥乱，降南部者岁数千人，仅章和元年（87），即有屈兰储等五十八部，二十八万口来降。南匈奴和鲜卑、丁零等在汉王朝支持下，进袭北匈奴，也常古代出游图有虏获。北匈奴的力量日益削弱。章和二年（88），章帝死，和帝继位年幼，窦太后临朝

听政。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上书窦太后称：据北匈奴新降渠帅报告，北单于兄弟争立，部众离散，“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⑦。和帝永元元年（89），东汉政府以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领骑兵八千，与度辽营及南单于骑兵共三万人，从朔方出兵，分三路，出击匈奴，与北单于大战于稽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北匈奴败逃。汉军追击，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牲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北匈奴官兵陆续归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命中护军著名史学家班固撰写一篇铭文，刻石记功，宣称这次远征是上为高祖、文帝报仇雪耻，宣扬祖宗神灵，下为安国保嗣，开拓疆土，发展大汉声威。

第二年，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再次上书请求消灭北匈奴，于是派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骑兵八千人，在汉军军官将护下，远征北匈奴，乘夜围攻。北单于受创伤后率数十名轻骑兵逃脱，其阏氏及家属五人均被俘获，斩北匈奴官兵八千人，俘虏数千口而还。

永元三年（91），窦宪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俘获北单于母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⑧。汉军出塞五千余里而还，是北征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经过这次打击，北单于率余众退出漠北，西走康居（在前苏联乌兹别克一带），其后又入欧洲，汉朝边郡不再受匈奴的骚扰。

注释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②《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五郡：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郡。

③《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④《资治通鉴》汉光武帝二十三年。

⑤《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

⑥⑦《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⑧《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诸羌叛服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治允吾，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等郡，与汉人杂处。汉羌人民习俗既异，言语亦互不相通，古代铜器羌人“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①，因而时常聚众反抗。东汉初年，光武帝为安抚羌人，采纳司徒掾班彪建议，恢复设立护羌校尉，以牛邯主领其事，持节监护，理其怨结，但羌人犯塞并未停止。建武十年至十二年，先零羌豪曾与诸种联合，再度进犯金城、陇西、临洮一带，光武帝先后派中郎将来歙、陇西太守马援率兵击破。马援将归服的羌人，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分散治理，陇右保持相对平静。明帝继位后，对羌人采取软硬兼施策略，攻战稍稍缓和。从章帝建初二年（78）至和帝永元十三年（101），这二十多年时间，汉羌战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对烧当羌迷吾、迷唐父子的征伐，连年动众，干戈不息，耗费甚巨。羌首迷吾虽为汉陇西太守张纡定计毒杀，然汉朝郡守代领护羌校尉者或被杀，或征战无功，以致不得不频频易人。章帝时，张掖太守代护羌校尉邓训由于实施威抚并用，以赏赂离间诸种的策略，甚得其效，以致迷唐叔父号吾亦率其种人来降，使迷唐被迫远徙，部属离散。经过长期战争，众多羌人因战败而降服，但遭到地方官吏豪右所奴役，因而积怨为仇。东汉中期以后，羌人的反抗比以前更加激烈。

羌人第一次大规模反汉始于安帝永初元年（107）。是年六月，东汉政府派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接应西域都护段禧及屯田吏卒东归，期限紧迫，官吏苛暴。群羌担心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即纷纷逃散。诸郡各发兵邀截，官兵乘机骚扰，甚至毁坏羌人村落。羌人奋起反抗，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阻断陇道，大肆抄掠。他们没有兵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可能是利用铜镜的闪光来吓唬敌人），②郡县官兵畏懦，在羌人进攻面前，竟然束手无策。永初二年（115）春，东汉王朝诏令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领中央及诸郡兵五万人前去征讨。邓骘进至汉阳（今甘肃甘谷），诸郡兵尚未到达，就被钟羌数千人击败，死亡千余人。是年冬，任尚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今甘肃通渭

西），又被打得大败，死亡八千余人。羌人气势大盛，朝廷无可奈何。滇零于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自称天子，并联合武都、上郡、西河诸种羌人，“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掠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③。在此情况下，东汉王朝不得不召邓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节度诸军。

东汉军队既临阵忘战，缺乏战斗力，而地方二千石、令、长又多为内郡籍，他们无心战守，纷纷要求朝廷迁徙郡县以避战祸，邓骘也主张放弃凉州。永初五年（111），东汉政府正式下令将陇西、安古代风景画定、北地、上郡太守治所迁徙至内地。然而，百姓眷恋故土，不愿离开家园，东汉官府于是派兵抢割庄稼，拆毁民屋，夷平营垒，破坏积聚，强迫驱赶边民上路。当时正值连年旱蝗饥荒，百姓转徙离散，老弱弃置道旁，沿途死亡及幸存沦为奴婢者，已超过半数。东汉政府的残暴和无能迫使汉、羌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同年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人通谋，共同起兵反对东汉政府。他们占领上邦（今甘肃天水）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东汉军队无法取胜，不惜以高官厚禄悬赏购求杜琦首级，汉阳太守赵博收买刺客暗杀杜琦，其后王信兵败被杀。杜季贡被羌族首领推为将军，继续联合战斗。元初二年（115），汉阳太守庞参古代风景画鉴赏率羌胡兵七千余人，北击零昌，行至天水郡，为杜季贡所败，庞参因而被免职。朝廷派任尚为中郎将，率羽林、缇骑、五营子弟（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属部队）千五百人，屯驻三辅，讨伐杜季贡。任尚采纳属下虞诩建议，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组成轻骑部队，抄击杜季贡于丁奚城（属北地郡，在今宁夏灵武东南），斩杀四百余人，获牛马羊数千头。元初四年（117），任尚先后收买羌人刺杀杜季贡和零昌。其后，任尚又率诸郡兵与骑都尉马贤共击北地郡羌人狼莫。马贤为狼莫所败，任尚率军赶到，合兵俱进，狼莫等引退，汉军追至北地，双方相持六十余日，后在富平河上一战，汉军大败羌人，斩首五千级，狼莫逃走。明年冬十月，度辽将军邓遵收买羌人刺杀狼莫。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一带“羌患”得到肃清。然而，东汉政府在同羌人十余年的战争中，“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④。东汉王朝的统治也因此日益衰落，以致最后走向崩

溃。

羌人第二次大规模反抗始于顺帝永和五年（140）。永和四年（139），东汉政府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由于二人天性刻虐，对百姓残暴骚扰，五年夏，湟水地区且冻、傅难种羌起而反抗。他们围攻金城，与杂种羌胡进攻三辅，杀害地方长吏。东汉政府慌忙调集大军，进行征讨。顺帝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驻屯汉阳，并于关陇地区修建坞壁（防御工事）三百所，屯兵防守。马贤到任后，并未乘羌人未集发动进攻，反而处处留滞，贻误战机，结果在北地郡射姑山被羌人打得大败，马贤及其二子皆战死，东西部羌人遂大会师，进攻陇西、三辅，焚烧陵园，杀掠吏民。顺帝诏武都太守赵冲督河西四郡兵马为节度，抵御羌人进犯。数年间，赵冲与羌人交战，多所斩获，羌人力量由是衰耗。然而赵冲在追击叛逃降胡中，为羌伏兵所围，在战斗中牺牲。

冲帝永嘉元年（145），左冯翊梁并改变策略，以恩信招诱羌人，于是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皆来归降，陇右局势才得重新平静。自永和年间至此，西羌叛乱积年，东汉政府消耗军费八十余亿，然而由于将吏“上下放纵，不恤军事”，虽然花费大量费用，而“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⑤。

桓帝时，又爆发了西羌第三次大规模反抗斗争。延熹四年（161），零吾羌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进犯并、凉及三辅。代护羌校尉胡闳不晓军事，对羌人进攻束手无策，使羌人更加嚣张，转相招结，进攻诸郡，历年不能平息。泰山太守皇甫规上疏请命，愿去三辅平定羌祸，朝中三公亦交相举荐，于是桓帝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督关西兵讨伐零吾等羌。皇甫规素悉羌事，他在赴任前曾上疏桓帝，指出羌人所以反叛，皆由郡守不遵法度，对羌人不知绥抚所致。因此，他到任后，首先向皇帝条奏那些贪污狼藉的地方长官和多杀降羌的军官凡百余人，或免或诛。羌人仰慕皇甫规的威信，闻讯后相劝降者十余万人。

古代风风画皇甫规平服羌患，理应得到朝廷封赏，然而由于他“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⑥，于是他们内外串通，反诬皇甫规收买

群羌，使其文降（以文簿虚降）。桓帝听信谗言，连下玺书相责。皇甫规上疏申辩说："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⑦然而，在当时朝政腐败、宦官当权情况下，又有何是非可言?皇甫规不但未能得到封赏，反而以"余寇不绝"的罪名，被投入狱中。幸而得到一部分正直官员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为他诣阙申冤，才被赦免回家。此后羌人反抗活动仍不断发生。

延熹六年（163），皇甫规被朝廷起用为度辽将军。到营数月后，他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认为张奂才略兼优，宜为元帅，自己甘愿作张奂的副手。张奂于桓帝永寿元年（155）任安定属国都尉，曾以二百余人，招诱东羌，击破南匈奴的进犯，使地方得到安宁。羌豪感谢他的恩德，赠予二十匹马，先零羌酋豪还赠其金镰（金器）八件。张奂召主簿在诸羌面前，当众宣布："使马如羊（即使马匹像羊那样多），不以人厩；使金如粟，不以人怀，"⑧然后将马及金鐻全部退还给羌人。在张奂以前有八任都尉俱是贪财好货之辈，羌人深受其害，因而对张奂的廉洁清正，非常敬佩。后来张奂又在武威太守任上，实施平均徭赋，革除陋俗，百姓生为立祠。于是，朝廷在皇甫规的建议下，改任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在他们任职期间，由于措施得当，边境比较平静。但是由于朝政腐败，羌人反抗活动仍然时起时伏。

延熹六年（163），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又大举进犯武威、张掖、酒泉等郡，"凉州几亡"。东汉政府任命段脉颎（音炯）为护羌校尉，前去征讨。段颎性情轻狂刚猛，他反对皇甫规、张奂恩威并用的策略，主张采用军事手段，镇压羌人的反抗。数年之间，他攻打西羌，共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牲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西羌予以弭定。

西羌虽平，而东羌先零等种既降复叛。桓帝向段颎征询对策。段颎回答说："臣以为（东羌）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自刃加颈耳。"⑨他提出："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辆，三冬二夏，足以破定。"⑩他的这一斩尽杀绝的主张，竟为桓帝所采纳。从建宁元年（168）春至建宁二年（169）的两年间，段颎先后与羌人作战一百八十次，斩杀羌人三万八千六百余人，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用去军费四十四亿，汉军官兵死者四百余

人。经过这一残酷镇压，东羌暂时被平定。但十多年后黄巾起义爆发，羌人又群起响应，加入汉族人民起义的洪流，终于促使东汉王朝走向灭亡。

从安帝永初元年（107）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六十余年间，东汉在西北边郡经常屯驻军队达二十万人，军饷耗费四百万万。在征战中，东汉政府调发大批州郡农民充军，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在羌人的反抗斗争中，羌人贵族分子和东汉军队照样烧杀掠抢，他们不但摧残了羌人，同时也使边郡汉人迁徙流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注释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⑥⑦《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

⑧《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

⑨⑩《后汉书》卷六五《段颍传》。

王充撰《论衡》

正当经学昌盛、谶纬迷信流行之时，东汉初期一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逆风而出，公开地向儒家哲学和谶纬迷信展开了挑战。

古代风景画鉴赏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生于建武三年（27），死于和帝永元（89—105）年间。他出身“细族孤门”，自幼生长在一个政治、经济上并无地位的寒庶之家。从曾祖父起，他家因打抱不平，与豪门之家结下怨仇，被迫多次易地而居。这些对王充的思想性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充六岁时开始读书，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中有学童百余人，皆因有过失或书写不佳，受过师长责罚，王充却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他的学习一天天进步，据说他从老师学《论语》、《尚书》，一天就能背诵千余字。稍长，至京师洛阳太学受业，师事当时大儒班彪。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因家境贫寒，无力购书，常到洛阳书肆中去阅览出售之书，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家乡，先后做过短期县、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出身寒微，思想见解又与当时统治者相左，被迫去职。王充感到他与仕途无缘，就一面居家教授，一面

专心著述。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先后著有《大儒》、《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书，大多是针对当时思想界的问题而发。现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

《论衡》是一部富有战斗精神的哲学巨著，历来著录为八十五篇，今传世各本，《招致》一篇，均有目无文，实存仅八十四篇。据《后汉书》王充本传记载：“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针对有人批评其书“文重”时亦云：“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是《论衡》原书，当在百篇以上，今所存者，可能已非全书。书名《论衡》，王充解释说：“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①即是说，要实事求是地衡量言论之得失与真伪，绝非调弄笔墨，以示殊异。

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据其自称：“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②他所谓虚妄之言，当然是指古文经中的伪书和所有的谶纬之书。董仲舒散布的神学谶纬认为，万物相争的胜负都是由五行相生相克决定的。王充举出很多明显事例，指出神学谶纬的荒谬虚妄，并说明万物相争的胜负存亡是由其自身条件所决定。他说：“夫物之相生，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③谶纬中说孔子是黑龙之子，刘邦是赤龙之子，圣人、皇帝之所以为圣人、皇帝，即因他们不是人种而是龙种。王充非之曰：“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④东汉初期，天命之说高唱人云。王充依据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儒家“天人感应”说是虚妄的。因为“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⑤。在《自然篇》中，王充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⑥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天真能用灾异谴告人君，天也必然能任命圣君，选择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委以王事又何必“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⑦。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

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⑧揭露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目的。

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王充反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鬼神迷信活动，提出了系统的无神论。王充首先论证了人死不为鬼。他指出精神依存于形体，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⑨据此道理，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绝，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灭而成灰土，何用为鬼?”⑩王充还从物质灭化的不可逆性，论定人死不能为鬼。他用火灭不能复燃来证明这一点。他说：“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惠，二者宜同一实。”他还用元气自然论论证人死不为鬼。他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古代风景画鉴赏气。”“人之所以聪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气也；五常之气所以在人者，以五藏（脏）在形中也。五藏不伤，则人智惠；五藏有病，则人荒忽……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智之精?”古代鬼神迷信的要害是主张形亡可以神存，王充批判说：“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王充认为，“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在忧惧，忧惧见鬼出”。他指出鬼神乃人精神之幻觉，并非真有其物。

从无鬼论出发，王充反对厚葬，提倡薄葬。他说：“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商代大臣，善占卜），良如扁鹊（春秋名医），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此外，王充还反对神学迷信的种种表现，如灾祥、祸福、星变、卜筮、宅术等等。

王充在批判神学谶纬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认为人认识事物，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同事物相接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他还指出，人才虽有高下，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⑩。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在《论衡·实知篇》中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他举出有关周公、晏婴、孔子、颜渊、孟子等古圣事迹的十六个历史例证，说明圣人不能先知，也必待学问而后知也。因此，他反对盲目迷信圣人，指责“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

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种把儒家哲学当作圣经的学习方法，不能弄清道理，提高认识。他还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他认为做学问的根本方法在于大胆提出疑问，同老师辩论是非，以“核道实义，证定是非”。“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为了证实他的见解，王充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举出许多例子，指出圣贤之言自相矛盾之处。在《论衡》的其他部分，还分别对墨子（《命义篇》）、韩非（《韩非篇》）、邹衍（《谈天篇》）等人进行了批判。在这些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古代山水画鉴赏王充还对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说：“俗好褒远称古，讲瑞则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睹奇于今，终不信然”。他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以汉朝与圣王辈出的周朝相比，认为周不如汉。他说：“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他强调汉王朝版图远比商、周辽阔，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古代戎狄已进化为汉之齐民，生活文化显著提高。他总结说：“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王充指出：“汉有实事，儒者不称”，这是由于“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当时，能够如此立说，确是振聋发聩之论。

王充从唯物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秩序，都依存于物质而不依存于符瑞。他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世俗每称五帝之时，凤凰来集，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王充则认为不尽如此，这可能是人们有意渲染夸大。他认为，果真如此，“方今圣世，尧舜之主，流布道化，仁圣之物，何为不生”?对神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不过，王充由于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有时把自己引为论据的一些自然现象理解错误，他无法透彻阐明唯物主义思想并将其应用到社会历史分析中去，更无法理解国家治乱安危、人们富贵贫贱的真实原因，只得归之于天命，因而陷入了宿命论的历史观。如他说：“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教，无能损益”。这与上述世乱的论断，是大相径庭的。他还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寿。他说：“贵贱贫富，命也……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何以才能知命?用之骨体，“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说明王充的唯物论，还有很大缺陷。

古代风风景鉴赏王充所著《论衡》，在儒家学说和谶纬玄学盛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禁止流行，直到东汉末年，才由著名学者蔡邕发现，带入中原，秘密藏于书库。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论衡》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至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刻书业的兴起，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论衡》才得以刻印，比较广泛地流传开来。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洪适校刊《论衡》于会稽，《论衡》一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直到今天，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一直闪烁着光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①②《论衡·对作篇》。

⑨《论衡·物势篇》。

④《论衡·奇怪篇》。

⑤⑥《论衡·谴告篇》。

⑦⑧《论衡·自然篇》。

⑨⑩《论衡·论死篇》。

《论衡·订鬼篇》。

《论衡·薄葬篇》。

《论衡·实知篇》。

《论衡·问孔篇》。

《论衡·宣汉篇》。

《论衡·齐世篇》。

《论衡·治期篇》。

《论衡·讲瑞篇》。

《论衡·治期篇》。

《论衡·骨相篇》。

第二十二章

班固修《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西汉《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学名著。

古代风景画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郡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本传》称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之父班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问），想续写武帝之后，于是收集史料，写成《史记后传》65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决定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不久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因而下狱，后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

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宫内贮藏图书之处），不久迁升为郎，奉命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汉书》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封燕然山铭》，即为班固所撰。后窦宪以失势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古代风景画鉴赏死于永元四年（92），年六十一岁。以后和帝又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同郡马续补写《天文志》，终于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分为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终于刘玄更始二年（24），共记载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对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西

汉历史，在史料来源上，多采自《史记》。但亦有所增补。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增加了《贤良策》、《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公孙弘传》增补了《贤良策》等文章。在韩信、楚元王、肖何、卫青、石庆及公孙弘等传中增加了一些史实。此外，还在《史记》材料的基础上，新立了一些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

梅花图武帝以后的史料则以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作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有关著述，作了大量订正，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班固还利用官府藏书，收集许多遗闻轶事，经过取舍剪裁，熔铸于书中，使《史记》缺漏的重要文献在《汉书》中得到补充。《后汉书》作者范晔肯定班固的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汉书》的体例也大体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如改“书”为“志”，废“世家”，将“世家”并人“列传”。

《汉书》的精华在“志”。其十篇“志”，比《史记》的八篇“书”，内容详备，规模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均为班固新创。《五行》与《刑法》分别记载古代自然变异和立法设刑的情况。《地理》则叙述从传说的“九州”到西汉的地理沿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风土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著作。《艺文》是综述各学科和学派的源流，记载西汉皇家藏书情况，是论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其他六志，如《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系统地记述了西周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是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料。《沟洫志》续补《史记·河渠书》，详记黄河变迁与治河对策，所载西汉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是极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律历志》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礼乐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十志在八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志书规模，后来“正史”的志，大体依十志稍作增减。唐宋时期，志书体得到大发展，出现了《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文献

专著。《汉书》十志的创始功绩不可泯灭。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任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吏的变迁情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自此以后，用纪传体编纂的断代史连续不断，遂形成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述罪戾。班氏史体最合古代文人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范文澜），《正史考略》）。而且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些编年体的断代史，如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就是将《汉书》的内容删略为编年体的史书。我国历史悠久，自东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料，都能相当丰富而没有间断地保存至今，是与历代都有断代史的编纂分不开的。班固开创了断代为史的方法，是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断代史也存在着割断历史联系的缺点，这一点，过去的史学家唐朝的刘知几和宋朝的郑樵都曾指出过。

《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古代风景画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杨雄等的文章皆人本传。在古代书籍流传不易，不集中在大著述中是不易保存的，多载文章，亦有必要，后人以此相讥，不得谓之公允。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缪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然，《汉书》较之

《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②，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③，是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巾义有特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列传。故晋朝傅玄在批评《汉书》时说“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事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④。《汉书》在思想方面比起司马迁的《史记》来，确是中庸、保守得多。

注释①《后汉书·班固传论》。

②《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③《汉书》卷一○○《叙传》下。

④《史通·书事》。

蔡伦改进造纸术关于造纸术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三国时文学家张揖及南朝史学家范晔为代表，认为东汉时，宦官蔡伦于公元蔡伦105年发明了纸。第二种意见是以唐代书画鉴赏家张怀瓘（音欢）及宋代一些著作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年即已有纸代简，至东汉蔡伦时所造之纸精工于前世，故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发掘实践证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其年代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他根据这一考古发现，认为在蔡伦之前一百五十多年已有纸。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古墓遗址出土一批文物，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

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专家鉴定该纸为早期麻纸。以后1973年，1978年，1979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内蒙、陕西、甘肃等地区发

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蔡伦前古纸，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的造纸术起源提前了二百年。

那么，这是否意味抹杀蔡伦的作用和贡献呢?否。蔡伦的作用在于：（一）他总结了前代和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和经验，组织生产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二）他倡导并主持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大了造纸原料。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但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技术革新者。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东汉明帝永平（58—75）末年，他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太监，章帝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①。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他做了中常侍后，尽心王事，十分勤恳。他也敢于直言进谏，“匡弼得失”，因而深得和帝信任。后来，他又被加任尚方令。尚方是皇宫内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器物。史书记载，蔡伦做尚方令后，经他鉴制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②。正是在他负责尚方工作时，对于造纸技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古代风景画鉴赏纸的发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后，客观上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较普遍的有泥板、树皮、羊皮、纸草、龟甲、牛骨、竹、木、缣帛等。在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又将文字刻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后来又有把字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用绳子一片片地串起来，叫做“策”（或叫“册”）；缣帛上写的文字，最后卷起来，成为一“卷”。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册”和“卷”的来历。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在缣帛上写字，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简和木简仍很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时，齐人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奏章，共用简三千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而且简携带起来也不方便，《庄子》中记载，战国时学者惠施出门，喜欢带上书，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从春秋战国开始，亦用帛来写字，叫“帛书”。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

古代风景画但是帛受生产的限制，不可多得，而且价格昂贵，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想到要寻找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纸，一般是指用植物纤维（麻、木材、竹、草等）做原料制成的。最初的造纸法是模仿漂絮法而产生的。东汉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有一个名叫曹伟能的女官生了一个男孩，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一种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蹶”（夕蹄）包裹着毒药，上面写着迫她自杀的字。“赫蹶”就是丝质的絮纸。

西汉时期，我国蚕丝业已很发达，妇女们把蚕茧煮了以后，再放到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成为丝绵。把丝绵起下之后，在席子上留有一层薄薄的纤维，把它剥下晒干，就成为一张丝绵纸。但是用蚕丝的纤维造纸，原料来源少，产量低，成本也高，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人们很需要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纸张来作为书写材料。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叠纸，共八十八片，因此，被称作“灞桥纸”。经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前140—前87）。其后，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又在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一张麻纸，发掘报告认为“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③。这应当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但是，西汉早期的植物纤维纸，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初级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发展，造纸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其后，在1942年和1959年，又先后在内蒙古额纳河和新疆民丰县各发现一张东汉纸；到了1974年，又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的质量比西汉纸有着明显的提高，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及在民间

了。可以说，东汉已经是造纸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了。事实证明，这些进步都是和蔡伦在造纸工艺上的“造意”分不开的。

蔡伦在主持各种御器的制造时，经常和工匠在一起，这样就使他有机会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同时，蔡伦善于诗、书，深知世间缺纸的困难。这些为他研究和总结造纸术提古代风景画鉴赏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蔡伦首先想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乃造意（立意，发明创造），用树膚、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④。从今天发现的东汉纸来检验，其工艺流程大体是：浸湿原料、切碎原料、厥水浸泡、蒸煮、舂捣、洗涤、打槽、抄纸、晒干、揭纸。蔡伦造出的纸，体轻质薄，价廉耐用，为人们所欢迎。元兴元年（105），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汉和帝，受到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由于蔡伦曾被封侯，后来人们就把他造的纸称为“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之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其所造麻纸，均匀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赵歧《三辅决录》引韦诞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指韦诞）墨，皆古法，”可见其纸质之优良。

安帝元初四年（117），“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竭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⑤。蔡伦奉旨后，每日亲至东观（洛阳宫中殿名，为修史之所），主持校勘事宜。由于他对于经史多所通晓，加上他做事认真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全部经史校雠完毕，受到安帝的褒奖。

古代人物画像蔡伦自永平末年入宫侍卫，历经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等五代皇帝，由于他有才学，又能忠于职守，因此得到历代皇帝的信任，从小黄门升到长乐太仆，被封为龙亭侯，可谓官运亨通，一帆风顺。然而在章帝时，由于他在窦后的威势下，被迫参与了宫廷斗争，而造成安帝祖母宋贵人的自杀身亡。安帝亲政后，下令廷尉审理此事，要求蔡伦到廷尉受审，蔡伦在内疚的心情下，“耻受辱，乃沐浴整衣

冠，饮药而死”⑥。这样一个对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竟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实为悲剧!然而他改进造纸术的功绩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他故乡建立了“蔡侯墓”，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个大字，是郭沫若的手书。

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羊皮和纸草进行书写，在书写材料上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魏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朝鲜，公元七世纪，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向西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公元1150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比我国已经晚了一千多年。十六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由欧洲传到北美洲。此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注释①②《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③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东汉墓群的发掘》，见《文物》

1989年第二期。

④⑤⑥《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张衡研制两“仪”

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人（今河南省南阳县城北五十里）。石桥镇西南有个鄂城寺，鄂城寺东边相传就是张衡的旧宅所在地，现在叫做“平子读书台”。

张衡的祖先为南阳望族，《后汉书》中有他祖父张堪的传，张堪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年轻时曾“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由于品德美好，十六岁被荐举到京城长安学习，他勤奋好学，被京城学者誉为“圣童”。刘秀起兵，张堪率全家相随，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功劳。东地动仪汉建立后，官至蜀郡太守和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太守。为官清廉，死后没有留下什么家财，张家家境急剧衰落。张衡的父亲未见史书记载，可能是从未入仕，壮年故去。

张衡年幼时，家境清苦，经历许多磨练，激发了他奋发学习的精神。张衡“天资睿哲，敏而好学”①，聪慧过人。少年时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七岁时游学三辅，随后又东入京城洛阳，就教于太学，拜经学大师贾逵为师，“遂通五经，贯六艺”②，儒家经世济时的思想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但这时政归外戚，权任宦官，朝政日趋腐败。因此“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③。正好此时鲍德出任南阳太守，鲍德“修志节，有名称”④，又颇重儒术，所以当鲍德邀请张衡出任主簿时，张衡他欣然立承。由于两人志趣相投，合作多欢，一任九年，直至鲍德被诏拜大司农才离去。

张衡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他从二十三岁开始，以自己出外游学的见闻为素材，模仿班固的《两都赋》，花了十年时间，创作出著名的《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⑤，张衡做《二京赋》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讽谏”。在赋中，他谴责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腐朽统治，对人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过去的大赋虽然也讲讽谏，但往往是劝百讽一，欲讽反谀。《二京赋》的讽谏是切直无掩的，如赋中写道：“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用以警告统治者不要穷奢极欲，残害百姓，否则将要激起百姓的反抗，表现出张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由于《二京赋》文辞华丽，感情充沛，被前人评论为集汉赋之大成，是“汉赋之极轨”。当然奠定张衡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有那篇开抒情小赋先河的《归田赋》，以及被誉为七言之祖的《思玄赋》后的系辞。

张衡最大的科学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安帝永初五年（111），三十四岁的张衡又一次被地方官推荐，来到京城洛阳，被任命为郎中。这期间，他精读杨雄的《太玄经》，并写下了《太玄经注解》，绘制了《太玄图》。《太玄经》既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涉及天文、历数的知识，张衡通过深入研究，逐步将兴趣与研究转到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方面。元初元年（115），张衡升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政府的档案、文书，并主管。“天时、星、历”，为朝廷的祭祀盛典等选择“良辰吉日”和记录各地发生的灾异、祥瑞等工作。张衡本“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⑥，因此，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担任太史令，先后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这一工作上，张衡更加深人、广泛地研

究了天文和历算，对于科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之一是他撰写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理论名著《灵宪），从哲学概括的理论高度，阐述了天地的生成、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⑦，说明月亮发光是太阳照射的结果，月亮对照太阳则成满月，背着太阳则月亮就隐而不见。张衡还第一次解释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人地影面未能受到日光反照形成的。他还记述了恒星的数字，“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⑧，并绘制有关星体位置的《灵宪图》。这是我国最早一张星体分布图。张衡所作《灵宪》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关于宇宙天体结构，据蔡邕说东汉时曾有三个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天说。盖天说是从古代“天圆地方”说发展而来的。此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为天所覆盖。天体在地面以上运动，日月星辰附着于天盖之上，随天转动。“浑天说”认为，天地是浑为一体的，天像一个蛋壳，地像蛋黄，居于其中，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断地转动。“宣天说”则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悬浮于天空之中。张衡通过观察天象，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⑨。元初四年（117），张衡根据浑天说，并参考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的浑天仪，用精铜制成演示天象用的浑天仪。

据记载，“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球体。球体内有根铁轴贯穿球心，球体可以绕铁轴转动。铁轴和球面的两个交点，代表北极和南极。球面刻有二十八宿及其他星辰。球外套有几个圆圈，为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和赤道圈。黄道和赤道的交角为二十四度，上刻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同时；又利用滴漏推动仪器转动，使天文现象在仪器上表现出来。浑天仪制成后，张衡写了《浑天仪图注》和《漏水转浑天仪注》，说明它的原理和使用。

古代风景画鉴赏《晋书·天文志》对张衡的浑天仪的演示效果曾有生动的说明：“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倡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

已没。皆如合符也。”这就是说，由于这些天文现象的出没，与天体运转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人们只要在屋中观察“浑天仪”的转动，便能对天体运动一目了然。

张衡研制的“浑天仪”后来失落了，但是由于他留有《浑天仪图注》一书，因此，后来科学工作者根据书中叙述的原理，把这个“浑天仪”复制出来。复制的“浑天仪”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安帝建光元年（121），张衡转为公车司马令，这是卫尉的属官，地位要比太史令为高。但仕途多变，顺帝永建元年（126），又转为太史令。这当然是官运不亨，所以当时人都认为这“非进取之势”，乃失志的表现。张衡对此抱着“得之不休（美也），不获不吝（耻也）”⑩的态度，仿照东方朔《答客难》作《应间》表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在文中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他表示“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求之无益”，在命运不达的情况下不能自暴自沉，而要“奉顺敦笃，守以忠信……不见是而不恬，居下位而不忧”。他依然和以前一样，在太史令的岗位上，继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

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和帝永元四年（92）到安帝延光四年（125）这三十年间，我国连年发生地震，收集各地的地震情况，是太史令的职责之一。尤以元初六年（119）洛阳一带连续两次大地震，为害最大，房屋倒塌，人畜死亡，波及数十个郡县。有人把地震这一自然灾害说成是天意，妄图为谶纬迷信制造根据。为了掌握自然规律和破除迷信，张衡对此精心研究，于阳嘉元年（132）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记录地震、掌握地震情报的“地动仪”。这年张衡五十五岁。

《后汉书·张衡传》有地动仪形状、构造的记述：“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音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古代风景画鉴赏阳嘉二年（133）四月，阳嘉四年（135）十二月，永和二年（137）四月，永和三年（138）二月，京都连续发生地震，地动仪均准确无误测到。永和三年的一天，朝西北方向的龙吐出铜球，可是在洛阳，谁也没感到“地动”。人们纷纷议论地动仪失灵。没几天该地派人到洛阳报告：陇西（今甘肃东南）几天前发生了地震。经查对时间，正是地动仪上西北方的龙头吐球的那个时辰。于是人们“皆服其妙”。今日文物考古、科学史专家曾对张衡地动仪作过复原和研究，认为它与现代地震仪器设计原理基本相同，但却比欧洲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可见张衡的奇思巧技是何等的伟大!

阳嘉二年（133），张衡被提升为侍中。侍中为九卿之一少府的高级属员，俸禄二千石，“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可以直接接触皇帝。此职使张衡不悦，因为他一生经历过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从和帝开始，这些皇帝均是幼年继位，朝政由外戚、宦官反复倾轧把持，张衡不满这种腐败政局，曾多次上《论贡举疏》、《陈事疏》、《请禁绝图谶动》、《京师地震对策》等，要求顺帝改革政局，不仅毫无结果，反招致大臣嫉恨。阳嘉二年，他上书顺帝，要求辞官到学术机关古代风景画——东观专事著述，但始终未获准。永和元年（136），他调出京城，任河间相（相当于河间太守）。他针对“国王骄奢”，“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情况，下车伊始，即“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任职三年就得到百姓称颂。永和四年（139），他又被调到京城任尚书，当年，这位六十二岁的大科学家在洛阳与世长辞。

张衡的至交崔瑗为他的墓碑写了长篇铭辞，对张衡一生成就作了高度评价：称赞他在研究学问方面的勤奋刻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赞扬他的科学成就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可谓恰如其分，并不过誉。张衡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学、天文学、地震学、机械制造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重大成就。解放后，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墓碑上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为了纪念张衡在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学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注释①崔瑗为张衡墓碑所写的墓志铭。

②③④《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⑤《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

⑥《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⑦⑧《续汉书·天文志》注引《灵宪》。

⑨张衡《浑天仪图注》。

⑩《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第二十三章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

有人把汉代比作中医史上的罗马时期，主要由于产生了两个“医圣”、三大医典。北方青、徐（今山东、江苏）一带的神医华佗，以外科术著称。在南方荆襄（今湖北）一带活动，能与之颉颃的人物就是张仲景，其所著《伤寒杂病论》是内科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三大医典之一（另两部是《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宋代名医许叔微曾说：“不读仲景书，犹如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①医学之有张仲景，犹如儒学之有孔仲尼，所以人称“医圣”。遗憾的是，他虽有著作传世，也像大多数古代科技人物一样，史书中并没有为他立传，因而他的事迹大都泯灭无闻。仅就所能见到的零星史料及流传下来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作一概介。

张仲景张仲景（147或150—219），名机，以字行世。东汉时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人。他家庭富裕，从小勤奋好学。当他从史书中看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时，对扁鹊望气色便知疾病的技能，很是感动，因而对医学发生了兴趣，认为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业，决心研习医术。还是童年时，他就拜家乡名医张伯祖为师。张伯祖见他对医学专心致志，就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全部传授给他。在学习过程中张仲景已显示出在医道方面的卓越才能。《太平御览》引《何颐别传》说，何颐善识人才，以此天下闻名。何颐一见少年张仲景，便断言他“用思精密”，将来必为良医。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言和《太平广记》都曾记述他神话般的高超医术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十七岁见到张仲景，张仲景就说王粲有病，应服“玉石汤”，不然。病势浸成。三十岁眉毛就会脱落（今称麻疯病，此病潜伏期很长）。张仲景能识之于初，说明他对地方病很有研究。只是王粲少年成名，正是才气横溢，精力旺盛，不以张仲景的话为然。谁知三十岁时，眉毛果然脱落，有人不信此记载，因为《魏书》只说他四十一岁因病（未言何病）死于征吴道上。这种壮年而死，正是由于长期患慢性病，加上征途劳累，病情急剧恶化所致。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政治极其腐败，军阀割据，战乱连绵，加以瘟疫流行，灾难深重，人民幸免于兵祸的，又被瘟疫夺去生命。曹植对瘟疫流行的惨状有诗描写“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而瘟疫中的主要一种就是伤寒病。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自建安以来十年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人民疾苦与自身遭遇，促使他决意研究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奔波于患者之间，以行医为终生事业。有的文献说他曾举过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但从《后汉书》和《三国志》等正史查考，建安以来在长沙为太守者，并无张机其人。

张仲景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风高尚，他把“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作为行医目标，痛恨那些玩忽职守，视人命如儿戏的庸医。东汉末，寸关尺诊脉法已经流行。为了慎重，他主张不单诊寸、关、尺脉。西汉以前，有《素问》的三部九候诊脉法：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古代风景画鉴赏部”：每部取天、地、人三个部位，共九个部位，名为“九候”；“九候”又分左右，合为十八诊，必诊遍这些部位才得确诊。比起寸关尺法麻烦许多，却易把握病情。自东汉产生寸、关、尺法后，三部九候诊断渐已不行，张仲景认为那种“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伤寒论》自序），就胡乱开方是难以治好病症的。故他独能不殚其烦，主张参行三部九候法。

张仲景在一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是这种研究和实践的产物。他看到《内经·素问》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他根据自己实践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但发病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名称。冬天因受寒而发病的叫伤寒；春天受寒发病的叫温病；夏古代扇画天受寒发病的叫暑病。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以至用药，都有细致的论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中医学著作。其中在理论上叙述的有二十二篇，治疗原则三百九十七法，记治传染病三十种，共列出一百三十三个药方。按明朝徐镕的说法，晋太医王叔和始加阐明、扩充，并编次成两书：一名《伤寒论》，一名《金匮玉函要略经》。前者是专论述外感疾病的专书，后者论述内科、杂病，兼及外科、妇科的病症。今传《伤寒论》是宋朝林亿、孙奇等人校定本，分十卷，二十二篇，除去重复计有

一百一十三方。《金匮玉函要略经》亦简称《金匮要略》曾一度失传，宋人王洙从馆阁蠹简中发现了残本，抄行于世。书分三卷：前论伤寒，中论杂，病，末载医方，兼论妇科病。宋神宗熙宁间，必秘阁校理林亿等奉敕校定医书，因上卷过于简略，但取杂病以下，又将末卷医方散附各病名下，以便拣用，共得二百六十二方，合二十五篇。内容有研究病因、病机、疾病分类和诊断等部分；治疗所用剂型有汤、丸、散、酒、洗、熏、坐。张仲景的医学成就从以上二部著作中考察，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医疗方法（即诊断），二是关于中药处方（即治疗）。上古医病主要用针灸法，从战国时起，药物疗法的经验逐渐积累下来，后来出现了《山海经》和《神农本草》等中药学书籍。但它们对医疗方法没有涉及。张仲景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出要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方法。《伤寒论》从疾病所在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辨证八纲”。根据“八纲”诊断病症，他又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的温、清、补、和、汗、吐、下、消的治疗方法，后世称之为中医“八法”。张仲景认为，这些治疗方法，都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运用，要使用得当，才能奏效。他还认为，有的病症可以“寒用热治”，“热用寒治”，既可以“先表后里”，也可以“先里后表”。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常例和变例，必须靠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去认真掌握和灵活运用。

其次，张仲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成方，如以发汗排毒的麻黄汤、桂枝汤；治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细菌性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等等，至今中医里有许多方剂，都是从张仲景的方剂变化而来的。不仅丰富了中药方剂这个医学宝库，并且在中药的炮制和方剂的配伍等方面也都有所总结和创造。

在方剂的配伍方面，张仲景是有所发明的。中药方从单方逐渐发展为复方，由于复方是由多味药组成，配制时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即一方之中，必以某药为主（君），某药为辅（臣或佐使）。《神农本草》单纯按照药物的性质分类；《素问》规定一方之中，君臣剂量，各有固定比例。《伤寒论》则是完全按照病势，酌情增减。比起《本草》和《素问》的配制方法更为科学。后世中医有“因病立方”，而不“立方待

病”的原则，就是在《伤寒论》的影响下确立的。

张仲景既重视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提出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古代山水画鉴赏的保健方法，还提倡练气功、按摩等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病人治病时，不仅注意用医方治病，还注重针灸等理疗。他常给人用灌肠法导便和用人工呼吸法去抢救昏厥的病人。

张仲景的著作很多，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要方》一卷，《疗妇人方）一卷，《五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等，可惜都没保存下来。

张仲景生活的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毕竟还不高，这使他的医学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在病理方面，还不能彻底肃清五行说的影响。他的医学理论，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实际。他的医学著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所以，后代的中医评论他的《伤寒杂病论》说：有治大人病的方剂，没有治小孩病的；有治北方病的，没有治南方病的。

但张仲景一生的研究与实践，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难经》等并奉为医学经典著作，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张仲景的著作影响及于海外，至今日本不少医生专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采用原法原方治病，而且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经过科学研究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见，这位”医圣”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

注释①《伤寒发微论》。华佗发明新医术一千七百多年前，我国有一位医学大家，他不仅善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还精通方药，擅长针灸，其中以外科手术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外科医生的鼻祖。他就是东汉末年鼎鼎大名的医学家华佗。

华佗（?—208），一名华旉（古敷字），字元化，东汉末年杰出医学家。他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精通儒学与医术，拒不为官，以医为业。他通晓养生之道，“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①。

华佗经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和公元184年的全国性黄巾大起义以及其后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华佗目睹战乱灾祸，不求仕进，立志“以医济民”。他重视前人经验，汲取民间偏方，发明创造。经过多年的华佗实践，他在针灸术、诊断学、药物学、儿科、妇科、驱虫等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声名颇著，时人称为“神医”，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华佗给患者治病，所以疗效显著，关键的一点是他明于诊断，能根据病情看出病理，判断准确无误，然后对症下药。如一郡守，病情险恶，华佗察看病情，按脉后，诊断为瘀血积存腹内，长期不能吐泄出来所致。若设法使他暴怒，吐出瘀血，病即可愈。郡守之子一切照办，果然使郡守吐出黑瘀血，足有一升多，病症从此痊愈。

华佗在诊断术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善于区分病状相同，而病理不同的患者。当时有两个府吏，一名倪寻，一名李延。他们都是头疼发烧。感觉相同。华佗察看两人病情后，认为两人病理不同，处方也应当有别。倪寻是外实（感冒），应当吃泻药；李延是内实（伤食），应当发汗。这两人服了不同的药，第二天，二人均病愈。

又如一妇人，在妊娠六个月时，突然剧烈腹痛，经华佗、按脉，诊断为胎儿已死，并让她家人摸妇人腹部，告诉他如果胎儿在腹部左侧是男孩，若在右侧为女孩，家人摸了摸说在左侧，华佗给妇人开了药，服后果然坠下男死胎。在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使华佗的妇科医术，受到很大限制。

华佗还善于诊断小儿科常见的疾病，东阳县陈叔山的两岁幼子，常腹泻和啼哭，孩子日益消瘦。华佗治疗时分别察看了母子二人，说“其母怀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中），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②。华佗让孩子母亲服“四物女宛丸”，十天后，孩子一切恢复正常。

华佗在诊断时，善于察形观色，从病状到病理，由表及里，因此，在诊断学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晋代医学家王

叔和编撰了《脉经》一书，其中的卷五，记载了《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共有76条。所说“扁鹊华佗”，或指二人的要诀，或单指华佗继古代集市图承并发扬了扁鹊的医术，由华佗本人总结的经验。《要诀》根据病人的面色、五官、肤色、病状和举止行动等，可以判定患者的生死寿夭。例如：“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再如：“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由于华佗经验丰富，观察入微，他的诊断相当精确。有一个做过督邮官的顿子献，曾患病，治疗后自觉良好。一日华佗为他按脉说：“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夫妻同床）即死。”③恰巧顿子献妻听说丈夫病愈，不远百里，前来看望，夫妻同房团聚，时隔三天，果然病发而死。

华佗治病，常使用针灸法。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针灸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针灸，根据病情，分别使用灸法和针刺法。“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痊愈）”④。最著名的一例，是华佗为当时的汉丞相曹操治疗头风眩症，每当发作，经华佗针灸，即立刻奏效。

华佗的针灸疗法，还能医治一些妇科病。一位李将军的妻子怀孕不慎流产，请华佗检查。华佗按脉后判断：根据脉象，胎儿还未下来。李将军说亲见胎儿坠下，对华佗的诊断不以为然，华佗只得告辞离去。百日后将军妻子又腹痛不止，只好再次请来华佗。华佗告诉将军夫妇：“此脉故示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⑤华佗针、药并用，妇人有欲产而不能的腹痛。华佗说：“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⑥照此实行，果然是一个手足完具、全身变黑的死胎男孩。这时，将军悔恨自己的固执，对华佗的医术赞叹不已。

古代山水画华佗针灸的高明之处，不仅针灸准确，效果显著，而且还能诊断出别人针灸的失误。当时有一位督邮官徐毅得病，华佗前去看视，徐毅对华佗说：“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华佗察看了扎针的部位，询问了扎针的深度，然后对徐毅说：“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⑦五天之后，徐毅果然死

去。

华佗除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在医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在外科手术方面。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则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麻沸散"的药物成分和配制方法，今已失传，后人一般认为华佗是用麻蕡（音坟）、羊踯躅、当归、菖蒲等中草药，研制成散剂，每次手术前，用酒服下，即可全身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比西医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一千六百多年。有文献记载，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进行过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的病例。这从当时的医药水平来看，也是可行的。

华佗作为名医，努力尽职，即使一些不治之症，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也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施行手术治疗。有位士大夫，身体极不适，求华佗医治。华佗在认真做了检查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年，寿俱当尽。"⑧患者感到难以忍受，坚持要求手术。华佗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就照患者之意为其施了手术，当时见轻，十年后果然死去。

由于华佗的外科手术高超，时人称他为"神医"。他为患者进行外科手术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在这些故事中，有的是把别人做的事，也附会在他身上了。《襄阳府志》曾记载了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一事，《三国志·关羽传》也记载了这件事："羽便伸臂令医劈古代风景画鉴赏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漓，盈于盘器，而羽割炙饮酒，言笑自若"。但并未说医生是华佗。按关羽镇守襄阳时，华佗已死，"刮骨疗毒"二事似不可能。但是，在动手术前，使用华佗的"麻沸散"，进行局部麻醉，还是大有可能的。这也说明，华佗在外科医术上的成就是卓越的，也是一件了不起的革新创造。这对于那种克服疾病完全抱消极态度，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迂腐见解，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蚍虫⑨是当时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病害之一。华佗在治虫除害中，吸取民间良方妙药，再配合自己经验，总结提高，有效地降伏体内各种

寄生虫及其他虫害，以解除人们的痛苦。

一次，华佗外出行医，道上遇见一妇人病痛呼叫，即上前问病，得知病人自感咽喉有堵塞物，无法吞咽。华佗告诉病人：买三升又酸又辣的蒜齑（音积ji，即蒜泥）大酢（作，即醋）喝下，病且好。病人按他的指点服了药，很快就吐出一条地虫来，病痛立时减轻。

华佗还擅长用水疗法医治虫病。“彭城夫人夜之厕，虿（chāi拆）螫其手，呻吟无赖”⑩，华佗让她把螫伤的手浸泡在热水中，“卒可得寐”。华佗又让她每过一个时辰换一次水，以保持水温，第二天，螫伤的手就恢复了正常。

华佗治疗虫病的方法很多。其中用汤药治地虫是他的得意之作。建安五年（200），“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按脉后说：“府君（指陈登）胃中有虫，欲成内疽（jū居），腥物所为也。”华佗让人给他煎煮了二升汤药，先喝了一升，稍停片刻，又喝完另一升。片刻·“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陈登顿时觉得轻松。临别时，华佗告诉陈登说：“此病后三期（三年）当发，遇良医可救”。果然不出华佗所料，时过三年，陈登病情复作。由于华佗不在，又没遇到良医，陈登终于死去。

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把自己的医术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其中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名医学家。

华佗在教授中，曾谆谆告诫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还说：古代的长寿者，都做“导引之事”，仿照熊、鸱的动作，伸展躯体，活动关节，以求健康一长寿。“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可以除病和强健身体。当人身体感到不舒畅时，可起作一禽之戏，稍稍汗出，身体自感轻便，增加腹中食欲。吴普按照华佗的“五禽戏”，经常进行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古代集市图樊阿向华佗学习针灸之术，很有成绩。一般医生认为“背

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樊阿却敢于打破常规，在背部扎针，深度可达一二寸；在胸部扎针，竟可达五六寸。由于技术精湛，疗效十分显著。另外，华佗还将精心研制的漆叶青黏散，传授给樊阿。漆叶青黏散的药物成分是由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配制而成。据华佗说：经常服用此散，可以“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樊阿遵照老师的教导，长期服用，活到一百多岁。

华佗在用药方面没有留下著作，但李时珍认为，华佗的学生所著《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经》是华佗、张仲景所记，虽不免武断，但作过增修工作还是有可能的。关于华佗著作，《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唯一流传至今的是晋代王叔和撰《脉经》一书，其中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其中部分内容则为山水画鉴赏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则是对养生学的一大贡献。

曹操得了一种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多次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超群，便派人把他请来。经“佗针，随手而差（愈也）”。但仍不能除根。曹操为了让华佗随时为自己治病，要华佗做他的侍医。华佗离家年久，思归探视，乃以“求还取方”之名告假回家。其间曹操曾屡次作书召还，并敕令郡县发遣，华佗托词妻病，不肯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前去调查，并指示使者：“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使者至谯，见华妻安然无恙，便拘捕了华佗，传送到许昌狱中。曹操的高级谋士荀取或（音玉）为华佗向曹操请求说；“佗术实工（善也），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下令赐死。华佗临死前，将其所著书一卷交给狱吏说：“此可活人。”怎奈狱吏在曹操的淫威下不敢接受。华佗悲愤之极，不再勉强，遂用火焚化。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症并未根除，当发作时，愤然叹息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重，找不到良医救治。曹操喟然长叹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华佗被害后，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吴普在广陵修建了华佗的神庙，以表达其对恩师的哀思和悼念!在徐州，人们建造了华佗墓，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家。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华佗的医学成就也有其局限性，但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外科手术、麻醉剂和医疗体育及养生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确是很大的。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景仰，也为世界学者所称颂。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⑨地，古蛇字，这里所说的地虫，泛指寄食于人体的蛔虫及其地虫害。

⑩《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⑨⑩《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外戚专政东汉时期，皇室往往与世家豪族联姻，帝后多出自功臣勋贵之门，这些功臣勋贵一旦与皇室通婚即成为外戚。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在政治上对外戚防范很严。中期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发展，他们古代风景画每以外戚身份，拥立幼弱君主，以取代皇帝专政，夺取最高统治权。

永元元年（89），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继位，由其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后兄窦宪执掌朝政，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早在窦宪之妹立为章帝皇后时，窦宪一家就兄弟亲幸，宠贵日甚，掠夺土地财物，肆无忌惮，连皇室成员也不放在眼里。窦宪依恃宫掖声势，曾以贱价强夺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田，而公主竟不敢与之计较。后被章帝发觉，召宪切责说：“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

怖。……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①其妹窦后为此毁服向皇帝谢罪，良久章帝怒气始消，命窦宪将侵夺的园田归还公主，窦宪虽未判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后，窦宪遂以侍中，内主机密，出宣诰命。其诸弟窦笃、窦景等并侍宫省，处亲要之地。永元三年（91），窦宪大破匈奴于金微山（今独联体西伯利亚境内），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窦宪因此威名大震，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大批窦氏党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明年，窦宪等潜图弑逆，和帝阴知其谋，乃与宦官郑众定计，乘窦宪班师凯旋京师之际，一面派大臣持节郊迎慰问，一面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官，关闭城门，一举收捕窦宪党羽，下狱诛死。遣谒者仆射收回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与弟笃、景、瑰皆遣就国。窦宪及其弟窦笃、窦景到国后皆追令自杀；只有窦瑰因为平时尚知节约自修，河南尹张酺上疏求免，得以不死。窦氏宗族、宾客因宪得官者，皆免归本郡。和帝重新夺回了政权。

元兴元年（105），和帝死，少子隆出生方百余日，立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是为殇帝，尊邓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数月后，殇帝又死，太后与其兄邓骘定策迎立清河王子刘祐嗣位，是为安帝，安帝时古代山水画鉴赏年仅十三，仍由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邓氏吸取窦氏覆灭的教训，比较恭谨守法，邓骘在位，颇能推进贤士，与宦官郑众、蔡伦等也能合作共事。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仍遭贬黜，邓骘兄弟子侄七人皆被迫自杀。闫皇后兄弟闫显等人，并居卿、校之位，掌握大权。数年后，安帝死，闫后与其兄闫显定策禁中，迎立年纪幼小的北乡侯刘懿嗣位，是为少帝。尊闫后为皇太后，以闫显为车骑将军，执掌朝政，闰氏诸兄弟并处权要。但不久，少帝又病死，中常侍孙程等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刘保继位，是为顺帝。孙程等皆封列侯，宦官权势从此日盛。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而且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使外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顺帝阳嘉四年（135），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氏的权势不断扩大。永和六年（141），梁商死，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掌朝政。梁冀原是一个逸游自恣、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官职，一贯横行不法，顽嚣凶暴。建康元年（144），顺帝死，两

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侈暴滋甚”，四个月后，冲帝又死，梁太后与梁冀共谋迎立质帝，年仅八岁，梁氏继续以外戚身份掌权。质帝年少聪慧，他对梁冀的骄横侈暴，很是不满。一次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后又恨又怕。一日他阴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中，进奉质帝，质帝食后而死。在短短的两年中，汉家国祚三绝，比较正直的公卿李固、杜乔等甚感忧虑，他们都主张应当拥立年长而贤明的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与宦官曹腾则坚持立五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因而否决了公卿们的主张，刘志即汉桓帝。桓帝即位后，娶梁冀另一女弟为皇后，梁太后临朝，梁氏权势更加显赫。

梁冀以大将军专擅朝政，事无巨细，皆由其决断。和平元年（150），梁太后死，梁冀更加肆元忌惮。他指派心腹担任宫卫近侍，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当时四方调发和贡献给皇帝的珍异贡品，其中上等的皆先选送梁府，其次才献给皇帝。内外百官升迁，皆须先到梁府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台报到。当时的官吏只能唯命是从，如有异辞，必然遭到祸殃。太尉李固、杜乔由于不肯附和梁冀，皆被梁冀诬杀，陈尸街市。吴树出任宛县县令，拒绝了梁冀的嘱托，到任后，诛杀残害百姓的梁冀门客数十人。后来他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梁冀竟以毒酒款待，刚一出门，即死于车上。侯猛拜辽东太守，上任前未去梁府辞行，梁冀借故将其腰斩。

古代风景画桓帝为了褒奖梁冀迎立之功，命中朝二千石以上的大臣商议给梁冀以特殊礼遇。有司奏请：梁冀上朝谒见皇帝时的礼仪，可以比照西汉第一功臣肖何；扩大其封邑为四县，比照东汉第一功臣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为他特设专席，凌驾于三公之上。以示殊勋。并把以上规定，向全国公布，定为永制。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犹嫌太薄，表示不悦。

梁冀在政治上如此专横跋扈，在生活上更是骄奢淫逸，糜烂不堪。梁冀在洛阳城里，大肆修建豪华府第，而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竟夸。在这两座富丽堂皇的第宅里面，各有藏室，在藏室中，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②。每当春秋暇

日，“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③。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才完成。于是通知各地交纳生兔，刻其毛以为标识，如有人敢于伤害，罪至刑死。曾有一个西域来的客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被牵连处死的达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日“自卖人”④。

古代山水画梁冀听信孙寿的建议，斥夺梁氏外戚之在位者，外表上佯为谦让，而实际上是抬高妻族孙氏的地位。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污残暴。此辈各派遣家奴逮捕其属县富人，下狱拷掠，勒索钱财，出钱少者，则诬以他罪，致之于死，或流放外地。扶风人士孙奋家中富有而性吝啬，梁冀先赠给他四匹马，然后向他贷钱五千万。士孙奋不甘心，只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乃命令地方官员，指控士孙奋的母亲原为梁家管库婢女，因偷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而逃亡。于是拘捕士孙奋及其兄弟，进行拷问，两人皆死于狱中，没收其全部家财一亿七千余万。梁冀还派遣家奴周游四方，远至塞外，广泛搜求珍奇异物；这些奴客乘机横暴地方，掠夺妇女，殴打吏卒，百姓对之切齿痛恨。当时任侍御史的梁冀故吏朱穆，从为梁冀的禄位出发，多次上书劝谏梁冀“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⑤。梁冀始终不悟，报书朱穆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其贪婪凶顽竟至于此。

古代风景画鉴赏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为帝后；六人为贵人；两人官至大将军；夫人、女食邑封君（相当于侯）者七人；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等官职者五十七人。梁冀秉政将近三十年，拥立了三个皇帝，威行内外，百僚侧目，经东汉之世，外戚如此煊赫显贵，是很少有的。

外戚势力高涨，宦官威风相形见绌，因而形成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策划翦除梁冀。他们借梁冀派其亲信宦官张恽入宫宿卫（实际上是监视皇帝行动）之机，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将张恽逮捕。桓帝命尚书令尹勋召集尚书台官吏武装起来守卫中枢机构，派宦官首领具瑗统领皇宫侍卫

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梁冀府第，同时派光禄勋袁盱持节收缴梁冀大将军印绶，以解除其兵权。梁冀及其妻孙寿见情势不妙，皆于当日畏罪自杀。于是收捕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其他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处死者数十人，梁冀故吏、宾客被黜免者三百余人。朝廷的重要官员几乎被罢黜一空。由于事情突然从宫中发生，公卿张惶失措，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天下百姓无不额手称庆。抄没梁冀的家财，由政府拍卖，合三十余亿，以充王府经费，减天下租税之半。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同日被封为列侯，即所称“五侯”。此后至灵帝末年的三十年间，东汉的朝政一直为宦官所把持。

注释①《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②③④《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⑤《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

第二十四章

西汉王朝的兴衰布衣将相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有一天，在皇宫里大宴群臣。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汉高祖说：“各位大臣可以毫不隐讳地议论一下：看看我为什么能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得不到天下。”大臣高起、王陵回答说：“拿陛下跟项羽比，陛下容易发脾气，喜欢侮辱人；项羽讲究仁义而尊敬人，这是陛下不如项羽的地方。但是陛下赏罚分明，派人去攻城略地，攻下来的就给予奖赏，使大家都能得到好处；项羽嫉妒有才能的人，谁有功劳就害谁，谁有本领就怀疑谁，打了胜仗不给人记功，得了土地不给人奖赏，因此他得不到天下。”

汉高祖听了说道：“你们只知道事情的一个方面，不知道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要论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要论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筹集粮饷，我不如萧何；要论带兵打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我能用韩信像他们，这是我能够得到天下的重要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好好使用，那是他所以失败的缘故。”

汉高祖在宴会上说的他能用人这一点，的确是事实。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他不仅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样能独当一面的人杰，并且还用了许许多多有各种长处的人才。他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本领就用，不管什么出身。在楚汉战争中立过功劳，到汉朝建立后出任丞相和将军的许多人当中，数张良的出身最尊贵，是韩国的公子。其次就要算萧何和曹参，一个在沛县做过文书，一个是沛县的监狱官，在封建社会里，这都是官职卑微的小吏。再往下数，像陈平、王陵、郦食其等人，都是白丁，没有做过官，更不用提韩信了。在鸿门宴上保护过刘邦的樊哙，是宰狗的屠户。大将周勃是织草席子的手工业工人兼吹鼓手。大将灌婴是个绸布贩子。这些没有做过官的白丁，也包括做过小吏的萧何、曹参在内，在当时的社会里只有穿布衣的资格，是不许可穿绸衣的，因此，历史上称他们为布衣将相。

一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并不决定于他的出身，而要看他会不会动脑

筋，肯不肯卖力气。就是这些布衣将相，在帮助汉高祖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个个都立了大功；在汉朝建立以后，又为巩固封建统治做出了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这里先说说萧何。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是个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干的人。他了解刘邦，认定刘邦将来能够成就大事业。他在沛县做文书的时候，凡是刘邦与别人发生了刑事纠纷，官司打到县衙门里，萧何总是站在刘邦这边，处处袒护他。刘邦担任亭长，每次向咸阳押送壮丁需要筹集旅费，别人只出三百钱，萧何常常出五百钱。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以后，萧何和曹参派樊哙把刘邦找回来，杀了沛县县令，几个人商量着一起举兵反秦，并且拥戴刘邦做了沛公。萧何可以称得上汉朝的开国元勋。刘邦打进咸阳的时候，别的将士都忙着抢劫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一进咸阳城，就到秦朝的丞相府、御史府，把图书律令和文书档案全部接收过来。这是一批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料，有了它，使刘邦对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以及社会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对于打败项羽、统一天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于萧何月下追韩信，帮助刘邦启用了一员大将，这更是目光远大，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萧何还是个管理后勤工作的能手。在楚汉战争中，他以丞相的身分留在关中，在刘邦屡次被项羽战败以后，他很快又筹足了粮饷，补充上士兵，使刘邦能够重振旗鼓，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刘邦在统一天下以后，为了表彰萧何的功绩，把他封为酂侯〔酂zàn〕，让他做了丞相。

再说韩信，他自从被拜为大将以后，发挥了杰出的军事才能，立了许多战功。他在战争中常常能够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破赵之战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这次战争开始的时候，韩信在半夜里挑选了轻骑兵二千人，叫他们每人拿一面红旗，从小道出发，到赵军大营附近埋伏。出发以前，韩信吩咐他们说：“赵军看到我军后退，必定倾巢出动，来追赶我军，到时候你们冲入赵军的大营，拔掉他们的旗帜，换上我军的红旗。”

轻骑兵出发以后，韩信传令给全营将士准备点饭菜，他说：“现在大家少许吃一点，等天明打败了赵军以后，再举行丰盛的会餐。”接着，他

派一万人做先锋，背靠河流扎下了营寨。赵军看到韩信背水为阵，都笑他不懂兵法。等到天一亮，韩信叫人打起大旗，擂响战鼓，向赵军挑战。双方打了一阵子，韩信突然下令抛弃军旗战鼓等往后撤退。赵军见汉军战败，都争先恐后，一窝蜂地离开大营，来抢夺战利品。汉军退到河边，无路可退了，就回过身来，拚死力战，勇不可当。这时候，埋伏在赵营附近的二千轻骑兵，趁赵军倾巢出动的时候，一举占领赵营，插上了汉军的红旗。赵军打不过汉军，只得往回撤退，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营盘已经失守，不觉大吃一惊，便抛戈弃甲，纷纷逃走。汉军前后夹攻，大破赵军，斩杀赵军主将陈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战争结束以后，有人问韩信："将军不依兵法，背水为阵，结果却取得胜利，这是什么道理?"韩信回答说："我这种做法，兵法上有，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之所以要背水为阵。就是根据这一条啊!"从此，大家才知道韩信是一个善于灵活运用兵法的人，都非常佩服他。刘邦取得天下以后，韩信被封为楚王。

曹参立的战功也不小。沛县起义以后，他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多次打败敌人。他第一次立功是歼灭秦朝大将李由率领的军队，杀了李由，给予秦朝极其沉重的打击。攻克咸阳的战役中。曹参担任先锋，他是最早进入咸阳的大将之一。楚汉战争中，曹参的战功也十分显著，他常常在战局危急的时候，出来扭转局面，夺取胜利。他灭了两个六国旧贵族建立的国家，攻克县城一百二十二座，俘获敌人的两个王，三个相，六个将军，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吏。他自己先后负伤七十次，在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疤，为创建汉朝立下了血汗功勋。

王陵虽说是布衣出身，家里却比较富裕。起义以前，他跟刘邦是结拜兄弟。刘邦进攻咸阳的时候，王陵也聚集了几千人，呆古代演奏在南阳。起初他觉得自己年岁比刘邦大，是老大哥；又觉得自己跟刘邦的仇人雍齿很要好，所以就不愿意归附刘邦，想要自己打开一个局面。楚汉战争开始以后，他才站到了刘邦这一边。

在一次战争中，楚军捉住了王陵的母亲。王陵派使者去向项羽要还母亲，项羽故意请王陵的母亲坐在西边的客位上，待她很是尊敬，目的

是想招降王陵。王陵的母亲在送使者的时候，流着眼泪偷偷地告诉使者说："你回去对我儿子讲，叫他好好跟着汉王打天下，千万别为了我而三心二意。汉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准能得到天下。"说完，她就拔剑自杀了。王陵牢记母亲的教训，从此忠心耿耿地跟了刘邦，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手下的谋臣武将，还有一大班，关于他们的故事也很多。像陈平的足智多谋，樊哙一身是胆等等。周勃为人忠诚，厚重少文，不仅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为保卫刘姓的江也出了不少力气，我们将在后面《周勃安刘》这一篇中讲他的故事。叔孙通制订朝仪刘邦本没有什么文化，一向不喜欢读书人，也讨厌那些斯文的礼节规矩。他做了皇帝以后，觉得秦朝的那一套礼仪制度太麻烦，就把它一概废除了。这一来却乱了套，因为没有礼仪的约束，那些出身寒微而又恃有功的大臣们，在朝廷上太随便了，吵吵闹闹的很不成体统。

在汉朝刚刚建立、刘邦准备给大家论功封赏的时候，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争论了一年多也决定不下来。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封他做郡侯。许多大将听了都不服气，他们大声吵嚷说："我们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多的身经百战，少的也打了几十仗。萧何在后方光动动嘴，摇摇笔杆，没有汗马功劳，凭什么给他记头功?"刘邦见大伙儿不服，也动了肝火，就提高嗓门问大家："你们知道打猎吗?"大伙儿回答说："谁还不知道打猎。"刘邦说："那么你们知道猎狗吗?"大伙儿乱嚷嚷说："知道，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捕野兽的是猎狗，发号令叫猎狗去追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会冲锋陷阵，消灭敌人，这跟猎狗一样。萧何是发号施令的，是人。你们怎么能跟他相比!"

大将们听刘邦把他们比作狗，更不服气了。他们大声喧哗，狂呼乱叫，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砍宫殿上的柱子，真是乱成了一团糟。刘邦这个平日不讲礼法的人，也受不住了，觉得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应当想个办法整顿整顿才好。

有个叫叔孙通的儒生，原先在秦朝做过待诏博士，投到汉朝的日子还不久，因为刘邦一向讨厌儒生，所以他的地位并不显著。这时候，他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就对刘邦建议说："争夺天下的时候，儒生没有能做

出多少贡献；得到了天下以后，儒生却能帮助陛下保守好天下。我愿为陛下到鲁国去征集那些懂得礼仪的儒生，来帮助陛下制订朝仪，整顿好朝廷上的秩序。”刘邦虽然不满意朝廷上乱糟糟的情况，可是一听说要制订朝仪，却又犯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愁，他怕儒家那一套礼仪太烦琐，不容易学会，所以他抱着怀疑的态度问：“那种玩意儿不是很难学吗?”叔孙通说：“礼仪这东西，是可以根据时世的不同和人们的需要来制订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仪，是互相继承而又有所增减的，并不完全相同。我可以把古代的礼仪和秦朝的礼仪结合起来，再根据今天的需要，制订出一套新的礼仪。”刘邦说：“那你就试一试吧。不过千万要简单些，使我和大臣们都容易学会。”

于是叔孙通就到了原先鲁国的地方，召集懂得古代礼仪的儒生三十人，请他们一起来制订朝仪。叔孙通先叫人在长安郊外用竹竿和茅草搭了一个草棚，带着三十个儒生、汉高祖的一些近臣以及他自己的弟子，总共一百多人，开始制订并演习朝仪。搞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汉高祖来观看演习。汉高祖看了演习后说：“这个我能学得会，就照这样办。”于是他下令叫朝廷里的全体文武大臣都来学习朝仪，订于公元前200年，也就是刘邦当皇帝的第三年十月正式实行。汉朝初年，是以十月作为一岁之首的。

古代风景画十月到了，长安的主要宫殿长乐宫落成。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正式开始。准备朝见皇帝的文武官员，按照官职的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殿外边，悬挂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威武雄壮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等兵器，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令：“传大臣们上殿!”大臣们就分两路进入大殿，太尉等武官站在西边，面向东；丞相等文官站在东边，面向西。等大家站定以后，传令官代表群臣请皇帝上朝。汉高祖坐辇车〔辇niǎn〕从内宫来到殿上，接受群臣朝拜。参加朝拜的群臣，各人要自报姓名官职，恭恭敬敬地行跪拜礼，然后再退回到自己的位置。朝拜完毕，汉高祖赏赐群臣饮法酒。群臣把酒杯举到跟自己额头一样的高度，齐声喊：“谢酒!敬祝皇帝万寿无疆!”然后一饮而尽。酒是有限度的，完全是为了礼仪上的需要，决不许喝醉，所以叫做法酒。

在朝拜的过程中，御史负责执法，凡是在礼仪上出了差错的，就叫

卫士把他带走。因此大臣们都十分严肃认真，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的，唯恐出了差错。

朝拜仪式结束以后，出身寒微的汉高祖十分高兴，他说："今天我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尊贵啊!"于是他拜叔孙通为奉常，这是专管朝廷礼仪的官职，后来改称太常，并且赏赐给叔孙通黄金五百斤。

自从叔孙通制订朝仪以后，原先宫廷上那种乱哄哄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从此，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权，臣子成了皇帝的忠实奴仆，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一整套礼仪规矩建立起来了。这套礼仪规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实行了两千多年，从形式上巩固了封建制的统治。汉高祖杀马宣誓汉高祖刘邦在跟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除了重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以外，也争取到了张耳、英布、臧荼〔tú〕等人的大力协助。项羽实行割地分封，这些人也都封过王，张耳是常山王，英布是九江王，臧荼是燕王，当时他们的地位和汉王刘邦是平等的。项羽性情猜忌，不断排挤他们；刘邦则不断争取他们，所以他们终于背叛项羽，投靠刘邦，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为汉朝的创建立下了功劳。刘邦做了汉朝皇帝，自然不便亏待这些有功之人，也只好封他们为王。张耳已经死了，就把张耳的儿子张敖封为赵王，英布改封为淮南王，臧荼依旧封燕王。拿这些人的功劳跟韩信、彭越比，自然比不上，他们封了王，韩信、彭越理所当然也得封王。韩信在楚汉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已经封为齐王，这时候改封为楚王。彭越封为梁王。此外，还有一个韩襄王的后代也叫韩信的，被封为韩王。英布的岳父吴芮〔ruì〕被封为长沙王。一共封了七个王。

汉高祖封这些异姓的功臣为王，原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他深知这些异姓王能征惯战，有才干，有实力，他生怕他们的势力强大起来，会要夺取他刘姓的江山。所以在封王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杀戮功臣，一个一个地来收拾这些异姓王。

汉高祖称帝后不久，就借口燕王臧荼谋反，亲自带兵征讨，俘虏了臧荼，改封与自己同一天出生的同乡、同学兼好朋友卢绾〔wǎn〕做燕王。第二年，他听说楚王韩信收留了项羽的大将钟离古代山水画昧。他很自然地联想起自己跟韩信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汉高祖跟韩信谈到带

兵打仗的问题，汉高祖问韩信：“像我这样的才能，你看能带得了多少兵?”韩信说：“陛下顶多能带十万兵。”汉高祖又问韩信：“像你这样能带多少兵呢?”韩信说：“我带兵当然是多多益善!”汉高祖想到韩信这种锋芒毕露的谈话，认为韩信收留钟离昧，准是有谋反的意图，他有心去讨伐韩信。回头一想，自己的兵不如韩信的兵精锐，大将又都比不上韩信，害怕真要打起来，自己不是韩信的对手。于是他采用了陈平的计谋，假装要去游玩楚国的名胜云梦泽，带着自己亲信的部队来到韩信韵封地，准备找机会发动突然袭击。

古代人物画像韩信听说皇帝来到他的封地，知道来者不善，本想起兵反抗；又一想，自己有功而无罪，皇帝不会那样不讲理，就又犹豫起来了。有人给韩信建议说：“皇帝是为了钟离昧来的，杀了钟离昧，拿他的头献上去，皇帝一定高兴，不会有祸患的。”韩信找钟离昧商量，钟离昧大骂韩信道：“你这家伙太不够朋友了。刘邦不敢派兵进攻你，就是因为有我在这里，你如果杀了我去邀功，我今天死，你明天也必定灭亡。”说完，他就拔剑自杀了。韩信真的拿了钟离昧的头去拜见汉高祖。汉高祖当场就叫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装进囚车带走。韩信不服，大声喊叫：“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表示对汉高祖杀戮功臣的抗议。后来汉高祖考虑到韩信的功劳很大，威望很高，关于谋反的事又没有确凿证据，杀了他怕有人不服，就释放了他，把他降为淮阴侯。

就这样，汉高祖一个一个地收拾异姓王，称帝后到逝世前，先后把分封出去的七个异姓王消灭了六个。空出来的王位，改封自己的兄弟子侄去接替。这时候的汉高祖，已经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把整个天下当作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十分害怕别人来夺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只相信自己的子弟，不再相信那些为他立过汗马功劳的异姓王了。

汉高祖不但在活着的时候亲手铲除异姓王，并且在临死之前还郑重其事地立下遗嘱，规定不许封异姓人为王。他这个遗嘱，是在征讨淮南王英布的时候吃了苦头，才作出来的。

淮南王英布原先是项梁手下的一员猛将。项梁死后，英布跟着项羽

北上救赵。他作战勇敢，常常以少胜多，立下了大功。项羽进兵咸阳，英布又担任先锋，功劳不小。因此，项羽割地分封的时候，他被封为九江王。英布封王以后，跟项羽产生了争权夺利的矛盾。刘邦派能说会道的随何去拉拢英布，把英布拉到自己这边来，起兵反对项羽，打败项羽之后，就改封英布为准南王。

臧荼、韩信的下场，使英布很是寒心；后来梁王彭越也被除掉了，汉高祖还把彭越剁成肉酱，送给诸侯王去吃。这是杀鸡给猴子看，是对诸侯王的严重警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使英布产生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想法，所以他就在汉高祖登基的第七年（公元前196年）起兵造反。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高祖听说英布造反，亲自率领大军去讨伐。两军对阵的时候，汉高祖看到英布的阵势跟项羽相似，心里有点害怕。他责问英布说：“我已经封你为王，你为什么还要造反?”英布反问说：“当年项羽也曾封你为王，你为什么还反对他?你造反，做了皇帝；我造反，也想弄个皇帝做做。”

汉高祖听英布说要夺他的帝位，气得火冒三丈，赶快下令发动攻势。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败英布，平定了这次叛乱。在战争中，汉高祖被飞箭射伤，从此一病不起。

第二年（公元前196年），汉高祖知道自己已经不中用了。就带着文武大臣到太庙里去宣誓，立下了不许封异姓人为王的遗嘱。汉高祖叫手下人牵来一匹白马，亲自主持了杀马宣誓的仪式。他端起一杯冒着热气的马血酒起誓说：“我自起事以来，已经十二年了。当年跟着我打天下的英雄豪杰，我都给了他们应有的封赏，有些人被封王封侯，掌管不少土地。我扪心自问，认为已经对得起他们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居功自傲，贪心不足，举兵反叛，想要来抢夺我刘家的天下。现在我在这里当着祖宗的灵位，为子孙后代立下一条不许违反的信条，希望大家发誓遵守：从今以后，凡不是刘姓的人，一概不许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一概不许封侯。谁违反这个盟约，天下人就共同讨伐他!”

汉高祖起誓完毕，把马血酒洒半杯在地上，剩余的半杯，一口气喝

了下去。在场的人都照着他的样子，每人喝了马血酒，发誓一定要永远遵守这个盟约。

汉高祖杀马宣誓，是为了怕异姓王造反，抢夺他的天下，才想出来的一种所谓长久之计。可是后来违反这个誓约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吕后。吕后篡权汉高祖刘邦杀马宣誓以后，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他的妻子吕后找了一位有名的医生来给他治病。汉高祖问医生："我的病还能治不能治?"医生诊了脉以后，先是皱皱眉头，然后比较委婉地说："陛下的病是重的，但是还可以治。"汉高祖骂道："还治吕后什么!我从提剑斩蛇开始，终于取得了天下，这不是天命吗?现在老天爷要我的命了，即使把名医扁鹊找来，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吩咐赏赐给医生黄金五十斤，也不叫开药方，就把医生打发走了。吕后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她见汉高祖的生命危在旦夕，想要知道汉高祖怎么安排后事，就问汉高祖："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如果也死了，谁能接替他?"汉高祖说："曹参可以接替。"吕后又问："谁能接替曹参?"汉高祖说："王陵能接替，不过他有时候显得有些愚蠢，可以让陈平协助他。陈平的智谋有余，但是不能独当一面。周勃虽说缺少文化，但是稳重厚道，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必定是他，可以叫他做太尉。"吕后又接着往下问，汉高祖回答说："再往后，你也死了，再怎么安排，你也不能知道了。"不久，汉高祖刘邦去世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95年。

汉高祖一死，吕后就活动起来。她四天没有发讣告，却偷偷地和自己的亲信审食其〔shěn yì jī〕密谋杀害功臣。她对审食其说："朝廷中的几个大将，当初和皇帝都是一样的老百姓，后来对着皇帝称臣，心里总不愉快。现在又要他们来辅助年轻的皇帝，他们能心甘情愿吗?我看不把他们斩尽杀绝，天下是太平不了的。"有人听到了吕后和审食其的密谋，赶快去告诉大将郦商。郦商找到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去世已经四天，不发讣告，却在打算杀害功臣，真是这样的话，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带着十万兵马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兵马平定燕、代，如果他们听说皇帝已经去世，朝廷想要杀戮功臣，一定会联合起来造反。这样，天下不就又要大乱了吗?"审食其把郦商的话告诉给吕后，吕后只好改变原来的主意，赶快向外发讣告，并且把太子刘盈立为皇帝，就是汉惠帝。

汉惠帝十七岁即位，懂得的事情不多，性格优柔寡断，加上身体不好，大权就全由他母亲吕后掌握。

吕后名叫吕雉，她心肠狠毒。汉高祖还活着的时候，她就采取阴谋手段，杀戮功臣，为以后篡权扫除障碍。韩信被降职为淮阴侯，汉高祖本来没有立即杀掉他的意思，可是吕后乘着汉高祖外出平定叛乱的机会，设个圈套把韩信骗进未央宫，关进钟室里偷偷杀掉了。彭越本来并没有谋反，是被人诬告谋反才叫汉高祖逮住治罪的。汉高祖也因为他的功劳大，谋反的证据不足，不想杀他，而是把他削职后放逐到蜀地去。彭越离开洛阳去蜀古代瓷器地，在路上碰见了吕后，他哭着向吕后求情，说自己没有罪，不要把他放逐到偏远的蜀地，要求回老家昌邑去。吕后当面满口答应，带着彭越回到洛阳。可是她一见到汉高祖，却说："像彭越这样有本领的人，把他放逐到四川去，这不是留下后患了吗?不如把他杀掉，现在我已经把他带回洛阳来了。"于是她找了个假证人出来告发彭越，把彭越杀死，并且灭了彭越的三族——父母、兄弟、妻子。

汉高祖杀戳异姓功臣，吕后起了不小的作用。等到汉高祖一死，她就杀起刘姓王来，进一步为篡权做准备。她用残酷的手段先后杀死了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发、逼死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几年当中，把汉高祖的八个儿子杀了四个。还有一个齐悼惠王刘肥，差一点也被吕后害死，后来他向吕后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献了一个城阳郡，才换得了一条命。

吕后杀害赵隐王刘如意和他母亲戚夫人的手段，真可以说是残酷到了极点。原来如意的性格作风很像汉高祖，是汉高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汉高祖生前多次想废掉优柔寡断的太子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大臣们的反对，才没有办成。汉高祖死了以后，吕后先把如意的母亲戚夫人打入冷宫，给她脖子上套个囚犯的铁箍，穿上囚犯的衣服，罚她一天到晚舂米〔舂chōng〕，舂不到一定数量的米，就不给饭吃。接着，吕后把赵隐王如意从封地上召到京城里来，准备杀害他。汉惠帝刘盈从小和如意在一起玩耍，虽说是异母兄弟，感情却很融洽。汉惠帝听说母亲吕后把如意召来，知道他凶多吉少，就赶快把如意接到皇宫里，吃饭睡觉都跟他在一起，尽一切可能保护他。由于有惠帝的保护，吕后

好几个月都没有能够对如意下毒手。有一天，汉惠帝清早起来去打猎，如意因为睡懒觉，没有起来跟着去。吕后找到了可乘之机，就派人送去毒酒，把如意害死了。如意死后，吕后叫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掉眼珠，熏聋耳朵，灌了哑药，把她叫做“人彘”〔zhì，古时候叫猪作彘〕，关进了厕所。过了几天，吕后叫汉惠帝来看“人彘”。汉惠帝一看，认得这个没有了手脚、又瞎又聋又哑的“人彘”，原来是他父亲汉高祖生前最宠爱的妃子戚夫人，吓得他号啕大哭，病了一年多。他在病中派人送信给吕后说：“把人害得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的行为。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从此，他就一天到晚饮酒作乐，不再管理国家大事，到他即位后的第七年八月，就忧忧郁郁地死去了。

汉惠帝死后，吕后假惺惺地哭了一场。可她只是干号，没有掉下一滴眼泪。这时候，张良的儿子张辟疆在朝廷里做侍中的官，他虽然只有十五岁，却看出了吕后假哭的秘密，就跑去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一个儿子，如今死了，可太后哭泣的时候一滴眼泪也没有，您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陈平反问他：“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呢?”张辟疆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很害怕你们这些功臣。您现在去请求任命太后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让他们带兵，请吕家其他的人进宫执掌大权，这样太后就放心了，你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陈平是个足智多谋、又十分忠于刘汉王朝的人。他对吕后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不过认为吕后篡权的面目还没有暴露，目前还不能和她硬顶，最好还是顺着她的意思来。陈平听从了张辟疆的意见，进到皇宫里一说，吕后真的高兴了，再哭果然有眼泪了。但是，吕后一家篡权的活动也就从此全面展开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惠帝的张皇后一直没有生儿子，吕后叫她在衣服里塞些东西，让衣服鼓起来，假装怀孕了，到时候，抱来一个宫中美人生的婴儿，假称是皇后所生，并且把那个美人杀了灭口。汉惠帝死后，这个抱来的婴儿即位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少帝。其实，这个少帝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傀儡，当时的一切号令都由吕后发出，她实际上在行使皇帝的权力。

吕后篡权以后，想封吕家的子侄为王，巩固她的地位。她先征求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是个直心肠，他不懂得吕后的用意，当面表示反

对说："不行!高祖在世的时候，曾经杀白马订盟约，规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讨伐他。'如今您要封吕家的人为王，这是违背盟约的事，我不能同意!"吕后听了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她就免掉了王陵右丞相的职务，叫他去做少帝的老师。王陵很生气，推说有病，告假回故乡去了。吕后赶走了王陵，把左丞相陈平升任右丞相，把自己的亲信审食其提拔为左丞相。汉朝时候，右丞相的职位在左丞相之上。

接着，吕后向大臣们放出口风，极力夸奖自己的侄子吕台如何如何能干，意思是想叫大臣们出面，请封吕台为王。大臣们顺从了吕后的意见，替吕台请封。吕后把吕台封为吕王，把济南郡作为他的封国。后来又封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台的儿子吕通为燕王，还封了六个吕家的人为列侯。谁知道吕台没有福气做王，不到一年就得病死了，由他的儿子吕嘉继承为吕王。

再说那个少帝，后来长大了一点，对于人世间的事情已经少许懂得一些了。他听说张皇后不是他的母亲，吕后不是他的祖母，他自己的母亲已经被害死了，就愤愤不平地说："太后怎么杀了我的母亲?我现在还小，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替我母亲报仇!"吕后听到了这番话，害怕将来真的出乱子，就把少帝偷偷杀害了，又找了个名叫刘弘的小孩子来做皇帝，照旧由她自己执掌朝政大权。到这时候，吕后和她的侄子侄孙们，已经把刘姓的天下篡夺去了。周勃安刘被吕后找来继承帝位的那个小谈子刘弘，历史上也称他为少帝。少帝刘弘即位的第四年，吕后病倒了。她怕自己死后吕家的人倒霉，就指派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管都城北边的皇家警卫部队；指派梁王吕产掌管都城南边的警卫部队。她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生前曾和大臣订过盟约，'不是刘姓的人称王，天下人共同讨伐他'。如今咱们吕家的人封了王，大臣们一定不服气。我死了以后，皇帝年纪幼小，大臣们恐怕会发动叛乱，你们千万要抓好兵权，守住皇宫。你们不必为我送丧，以防被人暗算。"说完，她就死去了，遗嘱中指定梁芏吕产担任相国，把吕禄的女儿配给少帝刘弘做皇后。

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是吕禄的女婿，吕禄他们想要篡夺刘姓天下的阴谋，刘章从妻子那里打听得一清二楚。吕后一死。他赶快派人去告诉自己的哥哥齐哀王刘襄，叫他带兵从外面打进来，消灭诸

吕。齐哀王刘襄一边出兵，一边写信给诸侯王，控诉吕后一家的篡权行为，提议联兵杀掉吕家那一帮人。

吕产等听说齐哀王出兵打来，赶快派大将军灌婴带兵去阻击。灌婴带兵来到荥阳，暗地里思量着："吕家那一帮人控制住了关中地区，想要篡夺刘家的天下，我如果去打齐哀王，就等于帮了吕家的忙，这是违背高祖盟约的行为。"于是他在荥阳屯兵不动，并且同齐哀王订了密约，准备一起除掉诸吕。这样他们就在东面对诸吕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

再说京城里面，赵王吕禄、梁王吕产控制住了北军、南军，并且大量起用吕家的人，排挤朝廷上的大臣，准备全部篡夺刘姓的天下。太尉周勃本来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是也被吕禄、吕产篡了权，不让他指挥军队。周勃跑去和丞相陈平商量除掉诸吕的办法。他们听说曲周侯郦商老病在家，他的儿子郦寄和吕禄是好朋友，于是就派人把郦商软禁起来，叫郦寄去劝说吕禄，请吕禄交出兵权，请吕产交出相印，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并且告诉他们，这样做，齐哀王派出的军队就会退兵，大家就都能过太平日子。

古代风景画鉴赏吕禄相信郦寄的话，害怕遭到齐哀王和灌婴联军的进攻，准备把兵权交给太尉周勃。他派人去报告吕产和吕家其他的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的说这样做有利，有的说这样做不利，互相争执不下，一时决定不下来。

曹参的儿子曹窋〔zhú〕，在朝廷里担任御史大夫，能够知道吕产他们的动静。有一天，吕产的亲信贾寿从齐地回来，把灌婴和齐哀王等人联合的消息告诉了吕产，将吕产埋怨了一顿，然后出谋说："你早先不到自己的封地上去，现在虽然想去，已经来不及了。当今之计，最要紧的是赶快占领皇宫，控制皇帝，以便利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来对付那一帮反对你们的人。"曹窋探听到了吕产和贾寿的密谋，赶快跑去向陈平和周勃报告。

周勃一方面从襄平侯纪通那里弄到了进入北军的符节（相当于通行证），一方面叫郦寄和刘揭去警告吕禄，叫他交出兵权。吕禄不得已交出了大印，到自己的封地上去了。周勃拿了符节和大印，进了北军，立

即下命令说："现在吕家想要篡夺刘家的天下，你们愿意跟着吕家的，脱下右臂的袖子；愿意帮助刘家的，脱下左臂的袖子!"将士们本来就不同意吕家篡权的行为，如今听到周勃的命令，都脱掉了左臂的袖子，表示愿意跟着太尉去消灭诸吕，维护刘姓的江山。这样，北军全部被接收过来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可是吕产还把持着南军的大权不肯撒手。丞相陈平叫朱虚侯刘章去帮助太尉周勃。周勃命令刘章守住军门，命令平阳侯曹窋去告诉守卫皇宫的武官，不许相国吕产进入宫门。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交出北军的军权，冒冒失失地想冲进未央宫去劫持皇帝，发动叛乱。可是他走到东门，东门的卫兵挡住了他；走到西门，西门的卫兵也不许他进去，他只好在皇宫的庭院里往来徘徊，思考下一步如何行动。

平阳侯曹窋看到吕产的狼狈相，赶快去报告太尉周勃，周勃命令朱虚侯刘章说："你赶快进宫去，保卫住皇帝，逮捕吕产!"刘章请求拨给他士兵，周勃给了他一千精兵。

傍晚时分，刘章率领一千精兵来到未央宫，向吕产发动攻击。吕产匆匆忙忙地逃到郎中府的厕所里去躲藏，结果还是被搜出来杀了。刘章完成任务以后，到北军向太尉周勃告捷。胤勃向刘章祝贺，对刘章说："你立了一大功。我最担心的是吕产，因为他比吕禄更难对付，现在把他除掉了，天下就太平了。"

第二天，周勃和其他的将军、大臣们商量之后，派军队到吕禄的封地上逮捕了吕禄，也把他杀了。接着，又到各地去搜捕吕氏一族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杀了个一干二净。周勃没有辜负汉高祖刘邦的期望，在消灭诸吕叛乱、安定刘姓天下的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汉文帝治国周勃联合大臣和将军，粉碎了诸吕的篡权阴谋，安定了刘姓的天下。他和丞相陈平等在一起商量说："少帝刘弘不是惠帝的儿子，不应当由他来做皇帝；代王刘恒是汉高祖的儿子，皇位应当由他来继承。"于是他们就派人去迎接代王刘恒。代王刘恒汉文帝谦让了一番，最后正式即位称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

刘恒八岁的时候被封为代王，二十四岁做了皇帝。他的母亲是汉高

祖的妃子薄姬。薄姬因为害怕吕后，长期和儿子住在封地上，不管汉朝中央政府里的事情，所以他们母子俩没有引起吕后的注意，没有受到吕家那一帮人的陷害。汉文帝做了皇帝以后，看到受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起来，老百姓都很穷苦，政府想要收捐收税也收不起来。因此，他想到首先要办的事情是恢复农业生产。春耕开始的时候，他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到首都长安的郊外去耕地、下种。他还叫皇后在皇宫的园地里种桑养蚕，为广大农民做出榜样。

汉文帝知道发展生产得由人去做。老年人生产经验比较丰富，小孩子长大了就是搞生产和当兵的人力，应当敬老抚幼。他在即位之初就下了一道命令，叫政府要关心无儿无女的老公公老婆婆，关心没有父母的孤儿。政府借钱给这些可怜的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后来他又从政府的仓库里拨出一部分麻布、绸缎和丝绵来，分发给他们做衣服穿。对于那些有儿有女而岁数特别大的老年人，汉文帝也特别尊敬他们，规定家里有八十岁、九十岁以上老人的，可以减轻赋税负担。为了照顾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特点，政府按月发给老年人熬粥用的大米，还发给他们肉，使他们能够生活得愉快。

汉文帝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受人欢迎的是减轻刑罚。他首先废除了一人犯法父母妻子同坐的法律，后来又规定了罚钱赎罪的法律，并且还废除了肉刑。

罚钱赎罪的法律是在张释之做廷尉的时候规定的。廷尉张释之严格执行这一条法律，连冲撞了皇帝圣驾这样的重大事件，也可以用罚钱来赎罪。有一次，汉文帝坐着马车外出巡视，当马车行经中渭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冒冒失失地从桥下跑出来，吓惊了拉车的马，差一点把汉文帝从马车里摔出来。汉文帝十分生气，赶快派兵捉住了那个冒失鬼，把他送到廷尉张释之那里去治罪。张释之仔细地审问了那个人，问他为什么要冲撞皇帝的圣驾?那人回答说：“我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听说皇帝出巡，街上禁止行人，我很害怕，就躲藏在桥下。我躲了很久，以为皇帝的圣驾已经走过去了，我就钻了出来，谁知道一出来就正好碰见了皇帝的圣驾，我怕被卫兵捉住杀头，所以只好赶快逃走。哪里知道，我这一跑就会把马给吓惊了呢!”廷尉张释之认为这个乡下人说的都是实话，虽然他冲撞了皇帝的圣驾，犯了大罪，但是他毕竟不是有意的，所以就

判他罚钱赎罪。

汉文帝对于这个判决很不满意，他生气地说："这个家伙惊了我的马，幸亏马的性格还比较温驯，如果换了一匹烈性马，拚命奔跑起来，把我摔下车，我的命不就完了吗?像这样严重的罪行，你这个管法律的廷尉只判他罚钱赎罪，这不是太便宜了他!"张释之从容地回答说："陛下订的法律是治理天下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就应当照着去实行，故意加重治罪，就使法律在老百姓中间失去了信用。陛下既然把这个案件交给我处理，我就要处理得公平，不能因为陛下受了惊吓而把案子判重了。罪行有轻有重，轻罪重判，怎么能够叫老百姓服气呢?希望陛下平心静气地考虑考虑吧!"汉文帝听了张释之的辩解，想了很久，说："廷尉说得对。乡下人胆子小，罚他一些钱，把他放了吧!"

汉文帝还下过一道命令，规定老百姓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或愿意给皇帝提个合理建议的，可以给皇帝上书。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法令，就是在一个叫做淳于缇萦〔tíyíng〕的小姑娘给他上书以后颁布的。

那是在汉文帝做皇帝的第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一位著名的医生、齐国太仓县的县令淳于意犯了法，被判处肉刑。那时候的肉刑有三种：在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砍去左脚或右脚。因为淳于意是县令，是现任官吏，地方上只有判罪的权；判罪以后，要把犯人从齐国押解到首都长安，由朝廷的司法机关来执行肉刑。

淳于意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他被解差押着动身的时候，跺着脚叹气说："唉!生女不生男，有了急事，没有一个能顶用的!"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听了这话，又是伤心又是气愤，她一边哭一边想：女孩子为什么就不顶用?我一定要跟着父亲到长安去，想办法搭救父亲。于是她收拾行李，跟着父亲到了长安。

缇萦到了长安，听说人们有什么急难可以给皇帝上书，她就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书信，亲自送到皇宫里去，请求卫兵转呈给缇萦决定跟着父亲到长安去，想办法搭救父亲。

缇萦在书信里写道："我是太仓令淳干意的小女儿，名叫缇萦。我父亲在齐王的封国里做官，当地老百姓都称赞他廉洁公平，是个清官；精

通医道，又是个著名的医生。如今他犯了法，应当受到肉刑的处罚。肉刑是一种可怕的刑罚，就像一个人死了不能复生一样，割了鼻子不能再长起来，砍了脚不能再接上，脸上刺了字也破了相，以后虽然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补救了。我情愿让官家收做奴婢，替我父亲赎罪，让他有改过自新免受肉刑的机会。”

古代铜器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信，觉得这个小姑娘态度很诚恳，写的又是大实话，肉刑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刑罚，损伤了肉体是无法补救的。于是他对制订法律的官员们说：“刑罚的作用是警戒人们不要犯法。如今实行的三种肉刑都过于严重了，脸上刺字、割鼻子、砍左右脚，都害人一辈子，以后他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补救了。应该改订一下法律，废除肉刑，用别的刑罚来代替它。”

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在一块儿合计以后，建议以罚做苦工来代替脸上刺字，以打三百板子来代替割鼻子，以打五百板子来代替砍脚。他们把这种新办法呈报给汉文帝，汉文帝觉得很好，就批准实行。

从此，肉刑正式废除了。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不但救了她的父亲，并且使天下该受肉刑的犯人都减轻了刑罚。

可是汉文帝改革肉刑的做法是不彻底的，因为打板子使皮肉受苦，仍然是一种肉刑。板子打得重了，打不到三百五百就能够把人打死。后来，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又进一步改革。把该打五百板子的减为打三百板子；该打三百板子的改为打一百板子。打人用的板子，也改小改薄，并且规定一律打屁股，不许打身上别的地方。打板子的时候，由一人打到底，中途不许换人。这样，肉刑虽然没有完全废除，但是又进一步减轻了一些，对人民还是有利的。平定七国之乱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的过程中，分封刘姓子弟为王，去接替空出来的王位，那就是同姓王。同姓王起初只有九个，后来逐渐增加，传到汉文帝刘恒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二十多个，其中领地最大的有齐、楚、吴、荆、燕、淮南等。这些王国所领有的土地，合起来占了西汉帝国土地的大半。皇帝直接统辖的地区，仅仅只有十五个郡，并且这十五个郡当中往往还有列侯和公主的领地，真正属于皇帝能管辖的土地，也就只有十个郡左右。

刘邦生前认为同姓王都是他的兄弟子侄，是靠得住的，可是事实上同姓王势力大了照样也会造反，要来夺取皇位。汉景帝时候的七国之乱，就是同姓王想来夺取皇位的一次严重叛乱。

早在七国之乱以前，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六年（公元前174年），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已经发动过叛乱，因为叛乱的范围比较小，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影响不大。比这两次叛乱更早一些，吴王刘濞也已经在准备叛乱了。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二十岁的时候被封为吴王，掌管东南地区三郡五十三城的封地。他倚仗自己封国内自然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大量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蓄积财富。他为了收买民心，宣布免除封国内的赋税，并且招降纳叛，拚命扩张势力，准备用武力推翻汉朝的中央政府。

第二十五章

汉文帝立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不久，吴王刘濞把他的儿子送到长安来，名义上是陪伴太子一块儿学习、玩耍，实际上是送个儿子到皇宫里作抵押，迷惑一下汉文帝，表示他并没有谋反的野心。太子刘启和刘濞的儿子都很喜欢赌博，两个年轻人火气都很旺，赌着赌着就会吵起来，有时候甚至还动手打架。有一次，两个人又打起来了。太子刘启顺手抄起赌博用的木盘，扔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刘濞的儿子给打死了。刘启派人把死者的遗体送回吴国去安葬。吴王刘濞看到儿子的遗体，先是大哭一场，接着怒气冲冲地说："我和当今皇上是同一个爷爷的孙子。我的儿子既然死在长安，就应当在长安的皇陵里安葬，为什么要送同来?"他派人把儿子的遗体又送往长安，硬要在皇陵里安葬，用这种要挟的手段向汉文帝示威，并且从此以后，他就假装有病，不再到京城里朝见皇帝，更积极地准备造反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对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王国叛乱事件，一些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大臣和官吏，都感到事态严重，应当迅速谋求解决的办法。有个叫做贾谊的大臣，曾经给汉文帝上书，指出当时王国势力过于强大，犹如一个人犯了肿病，一条腿肿得像腰那么粗，一个指头肿得像一条腿，应当赶快医治才好。贾谊认为医治的办法最好是分割诸侯的王国，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也就不会造反了。太子刘启的管家晁错〔晁cháo〕，也跟贾谊有同样的看法，建议汉文帝削减王国的领地，分散他们的力量。汉文帝明知他们的建议都很好，可是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不能太性急了。他只是在齐王刘侧死后，因为没有儿子继位，才把领地最大的齐国分成了六个小国，又把曾经发动过叛乱的准南国分成了三个小国。

古代山水画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在四十六岁那年去世了。太子刘启做了皇帝，就是汉景帝。汉景帝任命自己的管家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又一次建议削夺王国的领地。他对汉景帝说："吴王因为儿子被打死，假装有病不来朝见天子，这种狂妄的行为，按照古代的礼法应当杀头。现在他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应当趁早削夺他的领地。"汉景帝

说："削夺他的领地，他造起反来怎么办?"晁错说："削夺他的领地，他要造反；不削夺他的领地，他也要造反。削他的地，他早一点反，危害小一些；不削他的地，他晚一点反，准备得更充分了，危害就更大。"汉景帝认为晁错说得有道理，就开始实行削弱王国的措施。他先从其他几个王国下手，先把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一个郡和胶西国的六个县削减下来，划归汉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吴王刘濞看到汉景帝已经削了三个王国，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决定用武力对抗。他联合了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áng〕、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一起出兵，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起兵的名义是"清君侧"，就是要求杀掉汉景帝身边主张削弱王国的晁错。这当然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吴王刘濞纠集分裂割据势力，想要夺取汉景帝的皇位。汉景帝一方面派太尉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等分头率军应战，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战事扩大，真的把晁错杀了，借以缓和七国的敌对情绪。汉景帝虽然杀了晁错，可是吴楚七国仍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还是一个劲儿的向西北进军。

古代风景画鉴赏被汉景帝派去平乱的太尉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很善于用兵。他接受平乱的任务以后，对汉景帝说："楚国军队很剽悍〔piāo hàn〕，跟他们正面作战很难取胜，应当断绝他们的粮道，才能制服他们。"汉景帝批准了周亚夫的作战计划，周亚夫领兵出发了。

军队来到霸上，有个叫赵涉的人拦住周亚夫的马车献计说："吴王刘濞占据的地方很富饶，他招兵买马，想要造反已经很久了，这次您出兵去征讨，他一定会在半路上山势险峻的地方设下埋伏，袭击您的队伍，所以您千万不要从老路行军；应当走蓝田，出武关，直奔洛阳，走这条路虽说远一些，路上要多花一两天时间，但是走这条路出于吴王他们的意料，他们一定没有防备，等到您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以为您是从天而降的。"周亚夫接受了赵涉的意见，大队人马从右路直奔洛阳。

赵涉的建议果然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周亚夫率领的大军很快截

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得联军的粮食供应发生很大困难，士兵由于饥饿，纷纷逃散。周亚夫乘机发动猛烈进攻，把吴楚七国联军打得大败。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带了几千人冲出重围，逃到长江南岸的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他想去联合东越兵卷土重来，可是周亚夫早已悬赏一千斤金子购买他的脑袋，所以东越人不但不帮助他，反而乘机杀了他，把他的脑袋献给了周亚夫。至此，历时约三个月的吴楚七国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了。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才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障。独尊儒术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安心从事生产。他很懂得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搞好了，政府才能收到更多的赋税。他给地方官吏下命令说：“黄金、珍珠、宝玉这些东西，肚子饿了不能当饭吃，身上冷了不能当衣穿，不如粮食、丝、麻这些东西更实惠。你们做地方官的应当劝农民种好粮食和桑麻，使得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政府能够收到更多的赋税。”为了鼓励农民生产，汉景帝把赋税减到三十税一，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按三十分之一的比例交赋税。

汉朝在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渐安定了。所以历史上有“文景之治”的说法。汉景帝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彻即位，就是雄心勃勃的汉武帝。

西汉前期的其他几个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但是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好处的。农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和提高生产技术，所以在当时，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汉武帝刘彻在位的时候，有个管理农业的官吏名叫赵过的，在总结农民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代田法和耧犁。

代田法就是在一块田地里实行垄沟轮作的办法。耕种的时候，先把土地犁成一条条互相间隔的垄和沟，垄比沟高出一尺，种籽播在沟里。在庄稼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地把垄上的土培到沟里，使庄稼的根扎得深，耐风耐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成。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垄沟的位置互相调换，使土地轮流休耕，恢复地力，使农作物能够增加产量。

耧犁是一种播种的农具，由耧斗、耧腿、犁铧和耧把四部分构成。耧斗是盛种籽用的。耧腿有两条或三条，细长中空，上面与耧斗相通，下面装有一个小犁铧。播种的时候，用牲口拉着耧前进，耧腿下面的小犁铧就在地上开沟，人扶住耧把来回摇动，种籽就通过空心的耧腿均匀地播到了地里。这样，既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播种的速度，又提高了播种的质量，能够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丝织、冶铜、漆器是西汉时期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西汉时期的古墓，出土了许多文物。像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铜器，制作十分精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和漆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长期的战乱，西汉初期，人口稀少，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国家相当贫穷。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国家逐渐地富裕起来了。据说到汉武帝刘彻即位的时候，政府里存钱和储粮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钱库里积累的钱多得数都数不清，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一年一年往上堆积，都露到了外面来，有些已经霉烂了。

经济上这样富裕，文化自然也相应地发达起来。西汉前期，在文学、音乐等方面都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

汉武帝很喜欢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叫做辞赋的文体，谁能跟他谈论辞赋，他就给谁官做。司马相如写的赋，文字优美，描写细腻，立意新颖，是当时最负盛名和广泛流传的文学作品。据说司马相如长得一表人才，善于弹琴，但是因为家里穷，大富翁卓王孙起初不愿意把女儿卓文君嫁给他。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只好偷偷地一起出走，逃到外地开一家小酒店维持生古代石器活。司马相如系着围裙亲自洗碗洗碟，卓文君在垆（放酒瓮的土台子）旁边卖酒。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当垆”〔垆lú〕的故事。有一次，汉武帝看到了司马相如写的赋，赞叹说：“写得多好的赋呀!可惜我没有缘份跟这赋的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给汉武帝养猎狗的杨得意是司马相如的同乡，他听到汉武帝的赞美，对汉武帝说：“禀告陛下，这赋的作者并非古人，他如今还在，就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汉

武帝听了很高兴，立即下令召见司马相如，封他做了大官。卓王孙本来对女儿女婿一个钱不给，如今一听到女婿有了出头之日的消息，就立即把自己的财产分出一部分来给女儿女婿，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成了大富翁。

西汉著名的辞赋家还有枚乘、贾谊、扬雄等人。西汉辞赋家共作赋一千多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汉武帝也很喜欢诗歌和音乐，他在政府里设立了一个叫做“乐府”的机构，专门负责搜集诗歌，配制乐谱，训练乐工，演唱歌曲。汉朝的乐府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支艳丽的花朵。乐府诗的内容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有揭露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有描写爱情的，也有鼓励人们上进的。有一首题为《长歌行》的乐府诗，全诗十句，五十个字，以自然界的现象作比喻，说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应该及早努力，不要耽误了青春。诗的最后四句是：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四句诗被后来的人们当作激励自己上进的座右铭，算得上是千古名句。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全国实行了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进一步实行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境内）人，是个精通儒家学说的大学问家，在汉景帝时候做过博士官。他看到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几次王国谋反的事件，认为应当宣传大一统的思想，巩固皇帝的中央集权的地位。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改造了由孔子创立经过孟子发展的儒家学说，并且把各家学说和阴阳五行等迷信思想融合在一起，使儒家学说变成了一种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的、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理论。他在汉武帝下诏选举“贤良之士”的时候，给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的建议。什么是天人三策呢?董仲舒说：天是有意志的，人世间的

事物，是按照天的意志存在和变化的。皇帝是老天爷的代表，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爷授予的，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老天爷，就是服从天道。在天道之下，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必须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的礼节，绝对不许违反这种礼节。董仲舒在建议里还说，诸子百家的学说妨碍皇帝的绝对权威，只有儒家学说才能保持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都应当禁止传播，从此以后只许把儒家的经书《诗》《书》《礼》《易》《春秋》等传授给读书人，诸子百家的著作一律不许作为教学的内容。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建议很适合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就在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下令在政府里设置了专门传授儒家学说的五经博士，在五经博士下面配置了五十名弟子员。这些弟子员在五经博士的指导下攻读儒家经书，规定每年进行一次考试，五经中能学通一经的就可以做官，成绩优良的还可以做大官。后来，博士弟子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最多的时候增加到了三千人。这样一来，儒家的经书就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学习儒家学说成了做官的主要途径，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被排斥了。依靠儒家学说做了官的人，自然按照董仲舒的那一套来帮助汉武帝治理天下，并且用儒家学说来教育子孙后代。从董仲舒的时候起，中央集权的思想成为中国社会里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几乎完全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的思想文化领域。

汉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来说，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把君权神化了，把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自由宣传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权利给剥夺了，这就起了禁锢人们头脑的坏作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坏影响。后来，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对儒家学说作了补充和发展，使它更适合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儒家学说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成为一种顽固保守的学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长达二千多年之久，同汉武帝和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是分不开的。飞将军李广汉武帝以前的帝王一般用甲子纪年。汉武帝即位以后，正式设立了年号，用一个吉祥好听的词命名。比如汉武帝即位时候立年号为“建元”，那一年就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往后依次计算。年号用两个字的多，也有用四个字的。新皇帝即位，在第二年改年号，叫做“改元”。一个皇帝还会多次改年号，也叫改元。只有后来的明朝和清

朝实行一帝一元制。我们这部书，为了叙述方便，从这里起，提到年代的时候，也都写明年号，同时仍注明公元年代。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国家很是富强。可是汉武帝并不怎么愉快，因为他还有桩心事没有解决。这桩心事就是北方的匈奴还不断来骚扰，使得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

秦始皇的时候，大将蒙恬把匈奴逐出河套地区，使得匈奴在很长一段时间无力南下。到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相争的时候，匈奴才又逐渐地强盛起来。匈奴的领袖称为单于，到冒顿〔这里读mò dú〕做单于的时候，匈奴往东灭亡了东胡族，势力发展到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西边赶走了月氏国〔月氏，这里读yuèzhī〕，势力扩展到现今的新疆和新疆以西地区；西北和北边征服了乌孙等小国和部落，势力到达中亚东部和西伯利亚一带；南边又控制了河套地区，到达现今的陕西和山西北部。

汉朝建立以后，汉高祖曾经想要解决匈奴的问题，他于当皇帝的第三年（公元前200年）亲自率领步兵32万北上迎击匈奴，因为中了埋伏，在自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南）被围七天七夜，险些做了俘虏。突围脱险以后，汉高祖认为汉朝正处在战乱之后，实力薄弱，一时还对付不了匈奴，就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朝宗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送给匈奴许多绸缎和酒等物资，并且和匈奴结为兄弟。以后，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和汉景帝，都一直实行这种委曲求全的和亲办法，来求得跟匈奴的和好。可是，匈奴的统治者并不满足，他们还是经常地派骑兵来窜扰汉族地区，掳走人民，抢走牲畜、粮食和其他物资，使北方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古代铜器汉武帝即位之初，表面上还在维持跟匈奴和好的关系，给匈奴送去优厚的礼物，实际上由于国力充足，已经在积极准备用武力征讨匈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大将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等五人，率领三十万兵马，搞了个“马邑之谋”，就是把兵马埋伏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县）城外的山谷中，然后派马邑人聂翁壹假装到匈奴去投降，愿意把马邑城出卖给匈奴。匈奴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富，真的率领十万骑兵跟了来，可是当他们进军到武州边塞（今山

西省左云县）的时候，看到草原上布满了牛羊而没有人放牧，就产生了怀疑，再仔细一观察，发觉汉朝设有埋伏，就半路退兵回去，没有中计。从此以后，汉朝和匈奴就完全断绝了关系，大规模的战争也随着开始了。

在汉朝和匈奴的战争中，李广是出过不少力气的一员猛将。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他家世世代代擅长射箭，李广也以善射出名。汉文帝的时候，李广在一次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了战功，被提拔为皇帝的侍卫官。李广经常陪着汉文帝出去打猎，他那百发百中的箭法，每次都使汉文帝满载而归。汉文帝很高兴，他曾经对李广说：“可惜你生在今天，只能陪着我打打猎，要是你生在高祖那个时候，封个万户侯是不成问题的。”

汉景帝的时候，有一次，李广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去追赶三个匈奴人，射杀了两个，活捉了一个，然后准备往回撤退。这时候突然来了几千个匈奴骑兵。汉兵看了很害怕，都想赶快逃走。李广说：“咱们离开大军有几十里地，如果就这样逃走，匈奴人追上来，一阵乱箭就能把咱们全部射死；如果咱们不走，匈奴人必定以为咱们是大军派出来诱敌的，就不敢来打咱们。”说着，他下个命令。叫大伙儿迎着匈奴人前进。到了离匈奴骑兵大约二里的地方，李广叫大伙儿停止前进，下了马，把马鞍也卸了下来，在草地上休息。大伙儿着急地说：“敌人那么近，卸了马鞍，万一池们冲过来，怎么办?”李广说：“咱们卸下马鞍休息，敌人摸不清底细，决不敢冲过来。”果然，匈奴人老远看到李广他们下马休息，就犯了疑心，也勒住马头，不再前进。有个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奔跑过来，想靠近一点看个仔细。李广立刻上马迎上去，只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李广回到原地，叫大伙儿都躺在草地上休息。天慢慢黑下来了，匈奴人一直以为汉军有埋伏，不敢发动进攻，到半夜里，悄悄地退走了。天一亮，李广他们看到匈奴人已经退走，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互相拍拍肩膀，说声“好险哪!”然后奔回了大营。

因为李广这样机智勇敢，所以汉朝皇帝很器重他，边境上哪儿形势吃紧，就把他派到哪里去。李广先后做过陇西、北地、雁门、云中等地的太守。他到了哪儿，哪里的匈奴人就望风逃走。匈奴人给李广起了个外号，叫他为“飞将军”。

“马邑之谋”以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四人，分头带兵去抵抗匈奴。匈奴人害怕李广，就设了埋伏，要活捉他。匈奴人事先挖下陷阱，再和李广对阵，假装被打败了，引诱李广去追赶他们。李广光看到前面是平展展的草地，没有想到匈奴人挖有陷阱，就追了上去。追着追着，只听“嗯啦”一声，李广连人带马都掉进了陷阱，他被匈奴人活捉了。

匈奴人捉住了李广，生怕他逃跑了，就把李广装在用绳子结成的大网兜里，用两匹马吊着大网兜，把他送到单于那里去报功。

李广窝在网兜里，闭上眼睛装死。走着走着，他微睁眼睛，偷偷地瞧见旁边一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就一个鲤鱼打挺，从网兜里一跃而起，跳上那匹好马，夺了那个匈奴兵的弓箭，拚命地往回奔跑。几百个匈奴骑兵追了上来。李广一连射死了前面的几个追兵，终于逃了回来。

李广打了败仗，做了俘虏又逃回来，按照当时的军法应当杀头。好在汉文帝已经订下了罚钱赎罪的规矩，李广就交钱赎罪，回家做了平民。

又过了几年，匈奴进攻辽西郡，杀了太守，打败了汉朝的大将韩安国。韩安国被调到右北平，没过多久就病死了。汉武帝觉得还是李广能干，又起用他，派他做右北平太守。匈奴人听说李广来到右北平，赶快逃走，好几年都不敢来骚扰。

匈奴人一逃走，边境上暂时没有战事，李广常常带着一些将士外出打猎。当时右北平山里有不少老虎，李广一连射死了好几只老虎。艺高人胆大，李广常常等老虎扑近的时候才射箭，所以箭无虚发，准能把老虎射死。有一次，一只猛虎朝李广迎面扑来，李广不慌不忙地往下一蹲，让猛虎从自己头顶上扑过去，然后对准猛虎的心窝，只一箭，就把猛虎射死了。

有一天，李广和将士们打猎回来，天色已经很晚，他们刚转过一个山坡，突然瞧见迎面的乱草丛中蹲着一只斑斓猛虎，正准备向他们扑过来。李广赶快拈弓搭箭，用足全身力气，一箭射去，只听“嗖”的一声，射个正着。将士们赶快提着剑跑过去逮老虎，可是跑近一看都愣了，原

来草丛中并没有老虎，只有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李广的那支箭，竟然射进了石头!箭怎么能射进石头里去?大伙儿很奇怪，李广自己也很纳闷。他站在原地又一连射了几箭，石头上只迸把握出一些火星，再也射不进去了。

飞将军李广一箭射进石头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匈奴人听了，更加害怕李广，赶快往西迁移，不敢再来骚扰右北平一带的边境地区了。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刘彻布置“马邑之谋”以前，为了征讨匈奴更有把握，详细询问了一些投降过来的匈奴人。这些匈奴人说：“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以后，曾经打败了月氏国，把月氏王的脑袋砍下来当作酒杯。月氏国被迫西迁到西域。月氏人恨透了匈奴，可惜没有人帮助他们，要是有人帮助，他们准能跟匈奴拚个你死我活。”

张骞汉武帝知道了这个情况，心想：月氏和匈奴有这样深的仇恨，我正好去联络他们，共同攻打匈奴。月氏在匈奴的西边，要是能跟月氏联络上，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胜利就大有把握了。于是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招募精明强干的人出使到西域去联络月氏。

月氏既然在匈奴的西边，要到月氏去必须经过匈奴。胆小的人听到这样的使命，吓得吐吐舌头，哪里敢来应征?

有个叫张骞的小伙子。胆子特别大。他认为打匈奴是为了汉朝的安全，出使月氏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即使要冒点风险，也是应当的。他就报了名，表示愿意应征。

张骞是汉中成固（今陕西省成固县）人，应征的时候在朝廷里做郎中的官。一些勇士看到张骞的榜样，也纷纷报名应征。有个叫堂邑父的匈奴降将也报了名。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也就是“马邑之谋”前五年，汉武帝正式任命张骞为使者，让他带了堂邑父当翻译，还有其他应征的人，组成了一百多人的队伍，从陇西（今甘肃省）出发，到西域去联络月氏国。他们一出陇西，就碰上了许多匈奴人，打起来了。因为寡不敌众，张骞和他带领的一百多人都被俘虏了。匈奴单于听说张骞是到月氏国去的，他生气地说：“月氏国在我们匈奴西边，我不同意你们通过我的地方

到月氏国去。”单于把张骞软禁起来。不过对张骞很优待，还嫁给他一个匈奴女人让他在匈奴享乐。可张骞心里却一直怀念着汉朝。他把汉武帝交给他的出使证明，偷偷地保存着，等待机会逃走。

过了几年，张骞和堂邑父两人终于找到了机会，弄到两匹好马，偷偷逃出匈奴，继续往西走去。他们一连走了几十天。一路上尽是沙漠和草原，找不到人家，也找不到食物和水。亏得堂邑父箭法高超，饿急了，就射些飞鸟和野兽来充饥。他们走着走着终于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鼻子高高的，眼睛蓝蓝的，他们以为那就是月氏国了，等到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国家不是月氏，是叫大宛。

大宛国国王早听说过东南方有一个又大又富庶的汉朝，他老早就想跟汉朝拉关系，却找不到门路，这次看到张骞，高兴极了，赶快拿出好酒和牛羊肉来招待张骞。张骞先向大宛王说明了出使西域的任务，然后说：“要是您能派人护送我到月氏去，将来我回到汉朝以后，一定请汉朝皇帝用许多金银财宝来酬谢您。”

大宛王自然乐意帮助张骞。他派骑兵和翻译，护送张骞和堂邑父到了康居，再请康居人护送他们到月氏国去。

月氏国自从国王被匈奴杀害以后，大臣们只好拥立了国王的夫人为王，西迁到了大夏国境内。大夏人打不过月氏人，向月氏人投降，两个国家合并成了一个国家，改名为大月氏国。大月氏所在的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四周围又没有一个国家能打得过他们，他们的生活十分安乐。生活一安乐，就把报仇雪耻的事情忘在脑后了。张骞几次向大月氏王陈述汉朝想和他们联合的意思，大月氏王总是故意把话岔开，不作正面回答。张骞在那里住了一年多，达不到目的，就只好往回走。

在回来的路上，张骞和堂邑父又被匈奴人捉住，软禁了一年多。后来正好赶上单于死了，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和堂邑父就乘乱逃走，回到了汉朝的首都长安。他们这次出使西域，一共花了十三年时间。去的时候，张骞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回来的时候，下巴颏上已经长了胡须了。去的时候，张骞带领了一百多人，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他和堂邑父两个人。

张骞这次出使月氏，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他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许多地方，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他听别人说，西域还有五六个大国，都是物产丰富，景色美丽的国家，并且也都很想和汉朝做买卖。特别有意思的是：张骞在大夏的时候，看到了那里有四川出产的邛竹杖和细布，问当地人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回答说是他们的商人从身毒国带来的。问他们身毒国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是在大夏东南几千里以外，那里靠近大海，地方潮湿，气候炎热，人们骑着大象跟别人打仗。张骞把这些情况都报告给汉武帝，并且分析说："大夏国在长安西南，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并且在那里能买到四川出产的东西，这说明那里离四川不远。如果再要出使大夏，从羌人那里走，地势险恶，羌人又不让过境；稍许偏北一点走，要经过匈奴地古代铜器界，容易被匈奴人捉住。现在如果从四川这条路走，又近又安全。"

汉武帝听说大宛、大夏和再往西去的安息，都是大国，物产丰富，好吃好玩的东西都很多，他们又愿意和汉朝来往。靠北边的大月氏和康居，兵强马壮，也值得跟他们建立关系。如果派能说会道的人去跟他们讲道理，宣传汉朝的富庶强大，一定能够使他们服从汉朝，拿他们的土特产来进贡。这样，汉朝等于扩充了几万里土地，还能得到许多新奇的东西，这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汉武帝同意了张骞的建议，决定派张骞从四川出发，再一次出使西域。

张骞从四川犍为（今四川省宜宾市）动身，把人马分成四队去探路，每一路都走了一二千里地，结果都被挡回来了，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地。

第二十六章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多名骑兵去征讨匈奴，张骞因为熟悉匈奴的地理形势，被汉武帝从四川召回，奉命随军出征。这一次出征大获全胜，消灭匈奴兵约四万人，并且使得匈奴内部分化，招降了一个昆邪王。张骞在战争中立了大功，回来以后，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

过了两年，张骞建议汉武帝去结交西域的乌孙国，把公主嫁给乌孙国国王，跟他们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做正使，带领副使和将士三百多人，带去许多金银、绸缎和牛羊，再次出使西域。张骞到了乌孙后，把副使分别派往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国，他自己留在乌孙，跟乌孙王拉关系。乌孙王因为不了解汉朝的情况，又害怕匈奴，一时决定不下来，想先派人到长安去看看，了解一些情况。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带着乌孙的使者回到长安。汉武帝热情招待乌孙使者，派人带着他到各地方去参观。乌孙使者亲眼看到了长安的繁华景象，看到了汉朝的繁荣昌盛。他回到乌孙以后，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了乌孙王。乌孙王听了很高兴，决定跟汉朝建立友好关系，并且娶了汉朝的公主做夫人。

张骞从乌孙回来，过了一年多就病死了。他死后不久，派到大宛等国去的副使，才陆续带着各国的使者回到长安。这些国家和乌孙一样，都跟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张骞和他的随从几次出使西域，对于沟通汉朝和西域的交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此以后，西域出产的葡萄、苜蓿、核桃、石榴和大蒜等，陆续传入汉朝，这些农作物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繁殖起来。汉族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打井和炼铁的方法，也传到了西域。西域的音乐舞蹈和乐器流传到了汉朝。汉族生产的丝绸等也带进了西域，并通过西域，进一步传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这样一来，汉朝、西域以至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后来，人们习惯上把由张骞开通的汉朝到西域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霍去病为国

忘家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被派去进攻匈奴并且大获全胜的霍去病，是汉朝赫赫有名的大将。那年，他才二十岁。

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他父亲是平阳县的一个衙役，被分发在平阳公主家里当差。他母亲是平阳公主的一个使唤丫头。霍去病出生在平阳公主府里，从小生活在奴婢群中，被看成是下等人。像他那样的人想要出头，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加军队，争取建立战功。霍去病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勤奋地练习骑马射箭等各种武艺，希望有朝一日到战场上去杀敌立功，以便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霍去病十六七岁的时候，武艺已经十分出众，被选中为保卫皇帝安全的侍中官。他十八岁那年，即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奉命出征匈奴。汉武帝认为这次出征十分重要，就把自己身边的侍中官霍去病拨给卫青指挥，并且赏给霍去病“票姚校尉”的官名，叫他带领八百名最精锐的骑兵，跟着卫青去作战。

霍去病得到这样一个建立战功的机会，自然十分高兴。他带领的八百名骑兵，成了这次战争中的突击队，经常被派远离自己的主力部队，到几百里路以外去寻找攻击的目标。他们一旦发现匈奴兵的力量比较单薄，或防备有些松懈，就像猛虎扑羊似地扑将过去，一下子把敌人消灭掉。卫青这次出征，打了不少胜仗，事后论功行赏，霍去病得了头功，被封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汉武帝任命霍去病做骠骑将军，率领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从陇西出发，去夺取河西走廊。霍去病虽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兵法，但是打起仗来很会用兵，他指挥的部队机动灵活，勇敢顽强，打得匈奴人连声叫苦。他们在燕支山一带转战六天，摧毁了匈奴人建立的一些小王国，最后终于跨越燕支，深人匈奴腹地一千多里，杀死了匈奴的折兰王和卢侯王及其兵将一共八千多人，生擒了浑邪王的王子和许多官吏。匈奴最能干的两个王浑邪王和休屠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只好连连后退。

古人出游图这一年夏天，霍去病率领的军队和公孙敖率领的军队配

合作战。半路上，公孙敖的部队困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没有能够和霍去病的部队去会师。霍去病设法掌握了匈奴兵的活动规律，大胆地采用孤军深入、直捣敌人心脏的作战方针，结果消灭匈奴兵三万多人，俘获匈奴单桓王及其官吏兵将几千人，还接受了匈奴兵将几千人投降。经过这次大战，霍去病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和大将军卫青齐名了。

卫青、霍去病等屡次打败匈奴，使得匈奴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匈奴伊稚斜单于严厉责备浑邪王，督促他向汉军发起反攻。浑邪王和休屠王商量以后，决定投降汉朝。他们派人跟汉朝联系，要求汉朝派人去接应。汉朝驻在河西的将军李息接见了浑邪王的使者，立即派人骑着快马到长安去向汉武帝报告。汉武帝恐怕浑邪王的投降有诈，就派霍去病带兵到河西去看情况受降。霍去病渡过了黄河，把军队排列好阵势，要求浑邪王过来投降。浑邪王也把匈奴兵排列好阵势，等候霍去病去受降。双方的阵营遥遥相望，形势显得十分紧张。浑邪王的部下，有些人不愿意投降，想要临阵脱逃。霍去病当机立断，不顾个人安危，赶快飞马冲入浑邪王的大营，亲自跟浑邪王谈判，下令斩杀了想要逃走的八千多人，并且叫浑邪王独自赶到皇帝的行营去朝见汉武帝。霍去病在河西收编了四万名投降过来的匈奴兵，把他们编列成整齐的队伍，听候汉朝调遣，然后他自己才渡河回到长安。这次受降的成功，是霍去病的一大功劳。从此匈奴的力量大大削弱，使得汉朝能够削减驻扎在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的边防军队，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领兵五万人，又一次奉命出征匈奴。卫青从定襄（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旗）出兵，霍去病从代郡（今山西省北部）出兵。卫青的部队在定襄以北一千多里路的沙漠中与匈奴兵遭遇，在狂风呼啸、沙砾扑面的恶劣条件之下，卫青指挥士兵们勇敢作战，歼灭匈奴兵一百多人。

霍去病大胆使用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叫他们组成先头部队在前面开路。他们从代郡向北推进二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间河，打败匈奴的左贤王，夺得敌人的粮草作为自己的给养。经过激烈战斗，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以及将军、相国、都尉等八十三人，歼灭匈奴兵七万多人。最后，由霍去病亲自主持，在狼居胥山举行了封山仪式，祭告了天地，悼念了为国捐躯的战士，犒劳了立功的英雄，然后班师回朝。

汉武帝看到霍去病立下了这样大的功劳，为了奖励他，指派了许多工匠，特地为他修建了一所比较宽敞豪华的住宅。住宅造好以后，汉武帝请霍去病先去看看，问他满意不满意。霍去病看后回报汉武帝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意思是说：匈奴还没有消灭，不能够先安排自己的家庭呢!"霍去病这种为国忘家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千百年来一直鼓舞着人们。

很可惜的是霍去病的寿命太短，他从十八岁投入军伍，在战场上仅仅驰骋了六年，到二十四岁那年，就不幸得病死了。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十分悲痛，下令发动边界上五个郡的匈奴移民，穿了黑甲，护送霍去病的灵柩，从长安到茂陵墓地安葬；并且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夜郎自大前面讲过，张骞从四川犍为派出四路使者，想经过身毒国，再通西域，但是派出去的人半路都被挡回来了。这挡住去路的，是住在现在四川省南部和贵州、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那一带有许多个少数民族，在四川南部和贵州的，数夜郎最强大；在云南一带的，数滇最强大；在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数邛都最强大。这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大都是束发为髻，穿左边开大襟的衣服，男的耕田、砍柴、饲养牦牛、筰马〔筰zuó〕，女的在家用木棉纺纱织布。由于当地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还比较富裕。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则比汉朝要落后得多，有的处在奴隶社会阶段，有的甚至还处在氏族公社的阶段。

夜郎是一个还处在氏族公社末期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的首领姓竹，名叫多同。据夜郎人的传说：多同是他母亲从竹筒里剖出来的。有一天，一个女子，即多同的母亲，在牂牁〔zāng　kē〕江（在今贵州省东南部）里洗脚，突然有一根三节长的大竹筒漂过她的身旁。她仔细一听，竹筒里面好像有婴儿啼哭的声音，就赶快把竹筒捞上来，剖开一看，里面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她把小男孩抱回去抚养，长大以后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英雄，这个英雄就是多同。因为他是从竹筒里面剖出来的，所以姓了竹。多同后来做了夜郎人的领袖，自称夜郎侯。他把夜郎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人们感谢他，就尊称他为竹王。

古代铜器这个传说，实际上说明了当时夜郎人的社会发展程度。竹王多同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这说明在他以前是母系氏族社会。到竹王多同的时候，男子成了夜郎人的领袖，并且已经称王，说明这时候夜郎已经是父系氏族社会，并且快要进入奴隶社会了。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第一次出发通西域的第三年，第二次通西域前十四年，住在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发生骚乱，汉武帝派唐蒙去劝告他们。唐蒙曾经在岭南看到人们吃美味的枸杞子酱。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回答说是从牂牁江那边买来的。唐蒙回到长安以后，就问从四川来的商人，枸杞子酱出在哪儿?牂牁江在哪儿?商人回答：枸杞子酱是他们四川的特产；牂牁江是在夜郎管辖的地区。牂牁江的江面宽几十丈，可以行船，枸杞子酱就是通过这条水路从夜郎运到岭南去的。

唐蒙了解到这些地理情况，认为从夜郎出发，通过牂牁江，可以控制岭南。他上书给汉武帝说：“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各自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从湘、赣一带出发去控制他们，由于河流纵横，阻碍交通，很不方便。听说在牂牁江一带的夜郎很强大，拥有精兵十万，如果派人去跟夜郎打交道，说服他们归顺汉朝，在那里派官治理，那末就可以利用群舸江这条水道，控制住岭南一带了。”

汉武帝觉得唐蒙的主意很好，就拜唐蒙为中郎将，叫他率领一千多人，带了许多金银绸缎，去联络夜郎。唐蒙从四川往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过千辛万苦，到了夜郎。他拜见了夜郎侯多同，送上礼物以后，转达了汉武帝的问候，要求由汉朝在那里设置郡县，请多同的儿子担任郡守。

夜郎侯多同等人，由于长年住在山窝窝里，交通闭塞，眼光狭窄，养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习惯。他们以为普天之下就数他们夜郎这片土地最大了，根本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听了汉使唐蒙转达汉武帝的问候，问唐蒙说：“你们是汉朝来的使者，请问是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大?”汉使唐蒙听了这样的问题，内心里虽然觉得很好笑，但是他表面上还是好言开导，告诉多同汉朝是一个文明大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请他们好好归顺汉朝，一定能得到很多

好处。多同听了这一席话，才知道汉朝比夜郎大得多，富得多，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才答应了汉朝的要求。这个故事后来便形成了“夜郎自大”这句成语。

夜郎附近的其他少数民族，听说汉使到来，都纷纷邀请唐蒙去他们那儿访问。唐蒙一一走访，向他们赠送礼物，说服他们都归顺了汉朝。从此，夜郎那一带就成了汉朝的犍为郡。

可是，从汉朝的首都长安去夜郎，不仅路途遥远，并且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很大，派到那边去驻防的士兵，往往由于水土不服，生疥疮，患疟疾，死亡的人很多。日子一久，汉朝跟夜郎等少数民族的联系又告中断，所以他们把张骞派出去的使者都挡回来了。

后来，汉朝平定了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的骚乱，又一次派使者去联络夜郎，夜郎跟汉朝的关系才又恢复。汉武帝加封夜郎侯多同为夜郎王，赐给他用黄金铸成的大印，把贵州一带的土地拨给夜郎管辖。

从此以后，祖国西南夜郎等少数民族和汉朝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西南地区出产的金、银、铜、铁、琥珀、水晶等矿产，麝香、犀角、象牙等畜产，源源不断地运到汉族地区；汉族的先进生产方法，也逐渐传入西南。有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人，还跑到夜郎等地去开设学馆，教授经书，把汉族的文化传播到了西南地区。这样，西南的少数民族就都逐渐地成了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苏武牧羊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霍去病打败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好些年不敢派兵到汉朝边境来骚扰。有时候，匈奴派使者到汉朝来访问，表面上做出想跟汉朝和好的样子，其实是来探听消息，想为他们再次进行骚扰做准备。为了表示友好，汉朝也派使者去回访，送去一些中原地方的土特产。可是匈奴单于很不讲信用，他们经常扣留汉朝派去的使者。汉朝为了报复，也扣留匈奴来的使者。这样，日子一久，双方互相扣留的使者就有十多起了。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且鞮侯〔鞮dī〕单于新立，他怕汉朝出兵打他，派使者到汉朝来求和，并且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者全都送了回来。

汉武帝觉得这个新即位的单于还懂道理，决定好好报答他的善意，就派中郎将苏武为正使，副中郎将张胜为副使，带着助手常惠和一百多名士兵，还带了许多金银绸缎等礼物，护送以前扣留下来的全部匈奴使者回匈奴去。

苏武接受任务以后，拿着汉武帝亲手交给他的“使节”，出发到匈奴去。“使节”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棍棒，顶部略弯，挂着一串串毛做的绒球，是用来表示使者的身分的。苏武到了匈奴，把带去的匈奴使者当面交还给了单于，并且送上礼物。哪里知道匈奴单于反复无常，他看到汉朝给他送去那么多礼物，不但不感谢，反而骄横起来了。苏武为了维护双方的和好，尽量耐着性子跟单于打交道，准备完成任务之后迅速返回汉朝。

苏武正在准备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原来，早在苏武去匈奴以前，有个叫做卫律的汉朝使者投降了匈奴，并且死心塌地的为单于出谋划策，干尽了反对汉朝的坏事。卫律的部下有个叫虞常的，是个忠于汉朝的血性汉子，他出于义愤，一心想找个机会收拾卫律。苏武出使匈奴，虞常高兴极了，他本来认识苏武的副使张胜，就偷偷地和张胜商量说：“听说汉朝皇帝很痛恨奸贼卫律，我决定暗地里除掉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万一我有什么不幸，希望皇上能够好好照顾他们。”张胜赞成虞常的计谋，并且拿出钱财和货物支持虞常。可是，由于虞常办事不够仔细，计谋泄露了，他被单于逮捕，交给卫律去审问。

苏武牧羊事情发生后，张胜恐怕牵连上自己，才把虞常跟他合计的经过告诉苏武。苏武说：“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你才告诉我，看起来我也要受牵连了。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我到匈奴的公堂上去受审。就等于我们汉朝受了侮辱，太丢脸了，还不如趁早自杀的好。”说着，他拔出刀来就要往脖子上抹。张胜、常惠赶快跑过去制止，把刀夺了下来。

卫律审问虞常，用尽了各种残酷的刑罚。虞常经受不住酷刑，终于攀连上了张胜。因为张胜是苏武的副使，单于命令卫律去叫苏武来受审。苏武对常惠等人说：“我这次出使匈奴，是为了汉朝与匈奴的和好。如今我出庭去受审，使汉朝受到了侮辱，我虽然活着，又有什么脸面回

到汉朝去呢?”说着，又拔出佩刀向自己身上砍去。卫律急忙把他抱住，夺下刀来，可是苏武已经受了重伤，血流如注，晕过去了。卫律赶快找来医生，包扎抢救，老半天苏武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常惠哭着把苏武抬回营房，张胜却被单于抓去关在监牢里了。

因为苏武很有骨气，视死如归，单于也暗暗佩服，他希望苏武能够投降，像卫律一样替他效力。他早晚派人来问候，想要软化苏武，劝苏武投降。

苏武恢复健康以后，单于命令卫律提审虞常和张胜，叫苏武去旁听。在审问的过程中，卫律当场把虞常杀死。接着，他举起宝剑威胁张胜说：“你身为汉朝副使，居然参与谋杀匈奴大臣的阴谋，也应当把你杀了；你要是肯投降，可以免你一死!”张胜害怕了，就跪下请求投降。卫律回过头来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应当跟他连坐。”苏武从容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他们的密谋，跟他们又没有亲属关系，凭什么叫我连坐!”卫律说：“你也赶快投降，否则把你也杀了!”说着，举起宝剑向苏武砍来。苏武脸不变色地迎上去说：“你有胆量杀堂堂汉使，你就杀吧!”卫律看苏武那样镇定，知道用武力吓不倒他，就收起宝剑，露出一脸奸笑对苏武说：“苏先生，我劝你还是投降吧!你看我投降匈奴以后，单于很重用我，封我为王，如今我手下有好几万人，牛羊满山，享尽了荣华富贵。你今天投降，明天也就会跟我一样。否则，你将自白地死在匈奴，葬身于荒原乱草之中。天高皇帝远，又有谁能够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呢?”

苏武对于卫律的胡言乱语，根本不予理睬。卫律却还是恬不知耻地接着说：“你如果听我的话，投降匈奴，我就跟你结为兄弟。今天你不听我的话，以后再想见我，那就难上加难啦。”苏武听卫律说要跟他结为兄弟，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指着卫律的鼻子，大骂道：“你身为汉朝使臣，却投降匈奴，真是忘恩负义，厚颜无耻。像你这样的人，我真不想见你。你仗着匈奴单于信任你，随便杀人，还想挑动汉朝和匈奴打仗，真是罪大恶极!你今天杀了我，将来总有一天有人来荡平匈奴，杀死你这个奸贼!”

卫律用尽了威胁利诱两套手段，都不能使苏武投降，就只好去回报单于。单于听说苏武这样坚定，更加希望苏武投降。他下令把苏武放在

一个大地窖里，不给饮食，想用饥饿来迫使苏武投降。匈奴地方的气候十分寒冷，天空经常飘着鹅毛大雪，西北风整天呼呼地吼叫。但是，意志坚强的苏武丝毫也不动摇，他蜷卧在地窖里，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嚼毡毛，过了好些天也没有死。

对于苏武这样的硬汉子，匈奴单于实在奈何不了他，就只好下个命令，把苏武送到北海边上（今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去牧羊。单于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就送你回汉朝去!”公羊怎么能生小羊呢?十分明白，单于是决意不放苏武回汉朝了。

北海地方，终年自雪皑皑，荒无人烟，连鸟兽也很稀少。苏武饿了，就掘取野鼠洞里的草籽来充饥。过些日子，单于又派人来劝苏武投降，苏武依旧斩钉截铁地坚决拒绝了。每天，苏武一面牧羊，一面抚弄着出使的时候汉武帝亲手交给他的使节，内心深溟地怀念着自己的父母之邦。日子一长，使节上的毛都脱落了，可苏武还是紧紧地攥着那根光秃秃的使节，不肯撒手，连晚上睡觉也紧紧地抱在胸前。就这样，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地方，艰苦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古代人物像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匈奴又跟汉朝进行和议。汉朝要求匈奴放苏武回来，匈奴欺骗说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又一次派使者到了匈奴。苏武的助手常惠，买通监视他的匈奴兵，在夜里偷偷地去见汉使，把苏武的情况详细地报告了使者，并且教给使者向单于要回苏武的办法。

第二天，使者去见单于，提出放苏武回汉朝的要求。单于说：“我们早就说过，苏武已经死了。”使者照着常惠教给他的一套说：“你们匈奴惯会骗人，苏武明明没有死。有一天，我们皇上在上林苑里射猎，射下一只大雁，大雁脚上系着一条绸子，那是苏武写给皇上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在北海地方牧羊。你们怎么说他死了?”单于听使者这么说，不觉大吃一惊，只好承认自己没有说实话，并且答应赶快派人把苏武从北海地方找回来，送他回汉朝。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春天，苏武、常惠等九个人回到了久别的首都长安，晋见了汉昭帝。汉昭帝下令为苏武准备了牛羊等祭

品，叫他到先帝庙里去拜见汉武帝的灵位，把那根光秃秃的使节交还到汉武帝灵前。

苏武出使的时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壮年汉子，他在匈奴度过了十九年异常艰苦的岁月，回来时已经是个须发全白的老年人了。他那坚强不屈，不怕磨难，永不失节的非凡事迹，轰动了朝野上下，不论是做大官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提起苏武的名字，没有一个不表示钦佩的。
司马迁写《史记》

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牧羊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京城长安受了屈辱的腐刑，正在发愤写一部历史书。这个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写的这部书后来被题名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系统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是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政府里担任太史令的官职。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从小就对司马迁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寻根究底。他也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从二十岁那年起，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往南，他到过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最远到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据说夏禹曾在会稽召开过各部落的酋长大会，在会稽留有禹穴的古迹。司马迁特地到禹穴进行了实际考察。他还爬上了今天湖南省境内的九嶷山，眺望了三湘的秀丽景色，并且还在沅水和湘水中泛舟，饱览了水光山色。往北，司马迁渡过汶水、泗水，到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鲁国的首都，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都要亲自去考察游览，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能防洪和灌溉，就特地跑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水去古代铜器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就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年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自沉汨罗江〔汨mì〕而

死，就特地跑到长沙，在汨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游历和考察，司马迁开扩了眼界，增长了实际知识，锻炼了观察事物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三十六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父亲生前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历史书，刚搜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没有写完。临死以前，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嘱咐说："汉朝兴起以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很丰富感人，我们做太史令的，如果不能把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算失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把书写完。"司马迁流着眼泪，连连点头，接受父亲的嘱咐。

过了两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太史令，开始编写他父亲没有写完的历史书。这时候，他有机会接触政府的各种文书档案，并且在皇家图书馆里读到了许多珍贵的书籍，知识更加丰富了，搜集到的材料也更加丰富了。

可是，在司马迁四十八岁那年，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司马迁有个老朋友，名叫李陵，被派去征讨匈奴。由于孤军深入，粮尽援绝，被匈奴包围俘虏了。当时有人传说李陵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一生气，把他的全家都杀了。李陵听到这消息，就真的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跟李陵认识多年，对李陵比较了解，他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辩解了几句，因此触犯了汉武帝，受到了腐刑的处分。腐刑就是割去生殖器官，是使人丧失生殖能力的残酷刑罚，虽然不至于危及生命，却让人蒙受极大的耻辱。

司马迁感到在人格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内心十分悲痛，他几次想要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又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把那部历史书写完。从此，他利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夜以继日地发愤著书。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在五十三岁那年，司马迁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五十二万多

字。其中包括本纪十二篇，记载帝王的事迹；表十篇，用列表的方法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补充本纪；书八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世家三十篇，记载诸侯王和孔子、陈胜等特殊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七十篇，记载重要人物、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纪和列传，因此后人称它为纪传体史书。自从《史记》首创了这种纪传体以后，中国历代的正史，即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以《史记》作榜样，采用纪传体这种形式来写的。

司马迁写的《史记》，不仅内容详实可靠，是一部了不起的历史书，并且文字生动优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栩xǔ〕，因此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司马迁表现在《史记》中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他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义士和农民起义领袖，大力褒扬歌颂；对暴君和奸臣酷吏，无情讽刺鞭挞。对当代的历史，不管好事坏事，都能够如实地记录下来。对好事不夸大，对坏事不隐瞒，就是对当代皇帝汉武帝的缺点和过失，也给予恰如其分的叙述。司马迁希望通过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叙述，使人们预见到未来的前途。他的进步思想和严谨的写作态度，直到今天也还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霍光辅政汉武帝的继承人是汉昭帝。昭帝刘弗陵即位的时候才八岁，国家大事由司马大将军霍光替他代管。霍光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弟。霍光十多岁的时候，霍去病把他从家乡接出来，让他做了汉武帝的侍从官。汉武帝喜欢霍光诚实忠厚，很快提拔他做了侍从官的首领。霍去病去世以后，汉武帝又把霍光提拔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掌管皇帝的车马和宫殿门户。霍光办事小心谨慎，二十多年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汉武帝七十一岁那年，体弱多病，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就指定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在自己死后接替皇位，并且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叫他辅佐年幼的皇帝管理国家大事。

霍光担负这样重大的责任，工作更加勤恳谨慎。他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把国家大事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帮助汉昭帝办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减少政府向农民支派的官差，使农民能够安心生产。缺少种籽和口粮的农民，政府还贷给他们钱或实物，免收利息。

由于霍光辅佐汉昭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因此他的成信越来越高，只要一提起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名字，老百姓没有不佩服的。可是，朝廷里那些想跟霍光争权的人，认为霍光碍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却恨透了霍光。

左将军上官桀是第一个想跟霍光争权的人。他和霍光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女儿做妻子。上官桀为了跟霍光争权，通过汉昭帝的大姐盖长公主的帮助，把自己的孙女、上官安的六岁的女儿嫁给了汉昭帝。过了几个月，这个六岁女孩子就被立为皇后。因为这个关系，上官桀就被封为安阳侯，上官安被封为桑乐侯，成了皇亲国戚，不仅地位更加显贵，而且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汉昭帝。

盖长公主帮助上官桀，上官桀想找个机会报答盖长公主，他听说盖长公主有个情人叫丁外人，就跑到霍光那里去给丁外人求封。霍光不徇私情，他直话直说地告诉上官桀：“高祖在世的时候，立下规矩，无功不得封侯。丁外人没有功劳，你没有理由替他求封。”上官桀又恳求说：“不能封他为侯，拜他做光禄大夫总可以吧!”霍光说：“那也不行，丁外人的名声很不好，什么官职也不能给他。”上官桀碰了一鼻子灰，很不高兴，他跑到盖长公主那里加油添醋地诉说一番，使得盖长公主也恨透了霍光。

为了反对霍光，上官桀、上官安和盖长公主又去联络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曾经替汉武帝搞盐铁专卖，又是个会理财的专家，有过功劳。他以这些功劳作为本钱，想替自己的子弟在朝廷里谋个官做，可是霍光不同意。霍光说：“你桑弘羊有功劳，皇上赏赐你。你的子弟不能靠着你的功劳做官，应当凭他们自己的本领吃饭。”因为这个缘故，桑弘羊也恨透了霍光。桑弘羊看到上官桀他们这个集团里都是皇亲国戚，又有皇帝的姐姐盖长公主做靠山，认为准能斗得过霍光，他就参加了这个集团。

霍光平日办事小心谨慎，上官桀他们挖空心思也找不出霍光的差错。他们这些人都和燕王刘旦有联系，于是就想利用燕王刘旦来反对霍光。有一次，霍光到长安附近的广明去检阅军队，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里去。上官桀等人就用燕王刘旦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送

到汉昭帝那里去告发霍光。信上说："霍光出去检阅军队，盗用了皇上的仪仗队，耀武扬威，十分骄横；他又自作主张，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里去。看起来霍光这个人野心很大，恐怕想要谋反。我愿意交还燕王的大印，回到长安，到皇宫里来担任皇上的警卫，镇压奸臣的叛乱。"

汉昭帝把这封告发霍光的信仔细看了几遍，就收起来了。上官桀急于把霍光赶下台，赶快进宫去追问汉昭帝这事如何处理。汉昭帝回答说："等霍光阅兵回来再说吧。"

第二天，霍光阅兵回来，听到有人告发他，就躲在偏殿里不敢去见汉昭帝。汉昭帝一上朝，看到文武官员当中没有霍光，就问道："听说大将军阅兵完毕，已经回朝，他在哪儿?"左将军上官桀赶快回答说："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所以不敢进来。"汉昭帝说："叫他进来，我有话对他说。"

霍光听说汉昭帝叫他，赶快来到殿上。他自己摘下帽子，跪下叩了一个头说："臣罪该万死，听候皇上发落!"汉昭帝抬一抬手说："大将军请起来，戴上帽子。我知道这封告发你的书信是假造的，你没有罪。"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这封书信是假造的呢?"汉昭帝说："大将军到广明去阅兵，是在京城附近的地方；调校尉去大将军府，也还不到十天。燕王在遥远的北方，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就算他能知道，马上派人送信来，今天也还送不到京城。再说，大将军如果真想造反，也用不着调用一个校尉。因此，我认为这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大将军，才假造了这样一封书信。我虽然年轻，却也看出了它的破绽，决不会上当。"这时候，汉昭帝才十四岁，他就能把问题分析得这样清楚，使得朝廷上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汉昭帝不但没有治霍光的罪，并且还当场下令，要追查假造书信的人。上官桀怕追查下去查出他们这个阴谋集团，就劝汉昭帝说："这是小事情，陛下不必追究了。"汉昭帝却没有听信他的话，还是一个劲儿的追查。

上官桀见汉昭帝继续追查，怕阴谋败露，就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屡次在汉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汉昭帝每次听了都大发脾气，他

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临终前嘱咐他辅佐我治理天下。他帮我办了许多好事，这是有目共睹的。今后再有人诽谤他，我一定要重重责罚。"从此以后，上官桀他们才不敢再说霍光的坏话了。可是他们还不死心，又布置了另一个阴谋，由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在厅堂四周埋伏下武士，准备乘公主劝酒的时候，命武士们冲出来，把霍光杀死，然后再废掉汉昭帝，迎立燕王做皇帝。

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上官桀他们的这一个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败露了。霍光奏明汉昭帝以后，杀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一伙。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见事情不妙，都自杀了。一场叛乱平定了下去。

霍光辅佐汉昭帝十三年，年轻的汉昭帝在二十一岁那年就去世了。昭帝没有儿子，霍光和皇太后商量，决定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做皇帝。没想到昌邑王刘贺是个荒淫无道的家伙，据说即位才二十七天，就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不应当做的事情，像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叫他做皇帝。因此，霍光跟丞相杨敞、车骑将军张安世、御史大夫蔡谊等文武大臣商量，决定奏请皇太后批准，废了昌邑王刘贺，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皇帝，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即位的时候也只有十八岁，霍光又辅佐他六七年，教他怎样做一个好皇帝。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患病去世。汉宣帝和皇太后亲自为霍光主持丧礼，用十分隆重的礼仪把他安葬在茂陵汉武帝的陵墓旁边。昭君出塞匈奴在汉武帝的时候被打败了。从那以后，大规模的南侵已经不可能了，小规模的骚扰还是经常发生。由于汉朝在西北方面布置了强大的兵力，所以匈奴的骚扰常常很快就被打退。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五个单于争统治权的斗争，争来争去，形成为郅支〔郅zhì〕单于和呼韩邪〔这里念yē〕单于南北对抗的局面。最后，郅支单于打败了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带兵南移，投降了汉朝。

第二十七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用十分隆重的礼仪接待他，赏赐他一套上等的衣帽，一颗系着紫色绸带的金印，一口上等的宝剑、一把佩刀和弓箭、棨〔qǐ〕戟等武器，一辆用珠玉装饰起来的车子和十五匹拉车的马，此外，还赏赐他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绸缎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汉宣帝带领合朝的文武百官、各少数民族的酋长、诸侯王和长安城里的百姓，亲自出长安城迎接匈奴贵宾，在渭桥旁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汉宣帝请呼韩邪单于一起登上渭桥，人们朝着皇帝和远方来的贵宾高呼“万岁”。呼韩邪单于见到这样的大场面，十分感动，不断地向汉宣帝道谢。接着，汉宣帝请呼韩邪单于出席皇宫里的宴会，请他参观了皇宫里收藏的珍宝。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回去的时候，汉宣帝派长乐卫尉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等。带领一万六千名骑兵护送他回国。汉宣帝还派人先后送去了三万四千斛粮食给匈奴人吃。

郅支单于看到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后得到这么多好处，同时他也害怕汉朝派兵支援呼韩邪单于进攻他，所以他也赶快派了使者来朝见汉宣帝，送来许多土特产。汉宣帝也非常客气地接待郅支单于的使者，回赠了许多贵重礼品。但是郅支单于和汉朝的关系总比不上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怕汉朝支持呼韩邪单于向他进攻，就只好往西迁移。

昭君出塞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到四十三岁那年去世了，他的儿子刘奭〔shì〕继承皇位，就是汉元帝。

汉元帝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一次到长安来。他为了表示要和汉朝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请求汉元帝答应他跟汉朝结亲。汉元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人到后宫去物色才貌双全的宫女，准备以嫁公主的礼节嫁给呼韩邪单于。

在汉元帝即位之初，谏议大夫贡禹曾建议减少宫女，已经把许多宫

女打发出去了，但是留下来的宫女还不少。这些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被选进皇宫，就好像飞鸟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自由。许多宫女盼望能够让她们从皇宫里出去，嫁个丈夫，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现在要远出塞外，嫁到匈奴去，那里天寒地冻，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大不一样，因此她们又都犹豫起来，不愿意应选。

有个叫王嫱〔qiáng〕的宫女，出身于小康家庭，幼年念过几年书，学名叫做昭君。她刚被选进宫里不久，还没有见过皇帝。王昭君听说匈奴想和汉朝结亲，觉得这是关系到匈奴和汉朝和好的大事，她决定应选到匈奴去。经办这件事情的官员禀明汉元帝，为王昭君准备嫁妆，并且找了个匈奴女人来，给王昭君讲解匈奴的风俗习惯，教她学习匈奴的语言，演奏琵琶、胡琴等西域地方的乐器。王昭君用心学习，没有多久，就学会了匈奴话，会演奏非常动听的乐曲了。

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呼韩邪单于按照汉朝的风俗习惯，亲自来迎娶新娘王昭君。新郎新娘拜见了汉元帝。汉元帝赏赐他们很多财物，并设宴为他们送行。新郎新娘离开长安回匈奴的时候，文武百官一直送他们到十里长亭。王昭君抱着琵琶，骑在马上，内心交织着欢乐和忧愁的情绪出发了。她欢乐的是自己为匈汉人民的和好做出了贡献，自己的终身从此也有了依靠；忧愁的是从此就离开了父母之邦，永远回不来了。王昭君在马上思索了一阵，很快就把自己这种矛盾的心情谱成了一首曲子，一边走着一边弹奏起来。人们把这首曲子称为《昭君怨》。其实，这首曲子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忧愁怨恨的情绪。后来有人把王昭君叫做汉明妃，《昭君怨》就又被人叫做《明妃曲》。

古代铜器王昭君出塞到了匈奴，帮助呼韩邪单于发展匈奴的生产事业，改革了一些游牧民族落后的风俗习惯。大约从王昭君到匈奴时候起，匈奴人学会了使用从汉朝输入的农业生产工具，逐渐地发展了农业生产，自己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需要，不再到汉族地区来抢劫粮食，也不再靠汉朝政府的救济了。因为农业有了发展，牲畜的饲料也就更有保障，畜牧业更发达了。郅支单于已经带领他的那部分人西迁，呼韩邪单于就把北边郅支单于的地盘接收了过来。在呼韩邪单于统治下，匈奴出现了人畜两旺的繁荣景象。

呼韩邪单于仰慕汉族的文化，十分尊重王昭君，夫妻两人的感情很融洽。到匈奴的第二年，王昭君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伊屠智牙师，长大以后被封为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去世以后，按照匈奴的风俗习惯，王昭君改嫁给新立的复株累若鞮单于〔鞮dī〕，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须卜居次，一个叫当于居次。

王昭君是匈奴单于的妻子，地位跟汉朝的皇后差不多，出塞以后，不便再回汉朝。不过王昭君热爱自己的父母之邦，经常派人送信回来，有时候还叫单于打发使者送些匈奴的土特产来奉献给汉朝皇帝。汉朝皇帝也回赠一些金银珠宝和绸缎。自从昭君出塞以后，匈奴和汉朝长期和睦相处，六十多年没有打仗。

王昭君年老的时候立下一个遗嘱，要求在她死后把她安葬在归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外，坟墓要坐北朝南，让她能够遥望自己的父母之邦。她去世以后，她的子女选了一块向阳的水草丰茂的山坡地，为她修建了坟墓。沙漠地区寒冷干燥，大多数地方只在夏季很短的一段时间才长青草。可是据说昭君墓得天独厚，又向阳，又有水，墓上的草生长期特别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青葱葱的，因此后人就把昭君墓称为“青冢”。

王昭君为了汉族和匈奴族的和好，自愿远嫁匈奴，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王莽篡汉昭君出塞那一年夏天，汉元帝去世了，他的儿子刘骜即位，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尊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给其他几个舅舅也都封了侯。外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家还有一个人，开始的时候默默无闻，后来才慢慢显露头角，他就是汉成帝的二舅王曼的次子王莽。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家境贫寒。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地位。他为了出人头地，一方面努力读书，把四书五经读得个滚瓜烂熟；另一方面拼命巴结伯伯叔叔，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栽培。特别是对于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大伯王凤，王莽像孝敬自己的父亲那样孝敬他。王凤病重的时候，王莽为了献殷勤、求信任，亲尝汤药，端屎端尿，不嫌脏，不怕累。为了服侍病人，他一连几个月没有梳头洗脸，睡觉不脱衣服。王凤被王莽的这种行为感动了，临死以前，他

向皇太后和汉成帝推荐王莽。这样，王莽才被任命为黄门郎，接着被提拔为射声校尉。

过了些时候，由于叔叔王商的推荐，王莽被拜为新都侯、光渌大夫。又过了几年，他的叔叔、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年老退休，王莽就代替他做了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莽是王家的第五个大司马，前四个都是他的伯伯叔叔。为了使自己的名声能够超过他的前辈，王莽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还用心搜罗党羽，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都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人心，他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病了，朝廷里文武百官都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王莽的妻子穿了一件刚刚能遮住膝盖的破衣服，出来迎接客人。那些贵夫人起初都以为这是王莽家里的佣人，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大司马的夫人，都感到十分惊奇。这样，王莽舍己为人、克己奉公、勤俭朴素的名声就传开了。朝廷里的大官都在皇帝面前称赞王莽，他的宾客、名士也到处替他吹嘘。

古代瓷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死了，他的侄子刘欣即位，就是汉哀帝。汉哀帝尊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继续任命王莽做大司马。可是汉哀帝也有一帮外戚，他祖母傅太后的娘家，他母亲丁太后的娘家，也都有一伙想要升官发财的人。他们利用汉哀帝的地位，拼命排挤王莽，王莽的大司马终于做不下去了，他只好辞职回家闲居。

汉哀帝的寿命不长，只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他没有儿子，由太皇太后作主，把哀帝的堂兄弟刘衎〔kàn〕立为皇帝，就是汉平帝。太皇太后还叫王莽重新担任大司马的官职。当时汉平帝才九岁，朝政大权名义上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代理行使，实际上全都掌握在大司马王莽手里。从这时候起，王莽就开始一步步地篡夺汉朝的天下了。

王莽怕成帝、哀帝的外戚再来争权夺利，就找个借口，迫使成帝的赵皇后、哀帝的傅皇后自杀，堵塞了赵、傅两家外戚的门路。王莽自己的叔伯当中，先后做过大司马的王凤、王音、王商、王根都已经去世，

还留下一个最小的叔叔红阳侯王立。王立虽然只有一个侯爵，没有在朝廷中担任具体的官职，但是他毕竟是太皇太后的亲弟弟，容易在太皇太后面前讲话，使得王莽不能背着太皇太后为所欲为。因此，王莽授意自己的亲信孔光，叫他出来揭发王立和淳于长之间的关系，迫使太皇太后叫王立到自己的封地上去，不许他来干预朝政大权。

把碍手碍脚的人挤走以后，王莽就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亲信。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崔发、陈崇，还有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都是王莽的心腹、谋士、爪牙，王莽都让他们做了大官。王莽有什么意图，就授意他们出面向太皇太后去奏请。王莽自己在太皇太后下诏以后，装出恭敬从命的样子去执行，用来迷惑太皇太后。王莽就用这种办法，让王舜他们出面，要求太皇太后封他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同意了这个要求，王莽却又上书：说孔光、王舜、甄丰、甄邯都有很大的功劳，应当封赏他们，不应当封赏我。甄邯赶快再向太皇太后上书请封王莽，王莽又再三推辞，并且因此装病不上朝。太皇太后封赏了孔光等四人之后，王莽还继续推辞，大臣们又一次上书给他请封，太皇太后又一次下了封赏的诏书，王莽才勉强接受了安汉公的封号。封号虽然接受了，给他增加的封地却坚决不肯接受。甄丰等人见王莽不肯接受封地，就鼓动各地的官吏和地主出来拍马屁，上书称颂他这种不接受封地的“功德”。几天当中，这些拍马屁的人，竟骗取了四十多万人具名上书，替王莽歌功颂德。

王莽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皇后。这样，他又多了“国丈”这一皇亲贵戚的身分，地位更加显赫了。有个泉陵侯刘庆，见王莽势大，也来拍马屁，他给太皇太后上书说：“周成王小时候，由周公旦代行皇帝的职权，如今皇帝也很年轻，应当请安汉公代行皇帝的职权。”太皇太后把刘庆的这个建议交给大臣们去商议。大臣们都说：“应当照刘庆的话办。”于是太皇太后就叫王莽像周公旦那样，代行起皇帝的职权来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王莽的地位一天天提高，汉平帝的年龄也一年年长大，他已经长到十四岁，多少懂得一些事情了。汉平帝看出王莽的野心不小，内心又是害怕，又是怨恨。平帝的母亲卫姬，照理应当尊为太后。可是王莽怕卫家的人凭借外戚的地位，来跟他争权夺利，所以只封卫姬为中山王后，封平帝的两个舅舅卫宝、卫玄为关内侯，都让他们留

在中山封地上。不许他们到京城里来。汉平帝对王莽的这种做法，自然也要吐出几句怨言。王莽知道以后，怕平帝将来对自己不利，就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的一天，用毒酒毒死了汉平帝，然后找了个才两岁的小孩刘婴来做皇太子，历史上称他为孺子婴。

汉平帝被毒死以后几天，据说武功地方有个叫孟通的人，淘井淘出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圆下方，石上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大字，这自然又是王莽手下那帮人弄的鬼。人们把这件事报到王莽那里，王莽就叫人去报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封王莽为摄政，并且把第二年的年号也改为居摄元年（公元6年）。

刘家皇族中的安众侯刘崇，看到王莽篡汉的心思日益显露，就对亲信张绍说：“安汉公王莽要篡位，刘家的天下危险了，可是没有一个人首先站出来反对他，这是我们刘家的耻辱。我愿意出来带个头，天下人准会起来响应。”张绍跟刘崇在一起召集了百十来个人，起兵进攻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但是因准备不足，力量太小，很快就失败了。

打败刘崇以后，王莽的胆子更大了，他又指使人去告诉太皇太后，要求封他为摄皇帝。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照办，封王莽为摄皇帝。

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向全国发出号召说：“王莽毒死汉平帝，想要夺取刘家天下，现在希望大家聚集到天子的旗号下来，共同讨伐王莽！”他们很快就发动了十几万人，浩浩荡荡向首都进军。王莽一方面日日夜夜抱着孺子婴在庙里祷告，一方面派王邑、孙建带兵去征讨刘信、翟义。长安附近槐里地方的赵明、霍鸿，起兵响应刘信、翟义，他们合计说：“王莽派兵去打东郡，京城一定很空虚，我们就乘机夺取京城。”他们一路打，一路发号召，人数也很快发展到十多万。王莽派王奇、王级带兵去对付。不久，王邑、孙建打败了刘信、翟义，回兵长安，跟王奇、王级会师，又打败了赵明、霍鸿。

两路兵马都取得胜利以后，王莽更加气粗胆壮，谁也不怕了。他又大造舆论，一会儿有人来报告说，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夜做了几个梦，梦见天使告诉他：“摄皇帝应当做真皇帝”；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

说，巴郡地方出现一只石牛，上面也刻有王莽应当做皇帝的字样，还有个梓潼人叫哀章的，做了一只铜箱，上面刻了“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字样，把它放在高祖庙里。人们看见了，赶快去报告王莽。这一次，王莽说：“高祖既然已经显灵，叫我做皇帝，这是老祖宗的意思，我不能再推辞。”于是他就正式做起真皇帝来。公元9年，王莽把汉朝改为“新朝”，自己称为“新皇帝”，废孺子婴为定安公，正式篡夺了由汉高祖刘邦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绿林赤眉起义王莽篡夺了西汉的天下，为了显示他的威德，也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制度上的改变，这在历史上叫做“王莽改制”。这些改变表面上好像要解决西汉末年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实际上却是一种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后拉的倒行逆施，其结果是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他自己的灭亡。

王莽改制最突出的一件事情是改变土地制度。他把奴隶社会时期的井田制重新搬了出来，规定天下的田都叫做“王田”，归朝廷所有，不许自由买卖，由政府按人口重新分配。这是一种鲥退的做法，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奴隶制社会实行井田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如果还要实行井田制，就会限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王莽的“王田”制度颁布了三年，却实行不了，没奈何只好下令取消，照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王莽改制的另一件事是改变货币制度。他下令废止了市面上流通已久的五铢钱，一会儿规定用这样几种货币，一会儿又规定用那样几种货币，甚至于把远古时期一度用作交易媒介的贝壳也规定作为货币使用，逼着老百姓兑换来兑换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把老百姓手里的钱都搜刮光了，商人都不敢做买卖了。

除了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的改变以外，王莽还改变了其他的一些制度，可是到头来除了扰民以外，什么也行不通，也都失败了。与此同时，王莽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还派兵去征伐匈奴、高丽、西南夷和西域，浩大的军费开支，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古代铜器在王莽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统治之下，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特别是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地主夺走了，仅有的一点积蓄也被币制改革和战争负担给剥削光了，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当时全国各地又普遍

发生了旱灾和蝗灾。老天久旱不雨，庄稼本来就长得稀稀落落的，成群的蝗虫又到处为害，把庄稼吃个精光，断绝了人们的生计。在北方，由于闹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在南方，人们成群结队到沼泽地里去挖野荸荠来充饥。关中地方，四处流亡来的几十万饥民，因为得不到救济，饿死的占十分之七八。王莽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却派人到各地去欺骗人民，教人民煮草木为酪，说是把野草树皮煮得烂熟以后，会成为像奶酪一样好吃的东西。这种骗人的鬼话当然没有人相信。人们为了求活路，终于拿起刀枪，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琅琊郡海曲县（今山东省日照县）发生了一起县官胡乱杀人的事情，因而引起了一场农民起义。海曲县县衙门有个当差的名叫吕育，他犯了点小小的罪，就被县官处死了。吕育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报仇，联合流亡农民几千人发动武装起义，攻进县城，杀死了县官。附近农民听到起义的消息，纷纷赶来参加，起义军迅速扩大到一万多人。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吕母起义，它揭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

和吕母起义同一年，南方的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也发生了农民起义。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人王匡、王凤，趁着饥饿的农民为争抢野荸荠发生殴斗的机会，进行鼓动，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地主恶霸和王莽政权。他们很快就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以绿林山（今湖北省当阳县境内）为根据地，号称绿林军。几个月的时间，绿林军就发展到了七八千人。

第二年，吕母家乡琅琊郡有个叫樊崇的也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了农民起义。樊崇带着起义军打到泰山郡（今山东省泰安县），正赶上青州、徐州一带闹饥荒，饥民纷纷起来参加，起义军很快就发展成一支拥有十几万人的队伍。樊崇是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没有念过书。他起义的目的不是想称王称帝，只想推翻王莽，让人们能够活得下去。他领导的起义军战士把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记，号称赤眉军。赤眉军保持着贫苦农民的淳朴作风，领导人只采用一些乡下小官吏的称呼，樊崇自称“三老”，下面小一些的领袖称为“从事”、“卒史”，士兵们则互相称“巨人”。樊崇不识字，他没有制订什么法律和规章制度，只在口头上规定：杀人的要处死刑，伤害人的要赔偿损失。起义军人人遵守这个规定，纪

律十分好，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王莽听到绿林、赤眉起义的消息后赶快派军队镇压。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的两万官军袭击绿林军，绿林军奋勇抵抗，打败官军，杀死官军几千人，夺得了大量物资。绿林军乘胜出击，攻下了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县）、云杜（今湖北省沔阳县）、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队伍扩充到了五万多人。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当起义军正在迅速发展的时候，绿林山一带发生了瘟疫。起义军缺医少药，死亡的人很多。王匡、王凤和起义军的其他首领商议以后，决定分散队伍，离开绿林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王常、成丹率领一部分队伍往西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等率领另一部分队伍往北进入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县），号称新市兵。王匡、王凤等经过平林（今湖北省随县）附近的时候，平林人陈牧、廖湛也发动一千多农民起义，称为平林兵。平林兵和新市兵联合，起义军的队伍又进一步扩大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绿林军分散转移这一年的冬天，王莽派十多万官兵去镇压赤眉军。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跟王莽派来的官兵决战，打败官兵，声势更加强大，很快从齐、鲁等地发展到现在的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并且还发展出了铜马军、青犊军等分支队伍。

这时候，荆州一带的地主刘玄、刘縯〔yān〕、刘秀等人，也利用他们跟汉朝皇帝同姓的关系，打出了反对王莽，复兴汉室的旗号，也来加入农民起义军，想要篡夺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刘玄加入了平林军；刘縯、刘秀兄弟俩在舂陵（今湖北省枣阳县）招集宗族、宾客和附近的地主武装共七八千人，号称舂陵军，跟新市、平林兵联合作战。刘玄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很快就取得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地位，在打败王莽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之后，他做了皇帝，仍然叫汉朝，定年号为更始，意思是他更新了汉朝，历史上称刘玄为更始皇帝。从此以后，绿林等农民起义军也被称为汉军。接着，起义军又打下了昆阳（今河南省叶县）、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县）、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郾yǎn〕，包围了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

王莽见农民起义已经成为燎原之势，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派大将王邑、王寻征集全国各地的兵马，拼凑了四十二万人的队伍，号称百万大军，南下向起义军进攻。王邑、王寻率领的兵马包围了起义军占领的昆阳，历史上有名的昆阳大战爆发了。新汉昆阳大战王寻、王邑带领42万新朝军队，南下进攻起义军，对昆阳形成了包围。

昆阳周围的农民起义军看到敌人来势汹汹，难以抵挡，都纷纷退到昆阳城里。有的将领认为敌众我寡，阵地守不住，主张放弃昆阳，把队伍分散到各地去各自为战。担任太常偏将的刘秀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如今我们兵寡粮少，敌人十分强大。如果我们集中力量打他一路，还有胜利的可能；分散兵力，只能进一步削弱自己，势必被敌人各个击破，全面崩溃。昆阳是首当其冲的要地，如果昆阳失守，一天之内，其他地方也都会被敌人占领。因此我们只有同心协力，保卫住昆阳，挫伤敌人的锐气，才能够把新军打败。"

起义军其他将领听刘秀这么说，认为很有道理，决定坚守昆阳。这时候，侦探回来报告：王莽的新朝军队已经到了昆阳城北，队伍有几十里路长，只见一路上烟尘滚滚，旌旗蔽天，望不见队伍的尾巴。

这时候，昆阳城里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起义军领袖王凤、王常和刘秀等人商量，决定由王凤、王常全力守卫昆阳，派刘秀和宗佻〔tiāo〕、李轶〔yì〕等十三人，黑夜里骑着快马从南门冲出去，到附近地区去征集援军。

这时候，王莽的新朝军队已经有十万人抵达昆阳城下。他们看到有人从城里冲出来，知道是去求援的，就赶快过来拦截。刘秀、宗佻、李轶等十三人奋勇作战，杀退了一批又一批敌人，终于冲了出去，分头到了郾城和定陵。他们把两地的几千农民起义军统一组织了起来，由刘秀率领着去援救昆阳。

古代风景画鉴赏再说昆阳城外边。王邑、王寻的新朝军队已经团团围住了昆阳城。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给王邑提出建议，他说："昆阳城虽然小，但是很坚固，轻易不能攻破。反军的头子更始皇帝刘玄在宛城一带，我们应当用主力去打他，把他打败了，昆阳就可以不攻自破。"可是

王邑不接受严尤的意见，一定要先打昆阳。他把42万大军全都压向昆阳，把小小的昆阳城围了几十重。只见昆阳城外旌旗蔽野，尘埃遮天，军号军鼓的声音几十里以外都能够听得到。王邑、王寻还调来了攻城用的云车、撞车和楼车。云车是十几丈高的了望车，居高临下，能够把城里的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撞车是冲锋陷阵用的战车，能够用来冲击城墙。楼车是弓箭手用来向城里射箭的战车。王莽的新朝军队，几乎把一切精良的武器设备全都用上了。他们还派遣了一部分士兵。专门挖掘地道，想从地道打进城去。

王凤、王常指挥昆阳城里的汉军，紧闭城门，守住险要的地方。城外敌人射来的箭，像雨点一般倾泻到城里。人们要到井里去汲水，都得头上顶着门板，抵挡飞箭。守城的士兵选好地形，隐蔽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岗位。王莽的新军接近城墙，想要爬城的时候，城上的滚石擂木像冰雹似地打将下去，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抱头鼠窜。

昆阳城里的汉军这样艰苦奋战，死守了一个多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六月里，刘秀率领的援军赶到了。他们在离开新军大本营四五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刘秀亲自带着精兵，从背后攻打新军。王邑、王寻听说刘秀只调来几千援军，不禁哈哈大笑，他们用轻蔑的口气对部下说：“刘秀只搬来几千援军，这不是拿鸡蛋来碰石头吗?”他们下令派出几千兵马去对付刘秀的援军。

新汉两军对阵的时候，刘秀一马当先，冲向敌阵，士兵们见主将这样勇猛，也都纷纷拿起刀枪，呐喊着像猛虎一般冲杀过去，王邑、王寻率领的新军，没有料想到汉军这样厉害，他们的阵脚被冲乱了，后退了好几里才站住脚跟。这一仗，刘秀的汉军消灭新军一千多人。以后几天，刘秀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继续进攻，又消灭了许多敌人。

这时候，宛城已经被起义军攻了下来，但是刘秀并不知道。为了虚张声势，恫吓敌人，刘秀派人假装成从宛城来的使者，向昆阳城里送信，信上说进攻宛城的汉军已经取得胜利，马上就要乘胜开来支援昆阳。他叫这个送信的假使者故意把信丢在路上，让敌人捡走。捡到书信的人拿去报告，王邑、王寻看后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如果攻打宛城的汉军增援到昆阳来，自己这方取胜的希望更少了，原来那种趾高气扬的

狂妄劲头已经下去了一半。

昆阳城里的守军听到城外喊杀的声音，从城墙上望见敌人队伍开始动乱，知道援军已经到来，就积极准备反攻，里应外合地夹击敌人。

决战的日子到了。刘秀探听到敌人的大本营在昆阳城西的河边，还探听到王邑、王寻仗着兵力强大，又有河流作屏障，大本营的防备不免松懈。于是刘秀带着三千名敢死队直捣敌人的巢穴。当汉军敢死队冲到新军大本营门口的时候，王邑、王寻才从睡梦中惊醒，匆匆忙忙地带兵迎战。汉军由于连日得胜，士气旺盛，个个以一当百；新军由于接连吃败仗，士气低落，都在设法后退保命。双方一接触，新军顷刻大乱，汉军勇猛向前冲杀，把新军的主将王寻杀死，把新军队伍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昆阳城里的守军趁着城西激战的时刻，由王凤、王常率领，擂响战鼓，呐喊着冲杀出来，与援军前后夹攻敌人。王邑见王寻被杀，自己已经腹背受敌，骑着快马赶快逃命。新军士兵们见主将逃走，有的投降了汉军，有的撒开两腿跟在王邑的马后逃跑。前面的人被撞倒了，后面的人也顾不得扶起他们，就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这样互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千多人。王邑带着残兵败将拼命奔跑了一百多里路，逃到溃水〔汝河的支流，流经昆阳北边滍zhì〕边上，正赶上一阵狂风暴雨，河水漫出河床。士兵们为了逃命，争着渡河，有些人顾不得水深流急，跳进水里，想游到对岸去，结果淹死了好几万人，把河流都堵塞了。王邑、严尤等丢掉了兵器、辎重、战车和抢来的珍宝，骑着马，踩着死尸渡过滍水，逃回洛阳，点点人数，四十二万人只剩下了几千人。

战争结束，刘秀、王凤、王常等派人打扫战场，光是收拾缴获的战利品，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昆阳大战中，昆阳城里的汉军八九千人，加上外来的几千援军，总共才一万多人，却打败了王莽新军42万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

昆阳大战以后，更始皇帝刘玄派农民军领袖王匡攻打洛阳，派另一支军队攻打长安。因为王莽新军的主力在昆阳大战中已经崩溃，所以攻

打长安的这支汉军很快就打到长安城下，从东北方的宣平门攻入城内。长安城内的市民在少年朱弟、张鱼的号召下起义，跟汉军一同围攻王莽的宫殿。攻破宫殿大门之后，商人杜吴跑在最前面，他一口气冲上宫中的渐台，杀死了王莽。起义军战士跟着上了渐台，他们出于对王莽的仇恨，一块块地分割了王莽的尸体。至此，篡夺了西汉天下的王莽，在维持了十五年的统治之后被推翻了。解读东汉王朝刘秀重建汉朝刘秀和绿林军联合作战，在昆阳大战中打败了王莽的主力部队，立了大功。他的哥哥刘縯也打下了宛城。已经被拥立为更始皇帝的刘玄，坐吃现成果子，进驻宛城，拿宛城做了更始政权的临时首都。

刘玄在宛城安顿下来以后，觉得自己的地位虽说比较巩固，可还是害怕刘縯、刘秀兄弟的势力强大起来，同自己争夺天下，就找个借口把刘縯杀了。这时候，刘秀正在别处，他听说哥哥被刘玄杀害，内心又是悲愤又是恐惧。他想到自己的势力还敌不过刘玄，只好忍气吞声，跑到宛城向刘玄谢罪。表面上，刘秀对哥哥的死装出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既不替哥哥戴孝，义在剖人面前饮食谈笑如常，见了刘縯的部下，一句私话也不讲。他对刘玄更是百依百顺，从来不标榜自己在昆阳之战中的功劳，还把许多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可是一到晚上，他关起门来，躲在被窝刘秀里偷偷哭泣，发誓要为哥哥报仇。刘玄只看到刘秀的表面活动，看不出刘秀的内心所想，为了安抚和笼络刘秀，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但是并没有付给实际的权力。

过了些时候，刘玄准备迁都洛阳，派刘秀先去洛阳整修宫殿。宫殿整修完毕以后，刘玄迁入洛阳，派刘秀到黄河以北去扩充势力。刘秀得到这样的好机会，不仅可以保全自己，免遭刘玄杀害，而且就像蛟龙被放归大海，猛虎被放归深山，还可以放手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了。

王莽的新朝政权被推翻以后，黄河以北的地主势力害怕农民起义的烈火燃烧到他们那里，纷纷组织起了地主武装。他们见刘秀到来，就都前来归附。这样，刘秀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在黄河以北站稳了脚跟。

更始皇帝刘玄怕刘秀的势力继续扩大，赶快派人去封刘秀为萧王，并且召他回首都长安来商量国家大事（这时候刘玄已经迁都长安）。刘秀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当然不愿意再受刘玄的控制。他叫人给刘

玄带去一封信，信上说："黄河以北还没有完全平定，我不能回长安去。"从此，刘秀跟刘玄实际上已经决裂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刘秀对分散在冀州、兖州一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打败了力量比较强的铜马、青犊等农民军，用诱降的手段收编了一些零散的农民军，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全都攫取到了自己手里。接着，他又乘赤眉军出兵西进的机会，派人两路出兵，扩充自己的势力，一路从河北南下，夺取了原先赤眉军的地盘；一路从河北往西，进攻并州（今山西省）。经过几次战斗，刘秀派出去的军队都得到了胜利，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物产富饶的中原地区几乎全都落入他的手中了。

刘秀一得势，就有更多的割据势力来归附他，那些归附他以后立了战功的大将，都急着想要拥戴刘秀做皇帝，以便自己能够当个开国功臣。他们对刘秀说："如今天下没有君主，大王是高祖九世之孙，众望所归，希望您趁早即位称帝，安定民心。"刘秀听了大将们的话。内心自然很是高兴，但是他怕时机还不成熟，就假装推辞，意思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向他劝进。

大将们看出了刘秀的心思，发动更多的人联名给刘秀上书，劝刘秀即位称帝。大将耿纯代表大家说出了心里话，他对刘秀说："天下的英雄，离别亲属，抛弃田园，跟着您在枪林箭雨之中出生入死，所希望的无非是想攀住龙鳞，附着凤翼，能够做个开国元勋罢了。希望您赶快即位称帝吧!"

刘秀看到那些想要攀龙附凤的大将真的愿意拥戴他，就不再推辞，于公元25年六月在鄗城〔今河北省高邑县，鄗hào〕正式即位称帝，重建被王莽篡夺了的汉朝。接着，他派兵西进，去进攻当时已经占领了关中地区的赤眉军。

这时候，赤眉军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在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拥立了一个十五岁的牧童刘盆子做皇帝，樊崇做了御史大夫。

古代风景画鉴赏那个在长安的更始皇帝刘玄，靠绿林军坐了江山，这时候却经常在宫中饮酒作乐。将领们有事找他商量，他因为喝得酩酊

大醉，不能出来见面，就叫他的一个侍中坐在宫殿上，前面挂上帐幕，代替他说话。将领们一听不是他的声音，都很生气，在背后议论说："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稳当，就这样放荡起来了，这能靠得住吗?"刘玄还恣意杀害了好几个农民出身的绿林军将领，公开地同绿林军分裂了。后来王匡等人被迫逃离长安。和赤眉军联合，一同打进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赤眉军进入长安的时候，长安城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到街上来欢迎。可是长安附近的地主却把粮食偷偷地藏起来，想要用饥饿来困死农民军。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刘秀，就乘着这样的时机，派大将邓禹一路打来。赤眉军虽然多次打败过邓禹，可这一回由于缺乏粮食，不能坚持抵抗，樊崇只好下令放弃长安，准备往东打回山东老家去。一路上，他们遭到了刘秀军队的伏击，损失极大，归路断绝了，只好被迫投降。樊崇在投降后想要恢复起义军的势力，被刘秀发觉后给杀害了。

刘秀在农民起义声中起兵，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声势扩大了势力，又在各派势力的争斗中逐渐占得了上风。他在部城称帝以后，不久定都于洛阳。因为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历史上称刘秀建立的汉朝为东汉，又叫后汉。刘秀是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光武帝。得陇望蜀汉光武帝刘秀镇压了赤眉起义军以后，天下并没有统一，政权并不巩固，因为南北各地还存在着许多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当中，兵力最多、占地最广的有东方齐鲁一带的刘永和张步，西北凉州、陇西一带的隗嚣〔kuíxiāo〕和西南巴蜀一带的公孙述等。他们这些人也称王称帝，想跟刘秀争夺天下。刘秀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起，依靠手下的得力大将，南征北伐，一个一个地消灭了这些割据势力，重新开创了统一的局面。

在光武帝刘秀进行统一的战争中，耿弇〔yǎn〕打张步，"有志者事竟成"；岑彭打隗嚣和公孙述，"得陇望蜀"，是历史上两个很有名的故事。

张步是琅琊人，当赤眉、绿林等农民军起义的时候，他也聚众数千，攻下了齐地的几座县城，自称为五威将军，成为当地的割据势力。

汉朝的宗室梁王刘永当时也乘机起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他跟张步联合，并且拜张步为辅汉大将军、忠节侯。张步驻扎在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县），对刘秀政权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秀派光禄大夫伏隆去招降张步，拜张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听说伏隆到了剧县，赶快派人给张步送去许多礼物，封张步为齐王。刘秀、刘永两边都拉拢张步，因为刘永送的礼物多，名号又是“王”，张步决定投靠刘永，就杀了刘秀派去的使者伏隆。刘秀听说伏隆被杀，很是生气，决定派大将耿弇去打张步。

耿弇接受了出征的命令，带领几万人马，对张步的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不到半天工夫，就打下了张步的前哨据点祝阿（令山东省历城县西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张步虽然吃了败仗，但是并没有大伤元气，他仍然自恃兵多将广，十分骄傲地对部下说：“我过去打败过拥有十多万兵马的尤来、大枪等农民军，现在耿弇的兵力比他们少得多，又经过长期战斗，疲劳不堪，有什么可怕的!”他带领二十万人马，开到临淄东门，准备反攻。

耿弇看到张步亲自出马，就渡过淄水，假装撤退，引诱张步来进攻，以便寻找机会，消灭他的主力。张步以为耿弇不敢迎战，更加骄横起来，冒冒失失地指挥军队发动进攻。哪里知道耿弇乘着张步顾前不顾后的时机，突然领着精兵从两翼包抄，把张步的主力围困起来。在激烈的战斗中。耿弇的大腿被飞箭射中。他恐怕影响士气，趁别人没有看见，抽出佩刀把箭砍断，带伤继续战斗，直到天黑才收兵。

第二天一早，耿弇不顾伤口剧痛，又要指挥兵马去进攻。他的部下劝他说：“目前张步的兵力还很强，不如暂时休战，等皇上带兵来增援的时候，再派兵出击也不晚。”耿弇不同意休战，他说：“皇上到来的时候，做臣子的应当杀牛备酒，隆重按驾，怎么能把没有歼灭的敌人留给皇上呢?”说完就指挥大军出战，从清早打到黄昏，终于把张步的军队打得大败。耿弇预料，张步失败之后一定会仓促退兵，就预先设了埋伏，遇到张步的败兵逃跑，又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阵，追赶了八九十里路。

过了几天，光武帝刘秀来到临淄，慰劳作战有功的部队。他在许多将士面前夸奖耿弇说：“从前韩信攻破历下，奠定了汉朝的基业；如今耿

将军攻破祝阿，天下大事也由此而定了，这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这话不仅鼓舞了耿弇，也鼓舞了参加战斗的全体将士，他们乘胜追击，终于完全平定了张步割据的齐地，凯旋而归。从此以后，刘秀夸奖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这句话，成了很有名的成语。

第二年，汉光武帝刘秀决定派兵进攻凉州、陇西一带的隗嚣和巴蜀一带的公孙述。

隗嚣是天水成纪人（今甘肃省秦安县），年轻的时候在王莽的朝廷里做官。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以后，隗嚣的叔叔伯伯乘机起兵，拥戴隗嚣为上将军，打下了陇西、武威、酒泉、敦煌等地，在天水建立了根据地。更始皇帝刘玄进入长安，派人把隗嚣请到长安做官。赤眉军打进关中以后，隗嚣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回天水。从此就自称西州上将军，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建武六年（公元30年）隗嚣看到刘秀的地位日益巩固，怕自己斗不过刘秀，就向占据巴蜀的公孙述投降，两家联合起来跟刘秀争斗。

古代画扇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人，从小就很能干，年轻时候做过小吏。王莽篡汉、刘玄称帝的时候，公孙述到四川去发展自己的势力，很快就组织起来几万人的队伍。刘秀称帝的那一年四月，公孙述也在四川称帝。刘秀忙着镇压赤眉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时候，公孙述进一步招兵买马，势力越来越强大。他在汉中屯积粮草，并且暗地里和陇西的隗嚣联合，准备共同对付刘秀。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刘秀乘着前两年作战胜利的余威，亲自率领征南大将军岑彭、大司马吴汉等西征陇蜀。岑彭带兵打破了隗嚣的根据地天水，与吴汉会合后，把隗嚣包围在西城（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公孙述派大将李育来救隗嚣。李育进兵到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邽guī〕被汉军包围。刘秀看到胜利在望，又听说洛阳附近的颍川发生兵变，京城骚动，就连夜东归。他临走的时候给征南大将军岑彭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西城、上邽两城如能打下，就可乘胜带兵南攻巴蜀。一个人善于没有知足的时候，既平陇，又望蜀。我为打仗耗尽心血，连头发和胡须也都变白了。”

田园风景画鉴赏岑彭看了刘秀的信，领会刘秀的意思是要他赶快平定陇蜀。他设了个计谋，用沙袋堵塞河流，引河水去灌西城，迫使隗嚣不得不放弃西城逃走。可是公孙述的大批缓军已经赶到，隗嚣绝处逢生，乘势反攻。汉军因为粮食接济不上，只好退兵东归。

第二年，公孙述派大将任满、田戎、程汛等，率领水军数万人，乘着竹木排，从长江顺流而下，在荆门山与虎牙山之间的江面架起浮桥、斗楼，抗拒汉兵。这时候，岑彭已经转战到荆州，他对任满等几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取得胜利，只好作长期打算。岑彭下令制造了水战用的船舰数千艘，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与吴汉等率领水陆战士六万余人，大举征蜀。岑彭先派人烧毁了蜀军的浮桥、斗楼，然后带兵逆流而上，打败蜀军。蜀军大将任满被杀，程汛被俘，田戎一直退到江州（今四川省巴县）。岑彭乘胜进军，一直打到成都东南几十里的广都。公孙述节节败退，只好采用暗杀手段，派刺客假装投降，在夜间刺杀了岑彭。

岑彭虽然死了，但是他那得陇望蜀的声势和首破荆门的战功，已经为汉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隗嚣、公孙述这两支割据势力，因为受到岑彭的严重打击，一蹶不振，最后终于被汉光武帝刘秀所征服。

王莽篡汉以后，各地地主武装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割据势力，造成了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经过刘秀和他手下的得力大将“得陇望蜀”地连年征战，又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局面，使得社会经济又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后人把刘秀重振汉室，叫“光武中兴”。从这一点来说，刘秀和他手下的大将们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强项令董宣汉光武帝刘秀是豪族地主出身，家里拥有大量田产。他在家乡的时候，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常常结交一些亡命之徒。有些杀了人该判死罪的犯人，只要往刘秀家里一躲，连衙门里的官吏也不敢去要。刘秀的亲戚也都是豪族地主。他的外祖父姓樊，是当地最有名的大地主，有地三百多顷。他的岳父姓阴，有地七百多顷。刘秀起兵以后，赶来投奔他的人，如邓禹、耿弇等，多数也是豪族地主。刘秀建立的东汉皇朝，是为大地主谋利益的政权。东汉政府对于贵戚豪族吞并农民土地的事情，从来不干涉。从东汉政权建立那天起，掌握几十顷、几百顷土地的大地主与日俱增，几乎到处都有。

大地主依仗自己的势力，建立起规模巨大的田庄。一所田庄好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甚至连政府派去征税的官吏都敢抗拒。

由于豪强地主横行霸道，地方政府的许多事情不好办，政府的法令也推行不开，连光武帝刘秀也觉得矛盾重重，有些不好处理。但是，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执法严明、敢于跟皇亲贵戚、豪强地主作斗争的官吏，他们甚至不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和性命，也要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外号叫做“强项令”的董宣，就是以维护法律尊严出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董宣在北海（今山东省昌乐县）地方做官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件豪强地主随便杀人的案子：有个叫公孙丹的豪强地主，在北海新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房子完工以后，占卜的人说房子盖得虽然好，可是触犯了凶神，住进去一定会死人。公孙丹听了很害怕，他决定牺牲别人的生命来免除自己的灾难。他叫儿子站在门口等着，看到门口过路的人，随便抓几个来杀了，埋在住宅里，用这个办法来祭祀凶神，避免住进去以后再死人的灾难。公孙丹父子随便杀人，当然是犯法的。可是公孙丹是地方上有名的豪强地主，谁都不敢管他。董宣却不怕这些，他认为自己是地方官，应当管。他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立即派人把公孙丹父子抓来，判处死刑，并且立即就地执行。这样一来，北海地方的那些豪强地主大受震动，从此都不敢再为非作恶、随随便便杀人了。

董宣办理得最出色，因而使他获得“强项令”称号的，是惩办湖阳公主管家的案件。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也是一个出名的豪强地主，她在京城洛阳郊区有占地广大的田庄，在洛阳城里拥有豪华的住宅，家里的奴婢有上千人。有一次，湖阳公主家里的管家在大白天杀了人，触犯了刑律。当时正是董宣在洛阳担任县令的时候，杀人犯害怕董宣治他的罪，就躲在湖阳公主家里，靠着公主的庇护，逍遥法外。董宣知道了这个案件，很是气愤，决心要把杀人犯抓来，依法治罪。

董宣等着等着，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湖阳公主因事外出，带了一大群家奴同行。那个杀人的管家认为风头已经躲过去了，也混在家奴里面一起外出。董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带了县衙门的人马，守候

在湖阳公主必须经过的夏门亭地方。当公主的车马前呼后拥地走到夏门亭时，董宣突然往路当中一站，挡住了去路。他用刀往地上一指，大声地对公主说：“禀告公主，您的管家横行不法，杀了人，应当判处死罪，请您把杀人犯交出来!”

湖阳公主见董宣拦住她的车马，要她交出管家，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很不高兴。她把脸一沉，斥责董宣说；“董宣!你身为县令，不要随便乱说。我的管家怎么会杀人?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吗?”

古代瓷器董宣说：“我当然有凭有据，您的管家杀人的时候，有许多人亲眼看见的。您要不相信，我可以找人来作证!”

公主一看情况不妙，赶快改变口气说：“董宣!你要知道，我的管家是我最信得过的人，就算他真的杀了人，你看在我的面上，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董宣看到湖阳公主居然藐视法律，想要庇护杀人凶手，就板起面孔大声地对公主说：“公主!您家法不严。管家才胡作非为。他既然犯了法，就应当治罪，您不应该替他求情。难道公主家里的管家就可以不遵守皇上的法律吗?”

湖阳公主被董宣一责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个杀人的管家一看情况不妙，赶快往人背后躲，可是董宣早已经认出他来了，命令手下人一把抓住他，拉到路当中，当场就把他斩了。

湖阳公主看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敢冒犯她，当着众人的面杀她的管家，心里非常气恼。她赶快跑到皇宫里去，找到光武帝刘秀，诉说自己的委屈，要求光武帝给她作主。光武帝听说董宣对姐姐这样无礼，也很生气，立刻下令把董宣抓来，要用乱棍把他打死。

董宣听说光武帝要打死他，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要打死我，我当然不敢违抗。不过，请您允许我在临死之前讲句话!”光武帝问：“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英明，所以才复兴了汉朝。如今公主的管家杀了人，公主置皇上的法律于不顾，想要庇护杀人凶手。我无非是公正地执行了法律，却要断送性命。陛下自己制订法律，自己破坏，这怎么能把国家

治理好呢?我看您不必打，我自己在这里撞死好了。”说完，就用头去撞宫殿的柱子，头皮撞破了，流了满脸的血。光武帝赶快叫太监把董宣拉住。他仔细一考虑，觉得董宣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为了照顾姐姐的面子，他想叫董宣给姐姐赔个罪，把事情了结。他对董宣说：“你按照法律办事，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冒犯了公主，使公主受了惊吓。你现在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不是，我就饶了你。”

萤宣听说叫他给公主磕头赔罪，很不服气，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光武帝叫人把董宣拉到湖阳公主面前。接着他的脑袋叫他跪下磕头。董宣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两手撑着地，挺着腰杆，强着脖子，死也不肯低头。

湖阳公主看到董宣的强硬态度，觉得自己实在有些下不了台。她对光武帝说：“早先陛下在乡下的时候，专门庇护那些亡命之徒，做官的都不敢到咱们家里来搜查。如今陛下贵为天子，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处治不了吗?”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和老百姓不同。董宣是个强脖子县令，是为了维护皇家的法律才这样做的，我不能处治他。您再找一个能干的人做管家吧!”说完，他下令把董宣放了，还赏赐他一顿酒饭。董宣把酒饭吃个精光，然后把杯盘全都翻转过来，底朝上地扣在桌子上。管事的人认为董宣这样做是有意侮辱皇上，又把他扭送到光武帝面前。光武帝听说以后，责问董宣说：“董宣!这一次你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董宣说：“皇上赐给我饮食，我不敢剩下一点儿；皇上叫我办事，我要拿出全部力气，这就是我把酒饭吃个精光，并且把杯盘翻转过来扣在桌子上的意思。”光武帝听了，点点头说：“这样很好!”他下令赏赐董宣三十万文钱。董宣把这笔钱全都分给了他的手下人。从此，“强项令”董宣的名气到处传开了。佛教入国

第二十八章

汉光武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大力提倡儒家的孔孟之道。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巡视，一下车，就打听当地有没有熟读四书五经的人。要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亲自登门拜访，务必要把这个人请出来做官。当时一些精通儒家学术的人，听说皇帝这样尊崇儒术，就从四面八方背着图书赶到京城里来。光武帝在京城里修了一所太学，设立了五经博士，让那些熟读经书的人在里面讲学。京城里的学术空气浓厚起来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等学说，为维护专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光武帝死后，儿子刘庄即位是汉明帝。汉明帝不仅信仰儒家学说，而且信仰佛教，用佛教的教义来维护他的统治。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刘庄还派人到印度去取经求佛。

佛教起源于印度，它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字叫悉达多，大约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在一个释迦族的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今天尼泊尔境内迦毗罗卫地方的一个统治者。因此，悉达多的青年时代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这个悉达多王子却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他觉得人世间存在着生、老、病、死的痛苦，应当想办法解脱。在二十九岁那年，悉达多离别了自己的双亲、妻儿，出家去修道。他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了七年，据说最后终于大彻大悟，进入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成了“佛陀”（即“觉悟者”的意思）。在这以后，他就到印度古代铜器的恒河流域去招收门徒，传播他创立的佛教。最初有舍利弗、阿难陀等人相信了他的说教，投在他的门下，成了他的第一批信徒。接着，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佛教成了印度的一大宗教。

佛教的重要教义是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根据佛教的说法，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像一个车轮似地在那里不断地转动着。从生到死，好像车轮转了一圈。紧接着死而来的就是来世的生。有了生，就又有死，从生到死，就又转了一圈。再紧接着的又是再一世的生。一个人这一世是人，他的前一世或者下一世不一定是人。他的前一世可能是神，因为不修行，这一世就被罚做人了；也可能他的前一世是牛马等牲畜，

因为修行了，就让他这一世升级做人。一个人的下一世做什么，得看他这一世的表现，如果这一世修行了，下一世就可能成为神；这一世不修行，下一世可能降格做牛马等牲畜。这种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自然是唯心的，决不可能真有那么回事，但是它很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可以利用佛教的这种说教，消磨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思想，叫他们这一世忍耐服从，好好修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佛教创立以后，在印度广泛流行。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期，阿育王统治印度，他规定佛教为印度的国教。从此，佛教逐渐地传播到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缅甸、暹罗（即今泰国）和越南等地。西汉末年，西域有些小国也崇信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正派使臣伊存到长安。西汉的博士弟子秦景宪跟着伊存策浮屠经。从此以后，佛教就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些王公贵族首先信仰佛教。他们吃素念佛，希望来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神仙。汉光武帝刘秀的一个儿子被封为楚王的刘英就是个佛教徒。刘英的母亲许美人没有受到光武帝的宠爱，所以他的地位比较低，虽然被封为楚王，封地却是又小又贫瘠。刘英希望自己的来世能过得比这一世更好，所以就信了佛教，并且还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佛教故事到处宣讲，也讲给他的异母兄弟明帝刘庄听，劝明帝信仰佛教。

永平八年的一天晚上，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金人，围绕着金人的脑袋和脖子，有一圈耀眼的光芒，看起来十分威武尊严。明帝一觉醒来，猜不透梦中所见的金人究竟代表什么，自己这个梦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第二天上朝，明帝把这个梦讲给文武大臣们听，请他们帮助他圆梦，也就是帮助他分析这个梦。明帝说完梦以后，合朝的文武大臣听了，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大半天，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还是楚王刘英给做了分析。刘英对明帝说："禀告陛下，您大概梦见佛了。我听西域天竺国来的佛教大师说，佛高一丈六尺，通体都是金黄的颜色，颈项上佩有日月的光辉。这跟您梦见的不是完全一样吗?佛给您托梦，这是吉祥的预兆，希望陛下赶快斋戒沐浴，并且派人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汉明帝听说自己梦见的是佛，梦见佛又是吉祥的预兆，高兴极了，就赶快斋戒沐浴，郑重其事地派郎中蔡愔〔yīn〕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带了黄色的和白色的上等丝绸，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天竺国就是张骞说的身毒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据说印度的商人早在西汉初年就跟中国的巴蜀有通商关系，张骞通西域的时候，曾经在西域见到过蜀地出产的布和邛竹杖，那是西域人从身毒国那里转运去的。张骞一度想出使身毒国，但是没有能够实现。

东汉的时候，由于生产的发展，各地之间的交通比西汉时候方便得多了。蔡愔、秦景和他们的随从，经过艰苦的长旅途行，终于到了天竺国，并且找到了佛教大师，向他们介绍了汉朝的情况，转达了汉明帝想要取经求佛的虔诚愿望。佛教的大师们认为汉明帝不远万里地派人去取经求佛，确是出于虔诚的心情，就决定派遣竺法兰和迦叶摩腾两位大师，带着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古代风景画鉴赏叶上的佛经，跟随蔡情、秦景等人到中国来。贝多罗树是天竺生长的一种树，叶子宽阔坚韧，佛教徒用它来写佛经。

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到了中国，朝见了汉明帝，向汉明帝讲解了佛教的教义。汉明帝认为佛教的教义很符合他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就请他们两位带着一些佛教徒，把他们带来的贝叶经翻译成为汉文。竺法兰和迦叶摩腾起初住在汉朝政府招待贵宾的鸿胪寺里。他们希望汉朝政府能按照印度佛教寺院的样子修建一所佛寺，供他们居住，就画出佛寺的图样来交给汉明帝。汉明帝从国库里拨出一大笔钱，并且调来了有名的工匠，在洛阳城里修建了我国的第一所佛寺。因为竺法兰和迦叶摩腾是用白马驮着贝叶经到中国来的，所以这所佛寺就取名为白马寺。

自从汉明帝派人去天竺取经求佛以后，佛教就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了。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有些教义跟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不合，后来，有些佛教徒和皇朝的统治者就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改造，把中国道家的黄老思想和儒家的孔孟之道掺和进去，把它变成了既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又有利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封建社会绵延达两千多年之久，封建思想十分顽固地盘踞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孔孟之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由于

佛教的影响。王景疏通汴渠东汉初期，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汉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禁止随便杀害和虐待奴婢；把田租减轻到像西汉初年那样的三十税一。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剥削略微减轻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他们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农村里荒废了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黄河南北广阔的原野里增添了一座座新的村庄，到处出现了人丁兴旺、鸡啼犬吠的繁荣景象。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冶铁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出来的东汉时期的铁制农具有犁铧、镰刀等多种。从四川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镰刀，全长达35厘米，是用来收割庄稼的。

汉光武帝在位的时候，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来鼓动冶铁炉的风箱，提高冶铁炉的炉温。用这种鼓风炉冶炼生铁和锻造铁器，不仅质量有显著提高，而且能够节省人工和成本。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得水利灌溉和航运必须大大改进。西汉末年以来，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许多河渠塘堰破坏了，严重影响了农田灌溉和水路运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兴修水利。东汉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在时代的需要下为整修河渠立了大功，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王景是朝鲜乐浪郡人，他的第八代以上的祖先是中国山东琅琊人。西汉景帝时候，为了躲避吴楚七国之乱，他家祖先才搬到朝鲜去的。传到王景这一代，因为他怀念父母之邦，喜好汉族的文化，怀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心情，又搬回故乡山东来了。王景不但喜欢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术数一类的科学，并且对于各种实用的工程、技艺和生产知识，特别是对于兴修水利工程很有研究。汉明帝在位的时候，浚仪渠（今河南省开封市）年久失修，常常发生水灾，明帝让一个叫王吴的官员去负责修治。王吴向明帝推荐王景参加这项工程。明帝接受了建议，叫王景去帮助王吴。王吴采用了王景提出来的“堙流法”〔堙yīn堵塞〕，

整修浚仪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堙流法”就是根据地形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把堵塞了的地方打通，使积水能够畅快地流过。这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治水方法，是王景根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浚仪渠修好了，汉明帝很高兴，又叫王景去整修汴渠。汴渠西起河南荥阳，东到黄河入海处的千乘海口，流经豫州、兖州、青州等地区，长达一千多里，是这几个州的水路交通要道和重要农田水利工程。从西汉时候起，因为黄河泛滥，水淹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使得汴水东侵，河堤常常溃决，不仅失去了航运和灌溉的便利，并且使几个州的人民受害不浅。人们多次要求东汉朝廷派人整修汴渠，无奈当地的郡县官吏只是说空话，并不见行动。他们有时候也向老百姓摊派修渠的捐款。可是收上去的捐款常常被用去兴办其他并不急需的工程，汴渠两岸的水灾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亲自召见王景，问他怎样才能把汴渠修好。王景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修渠方案。明帝把古代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珍贵的书籍赏赐给王景，叫他借鉴古人的经验，把汴渠治理好。

这一年夏天，王景从国库里领到了修渠的经费和器材，从豫、青、兖等州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和士兵，开始了规模巨大的修渠工程。这一次，王景请王吴给他当助手。他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地工作，亲自率领民工们测量地势，安排好施工的步骤。王景古代风景画鉴赏以历史上的夏禹为榜样，常常不辞辛苦地到施工现场去跟民工们一起劳动，开山凿石，排除障碍，挖深河道，把长年淤积下来的泥沙掏干净。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加高加固堤岸，防止洪水。在干渠两边新挖了许多支渠，既减轻干渠的负担，又便利农田灌溉。在一千多里长的渠道中，每隔十里修一个水门，以便调节水的流量。上游天旱缺水的时候，可以把下游的水门关闭，迫使水位升高，渠水回流，适应航运和灌溉的需要。这种修渠方法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可以说是从夏禹治水以来，几千年兴修水利工程的经验总结。

汴渠沿岸的老百姓，积极支援修渠工程，他们给民工和士兵送茶送水，踊跃地捐赠扁担箩筐，为修渠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汴渠的整修

工程整整进行了一年，第二年夏天洪水到来之前，工程完工了。明帝刘庄带着文武大臣亲自来视察竣工后的渠道，召见了沿渠的郡县官吏，规定以后沿渠郡县必须设置专人负责维修，哪一段因为管理不善而出了问题，就要处罚当地的官吏。明帝还下令奖赏修渠人员，王吴和其他修渠有功人员全都升官一级，王景是工程的主持人，功劳最大，连升三级，提升为侍御史。过了两年，又拜他为河堤谒者，赏赐他车马和许多绸缎钱币。

一年工夫整修好了一千多里长的渠道，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巨大成就。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除了王景本人的技能和努力以外，当时的社会条件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修渠使用了大量的铁制工具，应用了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测量技术，特别是吸取了从战国以来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修渠经验。东汉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开挖了许多河渠，著名的有郑国渠、西门豹渠、白渠等。人们开挖和修理这些河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景很好地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又根据实际情况大胆地创造革新，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王景不但在修渠治河的水利工程上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也做出了成绩。汉明帝的儿子汉章帝刘炟〔dá〕在位的时候，王景被派去做庐江太守。他发现庐江土壤肥沃，但是粮食产量很低，许多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仔细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当地的耕作技术很落后，农民还不知道用牛耕地。王景派人从外地买来许多耕牛和铁农具，大力提倡用牛和铁犁耕地，号召农民把荒废的土地开垦出来。这样一来，庐江境内的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班超投笔从戎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西域的一些主要国家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西汉末年，西域有五十多个国家。王莽当政的时候，西域诸国又跟汉朝断绝了关系，服从了匈奴。东汉建立以后，西域诸国都想跟汉朝恢复关系。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鄯善、焉耆〔yān　qí〕等十几个西域国家的国王，都把儿子送到洛阳来作抵押，表示愿意做汉朝的藩属，请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保护他们。汉光武帝觉得自己的政权刚刚才稳定下来。腾不出力量去管西域方面的事，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汉明帝即位以后，北匈奴出兵骚扰汉朝，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大将军窦固带兵去讨伐匈奴。窦固重用青年将领班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班超字仲升，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好劳动，有口才，读了很多书，但是不喜欢深刻钻研，总想在军事方面能为国家做出些贡献。

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汉明帝召去做校书郎，班超和他母亲也一起跟着到了洛阳。因为家里贫穷，班超只好到衙门里去帮公家抄写公文信件，挣点钱来贴补家用。可是班超不甘心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庸庸碌碌地度过，他想为国家驰骋疆场，建立战功。有一天，他抄完了一件公文，突然把笔投向砚台边上，叹口气说："男子汉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应当效法西汉傅介子那样杀敌报国，学习张骞那样立功异域，争取封侯才对，怎么能够老是在笔砚之间讨生活呢?"旁边的人听班古代风景画鉴赏超这么说，心想：这个穷小子，饭还吃不饱，志向倒不小哩。他们斜着眼看看班超，发出了一阵冷笑。班超不禁长叹一声，轻轻地自言自语地说："唉!小人怎么能够知道壮士的远大志向呢!"

永平十六年，班超投笔从戎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投到大将军窦固门下，跟着窦固出兵去攻打匈奴。班超作战勇敢，多次打了胜仗。有一次，窦固叫班超率领一支军队去进攻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县）。班超打败了匈奴的军队，占领了伊吾卢，把匈奴军队一直追击到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窦固觉得班超很能干，报请汉明帝批准，任命班超为假司马，并且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带着三十六名军士出使西域，去联络西域诸国，巩固对匈奴的胜利。从此，再次通西域的任务，就由班超承担起来了。

班超等一行三十六人，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首先到了鄯善。鄯善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是西域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鄯善王听说他们是汉朝的使者，开始的时候对他们很恭敬，招待得十分周到。没过几天，态度忽然一变，对他们显得十分冷淡了。班超对自己的随从说："鄯善王对咱们的态度变了你们觉察到了没有?我看这一定是匈奴的使者来了，所以鄯善王举棋不定，不敢对咱们太亲近了。俗语说，聪明的人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应当有所觉察，何况现在已经看得见苗头了。咱们应当早有准备才对!"说完，班超把服侍他们的鄯善侍者叫来，诈唬他说："告诉我，匈奴使者来了几天了?如今住在哪儿?"鄯善侍者见班超气势汹汹地逼问他，心里十分害怕，连忙回答："已经到了三天了，他们的营地离这儿三十里路。"

班超把鄯善侍者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把自己带去的三十六名军士全都召集起来，跟他们一起喝酒。大伙儿喝得正来劲的时候，班超突然站起来，激昂地对大家说：“弟兄们!你们跟我来到西域，目的是想要立大功，求富贵。可是如今匈奴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对咱们的态度就变了。如果咱们不采取对策，部善王很可能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到那时候，恐怕咱们的尸骨也回不了家乡啦。你们看这怎么办好?”三十六名军士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如今到了危急关头，我们都听您的，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只有趁着黑夜对匈奴人发动火攻，使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他们一乱，咱们就能把他们全部收拾掉，消灭了匈奴的使者，鄯善王才可能对咱们汉朝友好。”众人一致赞同班超的意见，连忙分头去准备。

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班超领着大伙儿出发了。当时正好刮大风，班超叫十个人拿了鼓，埋伏在匈奴使者的营房后面，跟他们约定说：只要看到火起，就使劲敲鼓，大声叫喊。其余二十六个人都拿了刀枪弓箭，埋伏在正门两边，一见匈奴使者冲出来，就截住厮杀。一切布置停当，班超叫人放火。火顺着风势蔓延开来，鼓声、喊杀声立刻响成一片。匈奴人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班超冲上前去，手起刀落，杀死了三个匈奴人。二十六名埋伏着的军士，也跟班超一齐奋勇冲杀，一共杀死匈奴人三十多个，烧死一百多个。

战斗结束后，班超派人把鄯善王请来，叫他看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一看，吓得面色煞白，话都说不出来了。班超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叫他不要跟着匈奴反对汉朝，要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部善王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并且决定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做人质。

班超把这一事件的经过向窦固报告，窦固很是高兴，立即替班超向汉明帝请功。汉明帝听说班超这样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也很高兴，下令奖励班超，提升班超为军司马，命令他继续完成通西域的重大任务。

古代文人窦固向班超传达了汉明帝的决定，让他出使于阗〔tián〕，还准备拨出更多的士兵归他指挥。班超只要原先的36个人，多了不要。他说：“人多了，如果遇到意外事件，行动反而不方便，有36个人就足够了。”

于阗在鄯善西面，国势比较强，由匈奴使者监护国政，在那一地区称霸。班超等人到了于阗，向于阗王转达了东汉朝廷的友好愿望，希望他和汉朝结成友好关系。于阗王因为害怕匈奴，对班超等人十分冷淡。有个巫师向于阗王出坏主意说："大王千万不能和汉朝通好呀!不然的话，神明就会发怒。汉朝使者有匹好马，不如向他要来杀了祭神，神明会保佑大王的。"于阗王派大臣向班超要马。班超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他表示同意，不过提出要巫师亲自来取马。巫师果然神气活现地和大臣一起来牵马。班超二话没说，当场斩了巫师的头，打了大臣几百鞭子，责备于阗王不讲友好。于阗王早已经听说班超在鄯善的所作所为，这会儿感到十分害怕，就杀了匈奴使者，表示愿意和汉朝友好。班超用好言抚慰于阗王，并且送了许多礼物给于阗王和他的大臣们。

班超率领三十六名军士，继续出使西域诸国，先后又和疏勒、车师等国结成了友好关系。他还发动这些国家的兵马，去进攻那些还跟着匈奴敌视汉朝的国家，用巧妙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得西域五十多国全都归附了东汉。班超自己被东汉政府任命为西域都护，负责监视匈奴，保护西域诸国。这样，从西汉末年起被阻塞了几十年的东西交通大道，又重新畅通了，汉族地区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又继续在那丝绸之路上频繁地展开了。王充写《论衡》

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在位的三十年间，是东汉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教育也发达起来。当时读书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进行争辩。汉明帝怕这种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会影响他的专制统治，决定要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自到太学里去讲经，招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听讲和看热闹。他要求大家按照他的讲解来学习儒家经典，不许可有别的讲法。

汉章帝继续他父亲的做法，想方设法地加强思想统治。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他亲自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生大会，讨论对《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种儒家经典的不同看法，最后由他亲自裁决，判定谁讲得对，谁讲得不对，规定以后所有讲学的人，都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意见去讲。他把自虎观会议的记录，交给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去整理，写成一本题为《自虎通义》的书。

班固是班超的哥哥，他写过一部《汉书》，这是继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的第二部著名的历史书。《汉书》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记录了汉高祖刘邦起，到王莽篡汉为止的二百多年的历史。班固也擅长写赋。那时候，有人对首都建在洛阳表示不满，希望迁到西汉时候的首都长安去。班固反对迁都长安，他特地为这件事写了一篇《两都赋》，赋的内容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长安人，一个是洛阳人。长安人夸耀长安如何如何好，应当作为首都；洛阳人说帝王之气在洛阳，应当以洛阳为首都。最后，洛阳人说服了长安人，两个人一致认为应当把首都建在洛阳。班固的这篇《两都赋》，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和班固差不多同时候，有个反对专制思想统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名叫王充。他是跟白虎观会议的要求唱反调的。王充是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从小就很聪明，也很用功，六岁开始识字读书，八岁被送进本乡的书塾，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在二十岁那年，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当时班固的父亲班彪正在太学里讲学。王充虚心地跟班彪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王充对讲堂里学到的知识不满足，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找别的书来读。日子一久，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于是他又跑到洛阳街上去逛书铺，寻找各种各样的新书。王充很穷，他找到了新书，买不起，只好站在书铺里阅读。王充读书十分专心，记忆力又特别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背下来。就这样，他又读到了许多新书，学到了许多书本知识。

王充在洛阳的太学里学习了几年，看到当时政治很腐败。他不想做官，回到家乡去了。后来他虽然在县里和郡里做过像秘书一类的工作，但是时间都不很长。王充的同乡曾经极力向章帝刘炟推荐他，说他的学问跟孟子和司马迁一样好。章帝也有意想请王充去做官，可是王充推说有病，不肯去，他情愿在家里写书。

王充用了几年工夫，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书名叫做《论衡》。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闭门谢客，拒绝应酬，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的窗台上、书架上、壁洞里，到处都安放了笔、刀和竹木简，一遇到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就赶快随手刻写在竹木简上，作为写书的素材。为了写《论衡》，王充搜集的材料储藏了好几间屋子。他

写的这部书不仅观点新颖，材料也很丰富，说服力很强。

《论衡》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书中对许多迷信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当时有迷信思想的人举了个例子，说：春秋时候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条水蛭（俗名叫蚂蟥）。如果他把这条水蛭挑出来，那样厨师就会被处死刑。他怜悯厨师，就悄悄地把水蛭和酸菜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解大便，不仅把水蛭解了出来，并且原有的肚子痛的病也痊愈了。他们说这就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王充用科学的道理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他说：为什么楚惠王吞了水蛭能够跟大便一起解出来呢?那是因为人的肚子里热度高，水蛭受不住，热死了，所以在解大便的时候就便出来了。至于楚惠王肚子痛的病，那是因为他肚子里有淤血，而水蛭正好是爱吸血的，水蛭在楚惠王肚子里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肚子里的那些淤血都吸走了。这样，楚惠王的病自然就痊愈了。这件事情只能算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是什么"善有善报"。王充对这件事的解释，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可是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又有一次，天上打雷，打死了一个人。有迷信思想的人又出来宣传说：这是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所以雷公把他打死了，这是"恶有恶报"。王充听到这件事情，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他看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烧焦了的臭味。于是他就解释说，打雷的时候有闪电，闪电就是火，雷其实就是一种天火，被雷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这也是碰巧的偶然现象，天上并没有什么雷公，更不是什么"恶有恶报"。

王充写的《论衡》这部书中，像这一类破除迷信、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很多的。《论衡》这部书，可以说是公元1世纪时候一盏智慧之光的明灯，它的光芒刺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蔡伦造纸王充写《论衡》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粗糙的麻纸，但是还不适宜于写字，他的书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王充去世后不久，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造出了适宜于写字的纸。从此以后，纸、墨、笔、砚就成了中国人写字的主要文具用品，合称为"文房四宝"。文房四宝不是同一个时候发明的，它们的出现有早有晚。笔和砚出现较早，墨和纸出现稍晚，按出现的顺序

排列，应该是笔、砚、墨、纸。

文房四宝出现以前，人们最初把字凿刻在龟甲兽骨上，这就是甲骨文。后来又把字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金文，或叫钟鼎文。春秋时候，笔出现了，刀笔并用，把字刻或写在竹简木牍上。最早的笔叫“聿”，是蘸了漆写字的。有了笔，很快就有了砚，那是用来调漆的。秦朝守长城的大将蒙恬改进了笔，做成了现在我蔡伦们常见的毛笔。笔改进以后不久，墨出现了。用砚磨墨，毛笔蘸了墨写字，就比用漆方便得多了。但是木简木牍太笨重，所以人们又把字写在绢帛上。秦汉时候，绢帛和简牍并用。绢帛虽然轻便，却也有价格昂贵的缺点，所以人们一直想寻找一种像绢帛那样轻便而价钱又便宜的东西用来写字。西汉时候，已经出现了用麻造的纸。这种麻纸很粗糙，还不适宜于写字，蔡伦就在用麻造纸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进行新的试验。

蔡伦字敬仲，是东汉和帝刘肇至安帝刘祜时候的一位宦官。他为人正直，敢于给皇帝提意见，很得汉和帝的信任。蔡伦又是善于发明创造的人。他看到写字用的简牍太笨重，绢帛太昂贵，而当时已有的麻纸又不适宜于写字，就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一种既便宜又便于写字的纸来。

蔡伦先仔细研究了前人造纸的经验，知道了制造麻纸的原瑚就是把麻的纤维捣烂，压成薄片。因为工艺很简单，造出来的纸就很粗糙。蔡伦想，如果把工艺搞得精细些，造出来的纸也许就会细腻而便于写字了。于是他开始把麻捣得很烂，压成很薄的纸。这样做，纸是比较细腻些了，但是还不够理想，因为麻里面还有不少粗纤维捣不烂，所以做成的纸仍然不适宜于写字，并且把能织麻布用的麻来造纸，成本也不便宜。

蔡伦进一步想，麻能造纸，是因为它有纤维，那么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不值钱的东西，也都含有纤维，是不是也能用来造纸呢？于是他又动手去做试验。他把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东西收集起来，先泡在水里，洗去污垢，再放在石臼里捣烂成浆，然后压成片，做成了纸。这样用不值钱的东西做原料造纸，纸造成了，成本也降低了。但是先前的缺点还存在，仍有一些捣不烂的纤维混在里面，做成的纸还不够光洁，还是不适宜于写字。

为了把纤维捣得更烂，使造出来的纸更加细腻光洁，蔡伦又在造纸用的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原料中加进了带腐蚀性的石灰等东西，一起放在石臼中舂捣。结果，不但原料捣得更烂了，并且还意外地出现了漂白的作用，使得捣成的纸浆变成了白色。可是用这样的纸浆直接压制成的纸，仍然不能除掉那些实在捣不烂的粗纤维，并且由于放了石灰等东西，做成的纸又出现了许多细小的颗粒。

蔡伦又接着做试验。他把捣烂了的纸浆兑上水调稀，放在一个大木槽里，然后用细帘子去捞那浮在上面较细的纸浆。等细帘子结了一层薄薄而又均匀的纸浆以后，把它晾干，揭下来就成了一张洁白细腻的纸。这样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试验终于成功了，造出了便于写字用的纸。这时候是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

蔡伦把自己改进造纸术的经过上奏汉和帝。汉和帝听了很高兴，叫蔡伦继续改进，扩大造纸的规模，造出更多更好的纸来。蔡伦没有辜负汉和帝的信任，果然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纸。蔡伦在汉安帝的时候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就把蔡伦造的纸叫做“蔡侯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时试验成功的那一套操作过程，后来的人又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造出来的纸越来越精美。造纸用的原料，也因为各地方的出产不同，又有所扩大，如出产藤的地方，用藤皮作造纸原料；出产竹子的地方，用竹子作造纸原料；出产楮〔chǔ〕树较多的地方，用楮皮造纸；沿海地方，用海苔造纸。

造纸术的改进，对笔、墨、砚的要求提高了，使得笔、墨、砚也不断地有所改进，文房四宝之间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造纸术的改进，写字容易了，著书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文化更加飞速地发展起来。造纸术的改进，对于中国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东汉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书法家和画家。东汉以后，有成就的书法家和画家更多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纸的用途也逐渐多起来，它不光是文房四宝之一，并且也能作包装食物和其他物品等用途。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也是离不了纸的。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最早传到东邻朝鲜，通过朝鲜再传到日本。大约在唐朝的时候，造纸术通过西域传往欧洲。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终于传遍了全世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张衡发明地动仪蔡伦在研究如何改进造纸法的时候，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科学家在进行另外一项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想要探索天体运行和地震的规律。这位科学家就是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幼年家境贫寒，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度日。这种艰苦的环境，不仅使张衡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还促使他立下了发愤读书的志向。张衡谦虚好学，十多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他十八岁到洛阳进了太学以后，熟读了四书五经，成了一个学识丰富的青年学者。

张衡的学问虽然超过了别人，可是他一点儿也不骄傲，仍然十分虚心地向别人的长处学习，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汉和帝刘肇听说张衡的学识丰富，几次派人请他去做官，他都没有去。他常常对别人说："一个人不愁自己的地位不高，而是应当担心自己的道德品质不够高尚；一个人也不愁得到的报酬太少，而是应当担心自己的知识学问不够广博。"张衡最感兴趣的是研究机械、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制造一种仪器，常常可以一连几天不间断地工作，直到做成功为止。据说张衡用木头制造过一只会飞的鸟，这只木鸟能在天空中盘旋翱翔，只要它的翅膀一下垂，就会乖乖地飞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可惜的是这种木鸟的制造方法并没有流传下来。

汉安帝刘祜〔hù〕听说张衡学识渊博，召他到朝廷去做了太史令，叫他负责管理天文历法方面的工作。

张衡做了太史令以后，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制造了一个叫做浑象的仪器。

浑象是一种天文仪器，是观测星象、确定节气和了解其他天文现象用的。它是一个直径八尺的空心铜球，里面有一根铁轴古代风景画鉴赏贯穿球心。球放在架子上倾斜的方向，正好就是地球自转轴的方向。铜球表面刻有各种重要的星宿和刻度，代表天空中的星座和天象运行的情

况。这个浑象连接在装有一组齿轮的机械上，机械再跟报时的漏壶连接起来，漏壶里滴出来的水能发动齿轮，齿轮就会带动浑象绕着铁轴旋转，一天转一周，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天象运行的情况。浑象制造成功以后，张衡坐在屋子里看着仪器说：现在某一颗星星正在从东方升起，某一颗星星已经升到了天空中间，某一颗星星正在向西方降落。人们跑到屋外去看天空，发现天空的情况和张衡说的基本上一样。事实证明张衡发明的浑象是古代比较精确的天文仪器。

接着，张衡又发明了一个观测地震用的地动仪。

东汉时候，我国各地常常发生地震。根据历史记载：从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到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三十年中，有二十三年发生过较大的地震。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九月的一次大地震，波及三十五个郡，有的地方大地裂缝，有的地方城墙和房屋倒塌，死伤的人很多。古代的人大都迷信鬼神，一发生地震，人们就以为这是鬼神在显灵，害怕得不得了。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地方官要赶快向京城里报告，由太史令把它记录下来，迟误了就要判罪。

张衡是个科学家，不迷信鬼神，他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人们不但要记录地震的情况，并且应当研究地震的规律。他为了充分掌握地震的情报，就在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发明了一架地动仪。地动仪用精铜铸成，直径八尺，很像一个大酒坛。顶上有个突起的盖子，可以打开。周围刻着山龟鸟兽的花纹，作为装饰。里面中心立着一根上粗下细的柱子，柱子紧挨着八道机关。和八道机关相连接的是趴在外面头朝下的八条龙。八个龙头分别对准着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八个方向。每个龙头的嘴里都衔着一个铜球。八个龙头的底下，蹲着八个铜铸的昂首张嘴的蛤蟆。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中间的立柱就倒向震区所在的方向，触动那个方向的机关，连接在那个机关上的龙头就张开嘴巴，吐出铜球，铜球就会掉进蛤蟆的嘴里，并且发出“当啷”的响声，给管理人员报信。管理人员只要一看铜球落进哪只蛤蟆的嘴里，就能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以便及时报告上司，赶快派人去了解情况。

地动仪制造成功以后，放在京城洛阳一间观测地震的屋子里。有一

天，西北方的龙头突然张嘴吐出铜球，“当啷”一声，锕球掉到了蛤蟆嘴里，说明西北方向发生了地震。可是当时住在洛阳的人并没有感觉到发生地震。这样，人们就怀疑起来了，都说张衡的发明靠不住，地动仪，这东西不准确。过了几天，陇西地方（今甘肃省）派人赶到京城洛阳来报告，说几天以前他们那里发生了地震，一查对日期，正好就是地动仪上龙头吐出铜球的那一天。人们这才相信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准确可靠的。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记录地震的仪器，欧洲在公元1880年才制造出类似的仪器，比张衡晚了一千七百多年。可以说：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用科学方法观测地震的开始，它揭开了地震科学的新纪元。党锢之祸东汉的皇帝，从汉明帝刘庄的孙子和帝刘肇起，都是幼年即位。和帝即位的时候才十岁。殇帝即位的时候不到半周岁。安帝十三岁即位。顺帝十一岁即位。冲帝两岁即位。质帝八岁即位。桓帝即位的时候大一点，也只有十五岁。这些从几个月到十几岁的小娃娃做了皇帝，当然不会管理国家大事，就只好由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相信娘家人，把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和舅父找来，帮助管理国家大事。这在历史上就叫外戚当权。

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不愿意充当傀儡，受外戚摆布，就让自己身边的宦官当亲信，利用宦官打击外戚。宦官把外戚打下去以后，他们也把持朝政，拿皇帝当傀儡。外戚集团不甘心被排挤，他们又利用皇帝对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这样，东汉朝廷上就出现了绵延不断的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

外戚专权最厉害的要数梁冀，他是汉顺帝梁皇后的哥哥，从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起，被任命为大将军，掌握朝改大权达二十年之久。他在做大将军的时候，作威作福，根本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年仅八岁的质帝刘缵〔zuǎn〕，就是被他用毒药害死的。梁冀家里前后有七个人封侯，三个人做皇后，六个人做贵人（妃子），出了两个大将军，三个驸马爷，有七个夫人得到封地和“君”的称号，其余做到卿、将、尹、校等官职的还有五十七个人，真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冀专断朝政，骄奢横暴，坏事干尽，没人敢惹他。可是到后来，终于跟他的另一个妹夫汉桓帝刘志发生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汉桓帝在他的

妻子梁皇后去世以后，跟自己的亲信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合谋，发动皇宫里的卫兵一千多人，乘着梁冀没有防备的时候，包围了他的大将军府，逼得梁冀和他的妻子双双自杀，并且把他的一家男女老少杀了个精光。

外戚梁冀专权的局面结束了，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立了大功，同一天都被封侯，掌握了朝政大权，号称“五侯专政”。从此，又出现了宦官当权的局面。

宦官当权以后，为非作恶，比外戚更坏。他们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把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都换上了他们的亲属。国库里的钱，他们拿来随意挥霍。东汉朝廷的钱粮税收，也都落入了他们的腰包。老百姓的脂膏都被他们榨干了，使得整个国家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局面。

宦官集团的黑暗统治，不但遭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也遭到了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的反对。太学是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培养官吏的场所。自从宦官掌权以后，做官不再需要什么学问，只要有门路、会拍马屁就行。这样，在太学里念书的中小地主的子弟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因此他们都恨透了宦官，在太学里展开反宦官的斗争。他们经常在太学里公开揭露和抨击宦官的罪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宦官。

包括外戚在内的世家豪族，看到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中小地主起来反对宦官，自然很是高兴。他们赶快也来配合行动，壮大反宦官斗争的声势。世家豪族出身的河南尹李膺、太尉陈蕃，跟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结成了好朋友。他们互相标榜，互相称誉，逐渐形成为一个反宦官的党派。在太学里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的歌谣。“楷模”就是榜样，这两句歌谣的意思就是号召太学生要以李膺、陈蕃为榜样，向他们学习。

宦官集团看到世家豪族和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党派，就寻找机会打击党人，先后发动了两次禁锢党人的暴力行动。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个跟宦官有勾

结而又迷信占卜的人，名叫张成，他预卜到皇帝将要进行大赦，就唆使他的儿子去杀人。不料这件杀人案子落到了河南尹李膺手里。李膺知道张成跟宦官有勾结，他一点也不客气，下令把张成的儿子抓来，公布了他的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张成见儿子被杀，自然恨透了李膺，他在宦官的唆使下，给桓帝写了一封诬告信，信上说："李膺等人在太学里结交各地来的太学生，组织秘密党派，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有谋反的嫌疑。"桓帝接到诬告信以后，也不调查了解，立刻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把他们送进监狱。有些党人闻风逃往外地，桓帝就派人四出查找，悬赏追捕。太尉陈蕃上书替李膺等人辩护，请皇帝停止捕人，也被免了职。

李膺等人虽然被捕，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审讯这件案子的时候，李膺慷慨激昂地当众揭发宦官集团的种种罪恶，把宦官集团搞得很是被动。这时候，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站在李膺等党人这一边，他想利用党人打击宦官，把朝政大权抢到自己手里来。太学生贾彪了解到窦武的政治态度以后，冒着有可能被捕的危险，化了妆，在夜里偷偷地回到洛阳，去见窦武，请他在桓帝面前替李膺等党人申诉。窦武答应了贾彪的请求，他和尚书霍谞〔xū〕联名给桓帝上书，请求赦免李膺等党人。桓帝觉得一方面是自己的岳父来说情；另一方面对于宦官他又不敢得罪，就来个折衷的办法。他下令赦免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但把他们驱逐回乡，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第一次的"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虽然被驱逐、禁锢，但是他们由于反对宦官而出了名，受到了社会上广大群众的拥护。桓帝的岳父窦武也在政治上捞了一把，获得了正直的声誉，受到了反对宦官的党人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中小地主，跟以外戚为代表的世家豪族，在反宦官专权的口号下联成一气，展开了声势更加壮大的反宦官斗争。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以后的第二年，汉桓帝死了。他没有儿子，窦皇后跟父亲窦武商量以后，把桓帝的侄子、十二岁的刘宏迎来，立为皇帝，就是汉灵帝。窦武被封为大将军，陈蕃被拜为太傅，由他们两人共同掌管朝政。窦武、陈蕃一掌权，立刻下令免除对党人的禁锢令，把李膺等几个为首的党人请出来做官，并且暗地里密谋诛杀宦官。

李膺等党人一回到京城里做官，宦官集团看到自己的死对头回来了，也立刻紧张地活动起来。他们探听到窦武、陈蕃、李膺等正在密谋诛杀宦官，就先下手为强，由宦官曹节、王甫等去要挟汉灵帝，迫使他下令逮捕窦武。窦武不甘心屈服，利用大将军的职权，发动驻守京城的北军起兵讨伐宦官，宦官指挥防卫宫廷的虎贲军和羽林军抵抗。一场武装争夺权力的斗争展开了。

窦武名义上是个大将军，可是办事没有魄力，不够坚决。陈蕃、李膺等人都是文弱书生，根本不会打仗。战斗的结果，虎贲军和羽林军打败了北军，窦武被包围后自杀，陈蕃被宦官杀害。

第二十九章

宦官集团取得胜利之后，由宦官头子侯览指使他的爪牙朱并上书控告党人张俭，说他和同郡的二十四个人结党谋反。灵帝下令逮捕张俭。张俭逃出京城，望门投止，也就是走到哪儿，依靠哪儿的百姓接待和掩护。最后辗转逃往塞外。宦官曹节又乘机奏请灵帝收捕李膺等一百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过几天又把他们偷偷地杀害了。宦官集团还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和杀害党人，几天工夫，被杀、被流放、被监禁的党人就有六七百人。接着，又把一千多个太学生全都关押了起来。凡是有替党人喊冤的，也都被杀被捕。所有党人和党人学生、父子、兄弟，凡是做着官的，都一律免职，驱逐回乡，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都是东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宦官们骄奢残暴，作恶多端，太学生发动的反宦官斗争，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自从他们的斗争被宦官击败以后，东汉的政权又一次完全被宦官集团所控制，政治越来越腐败了。崔寔写《四民月令》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激烈，大地主的庄园越来越多。很多庄园主常常兼营商业。他们把田庄里多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赚很多很多钱，然后再拿赚来的钱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有些大地主的田庄里不但出卖农产品，连池塘里出产的鱼虾和菱藕，丘陵地和山地上出产的木材和油漆，也拿到市场上去卖。有个大地主家里想做家具，他就叫在田庄里干活的农民种梓树和漆树。当时人们笑话他说：想做家具现种树，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成?可是过了一些年，他田庄里的梓树和漆树果然都长大了，不但他自己家里做了许多的家具，而且连那些笑话过他的人，也要到他的田庄里去买木材和油漆了。

东汉末年，有个叫崔寔〔shí〕的人，写了一本叫做《四民月令》的书，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东汉大地主庄园的情况。

崔寔是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做官的书香门第，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擅长写政论文。崔寔对农业生产很

有研究，也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桓帝刘志在位的时候，崔寔被任命为五原（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西部）太守。他到任的时候正好是冬天，看到五原街上行人很少，就到老百姓家里去了解情况。他看到许多老百姓穿得很单薄，抖抖索索的显得很可怜。有的老百姓正蜷缩在细草堆里御寒，看到崔寔到来，赶快从草堆里钻出来迎接，浑身上下还挂着不少的细草。崔寔看了觉得很奇怪，开始他只以为老百姓家里穷，买不起衣服，后来日子长了，才知道原来当地老百姓不懂得种麻，也古代画扇不懂得织布，所以没有衣服穿，只好钻草堆。崔寔进一步调查以后，知道五原的土地很肥沃，适宜于种麻，于是他就教老百姓学种麻，还教他们绩麻、织布。这样，五原的老百姓就有衣服穿了，冬天不用钻细草堆了。

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崔寔被调任为辽东太守。他在赴任途中，因母亲去世，回家办理丧事，在家闲居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崔寔了解了许多大地主田庄里的情况，他看到豪强地主的田庄拥有宽广的田地，强迫成千的农民替他们干活，而贫穷的农民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衣无食，十分可怜。崔寔对这种贫富悬殊的情况很不满意，他特地写了一篇《政论》来评论这种情况，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四民月令》也是他在这时候写成的一部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书。

《四民月令》这个书名中的“四民”，是指士、农、工、商四种人，“月令”是指逐月安排所应做的事情。当时农业生产是根本，手工业和商业都决定于农业生产，至于士，也就是读书人，当然更离不了农业生产供给衣食，所以虽说是“四民”，其实主要还是讲田庄里的农业生产情况。

《四民月令》原书已经散失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残存的三千二百多个字。从这三千二百多个字和刚才提到的那篇《政论》，再参考一些其他的书籍，我们可以知道东汉大地主田庄的规模大得惊人。最大的田庄里不仅有大片种粮食的田地，并且还有菜园、果园、养鱼池、种林木的丘陵和山地。田庄里种有大片的桑树林供养蚕用，桑树林旁边有养蚕室、缫丝房和染织房。因为田庄里土地辽阔，所以饲养了许多牛马供耕田和运输用，还养了许多猪、羊、鸡、狗等家畜家禽，供吃食用。当时吃狗肉的风气很盛行，养狗不是为了看门，主要是为了吃肉。田庄

里有酿造作坊，有人专管做鼬酿酒，作醋作酱，腌制成菜，并且用小麦、高粱等制作饴糖。田庄里有专门给田庄主人缝制四季衣服和做鞋做袜的裁缝；有给田庄主人做饭做菜做点心的厨师；还有专管修造房屋、车轿、家具和农具的泥水匠、木匠和铁匠；还有医药房负责采药、制药和治病，总之，凡是生产和生活上用得着的东西，田庄里几乎都自己生产，不用到外面去购买。一座田庄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

田庄里生产这么多东西，都供田庄主人享受。在田庄里劳动的农民，一年忙到头，却吃不饱，穿不暖，死后连块葬身之地也没有。田庄里的农民有个专门的称号，叫做“徒附”，其实就是失掉了政府的户籍，只好供大地主剥削的农奴。徒附不仅自身只能老死在田庄里，甚至他们生的子女也注定了做徒附的命运，不许离开田庄。

田庄里存在这样严重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自然十分尖锐。田庄主人为了防范徒附们起来造反，在田庄里修了坞堡。坞堡四周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四角修有瞭望楼监视徒附们的行动。墙外有深沟环绕，只有通过吊桥才能出入。田庄主人还训练了一批家兵来保卫自己，充当镇压农民的打手。

田庄主人住在坞堡中心的深宅大院之中，他们一家虽然只有几个、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居住的房屋却多到好几百间，有的房间是专门用来收藏金银珠宝的，有的房间是收藏四季衣服的。他们的厨房里鸡鸭鱼肉堆积得太多了，有的腐烂发臭，生了蛆，不能再吃了，只好扔掉。清香醇厚的美酒，因为搁得太久了，有的发酸变味，不能再喝，只好倒掉。田庄主人不仅不劳动，甚至连吃饭穿衣、梳头洗脚也要由奴婢在旁服侍。夏天，有奴婢给他们扇扇子，冬天，有奴婢围在身旁给他们挡寒风。田庄主人真是一些十足的寄生虫。

崔寔写的《四民月令》和《政论》，既使我们知道了东汉时候大地主田庄里的生产状况，也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历史画卷。它告诉我们，到东汉时候，封建制已经完全确立起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表现在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里，也表现在大地主的田庄里。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地主压迫和

剥削农民则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封建社会比起奴隶社会来虽然要进步得多，但是地主剥削农民和奴隶主剥削奴隶，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仍然是充满着阶级矛盾的社会。黄巾大起义宦官和外戚争权夺利，使得社会不安定，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而且，从汉和帝刘肇的时候起，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地闹水灾、旱灾和蝗灾。农民实在没有活路了，只好离开家乡，四处逃亡，形成了一群一群的流民。流民四处乞讨，餐风宿露，饿死冻死的很多，连首都洛阳的街头，也经常可以看到冻饿而死的流民的尸体。当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终于被迫打出了造反的旗号，开始聚众起义。东汉政府对各地的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可是农民反抗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当时民间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广大农民群众唱出了这种富有反抗精神的歌谣，他们藐视统治阶级，酝酿着起来斗争。从汉安帝刘祜在位的时候起，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时有发生。到汉灵帝刘宏在位的时候，终于爆发了一次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

黄巾大起义是张角领导的。张角是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人，太平道的首领。太平道是道教的一派，他们信奉中黄太一之神，以《太平清领书》作为他们的经典，宣传“黄天太平”思想，认为只有到了太平的时代，人们才能不愁吃穿，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张角本人懂点医道，常常免费给农民治病，病治好了，他就劝人家参加太平道。穷苦农民为了摆脱眼前困苦的生活，把张角看成是自己的救星，都纷纷信奉太平道，张角的信徒越来越多。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一带），太平道的信徒很快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

古代集市图张角派弟子去把信徒们组织起来，把八个州的信徒组织成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一方都指派一名首领去领导，叫做渠帅。三十六个渠帅都听张角统一指挥。张角还制定了“苍

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十六字起义口号。“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是指起义军要创造的天下，甲子是年号，就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他们预定在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八个州同时发动起义。张角还叫人在首都洛阳和地方州郡官府的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标明这些官府衙门到时候都将改变主人，借以鼓舞人心。

张角手下最得力的弟子是大方渠帅之一的马元义。他经常到首都洛阳联系，传达张角的命令。张角叫他先把荆州、扬州两地的信徒几万人调到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市北）集中，作为起义军的主力，以便配合首都附近各州郡的起义军进攻洛阳。

在预定的起义日期前一个月，济南的起义军中出了一个名叫唐周的叛徒，他写信给政府告密，起义的消息泄露了。东汉政府逮捕了马元义，在洛阳当众把他杀害。在洛阳受牵连被害的有一千多人，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洛阳街头。东汉政府还下令搜捕张角。张角得知消息以后，连夜派人赶去通知各地的信徒，叫他们立即发动起义。

叛徒的告密虽然打乱了起义的日程，使得起义军牺牲了一个重要领袖和一千多名战士，但是并不能扑灭起义的烈火。各地的太平道信徒早已组织起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接到张角的命令以后，三十六方立即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军用黄巾裹头，作为“黄天“的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己称为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和张梁称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他们三个人共同指挥起义军的战斗。

起义军每打到一个地方，就焚烧当地的官府衙门，攻打豪强地主的坞堡，捕杀为非作恶的官吏和地主。地方州郡的长官和大地主吓得纷纷逃窜。十几天工夫，封建统治的秩序就被打乱了。

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派重兵守住洛阳和附近的关口，又派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jùn〕为右中郎将，率领四万多名精兵来镇压黄巾起义军。颍川的黄巾军首领波才打败了皇甫嵩，把他围困在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官军看到黄巾军作战勇敢，声势浩大，都十分害怕。老奸巨滑的皇甫嵩，却看出了黄巾军缺乏作战经验的弱点。他召集自己的部下说：“打仗要用计谋，不在乎人数多少。我看黄巾军结草为营，一定害

怕火攻。如果我们乘着月黑风紧的夜晚去偷袭，放火烧他们的营寨，准能取得胜利。”在一个刮风的夜晚，皇甫嵩命令官军偷袭黄巾军，放火焚烧波才古代风景画鉴赏的军营。波才从梦中惊醒，赶快整顿队伍，奋勇抵抗，可是已经迟了。皇甫嵩、朱儁和骑兵都尉曹操率领官军，包围了他们，乘乱砍杀了成千上万的黄巾军战士。汝南、陈国两地的黄巾军闻讯赶来援救，也被打败。波才没有办法，只好退往阳翟。

北方由张角兄弟亲自率领的黄巾军打了胜仗，打败了东汉官军的北中郎将卢植和东中郎将董卓。汉灵帝赶快命令皇甫嵩从河南北上，夹击黄巾军。张角派张梁迎战皇甫嵩，两军在广宗（今河北省威县东）地方大战。张梁作战很英勇，他率领黄巾军奋勇冲杀，打得皇甫嵩招架不住，只好紧闭营门，躲藏起来。就在战局十分紧张的时候，可惜张角得病死了。张梁因为料理哥哥的后事，放松了警惕。皇甫嵩乘机向黄巾军反扑。他命令官军连夜准备，天刚蒙蒙亮就发动进攻，打破了黄巾军的大营。张梁率领部下奋勇抵抗，他和三万多名黄巾军战士英勇战死，另外五万多名黄巾军战败以后英勇不屈，投到河里壮烈牺牲。皇甫嵩居然劈开张角的棺材，砍下他的脑袋，送到京城里去请功。接着，皇甫嵩又去进攻张宝率领的黄巾军。张宝势孤力单，在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战死。

黄巾军的主力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各地的黄巾军仍然在战斗，沉重地打击东汉朝廷的统治。在黄巾军影响下的各地各族农民起义军，也纷纷起来跟地主阶级斗争。直到汉灵帝的儿子献帝刘协的时候，农民起义的浪潮还没有平息下去。洛阳遭劫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东汉朝廷害怕农民起义，也派宗室大臣到各地担任州牧，交给他们军政大权。这些人跟当地豪强地主勾结起来，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也就是军阀。豪强地主和大小军阀之间，弱肉强食，互相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京都洛阳，被凉州军阀董卓洗劫一空。

董卓是陇西临洮〔táo〕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到羌族〔羌qiāng〕地区游历，和羌族的豪强贵族交朋友，互赠礼物，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在陇西一带渐渐有了名气。后来，他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步步升官，势力越来越大。

正当董卓极力扩展势力的时候，东汉朝廷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又一次发展到了高潮。外戚何进任大将军，负责守卫洛阳。何进是汉灵帝何皇后的哥哥。他的势力强大，引起了宦官的不满和反对。当时宦官蹇硕〔蹇jiǎn〕担任上军校尉，即皇宫禁卫军的统帅。他想谋杀何进，不料走漏了消息。何进先下手为强，将蹇硕杀了。汉灵帝病死以后，何进就立皇子刘辩继承皇位，这就是少帝，改年号为光熹元年（公元189年）。担任中军校尉的袁绍，建议何进利用这个时机把所有的宦官全部杀掉。可是何太后不同意袁绍的意见。何进就想依靠凉州军阀董卓的力量，箝制何太后。他于八月间召董卓来洛阳。不想，这消息被宦官知道了，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又带人攻进皇宫，杀了大批宦官。朝廷上下乱成一团。正在这时候，董卓来了。

董卓只带了三千人马进入洛阳。他为了虚张声势，叫军队夜里偷偷出城，白天再打着旗子，敲着鼓，浩浩荡荡地从四个城门开进来。这样一连搞了四五天。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董卓调来了许多兵马。负责京城及其周围治安工作的长官丁原看出了董卓的野心，对董卓的行为深表不满。董卓也知道不除掉丁原就不能专权。他知道丁原的部将吕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就用金钱财物去收买吕布。吕布接受了董卓的贿赂，果然很卖力气，不几天就把丁原杀掉，替董卓扫除了障碍。这年九月间，董卓废了少帝，立陈留王刘协做皇帝。这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从这时候起，董卓自封为丞相，独揽了朝政大权，在洛阳为所欲为。有一天，董卓带兵去洛阳郊外游玩。正好百姓祭神赶庙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残暴的董卓竟然命令士兵冲进人群，把赶庙会的男人全部杀掉，驾走他们的牛车，抢走妇女和财物，还把那些砍下来的脑袋，绑在车辕车轴上，带回洛阳。在路上，董卓让士兵狂呼乱叫："打了大胜仗回来啦!"

董卓在洛阳的专横残暴，引起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对，就连那些官僚地主也对董卓没有好感。袁绍因为和董卓意田园风景画鉴赏见不合，逃到渤海郡。典军校尉曹操也怕董卓对他下毒手，逃出洛阳，回到陈留，公开打出了反对董卓的旗号。在这时候，有十多个州郡也先后起兵反对董卓。他们集合在一起，共同推袁绍做盟主，组织联军，讨伐

董卓。这支联军，历史上叫做“关东军”。

关东军对洛阳采取了半圆形的包围阵势，但是由于他们各有各的打算，都观望不前，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对董卓的压力。董卓也没有把关东军放在眼里。这时候董卓担心的是黄巾起义军的余部郭太。郭太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省襄汾县境内）重整旗鼓，多次打败董卓派去的军队。董卓害怕他们乘关东军围攻洛阳的机会，渡过黄河，切断后路，就匆匆忙忙地挟持汉献帝刘协撤出洛阳，逃往长安。

董卓撤出洛阳的时候，百姓不愿意跟他走。他就把洛阳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好几百万人口，编成许多小队，每个小队派一队士兵押送，驱赶着向西迁徙。董卓怕百姓半路逃回洛阳，就派军队把洛阳一带的房屋、庙宇、宫殿，全部烧光；把所有的物资一律毁掉，弄得鸡犬不留。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连同它长期积累起来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就这样被董卓这群残暴无比的军阀毁灭了。

洛阳遭劫，长安也不安宁。董卓到了长安以后，更加专横跋扈，穷奢极欲。董卓自比西周时候辅助武王立了大功的姜尚，也要汉献帝尊称他为“尚父”。董卓外出的时候，盗用天子的仪仗队，气势咄咄逼人。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董卓大权在手，就大封自己的子侄做官。他封还在吃奶的儿子为侯，封弟弟董旻〔mín〕为左将军，封侄子黄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掌管禁军。为了大量榨取人民的血汗，搜刮财物，董卓下令把秦始皇在长安所铸的铜人和长安皇宫里的铜钟铜架统统砸碎，把旧有的五铢钱〔铢zhū〕统统收集起来，利用这些铜料，铸成小钱，在市场上使用。这样大钱改小钱，造成了物价飞涨。一石〔dàn〕谷的价钱高到数十万钱。老百姓被害苦了，只希望残暴的董卓赶快死。当时长安市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指的是“董”字，“十日卜”就是“卓”字，意思是说：残暴的董卓啊!你怎么还活着，十日之内你死了吧!

古代风景画鉴赏穷凶极恶的董卓，不管人民的死活，征集了二十五万民伕，在离长安城二百六十里一个叫做郿的地方，建筑了一座防卫用的堡垒——郿坞。堡垒四周墙的高度厚度和长安城一样。董卓在里面屯积了供他们食用三十年的粮食，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还有其

他无数的珍宝。董卓怕人行刺，外出的时候，在衣服里面穿上厚厚的铠甲。他以为有了这些防卫措施，就可以万无一失，高枕无忧了。他说：夺权成功，可以称霸天下，万一不成功，守着这些东西也足够我过一辈子了。董卓哪里想到，就在他的堡垒里面，那些追随他的官员，如王允、吕布等，也不满他的骄横残暴。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间，王允和吕布合谋，把恶贯满盈的董卓杀了。杀死董卓的消息传开，长安市民欢欢鼓舞。看守董卓尸体的士兵，见尸体肥胖，就在尸体的肚脐中插上灯芯，像点灯一样点着了，足足点了两天。

不久，董卓的余部李傕〔juè〕、郭汜〔sì〕等打进长安，杀了王允等一万多人，对长安城进行了烧杀抢劫。洛阳、长安这两座繁华的大都市，相继遭到了凉州军阀的洗劫，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粲〔càn〕，在从长安逃往荆州途中，写了一首《七哀》诗，描写路上见到的悲惨情景，其中有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洛阳、长安遭劫，景象凄惨到了极点。鬣卓虽然被除掉了，但是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还刚刚开始，东汉从此转入分裂割据的局面。曹操陈留起兵在讨伐董卓的关东军将领中，曹操可以算是办事认真，有勇有谋，最有见识的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县，亳bó）人。他从小就很机警，能够随机应变。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担任了皇宫的侍从官。不久，他被调任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工作。洛阳虽说是京都，可是外戚、宦官倚仗权势，为非作歹，把洛阳城闹得乌烟瘴气。曹操决心整顿好京都的秩序。他一到任，就颁布了一道“夜禁令”，禁止深夜酗〔xù〕酒游逛。每天夜里，派出士兵在城北一带巡查，专门检查“夜禁令”执行的情况。他还叫工匠赶造了二十多根用五种颜色油漆的大棒，分别悬挂在衙门两旁，准备严厉惩罚那些违法乱纪的恶人。

一天夜里，曹操亲自带着一队士兵出去巡逻。夜已经深了，四下里静悄悄的。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狗叫声。曹操马上警觉起来，命令士兵注意四周的动向。不一会儿，在街头转角处闪出了五六个人影。只见他们走到一间民房门前，停了下来。有一个随从模样的人说：“蹇大人!就是这家，已经到了。”

这个被称为“蹇大人”的，是皇帝亲信宦官蹇硕的叔叔，一般人就叫他蹇叔。这家伙倚仗侄儿在朝廷的权势，霸占土地，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是洛阳城北一个出名的地头蛇。他白天干尽了坏事不算，晚上还经常带着一批爪牙闯入民宅，抢占民女。这天晚上，他们一伙又想闯人一家民房去捣乱，不料这一次正好撞到了曹操手里。蹇叔一伙正在叫喊敲门，曹操大喊一声：“来人!抓住这批歹徒!”巡逻队应声一拥而上，把蹇叔等人全都捆绑了起来。这时候，蹇叔还强作镇静，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嘴里骂道：“你们是些什么人，胆敢捉拿起老爷来!”巡逻队的士兵不由分说，把蹇叔等人押回衙门审问。

曹操坐在衙门的厅堂正中，见蹇叔还那么嚣张，就更加愤怒，大喝一声：“你们倚仗权势，漠视禁令，本部尉决不宽容，定要切实依法严惩!”接着吩咐士兵：“拿五色大棒来!”在旁边站立的士兵听说要棒打蹇叔，心里高兴极了，他们立刻将蹇叔按倒在地，用五色大棒一顿好打。不一会，蹇叔的四肢就挺直了。曹操这才命令退堂。棒杀蹇叔的故事，说明曹操是一个不畏强暴的人。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曹操正担任典军校尉的职务。董卓想拉他入伙，让他任骁骑校尉。但是曹操看到董卓的暴行很不得人心，认定他必然会失败。所以不管董卓怎样拉拢，怎样封官许愿，曹操都不愿意跟董卓合伙，而是想方设法地逃出洛阳，回到了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曹操的父亲住在陈留，已经积累了一部分财产，可以供曹操用来招兵买马。陈留太守是曹操比较熟悉的朋友，他在政治上能够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把陈留作为自己的基地，开始起兵反对董卓。

曹操起兵的第一步是找志同道合的人作帮手。他找到了卫兹。卫兹是本地的孝廉，为人正直，家里有很多财产，对董卓操纵朝政也非常不满。一天，曹操摆好酒席，请卫兹来商谈。在喝酒的时候，曹操说：“如今汉朝衰落，董卓专权，欺君害民。我想改变这种局面，阁下能助我一臂之力吗?”卫兹赶紧回答说：“曹君说那里话。您有这样大志，我当然愿意把全部家产拿出来，做为招募义兵的费用，追随左右。愿曹君发扬当年棒杀蹇叔的勇气，兴兵除掉国贼董卓!”说到这里，卫兹兴奋得举起杯来说：“我预祝您成功。”曹操和卫兹两人越谈越投机，一直谈到深夜，卫兹才告别回家。

曹操在陈留得到卫兹的帮助，开始招兵买马。这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少对董卓不满的中小地主带着他们的子弟来投奔曹操。不久，曹操的同乡好友夏侯惇〔dūn〕、堂弟曹洪，听到曹操招兵，也带了一批人赶来参加。曹操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很快就聚集了五千多人马。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他带兵参加了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讨伐董卓。

这支新联合起来的关东军，将领们都抱着割据一方的野心，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谁也不敢和董卓交锋。独有曹操带着几千人，和董卓部将徐荣打了起来。曹操寡不敌众，被打败了。关东军也就开始散伙。曹操为了补充兵员，和夏侯惇到扬州等地去募兵。袁绍也先后夺取了冀州等地，称雄北方。各地豪强继续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农民被迫起义，如同烈火遇见干柴，又迅速地蔓延开来。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的黄巾起义军攻入兖州，杀了刺史刘岱〔dài〕。兖州的官吏请曹操担任兖州刺史。曹操集中兵力，打败了黄巾起义军，得到降兵三十多万。他从中挑选健壮青年，充实和扩大自己的队伍，组成了有名的“青州兵”。从此，曹操在兖州建立了更加强固的根据地。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进入兖州，只有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当中，曹操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不仅脱离了袁绍，形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而且逐渐地敢于和袁绍争锋了。许昌屯田当时在北方称霸割据的除了袁绍和曹操以外，还有袁术、吕古代风景画鉴赏布、公孙瓒、陶谦、马腾等人，在长江一带还有刘表、刘璋、孙策等人。曹操要想重新统一国家，就得战胜这些军阀才行。他于是雄心勃勃地开始了这个事业。他得到了兖州这个立足点，势力壮大以后，来投靠他的人就更多了。

那时候，曹操手下有两个谋士，一个叫毛蚧，一个叫荀彧〔yù〕。他们对曹操建议说：要消灭各地的豪强军阀，统一天下，就必须实行两项政策。第一，要利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这叫“挟天子，令诸侯”；第二要注意耕种，开垦荒地，积蓄军粮。雄心勃勃的曹操，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经过一番筹划，曹操派出使者，带着向汉献帝表示愿意效力的奏章，前往长安。哪里知道，在曹操还没有和汉献帝联系好的时候，盘踞在南阳的军阀袁术竟挥军北上，进攻曹操。曹操刚打败了袁术，吕布和徐州牧陶谦又先后来进攻。曹操经过了三四个年头的艰苦战斗，才先

后打败了他们，巩固了兖州，占领了许昌，扩大了地盘。

正当曹操和豪强军阀混战的时候，凉州军阀李傕、郭汜两人，为了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在长安附近火并了起来。汉献帝忍受不了痛苦，就向劫持他的李信苦苦哀求，希望让他回洛阳。李傕答应了这个要求。汉献帝就在舅舅董承的护送下离开长安。不久，李傕和郭汜都后悔了。他们感到汉献帝回洛阳对自己不利，两人就合兵一起，紧紧追赶。汉献帝在官员的保卫下，摆脱了追兵，经过长途跋涉，怀着惶恐的心情，到达洛阳。

曹操听说汉献帝到了洛阳，认为趁这个机会把他接到许昌，就可以实现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了。于是，曹操亲自带领了一队人马，向洛阳进发。队伍走到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没有粮食吃了。曹操派人把县令杨沛找来，说道："我们去洛阳接皇上，路过这里，带的粮食都吃光了，你能给我们接济一点军粮吗?"杨沛说："不瞒将军说，这几年常常打仗，许多土地都没有人耕种，成了荒地。今年又遇上旱灾，哪儿来的粮食?我们好久没有吃到粮食了，只是吃一些桑葚〔rèn〕干来充饥。"曹操惊奇地问："桑葚干能当饭吃吗?"杨沛答道："是的。这一带野桑树很多，老百姓把桑葚摘下来晾干，准备饥荒的时候当粮食吃。县里的田赋收不到粮食，就收了点桑葚干，贮藏在仓库里。将军如果要的话，我可以送一些来。"当天晚上，曹操的军队都吃到了杨沛送来的桑葚干。

曹操在八月里到达洛阳，派人四处寻找汉献帝。这时候洛阳已经被黄卓洗劫一空，到处是断墙残壁，长满了蒿草，一片荒凉。他们在一个窝棚里找到了献帝。原来献帝到达洛阳后，因为没有了宫殿，底下人只好在宦官赵忠的旧房址上，因陋就简地搭起了一个小窝棚，名为"扬安殿"，献帝就住在里面。曹操到了那里，只能站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朝见皇上。

汉献帝在绝望中见到了曹操，很是高兴，马上封曹操为司隶校尉，叫他掌管军政大权。曹操乘机劝说汉献帝离开洛阳，迁都许昌，改年号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表示从此以后要建立起一个安定的汉朝来。

在这年九月的一天，汉献帝带着一批皇亲国戚，世族老臣，跟着曹操到了许昌。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开始“挟天予以令诸侯”，用皇帝的名义向各地豪强军阀发号施令，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接着，曹操开始着手解决粮食问题。东阿县令枣祗（zhī）建议曹操实行屯田。曹操认为屯田是个好办法。他对大家说：“自古以来，安定国家的办法，就是要有强大的军队，充足的粮食。秦国任用商鞅，提倡耕战，富国强兵，使秦国统一了天下；汉武帝实行屯田守边，加强了国防力量，平定了西域各地。这些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经验。”大家都同意曹操的看法。这年十月，曹操颁布了“屯田令”，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同时，命令各地军队也要大量开垦荒地，实行军屯。

曹操严令士兵保护庄稼，不准践踏禾苗，要是有人违犯，就要依据军法判罪。有一次，曹操带兵出征，队伍正迅速向前行进，突然扑刺刺一声，麦田里飞出来一只斑鸠，从曹操骑的马头上掠过。战马受惊，嘶叫着窜进了麦田。等曹操用力勒住缰绳停了下来，可是已经踩坏了一大片麦子。曹操赶紧下马，对管理法令文书的主簿说：“我的马踩坏了麦子，违犯禁令，请按军法议罪。”主簿说：“将军是一军的主帅，怎么能够议罪?”曹操接着说：“我制定的法令，我自己违犯，怎么能够服众?”主簿又说：“法令是对一般将士的。按照古书《春秋》定的规矩，对尊贵的人是不能施加刑罚的。将军是一军的主帅，何况战马受惊，闯入麦田，县出于意外，不县存心违法，我看就不必议罪了。”曹操听后，沉思了一会，说道：“既然主簿不敢议罪，我就自己来执行法令吧!”说罢，脱下帽子。用剑把自己的头发割下一绺〔liǔ〕来，掷在地上说道：“姑且用割发来代替砍头。”古代的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随便毁损的，所以割头发也是一种刑罚。曹操割发代首的事情，马上在全军将士中传开了。全军上下无不悚然，个个遵守军令，不敢违犯。

由于曹操重视农业，推行屯田政策，奖励耕作，保护庄稼，使破坏了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农业的发展，解决了军粮问题，为曹操打败群雄，统一北方，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论英雄在曹操积极发展农业，访求人才，壮大势力的时候，刘备的势力也开始在“群雄”中显露头角。

刘备是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字玄德，据说是西汉皇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辈份排起来，他比汉献帝还大一辈，所以号称皇叔。不过中山靖王这一支传到刘备这一代的时候，家境已经很贫穷，他只得依靠母亲贩鞋织席过活。

东汉灵帝末年，社会发生动乱，刘备得到中山（今河北省定县）富商张世平、苏双的帮助，招募义兵，组织地主自卫武装。关羽、张飞前来应募。这样，刘备又结识了关张二人。

张飞字翼德，是刘备的同乡。他性情暴躁，为人直率、爽朗，见义勇为。只要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事情，他就要说，就要做。有人曾写诗赞扬他说："安得快人如翼德，尽诛世上负心人!"

关羽字云长，是河东解良（今山西省解虞县）人。据说他本来并不姓关，因为年轻时候见义勇为，常常招惹是非，父母怕他在外面闯祸，就把他关在后园空房里面。有一天，关羽实在闷得慌，偷偷地打开窗户逃走，刚好从旁传来了一阵啼哭声。关羽循声走去，一打听，才知道县令的小舅子仗势强娶民女，民女的老人在啼哭。关羽听了，火从心头起，提着宝剑，去县衙门杀了县官和他的小舅子，然后逃到潼关。在那里，他听说城门口挂着自己的图形悬赏捉拿。凡是进出关卡的人，都要挨个察看。关羽整了整衣服，大胆地走到关前。守关士兵盘问，关羽随手指着潼关回答："我姓关，……"从此以后，他就以假为真，改姓关了。

关羽过了潼关，东行到涿郡，结识了张飞。恰巧刘备招募义兵。关羽和张飞同去应募。刘备看他们二人武艺高强，才智出众，就和他们结成生死之交。

古代风景画鉴赏刘备以汉朝皇族相标榜，又靠着富商的资助组织了武装。黄巾起义一开始，他就和关羽张飞带着新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参加镇压起义军的军事活动。不久以后，东汉政府因刘备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就派他做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县）县尉。

不久，刘备因受不了上级政府机关的敲榨勒索，被迫弃官，带着关羽张飞去投靠豪强军阀。他先后投靠过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徐州刺史

陶谦。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冬天，陶谦病死了，刘备继承陶谦做了徐州牧。刘备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把他列为“群雄”之一。不过，那时候刘备的力量还不算大，士兵不过一万，将领也只有关羽、张飞和赵云等人，当然不能同袁绍、曹操等人相比，也对付不了袁术、吕布等人的夹击。后来，刘备被吕布打败，逃出徐州，去投靠势力强大的曹操。

刘备虽然住在曹操那里，但是总想着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对曹操只是表面敷衍。曹操也看透了刘备的心思，暗中派人监视刘备的行动。刘备装出庸庸碌碌的样子，不关心天下大事，整天只知道浇水种菜，用这种假象来蒙骗曹操。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叫武将许褚〔zhǔ〕来请刘备。刘备心里一怔，害怕遭曹操的暗算。许褚在旁一再催促，刘备只得放下水桶，硬着头皮去了。曹操已经摆上了酒，他请刘备一边欣赏树梢上已经熟了的青梅，一边开怀畅饮，谈论天下大事。

过了一会，突然阴云密布，快要下大雨了。曹操指着天上的云彩问：“您知道龙的变化吗?”刘备回答：“我不大清楚。”曹操说：“龙能大能小，变化不定。龙乘时而变化，就好像人得了志，纵横天下。龙就好比是世上的英雄。”说到这里，曹操看了看刘备，又说：“您长久在外，见多识广，一定知道当今世上的英雄。请您说一说。”刘备说：“我可不知道。”曹操接着说：“您不要谦虚!”刘备只得应付说：“淮南的袁术，兵精粮足，可算是英雄。”曹操笑道：“那是坟墓中的枯骨，早晚就要被我收拾了。”刘备又说：“河北袁绍，占据着冀州，部下能干的人很多，可以说是英雄。”曹操大笑着说：“袁绍表面上厉害，实际上没有胆量，做事优柔寡断。到了要干大事的时候，他又怕死。看到一点小利，他就拼命。这种人，不能算做英雄。”刘备只得说：“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接着说：“英雄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的智慧，有吞吐天地的志向。”刘备见曹操这样说，就反问道：“谁能当得起?”曹操指了指刘备，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当今天下的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感到这是曹操在试探自己不觉心里一惊，手一松，筷子掉在地上。这时候正好天空中一阵雷鸣，下起了大雨。刘备抬头望了望天，说了声“好响的雷啊!把我吓了一大跳！”就把自己的惊慌掩饰过去。然后他从容地拾起筷子，又和曹操敷衍了一会儿，才辞别曹操，回到自己的住处。

刘备见曹操对自己有戒心，就想找个脱身的机会，离开曹操，另找出路。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一天，传来了公孙瓒已经被袁绍消灭，袁术又要和袁绍联兵的消息。刘备乘机对曹操说：“袁术要投靠袁绍，必然经过徐州。请求将军给我一些军队，在半路上打他个伏击。”当时，曹操也害怕袁术和袁绍联兵，见刘备愿意云攻打袁术，就同意刘备的请求，让他带兵去徐州。刘备一到徐州，正好和袁术相遇。两军一交战，袁术大败，退回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不久吐血死了。刘备乘胜进入徐州，杀了徐州刺史车胄〔zhòu〕。车胄是曹操的好朋友。刘备杀车胄又占领徐州，曹操哪能容忍?马上出兵讨伐。刘备无力抵抗，只得去投靠袁绍。

这时候，盘踞在北方广大地区的袁绍，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很雄厚，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可是曹操占据着中原部分地区，“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力发展也很快。两强对峙，必然要发生尖锐的冲突。袁曹官渡之战曹操用汉献帝的名义，封当时占有江东的（今长江下游江苏一带）孙策为吴侯，稳住了江东。不久，他和袁绍互相火并起来，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爆发了。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任命沮授（沮jū）为监军，统领十万大军，从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出发，进攻许昌。袁绍进军到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派郭图、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他企图引诱曹操离开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一举消灭曹军。监军沮授认为颜良虽然勇猛，但骄傲自大，缺少智谋，恐怕担当不了这样重要的任务。袁绍一向固执己见，根本不听沮授的意见，坚持不改变原来的决定。

在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听说袁军来进攻，急忙派人向曹操报告。曹操得到报告以后，赶快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他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不和袁绍硬打硬拼，而是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打法。他指挥军队，装出要从延津方向渡过黄河去攻打袁绍后方的样子，其实是要引诱袁绍的主力离开黎阳，并且麻痹进攻白马的颜良。果然不出曹操的意料，袁绍得到曹操向延津进军的消息，就限令黎阳的军队赶在曹军渡河之前到达延津渡口，做好和曹军决战的准备。曹操见袁绍中计，就悄悄率领轻骑，急奔白马。进攻白马的颜良、郭图，倚仗兵马众多，又有在

黎阳的主力军做后盾，正洋洋得意地开怀畅饮。曹操的人马突然出现，使得颜良手忙脚乱，仓促应战。曹军左右夹攻，颜良抵挡古代风景画鉴赏不住，在阵前被曹军杀死。郭图一看形势不好，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袁绍听说大将颜良被杀，进攻白马的袁军全被消灭，气得直跺脚。为了给颜良报仇，他派大将文丑带领五六千骑兵渡河追击曹操。

曹操已经从白马撤军，沿着黄河西进。曹军走到延津南面一个山坡下的时候，得到了袁绍派兵追来的消息。曹操见这里地势险要，两面高山对峙，峡谷中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山坡上树木郁郁葱葱，百草茂盛，就心生一计。他传下命令："以后军为前军，前军为后军，丢下一些车辆物资，绕道西进，叫徐晃挑选精锐骑兵六百多名，在树林中埋伏起来。过了一会，文丑的大队人马到来。他们看见道上的车辆物资，以为曹军为了逃命才丢下的，便争先恐后地跳下马，一窝蜂似地拥上去抢东西。这时候曹操一声令下，埋伏着的骑兵突然冲将出来，看见袁军就杀。文丑遭到这突然袭击，仓促应战，结果被徐晃一刀砍死了。他手下的士兵逃的逃，降的降，全都溃散了。打了胜仗的曹军将士，斗志昂扬地带着战利品回到官渡。

袁军接连打了两次败仗，士气低落。但是袁绍仍然自恃兵多，定要渡河跟曹操的主力决战。沮授劝告他说："目前我军新败，不能决战。曹操虽胜，但是兵少粮缺，只要我们和他长期对峙，就能战胜他。"袁绍冷冷地说："兵贵神速，难道你不懂吗?"他不听沮授的劝阻，率领大军渡过黄河，进驻阳武，又涉过蒗荡渠〔蒗làng〕，直逼官渡。

古代打渔者官渡离许昌不到二百里，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如果官渡失守，许昌就失去了屏障。因此，曹操竭尽全力固守官渡阵地，使袁绍一时不能得手，战局进入了相持状态。

日子一久，袁绍感到粮食困难，希望早点打破这旷日持久的局面。一天，袁绍巡视阵地，爬上一个土堆，望见了曹营将士活动的情况。袁绍从这里受到启发，命令士兵沿曹营阵地堆起土山，筑起了望楼，让弓箭手居高临下，寻找机会向曹营射箭。曹军遭到这突然袭击，死伤不

少。曹操吃了亏，就聚众商议对策。有人建议制造发石车对付袁军。这种发石车能把十斤重的大石块发射到三百步以外的地方。曹操命令工匠赶快连夜按图制造。发石车造好以后。曹操命令各处的发石车同时对准袁绍的了望楼发射。顷刻之间，声如雷鸣，乱石飞空，打得袁军头破血流，鬼哭狼嚎。

曹操虽然多次打败了袁绍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但是由于双方相持的时间长，粮草供应也越来越困难，显得有点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突然卫兵跑来报告说：从袁军那边跑过来一个名叫许攸的官员，说是有急事求见。许攸原先就认识曹操，曹操赶快把他迎了进来。许攸诉说了前来投奔曹操的原因，并且建议曹操派兵去袭击袁绍的乌巢粮仓。他说："袁绍派在乌巢看守粮仓的淳于琼，为人骄傲自大，喜欢喝酒，警惕性很差。如果派奇兵去袭击，烧掉那里的全部粮食，不出三天，袁军就会不战自溃。"第二天，曹操和谋士们商量，拟定了夜袭乌巢的作战方案。

十月的一天夜里，万籁寂静，星光满天。曹操和张辽、乐进等几员将领，带着五千精兵，打着袁军的旗号，悄悄地离开官渡，向乌巢进发。守卫在乌巢外围的袁军哨兵，看见一队人马迎面走来，连忙截住查问。张辽骗他们说："我们是蒋奇的人马，是袁将军派到乌巢来护粮的。"他没等哨兵进一步追问，又走近一步，故意压低了声音，装出十分神秘的样子说："听说曹操要偷袭乌巢，袁将军派我们赶来增援。"哨兵一看旗帜上写着斗大的"袁"字，就不再怀疑，让他们通过了。曹军摸进乌巢，按预定计划分头占领要道，放火焚烧粮囤。刹时间，粮囤到处起火，浓烟滚滚，直冲云霄。袁军士兵吓得连声叫苦，赶快去报告淳于琼。喝得醉醺醺的淳于琼听说粮囤起火，曹操的人马打进来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集合士兵准备厮杀。曹操的大将乐进已经冲了进来，一刀就把他给收拾了。剩下的士兵逃的逃，降的降，没有多久就结束了战斗。

在官渡前线的袁绍得知乌巢被袭，粮食被烧光，吓得目瞪口呆。他的儿子袁谭催促说："情况危急了，怎么办?快想想办法吧!"袁绍略为思考了一下，故作镇静地说："曹操偷袭乌巢，我将计就计，袭击他的大本营，切断他的归路，叫他死无葬身之地!"袁绍不管有人反对，命令部将

张郃〔hé〕、高览去进攻官渡的曹营。张郃、高览只好勉强带领军队出发。袁军到达官渡，前面遇到了曹洪的坚强抵抗；背后受到了从乌巢回军官渡的曹操的猛烈袭击。张郃腹背受敌，抵挡不住。他恨袁绍的虚伪奸诈，听信谗言，认定袁绍成不了大事，就和高览一同投降了曹操。袁绍连吃败仗，粮草被烧，谋士离叛，将领投降，他见大势已去，慌忙向北逃窜。逃过黄河的时候，袁绍身边只剩下八百名残兵败将了。

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官渡大战结束了。曹操乘胜追击，继续向袁绍占领的地区进军，很快统一了北方。孙氏称霸江东曹操和袁绍在北方争雄的时候，孙氏父子逐渐占据长江下游的地盘，建立政权，势力也在一天天地扩大。孙氏政权是由孙策打下基础，在孙权手里巩固的。

孙策、孙权的父亲孙坚，原是袁术的部下。一次，孙坚替袁术去攻打荆州，被荆州刺史刘表的部将黄祖射死在岘山（今湖北省襄阳市城外）。当时，孙策还只有十七岁，他只得仍旧去投靠父亲的老上司袁术。袁术见孙策少年英俊，心里很是欢喜。他常常对人说："假使我的儿子能像孙郎这样，我死了也就没有什么遗恨了!"

孙策投靠袁术以后不久，扬州刺史刘繇〔yáo〕以优势兵力来侵占孙策舅舅吴景掌管的丹阳，孙策要求袁术借兵给他去讨伐刘繇，帮助舅舅摆脱困难的处境。袁术觉得刘繇的行动也损害了自己在江东的利益，正好利用孙策去打击刘繇，于是就借了一千人马给孙策。

孙策进军江东，沿途不断招兵买马。半路上，他得到好朋友周瑜的援助，补充了粮食和其他物资，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在牛渚（今安徽省当涂县，渚zhǔ）打败刘繇的部将张英，在秣陵打败笮融〔笮zé〕，最后终于赶走刘繇，解救了舅舅吴景的危难，并且乘机控制了江东的一大块地盘。为了得到江东人民的支持，他不许士兵抢劫百姓的财物，不许虐待俘虏。十来天工夫，有两万多人来投奔孙策。他乘胜攻下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占领会稽和其他四个郡，自任会稽太守。从此，他跟袁术断绝关系，开始在江东称霸。

孙策不满足于占有江东六郡，想要渡江与曹操争夺地盘。吴郡太守许贡看出了孙策的心思，暗中派人去给曹操通风报信。送信人在渡江的

时候被孙策的士兵查了出来。孙策得到报告以后，就想法把许贡骗来，拉出去杀了。许贡的家属和奴仆，慌忙逃亡在外，并且决心报仇雪恨。

一天，孙策带了一些士兵在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郊外打猎。他见一只鹿在前面跑过，赶快纵马追逐。追到树林深处，见有三个人持枪带弓等在那里。孙策正要盘问他们，其中一人已经举枪刺来。孙策赶快挥剑抵挡，砍倒了他，可是另一个人趁孙策不备，一箭射中了孙策脸颊。那人大声喊道：“我们是为主人许贡报仇的!”等孙策的士兵赶到，杀死刺客，孙策已经血流满面，受了重伤。士兵们急忙抢救，把他送回会稽养伤。

因为刺客的箭头上涂了毒药，所以孙策的伤势越来越重。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就把弟弟孙权、长史张昭叫来，吩咐后事。孙策对弟弟说：“我死了以后，江东的局面就由你来支撑了。你应该常常想到父兄创业的艰难，要多依靠张昭、周瑜，要任用有才能的人，不要在强暴面前屈服，要坚决保住江东。”说完，孙策用手示意，把印绶挂在孙权的脖子上。孙权强忍着悲痛，劝慰哥哥。孙策转过来紧紧握住张昭的手，说：“现在天下大乱。我们江东人才众多，又有长江天险，抵抗强暴，进而争霸天下，这是大有可为的。希望你尽力辅佐我弟弟!”说完，就昏迷过去，咽了气，死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六岁。

孙策死后，年仅十九岁的孙权，在张昭的协助下，开始掌管起军政大权来。过了几天，周瑜从巴丘赶回吴郡，也来辅佐孙权。周瑜当时担任中护军、江夏太守，兵权在握，是个实力派。孙权见周瑜来了，高兴地说：“您一来我就放心了。我哥哥临终的时候嘱咐我要好好请教您和张昭，希望你们尽力帮助我。”周瑜同答说：“张昭是个有见识的人，担当得起这个重任，我的能力很差，恐怕辜负你哥哥的托付。我愿意推荐一个人来帮助您。”孙权问：“您推荐谁?”周瑜说：“有一个临淮东城人，姓鲁名肃，很有军事才能。这人现在曲阿，您可以马上去把他请来。”孙权听了非常高兴，就让周瑜把鲁肃请来，在自己身边增添了一个出谋划策的帮手。

当时江东初定，政局不稳，人心浮动。这对孙权确实是个严重的考验。江东有许多人对孙权持观望态度，有人怀疑他的统治能否长久，有

人甚至公开反叛。庐江太守李术就是公开反叛的一个。在这紧要关头，孙权迅速调动军队，一举消灭李术，把李术部下三万多人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大家见孙权这样有气魄，有胆略，又很果断，打心眼里佩服他，愿意服从他的指挥，江东的局势稳定下来了。

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派遣使者到江东，要孙权送一个儿子到许昌去做人质，以表示两家和好。孙权召集文武官员商议这件事情。长史张昭是个文官，害怕打仗，他说："如果我们不送人去，恐怕曹操就要借口兴兵来打江东。一旦大兵压境，局势就危险啦。"周瑜反对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意见，他说："如果按照长史的主张，送去人质，那么我们就成了曹操的附庸，就要受他的控制，听他的指挥了。我们称霸江东的大业也就要断送了。现在我们占有江东六郡，物产丰富，兵精粮多，人心不乱，将士用命。有什么理由要给曹操送人质去呢?"孙权同意周瑜的看法，认为不应当在曹操的威胁之下屈服。他坚决拒绝了曹操的要求。在文臣武将齐心协力的辅佐下，孙权用心管理政事，努力增强军事实力。从此，由孙策开创的称霸江东的事业，到孙权手里逐步地得到了巩固。刘备三请诸葛亮官渡之战袁绍失败以后，原来投靠袁绍的刘备，只得带着张飞，以及从曹操那里逃回来的关羽，去投靠荆州牧刘表。刘表对刘备很客气，拨给他一些兵马，可对他有些不放心，叫他屯驻在偏僻的小小的新野县城。

古代画扇刘备从起事以来有二十多年了，虽然他一直寄人篱下。可是名声很大，只是身边缺少能出谋划策指挥千军万马的干才。他屯驻在新野以后，有不少的人从各地来投奔他，他自己也四处访求人才。有个叫徐庶的谋士，赶到新野来对刘备说："有个叫诸葛亮的，人称'卧龙'，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将军愿意见他吗?"刘备一听十分高兴，连忙对徐庶说："请您把他带来见我吧!"徐庶摇摇手说："诸葛亮是个难得的人才。像他这样的人，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叫他来，您应当恭恭敬敬地亲自去请他来。"刘备认为徐庶说得很对，决定亲自去拜会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是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水县南）人。他从小死了父母，跟随叔父在荆州避难。在他十七岁那年，叔父死了，他就在隆中（今湖北省襄阳县西北）的卧龙岗盖了儿间茅屋，定居下来。他除了种地以外，经常和一些朋友攻读史书，切磋学问，谈论天下大事。诸葛

亮胸怀大志，常常把自己比做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和乐毅。管仲曾经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乐毅曾经替燕昭王打败了强大的齐国。熟悉诸葛亮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像卧在地上、准备腾空而起的龙，又因为他住在卧龙岗，所以人们就尊称他为“卧龙先生”。

刘备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来到隆中。这里山峦起伏，树木葱茏，风景秀丽。其中有一座山蜿蜒曲折，真像是一条静卧的苍龙。刘备等三人继续前行，来到一座山岗脚下，只见几间茅屋，掩映在一片苍松翠竹之中。刘备对关羽、张飞说：“这里大概就是卧龙岗了。”说着，三人在茅屋前下了马。刘备亲自上去敲门。一个小童开门出来问道：“你们找谁?”刘备客客气气地说：“请告诉卧龙先生，刘备前来拜见!”小童迟疑了一会儿，说：“先生不在家，早上就出门去了。”刘备问：“先生到哪里去了?”小童说：“不知道上哪儿。可能找朋友一块儿读书去了。”张飞见刘备还要再问，不耐烦地说：“既然他不在家，我们就回去吧!”关羽也在一旁说：“我们先回去，以后派人打听好了再来。”刘备只得对小童说：“等先生回来，请你告诉他说，我刘备来拜访了。”说完，失望地离开了卧龙岗。

过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已经回到家里，又带着关羽、张飞去请他。那天天气很冷，走到半路上，天下起大雪来了。张飞有些不耐烦，想要折回新野。刘备却认为冒着风雪去请，正好能表明自己的诚意，坚持要去。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卧龙岗，一打听，才知道孔明已经在头一天和朋友出去了，又扑了一个空。

过了些时候，刘备选定了一个好日子，准备第三次去请诸葛亮。这次连关羽也有些不高兴去了。刘备说：“你们知道周文王访贤遇姜尚的故事吗?文王那样敬重姜尚，姜尚一心辅佐文王和武王，君臣齐心，上下合力，终于完成了灭殷的大业。咱们应该效法古人呢。”说完，带着关羽、张飞出发了。

刘备等三人来到卧龙岗，从小童那里打听到诸葛亮还在草堂上睡觉，不敢随便去惊动。刘备叫关羽、张飞在门外等候，自己恭恭敬敬地站在草堂的台阶下等着。过了好一会，诸葛亮才翻身醒来。小童赶快禀报说：“刘备已经来了一会儿了。”诸葛亮这才把刘备和关羽、张飞迎接

到屋里，开始谈论起天下大事来。

刘备说："现在汉室衰颓，奸臣当道，我不自量力，想要出来安定天下。但是，我的智谋短浅，能力薄弱，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成就。请先生指教，我应当怎么办才能够得到成功呢?"诸葛亮见刘备谦虚诚恳，就对当时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给刘备提出了一整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他说："自从董卓进入洛阳以来，天下群雄并起，势力跨州连郡的多得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比，名望低，兵力少，但结果竟然打败了袁绍，这是由于曹操有智谋。如今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目前当然不能够和他争锋。至于孙权，他据有长江天险，老百姓归附他，有才能的人肯为他效力，因此对他只能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荆州地势险要，北有汉水、沔水〔沔miǎn〕，南通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个用兵的地方。可是荆州的主将刘表守不住这个地方，这似乎是老天要将这个地方送给将军，将军应当取而代之。益州是个易守难攻的天然要塞，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称号。汉高祖刘邦就是以益州为根据地，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将军如能先占据荆州，站稳脚跟，再取益州，励精图治，充实国力，联合孙权，结好西南各民族，然后等待时机，再向中原发展。那么，统一天下的大业就能够获得成功。"刘备连连点头称是。他对诸葛亮说："先生这一番话，说得十分透彻。我希望先生能够出来，帮我进一步策划完成统一天下的事业!"诸葛亮见刘备非常诚恳，激动地说："既然将军这样看得起我，我只好竭尽微薄的力量来为将军效劳了。"刘备见诸葛亮已经答应请求，非常高兴，他请诸葛亮尽快出山，共图大业。第二天，诸葛亮告别了亲友，跟着刘备一起到了新野。

诸葛亮当时只有二十七岁。从此以后，他就用全部的智慧和才能辅佐刘备打天下。刘备的势力越来越大。文姬归汉曹操在统一了北方以后，不仅注意发展生产，还努力提倡文化。他打听到自己的好朋友蔡邕〔yōng〕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匈古代风景画鉴赏奴，就派遣使者，携带厚重的礼物，到匈奴把蔡文姬赎回来，让她为发展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蔡文姬，名琰〔yǎn〕，陈留圉〔yǔ，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她的父亲蔡邕，是东汉末年的大文学家。蔡文姬从小受到父亲的培养，博学多才，记忆力很强，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yì〕。据说蔡文姬小时候，

有一天夜里，她睡在床上听父亲弹琴，忽然琴弦断了一根。她对父亲说："第二根琴弦断了。"蔡邕认为这是她偶然猜中的。为了证实女儿是不是真能辨别音调，他又故意弄断了一根琴弦。蔡文姬马上又说："这次断的是第四根弦。"果然一点不差。蔡邕这才知道女儿真的能够辨别琴音，高兴极了，就更用心地教她学习音乐，教她做诗写文章。这是个传说故事。事实上，蔡文姬一生的遭遇，是十分悲惨的。

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蔡邕被人诬陷获罪，全家充军到了朔方。这时候，蔡文姬还是个襁褓〔qiǎng bǎo，背婴儿的布幅〕中的婴儿，她也成了罪奴，被剪去头发，跟着父亲去充军。过了几个月，蔡邕遇赦回家。在归途中，他得罪了一个地方官，全家又被迫过了十二年的流亡生活，后来才回到洛阳。文姬十六岁那年，父亲把她嫁给了河东卫仲道。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蔡邕在长安被王允逮捕入狱，囚死在狱中。接着，文姬的母亲和丈夫也相继死亡。蔡文姬只好只身回到陈留，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也就是汉献帝从长安逃到洛阳的那一年，汉献帝派人去南匈奴，邀请匈奴出兵，来对付凉州军阀李傕的追击。匈奴兵在打败李傕以后，乘机大肆掳掠。蔡文姬给匈奴兵掳走，被迫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她留居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孩子。

就在蔡文姬流落匈奴期间，中原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生产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较安定了。在这个基础上，曹操努力提倡文化。他搜罗各方面的人才，也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蔡邕的女儿文姬，决定派人带着礼物出使匈奴，把蔡文姬赎回来，好让她为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派去的使者到了匈奴。使者拜见了左贤王和蔡文姬，陈述了曹操想要迎接蔡文姬回汉朝的要求，并且向左贤王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蔡文姬听了，又是高兴，又是悲伤。高兴的是她很快就能回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故乡了；悲伤的是将要离别丈夫和在匈奴出生的儿女了。此情此景，怎能不叫她内心矛盾重重呢!她不知道应当怎样办才好。蔡文姬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被曹操的事业和功绩所感动，决心离别自己的亲骨肉，离开匈奴，献身于汉朝的文化事业。

蔡文姬回到汉朝，遵照曹操的意愿，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积极参加了撰写《续汉书》的工作。有一次，曹操召见蔡文姬，问她："听说你家里原有很多古书，现在还能记得内容吗?"蔡文姬答道："从前亡父赐给我古书四千多卷，因为流离散失，一无所存，如今还记得内容的只有四百多篇。"曹操说："很好!我派十个人，帮助你默写下来。"蔡文姬说："不必了。我自己默写好了，再给您送去。"果然，蔡文姬凭着自己的记忆，默写出了四百多篇古代珍贵的文献，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古代山水画鉴赏文姬归汉反映了曹操重视人才、重视文学的事实。其实曹操本人就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很诙谐、很潇洒、不拘形迹的人物。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很有气魄，唱出了他统一天下的理想，昂扬进取的精神，慷慨不平的感情，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丕，也爱好文学。他和文士相处，不拘礼法。常常在一块儿喝酒，谈论诗文。曹丕写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植，十多岁就能诵读辞赋数十万言，是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据说，曹丕很嫉妒他的弟弟。有一次，他要曹植在走完七步路的时候，就吟出一首诗来。这首诗的题目是《兄弟》，但是诗中不准出现兄弟的字眼。不然的话，就要受到惩罚。曹植略加思索，走了七步路以后立刻吟道：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第三十章

曹植还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政治抱负，反映战乱和人民疾苦的诗篇。

曹家父子是当时文坛上的领袖，曹操的邺都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中心。因为他们活动在汉献帝建安时代，后来就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作家数以百计，其中最负盛名的除曹氏父子外，还有孔融、王粲、刘桢、阮瑀〔yǔ〕、徐干、陈琳、应玚〔yáng〕，称为建安七子。建安文学在诗赋文章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兴盛繁荣的新局面。文姬归汉这个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曹操掌权时代文治武功的盛况。名医华佗东汉后期，我国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名医，像华佗，张仲景等人。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年轻时候在徐州读过书。由于他刻苦学习，学问非常渊博，特别精通医学。地方官和朝廷上的大官听说华佗学问很好，医道高明，都想请他去做官。华佗乐意行医，为乡亲们解除病痛，厌恶官场上的那一套，对于他们的邀请，都婉言谢绝了。

华佗华佗经常在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行医，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真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因此到处流传着华佗治病的动人故事。

广陵（今江苏省淮阴县）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闷，经常肚子痛，面色发赤，不想吃东西。华佗给他诊断以后，说："因为你吃了未经煮熟的鱼肉荤腥等东西，肚子里有许多虫子。"说完，就给他配了一副打虫药。陈登吃了药，果然吐出许多虫子来，病就好了。

又有一次，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很厉害，派人请华佗给她看病。华佗摸了摸她的脉，说道："这是因为怀孕期间跌伤了身子，胎儿没有下来的缘故。"在一旁的李将军惊异地说："她确实摔了一跤，伤了身子，但是，已经流产过了，胎儿早已堕落。"华佗接着说："依我切脉来看，还有胎儿在腹中。"李将军不相信。过了些日子，病人的病势更重了，再来请华佗治疗。华佗切脉以后，对他们说："脉搏和上次看的差不多，可能

是双胎。在第一个胎儿流产的时候，流血过多，因而使得第二个胎儿下不来。现在只好用针灸和汤药把死胎催下来。”华佗给李将军的妻子扎了针，又吃了汤药，病人的肚子痛得像要临产，可就是不见胎儿下来。华佗判断这是死胎在腹中时间太久，下不来，应当由人工取出。他叫李将军找个产婆来按摩探取，果然取出来一个死胎。

有一次，华佗碰到两个都是患头痛的病人，症状完全一样。华佗切脉以后，判断叫倪寻的应当服泻药，叫李延的应当服发汗药。两个病人服了华佗给的药，病都好了。有人问华佗为什么对同样的病却要用不同的药来治疗。华佗解释说；“倪寻的病根在内部，所以要用泻药；李延的病是受外感，所以要用发汗药。”

还有一次，盐渎（今江苏省盐城县）有几个人，为了等候华佗治病，在一家酒店里饮酒。华佗来了，向大家打招呼，看了看每个人的脸色，然后对一个名叫严昕的人说：“从你脸上可以看出你有急病，最好不要多饮酒，快点回家去。”严昕听了半信半疑。不大在意。过了一会，严昕坐着马车回家，刚走了几里路，果然头发晕，从车上跌了下来。别人把他扶起送到家里，不久就死了。

华佗不光精于内科、针灸，他尤其精通外科。在外科手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个病人感到肚子阵阵剧痛，过了十多天，鬓发和眉毛都脱落了。家里的人把他送到华佗那里去诊治。华佗按了按病人的脉搏，解开他的衣服，用手揿了揿他的肚皮，再仔细看看病人的神色。经过反复的观察和诊断，华佗认为病人是脾脏腐烂了，要进行切除手术。他拿出一包叫做“麻沸散”的药来，让病人和在酒里喝了下去。不一会，病人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华佗拿出手术刀，把病人肚子切开。果然看到脾脏已经烂掉了一半。华佗迅速地把腐烂的部分切除，用消过毒的丝线扎好留下的脾脏，再缝好腹部的刀口，涂上特制的消炎药膏，又给他开了一些口服的药。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病就完全好了。

华佗给病人吃的麻沸散，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麻药。病人服了麻沸散，全身失去知觉，减轻手术时候的痛苦。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阿拉伯等地。华佗的这一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比欧洲人发明麻药早了一千六百多年。

为了让人预防疾病，华佗很注意人们平时的体育锻炼。他认为一个人经常活动，才能血脉流通，帮助消化，防止疾病，就好象门轴，因为经常转动，才不会生蛀虫。华佗创造了一套健身术，像我们现在的体操一样，名叫“五禽戏”，就是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禽兽的动作，转动四肢、腰部，活动各个关节，增进身体健康。华佗的学生吴普，照着‘老师的话去做，活到九十多岁，还是耳聪目明，牙齿坚固。这五禽戏的创造，是华佗总结了前人健身经验的结果。秦汉以来，有一些想要成仙的人，模仿鸟兽的各种动作和练气功，称为“导引”，想用这种办法求得长生不老。华佗抛弃了其中修仙的幻想成分，吸取了锻炼身体的合理部分，再加以发展和提高，就成了有益于人们的健身操了。

曹操素来患偏头痛，他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派人来请华佗治病。华佗给曹操诊断以后，选择了针灸的穴位，给曹操扎了几针，头就不痛了。曹操很高兴，要把华佗留下来，好随时给他治病。华佗不求名利，当然不愿意只给曹操一个人服务。他借口接到家信，要回家一趟。华佗到家以后，推说妻子有病脱不开身，不肯回到曹操那里去。曹操多次写信催他回来，他根本不理睬。曹操命令郡县官吏去催，华佗也总是找借口不动身。因此，惹得曹操大发雷霆，派人去了解华佗的情况。还吩咐说：要是他的妻子真的有病，就送四十斛小豆给他，放宽期限；要是假的，便把他抓起来办罪。结果，华佗就被抓去了。

华佗被关进监狱，不久就被曹操判处死刑。华佗在临刑之前，拿出几本医书来送给管监牢的人，说：“这里面有可以救人治病的药方，你留下来吧!”但是管监牢的人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叹了一口气，就用火把书烧了。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华佗被无辜杀害了，这给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是曹操一生中办的一件很大的错事。医圣张仲景华佗精通医术，最擅长的是外科手术。跟华佗同时候的张仲景，以擅长内科出名，尤其对伤寒病最有研究。

古代田园风景画鉴赏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县东北）人。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很早就以知识渊博闻名乡里。当时的读书人都忙着追逐权势，不关心民间疾苦，他不满意；当时迷信盛行，人们有了病不去求医而盲目相信巫师，他也不满意。他很早就立志要学医，为人们解除病痛做出贡献。为此，他拜同郡

名医张伯祖为师，学到了老师的全部本领，在乡里间为人们治病。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被选拔出来做官，一直做到长沙太守。他为官清廉，很受老百姓的爱戴。

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由于战乱频繁，瘟疫大为流行，人们病死的很多。张仲景的家族，原有二百多口人，不到十年工夫，就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的人是患伤寒这种流行病死的。那时候所说的伤寒病，是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一类的急性传染病。在东汉末年，大多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还束手无策，没有对症治疗的办法，所以人们成百上千地被这种病夺去了生命。

张仲景为了解救人们的疾苦，也是受了自己家族中家破人亡的刺激，他下决心要探求出一套治疗伤寒病的办法来。他结合自己给人治病的经验，对伤寒病的各种症状都做了详细记录。还细心地询问病人及其家属，了解伤寒病发病的原因和服药以后的种种变化。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张仲景终于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伤寒病的病理、诊断、治疗、用药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伤寒病从初起到病危，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病人，应当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病人需要让他发汗，有的病人则不能发汗；有的病人应当让他下泻，有的病人则绝对不能下泻；有的病人可以用艾火灸，有的病人则千万灸不得。张仲景说："如果不应当发汗的病人服了发汗药，那就会使病人的津液枯竭，断送性命；应该发汗的病人不让他服药把汗发出来，那就会使病人的毛孔闭塞，窒闷而死，不应当泻下的病人服了泻下药，会使病人开肠洞泄不止而死；应当泻下的病人不服泻下药，就会使病人胀满烦乱，浮肿而死，不当灸的病人一灸，就会使病人火邪入腹，加重其烦恼而死；当灸的病人不灸，会使病人冷结重凝，无法消散而死。"总之，给人治病必须弄清楚病人起病的原因，病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曾经服过什么药，只有把这种种情况全都了解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为了要弄清楚病人的全部情况，张仲景反对当时医生治病时墨守成规而又十分草率的做法。有些医生只是简单地问问病人哪儿不舒服，切脉的时候三个指头没有由轻到重地切，仔细辨别病人的脉象跟正常人有何不同，就匆匆忙忙地铺开纸开药方了。张仲景说，这些医生对病人如此不负责任，又怎么能治得好病呢。张仲景给人看病，很好地运用了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观察病人的气色，闻是听病人说话和呼吸的声音，向是询问病人的自我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切是由轻到重地按病人两手的脉搏，必要的时候还得按脚上的脉搏。张仲景认为只有很好地运用四诊法，并且把通过四诊得到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可靠结论，从而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治疗方案，开出对症下药的方剂。只抓住某一个诊法得到的片面印象，就匆匆忙忙地制订治疗方案，肯定不会正确，开出来的方剂也决不会是对症的，病人服了这样的药，一定不会减轻痛苦。

张仲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仔细研究，已经能够根据四诊分辨病人的症状是阴症，还是阳症；病在浅表，还是已经深入脏腑；是虚症，还是实症；是寒症，还是热症。这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被称为中医诊断学的八纲。四诊八纲辩证施治的理论原则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张仲景对这个理论原则的奠定，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除了伤寒病以外，张仲景对其他疑难杂病也下了很大功夫去探求治疗方法。杂病的范围很广泛，大致上以内科病为主，也包括妇科、儿科和外科等疾病。张仲景对每一种遇到的疾病都不轻易放过，下功夫去进行病因病理的研究，对已经治好的病人，也常常去跟踪追访，问他们病后有什么感觉，是否复发。张仲景治病不一定都给病人用内服药，也经常采用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喷鼻等等治疗方法。他认为对某些疾病来说，这些治疗方法的效果也许会比内服药更好。

张仲景主张有病要及时治疗，无病要及早预防。他说，预防疾病的方法是饮食有节，劳逸适当。能做到这两条，基本上就能保持身体健康，少患疾病了。

张仲景一边行医，一边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记录行之有效的方剂。在多年行医经验的基础上，他撰著了一部《伤寒杂病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贡献给同行。后来，晋朝的名医王叔和，在仔细钻研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后，把这部重要的医书分开改编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论》专门分析伤寒病的病理，提出治疗方法，附载有效方剂。《金匮要略》则是治疗各种杂病的医方汇

集，载有大量药方。这两部医书都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张仲景以他自己的杰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赤壁鏖兵官渡之战以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发展了生产，增强了军事力量。他打算进军南方，消灭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进而统一全国。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挥军南下，直取荆州。这时候盘踞荆州的刘表刚刚死去，次子刘琮承袭了他的职位。刘琮听说曹军声势浩大，吓破了胆，暗地里向曹操投降。受刘表派遣驻守新野、樊城一带的刘备，见曹操大军迫近，想要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匆忙地向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退却。江陵是军事重镇，又是兵力和物资的重要补给地。曹操怕刘备占领江陵，就亲自率领五千轻骑兵，不分日夜地追赶。没几天工夫，曹操在长坂（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追上了刘备，把刘备打得大败，夺取了江陵。刘备从小道逃到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在那里和刘表的长子刘琦相遇，合兵一处，约有二万人。

对于曹操的南下，占据江东的孙权也感到很紧张。在孙权同意下，鲁肃到刘备那里去察看动静，并且说服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刘备完全同意鲁肃的主张，带领军队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省鄂城县北）。曹操收降了刘琮的军队八万多人，兵力增加到二十多万，他率领兵马沿江东下，直逼夏口。诸葛亮看到形势紧张，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急了，让我去孙权那里求救吧!”刘备就派诸葛亮跟着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会见孙权。

诸葛亮见到孙权，觉得孙权对抵抗曹操还有些犹豫不决，就对孙权说：“曹操破了荆州，威震四海，现在他顺江而下，直逼江东。孙将军如果想要抵抗曹操，就应该立刻跟他断绝关系；如果没有这份胆量，何不按兵束甲，趁早投降，向曹操称臣呢?”孙权一听这话。反问道：“刘豫州（刘备当过豫州刺史，古人不称名而称官衔，表示尊敬）为什么不向曹操投降呢?”诸葛亮回答说：“刘豫州是汉朝王室的后裔，读书人仰慕他，就像江河归大海一样，眼前遇到一点困难，怎么就能屈居人下呢!”孙权听诸葛亮这么说，十分激动，猛地站起来说：“我不能拿整个江东和十万甲兵，受人家的控制!我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不过刘豫州刚打了败仗，他又怎么能抵抗得了曹操呢?”诸葛亮说：“刘豫州还有精兵二万。曹操兵马虽多，但是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何况曹军又多半是北方人，

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又不习惯于水战。他们刚刚占领荆州，人心不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协力作战，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诸葛亮这样一分析，孙权觉得很有道理，增强了抗曹的决心。他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开会商讨抗击曹操的方法。恰巧在这个时候，曹操写信威吓孙权，说是他带领八十万军队讨伐江东，要同孙权见个高低。

在会议上，孙权把曹操的信拿给大家看，许多人大惊失色。长史张昭说：“我们可以凭借着抗拒曹操的，是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了荆州，得了刘表的水军和几千条战舰，沿江水陆俱下。他已经占有长江北岸的险要地方，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抵抗他!照我看，我们不如和他讲和，表示欢迎好了!”孙权听到这种投降的言论，心里很不高兴，起身离开了会场。鲁肃赶快跟在后面，追到屋檐下，对孙权说：“刚才张昭他们的那些泄气话，您可千万听不得。您应当把周瑜叫回来，请他一起来决定大计。”孙权接受了鲁肃的建议，宣布暂时休会，等周瑜来了再说。

周瑜当时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听说孙权召见他，就动身回古代人物画像到柴桑。他听了文武官员的意见，对孙权说：“将军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应当横行天下，哪能向曹操称臣呢?”周瑜接着分析说：“其实，曹军最多不过二十多万，现在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他们军马缺乏草料。北方士兵来到南方，水土不服，必然生病。这些都是曹军的致命弱点。依我看，这正是我们打败曹操的最好时机。请将军拨给我几万精兵，开赴夏口，击败曹操。”孙权听周瑜这么说，精神为之一振。他拔出佩刀，一刀砍下案桌的一角，对大伙儿说：“谁要是再提迎降曹操，就和这张桌子一样。”他任命周瑜做大都督，程普做副都督，鲁肃做赞军校尉，叫他们带领三万人马。与刘备的水军会合，协同作战。孙刘联军进驻长江南岸的赤壁，跟北岸曹操的军队隔江对峙，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曹操的士兵因水土不服，陆陆续续地生起病来；没有得病的士兵，不习惯水上的风浪颠簸，许多人晕船，恶心呕吐，失去了作战的能力。曹操对此非常焦急。有人献计把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铺上木板，造成“连环船”，就会四平八稳。曹操急忙命令工匠连夜赶造。连环船造成了，人在船上行走，就像在陆地上一样，果然平稳得多了。

统率孙刘联军的周瑜，得知曹操使用连环船的消息，就跟大伙儿商量对策。部将黄盖说：“连环船虽然四平八稳，但是它有弱点，最怕火攻。”周瑜说：“火攻，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怎样放火呢?要有个人去诈降，挨近他们，趁机放火才行。可这是很危险的事。”黄盖说：“我愿意去。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设法火烧曹营!”

几天以后，曹操接到了黄盖要求投降的信。这时候，曹操认为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同时认为孙权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江东覆亡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孙氏政权内部的分化极有可能。因此他对黄盖的诈降信以为真，还约定了黄盖来投降的日期和暗号。

到了约定的日子，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曹操得到士兵的报告说：“有十条插着青龙旗的小船向北岸开来了。”曹操高兴地说：“这是黄盖前来投降。黄盖一来，我的大功就告成了!”哪里知道黄盖的船上，装满了浇上油的枯柴干草，外边盖上帷幕。在离曹营不远的地方，黄盖叫点起火来。当时正刮东南风，火借风势，风趁火力，十条船就像十条火龙，飞快地顺着风势冲向曹营，把曹营的船只都烧着了。因为曹营的船是用铁链锁着的连环船，很快就烧成了一片火海。只见烈焰腾空，火光把江岸的石壁都照红了。曹军士兵一片惊慌，争着逃命，被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周瑜指挥联军主力，乘机向曹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曹军大败。孙刘联军分水陆两路乘胜追击，曹操带着残兵败将，由陆路狼狈逃走，最后回到了许昌，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向南进军了。

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曹军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又一个著名战例。曹魏代汉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归北方。孙权、刘备的联军因为力量不足，加上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所以他们得胜后就匆匆收兵。这样，曹、孙、刘三方的力量暂时趋向平衡，进入绷对缓和状态。三方都忙着整顿自己内部，积蓄力量，以备将来好按照自己的打算进一步行动。

曹操回到北方以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决定先从整顿军队、发展生产、网罗人才入手，充实力量。他派人在淮河、淝水等河流上训练水军；又派人兴修水利，开荒屯田，积储粮食；还发布了“唯才是举”令，把有真才实学的人网罗到自己门下来。

在此同时，曹操还一步步地迫使汉献帝刘协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他，准备把汉朝的天下夺取过来。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被迫封曹操为魏公，以冀州十郡（今河北省的大部分和山西省、山东省的一部分）作为封地，允许曹操在封地内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属。三年以后，汉献帝又被迫进封曹操为魏王，允许他使用天子才能用的旌旗，出入像天子一样的排场。这时候的曹操，名义上虽然还是汉朝的丞相和魏王而不是皇帝，实际上只差叫汉献帝让出皇位这一步了。可惜曹操这时候已经六十多岁，时光不饶人，他就准备把当皇帝的事留给自己的儿子去做。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死去了。他的儿子曹丕接替他做了魏王和汉朝丞相，随即着手准备完成他父亲未完成的事情。

曹丕的手段比曹操还要高明，他没有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先装模作样地带兵南征，显示自己手握兵权，并且有他父亲那样的军事才干，这样既能吓唬汉献帝，也便于拉拢更多的入来为自己捧场。他带兵回到了家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大摆筵席，宴请六军将士和家乡的父老百姓。他虽然还没有做皇帝，却在摹仿当年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的故事了。这时候，江南的孙权正忙于积蓄力量，他同刘备的矛盾已经变得很尖锐，顾不上跟曹丕对抗，听说曹丕带兵南下，就赶快派人前来祝贺曹丕继任魏王，表示了愿意和好的意思。曹丕见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跟孙权相安无事的结果，自然很高兴，于是就带兵回到许昌。

接着，曹丕授意他的亲信为他夺取汉朝天下制造舆论。亲信们心领神会，就不断地制造所谓出现祥瑞的传闻。他们一会儿说在曹丕的家乡谯县出现了黄龙，一会儿说在石邑飞来了许多凤凰，一会儿又说在饶安见到了白雉鸡。龙和凤在现实世界里都是不存在的，它们只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神鸟，在封建社会里被当作是皇帝和皇后的象征。白雉鸡在现实世界里虽然有，却不多见，封建社会里把它当作吉祥物。既然在曹丕的家乡出现了黄龙，这就等于说曹丕应该是做惶帝的真龙天子，而凤凰和白雉鸡是为黄龙做陪衬的，用来证明改朝换代的时候确实已经来到了。

在制造祥瑞传闻的同时，曹丕的亲信还利用了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谶chèn〕。太史丞许芝装模作样地说：“我看到过有本名为《易运

期》的谶纬书上说：‘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我仔细揣摩了这谶言的意思，才弄明白这‘言’字旁加个‘午’乃是‘许’字，两个‘日’字在一起，一个上，一个下，乃是个‘昌’字。合起来是许昌，乃魏王的发祥之地。‘其为主，反为辅’，是说魏王本应是君主，却做了丞相，是弄颠倒了。‘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是说汉朝在西京、东京建都，加起来已经享国有四百年了，气数已尽，应该让位给新的真命天子了。”接着，许芝又说：“《易运期》这本书上还说：‘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这‘鬼’字边与禾女’相连，不就是‘魏字’字吗?谶纬书早有预见，说魏王应该做天下之主了。”许芝这么一说，其他的人赶快随声附和，这个说：“谶纬书是最灵验的神仙预言，当年光武帝即位的时候，就应了谶纬书上说的话，所以不能不信。”那个说：“既然书上都这么说了，看来天命已定，汉朝天子应该赶快让位给魏王了。”说着，就有许多人把这些编出来的瞎话去禀报汉献帝，意思是催促他自己应当知趣，赶快让出皇位。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献帝听说叫他让位，自然很不乐意。他想：当年高祖皇帝和项羽逐鹿中原，开创基业是多么的不容易，光武皇帝中兴汉室，也曾经出生入死，祖宗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如今要经过自己的手奉送给别人，这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他不禁暗陪流泪了。可是他又不能不同意让位。因为满朝文武大都是魏王的人了。他自己早就是个被架空的傀儡了。看来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要是坚持不让位，那就会丢掉脑袋；而主动让位，也许曹丕还能手下留情，保得住一条性命。汉献帝想到这里，只好含着眼泪下了让位诏书，宣布把皇位禅让给魏王曹丕。

曹丕接到汉献帝的诏书，心里十分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谦让，叫人把诏书原封退回。汉献帝又一次下诏禅位，曹丕还是把诏书退了回去。汉献帝被弄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有人告诉他说：“皇位的禅代，决不可马马虎虎，应当举行隆重的典礼才行。”汉献帝这才领会了曹丕的意思，于是就赶快派人连夜在颍阴的繁阳（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修筑起一个禅位坛。在禅位大典上，先由汉献帝登坛祭告天地和祖宗。接着，汉献帝在上，魏王曹丕在下，汉献帝宣读禅位诏书，公开承认汉朝的气数已尽，愿意让位给天命所归的魏王曹丕。然后双方互换位置，曹丕正式宣告即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封汉献帝为

山阳公，送往河内郡的山阳县（今河南省修武县）居住。不久。曹丕宣布迁都洛阳，把繁阳改为繁昌，表示他建立的魏国是从这里开始昌盛起来的。到这里，汉魏之间的所谓“禅代”终于完成了，曹操经营了多年而没有实现的事，由曹丕实现了。事实上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

这段时间里，南方的刘备乘着赤壁之战的胜利，占据荆州，又想往益州（今四川一带）发展。这本来就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定下的策略。当时占据益州的刘璋懦弱无能，连他手下的一些人也认为他没有能力管理益州，抵抗曹操。有个叫张松的官员劝他把刘备请到益州，帮他掌权。刘璋同意了，派法正去请刘备。他哪里知道，张松和法正是密谋好的，要让刘备来益州取代刘璋。刘备知道以后，果然带人进入益州，不久就和拥护刘璋的将领发生了冲突。刘备接连得胜，可他的军师庞统也被杀死。留守在荆州的诸葛亮听说后，让关羽守荆州，自己带张飞、赵云等大将连夜去支援刘备。刘璋文不能武不会，哪里是对手?最后连成都也被包围起来。刘备又把西凉名将马超也联合起来，劝刘璋投降。刘璋没办法，只得出城投降，把益州让给了刘备。刘备如愿以偿，自任益州刺史，得到了真正属于他的一块地盘。

随后，刘备又想去夺取汉中。因为汉中是益州北面的门户，得到汉中，益州的安全就有保障了。汉中当时为曹操所占有，于是曹刘两家在汉中又打了一仗。刘备亲自带兵，曹操也到长安督战。一开始，曹军打了胜仗，可是领兵的夏侯渊瞧不起自己的对手老将黄忠，他说：“黄忠胡子都白了，还能打仗?”曹操劝他小心，他也不听。后来在定军山一战，黄忠以逸待劳，突然袭击，斩杀了夏侯渊。接着，赵云又用“空营计”杀败了曹将张郃。战争形势转为对刘备有利。几个月以后，天气炎热，疾病流行，曹军只好撤退。刘备占领了汉中，自称汉中王。他一心要消灭曹操，恢复汉室。

曹魏代汉的消息传到益州，刘备悲痛欲绝，他带着军民人等对天痛哭三天，然后在成都宣布自己即位称帝，继承汉朝的法统。因为他建立的汉朝势力范围只局限于巴蜀地区，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蜀国。刘备称帝后八年，公元229年，孙权也在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即位称帝，国号吴，历史上称东吴或孙吴。这样，就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附录大汉王朝大事记宦官弄权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图

谋不轨。和帝预知其谋，当时朝臣上下莫不附宪，唯独中常侍钩盾令（钩盾令属少府，宦官）郑众，不事豪党，遂与郑众定计诛窦宪。永元四年（92）六月，窦宪伏诛，郑众以功升迁大长秋（皇后近侍）。和帝每次策勋班赏，郑众往往辞多受少，和帝因此对之很是器重，时常同他议论国家大事，并封郑众为侯，东汉宦官用权自此开始。

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掌握朝政。建光元年（121），邓太后病死，安帝亲政。他的乳母王圣、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合谋告发太后兄邓悝有废帝之意。邓氏一族或废为庶人，或先后被迫自杀。安帝重用宦官李闫、江京与皇后闰氏兄弟闫显、闫景、闫耀等，共同执掌朝政，开启了外戚与宦官联合专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闫皇后及其兄弟，还有宦官江京、樊丰等人，阴谋定策另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刘懿年少即位，是为少帝。闫太后临朝，闫显以车骑将军执掌大权，并处死宦官樊丰、周广等人。不到一年，刘懿又病死。以孙程为首的另一伙宦官共十九人，乘机起事，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闫显被杀，闫氏倒台。孙程等以立帝有功，十九人均封列侯，宦官再度把持朝政，权势日盛。

桓帝时，梁冀专权跋扈，天子拱手，桓帝心虽不平，但又口不敢言。延熹二年（159），梁太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唐衡、左倌等五人密谋诛除梁冀。梁氏灭门后，单超等五人皆因诛梁有功，同日被封列侯，连小黄门刘普、赵忠等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此外，以冒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宦官掌权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①，狐假虎威，无恶不做。他们还兼作朝官，娶姬妾，蓄养子，并得以养子传爵袭封。他们的“见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搜刮）百姓，与盗贼无异”②。单超弟安官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盛为河内太守，左倌弟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恭为沛相，无不贪污残暴，毒害地方。单超之丧，皇帝除追封他为车骑将军，又赐东周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③。其威风无可伦比。单超死后，四侯更加骄横，天下为之语日：“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意为办事无准则，可恣意胡为）。”④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他因向前汝南太守李暠家求婚未遂，及到任，竟发吏卒捕女

至县衙，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根据举报，经过核实，将徐宣斩首示众。徐璜向桓帝诉怨，昏愦的桓帝反将黄浮髡钳（即剃发束颈），输作左校（遣送左校劳作）。中常侍侯览之兄侯参任益州刺史，对辖区内富豪，竟诬为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全部家财，前后累计以亿计。其后被太尉杨秉弹劾，押送来京途中，畏罪自杀。京兆尹于旅舍检查其行装，居然还有三百多车，全是金银锦帛珍玩，多得不可胜数。侯览本人更是“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⑤。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八十一顷”⑥。新建府第十有六区，都是亭台楼阁，画栋雕梁。他还掠夺良家妇女，以为姬妾奴婢。督邮张俭举奏侯览罪行，反被诛杀。是非颠倒，以至于此，民不堪命，只有“起为盗贼”。桓帝延熹八年（165）冬，立窦武长女为皇后，拜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窦武为人清身嫉恶，生活俭仆，多辟名士入朝为官，对于子侄亦能严加约束，使其遵纪守法。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不少正直大臣遭到逮捕及罢黜。窦武上疏桓帝，请求贬黜宦官，信任忠良，桓帝被迫赦免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

古代出游图永康元年（167）十二月，桓帝死，无嗣。窦太后与其父窦武商议，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于建宁元年（168）正月继位，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太傅陈蕃与窦武谋划诛翦宦官。窦武引用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窦武兄子窦绍为步兵校尉，监羽林左骑，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部队。又征召天下名士前司隶校尉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堂，共定计策。会五月发生日食，陈蕃谓窦武日：“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⑦窦武向太后建议：宦官但当供职宫中，主管生活服务琐事，不宜干预政务，尤其不能使其子弟担任要职。目前天下议论纷纷，正因此故。应当悉数诛除宦官，以清朝廷。太后以为任用宦官，本朝早有先例，不能尽废，但当诛杀其有罪者。窦武只好先杀掉专制宫内的中常侍管霸、苏康等，然后又屡奏太后诛杀用事宦官曹节等，太后犹豫不决，故事久未发。八月，侍中刘瑜上奏太后称：太白出西方，奸人在主傍，宜急防之。同时上书窦武和陈蕃，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窦武、陈蕃得书将发，于是又安排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以控制首都及周边地方政府机构。

正当窦武、陈蕃积极布置准备尽诛宦官时，宦官曹节、王甫、朱瑀等却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占据皇宫，并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驰人步兵营，与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禁军五校尉兵数千人屯洛阳都亭，准备抵抗。陈蕃闻难，亲自率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拔刃突入尚书门，与宦官王甫相遇，陈蕃拔剑叱甫叛逆，王甫命宫廷警卫执蕃下狱，当日遇害。王甫矫诏命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与新从边区征还京师，不知缘由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统五营士兵进攻窦武。深夜，王甫率宫中警卫虎贲、羽林、剑戟士等千余人，出屯北宫门，与张奂会合。明辰，两军在宫门外对阵。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谋反，营府禁军素来畏惧宦官，窦武部下逐渐散走归降，窦武、窦绍退走，王甫挥军追围，武、绍皆被迫自杀，窦武宗亲、宾客、姻属，、悉被诛戮、窦太后被软禁于南宫云台。自公卿以下，凡为陈蕃、窦武举奏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曹节、王甫等诛杀窦武、陈蕃后，曹节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升为中常侍，并任黄门令如故；其余十多名宦官皆封列侯。宦官完全控制了朝政，灵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门阙上书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⑧。于是宦官矫诏命司隶校尉刘猛急捕书写人，刘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结果被贬官。中常侍王甫因向渤海王刘悝（桓帝弟）勒索五千万钱未遂，乃与曹节等诬奏刘悝谋反，迫令自杀。刘悝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官属皆被杀。王甫等十二人自相封赏，“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⑨曹节、王甫一伙宦官当道后，贪污残暴，胡作非为，公卿大臣堵口吞声，莫敢有言。王甫养子王吉为沛国（治相县，今安徽睢溪县西北）相，尤为残暴。凡判处死刑的人，皆陈尸车上，标明罪状，巡行所属各县示众。遇到夏季尸体腐坏，则以绳索串连尸骨，遍游国中乃止，见者，无不惊恐万状。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死一万多人。当时任尚书令的阳球激愤说：“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⑩光和二年（179），阳球果然迁为司隶校尉。他借上朝谢恩之机，参奏王甫父子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等罪恶。灵帝命阳球亲临考问王甫等人，五刑俱备，王甫父子皆死于杖下。于是磔王甫尸体于洛阳夏城门，于尸旁立牌大书日：“贼臣王甫。”抄没其全部家产，妻子皆流徙外地。其后，阳球与司徒刘郃计议

收审曹节、张让等，却被曹节等先发，向灵帝诬奏阳球与刘合墨、少府陈球等“勾通书疏，谋议不轨”。灵帝昏庸，竟相信宦者诬告，阳球、刘郃、陈球等皆下狱诛死。曹节兼任尚书令，直接掌握政府中枢机构，宦官权势复盛。

光和四年（181），曹节死，张让、赵忠等十二人并为中常侍（宦官最高品级），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贪污纳贿，残害百姓，被称为“十常侍”。黄巾军起，郎中张钧上书乞斩“十常侍”，以谢百姓，反为张让等诬为与张角交通，被收掠死于狱中。张让、赵忠教唆灵帝聚敛天下，每亩增税十钱用来大修宫室。由于宦官从中贪污作弊，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不得不加增私调，百姓苦不堪言。贪残的灵帝还大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

县令县长，当面议价，富者交现金，贫者到任以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灵帝把他在各种名义下搜刮来的钱财，一部分命人带到他原来的封邑河间去买田宅，起第观；一部分则寄藏在小黄门、常侍家中。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昏愦无耻，竟至于此!宦官得到如此空前的宠遇，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东汉政府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寿终正寝之日，已为时不远矣。

注释①②《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

③④《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⑤⑥《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侯览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窦武传》。

⑧⑨《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传》。

⑩《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

《后汉书》卷五六《陈球传》。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传》。

第三十一章

党锢之祸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①。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②，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③，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

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④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倌、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⑤的罪行，左倌、左称皆畏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⑥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古代山水画鉴赏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聂（hé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⑦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借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⑧。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

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瑨与其功曹岑晊，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泭，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晊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泭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⑨。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⑩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⑩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⑩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⑩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

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注释①②《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③《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

④《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⑥《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⑧《资治通鉴》汉桓帝永兴元年。

⑨《后汉书》卷六七《党钢列传序》。

⑩《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俭传》。

《资治通鉴》汉灵帝熹平五年。

第三十二章

道教的兴起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形成于东汉末年。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夺利争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身上。而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感到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稳定其统治。于是佛教转盛，道家复起，道教也趁机而兴，企图用一套宗教救世之方，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迷信。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殷人尚鬼，故也重巫，如以巫咸、巫贤为相。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即有很多巫觋古代风景画鉴赏降神的描述。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仙药可以长生不死，迎合上层贵族要求永享富贵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醉心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药。汉武帝宠信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终日梦想如黄帝一样飞升成仙。这些神仙学说和方术思想逐渐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其次，表现在它与道家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关系上。先秦与东汉道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关于《老子》之被神学化以及老子何以被奉为道教教主，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说明。从时间上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①。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这里所说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无关，而是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拥有众多的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因此对社会下层人民有较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为符箓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立。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至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亦云：“太平道者，坚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主要在下层群众之间流行，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它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而领导集团有武装起事的预谋，传道的目的在于借用宗教外衣为起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口号，向封建朝廷实行造反，军队著黄巾，张角自称黄天，表现出黄老崇拜的特色。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反叛朝廷的起事，一时“八郡同时俱发”，“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后被东汉政府动员大军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

五斗米道也是中国原始的道教，它的开山祖师是沛国丰人张陵。关于张陵的事迹，史书记载极其简略。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记云：“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三张传道世系的最早记载。另据《典略》谓：“汉中有张修，”“修为五斗米道。”张修死后，“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④。又《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起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裴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是历史上确有张修其人。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

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根据以上几条记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教权。以上两说均有所本，并志于此。

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恩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日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遭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⑤。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⑥。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

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古代风景画鉴赏《太平经》提出“太平”的社会理想，是该书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美好概念。书中解释“太平”为“太者大也，平者正也”（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48页）。太平世界是和谐公正安定的世界，“凡事皆能得其宜，帝王优游，盗贼无有，百姓无怨，颂声不绝”（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92页）。这种向往和平，反对战乱的思想，引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共鸣，对于汉末民间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易参同契》是稍晚于《太平经》的道教丹鼎派理论著作。它的中心思想，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经。书中主要讲述炼丹的用药、火候及服用效应等。该书文字古奥，语言含混，千余年来，学者反复研味，多方诠释，仍不能得其真意，甚至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家也慨叹说“无下手处，不敢轻议”⑦。然而，无论如何，《参同契》却推演出许多新的丹鼎学说，奠定了道教外丹学说的基本理论，被称为丹经之祖。

注释①《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裴注。

⑤《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⑥《后汉书》卷三。下《襄楷传》。

⑦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黄巾大暴动东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竞相专权，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安帝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今河南省）一带，“饥死者十四五，至有灭户者”①。尽管如此，豪族地主和封建国家压榨搜刮仍有增无减，官吏贪婪无厌，众多农民死于箠楚之下。因此，从安帝以来，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接连不断，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不下百次，至于各地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②，更是不可胜数。当时，农民中流传一首歌谣说：“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③反映了农民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是继起的暴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终于形成了以张角为首的全国性黄巾大暴动。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疠疫流行。张角画符诵咒，以治病为名创立和传播太平道教，利用宗教，在农民中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张角派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传道，受到农民的信任。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天下辐负（背着小孩）归之”④，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东汉王朝屡下“赦令”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命州郡使用武力“捕讨”。司徒杨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张角的势力正在“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⑤，因此，他建议皇帝命令州郡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首领），’⑥，这样“可不劳而定”⑦。其后，侍御史刘陶等人也上疏灵帝，请求“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⑧，企图用收买手段，消弭起义。但是东汉统治者的上述对策，并没有得到实行。

在此有利形势下，张角加快了起义准备。他把道徒以“方”为单位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

帅。组织工作就绪后，张角等人“窃人京师，觇视朝政”⑨，深入了解东汉王朝的内部情况，最后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张角向道徒们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⑩的口号，向人民宣告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号，并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信号和攻打的目标。

中平元年（184）春，张角派大方马元义调荆、扬二州数万信徒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集中，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多次到洛阳，联系宦官封胥、徐奉等人作内应，约定于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但是，当此紧要关头，起义军中的叛徒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泄露了起义的全部计划。东汉政府下令搜捕，马元义在洛阳被捕牺牲，太平道的徒众一千多人遭到杀害；同时，又下令冀州官府逮捕张角等人。张角得知计划泄露，当机立断，他派人星夜驰向各方，通知信徒，立即举行起义。中平元年（1814）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黄巾军由张角统一指挥，向着东汉封建统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黄巾军在起义后迅速形成三个中心。一支是由张角三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一支是由波才领导的颍州黄巾军；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大暴动后，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驻都亭（洛阳附近），并分遣八都尉屯兵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险要关隘；又遣中郎将皇甫嵩、朱隽、卢植、董卓等率兵分头镇压起义。为了纠集豪族地主武装镇压起义，灵帝采纳中常侍吕强建议，宣布取消党禁，赦免党人。于是各地豪族地主纷纷起兵，与黄巾军为敌。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郎中张钧大胆向灵帝提出诛杀宦官，以谢人民的主张。他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搜刮）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

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昏庸的灵帝不但不采纳，反而替宦官辩护，结果张钧被宦官所诬杀。

起义前期，各个战场上的黄巾军均给予官军以沉重打击。张角领导的冀州黄巾军活捉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斩杀幽州刺史郭勋、太守刘卫，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并先后打败卢植和董卓率领的官军。当年三月，南阳黄巾军张曼成攻克宛城，杀死太守褚贡。四月，颍川、汝南黄巾军在波才、彭脱指挥下，打败朱隽，并把皇甫嵩的主力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一时之间，农民军声势浩大，官军被打得狼狈不堪。

本来形势的发展对黄巾军很有利，但由于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波才的颍川军包围长社后，失去警惕，“依草结营”，给皇甫嵩以可乘之机。皇甫嵩乘风放火，对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皇甫嵩令军士皆手持一束燃苇登城，使锐士乘间突围，纵火大呼，城上举燎相应，嵩从城中鼓噪出击，恰在此时骑都尉曹操率领援军赶到，合攻黄巾军，义军因之大败，几万人遭到血腥屠杀。接着，波才军余部于阳翟，彭脱义军在西华，相继失败。之后，皇甫嵩调军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军领袖卜巳不幸被俘。朱隽一军则继续南下进扑南阳一带义军。

在南阳战场上，张曼成斩杀南阳太守楮贡后，在宛下屯驻百余日，军事上没有新的进展。同年六月，东汉政府派秦颉率兵向起义军反扑，张曼成不幸牺牲。黄巾军推赵弘为帅，队伍扩充到十多万人，将新任的南阳太守秦颉赶跑，再据宛城。朱波会同荆州刺史徐璆、南阳太守秦颉等地方军，合力围攻宛城。从六月至八月，义军粉碎官军多次进攻，坚守住了宛城，朱浅几乎被撤职。但黄巾军错过主动出击时机，坐使官军重新积聚力量扭转局面。赵弘在战斗中牺牲后，义军又推韩忠为帅，韩忠被杀，再推孙夏为帅，继续战斗。由于官军不断增兵，义军毫无后援。十一月，宛城陷落，孙夏率义军向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内的精山转移。朱洩乘机追击黄巾军，孙夏战死，黄巾军又有一万多人牺牲，南阳的黄巾军主力，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在冀州地区，起义爆发之后，张角首先率领义军攻占广宗（今河北

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诸城邑。东汉政府派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镇压。卢植开始虽然取得小胜，斩获黄巾，军万余人，但他虽倾尽全力“筑围凿堑，造作云梯”，一直未能攻下广宗。东汉政府无奈，只好又改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替卢植去镇压，董卓在下曲阳与义军较量，又被张角一举击破。他围攻广宗三个月，广宗屹然不动。八月底，东汉政府调左中郎将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广宗战场。这时张角已病死由其弟张梁统率广宗义军。

“梁众精勇，嵩不能克”，皇甫嵩只得“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可是，在十月间的一场战斗中，由于义军疏忽大意，皇甫嵩“潜夜勒兵”，鸡鸣时进扑义军阵地。义军仓促接战，张梁阵前牺牲。与张梁一道战死的有三万多人，其余不甘屈服，投河而死者五万余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军又攻破下曲阳，张宝等十多万义军被杀害。残暴的东汉统治者对农民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因张角已先病死，竟棺戮尸，传首京师”，并在下曲阳城南积尸封土，筑为“京观”。这种野蛮的行径，并没能改变东汉统治者覆灭的命运。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镇压，但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中平二年（185），黄巾余众和各地饥民，又举起各种各样的旗帜，活动在黄河以北的原野上。据《后汉书·朱隽传》云：“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风、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之徒，并起山谷问，不可胜数。”其中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黑山军首领张燕（即张飞燕，原姓褚，张牛角战死，改姓张）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发展成为百万人的队伍，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他们长期坚持抗击官军和袁绍割据势力的斗争。继黄巾军而起的暴动集团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各个集团分散行动，互不相属，因而不能集中力量，整齐步伍，向着共同的敌人进军。张燕虽与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但他并不能把各集团领导起来，而且他的反抗意识并不坚定，起事后不久，即“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被东汉政府任命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

中平五年（188），当时分散在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并州的

黄巾军余部，再次发动起义。如郭太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抗击董卓的军队。同年十月，青、徐一带黄巾复起，声势巨大。徐州黄巾军为陶谦阻击后，攻破北海。北海太守孔融慑于起义威势，出屯都昌（今山东临朐境），复被起义军管亥所部包围，直到刘备兵到才解围。青州黄巾再起后，先后进攻泰山、兖州、东平等地，杀死任城相郑遂，兖州刺史刘岱，发展至百万人。曹操倾全力阻击这支义军，在寿张东与义军“昼夜会战”，被义军击败，济北相鲍信被杀。义军人数虽多，但妇女老幼等非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军需供应全靠“钞略”补给，这就为其流动作战带来极大困难。初平三年（192）这支义军被曹操所收降，曹操简其部分精锐，组成“青州兵”，成为他后来统一北方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而黑山军在被东汉政府招抚后，后又“渐寇河内，逼近京师”，直至建安十年（205年）夏四月，才由张燕率领其众十余万人归降曹操。黄巾大暴动，至此宣告结束，但东汉政权，也被割据势力所瓜分，历史进入豪族混战的局面，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注释①《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②《齐民要术》卷三引崔宠《四民月令》。

③《全后汉文》卷四六。

④⑤⑥⑦《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赐传》。

⑧⑨《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⑩《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八《宦官列传·张让传》。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一《朱隽传》。

第三十三章

张鲁雄据巴汉与黄巾大暴动同时，在蜀郡，张修、张鲁也造作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东汉时期流行于巴蜀、汉中原始道教的一个流派，其创始人是沛国人张陵。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张陵之孙总道主张鲁为首领，主要活动于四川西部，完全按照其乃祖乃父（张衡）所贯彻的宗旨行事，将五斗米道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迷信在传播；另一支是以巴郡教区张修为首领，活跃于巴郡（今重庆市区）、汉中一带，他们在东方太平道的思想影响下，以五斗米道为工具，于中平元年（184）黄巾大暴动之后，也随之发动“叛乱”，攻占了巴郡、汉中相当大的一块地区。

汉末熹平、光和中，到处发生农民暴动，为了加强对各地“叛民”的镇压，汉灵帝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称州牧，选派有名望的宗室、列卿充任，以总揽一州的军政大权。中平五年（188），宗正兼太常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来到四川，在绵竹（治今四川德阳县北）建立起益州最高行政机关。刘焉和东汉朝廷中许多公卿大臣一样，冀图乘东汉“政治衰缺，王室多故”①之机，离开京师，到外面去占据一块地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政首领。因此，他一到绵竹，即迫不及待地实行“抚纳离叛，务行宽惠”②的政策，阴谋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

刘焉认为，四川的五斗米道势力和汉中的东汉政权是他“阴图异计”的两个重要障碍。于是刘焉首先对张鲁进行笼络，而张鲁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也想寻觅一个政治靠山，以确保其既得权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加之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③，刘焉利用这种关系，于初平二年（191）派张鲁为督义司马，并利用张鲁和张修之间的五斗米道关系，给张修以别部司马的名义，令其合兵进攻汉中。

张鲁在取得张修的合作后，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张鲁在武都入汉中的孔道上，“因即峭岭”，修了一个“周围五里，东临溶谷，杳然百寻，西

北两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以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④的强固城堡，即后世所谓的“张鲁城”。在张鲁城不远处还有“张鲁治”、“张天师堂”等建筑。张鲁以此为活动中心，大肆传道，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中人民的支持下，张修和张鲁掩杀了东汉汉中太守苏固，消灭其武装力量。汉中部分地方豪强势力如赵嵩、陈调和顽抗的陈固等亦也消灭。从此刘焉便以“米贼断道”为借口，与东汉统治者断绝联系，利用农民武装力量割据巴蜀。

张鲁既是五斗米道世家、道主，又是广拥部曲的豪强。攻下汉中以后，他认为割据汉中的时机已到。初平二年（191），张鲁袭杀了张修，并收编了他的队伍。于是，他把自己的活动中心由“张鲁城”迁到南郑。兴平元年（194），绵竹大火，燔烧城府辎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刘焉徙居成都，疽发背死，其三子刘璋领益州牧。刘璋为人闇弱，张鲁骄恣，不肯承顺，刘璋杀张鲁之母及弟，因此，张鲁与之公开决裂，在汉中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割据政权。建安六年（201），张鲁派兵攻下巴郡，从此，他便成为一个占有巴、汉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刘璋屡次派兵攻打张鲁，皆为所败。赤壁战后，刘璋采纳别驾张松建议，遣法正请刘备人川。刘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⑤，使讨张鲁。

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张鲁控制下的汉中地区居民，都得加人五斗米道，即使“流移寄在其地者”⑥亦“不敢不奉”⑦。初入道者皆称“鬼卒”；入道既久而又笃信不疑者称做“祭酒”，“各领部众”。祭酒本是当时社会上对某些有地位人的尊敬称号，因而“各领部众”的祭酒乃是五斗米道中的上层分子；领有部众特多、在五斗米道中特权更大者，则称做“治头大祭酒”。张鲁的统治办法是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⑧，即除在郡一级设太守府及其僚佐以外，郡以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乡、亭等皆不设相应的官吏，而是“以祭酒为治”，使各级祭酒行使原基层官吏“治民”、“理民”的职能。祭酒既是宗教统治者，又是行政统治者，这样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要比单纯的行政统治更为牢固和有效。张鲁的汉中政权，按照《太平经》的设想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以下一些改良措施。

首先，初入道和治病者都得缴纳五斗米，作为祈祷费。此后鬼卒们

要常年缴纳，“其供道限五斗米”⑨，使原来道徒的一种宗教性负担，扩展成为普遍实施的通供赋税。另据李膺《益州记》记载：“受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这样种类繁多的实物贡赋，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米民”，则是把一部分贫苦农民控制起来，从事专门的粮食加工生产，以供养张鲁政权的粮谷需要。在此基础上，张鲁命“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⑩。义舍中置有米肉，据说是供“行路者量腹取足”之用，如果取得过多，“鬼道辄病之”。既然汉中居民都得信奉道教，张鲁义以道教组织体系作为其政权形式，这种义舍显然是为张鲁传布政教命令而设置的一种机构。义舍和义米、义肉，并不包含什么“共同生活”的意义。

其次，张鲁对传统的刑法亦有所改变。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这说明对触犯法纪的人，还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只是在三次原谅之后，仍然坚持不改者，才使用刑罚。对于那些“有小过者”，则令其“治道百步”，可以免除其罪。这比旧的科条要减轻了许多。张鲁所以采取比较宽简的刑律，主要是为了安定巴汉地区的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为他是了解东汉政府汉中政权怎样被当地农民推翻的。

再次，张鲁政权“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推行“其市肆贾平”⑥的政策，以发展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在汉末天下大乱，全国经济凋敝，城乡一片残破的情况下，即使要巩固局部地区政权，也必须做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否则都难免遭到覆灭的下场。曹操所以能够战胜群雄，统一北方，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能够认真去解决。他首先在许县实行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以后又逐步推广到其所占领地区，积累了较充足的军粮，最终才得以战胜袁绍，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张鲁吸取了曹操的成功经验，非常注意经济问题，加之汉中、巴郡地区战争较少，关西之民来奔者数万家，使这个政权有了一定的实力，即使拥有益州大一部的刘璋对之也无可如何。张鲁实施的“保境安民”政策，史称“民夷便乐之”，这是他能够“雄据巴、汉垂三十年”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东汉政府，已无力约束张鲁，只好给以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即汉中）太守的官位，承认了张鲁的割据。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从散关出武都进攻汉中，

至阳平关，张鲁遣五官掾接洽投降，其弟张卫不肯，率领部众数万人拒关坚守，曹军不得进。曹军军粮尽，曹操准备退兵，部下郭谌以为不可。他说：“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偏师）可攻。悬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曹操犹疑不定。是夜天色昏黑，曹军迷惑，误入卫营，张卫以为被曹操大军包围，遂降。张鲁闻说阳平关已被攻破，将要“稽颡归降”，部下闫圃认为；“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归顺），功必多，”劝张鲁南人巴中，投奔巴酋杜濩，然后与曹操谈判投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在张鲁逃奔巴中前，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张鲁止之日：“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命人封藏完毕之后，才离去。曹操进入南郑，见宝货仓库保存完好，对张鲁很是嘉奖，遣人对之进行慰喻。张鲁本有降意，至此遂率领部众向曹操投降。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闫圃皆赐封列侯。曹操还特为其子彭祖聘娶张鲁之女为妻，进行联姻，以示宠信。张鲁建立的巴汉政权，至此告终。

注释①②《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③《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

④《水经注·沔水篇》。

⑤《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⑥⑦《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⑧《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⑨《华阳国志·汉中志》。

⑩《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世语》。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董卓之乱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再度激化，一方面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又趋剧烈。

黄巾起义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加强镇压力量，扣平五年（188），汉灵帝接受刘焉的建议，先后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的官僚充任，于是州的长官叭只具有行政权，一变而为兼有领兵治民之权。这就给一些将帅和地方长吏以扩充军事实力的权力，出现州郡牧守擅兵局面，加速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灵帝为了加强防护京师的力量，在首都设置西园八校尉，扩建八支近卫部队，袁绍、曹操等七人被任命为校尉，各统一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兼为元帅，统帅其他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归他统管，宦官同外戚、官僚士大夫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去，蹇硕欲杀死何进，拥立王贵人之子刘协为帝，独揽大权。为何进察觉，乃急引兵回营，蹇硕之谋未能得逞。于是何皇后之子刘辩得以继位。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何进素知宦官专权乱政，为天下人所痛恨，便与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等谋议铲除宦官。蹇硕疑不自安，作书与中常侍赵忠等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指宦官），扫灭我曹。但以硕典重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①何进同乡中常侍郭胜素亲何氏，他与赵忠商议后向何进告密。何进先发制人，命黄门令逮捕蹇硕处死，并接管蹇硕率领的禁兵，成为独掌军权的实力人物。

何进独揽大权之后，袁绍以窦武失败的教训劝他抓紧时机消灭宦官：“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②并告诫他不可轻易进宫。何进与袁绍定策，欲尽罢除诸宦官，并以其计报告太后。何太后因凭借宦官势力登上皇后宝座，她与宦官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不同意何进的建议，他说宦官统领宫中事务，汉王朝自开国以来，历来如此，怎可废除?何进无法改变太后成见，袁绍提醒何进，“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③。何进犹豫不决。

于是袁绍又建议何进多招四方猛将及各地豪杰，使其各自领兵入京，以胁迫太后。何进表示赞同。主簿陈琳认为“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④。尚书卢植亦言不宜召卓人京。何进皆不听，遂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进屯洛阳附近，向朝廷提出消灭宦官的建议。太后犹不从，何进之弟何苗亦劝进深思，何进意更狐疑。袁绍担心何进变计，乃威胁说：“今交搏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⑤何进于是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以控制首都洛阳及河南地区军政大权。袁绍接受任命后，一面命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官，一面催促董卓等人迅速上路。直至此时，何太后才感到事机不妙，被迫罢免了张让等当权宦官，诸常侍、小黄门皆面见何进谢罪，听候处置。袁绍建议何进趁机一网打尽，何进不许。何进劝他们各回封国去享清福，宦官们不肯自动下台，秘密策划反扑。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临洮在西汉时为一防御羌人边陲重镇，地理形势甚是险要。当地人民长于骑射，习性勇武剽悍。董卓自幼生长在一个武官家庭，力大体壮，粗猛有谋，史称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⑥。青年时尝游羌中，尽与羌豪相结，精通羌胡事，以健侠知名羌胡。东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随中郎将张奂共击汉阳叛羌，屡立战功，连升官阶，一直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董卓拜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率兵攻打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不久，又被任命为中郎将、破虏将军，随同车骑将军张温进攻金城叛将边章、韩遂。中平四年（187），韩遂与马腾联合向三辅进攻。董卓被朝廷任命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共同将韩遂、马腾击败。由于董卓在对西羌和韩遂、马腾作战中，壮大了凉州兵的势力，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以致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一是中平六年（189），东汉政府征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九卿之一），董卓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不去洛阳就职；一是当灵帝将死时，玺书拜他为并州牧，命他将兵权交与皇甫嵩，他再次抗命不遵，并

带领部队驻守河东，以观时变。这次当他得到何进的召唤，他认为是篡权的好机会，立即引兵向洛阳进发，并上书请求惩办宦官张让等，“以清奸秽”。董卓还未到达洛阳，宦官张让、段硅等假传太后旨意，召何进人宫议政，事先使党羽数十人埋伏在官门外，当何进出官时，发动突然袭击，将何进杀死。张让、段娃等作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不肯信，日：“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何进首级掷地日：“何进谋反，已伏诛矣。”⑦何进部将和袁术等听说何进被害，领兵焚烧宫门，张让、段硅等见势不妙，慌忙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及宫内官属数十人逃走。当他们逃至小平津（黄河重要渡口，在今河南孟津东北）肘，张让被逼走投无路，投河自杀。与此同时，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勒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斩首，共诛杀二千余人，有些无胡须的人也被当做宦官杀死。

当洛阳大杀宦官之时，董卓已率兵接近京城，远见火起，知朝中有变，乃引兵急进，天尚未明，到达城西，听说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少帝见到董卓带兵卒然来到，恐怖涕泣。群臣见此情景，对董卓说：“有诏却兵。”董卓早怀异心，怎肯听从，乃对群臣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⑧遂与少帝和陈留王，一起回到洛阳。

古代风水画鉴赏董卓领兵进入洛阳，恰好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来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⑨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难。不久，何进及其弟何苗的一些部曲投归董卓，董卓又收买丁原的部属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兼并了他统领的部队，再加上他从凉州带来的三千人马，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董卓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他先后自封为司空、太尉、相国。为了削弱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他准备废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他同袁绍商议，袁绍持异议，董卓按剑怒叱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⑩袁绍勃然大怒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罢引佩刀长揖而去，座上公卿，见此情景，皆大惊愕。董卓新到洛阳，又因袁绍为世家，亦未敢加害。袁绍惧怕董卓报复，当晚奔冀州。董卓采纳部下周珌、伍琼建议，授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之弟袁术和曹操，不愿屈从董卓，也先后逃离洛阳，别图发展。

董卓掌权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欺世盗名，假惺惺地外示宽柔，起用党人名士做朝官，外放大臣为牧伯太守，平反陈蕃、窦武及诸党人冤狱，“以从人望”。他起用周璐、伍琼、郑泰、苟爽等，处以要职；其染党锢者如陈纪、韩融之徒，皆任为列卿。知名大儒蔡邕以前在宦官打击下，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间迁升三次，位至侍中。对其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董卓也尽力笼络，如任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仙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对名将朱傍表面亲近而内心忌惮，董卓自为太尉，以朱隽为副，但不令其真正掌握兵权。

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刘协为帝后，以为天下安定，可以为所欲为，对人民一味掠夺残杀。董卓生性残忍，经常放纵士兵抢劫财物，掳掠妇女，使洛阳一带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遣兵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当时正值百姓社祭，董卓士兵杀死全部男子，掳夺妇女、财物，将人头系在车辕上，诡称“攻贼大获”，高呼“万岁”。回到洛阳城内，将男子首级焚烧，将妇女赏给士兵为婢妾。董卓的种种暴行，激起人民的强烈怨恨。关东地区拥有武装力量的州郡长官，也乘机以讨伐董卓为名，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初平元年（190）初，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以及典军校尉曹操等联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是时，黄巾余党郭太等率十余万众，再次起事于西河白波谷，转攻太原、河东等地，与关东军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董卓恐惧，乃鸩杀弘农王，准备迁都长安，召集公卿会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不同意迁都长安，在朝廷上争论没有结果，伍琼、周璐又力谏不可。董卓大怒，下令将伍、周二人斩首，黄琬、杨彪降为光禄大夫，决定挟持汉献帝西迁。在临行前，董卓下令将洛阳宫殿、官府全部烧毁，二百里内民居洗劫一空，荡然无存。他强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西迁，一路上老百姓在军队的践踏和抢掠之下，死伤很多，由于粮食缺乏，因饥饿而死者也为数不少。董卓还命人挖掘皇帝及公卿陵墓，盗取珍宝。董卓的倒行逆施，不仅使洛阳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也使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洗劫，大批书籍及文物损毁殆尽。

迁都长安后，董卓授意天子拜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他将从洛阳等地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积藏在郿坞，城墙高厚皆七丈，号曰“万岁坞”。董卓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他大封亲戚为官，“宗族内外，并居列位”与此同时，董卓大肆诛杀异己，“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弄得“百姓嗷嗷，道路以目”⑩。一次，董卓去郿坞巡行，命公卿百官在长安西门外设宴送行，董卓于坐中杀死数百降人助宴。被杀的人，先断其舌，次斩手足，然后挖去眼睛，最后投入滚烫的开水锅中活活煮死，与会公卿大臣有人被吓得遗失匕箸，董卓饮食自若。其凶残野蛮，以至于此!天下之人对董卓及其凉州兵恨之骨，够有诛灭之心。

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中郎将吕布等，密谋诛董卓。吕布自从杀死丁原之后，成了董卓的亲信侍从，二人誓为父子。后来吕布因小事失卓意，险些被董卓用手戟刺死，吕布由此阴怨董卓，加以吕布私通宫中婢妾，心中益不自安，遂参与王允密谋，许为内应。四月，献帝有疾新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王允等乘机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带士兵十余人伪装卫士，守住宫门，等待董卓到来。董卓入门之后，李肃一戟刺去，董卓伤臂，堕落车下。他大声呼唤：“吕布何在?”吕布应声喝道：“有诏讨贼臣!”举矛将董卓刺死，接着又杀死几名董卓的亲信。吕布取出怀中诏版向吏士们高声宣布：“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吏士皆正立不动，“大称万岁”!长安城中百姓听到董卓被杀消息，纷纷“歌舞于道”，不少士女卖掉珠玉衣装，沽酒买肉，以相庆贺。

董卓死后，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共掌朝政。王允刚愎自用，不讲策略，许多过去被追依附于董卓的公卿大臣皆被处死。著名学者蔡邕，听到董卓被杀消息，表示惊叹，也下狱身死。董卓部下皆怀恐惧之心，王允也未能妥善处置，致使董卓部将李傕（音决）、郭汜等相与结盟，集兵十余万，进攻长安，打败吕布，杀死王允。不久，董卓部将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又展开了两年多的火拼，使长安及其附近的关中地区，成为厮杀的战场，居民逃散，行旅断绝，出现了诗人描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汉献帝徒具虚名，东汉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接着而来的则是关东军阀的更大混战，逐步形成了长时间的分裂局面。

注释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⑤《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⑧《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注引《典略》。

⑨⑩《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